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顾卫民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顾卫民著. —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678-007-6

I. 中... II. 顾... III. 罗马公教—基督教史—中国 IV. B97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3992号

责任编辑 陆坚心
封面装帧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绍军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顾卫民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960mm 1/16 印张 33.75 字数 455千

2003年4月第一版 200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 3000

ISBN 7 80678 007-6/B · 1

定价: 70.00 元



顾卫民：1961年12月生，上海市人。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意大利历史科学委员会暨米兰国际关系史学会会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著作《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年上海），《刚恒毅在中国》（1998年意大利文版），《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2001年北京），《“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合译，2001年上海）。曾先后赴意大利宗座格里高利大学，罗马大学，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特兰托大学，英国阿伯丁大学及中国台湾地区辅仁大学，中原大学以及政治大学访学。

编纂说明

一、本书作者试图以编年史的方式,比较全面、公正、客观地描述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史,但最终能否体现此种意图,只能有待于史学界和广大读者评说。作者更希望此书只被看成是个人对于历史的一种理解。

二、本书在时段上分为唐元时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时期,主要依据天主教入华的三次历史过程而划分。唐朝的景教并非天主教,但著名历史学家方豪在编写《中国天主教人物传》时,也将唐朝列入其内,这可能是出于对历史渊源及背景的尊重,本书也仿此例。“明清时期”并不包括晚清,而是以禁教时期的结束为结尾,以便更完整地体现天主教第二次入华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49年西方传教士的撤离作为第三期,也应符合历史本来的事实。

三、在记叙每一年发生的历史事实时,每一事件之间以○符号隔开。在日期的表述上,阿拉伯数字表示阳历,中文数字表示阴历。外籍传教士在首次出现时一般均标明西文名字。

四、为有助于读者了解史事原委,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年份之下,附上原始文献,以备查考。它们包括历代中国朝廷及皇帝的谕旨,奉教士大夫为西士著作所写的序跋,重要的护教及反教文献,相关的游记和诗歌,教宗及教廷的通谕、牧函及部令,各修会首长的报告,传教士著作、日记的摘要,报章杂志的相关评论等等。

五、许多重要的中西人物,均附有生平、职官及著述简介。

六、为增加读者对历史氛围的感受,本书配有多幅图片,其中有些是历史图片,另外一些著名的教堂、坟茔以及教会建筑,则是作者历年游历时亲自拍摄的。

七、作者感谢许多中外人士的帮助。使作者尤为铭感的是上

海书店总编金良年先生一心扶持学术著作出版的热忱和远见。他对于书稿的许多中肯意见都被采纳，他还亲自排定了书中的图片，确定了版式。作者也应对责任编辑陆坚心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他十分仔细地校对了书稿，改正了疏漏及排印中的问题，校对科的诸女士和先生为保证此书顺利出版也付出许多辛劳。所有这些，作者深觉难以报偿，只能深深地铭记。

八、由于资料及文献来源众多，虽然作者力图弥补，但仍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地方。更由于作者学识所限，错误缺点在所难免，作者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顾卫民

2002年9月16日

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

景教“大德”(主教)阿罗本(Olopen)自中亚携经籍来到唐都长安(今西安)。唐太宗特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到西郊迎迓,一直请入宫内,在皇宫里“问道”,在“书殿”里“翻经”。

638年(贞观十二年)

七月,皇帝诏令:“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这座建于长安义宁坊的景教寺称为“波斯寺”,所谓“僧”即教士。该诏令称景教为“经教”。

650年(高宗永徽元年)

高宗敕令诸州各建景教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时景教大行,“法流十道”,“寺满百城”。

651年(永徽二年)

波斯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完全征服,伊斯兰教在中亚占了统治地位,聂斯脱里派(景教)传教士进一步向东迁徙。

683年(弘道元年)

高宗去世,其三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临朝称制。

689年(永昌元年)

武则天改唐为周,改元天授。

694年(武周延载元年)

八月,景教士阿罗憾为武后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敦煌出土的景教经典



高昌出土的唐代
景教寺院壁画《棕
枝主日》残片

695年(武周天册万岁元年)

四月，“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完工。这座建筑物位于洛阳城西皇城正南，端门外，高一百零五尺，八面，面各五尺。柱基以铁熔铸，像一座山，周围一百七十尺，高两丈；铁山之下又以铜龙负荷，四周都是石刻的怪兽。天枢顶端有一云彩形盖，嵌大火珠，珠由四条蛟龙承托。全部工程耗费二百万斤铜铁。

698年(圣历元年)

洛阳有一名叫用壮的和尚，指责景教。

705年(中宗神龙元年)

武则天去世。唐中宗恢复帝位及唐国号。

710年(睿宗景云元年)

四月一日,阿罗憾去世。

712年(玄宗先天元年)

八月,睿宗传位玄宗,改元先天。○长安有一些士大夫排斥景教。

714年(开元二年)

唐朝廷下令推倒“大周万国颂德天枢”。

732年(开元二十八年)

10月3日(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授首领果毅,赐僧紫袈裟一付,及帛五十匹。”(《册府元龟》卷九七五)

742年(天宝元年)

玄宗命大将军高力士将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帝的画像,送到景教寺内安置。先前,玄宗还命其弟宁国五王到景教寺内行礼,并建神坛。

744年(天宝三载)

大秦国景教士佶和来长安觐见玄宗,皇帝下诏要景教寺主持罗含、普论等十七位教士与主教佶和一同到兴庆宫颂经行忏,并亲题榜额。

745年(天宝四载)

九月,皇帝诏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长安和



陕西周至县大秦寺遗址

洛阳)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会要》卷四十九)

755年(天宝十四载)

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入蜀避难。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肃宗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教寺。

781年(德宗建中二年)

由景教士伊斯(叙利亚文 Yazedbouzid)出钱,其子景净撰文,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书写人为吕秀岩。据碑上叙利亚文,作者景净是“省主教(Korepis Kopa)兼中国总监督”。此碑高约十英尺,宽不到四英尺,厚一英尺,重二吨。碑头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一个十字架,旁有无角之龙名“螭”者环绕,左右配上百合花。碑下和左右两侧均有以叙利亚文刻着的景教士名称和职位。碑文的历史部分叙述了景教由阿罗本介绍到长安以后,受太宗以下六代皇帝优礼的经过。碑文的教义部分则将基督教的重要教义介绍给了中国人,如天主自有(先先而无元)、三位一体(三一妙身)、创造宇宙(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先造万物后造原祖(匠成万物,然立初人)、人性本善(素荡之心,本无希嗜)、魔鬼引诱原祖(娑殚施妄)、圣子降生(三一分身)、救世主默西亚(景尊弥施诃)、童贞圣母诞生耶稣、天使欢歌(神天宣庆,室女诞圣)、东方博士来朝(景宿告祥,波斯睹耀以来贡)、救赎(开生灭死,棹慈航以登明宫)、耶稣升天(亭午升真)、新约二十七卷(留经二十七部)、十字架圣号(印持十字)、教士一日分七时诵念日课(七时礼赞,大庇存亡)等等。此碑后于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西安出土。

824年(穆宗长庆四年)

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全唐文》卷七二七)云:摩尼、大秦、火袄“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可见景教被时人视为“胡教”、“夷寺”,发展有限。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824年(穆宗长庆四年)

845年(武宗会昌五年)

唐武宗下令灭教。主要打击对象为佛教,但景教亦受牵连。七月,中书门下条奏:“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新唐书·食货志》记曰:“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

878年(僖宗乾符五年)

据阿拉伯作家阿布·泽德(Abu Zayd)《东游录》记载,是年黄巢军攻破广州,杀伊斯兰教徒、犹太人、火袄教徒和基督徒达十二万之众。

980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景教士那及兰(Najran),奉聂斯脱里派(景教)大主教之命,偕另五位教士同来中国复兴教会。七年以后他们回去报告:“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亦已毁坏。”

1206年(蒙古太祖元年,南宋宁宗开禧二年)

铁木真会蒙古诸部于斡难河,即大汗位,号“成吉思汗”,是即元太祖皇帝。

1219年(蒙古太祖十四年,南宋嘉定十二年)

蒙古第一次西征。成吉思汗率术赤、察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兵分四路,远征中亚细亚花刺子模国,先后攻占锡尔河沿岸各大都市,次年陷布哈拉及花刺子模国新都撒马尔罕,杀戮甚剧。

1235年(蒙古太宗七年,南宋理宗端平二年)

窝阔台建都和林(哈刺和林简称,在库伦西南)。同时,太宗命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大将,率军第二次大举西征,意欲征服欧洲。



中世纪欧洲绘画中的蒙古人形象

1236年~1237年(蒙古太宗八、九年,南宋端平三年、嘉熙元年)

蒙古军队攻陷俄罗斯境内的莫斯科、梁赞、苏兹达勒、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特维尔,一直北进至诺夫哥罗德,因泥淖不利骑兵,转而经略俄罗斯南部。

1240~1241年(蒙古太宗十一、十二年,南宋嘉熙三、四年)

蒙军攻陷基辅,向西方进袭,其左翼军经加里西亚进入波兰,在西里西亚击溃波兰和日耳曼联军,波兰大公亨利二世被杀。蒙军又转入匈牙利,陷其都马加城(今布达佩斯)。蒙军会师以后渡多瑙河,大掠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并向北冲进了奥地利,远抵克洛斯特诺伊堡。适此时蒙古太宗去世的讣闻传到,拔都乃班师东归。

1245年(蒙古太宗十七年,南宋淳祐五年)

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在法国里昂召集全欧主教会议,号召欧洲各国君主在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领导下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并劝诫各国君主对蒙古的进犯早作准备,但联军计划并未实现。时教宗已听说蒙古和林朝廷中不乏信教者,乃决议派使向蒙古通聘。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等三名方济各会士奉命出使蒙古。4月16日复活节当天,柏朗嘉宾从里昂出发。

约翰·柏朗嘉宾于12世纪末出生于意大利佩鲁贾(Perugia),1221年受圣方济各(Saint François d'Assise)派遣前往日耳曼,至1239年一直担任萨克森修道院院长及省教长,期间曾侨居西班牙。柏朗嘉宾自里昂起程后抵波兰境内布雷斯劳(Breslau),携波兰人本笃(Benedictus)教友同行并充任翻译。方济各会初兴时,出外必须步行,柏朗嘉宾因肥胖,准骑驴代步。同行者还有波西米亚人司提反(Stephen)修士(中途因病返)。

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致元定宗贵由汗书信



1245年里昂大公会议,教宗英诺森四世决定向蒙古派遣使节

(此书信系由柏朗嘉宾于 1245 年带往和林)

天主仆役之仆役，主教英诺森(Innocent)谨致书于鞑靼国王及臣民曰：天主好生，创造人类动物，以及地上所有有机物质。以明神为例，故有生之物，莫不相亲相爱，安居乐业，永不相扰。余闻王等侵入基督教诸国以及他境，所过杀戮，千里为墟，血流盈壑。直至于今，王及部下凶狠之气，破坏毒手，未稍休止。解除一切天然束缚，不论男女老幼，无有幸脱王之剑铍者。余代天主行教，闻王所为如此，不胜诧异。余本天主好生之德，欲合人类于一家，据敬天明神之理，特申劝告并警戒，请求王及部下止息此类暴行，尤不可虐待基督教徒。王所犯罪恶多而且重，必遭天主所谴，可毋庸疑。王须急宜忏悔，使天主满意。以前诸国所以为王克服者，乃天主所使，非王之兵力所能也。以后王及部下亟宜停止暴行，须知天主可畏也。骄横跋扈之人，固有时幸逃天主法网。然若怙恶不悛，始终不知迁善谦让，天主未有不严刑惩罚者也。余今遣所爱兄弟约翰(即柏朗嘉宾之名)及同伴数人，携国书聘礼，往王之庭。诸人皆谨厚守礼，笃信宗教，通晓《圣经》。余希望王温颜接受，善待诸人，则不啻身受王之惠矣。诸人代余所说者，愿王倾心信之。所言和平方法，尤宜深加采纳。更况通告诸人，王究因何而扫灭他国，王以后意志如何，亦请示知。诸人往来，长途跋涉，愿王派使护送为便。归回时，亦请供给沿途所需，俾得来达余处也。约翰等僧，皆品行端正，深通《圣经》，能告王等以吾救世主之为人谦逊，故余遣之。若仅能为王奔走，代王布德，有利于王者，则余将不遣彼等，而另遣其他高僧或有权势之人矣。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第二卷, 第 415 ~ 416 页; 转引自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第 130 页]

1246 年(蒙古定宗元年,南宋淳祐六年)

年初,柏朗嘉宾抵基辅,2月3日离基辅出发东行,行走二十余日遇蒙古军,被送往伏尔加河上游萨莱城,晋见成吉思汗之

孙拔都。拔都阅教宗文书以后，命二修士马不停蹄，由骑兵护送，去和林觐见大可汗。7月22日，柏氏抵和林。8月24日，蒙古新君贵由汗行登极典礼，是为元定宗，柏氏与各邦使节一同参加典礼。11月13日，大汗召见柏朗嘉宾，柏氏呈上教宗国书，贵由汗亦备有复信，言辞傲慢。二修士又晋见皇太后刺吉纳（《元史》作脱列哥那），太后为景教徒，素热心，温语慰劳。大汗的复信为蒙文，由柏氏译为拉丁文，并加盖玉玺。同月，柏朗嘉宾起程回国，太后各赐貂皮缎袍二袭。

贵由汗致教宗英诺森四世的信(1246)

我们，长生天气力里，
大兀鲁思(Ulus)^①之汗
我们的命令：

这是送给大教宗的一份译本，以便他可从〔穆斯林〕语得悉并了解信中的内容。在皇帝国土举行大会时，你提出的〔表示拥护我们的〕请求书，已从你的使者处获悉。

如果你的使者返抵你处，送上他自己的报告，你，大教宗，和所有的君主们一道，应立即亲自前来为我们服役。那时，我将公布札撒的一切命令。

你又说，你曾向上帝祈求和祈祷，希望我接受洗礼。我不懂你的这个祈祷。你还对我说了其他的话：“你夺取了马札儿人和基督教徒的一切土地，使我十分惊讶。告诉我们，他们的过错是什么。”我也不懂你的这些话。长生天杀死并消灭了这些地方的人民，因为他们既不忠于成吉思汗，也不忠于合罕^②（成吉思汗和合罕都是奉派来传布长生天的命令的），又不遵

① 兀鲁思(ulus)，即人民、领地、分地。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兀鲁思一词，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译作‘分地、领地’；不过，作为纯粹游牧民的蒙古人，更喜欢把兀鲁思理解为人，而不理解为领土；事实上，兀鲁思一词的原始意义也本来是‘人’。因此，兀鲁思一词也可以译作‘人民’，即‘人民-分地’，‘联合在某一分地里或建立分地-领地的人民’。到后来，兀鲁思又有‘人民-国家’，‘形成国家-领地的人民’和‘国家’的意义了。”（《出使蒙古记》，第155页）

② 合罕(Khagan)，在一般情况下是对窝阔台的称呼。

守长生天的命令。像你所说的话一样,他们也是粗鲁无耻的,他们是傲慢的,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使者。任何人,怎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捉人或杀人呢?

虽然你又说,我应该成为一个虔诚的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崇拜上帝,并成为一个人苦行修道者,但是你怎么知道长生天赦免谁,他对谁真正表示慈悲呢?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得到长生天批准的呢?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

现在你应该真心诚意地说:“我愿意降服并为你服役。”你本人,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

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

(回历)644年6月末(相当于1246年11月,据波斯文译出)

〔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02~103页〕

1247年(蒙古定宗二年,南宋淳祐七年)

教宗英诺森四世又派三名多明我会士亚杰利(Ascelino或称Anselmo di Lombardia)、龙如美(Andre de Longjumeau)和贵加(Guichard de Cremona)出使近东的蒙古军营。8月,三人抵达加利津城(在花刺子模)的蒙军统帅巴一朱(Baidju)营中,呈上教宗玺书,口传教宗之意,劝其勿屠杀生灵,且不行叩头礼,不献礼物。巴一朱大怒,下令推出斩首,幸得一奉景教的王妃营救得免。三位修士被拘留,视同俘虏,两个月后遣回。巴一朱复教宗信亦傲慢,劝教宗率欧洲各国投顺进贡。此次教宗派使之目的是想联合蒙军中信奉景教派者,合力驱逐占据耶路撒冷之穆斯林,但一无结果。○7月,柏朗嘉宾回到法国里昂。

柏朗嘉宾回到欧洲以后以拉丁文著成《蒙古史》(*Historia Mongolorum*)一书,对蒙古军事记载尤详。全书共分为九章:

(一)鞑靼人的地区、方位、资源和气候条件；(二)鞑靼地区的居民、服装、住宅、产业和婚姻；(三)鞑靼人崇拜的神，他们认为是罪孽的事，占卜术、涤除罪恶和殡葬仪礼；(四)鞑靼人的淳风和陋俗，处世之道和食物；(五)鞑靼帝国及诸王的起源，帝王及诸王的权力；(六)关于战争、军队的结构及武器，关于战争的韬略和部队的集结，对战俘的残酷性，对堡垒的包围和对投降者的背信弃义；(七)鞑靼人怎样媾和，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名称，对自己臣民的压迫，勇敢地抵抗他们的地区；(八)怎样同鞑靼人作战，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他们的武器和部队组织，如何对付他们的韬略，堡垒和城市的防御工事，如何处置战俘；(九)鞑靼人的省份以及我们所经过那些省份的形势，在那里会见过我们的证人，鞑靼皇帝及诸王的宫廷。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1248年(蒙古定宗三年,南宋淳祐八年)

9月,法王圣路易九世,统帅第七次十字军驻扎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岛。12月14日,驻扎在高加索一带的蒙古大将伊治加台(Itchigatai,巴一朱的继任者)派遣两名使者大维(Moriffiat David)和马尔谷(Marcus)觐见圣路易,呈上伊治加台书信。晋见时,由曾出使蒙古的龙如美任翻译。伊治加台信件由波斯文及阿拉伯文书写,表示愿率蒙军相助恢复耶路撒冷圣地。同时亦希望当蒙军进攻伊斯兰教哈利发时,请法王亦出兵埃及,以为声援。据使者称,伊治加台本人为景教徒。

1249年(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南宋淳祐九年)

1月27日,龙如美和另两名多明我会士随大维和马尔谷,携带国书及名贵礼物(其中有一嵌有耶稣真十字架圣木的十字架),经波斯至伊治加台营中。伊氏遣法王使臣前往和林觐见大汗。时定宗贵由汗去世,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临朝听政。龙如美拜谒皇后,呈上礼物。皇后视之为贡物,复书令法王年年进贡。

1251年(蒙古宪宗元年,南宋淳祐十一年)

龙如美回到阿克(Acre, 亚洲西部, 巴勒斯坦北部的濒海城市)复命。

1253年(蒙古宪宗二年,南宋宝祐元年)

法王路易九世再命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以教士身份,携带国王信件,前往东方蒙古。另有一意大利人克莱莫那(Bartolomeo de Cremona)随行,他们并非法王的正式使节。5月7日,鲁布鲁克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黑海,6月21日抵索耳达亚(Soldaia),7月31日抵拔都之子撒里答营,后又至钦察晋见拔都。9月16日继续东行,12月27日抵达和林。

鲁布鲁克是方济各会修士,约1215年至1230年之间生于法国加塞尔(Cassel)附近罗伯尔镇,其少年时代及加入方济各会的年代均不可考。约1248年,他随法王路易九世到圣地耶路撒冷,据方济各会志记载,他在君士坦丁堡讲道时说:“我不是陛下(路易九世)的使臣,也不是任何人的使臣,我只是按我们的会规前往非教友地区。”其意是说去传教。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19~20页]

1254年(蒙古宪宗四年,南宋宝祐二年)

1月4日,宪宗接见鲁布鲁克一行。5月24日,宪宗再度召见,以蒙古文复法王书,托他带回。8月18日,鲁布鲁克离开和林。在蒙古逗留期间,鲁布鲁克曾请求留在当地传教,未获准允。

1255年(蒙古宪宗五年,南宋宝祐三年)

6月16日,鲁布鲁克返回塞浦路斯岛,时路易九世已回法国。当地主教让他将旅行经历写下来,另派人转呈国王。于是鲁布鲁克便写了游记向法王报告。

鲁布鲁克的游记记载蒙古生活颇为详细,主要内容有:
(一)可萨利省;(二)鞑靼人和其住所;(三)鞑靼人的食物;
(四)勿迷思的制作;(五)他们吃的动物以及他们的衣服和狩

猎；(六)男人薙发,女人打扮；(七)妇女的职责和工作；(八)鞑靼人的法律、审判、死和葬；(九)斯克台的鞑耳朵；(十)圣灵节前阿兰人的访问；(十一)经受苦难；(十二)表示受洗的撒拉逊人；(十三)撒里答地方及其居民；(十四)撒里答的鞑耳朵；(十五)奉命去见撒里答及其父亲拔都；(十六)撒里答、蒙哥汗和贵由汗礼敬基督徒；(十七)罗斯人、匈牙利人、阿兰人和甲斯便海；(十八)到蒙哥汗宫廷的旅行；(十九)聂斯脱里派教徒和撒拉逊人杂居；(二十)和尚的寺庙和偶像,以及礼拜仪式；(二十一)吃父母的部族,大契丹；(二十二)赴蒙哥汗宫廷,贵由汗的驻地；(二十三)蒙哥的宫廷；(二十四)蒙哥在哈刺和林的宫殿；(二十五)哈刺和林；(二十六)宗教论战；(二十七)和蒙哥汗的最后会面；(二十八)占卜家；(二十九)汗的节日及教友威廉的返回；(三十)到达拔都宫廷；(三十一)从希尔康尼亚到的黎玻里。据鲁布鲁克记载,外蒙境内的克烈、蔑里克、乃蛮三大部落均有景教徒,契丹国十五个城市中亦有景教徒,且在西京(可能指大同)驻有总主教。鲁布鲁克后来获准前往巴黎,在那里他向英国科学家和公法学家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提供了大量地理知识。培根在其著《上论》(*Opus Majus*)中谈到了鲁布鲁克的贡献。鲁布鲁克的游记,在地理学、人类学和宗教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耿昇、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记》,第180~181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21页〕

1259年(蒙古宪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

蒙将旭烈兀藉词埃及属国叙利亚国王不朝,分三军攻其都城大马士革,不克,乃折而北,经略小亚细亚,破巴尔干诸国联军。东罗马朝廷和西欧基督教国家皆来请和,欲与蒙古联合攻击伊斯兰教诸国。旭烈兀又命大将郭侃渡地中海,攻占塞浦路斯岛,蒙军又复折而东,抵波斯失罗子城,又破兀林及起尔曼,原准备再攻埃及,适此时蒙哥汗死,蒙古退兵,西征遂告终止。

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南宋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忽必烈即位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县,至元五年改为上都),建元中统。蒙古阿里不哥即位于和林。

1261年(元世祖中统二年,南宋景定二年)

忽必烈率军击败阿里不哥。

1263年(元世祖中统四年,南宋景定四年)

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Nicolo Polo)和玛飞奥·波罗(Maffeo Polo)从君士坦丁堡出发,沿伏尔加河来到中亚布哈拉(Bokhara,中国古称“安息”)。在那里遇见忽必烈大汗派往旭烈兀统治的伊儿汗国使团,使团邀请两位威尼斯商人去上都晋见忽必烈。

1264年(元世祖至元元年,南宋度宗景定五年)

蒙古世祖忽必烈入都燕京,改元至元。○2月26日(春正月癸卯),元政府命对儒、释、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旧免租税户,重新开征税收。

1266年(元至元三年,南宋咸淳二年)

忽必烈在蒙廷款待尼古拉·波罗和玛飞奥·波罗。元世祖托他们带信给罗马教宗,敦请教宗派遣通晓“七艺”(文法、论理学、修辞学、算学、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的一百名教士来华,与其他各派宗教辩论,如能证明天主教确为优越之宗教,他可率臣民皈依天主教。忽必烈要求他们去圣地耶路撒冷,从耶稣墓前长明灯里取回一点圣油,以为纪念和治病之用。

1269年(元至元六年,南宋咸淳五年)

4月,波罗兄弟回到阿克城,时任宗座代表的维斯康梯告诉他们,教宗克莱门四世(Clement IV)已于上年去世,须等新教宗选出,方能履行使命。波罗兄弟决定回威尼斯,抵家以后方知尼



马可波罗像

古拉妻子已去世，遗下的儿子马可·波罗已是十五岁的少年。

1271年(元至元八年,南宋咸淳七年)

波罗兄弟偕年仅十七岁的马可·波罗，先到阿克教宗代表维斯康梯处取得了证书，再到耶路撒冷取了圣墓上的圣油，再行至刺牙思城时，意外得知维斯康梯教宗代表当选为新教宗，号额我略十世(Gregory X)，时为9月1日。新教宗派人召波罗一家回抵阿克，发给他们正式的文书、礼品和证书，另派两名多明我会士随波罗一家三人一同前往中国。11月，五位使者重新登程，复至刺牙思时，巴比伦苏丹邦多克达里入侵亚美尼亚，大肆屠掠，两位多明我会士大为恐慌，将所有证书、公文和礼品交波罗三人，原道返回了。

1275年(元至元十二年,南宋恭帝德祐元年)

波罗一家经伊朗高原，越帕米尔，取道新疆、甘肃，于是年夏天抵达上都，晋见元世祖忽必烈。世祖派使臣“迎于四十日程外”，在晋见大汗时，尼古拉将儿子马可作为“汗之臣仆”引见，世祖大喜。马可·波罗在蒙廷习朝廷礼仪，学习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曾被世祖派往各地巡视，并在扬州任三年地方官，在中国任职凡十七年。○中国景教徒巴扫马(Bar Sawma)及其弟子马可斯(Markos)，起程西行，前往圣地耶路撒冷(一说1276年)。他们从北京出发，经过山西霍山、沙州(敦煌)、和阗、喀什噶尔、呼罗珊，前往巴格达。在马拉加城(Maragh, 今Tabriz)，见到聂斯脱里派宗主教马屯哈(Mar Denha)，取得介绍信后前往巴勒斯坦，但时因叙利亚境内有战事，不能前行。

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南宋祥兴二年)

元军攻陷厓山，宋相陆秀夫负宋帝人海殉国，宋亡。

1280年(至元十七年)

景教宗主教马屯哈委任马可斯为驻中国的契丹城和汪古部

总主教,马可斯取名雅八拉哈三世(Yabalaha III),祝圣时年仅三十五岁。马屯哈同时委任巴扫马为巡视专员。马屯哈希望他们祝圣后返回中国。

1281年(至元十八年)

雅八拉哈和巴扫马二人回国途中,获知马屯哈死于巴格达,折回巴格达参加丧礼。各地主教一致推选雅八拉哈继马屯哈之位为“东方教会宗主教”,管辖东至中国、西至巴勒斯坦、北自西伯利亚、南至锡兰(斯里兰卡)的广大教区,并兼管赛流西亚(Seleucia)与克泰锡芬(Ctesiphon)双城的教务。马可斯坚辞,但无法谢却,终于在11月就任。

1282年(至元十九年)

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从至元十六年开始至本年,兴建景寺六座,即镇江大兴国寺、云山寺和聚明山寺、丹徒县的四渎寺和高安寺。后又在大兴国寺侧建甘泉寺。在明山寺和聚明山寺之下,还建有也里可温公墓。

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

马薛里吉思休官以后,又在杭州荐桥门修建景教大普兴寺。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

蒙古人统治的波斯伊儿汗国阿鲁浑汗(宪宗蒙哥汗之子)妻子卜鲁罕去世,临终遗言,要其族人继为王妃。阿鲁浑特派廷臣兀鲁姆、阿必失呵和火者为专使,携大批扈从来元室求婚。

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

蒙古伊儿汗国宗王阿鲁浑欲联合西方诸国收复耶路撒冷,请景教宗主教雅八拉哈三世推荐出使人选,雅八拉哈推荐巴扫马前往。3月,巴扫马先到君士坦丁堡觐见了拜占庭皇帝安得罗

尼克斯二世(Andronicus II),后由海路抵那不勒斯,又到了罗马,时教宗奥诺利伍四世(Honorius IV)刚去世,4月3日由枢机主教接待,随后于9月抵巴黎,将阿鲁浑信递呈法王腓力四世(Philippe IV),10月抵波尔多(Bordeaux)晋见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 I)。英王请求巴扫马主领圣餐,用的是景教礼仪。

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

2月,巴扫马抵罗马,受到新教宗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接见,巴扫马呈上阿鲁浑及雅八拉哈信。教宗请巴扫马按景教礼仪主领圣餐,巴扫马也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天主教弥撒。回程前,教宗赠巴扫马基督的一小片衣服、一小片圣母头巾,并赠雅八拉哈三世镶宝石的纯金三重冠。教宗致阿鲁浑信中赞许了收复耶路撒冷的计划,并敦请他皈依天主教。○阿鲁浑三位使者抵达元廷,忽必烈应其请求,选出蒙古伯牙兀惕部少女阔阔真为元室公主,远嫁波斯。他们从陆路原道回波斯,骑马走了八个月,不意中亚蒙古诸王互相争伐,道途阻塞,只得折回。

(1) 1288年4月教宗复东方教会主教的信:

尼古拉等谨致书东方年高德劭的修士约拉哈主教,敬祝贵体康泰,并致以教宗祝福。

我们以万分感激的心情,收读了东方大地的主教我们尊敬的巴扫马修士、尊贵的萨巴迪努斯、托马斯·安福西斯、译员犹格图斯和著名鞑靼国王的世俗使节等人代表您谨呈我们的书信。我们尽悉一切,我们以主的名义赞扬您的仁慈和远见卓识。我们从信中获悉,您非常仁慈地关怀着我们的爱子、即在你们那里传播教恩种子并向居民宣讲基督教义的方济各会修士们,并恩待他们。我们对您的仁慈了解得愈是深刻,就愈加感激你们。修士,我们对着他们为之工作的上帝为您祷告,希望您出于对教廷和对我们的尊敬,恩待我们向您推荐的这些修士,使他们借助你的恩惠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他们所从事的救世工作;并希望您从赏赐各种恩典的上帝得

到应有的报赏。您所管理的教士和人民无论水路或陆路都离罗马教会甚远，罗马教会虽像慈母一样，殷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永远的祝福，但他们既不便去她那里，也不容易靠她得到信仰上的教诲，所以我们只能希望他们保持罗马教会所遵守的纯正信仰，并认为把下述有关基督教信仰的阐释寄给你是美好的，非常希望您用心灵的眼睛热切仰望主，利用您的智慧把这些阐释讲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普遍接受、谨慎遵守之，这样您就会像一个良好的仆人把他们领到救恩的牧场。上述的教义阐释如下……

四月十三日(1288年4月7日)写于罗马圣彼得教堂。^①

(2) 1288年4月教宗复伊儿汗国王阿鲁浑的信：

尼古拉等谨致书鞑靼国王阿鲁浑。

我们从我们年高德劭的修士东方大地的主教巴扫马、尊贵的萨巴迪努斯、托马斯·安福西斯、译员犹格图斯和国王陛下的俗人使节得知，如果能把耶路撒冷从邪恶人手中解放出来，你们愿在耶路撒冷受洗得重生。我们确实盼望您和你们的人得救，因此我们以主的名义一再称赞你们的这个计划健全可嘉。但是我们满怀希望地想，在您接受洗礼后，借助主的帮助，耶路撒冷的解放将会更容易实现，同时我们看到，尽早排除障碍，实现您所设想的计划，这也会加速您的得救。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勉励殿下先考虑自己的得救问题，并听从我们发自圣洁内心的劝告，即刻接受洗礼，切勿迟延，以颂扬上帝，并加速拯救您自己。您愈是迅速愉快地接受洗礼，您就会引来更多的人仿效您的高贵榜样也接受洗礼，因此你会使主更加喜悦。日期同上(1288年4月7日)。

(3) 1288年4月教宗复巴扫马的信：

谨致书东方地区主教巴扫马，祝您贵体康泰。

我们最近欣慰地看到您亲自来觐见教宗，并以主的慈

^① 《梵蒂冈教廷档案》44. C. 13；第88页；《马·雅八拉哈三世传》，第195~199页。

爱和欢乐接待了您。我主恩惠无边。您为基督教信仰之光所照亮,在洗礼的泉水中重生,正如一份可靠报告所记,您表明自己渴望和关心着这些事,因此你能扩大信仰范围,延伸信仰的边际,并为此而献身,所以您工作得越来越好,在至高者的眼中得蒙喜悦。您把心灵的纯洁托付于为至高者服务的事业。我们听到您和所有崇拜纯正信仰的人的消息,确实感到非常快乐和欣慰。这使您赢得了赞扬,提高了声誉。修士,我们以圣子之名勉励您,用您心灵的眼睛仰望那以丰富恩典酬赏微小服侍的主,热情地信奉和经常坚守基督教信仰,用上帝赐你的智慧认真地传道,劝诫人们。您越是热情地把更多的人从不信的乌云中引回到基督教的阳光下,从迷途引上正道,您就会得到更多的喜悦,并使主更加欢心。为了使您更加充分有效地教导别人信仰罗马母会坚守的基督教义,我们把教义和对教义的阐释附在信后。我们相信……

日期同上(1288年4月7日于罗马)。

[录自 A. C.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 131 ~ 133 页]

1289 年(至元二十六年)

巴扫马回到阿鲁浑驻地。阿鲁浑又派一使团出使罗马、巴黎和伦敦,但未获成果。○罗马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委任方济各会士蒙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以教廷使节(Legatus Apostolicus)名义,携带文书出使中国。○是年,元政府设崇福司,掌管基督教教士等事。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司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

蒙高维诺于 1247 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萨莱诺(Salerno)附近的蒙高维诺·洛勿拉(Montecorvino Rovella)。蒙高维诺壮年时入方济各会,1280 年左右第一次被派往小亚细亚传

教。1289年他作为亚美尼亚王海屯二世(Haiton II)的钦使,晋见教宗尼古拉四世。教宗转命他充任教廷使节出使中国。同时又顺道携教宗书遍访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斯坦等地国君。蒙高维诺自意大利出发,乘船赴小亚细亚,经亚美尼亚抵达波斯,又从海路抵印度马拉巴,再从海路来中国,登陆地点很可能是泉州。同行有一名尼古拉(Nicola da Pistoia)的多明我会士以及另一名伯铎禄(Pietro da Lucalongo)的商人。抵印度后尼古拉病逝。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40页〕

1290(至元二十七年)

阿鲁浑又向教廷派出一使团,但使团的活动不为人知。

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

波罗一家三人陪同波斯使臣三人偕阔阔真公主自泉州起程从海路回波斯。○3月7日,阿鲁浑去世。○8月21日、30日教宗回信阿鲁浑,规劝他早日奉教,并通报英王爱德华将远征耶路撒冷的消息。

1293年(至元三十年)

波罗一行护送阔阔真公主抵达波斯,时阿鲁浑已去世,按蒙古风俗,将阔阔真许配给阿鲁浑之子合赞汗。马可等休息了九个月以后,再起程回威尼斯。

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

2月18日,忽必烈去世。○7月,蒙高维诺抵达大都,觐见新君元成宗,颇受优礼,准其传教。当年,蒙高维诺即劝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改宗天主教。高唐王的辖区在长城以北,今河套五原县包头镇诸地。其部众原多系景教,后均改奉天主教,并在其地建一天主堂。○1月4日,巴扫马在阿尔伯拉去世。

1298年(大德二年)

蒙高维诺在汗八里(大都)建立了第一座天主堂,又建一钟楼,内置三口钟。○阔里吉思王被杀。

1303年(大德七年)

德国科隆的修士阿诺尔德(Arnold of Cologne)来大都协助蒙高维诺传教,为期约有两年。

1305年(大德九年)

1月8日,蒙高维诺从大都致信欧洲,称京城已有天主教徒六千名,并且在北京皇宫前面又建造了一座天主堂。他还为四十名男童施洗礼,并教他们拉丁文和宗教仪式,组成唱诗班举行礼拜。蒙高维诺还将《新约》与《旧约》之《圣咏》译成当地语言(可能是蒙古文)。

蒙高维诺寄回欧洲的信共有三封:第一封为1292年从印度寄出,报告印度的情况;第二封为1305年1月8日从北京寄出;第三封是1306年2月也是从北京发出的。第二、三封信保存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初期材料,现将内容附录于下:

蒙高维诺的第二封信

我——小兄弟会^①的教友约翰——于耶稣纪元1291年离开波斯的帖兀力思城(Tauris),并进入印度。我居留印度使徒圣托马斯(St. Thomas the Apostle)教堂十三个月。在那里,我对来自各地的大约一百个人施行了洗礼。和我一道旅行的同伴,是多明我会的皮斯托亚人尼古拉(Nicholas of Pistoia)。他在印度去世了,就埋葬在使徒圣托马斯教堂里面。我从印度出发,继续前行,抵达契丹。这是鞑靼皇帝的王国,鞑靼皇帝被称为大汗。确实的,我递呈了教宗陛下的信件,劝告皇帝本人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罗马天主教,但是,他对偶像教的迷信太深了。然而,他对基督教徒非常宽厚。我同他在一起,至

① 小兄弟会即方济各修会。

今已有十二年了。可是，聂思脱里派教徒——他们自称为基督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根本不像是基督教徒的样子——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发展得如此强大，因此他们不允许奉行另一种宗教仪式的任何基督教徒拥有任何举行礼拜的地方，即使是很小的礼拜堂；也不允许宣讲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教义。由于从来没有任何使徒或使徒的门徒来过这些地方，因此上面提到的聂思脱里派教徒们既直接地又用行贿的办法指使别人对我进行极为残酷的迫害，宣布说，我并不是被教宗陛下派来的，而是一个间谍、魔术师和骗子。后来，他们又伪造了更多的证据，说，教宗派的是另一位使者，携带着赠送给皇帝的很多财宝，是我在印度谋杀了他，窃取了他携带的礼物。这个阴谋持续了大约五年之久，因此我常常受到审讯，并且随时有被处死刑而可耻地死去的危险。但是，最后，由于天主的安排，他们之中有些人供认所有这些都是阴谋，因此皇帝知道了我是无罪的，控告我的人 是诬告，就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道流放出去。

现在，我在此次旅行之中，孤独一人，没有一位神父相助，已有十一年之久，直至一年多以前，才有科隆省的一位日耳曼人教友阿诺德（Arnold）来到我这里。我已在北京汗八里（Cambalisch）建筑了一座教堂，这是在六年前竣工的。我又建筑了一座钟楼，在里面设置了三口钟。再者，根据我的计算，迄今为止，我在那里已为大约六千人施行了洗礼。如果没有上述的造谣中伤，我可能已为三万余人施行了洗礼，因为我是在不断地施行洗礼的。

我已逐渐买下了四十名男童，他们都是异教徒的儿子，年龄在七岁至十一岁之间。在买下时，他们都不懂得什么宗教。我在此对他们施行了洗礼，并且教他们拉丁文和我们的宗教仪式。我为他们写出了诗篇和赞美诗约三十首，每日祈祷书二篇。他们之中，有十一名男童现已学会应用这些来举行礼拜仪式。不管我在不在教堂，他们都组成唱诗班唱诗并举行礼拜仪式，好像在修道院里一样。他们之中，有几个人能抄写诗篇

和其他合适的文件。皇帝陛下非常高兴听他们唱歌。在定时祈祷时,我就敲那三口钟,并和由“乳臭未干的小伙子和幼童”组成的唱诗班一道唱祷告词。但是,我们是凭记忆来唱,因为我们没有配有乐谱的书。

关于好王阔里吉思(George)

这里的一位阔里吉思王,信仰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他是印度的称为长老约翰的伟大国王的后裔。我来到这第一年的,他就同我很亲近。我使他改信了真正的罗马天主教的正宗教义。他被授予较低级的圣职。在我举行弥撒时,他穿着庄严的法衣前来参加,因此其他的聂思脱里派教徒们责备他为叛教。然而,他劝导他的大部分人民皈依了真正的罗马天主教,并捐建了一座壮丽的教堂,供奉上帝、三位一体和教宗陛下,且按照我的建议,赐名为“罗马教堂”。这位阔里吉思王作为一位真正的基督教徒去世,他去世时,留下一个还在婴儿时期的儿子和继承人,现在已有九岁了。但是,阔里吉思王去世后,他的兄弟们坚持聂思脱里派的错误,把经阔里吉思王劝导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人统统诱入邪道,使他们回到聂思脱里派。王生前所建的教堂,距离这里有二十日的路程,由于我是孤独一人,不能离开皇帝大汗,因此未能前往视察。虽然如此,如果有几位助手和同事来到这里,我深信,依靠天主的力量,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因为阔里吉思王生前赏赐给我的钱财,我仍然还保存着。

我再说一遍:如果没有上述的造谣中伤,我可能已作出伟大的成绩。如果我即使只有二三位助手,或许皇帝大汗很可能已经受洗了。我恳求派若干教士前来,如果有任何人愿意前来的话。不过,前来的人须是渴望献身传教,树立榜样的人,而不是想获得声名的人。^①

至于前来的道路,我向你们报告,以取道陆路,经过北鞑

^① “获得声名”,直译为“将衣裳穗子做长了”。(《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3章第5节。译者按:《马太福音》第23章第5节原文为:“他们做事,都是为叫人看见,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穗子做长了。”)

鞑的皇帝阔丹 (Cothay) 的领土较为安全可靠, 如与使者们同行, 在五六个月内即可到达这里。但是, 如取道海路, 则是最为遥远和危险的, 因为这样须航行两段海路, 第一段, 约相当于阿克儿至普罗文思省 (Provence) 的距离, 而第二段约相当当地阿克儿至英格兰的距离, 而且, 很可能在两年以内还不能走毕全程。然而, 由于战争之故, 长期以来, 陆路已不安全, 我没有接到罗马教廷、我们的小兄弟会和西方国家的消息, 已有十二年了。两年以前, 从伦巴第 (Lombardy) 来了一位外科医生, 他在这里散布了许多亵渎诽谤罗马教廷、小兄弟会和西方国家的难以置信的流言蜚语, 因此我非常渴望获悉真相。

我恳求接得这封信的兄弟们, 尽力设法将此信内容呈报教宗陛下、枢机主教们和小兄弟会驻罗马教廷的代表。我恳求小兄弟会的会务处, 寄给我《唱和歌集》、《圣徒故事集》、渐进的并配以乐谱的《诗篇集》各一册, 以便作为样本, 因为我除了有《每日祈祷书》(附有经过缩短的日课) 和《弥撒书》各一小册外, 其他书籍都没有。

只要我有了样本, 上述男童们就可以根据样本抄录副本。

现在我正在建筑另一座教堂, 以便可将男童们分置二处。

我已经老了, 我的头发已经白了, 这是由于劳苦和忧虑, 而不是由于年高, 因为我现在不过才五十八岁。我已通晓鞑鞑语言文字, 这是鞑鞑人通用的语言。现在我已将《新约全书》和《诗篇集》全部译成那种语文, 并已叫人用美丽的字体缮写出来。我证明基督的戒律是不假的, 并且公开地当众朗读和宣讲。上述阔里吉思王生前, 我曾同他计划过, 把拉丁文祷告词全部翻译出来, 以便可在他管辖的领土内广为歌唱。在他生前, 在他的教堂里经常按照拉丁仪式用他们自己的语文(弥撒的序祷和中心部分都用他们自己的语文)举行弥撒。上述阔里吉思王的儿子取我的名字为名, 叫做约翰, 我希望天主能使他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据我见闻所及, 我相信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巨等方面,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王或君主能与大汗陛下比拟的。

耶稣纪元 1305 年 1 月 8 日写于契丹王国汗八里城

蒙高维诺的第三封信

基督的无用的奴仆、基督教的传教师、罗马教廷的使节、教士约翰·蒙高维诺 致基督教神父……，致兄弟……，致兄弟……，致小兄弟会会务处主任……，致多明我会会务处主任，并致小兄弟会与多明我会驻波斯教区诸教友——首先向上帝致敬，并表示敬爱之情，他是真正爱护一切人并保佑他们健康的。

仁爱的修道会要求我们，相互远离的人，尤其是为了基督的戒律而远行的人，当他们不能相互见面时，至少应该常通书信，相互安慰。我想，你们可能十分奇怪，我长期居住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为什么你们从来没有接到过我的信。但是，我也同样地奇怪，直至今年为止，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兄弟或友人寄来的信件或良好的祝愿。因此，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一个人记得我了，特别是由于我听说，关于我去世的谣言已经传到了你们那里。因此，我现在通知你们，去年 1 月初，我托一位友人（他随同阔丹〈Cothay〉汗来到契丹大汗这里）带信给可萨里亚教区的主教和教友们，把我目前的情况简略地告诉了他们。在这封信中，我请求主教把此信抄录若干副本寄给你们。现在我从可靠的人（他随上述阔丹汗的使者来到契丹大汗这里）那里获悉，我的信已送达你们那里，带信者后来从撒莱到帖兀力思去了。因此，这封信中提到过的下述事情和内容，我仅在此简单地提一下，就不再重复详叙了：第一，关于我遭受聂思脱里派教徒迫害的情况。第二，关于我建成的教堂和房屋的情况。我曾根据《旧约》和《新约》的故事，绘制图像六幅，以便教导愚昧无知的人。图下各有拉丁、突厥和波斯文的说明，因此通晓这三种文字的人，都可以看得懂。第三，我买下的男童们，其中有些人业已去世。第四，我自到达鞑靼、契丹以来，已为几千人施行了洗礼。

今年即耶稣纪元 1305 年，我已在大汗宫门前面开始建筑一座新教堂。这座教堂与宫门之间的距离仅有一掷石之远。

卢卡隆戈(Lucalongo)人彼得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并且是一位大商人。我从帖兀力思启程东行以来,一路上他是我的旅伴。我所说的新教堂的地基,是他购置的。由于对天主的敬爱,并为慈悲的信念所鼓舞,他把这块地基捐赠给我。为了建筑一座罗马天主教教堂,在大汗帝国的全境,人们再也找不出比这更为合适的地址了。我于8月初接收了这块地基,由于我的施主们和资助者们的帮助,建筑工程于圣方济各节已大部竣工,计有围墙、房屋、简单办公用房和一座可容二百人的礼拜堂。但是,由于已届冬季,这座教堂未能全部完工。不过,我已备齐木料,贮藏室内。依靠上帝的慈悲,我将于明年夏季把它建成。我确实地告诉你们,从城内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看到新建成的房屋,并且有一个红十字架高树房顶时,都认为似乎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在此以前从未听到过这座新教堂的一点消息。我们在我们的礼拜堂里用普通调子庄严地唱祷告词,因为我们尚未得到配有乐谱的《诗篇集》。大汗在宫里可以听到我们歌唱的声音,这种情况被当做一个奇迹在各民族中间广泛传告,而且这种情况也将按照慈悲的上帝的安排和促成而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第一座教堂和新建的第二座教堂,都在城里(这个城市是很大的),两处相距约二英里半。我把男童们分为两部分,让一部分男童在第一座教堂,另一部分男童在第二座教堂,由他们自行唱祷告词。但是,我每隔一星期轮流到每座教堂去,作为教士举行弥撒,因为男童们还不是教士。

关于伟大的鞑靼帝国

关于东方人的国土,特别是大汗的帝国,我可以断言,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大的国家了。我在大汗宫里有一个座位,而且作为教宗陛下的使节,享有进入宫内的权利。大汗对我的尊敬,超过对其他的主教们,不管他们拥有什么称号。虽然大汗已听到过关于罗马教廷和拉丁国家的许多情况,然而他仍然非常渴望看到那些地方派来的使者,

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偶像教徒的教派,各派有不同的信

仰。有许多种类的僧人，习惯各不相同，他们在遵守教规方面，要比拉丁修士严格得多。

关于印度，我已亲眼看到大部分的地方，至于其余的地方，我也曾详加询问。如果修士们来到这里传教，将极为有益。但是，只有绝对可靠的人方可派来，因为这个地方极为美丽，盛产各种香料和宝石，虽然我们那里的水果，这里产得很少。由于这里温度高，气候暖和，居民都裸体不穿衣服，只围一小块腰布，因此他们不需要我们的裁缝和鞋匠的技艺和产品。这里永远是夏季，从来没有冬季。我在这里大约为一百人施行了洗礼。

在同一封信中，教友约翰说，一个庄严的使节团从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来到他那里，要求他到那里去传教，或派良好的传教师前去，因为自从圣马太 (St. Matthew) 和他的弟子们传教以来，就没有传教士教导他们基督教教义，而他们非常渴望领悟基督的真正教义。如果派修士们到那里去，就可以使他们统统改信基督，他们将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因为，在东方有很多人只是名义上是基督教徒和信仰基督，但是对于《圣经》和圣徒们的教义，一无所知，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传教师和导师。

教友约翰又说，自万圣节以来，他已为四百多人施行了洗礼。因为他听说小兄弟会和多明我会的若干修士已经抵达可萨里亚和波斯，因此他劝告他们热情地宣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义，以便获得灵魂上的成果。

这封信是于耶稣纪元 1306 年 2 月四旬斋前的星期日写于契丹王国的汗八里城。

〔道森：《出使蒙古记》，第 262 ~ 268 页〕

1307 年 (大德十一年)

罗马教宗任蒙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特设汗八里总主教区，统辖契丹 (中国北部) 及蛮子 (中国南部) 各处主教，统理远东教务，有简授主教及划分教区权；非重大事件，不需请示教宗，只

须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从宗座领取总主教绶带,但绶带的传袭须有教宗的许可。○7月22日,教宗克莱门五世(Clement V)祝圣方济各会上主教七人,命来华协助蒙高维诺。他们是哲拉德(Gerard. A)、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安德鲁(Andrew of Perigia)、尼古拉(Nicholas of Bantra)、彼得(Peter of Castello)、安德烈斯(Andrutius of Assis)、威廉(William of France. Villanova)以及省教长弗朗西斯(Francisus)。

1309年(武宗至大元年)

教宗克莱门五世将教廷迁往阿维农,迫于法王腓力四世压力,他同意国王向法国教会和神职人员征税,解散圣殿骑士团。在他之后任教宗的,有约翰二十二世、本笃十二世、克雷芒六世、英诺森六世、乌尔班五世和额我略十一世。直至1377年额我略(格里高利)十一世才将教廷迁回罗马。

1313年(仁宗皇庆二年)

教宗克莱门五世遣往中国的七位主教中的三位抵达中国,他们是哲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和安德鲁(Andrew of Perigia),他们抵北京后祝圣蒙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另三人病死在印度,一人未曾出发。同年,泉州成立主教区(一说五年以后),哲拉德任首任主教。

1314年(延祐元年)

安德鲁至泉州附近建立教堂和修院。

1315年(延祐二年)

元政府将崇福司改为崇福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二十七所。五年后又复为司。

1317年(延祐四年)

11月13日,马可(雅八拉哈三世)去世。



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和德里像

1318年(延祐五年)

1月3日,裴莱格林致信欧洲,称哲拉德主教已死,他本人已继任为泉州主教。有三位教徒协助他:约翰(John of Grimaldi)、蒙蒂库洛(Monticulo)人伊曼纽尔(Emmanuel)和萨雷札纳(Sarezana)人文图拉(Ventura)。一个亚美尼亚贵妇捐赠了一座壮美的教堂,位于泉州城中。这位贵妇还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和德里(Odoricus de Portu Naonis)起程东来(一说1314年)。和德里约于1286年出生于意大利弗里伍里(Friuli)省伍地纳(Udine)。十五岁时入方济各会为托钵僧,云游四方,以清水、面包为生,经常退隐荒野,并拒绝在教会中升迁。

刺桐主教、教友裴莱格林的信

被任命在另一个世界担任贫穷的主教的教友裴莱格林致基督教神父,致会务处主任、教友……,并致东方教区的其他教友们,向你们致敬,并渴望听到来自忠实信仰基督教的世界的消息。

因为,虽然我和我的伙伴们远走高飞到遥远的国度,像流浪的儿子那样,然而,我们的小教友会像一位慈母,至少应该记得它流放到异乡去的儿子们。因为一位母亲的心,是不会以司法审判的严厉态度来对待一个儿子的。[下面他继续写道:]不管我是怎样的微不足道,我毕竟是一位主教。[下面他继续写道:]我和主教、教友佩鲁贾人安德鲁一道到达汗八里。

首先,我想谈谈总主教,教友约翰。他表面上的生活是好的,艰苦的。因为,谈到那位阔里吉思王,这是确实的:他完全地并且有价值地使这位王改信了真正的基督教,虽然王以前是同聂思脱里派教徒混在一起的。而且王本人在一天之内就使他人民中的几千人改信了真正的基督教。如果他活着的话,我们确实就会使他的全体人民和整个王国皈依了基督,而且甚至或许已使大汗改信了基督教。因为,在上述总主教来到大汗帝国以前,由于聂思脱里派教徒凭借其权力加以阻挠,不管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教派的基督教徒都不能在这里建筑一座

小礼拜堂(不管它是如何的小)或树立一个十字架。因此,他们被迫或是遵循宗教分裂者的和错误的仪式,或是按照不信宗教的人的习惯办事。但是,教友约翰到来以后,由于得到上帝的帮助,尽管聂思脱里派教徒加以阻挠,他已经在这里建筑了若干座教堂。憎恨搞宗教分裂的聂思脱里派教徒的其他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也遵循了教友约翰的榜样,特别是阿美尼亚人,他们现在正在为他们自己建筑一座非常壮丽的教堂,并且打算把它捐献给教友约翰。因此,教友约翰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并且把拉丁教堂交给其他教友管理。同样的,另外还有称为阿兰人(其中有三万人为伟大国王所雇用)的好基督教徒,这些人带着他们的家属来到教友约翰那里。他向他们讲道,并鼓励他们。

我们也没有看到……。我们能够向他们讲道,并且行我们教派的圣礼。但是,在不信仰宗教的人中间,我们能自由地讲道。在萨拉森人的伊斯兰教寺院中,我们常常去讲道,希望他们或许会改信基督教。同样的,我们也通过两位译员,向居住在他们的各大城市中的偶像教徒们讲道。许多人聚拢来,感到非常惊奇,并且孜孜不倦地询问这些事情。这样的讲道现在已经开始进行,鉴于群众渴望听我们讲道,并且奔跑到我们讲道的地方来,因此我们抱有很大的希望。确实的,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掌握了他们的语言,上帝就将显示他的奇迹。确实,收获物是巨大的,但从事收割的劳工是很少的,而且他们没有镰刀。因为我们教友人数很少,而且年龄相当大了,不善于学习当地语言。愿上帝饶恕那些阻挠教友们到这里来的人!说实在话,我相信敌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会侵入他无可争辩地占有的独立王国。

目前在汗八里的,有总主教、教友佩鲁贾人安德鲁和教友佛罗伦萨(Florence)人彼得(Peter),即主教。在世俗的东西方面,他们不缺乏什么。而在精神的东面方面,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丰富。因为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如此经常地从事祈祷和沉思默想,圣灵如此地祝福、安慰和鼓励他们,因此他

们似乎忘掉了一切其他事情，而只是在祈祷中日日夜夜地侍奉着上帝。

现在我被任命为刺桐的主教，在这里我同三位虔诚的教友一道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中自由地为上帝服役。这三位上帝的仆人是：教友格里马尔迪 (Grimaldi) 人约翰、教友蒙蒂库洛 (Monticulo) 人伊曼纽尔 (Emmanuel) 和教友萨雷扎纳 (Sarezana) 人文图拉 (Ventura, 他是在这个国家里成为一位修士的)。由于他们具备了一切德行，上帝是受他们尊敬的。但愿我们有一百个像他们这样的人同我们在一道！在刺桐城里，我们有一座很好的教堂，这是一位阿美尼亚贵妇捐赠给我们的，教堂里有一座房屋。这位贵妇以生活必需品供应我们，如果有其他人来到这里，她也可同样供应。在城外，我们有一块地皮，那里环境优美，有一片树林，我们准备在那里建筑若干修道室和一座礼拜堂。我们迫切需要的，莫过于多派教友前来，这是我们所渴望的。因为主教教友杰勒德 (Gerard) 业已去世，而我们这些修士们也活不长了，但没有其他人到这里来。这样，这座教堂就将无人管理，更没有人施行洗礼。

如果我把这个伟大帝国的情形叙述出来——其权力之巨大，其军队之众多，其领土之辽阔，其岁入之总额，其慈善救济之支出——人们是不会相信的。在这里的拉丁人就这些方面把它同世界上所有其他王国相比较，但是我不叙述它怎样超越。们。我们所在的伟大城市刺桐位于海滨，距离汗八里约有三个月的行程。

耶稣纪元 1318 年 1 月 3 日写于刺桐。

〔录自道森：《出使蒙古记》，第 270 ~ 272 页〕

1319 年(延祐六年)

葡萄牙成立基督骑士会，被赋以保教权。

1322 年(英宗至治二年)

泉州主教裴莱格林去世。安德鲁从北京前往泉州任主教职

位。皇帝准他“用八匹马驮运行李,沿途极受尊敬”。安德鲁在距城四分之一英里处建筑了一座“华丽和合适”的教堂。○是年,和德里由印度西部从海道来到中国,在泉州登陆,并且自福州经仙霞岭北上,抵杭州和南京,再沿运河直达北京,与蒙高维诺主教相会。和德里在北京居住三年,协助蒙高维诺为两万人付洗。一说和德里于次年抵中国。

1326年(泰定帝泰定三年)

1月,泉州安德鲁主教致信欧洲,报告中国教务。

佩鲁贾人刺桐(泉州)主教安德鲁的信

小兄弟会的被任命为主教的教友佩鲁贾人安德鲁 致神父、佩鲁贾修道院监护、教友……,向您致敬,敬祝上帝保佑您永远平安。

〔下面他继续写道:〕

由于我们相隔千山万水,距离遥远,我很难希望我寄出的信件能到达您手里。

〔下面他继续写道:〕

您应当知道,我同已故的教友裴莱格林(我的同事,主教,也是我在旅途中不可分离的伙伴)取道陆路和海路,饱尝劳苦、疲乏、饥饿、艰苦和危险之苦(在旅途中,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抢走了,甚至我们的外衣和僧袍也被抢走),最后由于上帝的帮助,我想,于耶稣纪元1318年抵达大汗的都城汗八里。在这里,我们遵照罗马教廷的谕旨,举行了总主教的授职典礼,并且留在那里,几达五年之久。在这个期间里,我们从高贵的皇帝那里领得阿拉发(alafa)一份,以供我们八人衣食之需。阿拉发,是皇帝赐予大人物的使者、特使、战士、各行业的技工、周游四方的演唱者、穷人和各种各样的人的补助金。这些补助金的总额,超过许多西方国王的收入和开销。



元代泉州景教石刻,
另说为方济各会石刻

我不想谈这位伟大皇帝的富有、庄严和光荣，帝国国土之广，其城市之多而且大，帝国治理秩序之佳（国内无人敢拔刀侵犯他人），因为如果一一细述，这封信就太长了，而且听到的人也不会相信。因为即使是我，虽然亲身在这里，听到这些事情，也很难相信。

在大洋之滨，有一座大城，波斯语称之为刺桐。在城内，一位富有的阿美尼亚贵妇建筑了一座相当华丽宏大的教堂。在总主教根据她的遗嘱指定这座教堂为总教堂以后，她把这座教堂连同一笔合适的捐款遗赠给主教杰勒德和同他在一起的教友们。

在上述主教哲拉德（他是主持这个教区的第一个人）去世并埋葬在那里以后，总主教想任命我继任他的职位。但是，由于我不同意这项任命，他就任命了教友裴莱格林，即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主教。裴莱格林在有机会时，就到那里去担任了主教之职。他在管理该教区数年以后，于耶稣纪元1322年使徒彼得和保罗节后第九日在那里去世。由于种种原因，我在汗八里感到不满意，因此，几乎在主教裴莱格林去世前四年，我就得到批准，将给我的阿拉发移往刺桐发给。如上所述，刺桐距汗八里约有三个月的路程。我前往刺桐时，皇帝准许我用八匹马驮运行李，沿途极受尊敬。抵达刺桐时，教友佩里格林还活着。在距刺桐城四分之一英里之处，有一片树林，我叫人在这里建筑了一座华丽和合适的教堂。教堂中有可供二十位教友住宿的房屋，并有四个房间，其中任何一个房间都非常适合于位主教应用。

这样，我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我依靠上述皇帝的补助金为生。按照热那亚商人们的估计，这笔补助金大约相当于一百个金佛罗林（florin）的价值。我把这笔补助金的一大部分花用在建筑这座教堂上。我想，在我们这个省份里的所有的教堂中，在华丽和方便方面，没有能和我建筑的这座教堂相比拟的。

最后，在教友裴莱格林去世以后不久，我接到总主教任命我为上述总教堂主教的命令。对于这项任命，我同意了，这似

乎也是合理的。现在我有时住在城内的总教堂里，有时住在城外我建筑的教堂里，随我的便。我的身体是健康的，而且在我的年龄允许的范围内，我也是精力旺盛的和活跃的——事实上，除了我的白发外，我没有老年人具有的种种自然的缺陷和特征。

在这个广大的帝国中，确实居住着世界上的各种民族和信仰各种教派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允许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自由生活。因为这是他们的意见（而我应该说这是他们的错误）：每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教派中都可以得到拯救。我们可以自由地和安全地讲道，但是犹太人和萨拉森人中没有一个人改信基督教。偶像教徒中，接受洗礼的极多，但是他们在接受洗礼以后，并不严格遵守基督教的习惯。

关于殉教的教友

我们的教友中，有四个人在印度受到萨拉森人的迫害，都殉教了。其中的一个人，两次被投入大火之中，而每次都从火中走出，丝毫未曾烧伤。然而，萨拉森人中，没有一个人由于如此惊人的奇迹而改信基督教的。

我曾注意把所有这些事情写成简短的报告寄给您，以便您可以把这些事情转告其他人。我没有写信给我的同教教友们和我的主要朋友们，因为我不知道谁已经去世，谁还活着。因此我祈求他们能原谅我，但是我向所有这些人致敬，并且尽可能亲密地向所有的人致意。请您代我向佩鲁贾的大主教和监护致意，并向所有的普通教友致意。教皇克莱门特（Clement）任命的所有的汗八里教区的副主教，都已平安去世。只有我还活着。班色拉（Banthra）〔班齐亚（Banzia）〕人教友尼古拉、阿西西（Assisi）人教友安德鲁蒂斯（Andrutius）和另一位主教，在到达下印度（Lower India）时，在一个非常热的地方死去了。〔那里的天气不适宜，〕以前有许多其他的教友死在那里，并且被埋葬在那里。

祝上帝保佑您一切顺利，并且永远顺利。

耶稣纪元 1326 年 1 月写于刺桐。

[录自道森:《出使蒙古记》,第 273~276 页]

1328 年(致和元年)

和德里奉蒙高维诺之命离北京回欧洲求教宗多遣教士来华。他从河北进入山西天德,又经青海抵西藏首府拉萨,然后经中亚、波斯返回意大利。○是年,蒙高维诺逝世于北京,享年八十一岁。

1330 年(文宗至顺元年)

和德里返到故乡。5 月,他在病中向同会会士索拉搦(Gulielmus de Solagna)口述游行经过,著成《和德里东游录》。《和德里东游录》中第一次向西方报道了中国妇女缠足以及西藏的天葬等风俗。完成以后,他想到阿维农城晋见教宗,请教宗降福,并请率领五十位教士,准备再来中国。但抵比萨时因病重又返回伍地纳会院。

1331 年(至顺二年)

1 月 14 日,和德里逝世。和德里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尼哥罗康梯(Nicolo Conti)并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1332 年(至顺三年)

泉州安德鲁主教逝世。佛罗伦斯继任,在泉州建第三座教堂。

1939 年抗日战争中,在泉州被拆的城墙中发现安德鲁主教的墓碑。英国学者福斯特(John Foster)和法国学者韩百诗(Lows Hounbis)解读了墓志铭,上有下列拉丁文:

Hic.....sepultus
Andreas Perugius
Ordinis.....



元代泉州主教安德鲁墓碑

……apostolus

M……XII

意即：“这里埋葬（方济各会）佩鲁贾人安德鲁……宗徒（座）”日期可能是 MCCCXXXII 即 1332 年。也有学者认为这时安德鲁还活着。

1333 年（顺帝元统元年）

教宗约翰二十二世得知蒙高维诺总主教去世消息，派方济各会士、曾任巴黎大学宗教学教授的尼古拉（Nicolas）继任蒙高维诺职位，随行者尚有二十六位神父，但一行人后来失踪，不知所往。

1336 年（至元二年）

7 月 16 日在汗八里奉教之阿兰官员上书教宗，请教宗派使前来中国，同时又请元顺帝派遣使团出使教廷。顺帝派出一个十六人的使团，携有顺帝致教宗和阿兰人上教宗书，自汗八里起程。使团正使为安德烈（Andrew the Frank），副使为威廉（William of Nassio）。

元顺帝致罗马教宗本笃十二世书

约翰·蒙高维诺既卒，而新总主教尼古拉斯久不至北京。公元 1336 年（顺帝至元二年）在中国之阿兰人，皆为基督信徒，乃上书于罗马教宗请主教。元顺帝同时亦颁给教宗谕旨一道。使者共十六人，以法兰克人安德鲁（Andrew the Frank）及日耳曼那梭人威廉（William of Nassio or Nassau），契丹国阿兰人拖该（Thogay, an Alan of Cathay）为领袖。由陆道西行，于 1338 年（顺帝至元四年）抵意大利阿维南城。安德鲁尝在中国南方泉州（Zayton）充主教者也。元顺帝之谕旨云：“长生天气力里，皇帝之皇帝圣旨。咨尔西方日没处，七海之外，法兰克国（Frankland）基督教徒主人，罗马教宗。朕遣法兰克人安德鲁及从者十五人于尔教宗之廷，设法修好，俾以后时得通聘。仰尔教宗赐福于朕，每日祈祷时，不忘朕之名也。朕之侍人阿兰

人，皆基督之孝子顺孙。朕今介绍之于尔教宗。朕使人归时，仰尔教宗，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准此。鼠儿年（即顺帝至元二年）六月三日，书自汗八里城。”

〔见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3卷，第177~183页〕

阿兰人1336年致罗马教宗本笃十二世书

敬祷上帝，赐福吾主皇帝大汗，万寿无疆。福定·琼斯（Futim Joens）、香山·董琪（Chyansam Tungii）、者燕不花·爱文奇（Gemboga Evenzi）、嘉琿·俞乔（Joannes Yuchoy）、鲁比士·平则奴斯（Rubeus Pinzanus）等谨泥首上书于圣父教宗法座曰……下走福定等自昔受法座使者约翰·蒙高维诺之教诲养育，崇奉天主教，于是举止有方，心神藉慰。约翰大师才学高超，德行逾俗。出言为重于当世，行措为则于后人。不幸八年前，竟离下走等而仙逝。下走等生者居世无教师，死者魂魄无抚慰。下走等久闻法座已遣主教东来，然至今尚未抵此也。下走等敬请法座早日任命聪明才能，道学高超使人，来东以慰下走等之望也，并请催使人速即束装就道。盖下走等居此，犹之群羊而无牧人，无教诲无抚慰也。……法座使者来至皇帝大汗之廷，盖不下三四次矣。皆蒙待遇优渥，赏赉有加。使者皆交口应承，回西之后，携来法座之书。然至今杳如黄鹤，未闻有尊使者至也。今此之役，敬乞法座注意，报聘之书，不可不答，通好之使，不可不遣也。此间基督信徒，屡告他人，法座之使不久即至。若终无专使，岂不遗羞他人，使之讥基督教徒播布谎言耶？故下走福定等待法座使者之来，不胜其翘首西望也。鼠儿年六月三日，谨上自汗八里城。

〔见亨利·玉尔：《中国古代闻见录》第3卷，第177~183页；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第138~139页〕

1338年（至元四年）

元顺帝的使团抵达法国阿维农城。教宗本笃十二世优礼接

待，并有复元帝书。11月，教宗任命方济各会士马黎诺里(Giovanni da Marignoli)为使节出使元廷报聘，同行者还有鲍纳(Nicolas Bonet)、穆拉诺(Nicolas de Molano)和格里高利(Gregory)以及佛罗伦斯(Giovanni da Firenze)，使团在12月离开法国阿维农。

马黎诺里于13世纪末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圣名若望，按当时方济各会会规，以地名或修院名称称会士，所以他又被称为“圣劳伦佐的若望(Giovanni da St. Lorenzo)”。

1339年(至元五年)

3月，马黎诺里使团离开那不勒斯，渡海抵君士坦丁堡，再渡海至克里来亚喀法，由中亚细亚进入阿里麻里城(今新疆霍城县西北)。

1342年(至正二年)

8月19日，马黎诺里抵达北京，觐见元顺帝，呈上教宗书信，并为元帝祝福，且以教宗名义奉赠骏马一匹。《元史·顺帝本纪》载：“至正二年秋，七月十八日(阴历)，佛郎国贡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献马地点在慈仁殿。献马事轰动一时，文人学士纷纷撰文记叙，揭傒斯作《天马赞》(《文安公文集》卷四十)、欧阳玄有《天马颂》和《天马赋》(《圭斋文集》卷一)、周伯琦有《天马行》(《近光集》)、陆仁有《天马歌》(《元诗选》)等等。

马黎诺里后来记叙其出使元廷情形说：

现在略述几点我的见闻。1334年，我方济各会佛罗伦萨修士约翰·比希纳诺之不称职主教，奉神圣教皇伯奈狄克特十二世之命，携国书和礼物出使汗庭。汗乃众鞑靼人的主要首领，统治东方世界过半。权力之巨大、城市之众多、疆土之辽阔、语言之复杂、物产之富足，民族之繁多，难以言表。〔1338年〕12月，我等离开阿维尼翁，四旬斋初抵那不勒斯，在此停留至3月底(28日)复活节，以待鞑靼使臣所乘热那亚船至。

此使臣来自汗八里大都城，系汗遣往谒见教皇，安排互派使节，开辟道路，与基督教徒签订条约，因他非常崇敬和热爱我们的信仰。汗的国家有王公三万余，称为阿速人，统辖整个东方帝国。他们在事实上或名义上皆为基督教徒，自称教皇之奴仆，愿为法兰克人而死。他们称我们为法兰克人 (Franquia)，而非法兰西人 (Francia)。他们中间的第一位传教士为修士约翰，其外号蒙特·科维诺，初充士兵、后任法官、腓特烈皇帝之教师，七十二年后，他成为一位最聪明最有学识的方济各会修士。5月1日，我们由海道抵君士坦丁堡，在倍拉居住到圣约翰洗礼节。在彼处毫无闲暇，因我等和希腊人之教务大总管及其议会全体成员在圣索菲亚宫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上帝又行奇迹于我等，赐我等锋利口舌和聪明才智，批驳对方无言可答，从而迫使其承认自己是分裂教会者。他们除抱怨罗马教士态度傲慢无法忍受外，只好接受对他们的谴责。我们从这里启航渡黑海，行八日抵喀法(即今克里米亚)。此地基督教徒派别甚多。从这里出发，我们来到鞑靼人第一皇帝月即伯汗之廷，向他呈递国书、锦衣、战马、果酒(cytia)和教皇之礼物。冬天过去，行时月即伯汗设佳宴款待，赐以锦衣，赏以酬金，供以马匹和盘费。我们来到中央帝国的阿力麻里，在此建教堂一所，购地一块，制圣水器作弥撒，为众多人行洗礼，自由公开宣教。虽然如此，但一年前，一位主教和其他六位方济各会修士，正当才华焕发之际，为基督壮烈殉道。他们的姓名是：勃艮地人主教理查德修士，亚历山大利亚人弗朗西斯修士，西班牙人巴斯喀尔修士(巴斯喀尔是一位先知，曾见天门忽开，预知他本人及其同事将有殉道之事，并预言萨莱之鞑靼人将被洪水毁灭，阿力麻里将因教士们之殉教而灭亡，教士们殉教后第三日，阿力麻里之皇帝必将被杀，他还预言过其他许多光辉之事)，劳伦斯·昂科纳修士，彼得修士(他是印度人，担任翻译)，商人基洛托。

离教皇宫廷后第三年，我们从阿力麻里启程来到乔洛斯卡甘，此城在沙山麓，沙山乃由风吹而形成。在鞑靼人未崛

起以前,无人想过沙山那边还有可居之地,也无人想过那边还有何国。鞑靼靠天之助,不辞艰难险阻,越过此山来到一广漠平原,哲人称此地为热地,无人能通过,但鞑靼人已经通过,而我也两度涉过此境。关于此地,大卫在《诗篇》中说:他创造了荒原等等。越过沙山,我们来到汗八里,此城乃东方帝国之首府,雄伟无比,其人口之众和军容之庄严,无须赘述。大汗看见战马、教皇的礼物和用金箔密封的国书(也有罗伯特国王的国书),看见我们,极大喜悦,赞口不绝,对我们尊重毕至。觐见时,我身着礼服,在我前面有人持一极为精美十字架,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我口唱“笃信惟一真神”,进入豪华壮丽宫殿朝见大汗。圣歌毕,我为大汗祝福,大汗虔诚领受。然后我们被送至官馆,此馆早已为我们准备,装饰豪华。大汗派二亲王侍候我们,所需一切,如食物、酒,甚至糊灯笼用纸,皆极为丰富。仆从皆由宫廷派来。彼等待候我们约四年,始终毕恭毕敬,随员皆着贵重衣服。我对所用作了精确计算,大汗供给我们的费用竟达四千余马克。我们共计三十二人。此外,我们和犹太人及其他各派宗教人士有过多次数辩论,皆辩而胜之。还使大汗国许多人灵魂得救,此为一大收获。方济各会之修士们在汗八里城内有一大教堂,紧靠皇宫,城内他处还有总主教寓所一处,教堂数所,各备警钟。他们的生活费用皆由皇帝供给,十分丰富。皇帝见我决意不愿久留,遂准许我返回教皇处,并给我三年盘费和礼物。皇帝希望教皇派我或者另一有全权之红衣主教迅速返回,充当主教,因所有东方人,不管他们是否为基督教徒,皆最崇拜主教。来者应属方济各会,因东方人只认可该会教士,并且认为教皇也总像前教皇捷罗摩一样,后者曾派约翰·蒙特·科维诺来东方,鞑靼人和阿速人崇拜他为圣人。我们居住汗八里约三年。临行时,皇帝赐予我们大量食物,马二百匹。我们经蛮子国而归。沿途我们看到许多城市村庄,其繁荣昌盛难以言表。从圣斯提凡祭日到复活节前的星期日(Sunday of Olives),我们渡过印度洋来到印度一最繁华城市,名高郎步(俱蓝)……。



在江苏扬州发现的一块元朝天主教徒拉丁文墓碑的拓本。墓主圣名为加大利纳。墓碑最上方为圣母抱圣婴图，左下方描绘圣女加大利纳在两轮之间受刑，两刽子手被雷击倒地。右下方为圣女被斩首图，上有二天使安葬圣女。右下角一老者抱婴儿代表亡者之灵。

[录自 A. C.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 282 ~ 287 页]

1346 年(至正六年)

马黎诺里南下杭州、宁波,由泉州上船西返印度,再赴欧洲。临行之前,元帝设宴欢送,除赠礼物以外,另赐三年费用和良马二百匹。

1348 年(至正八年)

黑死病在欧洲蔓延。

1353 年(至正十三年)

马黎诺里返回阿维农城向教宗复命,并呈上元帝致教宗书信。此书信表示元帝对天主教颇为尊重,恳请再派总主教及传教士来华。

1354 年(至正十四年)

5月12日,马黎诺里被任命为皮西尼亚尼(Bisiniani)主教。时波希米亚王查理四世在罗马加冕为日耳曼皇帝,任命马黎诺里为宫廷顾问、皇宫神长以及宫廷史官。马黎诺里奉命撰《波希米亚历史文献》,其中谈到其来华的经历。

1362 年(至正二十二年)

教廷任命多马索(Thomasso)为汗八里总主教,但未到任。○汉军攻入泉州,泉州最后一位天主教主教詹姆斯(James of Florence)被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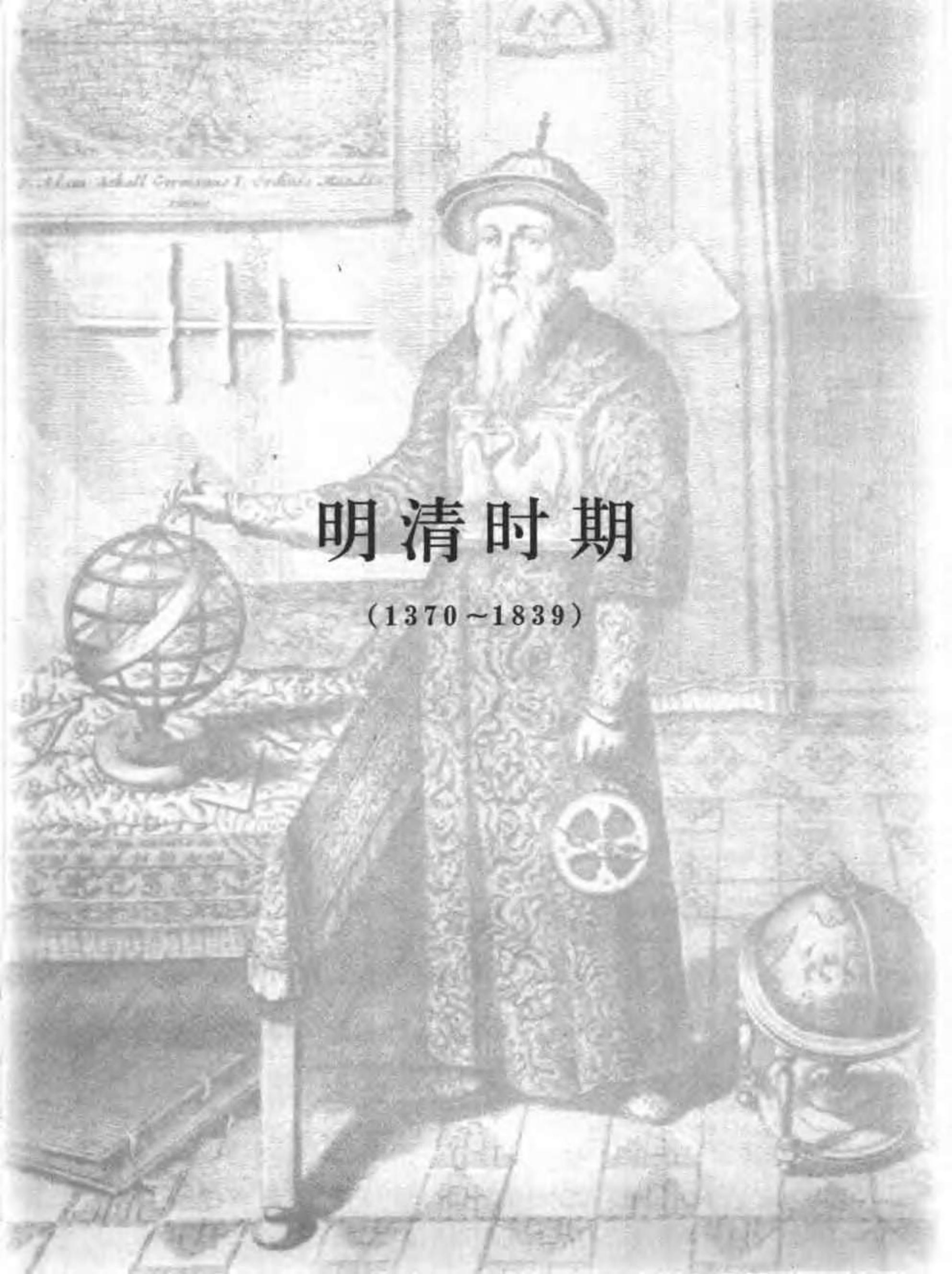
1368 年(至正二十八年)

元顺帝退出大都,卫戍大都的信仰天主教的阿兰人也撤至漠北。元朝灭亡后,天主教也在中原几近绝迹。

P. Adam Schall, S. J. in China, 1685

明清时期

(1370 ~ 1839)



1370年(明太祖洪武三年)

教宗乌尔班五世委任方济各会士伯拉笃 (Gughiemo del Prato) 为北京总主教,率十二名教士来华,但未抵中国。

1418年(永乐十六年)

4月4日,教宗马丁五世发布“*Sane Charissimus*”通谕,代表教会赐葡萄牙人在其海外发现的土地上拥有特权。

1426年(宣宗宣德元年)

教宗马丁五世任命加布阿 (Giacomo da Capua) 为北京总主教,亦未到任。

1443年(英宗正统八年)

倡导葡萄牙航海事业的亨利亲王出任基督骑士会 (Ordo Militae Jesu Christi) 长官,教宗欧杰尼四世 (Eugene IV) 颁发“*Etsi Suscepti*”通谕,赐予基督骑士会进占一切海岛的权利,并赐航海者亨利亲王以保教权 (Royal Patronage)。

1452年(代宗景泰三年)

教宗尼古拉五世 (Nicholas V) 颁发“*Dum Diversa*”和“*Divino Amore*”通谕,无限期给予葡萄牙王征服异域的权利和保教权。

1456年(景泰七年)

3月13日,教宗迦里斯图斯七世颁布“*Inter Caetera*”通谕,再次授予航海者亨利亲王以海外保教权。

1488年(孝宗弘治元年)

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 (Bartolomeu Dias) 奉葡王若望二世之命,率三艘船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发现好望角。

1491年(弘治四年)

耶稣会创立者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生于西班牙吉普斯夸省(Guipuzcoa)罗耀拉城的一个贵族家庭。

1492年(弘治五年)

10月,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之下,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率船三艘,抵达今巴哈马群岛、海地及古巴等地,发现美洲新大陆。

1493年(弘治六年)

5月3日、4日及9月25日,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应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请求,划分两国势力范围,分地球为东西两半球,以威特岛(Verd Islands)之西三百六十海里之经线为界,东半属葡萄牙,西半属西班牙,但两国的争执并未完全平息。○6月28日,教廷发布“*Piis Fidelium*”通谕,赋予葡萄牙有权指派去印度的传教士。

1494年(弘治七年)

6月7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式签订《托尔德西拉斯(Tordesillas)条约》,将上年所划之“教宗子午线”向西移三百七十里格(一里格约六公里),至西经 $43^{\circ}40'$ 。巴西成为葡萄牙势力范围。

1496年(弘治九年)

教宗尤里乌斯二世(Julius II)批准葡、西两国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

1497年(弘治十年)

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e Gama)奉葡王曼努埃尔之命,率船四艘由里斯本起航,探索前往印度的航路,11月20日或22日绕过好望角。

1498年(弘治十一年)

达·伽马的船队于5月20日抵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Calicut),次年9月返回里斯本,终于发现了由欧洲前往印度的航路。在印度西岸各海口,达·伽马采购了印度的土产如珍珠、胡椒、细布及香料群岛所产的香料。这一次贸易获利甚巨。

1502年(弘治十五年)

达·伽马第二次率船队到印度,他带到东方的资本约二百四十万法郎,归国后带回去的东方货物价值达一千二百万。

1505年(弘治十八年)

葡萄牙人在印度设立总督。

1506年(武宗正德元年)

方济各·沙勿略(S. Franciscus Xaverius)出生于西班牙那瓦尔王国沙威堡。

1508年(正德三年)

7月28日,教宗儒略二世颁布“*Universalis Ecclesiae*”通谕,授予葡萄牙人在海外占领地区有建筑教堂、提议官员人选、封赐主教座堂、建立学院、修院和其他宗教设施的权利。

1510年(正德五年)

葡属印度总督阿伯克尔克(Albuquerque)率兵攻占印度西海岸大城市果阿(Goa),并欲以此为中心,建立一个囊括印度洋及南洋的大海洋帝国。

1511年(正德六年)

葡萄牙的舰队攻击了地处南洋咽喉的满刺加(Malacca),此举开中西冲突之端。因满刺加自明永乐元年(1403)成祖派尹庆出使其地宣示威德以后,历年谨修职责,葡人灭满刺加即为吞并



方济各·沙勿略像

中国藩属。《明史·外国六》记曰：“后佛郎机强，举兵侵夺其地，王苏端妈末出奔，遣使告难。时世宗嗣位，敕责佛郎机，令还其故土，谕暹罗诸国王以救灾恤邻之义，迄无应者，满刺加竟为所灭。”

1514年(正德九年)

11月3日，罗马教宗良十世(Leo X)发布“*Praeelsae Devotions*”通谕，准允葡萄牙在未知地带内，如有任何新地发现，皆得占领，并伺机传播天主教。○葡萄牙将军阿尔弗留斯(Jorge Alvares)由满刺加搭乘中国的平底帆船来到广东附近之屯门(Taman)，并立石纪念，这是葡萄牙人首次来到中国。

1515年(正德十年)

葡人菲莱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正式奉葡领满刺加总督之命前往中国通聘，并作贸易。

1517年(正德十二年)

6月，葡人安刺德(Fernao Perez Andrade)及比留斯(Thomas Pirez)从满刺加出发，前往中国。8月，抵广东屯门港。9月，安抵广州，谒见广东总督陈金及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中国官府准其在广东贸易，比留斯滞留广东。○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教堂门口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批评天主教会的弊端，并宣扬“因信称义”的新教义。

1519年(正德十四年)

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aes)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支持之下，从西班牙圣罗卡港(Sanlucar de Barrameda)启船，率船五艘，渡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经南美大陆和火地岛之间的万圣海峡(后命名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又继续西行。

1520年(正德十五年)

1月,葡使比留斯和中国通译火者亚三,诈称满刺加贡使,离广东北上,四个月以后抵南京。时明武宗南巡驻辇南京。○10月,教宗良十世颁布“*Exsurge*”敕书,谴责路德,开除路德教籍。12月,路德愤而当众焚毁教宗诏书。

1521年(正德十六年)

3月16日,麦哲伦船队抵菲律宾。4月,麦哲伦因介入马克坦岛(Mactan)内争,被当地土著杀死。11月,其余船员航行至摩鹿加群岛,采购香料,然后驾驶惟一幸存的维多利亚号帆船,横渡印度洋回国。○葡使比留斯与火者亚三抵京。火者见会同馆主事梁焯,欲免行跪叩礼,被梁焯下令鞭挞。不久,武宗崩,世宗即位,朝臣以火者亚三冒充满刺加贡使,情节重大,决议处斩。比留斯则发往广东监禁。○5月,罗耀拉在西班牙与法军作战时负伤,右腿致残,回罗耀拉城养伤。期间,读了《耶稣传》和《圣徒言行》,受启发并感悟,离家出走。

1522年(世宗嘉靖元年)

麦哲伦的船队回到西班牙,环球航行取得成功,证明地圆说。○3月20日,罗耀拉抵达蒙塞拉特本笃会隐修院行三天忏悔,然后,在圣母领报节的前夕,他按照骑士方式彻夜守卫在圣母像前。据称其“神秘之夜”后成为其一生的转折点。以后他前往芒莱士,住多明我会会院。○在教廷文件中提及与葡国势力有关地名多处,首次列“中国地区”(Regiones Sinarum)之名。

1523年(嘉靖二年)

葡萄牙人别都卢·奥门(Pedro Homen)等率战舰四艘,进袭广东新会西草湾,又转战至赵州,被明军击退。明军捕获其炮,称之为“佛郎机”。《明史·佛郎机传》说:“火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然将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副使汪铉并将炮呈献入朝。○2月罗耀拉前往巴塞罗纳,3月乘船前往威尼斯,然后又抵塞

浦路斯,8月前往圣城耶路撒冷朝圣,9月抵耶路撒冷。

1525年(嘉靖四年)

方济各·沙勿略赴法国巴黎圣巴巴拉学院攻读哲学,五年后获硕士学位,开始担任讲师。○罗耀拉在巴塞罗纳学习文学。

1526年(嘉靖五年)

罗耀拉赴亚尔卡拉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且布施穷人。

1528年(嘉靖七年)

罗耀拉来到巴黎,就读于巴黎大学,以后七年之中,一直在巴黎深造,并在此修完神职学课程。罗耀拉在巴黎著《神操》一书,指出社会弊端实由人心向善,宗教修养可以提高德性,移易风气。灵修生活之要旨在于“愈显主荣”,他以“人若获得全世界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好处”为神修上的格言。并邀集同道,以《神操》为基础,手订《耶稣会会规》。

1529年(嘉靖八年)

西、葡两国又订《萨拉戈萨条约》,规定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处划一条线,线以西和以东分别属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势力范围。

1532年(嘉靖十一年)

瑞士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法国巴黎著《塞涅卡仁慈论注解》,倡导实行宗教改革。

1533年(嘉靖十二年)

抵达南美传教的奥斯定会成立墨西哥教省,其目标即为向“东鞑鞑国、中国与尚不能确定福音是否已传到之其他国家”传播天主教。

1534年(嘉靖十三年)

11月3日,教宗保禄三世发布“*Aequum Reputamus*”通谕,宣布在印度果阿成立主教区,统辖远东传教事务。葡王有权向教宗提出主教及神职人员人选,同时葡王也有义务支付宗教官员的工资、建筑和修复大小教堂、修道院并提供必要的宗教用品。○英王亨利八世于3月间以教宗不许其与王后西班牙公主凯瑟林离婚为理由,敦促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国教会奉英王为最高首领,不再从属罗马教宗,改革后的英国教会称英国国教会(圣公会或安立甘宗)。○8月15日,罗耀拉召集包括方济各·沙勿略在内的六名同道,在巴黎蒙马特山宣发神贫和贞洁誓愿,并誓许服从教宗的派遣。他们原本想前往耶路撒冷,以此询教宗保禄三世,教宗说:“如果你们热望为教会服务,为天主的教会作出贡献,则现实的和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意大利。”罗耀拉遂改变计划,向教宗提出建立新的修会的建议,该僧团准备在任何时间、地点,用任何手段反对马丁·路德及其追随者。○是年,印度半岛南端科摩林角有两万名巴拉瓦采珠渔民因不堪伊斯兰教徒压迫,向葡人求援。果阿副主教率几位神父,未经训练便给他们付了洗。消息传到里斯本,葡王就商于教宗和罗耀拉,罗耀拉决定派遣两名神父前往印度。

1540年(嘉靖十九年)

9月27日,教宗保禄三世正式批准成立耶稣会,命罗耀拉为第一任总会长。该会仿效军队编制组成,故有“耶稣连队”之称。耶稣会纪律森严,会士必须服从会长,分会长必须服从总会长,总会长常居罗马,对各地会士拥有绝对治权。会规除立“三绝”(绝财、绝色、绝意)外,还强调绝对服从教宗,无条件执行教宗一切命令。该会会士无专门会服,以便渗入社会各阶层。同时该会亦倡导学术研究,强调文化传教。当时教宗限制耶稣会会士不得超过六十人,但三年以后取消此一限制。○沙勿略受命去印度,离开罗马,前往葡京里斯本。

1541年(嘉靖二十年)

沙勿略和卡马利诺 (M. P. de Camerino) 和曼西亚 (F. Mansillas) 在里斯本候船赴印度时, 教宗上谕又到, 任命他为教宗钦使兼东方教务巡视员。

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

方济各·沙勿略于5月6日抵达印度果阿, 到达后拜访当地主教及方济各会会院, 时方济各会会士有三十名, 并于上年设立一圣保禄修院。10月, 沙勿略前往科摩林角寻访当地采珠的渔民教徒。

1545年(嘉靖二十四年)

2月, 沙勿略到印度东海岸古城马拉巴朝圣, 相传宗徒多默在此地传教并殉道, 并葬在该城一座古老教堂内。8月底, 沙勿略在马拉巴搭乘一船前往马六甲, 一个月以后抵达马六甲。○罗马教廷在特兰托 (Trent, 旧译脱里腾) 召开大公会议, 会议重申教宗首席权、整饬神职人员操行, 反对马丁·路德, 重新确立天主教会的体制。大公会议直至1563年才结束。

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

1月, 沙勿略离开马六甲, 前往摩鹿加群岛, 以后一年多时间里, 先后在安波 (Ambon, Amboina, 今印尼希兰岛〈Cernate〉南的一小岛)、丹那底 (Ternate, 今印尼哈马后拉〈Halmahera〉岛西岸一岛) 及摩罗泰 (Morotai, 哈马后拉岛东北一岛) 等岛屿传教。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

沙勿略又回到马六甲, 是年8月, 其友亚尔瓦来斯领一日本青年弥次郎来见。弥次郎出身贵族, 因失手杀人在逃, 沙勿略为之讲道, 并送他往果阿深造。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

沙勿略抵锡兰,又回果阿,准备次年起程赴日本传教。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

沙勿略起程往日本前,任命保禄·卡马利诺为印度会长。一行前往马六甲。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沙勿略偕岛来斯神父、斐迪南修士、日本人保禄弥次郎、中国人玛努尔并一马拉巴人亚马道,抵达日本九州南端的鹿儿岛。该岛为弥次郎的家乡。沙勿略是为踏上日本国土的第一名天主教传教士。至是年年底,鹿儿岛已有一百五十人、附近地区已有四百五十人领洗入教。

1551年(嘉靖三十年)

1月,沙勿略偕斐迪南修士前往京都,欲见天皇,未果,返回平户。○是年,沙勿略接受葡商建议,以教宗钦使名义着盛装晋见山口君主大内义隆,递呈国书,并进呈自鸣钟、洋琴、望远镜、玻璃花瓶、西洋画等礼品,义隆赐宝刀一口、黄金一箱,沙勿略坚辞。大内义隆遂张贴布告,宣布传教自由,并赐一座废弃之庙为教堂。此时,沙勿略已经听说日本的文物制度由中国传去,产生了去中国开教的愿望。是年,沙勿略又去丰后传教,丰后领主大友义镇盛服出迎,允其在当地自由传教。○11月30日,教宗保禄三世发布“*Præclara Charissimi*”通谕,将印度果阿升为总主教区,它包括科钦和马六甲教区。

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

1月24日,沙勿略回到印度科钦,并带了一名日本使节。葡总督诺龙哈(Alphonse de Noronha)表示欢迎,果阿总主教亚尔伯奎克(J. d. Albuquerque)赞成沙勿略出使中国的计划,并且派贝来以拉为使者随同沙勿略前往中国。1月29日,沙勿略致信罗耀拉总会长,报告去中国传教情形。在动身之前,沙勿略又于4月7日、8日、9日致信葡国耶稣会省会长劳特利盖、葡王若望三世、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强调去中国的传教上必须是饱学之

士。4月7日信中说：“来远东区传教的人士，为能在拯救人灵上，获得丰富的收获，应当具有下列两项特长：首先，他们应当是——批富有经验，不怕劳苦工作的标准会上；此外，他们还应当是——些学识渊博的人士。他们应当善于讲道，和能够回答教外人和僧侣的许多质询，不是用欧洲话，而是用日本话和中国话。”4月8日致葡王若望三世的信谓将随葡国专使贝来以拉觐见中国皇帝，请求明廷允许传教自由。5月底，沙勿略一行抵马六甲。马六甲长官亚戴德(Alv. d. ' Ataide)不准商人贝来以拉充任大使，于是沙勿略仅携带费来拉修士(Alvaro Fereira)和马拉巴仆人克里斯托夫(Christophus)和中国仆人安东尼(Antonius)前往中国。8月底，他们所乘坐的圣十字号抵达中国上川岛。从8月底至12月3日沙勿略逝世，在岛上他一共住了近一百天。他们在山坡上搭建草棚，作为临时的教堂。他们从一位自广州监狱逃出的葡商马诺厄·沙佛斯(Man. Chaves)那里得知潜入广州的危险，而答应帮助他们偷渡的中国商人又迟迟不来，费来拉修士返回印度。沙勿略饥寒交迫，发热甚剧。11月22日曾一度移居圣十字号，但风浪太大，船身簸动，次日仍回岛上。有人为之放血，热度增高，不能进食。28日，不能言语，亦不识人。12月1日，又能谈话。迁延至3日晨时去世，享年四十六岁。料理丧事者，仅中国人安东尼及两名当地土著人。○10月6日，利玛窦(Matteo Ricci)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是年，耶稣会成立印度会省。

1552年1月29日沙勿略由科钦写信给罗耀拉报告远东的传教情形，信中提及中国时说：

中国幅员广大，人民爱好和平，政治清明，全国统于一尊，臣民对皇上非常顺服。中国是一个富庶的国家，各种物产非常富饶。中国和日本相距不远。中国人民都很勤奋，聪明好学、长于政治、重视伦理道德。中国人肤色白皙、不蓄须、忠厚温良、不好私斗、境内无战争。如果在印度并无棘手的事情羁身，我计划本年(1552)前往中国开教，然后回日本。原来日本现行各教派，无一不来自中国。如果日本知道中国业已接受了救主的福音，自必起而追随，放弃现有各教。我很希望中国和日本都

能生活在真正的信光之下,舍弃偶像崇拜,通国恭敬事奉我等主耶稣基督,普世的救主。

中国和日本所用的文字相同,日本人认识中国字的,能够阅读中国经书,但不能用中国话交谈。……这些中国文字,中国和日本,各用其不同的方式诵读,因此中国人和日本人,可借赖所写的意义相同的文字互相传达心意,但是谈起话来,中国语言和日语却常是有分别的。

我们已用日语撰写了讲述创造天地的主宰和介绍基督降生的奥迹并言行的一本书。不久我们想把它改写成中文,以便带往中国,使中国人知道我亦通中国文字。

同日,沙勿略也写信给欧洲的耶稣会弟兄,其中一段说:

中国临近日本,日本的各宗教派别都来自中国。中国是一个疆域广大,国势强盛的国家,境内没有战争。据曾经到过中国的葡人记载:中国是正义之邦,一切讲公义公道,甚至超过信仰基督的国家。迄今我在日本并其他地方所见到的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物产丰富,人口繁盛,大城林立,建筑精美,部分采用雕石。人人皆说中国盛产绸缎,境内有许多风俗不同的民族,有的信奉伊斯兰教或犹太教;是否有人信奉基督,却没有人敢确定。

[引自顾保鹤:《圣方济·沙勿略传》,《天主教研究资料汇编》第40辑,第67~90页,1995年上海天主教光启社出版]

1552年方济各·沙勿略发自上川岛最后的几封信

一、致满刺加弗朗西斯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ez)神父

1552年10月22日于上川

我主基督的恩泽及热爱永远保佑我们。阿门。

1. 多亏我主的慈悲、怜悯,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的大船及所有乘客安全无恙地来到了上川港。在此我们遇到了许多其他商人的船只。上川港距广州三十里格。许多商人从广州城赶来此地与葡萄牙人交易。葡萄牙人不断与他们打交道,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带我去广州城。众人一致拒绝,他们说若广东督臣得知带我入城,他们的性命及货物将遭

受极大危险。因此不管我开多大的价，他们也不敢让我随他们的船去广州城。

2. 亏得天主保佑，住在广州城中一诚实的人自告奋勇地答应我以二百科鲁札多(克鲁札多)的代价用小船将我载至广城。船上只有他的儿子和船工，以此避免让广东督臣通过水手得知是谁捎带我。他还答应将我在他家中隐藏三四天。然后在一天清晨将我及一些书籍和衣服送至城门口。我由此去见督臣并告诉他说我们此来为去觐见中国国王，向他出示主教致中国国王的信件，告诉他我们受殿下之命来弘扬天主之法。

3. 据当地人说，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有二：首先，同意捎带我们的那人在收到二百科鲁札多后，因无广东督臣的许可，会将我们遗弃在某一荒岛上或投入海中；其次，即便带我们到广州见到督臣，或许会接待我们或许会将我们下狱。因为这将成爲一特大新闻。中国壁垒森严，无国王的“割”，任何人不得入华，因为国王严格禁止外国人无他的“割”进入他的国土。除上述危险外，还有许多更大的危险，但当地人说不出来。尽管我略述一二，但要详说实非易事。

4. 首先，不要再寄希望或相信天主的怜悯？因为出于对他的爱，为他效忠，我们不断信仰他的圣法，弘扬其子——我们的救世主与主人。天主对此十分清楚。因为他的神圣怜悯向我们传达了这些愿望。现在因为我们为他服务可能遇到的危险而对他的怜悯及法力产生怀疑这才是更大的危险。我为他的效忠愈多，我们在此尘世上将遭受的危险，将得到天主一切敌人使坏的可能性愈小，因为无天主的许可，任何牛鬼蛇神无法损害我们。

5. 坚信我主的话：“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这于我主基督的话相符：“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

6. 我们以为，这些身体的危险远远大于心灵的危险。我们人为已经受身体的危险而不要在天主面前体尝精神的危

险。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前往中国。但愿我主保佑我们一帆风顺。无论敌人及其走狗对我们进行何种迫害，我们的成功定会为圣教增光。因为“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

7. 当大船离开上川港前往满刺加时，但愿我主上帝保佑将带去我们如何在广州受到接待的新消息，因为从广州不断有船至此港。在这些消息中，我将叙述从此至广州的旅途情况及广州督臣对我们的接待。

阿尔瓦罗·费莱拉 (Alvaro Ferreira) 和华人安东尼 (Antonio) 一路上身体不适，现在多亏天主保佑，情况好多了。我觉得华人安东尼 (Antonio) 无法胜任翻译，因为他已忘记许多汉语。一名叫佩罗·洛佩斯 (Pero Lopez) 的人自告奋勇地为我当翻译。他是在满刺加围城中牺牲的阿尔博阿蒂亚 (Albobadilha) 的俘虏。他懂葡萄牙语，汉语也略通一些。他毛遂自荐与我同行。今生来世天主报答他。我乞求我主天主保其平安。

8 初抵上川我们便建立了一所教堂，直到我染上热病病倒为止，每天作弥撒。我病了十五天。现在托天主保佑，已痊愈。我的圣功不知耽误了多少，如作忏悔、探望病人、谈心交友。我实在不知写甚么好，但我们入华的决心坚如磐石。所有见到我们的华人，都是诚实的商人，对我们的举动感到高兴并希望我们前往中国。他们以为我们写在书上的圣法比他们信奉的道法为佳，也许他们是出于好奇。众人兴致颇高，但无人愿意冒险引导我们前往。

1552年10月22日写于上川

9. 圣母堂及学校若属于我们的话，属于耶稣会的一切将留下。由您把它交给维森特·维加斯 (Vicente Viegas) 神父，留存一份主教将圣母堂赠送给耶稣会契约的抄件，以便教区神父及其他人不必与圣母堂及维森特·维加斯神父打交道。因此，我以本会及我个人的名义，恳求维森特·维加斯神父看在上帝的份上接受这一职务，等待果阿圣保罗学院院长派人来

满刺加。如果您们以为贝尔那尔多(Bernardo)宜留在那里,那么他就留在那里教孩子们读书识字。

10. 我日夜盼望总有一天有一华人从广州来接我。上帝保佑他一定前来,这也是我的宿愿。若上帝不保佑的话,我真不知如何办,不知前往印度还是暹罗,若去暹罗,可随暹罗国王派遣出使中国国王的使团入华。我给你们写这些的目的是请你们转告迪奥戈·佩雷拉,若他前往中国,若可通过甚么途径往暹罗发信,一定给我写信,以便我们在那里或中国其他甚么港口会合。无论在满刺加还是在印度,你们要与他保持友谊,祈祷上帝保佑他。能帮助他,尽量帮助他,因为他是我会的挚友。

我主基督保佑我等。阿门。

今天,1552年10月22日于上川

基督与你们同在。

方济各(沙勿略)

二、致满刺加迪奥戈·佩雷拉

1552年10月22日于上川

1. 多亏我主的慈悲、怜悯,大船安全无恙地来到了上川港。许多人已给你写信汇报贸易的情况。对此我不在行,所以我不写甚么。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日夜盼望总有一天有一商人将我带至广州。我已同他约定,我出二百担胡椒;由他将我带至广州城。但愿我主上帝成全此事,这是我的宿愿。

2. 若在过去见天主的人中有谁应得到承认的话,我以为您当之无愧,因为您替我们支付一切费用。您的代理商托梅·埃斯坎德尔(Tome Escandel)严格执行了您的吩咐与命令,对我有求必应。我主上帝对他的善施及对我的帮助定会给予回报。

3. 将捎带我的华人是曼努埃尔·查维斯(Manuel Chaves)的熟人。他从广州狱中逃脱时,此人将其在他家中躲藏了多天。我每天等待此人来接我,因为在上川港我们商定我出二百

担胡椒让他带我。通过曼努埃尔·查维斯，我将向您叙述了一路上的情况，以及在广引受到的接待。

4. 万一，天主绝不允许这样，这个商人不来接我，今年我不能入华，我真不知如何办，不知前往印度还是暹罗。若去暹罗，可随暹罗国王派遣的使团明年入华。若前往印度的话，在阿尔瓦罗·达·加马(Alvaro da Gama)执政期间，若上帝不以其他方式成全我的话，不要指望在华作甚么留下记忆的事情。

5. 从新加坡海峡我曾致长信给您。但愿您已收悉，因为带信者曼努埃尔·达·丰塞卡·查维斯(Manuel da Fonseca)为一可靠的人，他是安东尼奥·佩加多(António Pegado)的仆人。通过曼努埃尔·查维斯，我将有长信写给您及我主国王陛下。不知还给您写些甚么，惟一要告诉您的是，尽管发了十五天烧，我身体尚好。

万一今年无法入华，我不知是否同迪奥戈·瓦斯·德·阿拉贡(Diogo Vaz de Aragão)一道乘坐他今年在此购买的一条平底帆船前往暹罗，然后从暹罗随暹罗国王遣华使团入华。若我前往暹罗，我会通过曼努埃尔·查维斯给您写信。若您可通过甚么途径往暹罗发信，一定给我写信，告诉我您明年的打算，是否与使团入华，以便我们在广海或广东其他甚么港口会合。但愿我们在华聚首，今年我将在中国等候您。若此生无缘再相逢，我主怜悯我们相聚天堂，永不分离。

1552年10月22日写于上川

6. 弗朗西斯科·达·维拉(Francisco da Villa)在大船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对在您家中受到的招待感恩不尽。他将与曼努埃尔·查维斯一道去乞求您宽恕他在未征得您的允许的情况下来此的错误。若他有甚么过失，责任完全在我。

您最诚挚的朋友

方济各(沙勿略)

三、致果阿迦斯帕尔·巴尔札埃奥(Gaspar Barzaeo)神父

1552年10月25日于上川

我主基督的恩泽及热爱永远保佑我们。阿门。

……

6. 我抵达上川港。它距广州城三十里格。我日夜盼望总有一天有一商人将我带至广州。我已同他约定,我出价二百科鲁札多(克鲁札多),这是因为无国王“割”,私自夹带外国人入华者违反禁令,将受到惩罚。但愿我主上帝成全此事。

7. 据可靠消息,我得知中国国王派人出国到某地考察当地的政治与司法。所以人们对我说国王一定会颁布一新法律。我将把发生的事情以长信告知。我主保佑我们在天国聚首。

1552年10月22日于中国上川港

基督与你们同在,

方济各(沙勿略)

四、致满刺加弗朗西斯科·佩雷斯神父

1552年11月12日于上川

……

1. ……我等待着八天以后那商人来接我前往广州。若我不去世,为了胡椒的重利,他一定会来此,因为若将我安全带至广州城,他可赚取三百五十多科鲁札多(克鲁札多)。这完全靠我的好友迪奥戈·佩雷拉的鼎助。上帝将会替我报答他,我无此支付能力。

2. 在印度,您能帮助他尽量助其一臂之力,因为我不知何时我们才能一并报答他为在中国弘扬我们的圣教作出的贡献,多亏他的资助,我们耶稣会才得以将我们的圣教发扬光大,因为他是我前往中国的巨大支持,我的一切旅行费用都是他襄助的。

3. 您了解一下明年迪奥戈·佩雷拉是否随使团前往广州,是否有可能来,我对此不抱太大希望。上帝保佑我如愿以偿,上帝饶恕如此深重罪孽的肇事者。我相信上帝定会惩罚他,即便现已惩罚他,亦不为过。

……

5. 如果今年通过科罗曼德尔——一个月后，有一条大船由此启航——可以告诉您些我在广州受到接待的情况，我一定从广州给您们写信。但愿上帝保佑迪奥戈·佩雷拉的这条大船在满刺加能赶上另外一条前往科罗曼德尔的船，这样在3月在科钦便会有我在广州的情况。

今日，1552年11月12日于上川港

方济各(沙勿略)

五、致满刺加迪奥戈·佩雷拉

1552年11月12日于上川

……

4. 若明年您按照总督的命令，前来中国出使，您跟弗朗西斯科·佩雷斯神甫(他今年前往印度)说让果阿学院院长加斯帕尔·巴尔札埃奥派遣一神甫与您同来并将我留在满刺加弗朗西斯科·佩雷斯处的礼服带来。圣杯我派托梅·埃斯卡德尔在大船上带来，其余东西由与您同行的神甫带来。您可将此信交给弗朗西斯科·佩雷斯看，让他把装饰物(宗教用品)交给您。

5. 万一今年，这不是上帝的意愿，无法入华，我将与迪奥戈·瓦斯·德·阿拉贡一道前往暹罗，然后从暹罗乘坐一艘暹罗的平底帆船进入广州。若我得知您于明年一定率使团来此，我乘坐这艘平底帆船前往满刺加。若您率使团来此，我们在广海或广州会合。若可以的话，请从满刺加给我往暹罗写信告诉我你的决定，我将十分高兴接到你的信件。

通过曼努埃尔·查维斯，您可了解此地情况，我等待前往广州，故不赘言。

……

7. 总督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函，我未给您，我一时疏忽把它随身带来了。

我请您一定在百忙之中给我往暹罗写信，若我不能前往中国，我一定前去暹罗。但愿上帝保佑我期待的旅行一帆风顺，以便我可以中国皇帝的朝廷里等待您，因为若我中国之

行可成,在两个地方中一处您可以见到我:在广州狱中为阶下囚或在北京。据说,皇帝常驻那里。

.....

我主上帝以其怜悯定会使我们今生在中国聚首,为其效劳,否则来世相逢在天堂。

1552年11月12日于上川

您最诚挚的朋友

方济各(沙勿略)顿首

六、致满刺加弗朗西斯科·佩雷斯神父及致果阿加斯巴尔·巴尔扎埃奥神父

1552年11月13日于上川

6. 从此港口入华麻烦且危险,我不知将会发生甚么事情,尽管我希望一切一帆风顺。若今年不能入广州城,如前所述,我将前往暹罗;若明年从暹罗不得入华,尽管我仍不放弃入华的愿望,我将前往印度。

7. 你们应确信无疑的是,耶稣会得以入华只有魔鬼会不高兴。一旦得以入华,我立即将此消息告诉你们。请勿怀疑,因为已经或正在给我找的麻烦,我是不会写信告诉你们的。请你们坚信:有我主上帝的佑助,魔鬼定会不知所措。这将是上帝的巨大荣耀。因我这样的区区小人,将魔鬼这样大的势力斗得束手无策。

.....

1552年11月12日于上川

方济各(沙勿略)

七、华人安东尼·曼奴埃尔·特谢拉(Manuel Teixeira)修士的信(此信不是写于1552年,但记载沙勿略最后入华情况,一并收录)。

1557年(?)9月4日于科钦

1. 亲爱的兄弟,至于你们想知道尊敬的弗朗西斯科神父逝世的情况,我想说的是,在他谢世时,我是惟一为其送终者。为前往中国,弗朗西斯科神父在满刺加已费了不少力气,

他执意实施这一计划。我们离开满刺加后，一路顺风。不几天，我们便来到中国海岸。大船抛锚后，领航员不知所在何地，因为无法确定是否已驶过我们要去的港口或它还在前方。……

2. 弗朗西斯科神父一抵达此地，便请求葡萄牙人看在天主的份上让人给他建立一座草棚小教堂，以便可以在里面作弥撒和教那些被捕的儿童、少年学习教义。尽管人数不多，但他像他所到之处那样非常有爱心地把教他们。他为许多人作忏悔。此项工作占据了他全部时间。他为穷人化缘，与来那里贸易的华人异教徒交往。不是传播教义，而是拉家常。谈论的题目通常是哲学，例如世界的构成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的回答令华人信服。他们逢人便说，弗朗西斯科神父看上去似乎是智者，来历不凡。

……

4. 在弗朗西斯科神父在那里逗留的全部时间里，他一切的心思在于如何进入中国弘扬耶稣基督的圣教。他与华商探讨了许久。一些人说，他不可入华，因为中国国王不希望外国人进入他的国土，凡夹带外人入华者严惩不贷。另外一些人以为可以带他去，看上去他像圣人。最后，人们还是认为无法带他入华。但弗朗西斯科神父决心非常坚决，他对我主满怀希望，一定会入华。他已有所准备，若从那个港口无法入华，他将前往暹罗，从那里随暹罗国王一年一度派往中国的大使同行。

5. 做出这一决定后，弗朗西斯科神父病倒了，但不严重，不过是劳累过度，受了些凉。他每天仍坚持作弥撒。在当地葡萄牙人的建议下，他服用了泄药，很快恢复了健康，开始照常讲授教义，与华人聊天。他同一人达成了协议。此人只愿意晚上捎带我们，将他和我（因为阿尔瓦罗·费莱拉已到此）送到广州的海滩，不让人知道是谁把我们带到那里的。否则，他将性命难保，因为国王命令凡夹带外人者严惩不贷，官员严格执行。所以，给他一定数量他们喜欢的胡椒。总值为一百五十帕尔达奥（pardaos）。约定之后，他去向舰队司令告别并请求批

准。舰队司令请求他在那些大船在那里停泊时不要入华,因为中国官员见到他,看不到葡萄牙人会给他们带来麻烦。鉴此,看到当时入华有可能给葡萄牙人带来的麻烦,弗朗西斯科神甫决定在大船启航前往满刺加后再入华。届时,华人即便想找葡萄牙人的麻烦,也早已船去人空了。

.....

亲爱的兄弟,我主与其同在。

华人圣教安东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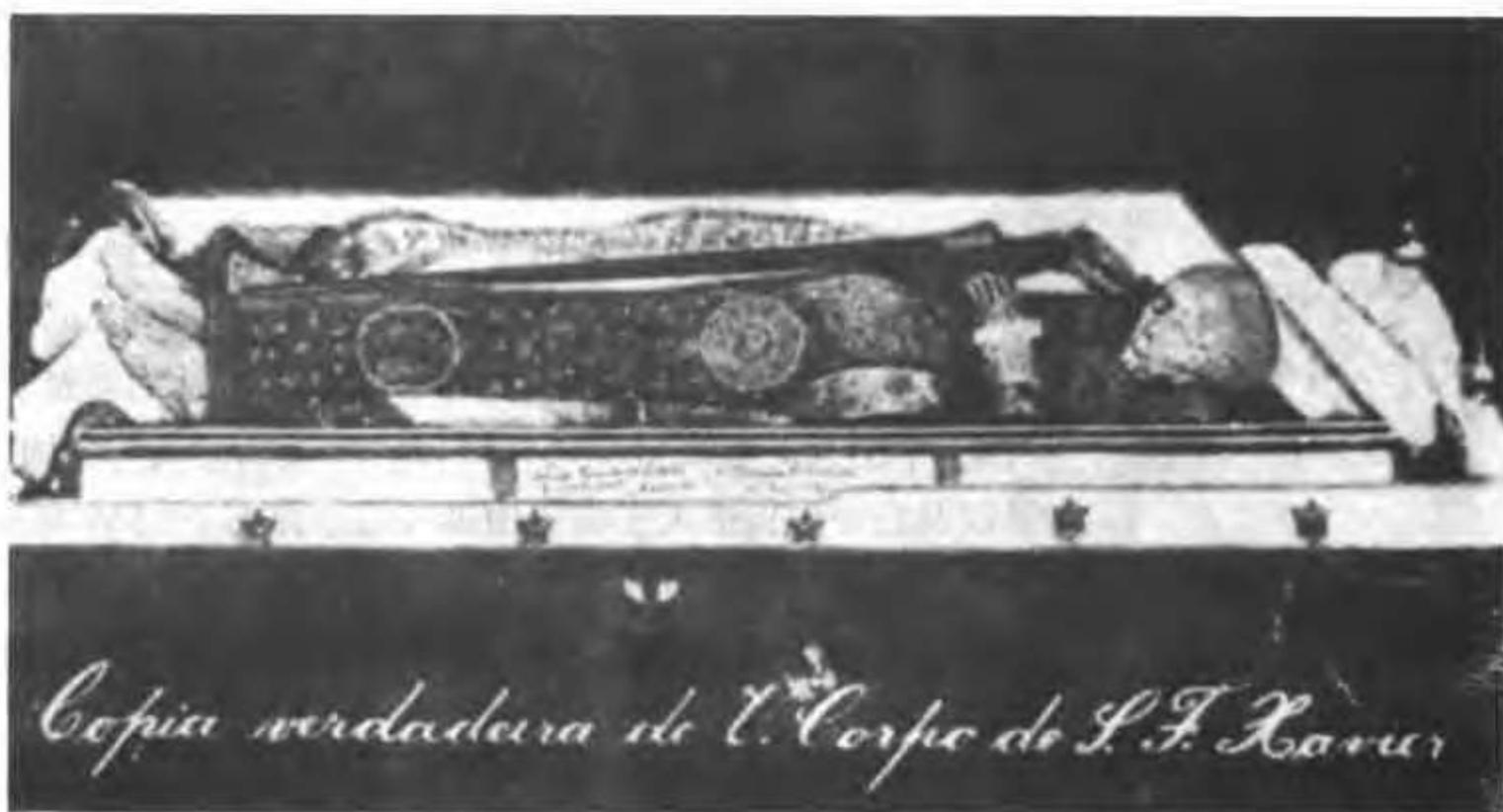
[原文载:George Schurhammer:《方济各·沙勿略通讯录》(*Epistolae S. Francisci Xaverii Aliaque eius Script*),罗马,2卷,1944~1945年,摘录自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年8月,第294~303页]

利玛窦,字西泰,1552年10月6日生于意大利中部安科纳(Ancone)省边境地区的马切拉塔(Macerata),其家庭为城中望族。其父 Giovanna Angiolelli 业医,曾任教宗国市长和省长,生子八人,女四人,利玛窦是其长子。利氏的塾师是本西凡义教士(Nicdas Bencivegni),此人后入耶稣会。在受完启蒙教育以后,他在本乡就读于七年制的耶稣会办的学校。十六岁时,父亲将他送往罗马,进罗马学院攻读法律,并加入了学院中的“圣母会”。此时,他自感有志于修道,要求入耶稣会。1571年8月15日,利玛窦在罗马桂里纳小岗(Quirinale)耶稣会会院加入了耶稣会,当时他入的是圣安德肋耶稣会初学院,他立志于东方传教,并蒙准允。故他将全部的时间用在研究对传教事业有用的各项专业知识上。他曾受教于著名的教授、数学家克拉维奥(P. Clavius,利氏译为丁先生),故精通数学和地理。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30~31页;罗光:《利玛窦传》,第1~24页]

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

2月中旬,圣十字号启航前,安东尼带人至沙勿略墓地,破土取棺装船。17日,该船启碇。3月22日,船抵马六甲,开棺检



上川島(上) 1931年开棺时的沙勿略遗体(下)

验，其容颜如生。众人争相观看。12月11日，重新安装在珍贵棺木中的沙勿略遗体运回印度。○阿加查瓦修士 (Fr. Pierre d' Alcazova) 自日本返回时，途经上川岛，曾探访沙勿略墓地。

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

3月15日，沙勿略遗体运抵果阿。船进果阿港，钟声大作，总督、政界、神职界人士及民众密集港口，迎接灵柩。教会应民众之请，将遗体显供三天，任民众瞻仰。然后暂厝圣保禄学院教堂。○葡人通过贿赂明海道副使汪柏，获准在濠境(澳门)互市和居住。

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

7月20日，葡萄牙耶稣会士巴莱多(Melchior Nunez Barreto)至上川岛谒沙勿略墓。8月3日，在浪白澳建草屋数间，成立一传教所，并在广州居留两个月，是年12月前，想营救三名葡人及三名中国教徒，未果。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

葡籍多明我会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来到中国广州。他留下了一部鲜为人知但很重要的《中国志》(Tractado)，报道了中国的疆域、省份的划分、广州城的情况、内地的建筑、百姓的行业、中国人的服饰、仪节、风俗、法律、葡萄牙人与中国人的贸易以及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困难等等。此书于1569年至1570年在恩渥拉付印。克路士于1548年随副主教伯德慕斯(Diogo Bermudes)来远东柬埔寨传教，后因在当地无法开展教务转来中国广州。

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

葡萄牙人从大陆运来砖木石瓦，在濠境搭建坚固的西式木屋多至数百间，出现了葡人居留地，从而开盘踞之渐。○是年，杨廷筠生于浙江仁和的一个官宦家庭。

杨廷筠字仲坚，号淇园，别号井寒子、郑圃居士、泌园居士。杭州仁和人。祖父杨洲，进士；祖母陈氏；父兆坊，字思说，号苏门。叔杨兆金，官至郎中。1579年（万历七年）二十三岁时中举人，1592年（万历二十年）中进士。知江西安福县知事。五年以后，建安积仓，以防饥馑。在任时“缓催科、均徭役，尤加意学校，月课岁试，奖进不倦”。地方人士称为“仁侯”。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擢按察使，曾谏阻石厂税、疏劾宦官陈奉、马堂、陈增奸状。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入京，约在次年，杨廷筠会见利氏，但没有立即信教。1602年（万历三十年）任湖广道御史，巡视漕运。两年以后，任四川掌道事。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巡按苏、松，疏请罢止苏、松改织綾纁三十万事，又请免苏、松、常、镇四府河工加赋，有“焚林竭泽，民岂堪此”之语。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任南直隶（江苏）督学，访方孝孺后裔，建求忠书院。同年因病告归。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26～127页〕

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

4月24日，徐光启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天主教会在澳门建成简陋的小教堂三座：即疯王堂（望德圣母堂）、花王堂（圣安多尼堂）和风顺堂（圣劳伦佐堂）。当时澳门教会隶属马六甲教区，由苏神父（P. João Soares）担任马六甲主教代表，驻望德堂。当时澳门有教徒六百人。○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don Sébastien）命令葡属印度总督唐·雷堂多（don Francois Coutinho de Redondon）派使团去北京朝廷。总督任命佩雷拉（Jacques Pereira）为使团团团长，于本年4月从果阿起程赴广州。同行的有佩莱思神父（P. Francois Perez）、德赛拉（P. Emmanuel Texeira）和品托（Francois André Pinto）。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高祖竹轩时迁居上海。到曾祖徐珣时，因受地方官压迫，家道中落，成了自耕农。祖父徐绪，弃农经商，家道逐渐富裕。光启父亲徐思诚“课农学圃自给”，祖母和母亲“早暮纺织，寒暑不辍”。1581年（万历九年）光启中



徐光启像



澳门花王堂(上) 澳门风顺堂(下)

金山卫秀才。父亲思诚为光启完婚，娶同邑吴小溪处士女儿吴氏为妻。又过一年，生子徐骥，再过一年，祖母尹氏去世。光启在家中设馆教学，做蒙师养家。光启少有大志。《行述》称其“胆智过人”，“以天下为己任”。

〔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4 页〕

1563 年(嘉靖四十二年)

葡印总督派出以戈埃斯 (Gil de Goes) 为首的使团抵达澳门，他们冒充满刺加使臣，以入京进贡为名，请求明朝政府允许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而葡人亦得尾随入中国而行贸易。广东的官吏看出破绽，葡使又自称为“蒲丽都家”使臣，但仍未获准入京进贡。7 月 26 日，佩雷拉和葡籍耶稣会佩莱思神父及另两位神父及修士抵澳门。但他们没有能进入中国大陆。○或记是年澳门已有耶稣会士八人，人口增至五千左右，葡人九百，皆系教徒。同年复活节前一星期内，已举行宗教仪式之游行。无数中国当地居民前来围观天主教的宗教音乐和舞蹈，六百余个灯笼、火把拥簇着圣体。不久，成批的中国居民，包括商贩、通事、雇工先后领洗入教。

1564 年(嘉靖四十三年)

西班牙海军上将黎牙实比 (Michel de Legazpi) 率舰队从墨西哥出发，远征菲律宾群岛，同行者有奥斯定会修士乌达内塔 (Fray Andres de Urdanata)。

1565 年(嘉靖四十四年)

11 月 21 日，佩莱思神父进入广州，向中国官府递呈中葡文书各一，请求居内地传教，未获准允。○耶稣会士贾耐劳 (D. Belchior Carneiro Letiao) 来澳门，并创建辣匝禄麻疯病院。(一说 1567 年)○奥斯定会士进入菲律宾。○李之藻生于浙江仁和(杭州旧分仁和、钱塘两县)的一个武官家庭。○西班牙舰队

抵菲律宾群岛中的宿务岛(Cebu)。

李之藻，字振之，又字我存，受洗圣名为“良”，故又字凉菴，号凉菴居士或凉菴逸民；另号存园寄叟。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中进士第五名，即分发为南京工部员外郎，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抵北京。约在两年后才认识利玛竇。利氏称“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耳！”李之藻所学很广，天文、地理、军事、水利、音乐、数学、理化、哲学、宗教，无不研究。《开州志》说他“性明敏，法令划一，摘发如神，人莫敢欺，于诸家之学，无所不窥”。他认识利玛竇很早，但因纳妾之故，于多年以后才摒妾入教。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113页]

1568年(穆宗隆庆二年)

黎伯拉(P. Jean-Baptiste Ribeyra)和黎耶拉(P. Pierre-Bonaventure Riera)两神父抵澳门，想去广州，未成。此时澳门教区没有明确的范围。

1569年(隆庆三年)

耶稣会士贾耐劳建成仁慈堂、拉法(Raphael)医院(即今之白马医院)以及辣匝禄(Lazaro)麻疯院。

1571年(隆庆五年)

8月15日，利玛竇在罗马入耶稣会。○西班牙黎牙实比的舰队占据马尼拉，将其作为菲律宾首府。

1572年(隆庆六年)

耶稣会士在澳门创办圣保禄学院，以培养神职人员。该院教授神学、哲学和拉丁文，还附设图书馆、观象台和药房。○9月，利玛竇入罗马的耶稣会办的罗马学院(Collegio Romano)攻读神学和哲学，五年不辍。



16 世纪来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

1573 年(神宗万历元年)

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任命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为远东教务视察专员。

范礼安,字立山,1538年12月20日生,生于那不勒斯王国 Chieti 城的望族,十九岁获巴杜(Padoue)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566年5月入耶稣会,两年以后晋铎。1573年被任为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专员,次年从里斯本前往印度,1578年在前往日本期间在中国澳门逗留,后从事日本开教工作。1606年1月20日卒于澳门。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8-21页]

1574 年(万历二年)

范礼安率领三十八名耶稣会士从葡京里斯本起程前往远东。



范礼安像

1575年(万历三年)

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拉达 (Martin de Rada) 和马里诺 (Jeronime Marino) 随同明朝清剿海匪统领王望高在厦门登陆, 在泉州小住。拉达后来著有《出使福建记:1575年6月至10月》以及《记大明的中国事情》。

1576年(万历四年)

1月23日,罗马教宗额我略十三世(Gregary XIII)颁布“*Super Specula Ecclesiae*”通谕,将马六甲与澳门分立为两个教区。澳门教区由此正式成立,其辖区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及附属各岛,并隶属于果阿总主教区。同时任命耶稣会士贾耐劳为署理主教,将圣玛利亚教堂升格为主教座堂。原澳门望德堂变为麻疯病院附属教堂。

1577年(万历五年)

5月18日,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遣往印度的传教士从罗马出发,前往里斯本。新传教士共四人,其中有利玛窦和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罗明坚,字复初。1543年生于那不勒斯王国威尼斯主教区 Spinazzola 城,获两种法学博士学位,二十九岁时辞去朝中公职,入耶稣会。1578年与同会会士抵果阿,次年抵澳门,1582年12月在中国广东肇庆建立耶稣会第一所会院。1586年1月,与麦安东前往浙江省会杭州,以后又去了广西桂林。不久回肇庆。当时肇庆教会遭到攻击,教会准备派罗明坚回欧洲敦请教宗派使觐见中国朝廷,罗氏于1588年从澳门起程,次年回到里斯本,晋见葡王菲律蒲二世,时适逢四位教宗相继去世,罗氏的使命被推迟,积劳成疾,退至萨莱纳(Salerno),1607年去世。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24~27页〕

1578年(万历六年)

3月24日,利玛窦、罗明坚和同会会士十四人,由葡京



澳门望德堂

里斯本出发前往果阿，所乘船名“圣路易号”。同船耶稣会士中尚有后来去中国传教的巴范济(Francisco Pasio)。同年9月13日抵果阿。○是年，范礼安结束对印度的教务巡视，起程东来，于7月抵达澳门。这是他去日本途中的滞留。范礼安向中国的传教筹划是：(一)必须改变目前在其他诸国的传教方法，尽量了解中国的礼俗、社会和民情；(二)要委派学识和品德出众的传教士到中国人中居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伺机将天主教传入中国。

1579年(万历七年)

利玛窦在果阿修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又被派往科钦(Cochin)教书半年。○7月7日，范礼安离开澳门，前往日本巡视教务。罗明坚由范礼安调往澳门，准备入中国传教。罗明

坚抵澳门以后,按训示努力学习中文。○方济各会士来澳门,建天神之后圣母会院。

1580年(万历八年)

7月25日,利玛窦在科钦晋升司铎,9月,奉调回果阿。○罗明坚是年初次与葡商至广州小住,为进入中国内地居住的最早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1581年(万历九年)

耶稣会士始入菲律宾传教。马尼拉成立主教区,西班牙教士桑切斯随首任马尼拉主教萨拉扎(Salazar)抵菲律宾。

利玛窦和众多来华耶稣会士来华前就读的“罗马学院”,现为宗座格里高利大学(作者摄于1996年5月)

1582年(万历十年)

教宗额我略十三世(Gregory XIII)颁布额我略公历,以当年



10月4日令以10月5日为10月15日，因而是年十月减少十天。从此，新阳历较旧阳历提早十天。此法最先行于南欧各国，以后全世界各国陆续采用。○是年，教宗将耶稣会办的罗马学院改为正式的大学，称额我略（格里高利）大学。○在日本的范礼安视察员鼓励日本九州的三位奉教大名大宗友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组织使节团前往罗马觐见教宗，是为日本史上著名的“天正遣欧使团”。○4月15日，在果阿的利玛窦接奉范礼安之命，与巴范济一同起程前往澳门。8月7日，利、巴二人抵达澳门。○是年，两广总督陈瑞行文香山澳制台马文峰，传令澳门主教萨来约（Leonardo Saa）和澳门葡国长官满多萨（Airez Gonzalez Mendoza）来省城肇庆议事。澳门主教决定派罗明坚代表前往。12月18日，罗明坚、巴范济及修士二人、中国奉教青年若干，起程前往广东肇庆，27日抵达当地，获得两广总督陈瑞允准，住肇庆东关天宁寺，是为中国内地第一所耶稣会会院。

1583年（万历十一年）

4月，两广总督陈瑞去职，罗明坚和巴范济退回澳门。巴范济去了日本。夏季，两广新总督郭应聘到任，香山县知县批准罗明坚来香山复验“路照”，罗明坚偕利玛窦同往香山。当地及广州的官员命罗氏和利氏仍回澳门。不久，肇庆知府王泮又差人召两位神父返回肇庆，在一澳门葡商威加（Gaspar Viegas）的资助下，罗明坚和利玛窦于9月10日抵达广东肇庆。时肇庆为广东省会，两广总督驻节城内。罗明坚和利玛窦居住在城东西江滨一座宝塔之旁的旷地上。9月14日，知府王泮召见两神父，告知总督已准允择地建堂。两位神父即开始差人营建教堂和住院。肇庆开教，奠定了明、清天主教传华的基业。年终，罗明坚回澳门筹款建堂。○8月19日，澳门贾耐劳主教去世，葬于圣保禄教堂。

1584年（万历十二年）

罗明坚在肇庆刊印《祖传天主十诫》：“一、要诚心奉敬天主，

不可祭拜别等神像；二、勿呼请天主名字而虚发誓愿；三、当礼拜之日禁止工夫，谒寺诵经，礼拜天主；四、当孝亲敬长；五、莫乱法杀人；六、莫行邪淫秽污等事；七、戒偷盗诸情；八、戒谤论是非；九、戒恋慕他人妻子；十、莫冒贪非义财物。”4月，罗明坚携巨款从澳门回广东肇庆，加工正在建筑的圣堂。年底时，完成一二两层建筑，另购买附近几幢矮屋，拆后建成花园。全屋用青砖和石灰建成，整洁美观。下层一厅供设祭坛，坛上供奉圣母和天主像。王知府遣人送匾额两方，一方书“仙花寺”，悬门首；一方书“西来净土”，悬挂中堂。○10月间，利玛窦在肇庆教堂绘制《山海舆地全图》，并附有自撰图解说明，向中国人介绍地为圆形，有南北二极，赤道及赤道南北昼夜之长短、五带、五大洲等世界地理知识。此图之贡献为：（一）以近代新科学方法及仪器实地测量；（二）地名之译定；（三）五大洲观念；（四）地圆说；（五）地带之划分；（六）世界之认识。时知府王泮已升岭南道道尹，他收到利玛窦的地图，翻刻赠送远近诸友。○11月，罗明坚在肇庆刻印了另一部重要的教理书《天主圣教实录》。此书原为三年前罗明坚在澳门和高麦斯神父（P. Pedro Gomez）编写的一册问答式要理，后罗氏请人译成中文，名为《西天竺国天主实录》。范礼安曾下令印行此书，但罗明坚为谨慎起见一直没有印。本年中，罗氏与利玛窦以及一位福建秀才一同润色修改此书抄本，将其付印成书。书名为《天主实录正文》，署名为“西天竺国僧书”，刊刻一千二百册，是为中国天主教第一册印刷之书籍。全书共十六章，其中不讲“天主圣三”，以免中国误信为三个天主；也不谈教宗，以免中国以为是外国君主；也不讲七件圣事，是怕名词翻译不当，有损教义。○同年5月1日，西班牙教士桑切斯（Alonso Sanchez）抵澳门，提出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立场，得到菲律宾当局的赞同。○6月25日，澳门耶稣会会长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进言西班牙国王菲律甫二世，主张武力征服中国。

阿隆索·桑切斯在澳门提出了他武力征服中国的设想：
现在要说的是，上述神甫罗明坚及其同伴（利玛窦）写信给我们说可以同总督及中国国王议和。尽管我们没有太大的

议和愿望,因为我们明白这不会有结果,但通过议和可以暗中策划战争,以获得真正的和平,即传教的和平。无论和宜与否,我们还是愿意同他们进行战争。因为尽管我已入华数月并在吕宋研究了数年(他曾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包含八十五点的备忘录),我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传教无法皈依中国。天主允许这样做。但在此问题上,我还是愿意相信在那里(日本)工作了二十年,在这里工作了近三十年的人。他们意见相同,认为天主一定会通过新西班牙(墨西哥)与秘鲁的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惟一不同的是,众人认为在上述两个国家无征服的凭据和权利,而在此却大有特有。

[汾屠立 (Pietro Tacchi Venturi):《利玛窦神父历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J.*),马切拉塔 1913 年,第 2 卷,第 425 ~ 426 页]

1584 年 6 月 25 日,澳门耶稣会会长卡布拉尔 (Francisco Cabral, 1583 ~ 1586 年任会长) 致西班牙国王菲律甫二世函,进言武力征服中国,全文如下:

两件事情令我有义务向您进言。首先,作为基督徒及为天主服务、拯救人们心灵的教士,我义不容辞。其次,作为陛下的臣民及耶稣会的成员,我责无旁贷。除了一般的义务外,出于陛下在王国内外对本会不断的特别加恩而给我们带来的特殊义务,本会对陛下感恩不尽。我实无法履行这些义务,但我以为应向陛下汇报一些此地与您的王业有关的情报。我这样做,不是以在日本及这一带居住了十七年的人的资格,而是现在正好有条陛下的大船离开此港,前往新西班牙。它带有与您的王业有关的指令及文件。有时我禀告此类消息完全是出于对您王业所具有的义务。菲律宾代理商若昂·巴蒂斯塔·罗马诺 (João Bautista Romano) 前来本港修理这条大船。因气候关系,该船驶抵本港时,已破烂不堪。除了修船之外,还要对某些船员同船长发生的格斗加以惩罚。无论如何,这是为陛下效劳,执法,平息双方。他在处理问题时,谨慎,有条理。我要说的是,在所有为陛下服务的人中,他是最卖力的。

通过其他途径，陛下一定会得到有关中国这一巨大帝国的富庶，其制度及其他与其有关的特殊情报，故我不在此赘述。我仅仅要向您汇报的是，我曾将中国的赋役全书译成我们的语言。两年前，范礼安视察员神父将其连同另外一些关于本地的情报曾呈阅陛下。这是可以搞到的最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是从当地人口中及一些书中不易得到的，所以，如我所言，仅仅谈谈国王的收入情况。每年的收入达一亿五千万。这在未亲临此地目睹一切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得知在中国所有省份中，没有一个人，无论其身份多高，可拥有一村、一臣子，即便是王子也无此权力，一切的一切绝对地掌握在国王手中。此外，每省向国王支付的人丁、水果、货物等税收数量之大不足为奇。一亿五千万收入用于王国的普通费用、维持舰队、发放俸金及工资等用去一亿，余下五千万库存各省。多年来一直这样办理，陛下您可以看到公库多么充盈。还有无记其数的私库。仅一国王的私库有一年被抄没时竟然查到二亿两库存。从征服中国中陛下可以得到好处。我知道陛下最渴望的，第一是为我上主服务，弘扬圣教信仰，皈依这千百万基督用鲜血换来、但却不公正地掌握在魔鬼手中的心灵。

第二，征服中国使您英名远扬全球。

第三，您从众多王国中所得的收入又有新的增加。

第四，每年从中国输出的货物将给西班牙属下各国的海关王家税收带来巨大增长。

第五，在此可能遇到的大量银库。尽管中国国王每年净收入五千万（这数目已很多），再加上普通开销的一亿。只要中国一归入陛下，目前的许多开支可以取消。只要陛下管理得当，尚可节约许多。

第六，我们基督教世界可获大益。不仅仅是贸易，因为如果陛下的国库充盈，将可保护基督教世界不受我主上帝的敌人的迫害，而且还可尽数摧毁他们，您将最后成为世界之主。您所具有的百战百胜的勇气可做出艰难之举。毋须勇敢无畏、经验丰富的船长来执行，毋须运气神佑来完善结束。

从中国方面来讲,有助于此大业的因素如下:

第一,中国人通常矫揉造作、不堪一击,尤其是贵族弱不经风。

第二,华人手无寸铁。除了目前守卫边疆的士兵外,就连佩剑都遭禁止。只有国王的仓库里才有武器。打仗时分发给士兵,结束后收回,所以华人一无作战经验,二贪生怕死。前几年,我正在澳门,当时来了一条日本小船,上面只有十三个人,在距此四里格处靠了岸。三千多华人将他们团团围住。日本人躲进一岩洞中。有了这掩体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出洞,但每每被歼。这样一直把他们包围着,一天一夜不敢入内。日本人见到围困的人愈来愈多,冒险突出重围,来到附近的海滩。尽管华人很多,他们还是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从华人手中夺取了一条船逃去。从此,陛下可以看到华人是甚么打仗的料。

第三,全中国无一发铜制的炮弹,因为舰队的大炮及弹丸都是铸铁的。所有的城镇筑有高墙,但不堪一击。任何一门重炮可将其夷为平地。

第四,自然而然,全体人民不忠心耿耿、喜欢揭竿而起,所以不允许他们持有任何武器。

第五,政府严厉,任何一个小镇上执法官员如云。每个官员有权逮捕百姓并以一六掌长、四掌宽的竹板加以抽打。十五大板下常常有人丧命。他们对百姓动辄抽打、虐待,致使百姓一有机会便揭竿而起,尤其是当他们见到有人开始好生对待他们,至少不像当地人那样虐待他们。

此外,还有许多便利之处,为不使本函过于冗长,不在此赘述。

首先,从这样一个省份众多、幅员辽阔的王国,我们基督教及陛下可期待得到巨大名利,又毋须很大破费,亦不必大动干戈。依我所见,为进行此项伟业,初期只需七八千或至多一万人及一舰队。这舰队的船只可十分容易地从葡属印度、菲律宾、秘鲁及新西班牙调派来。若因其他原因不能从上述地点

调兵遣将、集结船只，陛下还有日本。在那里的耶稣会神父可易如反掌地派来二三千日本基督徒。这些人因对水陆作战训练有素，骁勇无比。只要给他们每月一个半或两个埃斯库多的军饷，他们便会乐意来为陛下的这一大业效劳。就是军饷更低，因有指望进行掠夺，他们也会来。

另外的便利条件是，我们现在居住的澳门有一可供大船停泊的良港。周围有许多村落。尽管此地的葡萄牙居民仅有二三百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奴隶及本地基督徒人数可达到三千。

陛下还有广州之外的响应。广州为一主要城市，这个省份的首邑。该省份的大部分银库及其他仓库位于该城。若不进行超过目前的普通准备的备战话，只消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便可入广州城，劫掠之。入城易如反掌，陛下可攫取金钱、武器弹药、给养、船只，不用新的破费便可维持战争并将其向前推进。一夺取粤省，其他省份唾手可得，因为当地人看到我们待他们好，加上他们爱好新鲜，受着沉重的奴役，将一呼百应，揭竿而起。

此外陛下还有耶稣会神父。他们现已入居肇庆城。这是粤省总督的驻地。大概七个月前，我们从此学院派他们去那里常住。为了某种伟大的目标，上帝允许我们的两个人终于获准在那里居住。在耶稣会为入华付出了近二十年的努力之后，在多次的尝试之后，直至不久前仍为中国官员所牢牢控制，我们毫无希望，上帝允许我们的两个人如愿以偿。他们现在在学习说写汉语，以便以后布道，拯救心灵。他们已获准可往返本澳。这两个人亦可帮大忙，届时他们已掌握说写，可以向我们提供必要的通报，协助一切为陛下的效劳。于此同时，我将尽量搜集更多的情报，暗中观察、了解一切我认为与本大业有关的情况。

陛下还有菲律宾。此地近在咫尺。在必要的情况下，八天之内可送来给养及援兵。同样，满刺加虽然较慢，但也可以派用。

此外,还有其他完成此大业的办法,为不张扬,恕不在此笔述。

此大业一开始,这里稍有些头脑的人便会为陛下效劳。其他人还会提供更多的消息情报,以便采取最易于达到此目的方法。

现在来说说陛下可以用来开始此项伟业的凭据及正当法理,以免违背良心。通常而言,博士们对任何一新的征服采用两种解释途径。一是拒绝通商,这是违反人权的;二是不愿接受传播福音,这是违背自然及神圣权力的,但我不知上述两种权力在此次征服中具有何等力量。因为,至于通商的权力,只要缴纳海关税,已承认葡萄牙人,而且也承认西班牙人具有此权力。从本年这条大船及代理商乘坐来澳的三桅船一事便可看到此点。至于传教,迄今为止尚未见对其禁止。相反,尽管不得允许外人入华,已允许耶稣会会士以神甫和宗教人员的身份入华。不但不禁止他们布教,总督及县官还送给他们场地、土地,供盖住院之用。据现在已在那里的神甫写给我的信称,上述官员还想出资建造教堂。所以,由此两种途径,我不知道有多少正当理由。

但我以为,最正确的、迅速找到可援引的正当理由的途径是,陛下下令以贸易的借口迅速增加澳门的人口。他们可来自新西班牙、秘鲁或葡属印度,以便本地常有五百至六百人,设立一常设兵头。由于广东的官员及督抚欲不断为其国王增加税收,因为他们也会为此受恩惠。为了达到此目的,有时对本港口居民有蛮横之处。尽管为这些行为道了歉,也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本年,我曾目睹几件这样的事情。鉴于此原因,若我们有财力的话,有正当理由向他们发动战争。即便出于广东对我们的侮辱,我们有理由行动,但尚无理由对全中国发动战争。我们有理由对剥夺我们权力的人,仅仅向这些人宣战。他们肯定会得到全中国的帮援,这样我们就有正当理由来自卫、打退侵略者。因本函的篇幅关系,不拟就此问题多作探讨。神学家对此已有广泛的讨论,我不赘述。当您决定开始这

一征服时，不缺乏正当的凭据。

最后我要建议的是，对日航行对陛下的王业、本港保存、对华征服及其益处是多么的重要。日航的收益如下：

第一，每年陛下可使您王国中一贵族获得七或八万科鲁札多的收入；

第二，以此航行每年可支付一贵族十或十五年的服务报酬。

本地人每年可有二三千或四万科鲁札多的收入。在葡属印度亦可有同等收入。

您王国中的大宗、丰富的货物将更加流通。来此运货的大船将缴纳的巨大税收将使您的海关收入猛增。为陛下服务的极其重要的满刺加海关从由本港开出的大船所缴纳的关税中可支付大部分的日常费用，此外尚有多种利益。

为使它与日俱增，永不衰败，陛下为本地派遣一常驻兵团或常驻总督实属必要。这将有益于本澳的利益及生存，以本澳十分缺乏的正义管理本澳，为陛下服务。

此为一时所思之处，我认为有义务禀告陛下。陛下明鉴，出于陛下的大业利益，降旨施行。我主上帝保佑陛下万寿无疆、王体安康、繁荣富强。此乃我基督教世界之福祇。

1584年6月25日发于澳门

弗朗西斯科·卡布拉尔(Francisco Cabral)顿首

满刺加主教卡耀也主张对中国武力征服：

许多人以为，陛下在以上述安排派舰队攻打亚齐时，可通过菲律宾组织一支人员达四千人的第二舰队前去攻打暹罗和北大年，因为如果陛下在这些地方设立了据点，将威震四方，一切太平，无人胆敢闹事。然后不必多有破费，陛下将成为金银遍地的中国及广州城的主人。据众人说，世上无再富裕之地。在征服时，可从暹罗调集一切军需给养。为此亦绘制了航图，解说征服暹罗和北大年的程序。陛下庇护神圣天主教，上帝保佑我主陛下万寿无疆。

1584年12月23日于满刺加

满刺加主教若昂·李贝罗·卡耀 (D. João Ribeiro Gaio)

签字

〔摘自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 2000 年，第 132～139 页〕

1585 年(万历十三年)

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卡布拉 (P. Francis Cabral) 他调，孟三德 (Eduardo de Sande) 接任。7 月，孟三德神父偕麦安东 (Antonio de Almeida) 抵澳门。时两广总督郭应聘遣罗明坚往澳门采购翎毛，罗明坚乘机偕孟三德至肇庆。孟氏在肇庆往拜岭西道王泮，孟留居仙花寺。11 月，继王泮任肇庆知府的浙江上虞人氏邹一麟，邀请罗明坚以及尚在澳门的麦安东神父一同去浙江。○方济各会士试入中国未成。○是年，传教区教徒有二十名。

1586 年(万历十四年)

1 月 23 日，罗明坚、麦安东经江西南昌抵浙江绍兴，在城中居数月，官民和平民往见甚众，轰动一时。王道尹的亲戚和邹一麟家人都担心事情传到南京和北京，催二神父回广东。7 月，罗、麦二人回到广东肇庆。○是年，西班牙教士桑切斯鼓动菲律宾当局，向西班牙国王菲律甫二世提交《论征服中国》备忘录，准备以一万余名欧洲士兵再加五六千日本人和菲岛土人，以及数名炮术专家组成军队远征中国，以推动基督教。但菲律甫二世忙于与英国争雄，不予重视。○奥斯定会士来澳门，在岗顶建立奥斯定堂，华人称为“龙须庙”。

1587 年(万历十五年)

是年，王泮的一位谭姓朋友，劝罗明坚前往湖北武当山。罗明坚只身一人于正月赴广西，抵桂林，因和明朝宗室有过从，招惹桂林官界疑忌，被布政司逐出，绕道湖广一带，折回肇庆。○多明我会士来澳门，建会院于卖草地，又建玫瑰圣母堂，华人称



澳门玫瑰堂

为“板樟庙”。

1588年(万历十六年)

王泮升任布政使。○罗明坚回到澳门,与当时正在澳门的范礼安、孟三德商议教务。范礼安命罗明坚返回欧洲,商请教宗委派专使前往北京觐见大明皇帝,请准在中国传教。12月20日,罗明坚离澳门返回欧洲。中国内地的教务悉由利玛窦承担。○是年,自欧洲返回的四名日本使者来到澳门,觐见范礼安。他们携来印书机一台,在澳门印刷出版了拉丁文的卜尼法爵的《公教儿童教育》以及《日本使团旅行记》两书,是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西文书籍。○日本成立主教区。○西班牙籍多明我会教士高姆噠(P. Juan Cobo)抵达菲律宾,在当地华侨中传教。

1589年(万历十七年)

新任两广总督刘节斋企图占肇庆的仙花寺,于8月3日下令,限利玛窦在三日内回澳门,给银六十两,作渡海费用。利氏拒收钱,只要刘总督一纸文书,声明非因犯罪而被逐。利玛窦乘舟由西江至广州,又被刘节斋差人召回。时肇庆同知方应时向刘节斋报告,利氏未收银两,刘节斋担心舆论将说他强夺番僧寺院以作生祠,速将利氏召回。利玛窦面见刘节斋时仍拒受银两,同时申明愿往别处居住,刘节斋应允。8月15日,利玛窦领取银两,取得路票,前往韶州南华寺。时麦安东正由澳门来肇庆,两人便一同前往,在韶州光华寺小住数日以后,请得当地兵备道准允,暂住城外光孝寺。不久,他们获准在另一旷地建立一华式的教堂和住院,范礼安从澳门派两位奉教中国青年钟鸣仁、黄明沙到韶州相助。○年终,石方西神父(Francis de Petris)来韶州。○是年,瞿太素从南雄来到韶州,慕名往见利玛窦,并从利氏学习天算。

瞿太素名汝夔,生于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江苏常熟人氏。著名的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楼)即为瞿氏所拥有。父名景淳,官至礼部尚书,家居丹阳。瞿太素不求仕进,周游四方,



1589年利玛窦迁居韶州时所住的南华寺

往访刘节斋时，闻利玛窦之名，往见相识。当时利玛窦初来中国，穿僧装，瞿氏劝他改穿儒服。瞿太素常在缙绅间揄扬利玛窦，并在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为利玛窦《交友论》作序。瞿太素曾从利玛窦学象数两年。到1605年3月在罗如望神父手中领洗，取教名依纳爵。1607年，他的长子瞿式穀亦领洗，取教名玛窦，以纪念利玛窦，当时式穀十五岁。瞿太素（汝夔）弟瞿汝说，汝说之子即瞿式耜，为太素的从侄，生于1590年（万历十八年），长式穀三岁，据西方史籍记载，瞿式耜于1623年（天启三年）艾儒略到常熟开教时受洗，并在宅门外张贴“僧道无缘”之条。后瞿式耜成为南明的爱国名臣，在桂林殉难。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74～277页〕

1590年（万历十八年）

利玛窦在韶州设耶稣会初学院，钟鸣仁、黄明沙二青年入院修习。瞿太素介绍一江西富商葛某往见利玛窦，并受洗入教，取圣名若瑟。○耶稣会士石方西（P. Francois de Petris）来澳门。

1591年（万历十九年）

1月1日，钟鸣仁、黄明沙正式加入耶稣会，成为最早的中国籍耶稣会士。○从是年开始，利玛窦着手将中国儒家典籍《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欧洲，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瞿太素将利玛窦业师丁先生（Cristoforo Clavio）的拉丁文《几何纲要》第一卷译成中文，但未出版。时瞿太素建议利玛窦抛弃僧服僧名，改易儒服。○麦安东卒于韶州。

1592年（万历二十年）

阴历新年，瞿太素在南雄家中度岁，利玛窦遣人送礼，瞿太素立即亲自到肇庆还礼，并邀利玛窦到南雄一游。是为南雄开教之始。是年，瞿太素离南雄回江苏。○5月1日，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生于德国科隆。○10月间，范礼

安回澳门巡视。利玛窦决定不再穿着僧服,但必须经耶稣会会长及总会长批准。年底,利玛窦被召回澳门,利氏便向范礼安说明原委。范氏表示赞同,并上书总会长,陈明改装理由。○高姆噤出使日本,中途遇飓风飘至台湾而卒。○杨廷筠中进士,知江西安福县事。冯应京中进士。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

11月5日,石方西去世于韶州。年底,澳门一修士来韶州,将麦安东、石方西两神父棺柩归葬澳门。○是年,马尼拉出版了高姆噤神父的《天主教教义》(*Doctrina Christiana*),此书以中文写成,但差不多都是用闽南语音译的西班牙名词,如:吾主天主——本头僚氏(Dios)、圣神——卑厘厨山厨(Espiritu Santo)、圣十字——山礁居律氏(Santa Cruz)、圣玛利亚童贞——山礁妈厘啞美里矧(Virgen)、圣公教会——山礁礼社交刀厘咬(Iglesia Catolica)、圣事——沙胶览民厨(Sacramentos)、神父——巴礼(Padre)、主教——巴礼王、教宗——巴罢(Papa)、教友——洒水人、三位一体——三治氏马知咩力(Santisima Trinidad)、天神——天人、教堂——庙,等等。○利玛窦译中国经籍《四书》为拉丁文,译本名 *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今佚。是为西人翻译中国经籍之始。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受范礼安委派,于7月7日抵韶州,协助利玛窦传教。同时郭居静告诉利玛窦,范礼安已批准蓄须蓄发,改穿儒服。○耶稣会士初创圣保罗书院,华人称之为大三巴书院。早在1580年,罗明坚已在大三巴建造了一所小房子,作为讲授教理之用,至1582年,耶稣会士放弃旧会院迁居大三巴上新建会院中,附设教堂和学校。至本年这所学院升格为学院(当时的大学),有会士三十多人,学生二百余人,附设大修院。当时正是澳门商业和传教繁荣的时代。

郭居静,字仰凤。1560年生于意大利的Sazzano附近

Gênes 城,出身于古老的 Cattanei 氏贵族家族。早年攻读文学、哲学和神学。1581 年入耶稣会。后去印度,在果阿任公学院院长,又任 La Pecherie 教区会长二年,1594 年来华。

1595 年(万历二十三年)

兵部侍郎石星进京途中路过韶州,邀利玛窦北上。利玛窦留郭居静以及钟鸣仁、黄明沙二人在韶州,自率两名澳门青年和两名仆人随石侍郎北上。他们抵南雄,过梅岭,经江西南安,由水路抵吉安,过南昌,入鄱阳湖,沿庐山而入长江,沿江东下,于 5 月 31 日抵南京。抵陪都以后,利玛窦往见鸿胪寺礼部侍郎徐大任。此时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正进攻朝鲜,明军人朝援助,徐侍郎怕有人告发南京礼部接待外国人,有通敌之嫌,遂驱逐利玛窦出南京。利玛窦于 6 月 17 日抵南昌,不久,往见江西巡抚陆万垓,在南昌的明朝宗室建安王朱多炡、乐安王朱多煊亦邀利氏入府宴游。利玛窦应建安王之请,作《交友论》(原题《上建安王交友》),其中收录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苏格拉底、奥古斯丁等西哲论友谊之名言,《天学初函》、《宝颜堂秘笈》、《广百川学海》、《坚瓠秘集》、《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收有此书。同时利玛窦又造二时钟、二地球仪,分送二王及陆巡抚。此时利玛窦已改着儒服,头戴方巾,自称“道人”,见客时执秀才礼,中国的官吏和文士均不以为怪。《天主实义》初刻于南昌。○12 月 24 日,耶稣会士苏如望(Giovanni Soerio)和黄明沙抵南昌。○是年,徐光启在广东韶州教学,偶值余暇,信步至城西天主堂。时利玛窦已北上传教,韶州教堂事由郭居静主持,徐光启“入堂宇,睹圣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潜孚”,又“与郭子晤,颇惬意”。是为徐氏与天主教的第一次接触。

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

1 月 1 日,利玛窦发耶稣会四大誓愿,由苏如望神父监誓。其四大誓愿除绝财、绝色、绝意外,第四誓愿即绝对服从教宗的指挥。利玛窦在南昌结识白鹿书院院长章潢(本清),南昌文士

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

均来拜访利玛窦,利氏出所著《天主实义》以示章潢及众文人,婉请修改。章氏等人劝其付梓,但利玛窦因译名问题暂未付印。○徐光启应浚州知州赵凤宇之请,由韶州移馆浚州。○葡籍耶稣会士李玛诺(P. Emmanuel Diaz)被任为澳门耶稣会院长。○耶稣会总会长阿奎维瓦(P. Claude Aquaviva)委派皮门塔(Pimenta)处理葡属印度及果阿传教事务,范礼安则专门负责中国和日本的传教团。范礼安不再管辖印度的事务。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

郭居静大病,往澳门就医。○罗雅各(John da Rocha)神父被派往韶州,隐居堂中,为教友举行圣事。○半年以后,郭居静身体复原,偕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神父一同来韶州,韶州乃有神父三人。这是龙华民初来中国。○7月,范礼安从印度果阿出发,经科钦和马六甲抵澳门,任命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秋,徐光启由浚州北上顺天府(原北平府)参加乡试,主考官焦竑得其卷“击节称赏,阅至三场,复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拔置第一”,徐光启遂留京候会试。

龙华民,字精华,1559年(一说1556)生于意大利西西里Caltagirone城贵族家庭。早年在墨西哥耶稣会攻读文学、哲学、神学,成绩优异。后任初学院助教二年,导师一年。1596年从里斯本启程东航,来华以后初在韶州城乡之间从事传教工作多年。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71页〕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

礼部尚书王忠铭答应携带利玛窦上北京进贡方物。6月25日,利玛窦偕郭居静神父、游文辉修士北上,罗雅各、苏如望和钟鸣仁则居南昌。7月5日或6日,利氏等抵南京。当时明军在朝鲜战败,人们对形迹可疑的外国人均疑为日本间谍。利玛窦等人日夜伏居船中,不敢登陆。最后利氏往访王尚书,王不愿食言,决定利、郭二人陪着他的行李,由运河北上,他自己则由陆路而

行。王尚书的好友、南京总督赵可怀(驻节句容)曾在苏州刻印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听说绘图者已到南京，便邀利氏前往句容一见，并待以上宾之礼。辞别赵可怀以后，利、郭二神父沿运河北上，过扬州，经淮安，在济宁小住，又在临清系缆，然后入直隶省，抵天津，9月7日终于进入北京。利、郭两人往谒王忠铭，王邀其同住一处，钟、游二修士则居城外，一个月以后，皇帝的万寿节已过，王忠铭未获升迁，出京返任。利玛窦等另租一房间，各方活动，但所有官吏为避嫌疑，不肯引见。利玛窦等只得雇船返回南京。船抵临清，郭居静留下小住，利氏则由陆路前往南京。○是年三月，徐光启在京应会试，不第。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

年初，利玛窦在回南京途中先往苏州，拜访瞿太素未遇。瞿是时在丹阳，利玛窦在丹阳的古庙中会见了瞿太素，商议择地建堂。2月6日，两人同入南京，居承恩寺。时朝鲜战事结束，南京的官吏和文士公开与利玛窦交游。王忠铭、刑部侍郎王明远、尚书赵参鲁、户部尚书张孟男、礼部尚书叶向高、国子监祭酒郭明龙、翰林院编修杨荆岩等都与利氏有往来。5月，郭居静也从山东临清回南京，利、郭便在南京购屋建堂及居所。利玛窦在南京向士大夫讲演天算，并出示自造的天地仪、地球仪、象限仪、纪限仪，同时他也到南京北极阁参观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南京刑部左事吴左海嫌王泮所刻利氏之《山海舆地全图》过于简单，便请利玛窦绘一较大的舆图，多加说明，并为之作序付梓刻印，流传全国各地以至日本。时已罢官居南京的学者焦竑、著名思想家李贽亦与利玛窦相识晋接。○6月，郭居静偕钟鸣仁离南京经南昌往澳门，8月底至澳门，筹备明年上北京的贡品及川资。10月下旬，郭从澳门起程北上，偕耶稣会新传教士、西班牙人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一同前来。郭居静所带的西洋物品中有钟表及圣母像一座。○是年，明廷遣宦官复全国积储，搜索上供，增加四川、湖广田赋。宦官陈奉任税吏，在湖广恣行威虐，激成民变。时冯应京任分巡签事，独以法裁制之，并参奏陈奉十

大罪。

庞迪我，字顺阳，1571年生于西班牙 Valdemora 城，属 Sēville 主教区。1589年入 Tolēde 省耶稣会初学院，在修毕全部学业以后，他要求去外方传教，1596年与龙华民神父起程东航，原定去日本，但范礼安指派他去南京。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82页〕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

春，徐光启赴北京礼部受试，路过南京，看到赵可怀、吴中明刻印的《山海輿地全图》，“乃知有利先生”。徐光启在城里见到了利玛窦，聆听利氏谈道，“为低回久之”，“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可惜因应试不能久留，与利玛窦告别以后匆匆取道北上。○5月18日，利玛窦偕庞迪我以进贡为名，离开南京，沿运河北上。船至济宁，李贽偕食道刘东星往见，两人并为利玛窦修改表文。船抵临清，驻临清监察税务的宦官马堂听说有西洋人进贡，便索看钟表、圣像、西洋镜、輿图等物品，一见以后便起了贪财贪功之心，他将利玛窦迁入他的官船里，要利氏由他引进北京。7月31日，马堂上奏，称有西洋人利玛窦者谨备方物进贡皇上，并备大船一只，保送彼等至天津卫，等候圣旨。船到天津以后，马堂将利、庞二人禁闭在一座楼里，等候圣旨。直到年底，进京的谕旨才到。○是年，中国天主教信徒达六百人。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

1月8日，马堂奉旨，立即遣人谕知天津卫发还利玛窦行李和贡物，并备车马脚夫，令利玛窦等即日起程。1月24日，利玛窦和庞迪我抵达北京。当夜宿宫门外太监庑殿。次日即将贡品送入宫内，计有时画天主像、古画天主像、时画天主圣母像、天主经（日课经）、万国图册、自鸣钟、映五彩玻璃石两方、大西洋琴、玻璃镜及玻璃瓶八件、犀角一只、沙刻漏两只、乾罗经（福音圣经）、大西洋各式镇袋四匹、大西洋布五匹、大西洋行使大银钱四个。万历帝命太监向西士学习修理钟表技术及演奏西琴的方法，利

玛竇由此作《西琴曲意》八章(吾愿在上、牧童游山、善计寿修、德之勇巧、悔老无德、胸中庸平、肩负双囊、定命四达)。不久,礼部命利玛竇等居住“礼宾馆”,并准利氏等出馆见客。时吏部给事中曹于汴与利氏交游。11月,冯琦接任礼部尚书,批准利玛竇出“礼宾馆”居住,并供盐米、肉酒。出馆以后,利氏还拜谒了阁老沈一贯。利玛竇虽未得见皇上,但留京的目的已经达到。○冯应京为裁制宦官陈奉,反被诬陷,逮下刑部狱。当逮冯应京时,武昌民众大愤,群起反抗,焚公署门,陈奉逃匿数月不敢出。冯应京被押解至京,还未下狱之前,利玛竇赶去谒见他。冯应京曾遣学生刘某去南京向利玛竇学习数学,故两人神交已久。冯应京被论罪下狱后,他们的友谊持续不断,彼此馈赠,互通尺素。利氏说:“他办我们神父的事,就好像他自己的事;我们神父办他的事,也好像我们自己的事。”○是年,徐光启又抵北京,礼部闈试不中,再赴韶州。

利玛竇上奏万历皇帝书

大西洋陪臣利玛竇谨奏,为贡献土物事。臣本国极远,从来贡献所不通,逃闻天朝声教文物,窃欲沾被其余,终身为氓,庶不虚生。于是辞离本国,航海而来,历时三年,路经八万余里,始达广东。盖缘音译未通,有如喑哑,因僦居学习语言文字,淹留肇庆韶州二府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凡经籍,亦略诵记,粗得其旨。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帝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一架,万国舆图一册,西琴一张等物,陈献御前。此虽不足为珍,然出自极西,贡至,差觉异耳,且稍寓野人芹曝之私。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初未婚娶,都无繁累,非有望幸。所献宝像,以视万寿,以祈纯嘏,佑国安民,实区区之忠悃也。伏祈皇上怜臣诚恁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臣益瞻皇恩浩荡,靡所不容,而于远臣慕义之忧,亦稍伸于万一耳。又臣先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

倘蒙皇上不弃疏微，命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然而不敢必也。臣不胜感激待命之至。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题。

〔利玛窦奏疏见《增订徐文定公集》卷首下，又见黄伯禄《正教奉褒》，但略改数字。关于进贡时间参看梁子涵：《利玛窦进京朝贡的时间问题》，（台）《新铎声》第二十期〕

1602年(万历三十年)

李之藻在北京重刻利玛窦《万国全图》，并作跋。此次所刻《万国全图》作屏风式，凡六幅。○龙华民在广东韶州出版《圣教日课》，此为天主教日常公诵之经本，分为三卷。○澳门初建圣保禄大堂。《澳门纪略》曰：“（寺）首（三巴）在澳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长，石作雕镂，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绮旒瑰丽，所奉曰天母，名玛利亚，貌如少女，抱一婴儿，曰天主耶稣。衣非缝制，自顶被体，皆采饰平画，障以琉璃，望之如塑。旁貌三十许人，左手执浑天仪，右指若方论说状。发眉竖者如怒，扬者如喜。耳重轮，鼻隆准，目若矚，口若声，上有楼，藏诸乐器，有定时台，巨钟覆其下，立飞仙台隅，为撞钟形，以机转之，按时发声。僧寮百十区，藩僧充斥其中。”该大堂至1640年才完工。○李贽以“惑乱人心”罪被逮捕，自刎死，年七十六岁。李氏与利玛窦曾“三度相会”，谓利氏“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居喧杂，仇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门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10月2日，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Goes Bento）受印度耶稣会视察员皮门塔（Nicolas Pimenta）派遣，离开阿格拉，开始其探险征途。当时印度的会士听说有一国家为契丹（Cathy），有教徒和教会，尽管利玛窦已函告印度会士，所谓“契丹”便是中国，但印度的会士不相信，决意派人探测，同时找到从印度到中国的捷径，鄂本笃担任了这一使命。

鄂本笃，1562年生于葡萄牙 Terceyres 群岛中的圣弥厄尔岛（St. Michel）上的 Villa - Franca，年轻时参军入伍，在印度

南部马拉巴驻防，在那里加入耶稣会，由于其机智和品德，成为莫卧儿国王阿克巴（Akbar）挚友，并在莫卧尔帝国习波斯语。当时印度总督唐·沙达那（don Arias de Saldagna）、果阿大主教唐·梅纳斯（don Alexis de Menesses）、印度耶稣会视察员皮门塔决定探查亚洲高原的路径，寻求从陆路前往北京的可能性。鄂本笃遂应命前往。他穿着亚美尼亚人的服装，取名阿卜杜拉·以赛（Abdullah Isai），同行者有一希腊修士，一商人和一亚美尼亚人。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09～112页〕

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

2月初，徐光启因事从上海到南京，往访利玛窦，不遇。在南京主持教务者为郭居静、罗如望二人。罗氏出而迎接，与徐光启讲天主教道理，并陪他观看礼拜堂中的圣母像，还送他一册《天主实义》和一册《天主教要》。光启归邸舍，“于邸中读之，达旦不寐，立志受教”。连日在教堂“观教礼，考道义”，聆听罗如望及钟鸣仁讲解教义，终于2月11日受洗成为教徒，取圣名“保禄”。领洗毕，即回沪。○利玛窦在北京再刻印《天学实义》（《天主实义》）。此书为利玛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初稿在南昌脱稿，后经多次润色，冯应京在万历二十九年于狱中为此书作序。全书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四篇，分论天主、灵魂、鬼神、人性、身后赏罚及耶稣降生各端道理。每篇都用“中士问，西士答”体裁，对中国原始儒家思想予以肯定，认为可与天主教沟通，对于宋明理学则有所贬抑，对于佛、道则痛予驳斥。后来李之藻收入《天学初函》，并附有李子重刻序。以后则翻译成日本文及高丽文。是书称天主为“天”或“上帝”，是据中国经书上之意义。1704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禁止此称呼，故《天主实义》后印者均改去“天”及“上帝”等字。○中国籍修士黄明沙说服瞿太素入教。此前，瞿太素有妾，本年，原妻病故，扶妾为正。遂于圣母须报瞻礼日受洗于罗如望神父之手，教名依纳爵。○李应试在北京刻印利玛窦世界地图，称“两仪玄览图”，有吴中明、李应试、常胤绪、冯应京、阮

泰元、侯拱宸、利玛窦序文。此图此后被朝鲜使节带回，后藏黄炳仁家，现藏汉城崇田大学。○是年，冯琦卒。○11月，鄂本笃翻越帕米尔高原，抵叶尔羌，当地人告许他听说过“契丹”之名。○意大利楮西亲王(Fredericus Cesi)创立“灵采研究院”，从事科学研究。“灵采”(Lincci)意为山猫，其目光锐利。

冯应京为《天主实义》所作序言：

天主实义，大西国利子及其同乡会友与吾中国人问答之词也。天主何？上帝也；实云者，不空也。吾国六经四子，圣贤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上帝，曰格上帝，夫谁以为空之说。汉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尝称西方圣人，殆谓佛与？相与鼓煽其说。若吾六经上，乌知天竺中国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窃闭他卧刺(人名)劝诱愚俗之言而衍之为轮回，中窃老氏乌狗万物之说而衍之为寂灭，一切尘芥六合，直欲超脱之以为高中国圣远言湮，鲜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势。且或内乐悠闲虚静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厌驰骋名利之劳，后慑沉沦六道之苦；古倦极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社稷山川祖祢，而今祀佛矣；古学者知天顺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燠天民，而今大隐居朝，逃禅出世矣。夫佛，天竺之君师也，吾国自有君师，三皇五帝、周公、孔子及我太祖以来皆是也。彼君师侮天而驾说于其上，吾君师继天而立极于其下，彼国从之无责尔，吾舍所学而从彼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释氏本心。师心之与法天，有我、无我之别也，两者足以定志矣。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谭空之误，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见谓人之弃人伦，遗事物，狠言不着不染，要为脱轮回也。乃轮回之诞明甚。其毕智力于身谋，分畦町于膜外，要为独亲其亲，独子其子也。乃乾父之公又明甚。语性则人大异于禽兽，语学则归于为仁而始于去欲，时亦或有吾国之素所未闻，而所尝闻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游八万里，高测九天，深测九渊，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尝穷之形象，既已穷之有确据，则其神理当有所受，不诬也。吾辈即有所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至所尝闻而未用力者，可

无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图乎？愚生也晚，足不遍阡域，识不越井天，第目击空谭之弊，而乐夫人之谭实也。谨题其端，与明达者共绎焉。

万历二十九年孟春灏旦后学冯应京谨序

利玛窦自撰《天主实义》引：

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臣以忠。忠也者，无二之谓也。吾伦甲乎君，君臣为三纲之首。夫正义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乱，群雄分争，真主未决，怀义者莫不深察正统所在焉，则奉身殉之，罔或与易也。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国统于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识而仰思焉。人流之抗罔，无罪不犯，巧夺人世犹未餍足，至于因僭天帝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难遂而谬布邪说，欺诳细民，以泯没天主之迹，妄以福利许人，使人钦崇而祭祀之。盖彼此皆获罪于上帝，所以天主降灾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哀哉！岂非认偷为主者乎？圣人不出，丑类胥煽，诚实之理几于消灭矣。竇也从幼出乡，广游天下，视此厉毒，无隙不及，意中国尧、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学，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间有不免者。窃欲为之一证。复惟遐方孤旅，言语文字与中华异口，手不能开动，矧材质卤莽，恐欲昭而弥暝之，鄙怀久有慨焉。二十余年，旦夕瞻天泣祷，仰惟天主，矜宥生灵，必有开晓匡正之日。忽承二三友人见示，谓虽不识正音，见偷不声，固为不可，或傍有仁惻矫毅，闻声兴起攻之。竇乃述答中士下问吾侪之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为无也，犹瞽者不见天，不信天有日也，然日光实在，目自不见，何患无日？天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觉，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虽无其形，然全为目则无所不见，全为耳则无所不闻，全为足则无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如宪判之威也。凡为善者必信有上尊者理夫世界，若云无是尊，或有而弗预人事，岂不塞行善之门而大开行恶之路也乎？人见霹雳之响徒击枯树，而不即及于不仁之人，则疑上无主焉。不知天之报咎，恢恢不漏，迟则弥重耳。顾吾人钦若上

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万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智以营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备此，以致各物万类所需都无缺欠，始为知大伦者云。但其理隐而难明，广博而难尽知，知而难言，然而不可不学，虽知天主之寡，其寡之益，尚胜于知他事之多。愿观实义，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义也。若夫天主，天地莫载，小篇孰载之。

时万历三十一年岁次癸卯七月既望利玛窦书

李之藻为《天主实义》所作序：

昔吾夫子语修身也，先事亲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养事天之论，而义乃綦备。盖即知即事，事天事亲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说天莫辩乎《易》，《易》为文字祖，即言乾元，统天为君为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阳氏解之，以为帝者天之主宰。然则天主之义，不自利先生创矣。世俗谓天幽远不暇论，竺乾氏者出，不事其亲，亦已甚矣，而敢于幻天藐帝，以自为尊。儒其服者习闻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说，而亦浸淫入之，然而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谭天之所以为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师说，演为《天主实义》十篇，用以训善坊恶。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为大父母也；人知国家有正统，而不目天主之统天之大正统也。不事亲，不可为子；不识正统，不可为臣；不事天主，不可为人。而尤勤恳于善恶之辩，祥殃之应，具论万善未备，不谓纯善；纤恶累性，亦谓济恶；为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恶若坠，坠地冥狱。大约使人悔过徙义，遏欲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监，绵昭畏而遄澡雪，以庶几无获戾于皇天大主。彼其梯航琛贄，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小心昭事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独是天堂地狱，拘者未信；要于福善祸淫，儒者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实理，舍善逐恶，比于厌康庄而陟崇山、浮涨海，亦何以异。苟非赴君父之急、关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鳄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拔身试之，是不亦冥顽弗灵甚哉。临女无二，原自心性实学，不必疑及祸福。若以惩愚傲

情，则命讨遏扬，合存是义，训俗立教，固是若心。尝读其书，往往不类近儒，而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顾粹然不诡于正，至其检身事心，严翼匪懈，则世所谓皋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厉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固不当与诸子百家同类而视矣。余友汪孟朴氏重刻于杭，而余为僭弁数语，非敢炫域外之书，以为闻所未闻，诚谓共戴皇皇，而钦崇要义，或亦有习闻而未之用力者，于是省焉，而存心养性之学，当不无裨益云尔。

万历疆圉叶洽之岁月躔在心浙西后学李之藻谨序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42～147页〕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

徐光启再往北京应进上试，路过南京，往访罗如望，十五天中，天天往教堂作弥撒，听罗如望讲解宗教生活实践法。进京以后，徐光启中了进士，官任翰林院庶吉士。在京期间，徐光启“每布衣徒步，晤于(利氏)邸舍，讲究精密，承问冲虚”，并在利玛窦手中初领圣体。○10月17日，冯应京出狱。利玛窦记叙说：“当他出狱时，在这里住了两三天，朝廷官员都去看他，我们神父和他谈话很短，没有能够给他授洗。但大家早以为他是天主教教友了。”冯应京出狱后，徐光启亦亲往慰问。冯仍关怀国事，向光启“索江南农师以治江北之田”，徐光启叹为“仁人之言”。冯应京出狱时，将利玛窦在南京时所撰宗教格言书《二十五言》，酌加润色并付刻。12月21日，徐光启为此书作跋。○是年，澳门的耶稣会圣保禄学院院长加尔伏瓦(Valentino Carvalho)与范礼安赴澳门之西北青州岛，擅自建立礼拜堂。中国人误以为炮台，当地流言四播，谓澳门葡人有袭取青州之意。○11月，鄂本笃自叶尔羌东行，经二十多天旅行，抵达阿克苏，后又再行抵达焉耆。这时，一队去北京的伊斯兰教商人回到焉耆，因他们冒充使臣朝贡去中国的，故在“礼宾馆”中见到过利玛窦，他们将此情况告诉了

鄂本笃,此时他对震旦即是中国已经深信不疑了。○李玛诺与倪雅谷(Fr. Jacques Nēva)同赴北京,与利玛窦在京共事两个月,又偕郭居静南下巡察。○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出版并被译成日文。○灵采研究院创办人之一荷籍爱克(Joannes Eck)漫游欧洲,招募学者。日耳曼人邓玉函(Joannes Terrenz, 原名 Schreck)首先加入。邓玉函精谙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及德、法、英诸国文字,通晓天文、数学、历法、生物及矿学。1611年4月,著名科学家伽利略被推为该院第六名院士,邓玉函则为第七名院士。是年11月,邓玉函又入耶稣会为修士。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

6月,河南开封孝廉艾田前来北京会见利玛窦,告诉利氏开封有十至十二家犹太人,并建有“礼拜寺”,寺内藏有犹太教的《摩西五经》,书写在羊皮纸上,有五六百年的历史。由于犹太人不吃猪肉,故当地人分不清他们与伊斯兰教有何区别。艾田自称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并知道以扫、雅各是其祖先。艾田称,他来北京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也为了“认宗”(他不知道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区别),故贸然来访。8月27日,利玛窦在宣武门内购得一所房子作为耶稣会士的居所,并辟其中一部为教堂。○李玛诺与邱永修修士同赴南昌次年即有教徒二百人。○北京奉教者已有二百多名。○李之藻开始编《浑盖通宪图说》,其序曰:“昔从京师识利先生,示我平仪,其制约浑,为之刻画重圆,上天下地,周罗星曜,……得未曾有,耳受手书,故亦镜其大凡。”○徐光启于本年撰《山海輿地图经解》,其中“外夷”部分著录有利玛窦《山海輿地全图》,并附有徐光启所撰之解说。冯应京为此图作序。○年底,鄂本笃一行经吐鲁番、哈密入嘉峪关,抵肃州(酒泉)。

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

徐光启迎父亲怀西公到北京,其父时年七十三岁。在徐光启的劝讲之下,其父抛弃星相占候杂说,受洗为教徒。光启夫人吴

氏、儿子徐骥也一同入教。是年秋，徐光启与利玛窦谈及格物及几何学事，决定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此书原名 *Elements of Euclid*，内容除欧几里德著作外，另有利玛窦业师、数学家丁先生之集解、续补和新论。徐光启说：“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此一家已失传，为其学者皆暗中摸索耳。既遇此事，又遇子不骄不吝，欲相指授，岂可畏劳玩日，当吾世而失之。呜呼！吾避难，难自长大；吾迎难，难自消微，必成之。”遂于每日下午三四时诣利氏寓所，由利玛窦口传，徐光启笔录，“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意”。○是年，冯应京卒。据利玛窦记叙：“我们南京方面的神父正预备到他家乡，给他讲完教理然后授洗，不幸他忽然去世了。希望天主看他为我们做的好事，又看他为宣传圣教信仰所有的热诚，和他愿信教的希望，当他就算是领了洗，使他的灵魂得享永生。”○李之藻以工部分司之职，在山东治河。利氏在《天主实义》中称其为“李水部”。○驻澳门中国官吏某率民众焚毁青州岛上葡人居室及礼拜堂，澳门葡人大怒，谋复仇。香山知县出面抚慰，许澳门耶稣会士有居青州岛之权，同时建立石碑，标明此岛为中国领土。不久澳门又有流言，谓耶稣会士郭居静有谋取中国帝位的野心，两广总督准调兵征讨，但经调查此实为不经之谣言。○黄明沙在广州被诬下狱并受刑，于3月31日卒。○耶稣会远东教务巡视专员范礼安逝世于澳门。○利玛窦在北京得鄂本笃一信，于12月11日派钟鸣礼火速动身去肃州。○全国天主教信徒达一千多名。

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

春，徐光启、利玛窦合译之《几何原本》前六卷告成。5月间，该书付印。5月23日，徐光启父亲怀西公卒于京邸，徐光启立即上疏扶柩归葬。○浙江处州知府、李之藻之友郑怀魁刻印李氏所著之《浑盖通宪图说》。同年，李之藻之友汪孟朴在杭州重刻《天主实义》。○3月底，钟鸣礼抵肃州，见到了鄂本笃，此时鄂本笃已得不治之症，当钟鸣礼用葡语向他致敬时，他将利玛窦的信举向天空，“眼中含泪，洋溢着快乐”，钟鸣礼用心调养，但终因缺

医少药,于钟氏抵达后十一天(4月11日)逝世。钟鸣礼将他埋葬在当地,墓碑上写着:“他找到了震旦,找到了天堂。”鄂氏卒后其遗物被人攫夺,日记亦被人撕破,钟鸣礼只收得若干残叶,10月27日携返北京,送呈利玛窦。利、钟二人据此残叶,请鄂氏仆人依撒格回忆旅行情况,整理出鄂本笃的旅行报告,收入到后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去。

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

3月8日,利玛窦上书耶稣会总会长阿瓜委瓦(Claudio Acquaviva),报告中国教务情形曰:如今在中国有教堂四处,本会会士二十人,其中十三人为神父,其余为修士。虽然去年苏如望神

九间楼徐光启故居



父和黄明沙修士已去世,今年却新收了四名修士。去年,调熊三拔神父来北京,帮助此间教务。澳门会院对中国传教区事务无权过问。全国四处教堂已付洗二千人,教会在各处的声望,日益增高,特别在北京和南京。春,利玛窦将已刻成的《几何原本》加以校订,以校正本寄上海徐光启,建议“今南方有好事者重刻之”。○是年,利玛窦所著之另一部《畸人十篇》付印,其书系问答体,以儒家学说衍述天主教教理。其中第三、四两篇为利、徐二人问答。此外所记问答语者还有李载、冯琦、曹于汴、李之藻、吴达可、龚大参(三益)等。李之藻、周炳谟、王家植为之撰序。○9月间,郭居静来上海开教,客居徐光启乔家浜九间楼家中。徐光启邀集合族亲戚同沪上缙绅,与郭居静见面,听他谈道。徐光启还将自己在南门外的别墅“双园”作为郭氏住所,辟建一小堂。两个月内,已有五十人领洗。是年圣诞节,徐光启赴南京吊丧,连夜赶步进城,参加子时弥撒。○11月,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笔译的《圜容较义》在北京刊刻。书成之后,李之藻被调任赴澧州(又名开州,河北濮阳县),在澧州时,李氏“谋开沟洫,贻民永利”,又重修州城,以西法治案牍,《开州志》曰:“尤精历律,吏会计钱谷多隐匿,之藻视案牍,以西洋算法正之,众骇服。”○是年,南昌耶稣会初学院招录四名初学生:钟鸣礼、丘良厚、石宏基、倪一诚。○利玛窦派一中国修士(Leitao)去开封调查,证实艾田所说的一切,并带回《摩西五经》头尾几节抄本,所用希伯来文没有母音(Vowel)符号,证明它是古本。利玛窦准备再派修士去开封,调查事情的原委。

上文已提及的数位中国籍神职人员生平简要如下:

游文辉,字合朴,西名 Fr. Emmanuel Pereira. 1575年生,1605年入耶稣会,生于澳门,1598年已与利玛窦等共事,他是一名画家,现存罗马 Residenza da Gesu 的利玛窦遗像,即出之其手。他还与徐必登、丘良稟、倪雅谷等参与李应试刻《两仪玄览图》的工作。

徐必登,西名 Fr. Antoine Leitão, 1580年生于澳门,1605年在北京入会。年十五岁即入内地,担任教理讲解员,常随庞

迪我等在京郊各地传教。在从韶州去澳门的船上得病去世（1611年6月10日）。

邱良厚，字永修，西名 Fr. Pascal Mendez。1584年生于澳门。1610年入会，父母为老教徒，曾担任教理讲解员有十年之久，从罗如望在南昌、建昌、南雄传教。1621年与毕方济抵北京，协助龙华民传教，并与官员叶向高等交往，1640年7月逝世于北京。

钟鸣仁、钟鸣礼，他们是两兄弟，钟鸣仁与利玛窦相交很久，1600年随利玛窦进京，住了七八年，又至南昌传教，后又至浙江。钟鸣礼1582年生于广东新会，与兄鸣仁一同在澳门奉教，1604年在南京与王丰肃共事，南京教案时被捕入狱，后获释。

黄明沙，名方祭，教名方济各，有葡萄牙血统，1568年生于澳门，有葡名 Martines，1606年广州被捕受刑，同年3月去世，倪一诚，又名倪雅谷，西名 Fr. Jacques Nēva，他是生于日本的华侨，在日本修院中以善于绘画著名，1610年被范礼安派来中国，后曾留居北京，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18~146页〕

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

12月24日圣诞夜，上海的第一个教堂开堂。入夜，徐光启和所有新老教友会聚新堂，郭居静当众诵念晨课，做了三台弥撒。徐光启朝服朝帽，亲自辅祭。是时上海已有教友二百人。○9月8日，利玛窦在北京创立“天主圣母会”，会友均为热心教友，每月首主日，在会长处集会。集会时，一位神父讲道，解答各种教义问题，会友每月捐款少许，为贫穷教徒安葬之需，每逢瞻礼日，又向教堂献烛献香。会友的义务，首在恭敬圣母，次则协助教友，依照天主教礼规举办丧事。这是中国天主教会第一个善会组织。○9月27日，利玛窦致罗马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去年年底，我不知怎样想到我是第一批进入这国家的人中之一，目前已经没有另一个人知道开始时的情形了。因此若把这事原原

本本地写出来，一定是件好事。况且我知道已经有人写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可是写的与事实不符合。因此，我便开始写一种报告书。”利玛窦从这年秋天动笔写《天主教传入中国史》。○徐光启作《勾股义》，弁以自序。○是年，伽利略至威尼斯，闻荷兰人造器能测远，因仿其意创新天文望远镜，并不断有所改进。在观测天象中有一系列发现，如太阳黑子、月球表面凹凸不平、木星有四卫星、行星绕太阳运行等，从而证实并发展哥白尼之学说。○龙华民抵北京。

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

2月，利玛窦写完《天主教传入中国史》(*Storia dell' introduzione del Cristianesimo in China*)。此书分为五卷：(一)绪论，泛论中国历史、地理、风俗、学术；(二)肇庆开教和建堂史；(三)韶州开教和建堂史；(四)入京进贡史；(五)定居北京后的传教史。全书原文为意大利文。1614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携带了利玛窦的手稿至罗马，在船上及抵欧洲以后作了修订和补充，添加了利玛窦逝世及殡葬情形，并将意文译成拉丁文，以《基督教远征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的书名，于1615年2月15日在欧洲出版。当时作者署名为金尼阁，利玛窦的手稿反而湮没无闻。直到三个世纪后的1909年，耶稣会历史学家达基芬屠立(Tacchi Venturi)才发现了利玛窦的手稿，于1911年出版问世。1942年及1949年，德礼贤神父(Pasquale D'Elia)重刊，添加了详细的注释。○3月，李之藻在京得了重病，自忖必死，家中亲人又不在京师，利玛窦日夜在床前侍候。李氏感利氏的爱德，许下离弃爱妾，领洗入教，取圣名良。领洗后，病亦痊愈，献银四十两以建造教堂。本年李氏四十六岁。○是年为京中会试及各省官吏入朝觐见的年份。外省的文士和官吏抵京都去拜访利玛窦，利氏劳瘁不堪。在严斋期，经常中止吃饭接客。5月3日，利玛窦卧床不起。李之藻等请御医来诊断，病势仍旧。5月8日，利玛窦向熊三拔神父行总告解。9日，利氏领受临终圣体。10日下午4时，他从昏迷中清醒

过来,领终傅礼。他对众神父说:“我去之后,给你们留下的是一扇敞开的大门,你们要立许多功劳,当然你们的困难和危险也不少。”11日下午6时许逝世。中国修士游文辉绘利玛窦遗容。李之藻献柏木棺材一具,二日后大殓,棺置于新堂中,举行追悼弥撒,吊毕,移棺于祭坛一侧。因利玛窦遗命不愿归葬澳门,愿葬于北京。熊三拔、李之藻、庞迪我等商议葬地。李引外人归顺,有钦赐葬地的前例,庞迪我即上疏奏请赐予葬地:“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异域孤臣,情实可怜。道途险恶,海人多忌讳,必不能将柩返国。……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礼,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悃之心,都城士共知,非敢饰说。……臣等外国微臣,岂敢希冀分外,所悲臣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以生死相依。”皇帝于6月29日御批“是”。正在此时,李之藻忽遭父丧,回籍守制,出京以前,遍托各部友好,请予庞迪我一臂之助。时学士叶向高、曹于汴及顺天府尹黄吉士等均表关怀。黄吉士命宛平及大兴两县知县与庞、熊二人选择茔地,一连看了五所寺院,最后勘定北京附近之栅栏佛寺。10月19日,顺天府尹批准栅栏佛寺为钦赐葬地。此寺原名“膝公栅栏”,位于阜城门外半里的二里沟,原为杨太监自建的佛寺,后因罪伏法,佛寺籍没人官。20日,熊、庞二司铎入寺,动工将佛寺改为天神之后教堂。○徐光启服阙后回京,妻吴氏同行。12月,回任翰林院检讨原职。○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神父、葡籍耶稣会士阳玛诺神父(Emmanuel Diaz, Junior)相继来华。○龙华民接替利玛窦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会长。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对儒家文化的有关论述:

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就个人来说,中国人并不选择这一教派,他们勿宁是说在研究学问时吸收它的教义。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相信任何别的教派的。孔子是他们的先师,据他们说发现了哲学这门学问的乃是孔子。他们不相信偶

像崇拜。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偶像。然而,他们却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他们也承认别的鬼神,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所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真正的儒家并不教导人们世界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以及由谁所创造的。我们用了“真正的”或者“真”这个词,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不那么著名的人会解释梦,但他们大部分既然是谈一些细琐的和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所以人们并不很相信他们。他们的信条包括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学说,但他们似乎只把报应局限于现世,而且只适用于干坏事的人并按他们的功过及于其子孙。古代人似乎不大怀疑灵魂不朽,因为人死之后的很长时间,他们还常常谈到死去的人,说他上了天。但是,他们根本不谈论恶人在地狱受惩罚的事。较晚近的儒家则教导说,人的肉体一死,灵魂也就不复存在,或者只再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因此,他们不提天堂或地狱。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颇为严厉的教义,因而这一学派教导说只有正直的人的灵魂才继续存在。他们说一个人的灵魂由于德行而加强并能巩固而持久,但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灵魂刚一离开身体就像一股轻烟那样消散了。

儒教目前最普遍信奉的学说,据我看似乎是来自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开始流传的那种崇拜偶像的教派。这种教义肯定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好像是有一个连续体(*corpus continuum*)的,与天地、人兽、树木以及四元素共存,而每桩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他们根据物质的这种统一性而推论各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团结相爱,而且人还可以变得和上帝一样,因为他被创造是和上帝合一的。我们试图驳斥这种哲学,不仅仅是根据道理,而且也根据他们自己古代哲学家的论证,而他们现在的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

虽然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他们却并不建造崇奉他的圣殿。没有专门用来崇拜这位神的地方,因此也没有僧侣或祭司来主持祭祀。我们没有发现大家

都必须遵守的任何特殊礼仪,或必须遵循的戒律,或任何最高的权威来解释或颁布教规以及惩罚破坏有关至高存在者的教规的人。也没有任何念或唱的公众或私人的祷词或颂歌用来崇拜这位最高的神祇。祭祀这位最高神和奉献牺牲是皇帝陛下的专职。情形确实是如此,以致如果有人僭越这一权利而自己献祭的话,他就被当做侵犯皇帝的职责并作为公敌而要受到严惩。

在北京和南京两座京城,各有两座皇帝专用的宏伟的庙宇。这两座庙宇是皇帝专门用来祭祀最高神祇的。一座庙用来祭天,另一座则用来祭地。以前的惯例是只有御驾亲临这两座庙里献祭,但现在则由最高的大臣进行宗教仪式,用大批牛羊向天神地祇献祭。同样地,也只有国中的高级大臣和最高官吏才能向山川和宇宙四方的神灵献祭。这类宗教仪式严禁庶民参加。这种法律的诫命是写在四书和五经里面的。除了这些书籍而外,便没有别的法典,还有便是一些对这几部书的解释。

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过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认为这种仪式是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正如在祖先生前要受崇敬一样。他们并不真正相信死者确实需要摆在他们墓前的供品;但是他们说他们之所以遵守这个摆供的习俗,是因为这似乎是对他们已故的亲人表示自己的深情的最好的办法。的确,很多人都断言这种礼仪的最初创立与其说是为了死者,倒不如说是为了生者的好处。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孩子们以及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看到受过教育的名流对于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崇敬,就能学会也尊敬和供养自己在世的父母。这种在死者墓前上供的作法似乎不能指责为渎神,而且也许并不带有迷信的色彩,因为他们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当做神,也并不向祖先乞求什么或希望得到什么。然而,对于已经接受基督教的教导的人,如果以救贫济苦和追求灵魂的得救来代替这种习俗,那就似乎更要好得多。

孔庙实际是儒教上层文人惟一的庙宇。法律规定在每座

城市并且是该城中被认为是文化中心的地点都建造一座中国哲学家之王的庙宇。这种庙修得十分华美，与它相邻的就是专管已获得初等学位者的大臣的学宫。庙中最突出的地位供着孔子的塑像，如果不是塑像，则供奉一块用巨大的金字书写着孔子名讳的牌位。在旁边还供奉孔子某些弟子的塑像，中国人也把他们奉为圣人，只是要低一等。

每个新月和满月到来时，大臣们以及学士一级的人们都到孔庙聚会，向他们的先师致敬。这种情况中的礼节包括焚香烧烛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规定的其他日期，都向孔子供献精美的肴馔，表明他们对他著作中所包含的学说的感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正是靠着这些学说，他们才得到了学位，而国家也才得到了被授与大臣官职的人们的优异的公共行政权威。他们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敬祖先一样。

这一教派还建有别的庙宇供奉当地行政区所属各城的有称号的神。官员们在庙中庄严宣誓要行事正当而合法律，并且恪尽职守。每个官员一接任，或者如他们所说一被委以官印，就要先办这件事。对这些城市之神也要烧香献祭，但与对孔子和对自已祖先上供的目的不同。区别在于他们对这些神只承认有一位神祇具有惩恶奖善的权力。

儒家这一教派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他们也期待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他们所阐述的箴言确实都是指导人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他们利用五对不同的组合来构成人与人的全部关系，即父子、夫妇、主仆、兄弟以及朋友五种关系，按照他们的信念，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尊重这些关系，而外国人则被认为是全然无知，或者即使知道也全不注意。他们不赞成独身而允许多妻制。他们的著作详尽地解说了仁爱的第二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十分重视子女尊敬和顺从父母，奴仆对主人忠诚，青年人效忠长辈。这一点确实是引人注目的。

因为他们既不禁止也不规定人们对于来世应该信仰什么，所以属于这一社会等级的很多人都把另两种教派和他们自己的教派合而为一。他们确实相信，如果他们容忍谬误并且不公开摒弃或非难虚伪的话，他们所信奉的就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宗教了。儒家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教派，他们宣称他们这个阶层或社会集团倒更是一个学术团体，为了恰当地治理国家和国家的普遍利益而组织起来的。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00~105页〕

京北尹王应麟所撰利玛窦墓碑记全文如下：

粤稽古用宾，在九州广万余里者，斯为辽绝仅已。我国家文明盛世，怀柔博洽。迄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泰西，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始经肇庆，大司宪刘公旌之，托居韶阳郡。时余奉刺凌江，窃与有闻。随同傅伴，赍表驰燕，跋庾岭，驻豫章。建安王挹遵，若追笃欢交谊之雅；宗伯王公洪海，竟倾盖投契合之孚。相与溯游长江，览景建业。箴尹祝公世禄，司徒张公孟男，淹款朋侪，相抒情素。西秦同庞子迪我号顺阳者，仅数友辈，乃越黄河，抵临清，督税宦官马堂，持其贡表，恭献阙廷。皇上启阅天主圣像，珍藏内帑，自鸣钟，万国舆图，琴器类，分布有司。欣念远来，召见便殿，宠颁一职，辞爵折风。僕设三辰，叨燕陛阙。欲亲貌颜，更工绘图。上命礼部宾之，遂享太官廩饩。是时大宗伯冯公琦，讨其所学，则学事天主，但吾人褻躬缮性，据义精确，因是数数疏义，排击空幻之流，欲彰其教。嗣后李冢宰，曹都谏，徐太史，李都水，龚大参，诸公问答，勒板成书。至于郑官尹，彭都谏，周太史，王中秘，熊给谏，杨学院，彭柱史，冯金宪，崔铨部，陈中宪，刘茂宰，同文甚都，见于叙次。衿绅翰墨之新，槐位贲行馆之重，班班可镜已。历受馆饩十载，适庚戌春，利氏卒。迪我偕兼具奏请恤。诏议，礼部少宗伯吴道南公，署部事，言其慕义远来，勤学明理，著述有称。且迪我等愿以生死相依，宜加优恤，伏乞勒下顺天府，查给地亩，收葬安插，昭我圣朝柔远之仁。奉圣旨“是”。宗伯乃移文少京兆黄吉士，行宛平县，有籍没杨内宦私创二里沟

佛寺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牒大司徒，禀成命而畀之居。复奏，蒙允。全取江右岳牧，转任广阳师表，实有承流宣化之责，欣闻是举，因此戢节抵寓。顺阳子与其友人龙精华，熊有纲，阳演西辈，晋接久，习其词色，洵彬彬大雅君子。殚其底蕴，以事天地之主，以仁爱信望天主为宗，以广爱诲人为功用，以悔罪归诚为入门，以生死大事有备无患为究竟。视其立身谦逊，履道高明，杜物欲，薄名誉，澹世味，勤德业，与贤智共知，挈愚不肖共由。玄精象纬，学究天人，乐工音律，法尽方圆。正历元以副农时，施水器以资民用。翼我中华，岂云小补。于是赞成皇上，盛治薰风，翔洽遘际，真夔绝千古者矣。斯时也，余承命辖东南，宁无去思之慨！附居郊处，虑有薪水之忧，赫赫王命之为何？余与有责焉，用识颠末于贞珉，纪我皇上柔远休征，昭示万祀，嘉惠远人之至意，为之记。以辛亥月日葬。钦赐房地共三十八间，周围墙垣二十亩。南至官道，北至嘉兴观地，东至嘉兴观，西至会中坟。

〔徐宗泽：《增订徐文定公文集》卷首下，第15~16页；罗光：《利玛窦传》，第231~235页〕

金尼阁，字四表。1577年3月3日生于比利时 Douai 城。就读于当地耶稣会的公学。1594年获艺术硕士学位，11月9日，入耶稣会法比省区的图尔内（Tournai）初学院。后往里尔学修辞学和哲学，还有为传教准备而学的地理、天文、数学、医学等。1607年从里斯本东渡印度，10月9日抵果阿，在城市和附近乡下传教，1610年抵澳门。

利玛窦遗著甚多，主要有：(1)《天主实义》二卷，初名《天学实义》，1595年初刻于南昌，1601年重刻于北京，重刻本有李之藻序，1603年再刻于北京。1630年后屡有刻本，曾收入《天学初函》。若干刻本前有徐光启、冯应京序。近代徐家汇土山湾曾重印多次。(2)《交友论》，1595年刻于南昌，1603年重刻于北京，前有冯应京的序。(3)《西国记法》一卷，1595年刻于南昌。(4)《二十五言》，1604年刻于北京。有冯应京、徐光启序。(5)《畸人十篇》二卷，1608年刻于北京，1609年刻于南京



北京车公庄明清传教士
墓地中的利玛窦墓

及南昌,近代有土山湾重刻本。(6)《辨学遗牍》,1609年刻于北京,有徐光启跋。(7)《西琴八曲》,在《畸人十篇》附有一卷。(8)《斋旨》一卷,后附《司铎化人九要》,年代不详。(9)《畸人十规》,即《天主十诫》,1584年刻于肇庆。(10)《几何原本》六卷,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1605年(一说1607年)刻于北京。1611年,徐光启与庞迪我、熊三拔“重阅一过,有所增定”,出版了再校本。(11)《同文指算》十一卷,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述。为应用算术,1614年刻于北京。(12)《测量法义》一卷,为应用几何。徐光启笔述,道光时刊行。(13)《勾股义》一卷,徐光启笔述。(14)《圆容较义》一卷,1614年刻于北京,李之藻笔述。(15)《浑盖通宪图说》二卷,1614年刻于北京,李之藻笔述。该书收录十八道几何计算题求面积和体积。(16)《经天核》一卷,李之藻笔述,为星经类著作,1601年(?)刻于北

京。(17)《山海輿地全图》(《万国輿图》),1584年在肇庆“仙花寺”首次展出。以后多次重刻。(18)《西字奇迹》一卷,1605年刻于北京。此书中利氏首创以罗马字注汉字方法,后世称罗马字注音法。即用拉丁字母,按语音学规则,拼出汉字读音来。每个汉字旁,均标有罗马字注音,并标有利氏特创的五个声调符号,即-ˆ、˘、˙、˚,代表明代官话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以及一个送气符号‘。(19)《乾坤体义》二卷,一作三卷,《四库全书》著录。(20)1593年,利玛窦将中国儒家伦理经典《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拉丁文,略加注释。名*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nibus*,今佚。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

4月22日,熊三拔、庞迪我等人将栅栏寺改建成天神之后教堂。将原先供地藏王的正殿改为正堂,堂中祭坛供天主像。原供奉阎王的两便殿改为客厅,庭院中的小佛殿改为憩息室,另新设一小圣母堂。花园外有墓园,古柏中央即为利玛窦的墓。改建墓地的工程,在夏天完成。11月1日为诸圣节,北京天主教会举行安葬利玛窦的典礼。当天,先行诸圣节大弥撒礼,北京全体教友到堂。大弥撒礼以后,继之以追思弥撒,追思礼毕,熊三拔司铎登台致哀词,述说利玛窦一生行迹。安葬时,徐光启与众信友持烛前行,信友四人舁棺出堂,抵墓穴,下棺入圹。徐光启亲自举铲抛土“哀之如师傅”。○4月间,李之藻因父丧回籍守制,伺机约请在南京的郭居静、金尼阁和钟鸣仁到杭州开教,5月8日,在杭州城内李之藻寓邸举行第一台开教弥撒。是时,杨廷筠前往李之藻府中致吊,见李之藻毁泥木佛像等,且不请僧道超度,颇为诧异。因李之藻之劝,杨廷筠屏妾异处,弃佛而入天主教。是年杨廷筠五十五岁。授洗者为郭居静神父,领洗圣名曰弥格尔,故号弥格子。6月,因杨府比李府离城较近,郭、金二神父迁入杨府居住。同年,杨廷筠又建教堂一座,“蠲洁供具,堂中帷幕,乃以御赐厨缣为之,曩者菩萨之堂,泥金之相,沉檀珠宝之奉,俱以瓦砾置之矣”。其父杨兆坊,不久亦信教。○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

(Julio Aleni) 与法籍耶稣会士史百度 (Pierre Van Spiere) 抵澳门, 从毕方济 (Francesco Sambiasi) 学习中文和儒家典籍。○徐光启、熊三拔著《简平仪说》。徐光启又撰《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夜晷图说》。

艾儒略, 字思及, 1582 年生于意大利 Brescia 城。十六岁入威尼斯圣安东尼学院学习神学, 读完哲学以后, 执教文学二年。1600 年入耶稣会, 后就读于帕多瓦大学。1607 年入罗马神学院攻读神学, 1609 年晋铎前与其他十余位神父获准去远东传教。1610 年抵澳门以后, 谋入内地。1641~1648 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副会长。

1612 年(万历四十年)

韶州的教堂和会院因当地民众的为难而变卖关闭。○巴范济神父被命为巡视中日两国传教事业, 未及到任, 卒于澳门。○徐光启与熊三拔同译《泰西水法》, 曹于汴作序记其书曰: “太史玄扈徐公軫念民隐, 于凡农事之可兴, 靡不采罗。阅泰西水器及水库之法, 精巧奇绝, 译为书而传之, 规制具陈, 分秒有度, 江河之水、井泉之水、雨雪之水, 无不可资为用, 用力约而收效广。盖肇议于利君西太, 其同侪共终厥志, 而器成于熊君有纲, 中华之有此法自今始。”是年, 徐光启将所译及再经校刻之《几何原本》续加校订, “仍多点窜”, “不频其烦”, 成为“三校本”。○孙元化在北京中举。○金尼阁至南京从郭居静、王丰肃神父习华语。

孙元化字初阳, 号火东, 江苏宝山高桥人。因宝山为嘉定县地面, 故亦称嘉定人。1581 年生。他是徐光启的门生, 从徐光启学习火器和算数, 著有《几何体论》一卷及《几何用法》等书。1621 年受洗于北京, 教名依纳爵。《明史》亦称其“善西洋炮法, 盖得自徐光启云”。又作《西法神机》, 为中国士人所著最早的关于西洋火炮的书籍。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 第 234~237 页]

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

李之藻改任南京太仆寺少卿,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但此疏敦请朝廷全面输入西学,不限于历法。疏曰:“伏见大西洋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诸人,慕义远来,读书谈道,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在京绅士,多与讲论。……其中非特历书,又有水法之书,……又有算法之书,……又有测望之书,……有仪象之书,……有日晷之书,……有万国图志之书,……有乐器之书,……有《几何原本》之书,……如蒙俯从未议,敕下礼部,亟开馆局,……但系有益世用者,渐次广译,其于鼓吹休明,观文成化,不无裨补。”同年,李之藻译成《同文算指前编》,并为之序,此为介绍西洋笔算最古译本,自加减乘除以至开方等,亦配有练习题。然序末云:“至于缘数寻理,载在《几何》;本本元元,具存《实义》诸书。如第为艺数云尔,则非利公九万里来苦心也。”可见李氏深知西士之原意在传教。○金尼阁神父奉派从澳门登州回罗马,向教宗及耶稣会总会长报告,希望在中国内地设一主教。○艾儒略(P. Jules Aleni)与史惟贞、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so)、曾德昭(A. de Smedo)一同进入中国内地,经南昌、杭州抵南京,以及又奉命前往开封调查中国境内的犹太人。艾儒略在开封当地看到过犹太人的“礼拜寺”,但年老的“掌教”已经去世,引领不肯以经龕中希伯来文经卷相示。○熊三拔著《简平仪说》。

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

金尼阁回到欧洲,并抵罗马。○李之藻《同文算指通编》刻成。徐光启撰《刻〈同文算指〉序》,杨廷筠亦为之序,云:“数年来乃得西国数学种种成书,皆生平未见,一大奇也。往予晤西泰利公,……公叹曰:‘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徐太史为译《几何》,李水部为推《算指》,而余乃获因利公未泯之绪以寻古数学于不坠。”○熊三拔著成《表度说》,有李之藻、熊明遇及周子愚序,后《天学初函》、《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均收录此书。○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著《七

克》一书，此书推论人性下伤私欲七罪（傲、妒、贪、忿、饕、淫、怠），复推论人性上伤彝良七德（以谦伏傲、以仁平妒、以施解贫、以忍息忿、以淡塞饕、以贞防淫、以勤策怠），既痛言七罪之丑恶，复盛陈七德之美好，以七德克七罪，故曰《七克》。是书刻于北京，有自序和杨廷筠、郑以伟、曹于汴，陈亮采等人为序，熊明遇作引，卷七末有汪汝淳跋，每卷前又有崔涓序。近代著名天主教会人上英敛之对此书评价极高：“当时的士大夫赞为语语刺骨、字字透心，其痛切亦可以想见了。惟因其文字简古，大类周秦子书，学问浅的人，不能十分了了，后人有将此书演为白话的，其间略加增减，与原书大同小异，名之曰《七克真训》。人果能平心静气一读，真是惊心动魄，神味无穷。”

杨廷筠为《七克》所作序文

自子思子发明性道，原本天命，后世言道术者准焉。至谓天下之至圣，德施洋溢，及乎照坠，命曰配天，殆未易揆测也。今上在宥天下，远人来宾，乃有泰西诸君子航海而来，计其途八万余里，阅三年抵中国，有古越裳、肃慎、奇肱、身毒所未经涉者，此亦尽乎照坠矣。夫麟游凤至，皆称圣瑞，贵来远也。物之瑞孰与人为瑞乎？洋洋乎圣德配天，非我皇畴当之。诸君子观光用宾，大都洁修自好，其为人不诡时向，其为学不袭浮说，间用华言，译其书教，皆先圣微旨也。察其燕私、屋漏、密修密证皆凿凿不背所闻，其言语文字更仆未易详，而大指不越两端：曰钦崇一天主万物之上，曰爱人如己。夫钦崇天主即吾儒昭事上帝也，爱人如己即吾儒民我同胞也，而又曰一、曰上，见主宰之权，至尊无对，一切非鬼而祭皆属不经，即夫子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其持论可谓至大至正而至实矣。夫课虚崇玄，洸洋无际，要眇何难，要以真实世谛，使人可信可解而不可易，此以难耳。则画师图鬼物、图狗马之说也。又以泛而言昭事，稽颡对越皆事也，必爱人乃为昭事之真；泛而言爱人，怵惕煦妯皆爱也，必克己乃有爱人之实。故有所谓食饥者、饮渴者、衣裸者、舍旅者、医病者，及顾圉圉者、赎虏者、葬死者，皆爱人事。而又有所谓伏傲、熄忿、解贪、防淫、远妒、清饮食、迷

醒懈惰，于为善之七克，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种，凡所施爱，纯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步步鞭策，着着近里，此之为学，又与吾儒暗然为己之旨脉脉同符。学者循此缮修，存顺殁宁，来去翛然，既不徒生，亦何畏死也。惟是七克所载，大率远于俗情，如富贵荣宠为缀疣，贫穷苦楚为福泽，骤阅之觉可骇可异，而徐玩之，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跃然神解而卷不释手者。此书在慧悟之士，机警触发，见之自有神契。其次则困衡之辈，推勘路穷，如贫见家珍，渴得甘露，更有津津证入处。惟一种世味浓郁，嗜进无已之人，灵府多滓，难与微言，视此不免嚼蜡；或以此方文字见解测之，更泥不通，则不终卷而卧，此非书之罪也。庞公号顺阳，予未与一面，闻其居长安，大官授餐，为圣天子所礼遇，名流多与之游诸，题语言人人殊，率企向不啻口出，其人可知矣。

郑圃居士杨廷筠书于明旦斋中

庞迪我为《七克》所作自序

人生百务不离消积两端，凡所为修者，消旧积新之谓也。圣贤规训万端，总为消恶积德之藉。凡恶乘乎欲，然欲本非恶，乃天主赐人存护此身，辅佐灵神，公义公理之密伴，人惟汨之以私，乃始罪，愆万状诸恶根焉。此根僭伏于心土，而欲富、欲贵、欲逸乐三巨干勃发于外，干又生枝，欲富生贪，欲贵生傲，欲逸生饕、生淫、生怠，其或以富贵逸乐胜我即生妒，夺我即生忿。是故私欲一根也，欲富、欲贵、欲逸乐干也，而生傲、生贪饕、生淫、生怠及妒忿枝也。种种罪说，非义之念虑言动，七枝之结为实、披为叶也。地狱之火，此树薪之，故曰去私欲，而狱火自无矣。世间疾忧患乱，身心不宁，皆由食此树之实，而作者拔此树于世，而人皆天神也。视人如己，视死如归，天堂境界岂远乎哉？然而克欲修德，终日论之，毕世务之，而傲、妒、忿、淫诸欲卒不见消，谦、仁、贞、忍诸德卒不见积，其故云何？有三蔽焉：一曰不念本原，二曰不清志向，三曰不循节次。夫世之傲然自是者，咸谓修德克欲之力量，我自能之。不知自有生来但有一念提醒，莫非天主上帝赐我者；富贵寿安微暂之福，有一隙

之明者，皆知出于上帝，而克欲修德，最难剧务，忘自认为己能，谬孰甚欤！如知力量悉从上帝而出，其于钦事祈鹭，自不容已，迨德成欲克，皆认帝赐也。彼谓我自能之，不缘帝力，乃由傲魔所中，忘却本原，冥悻自是，闻谏则沾沾自喜，稍拂则谓非所应遇而怨尤不已，此其所修何德哉？凡人善恶系于所志，有善业而无善志，犹人形而无灵神，非人徒人形耳。轻舟利车，济人于难而人不赏其功，何者？舟车有功而无济人之志耳。修德克欲者，惟是蠲洁其一心，以媚兹上帝，其志足贵也。次则羨天德之美也，次则志在乎生享净心之乐，而身后获见天帝与神圣耦也。若修德而杂之以富贵荣名世福之望，则所修非德，乃修他欲而袭德貌耳，非以德攻欲，乃以欲攻欲耳。旧欲未去，新欲且增垫焉。夫德所至忌世福之羨也，祛欲者所攻，正攻此羨世福之欲肠，有所攻以积德，又操所忌以毁之，德乌乎成？故志向不可不清也。凡有志修德者，必曰吾必使无丝毫人欲之私。语甚美矣，第言之易也，行之难也，一言而尽，百年不能迄，攻一欲难于胜一国，矧攻诸欲乎？且德之初修也，甚微甚弱，而欲之初受攻也，方巨方强，以微弱之德攻巨强之欲，意徒锐而欲弥增，旋废业而反受其害。夫克私欲如拆旧屋也，先拆址者，室覆材破，人受压焉；先拆甍檐，渐至于柱础，则材与人不伤，而功易奏。是以克欲者，须一一别攻之，始于易小，俟德力滋巨矣，乃始渐进于难且大者，以渐滋致精，道路更稳，如过于亟，易于碍坠。故曰进德如升梯，谨行勿奔，奔必陨，不控于地不已矣。亟修而无度，非自恃而凌躐，即速倦而委顿耳，此不循节次之咎也。迪我八万里外，异国之旅，蚤荷天主灵慈，悟此世福至暂至微，匪坚匪驻，转思身后，实具永年禔福，爰从耶稣会教习，闻豪杰光闡之旨，正己化俗，悯夫邪说充塞，不知天主为人物真主，不思天堂有真修捷路，乃偕数友东来，九死一生，涉海三载而抵中华。中华语言文字迥不相通，苦心习学，复似童蒙，近稍晓其大略，得接讲论，窃见有志儒贤，多务修德克己之功，同方合志，万里非悬。第缘三者之蔽，隔藩未一，因绎所闻及管窥一二，以资印可。夫人心之病有七，而瘳心之药亦有

七，要其大旨，总不过消旧而积新，积之之极，以积永乐永庆，消之之极，以消永苦永殃焉。谆谆箴勸，良费辞说，盖缘人心如口也，口各喜其味，故饌各投其喜，德一而已，众言错陈，故析俎之不一齎也，惟嗜者之所染指。如曰支离其辞，以支离其德，则迪我乌乎敢焉！

万历甲寅孟冬望日庞迪我题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53～56页〕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

3月20日，教宗保禄五世应金尼阁的请求，由礼仪部颁谕，准许以中文举行弥撒圣祭，诵念日课，任用当地中国人土为神职，并准许翻译《圣经》、弥撒经典、司铎日课、圣事礼典。因中国古礼重视“衣冠必整”，因此大典礼中必须戴冠，而西方礼俗以除冠为示敬，故西方弥撒祭服中并无特制之冠，金尼阁的请求获得准许之后，中国天主教会乃特定一种“祭巾”，沿用至清末，民初以后才渐渐废除。同年，金尼阁在罗马将利玛窦之意文《天主教传人中国史》译为拉丁文，并加两章，以《基督教远征中国记》的书名和他本人的名义在欧洲出版。○是年春，王徵赴北京考进士，会见庞迪我。上年王徵在家中已读过庞氏所著《七克》，钦佩之至。王氏约在此时受洗入教，取圣名斐理伯。○李之藻迁高邮制史，“会黄淮交涨，淮城危在旦夕，之藻起泾河、黄浦二闸以泄之，于高邮城外，开回坝塞海子之东浅，俾绕城而北。复淮安板闸五坝，以防黄河浊流内灌。又筑黄浦南堤之属宝应者。两治河漕，咸著成绩”。○阳玛诺作《天问略》刻成于北京，题周希令、孔贞时、王应熊同阅，李之藻将其编入《天学初函》。此书首次将伽利略的研究，如望远镜、土星的光环、银河、木星有四卫星等介绍给了中国人。○罗文藻生于福建福宁府福安县南福安河西岸罗家巷村。

王徵，陕西泾阳县人，字葵心，又字良甫，晚年自号“了一道人”。教名斐理伯。生于隆庆五年(1571)，卒于崇祯十七年(1644)。其父王应选终生未仕，在乡村教授经学算术，写有《算

术歌款》。王徵自幼随舅父奉议大夫张璠学习，二十四岁时成为举人。但以后九次“会试”，均落榜，直至天启二年(1622)才中进士。这一时期，王徵结识了庞迪我、金尼阁、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等西教士，并受洗为教徒。曾先后任直隶广平府和南直隶扬州府推官，崇祯四年(1631)任山东按察司佥事，不久在登州兵变中获罪，赦免回家以后，以著述为主。1634年，他在家乡创立“仁会”，行“爱人之仁”。以救饥、饮渴、衣裸、顾病、舍旅、赎虏、葬死七项为宗旨，主张建粥厂、药局、公墓。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军破西安，李氏请他出山，他誓死不从，绝食而死。王徵为官期间，曾写对联自警：“头上青天，在在明威真可畏；眼前赤子，人人痛痒总相关。”王徵的重要著述有：(1)《远西奇器图说录最》；(2)《两理略》；(3)《士约》；(4)《兵约》；(5)《学庸书解》；(6)《兵誓》；(7)《忠统录》；(8)《元真人传》；(9)《天问辞》(即《天问解》)；(10)《草野杞谈》；(11)《吁秦衷言》；(12)《西儒耳目资》中《三韵兑考》一章；(13)《了心丹》；(14)《百字解》；(15)《畏天爱人极论》；(16)《圣经直解》；(17)《西洋音诀》；(18)《耆镜》；(19)《诸器图说小稿》等等。

〔任大援：《王徵：西学与新思想的传播者抑或天主教徒？》；马立克：《西学与基督教在中国》(一)，第339~342页〕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

6月，南京礼部侍郎沈淮上疏禁天主教，并查办外国传教士。疏曰：“近年以来，狡夷自远而至，在京师则有庞迪我、熊三拔等，在南京则有王丰肃、阳玛诺等，其他各省会各郡在在有之，名其教曰天主教。臣初至南京，闻其聚有徒众、营有室庐，即欲修明本部职掌，擒治驱逐，而说者谓其类实繁，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况闾左之民，骤难家喻户晓，臣不觉喟然长叹。……伏乞敕下礼、兵二部，会同覆议。如果臣言不谬，合将为首者依律究遣，其余立限驱逐。”疏人不报，以后又连上两疏，不见御批。8月20日，时为沈淮同乡的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方从哲，交结内监魏忠贤，函告沈淮教他先拿下南京的教士，然后请旨治

罪。8月31日,王丰肃与两名教友被捕,9月1日,谢务禄(后改名曾德昭)亦与钟鸣礼及其他多名教友被捕,入狱教友共计二十四人。官吏苦打王、谢二神父,毁南京无梁殿教堂,火烧圣像经典,毙教徒夏玉,并开林斐理(Felicianus de Silva)厝棺。○次年年初,皇帝下谕,着依照办,将在京师的庞迪我、熊三拔及在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押解回国。阳玛诺也被逐回澳门。○是年7月,徐光启在邸报上看到了沈淮的奏疏,便上《辨学章疏》,为天主教和西教士辩护(全文下附)。年底,驱逐教士的谕旨既下,徐光启立即劝庞、熊二司铎自动南下,由礼部派人护送。两司铎安抵澳门。龙华民、毕方济没有被点名驱逐,便藏匿徐光启官寓,内廷太监想索回二里沟墓地,徐光启力争,以二里沟为皇上钦赐葬地,不宜擅动,因请礼部恩准教民,护守利玛窦坟园。不久龙、毕二司铎移匿二里沟堂中。沈淮在南京则将王、谢二司铎装人木笼车,押往澳门。杨廷筠家居杭州,府中亦匿藏教徒六七人。李之藻官在高邮,每天发信,帮助友人救护教士。在北京的徐光启,致信沪宁亲友“如南京先生有到上海者,可收拾西堂与居住也”。○杨廷筠作《鸚鵡不并鸣说》,这是一本护教著作,列举十四点,剖辩天主教与白莲、无为诸教不同。是年,杨廷筠又著护教著作《圣水纪言》,该书由其门人孙学诗、张文焘校,李之藻作序。○8月,金尼阁、邓玉函二位耶稣会士在慕尼黑与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相会,次年接触更多。○是年全国有耶稣会上十三位,辅理会十七人。

徐光启《辨学章疏》(万历四十四年七月)

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臣徐光启谨奏:为远人学术最正,愚臣智见甚真,愚乞圣明,表章隆重,以永万年福祉,以贻万世乂安事。臣见邸报,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内言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一云妄为星官之言,士人亦堕其云雾。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连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臣尝与诸陪臣讲究道理,书多刊刻;则信向之者臣也。又尝与之考求历法,前后疏章具在御前。则与言星官者亦臣也。诸陪臣果应得罪,臣岂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然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

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向善。以称上天爱人这意。其说以昭事上帝为宗本，以保救身灵为切要，以忠孝慈爱为工夫，以迁善改过为入门，以忏悔涤除为进修，以升天真福为作善之荣赏，以地狱永殃为作恶之苦报。一切戒训规条，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为善必真，去恶必尽，盖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赏善罚恶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耸动人心，使其爱信畏惧，发于繇里故也。臣尝论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至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马迁所云颜回之夭，盗跖之寿，使人疑于善恶之无报，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于是假释氏之说以辅之。其言善恶之报，在于身后，则外行中情，颜回盗跖，似乎皆得其报。谓宜使人为善去恶，不旋踵矣。奈何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说禅宗者，衍老庄之旨，幽邈而无当，行瑜伽者，杂符策之法，乖谬而无理。且欲抗佛而加于上主之上，则既与古帝王圣贤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适从，何所依据乎？必欲使人尽为善，则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法佛也者。盖彼西洋邻近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然犹举国之人，兢兢业业，惟恐之失坠，获罪于上主，则其法实能使人向善，亦既彰明较著矣。此等教化风俗，虽诸陪臣自言，然臣审其议论，察其图书，参互考稽。悉皆不妄。臣闻繇余西戎之旧臣，佐秦兴霸；金日磾西之世子，为汉名卿，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又见梵刹琳宫，遍布海内，番僧喇嘛，时至中国，即如回回一教，并无传译经典，可为证据，累朝以来，包荒容纳，礼拜之寺，所在有之，高皇帝命翰林臣李翀吴伯宗，与回回大师马沙赤黑马

哈麻等，翻译历法，至称为乾方先圣之书，此见先朝圣意，深愿化民成俗，是以褒表搜扬，不遗远外。而释道诸家，道术未纯，教法未备，二百五十年来，犹未能仰称皇朝表章之盛心。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纳僧道者，容纳诸陪臣，则兴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皇上豢养诸陪臣一十七载，恩施深厚，诸陪臣报答无阶，所抱之道，所怀之忠，延颈企踵，无繇上达。臣既知之，默而不言，则有隐蔽之罪，是以冒昧陈请，倘蒙圣明采纳，特赐表章，目今暂与僧徒道士，一体容留，使敷宣劝化。窃意数年之后，人心世道，必渐次改观，乃至一德同风，翕然丕变，法立而必行，令出而不犯，中外皆勿欺之。臣比屋成可封之俗，圣躬延无疆之遐福，国祚永万世之太平矣。倘以臣一时陈说，难可遽信，或恐旁观猜忖，尚有烦言，臣谨设为试验之法有三，处置之法有三，并以上请。试验之法：其一，尽召疏中有陪名臣，使至京师，乃择内外臣僚数人，同译西来经传，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乐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钦命廷臣共定其是非，果系叛常拂经，邪术左道，即行斥逐，臣甘受扶同欺罔之罪。其二，诸陪臣之言，与儒家相合，与释老相左，僧道之流，咸其愤嫉，是以谤害中伤，风闻流播，必须定其是非。乞命诸陪臣，与有名僧道，互相辨驳，推勘穷尽，务求归一。仍令儒学之臣，共论定之，如言无可采，理屈辞穷，即行斥逐，臣与受其罪。其三，书译若难就绪，僧道或无其人，即令诸陪臣，将教中大意，诚劝规条，与其事迹功效，略述一书，并已经翻译书籍三十余卷，原本经典一十余部，一并进呈御览，如其踏驳悖理，不足劝善戒恶，易俗移风，即行斥逐，臣与受其罪。此三者试验之法也。处置之法：其一，诸陪臣所以动见猜疑者，止为盘费一节，或疑烧炼金银，或疑洋商接济，皆非也。诸陪臣既已出家，不营生产，自然取给于捐施。凡今衣食，皆西国捐施之人，展转托寄，间遇风波盗贼，多不获至，诸陪臣亦甚苦之。然二十年来不受人一钱一物者，盖恐人不见察，受之无名，或更以设骗科敛等项罪过相加，且交际往来，反多烦费故耳。为今之计，除光禄寺

恩赐钱粮照旧给发外，其余明令诸陪臣量受捐助，以给衣食，足用之外，义不肯受者，听从其便。广海洋商，谕以用度既足，不得寄送，西来金银，仍行关津严查阻回，如此音耗断绝，尽释猜嫌矣。其二，诸陪臣所居地方，不择士民，不论富贵贫贱，皆能实心劝化。目今宜令随其所在，依止焚修，官司以礼相待，使随人引掖，或官司未能相信，令本地士民择有身家行止者，或十家，或二十家，同具一甘结在官。如司教之人，果有失德猥行，邪言妄念，表率不端者，依今部议放流进逐。甘结诸人，一体科坐，其无人保结者，不得容留；若他人有以违犯事理，传闻告言者，官司亦要体访的确，务求实迹，则掩饰难容，真伪自见矣。其三，地方保举，倘有扶同隐匿，难以遽信，再令所在官司，不时备细体察，除有前项违犯，登时纠举外，其道行高洁，地方士民，愿从受教者，有司给与刷信文簿二扇，令司教者，循环报数在官，年终，正印官备查从教人众，曾否犯有过恶，问有罪名，另籍登记；三籍总行考察。如从教人众，一无过犯，兼多善行可指，正印官于司教之人，优行嘉奖；如从教者作奸犯科，计其人之众寡，罪之轻重，甘结士民，量行罚治；若从教之人，故犯罪恶，司教同教，戒劝不悛，因而报明官司，除其教籍者，或教籍未除，而同教之人，自行出首者，或过犯在从教以前，事发在后者，罪止本身，同教之人，并不与坐。如此官府有籍可稽，诸人互相觉察，不惟人徒寡少，仍于事体有益，其他释道诸人，或争论教法，更不必设计造言，希图耸听，只须分民司教，亦同此法，考察赏罚，谁是谁非，孰损孰益，久久自明矣。此三者，处置之法也。已上诸条，伏惟圣明裁择，如在可采，乞赐施行。臣于部臣为衙门后辈，非敢抗言与之相左，特以臣考究既详，灼见国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无以过此。倘钦允部议，一时归国，臣有怀不吐，私悔无穷，是以不避罪戾，斋沐陈请。至于部臣所言风闻之说，臣在昔日，亦曾闻之，亦曾疑之矣。伺察数岁，臣实有心窥其情实，后来洞悉底里，乃始深信不疑。使其人果有纤芥可疑，臣心有一毫未信；又使其人虽非细作奸徒，而未是圣贤流辈，不能大有裨益，则其去其留，何与臣事？修历一

节,关系亦轻,臣身为侍从之臣,又安敢妄加称许,为之游说,欺罔君父,自干罪罚哉。窃恐部臣而伺察详尽,亦复如臣,其推奖许,亦不后于臣矣。臣干冒天威,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御批:知道了。

〔徐宗泽:《增订徐文定公集》卷五,第1~8页〕

1617年(万历四十五年)

罗儒望出版《诵念珠规程》。○杨廷筠奉献家屋宅为教堂,为同教瞻礼之地,并延请西国教士居住其中,时与众人讲解《圣经》。武林和杭州人士大批入教。当时避居杨府的西士有郭居静、龙华民、毕方济、史百度、费奇观(Gaspar Ferria)及艾儒略,均在杨氏指导之下学习中国经籍及语言文字。○是年,全国教徒一万三千名,散布于江南、浙江、江西、直隶、山西、陕西诸省。

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

沈淮获罪削职。徐光启升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1月,庞迪我卒于澳门。○5月,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陷抚顺、东州、马根单三城,大破明军,一时“中外张皇”,“廷议纷纷”。朝廷任杨镐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金尼阁率二十二名教士从里斯本起程返华。金氏在欧洲时,遍历意、法、德、比等国,向各方劝募书籍,约获七千部左右,起程时全部带来中国。○邓玉函在欧洲发出最后一函,托教宗御前植物学家法倍尔(Faber)搜集伽利略著作,准备带来中国。

庞迪我遗著除《七克》外尚有:(1)《人类原始》一卷;(2)《天神魔鬼说》一卷;(3)《受难始末》一卷;(4)《庞子遗论》二卷;(5)《实义续编》,为利玛窦《天主实义》续篇;(6)《辨揭》一卷,即沈淮反教时的申辩书。1618年(?)刻于澳门或广州。

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

艾儒略初至扬州,劝化一杭州籍高官马呈秀(又名三芝,圣名伯多禄),受聘于马氏,为之讲授西学。当马氏北调至陕西商州

任职时,又随往陕西,并在当地传授种植葡萄的技术。○泉州文士郑孩如在武荣山中掘地发现古十字架石。○杨镐率兵四十万出关抵御后金军,兵分四路:总兵马林出开原,杜松出抚顺,李如相趋清河,刘綎出宽甸。努尔哈赤合八旗之兵,猛攻杜松,松战死,其余三路亦相继败北。万历帝急罢杨镐,任熊廷弼为兵部侍郎兼右都御史。○是年徐光启回都,上疏请练兵,并自请监护朝鲜,以防朝鲜与满洲勾联。徐光启上疏自请监护朝鲜后,便与毕方济神父商议朝鲜开教事,并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重新翻印,准备带入朝鲜。万历帝谕令礼部议奏,礼部回奏徐光启有经世之才,不宜远出,出使朝鲜事便作罢。○罗如望出版《天主圣教启蒙》,此书根据耶稣会士 Mare Jorge《教理单元》(La Doctrina Cristiana)翻译。



汤若望像

1620年(光宗泰昌元年)

8月,万历皇帝朱翊钧卒,子常洛嗣位,改年号为泰昌。○10月,徐光启函托在杭州之友人李之藻、杨廷筠二人商议觅西洋火炮(西铳)以备练兵。李、杨二人合议,决定捐资遣李之藻的门人张焘(亦为教徒,圣名弥额尔)前往澳门购取。当时前往澳门关防甚严,藉广东按察使吴中伟协助,拨船差官伴送张焘进入澳门,向葡商买得火炮四门,运回广东。不久李之藻复函徐光启,“虑铳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万一,反为敌的所得”,便暂时搁置。张焘另募葡兵约百人,以 Laurent de Los Veglio 统率全军,并报告不久以前有英国船漂至中国海岸,舟上有巨炮三十尊,悉为中国所有,故要求聘请炮手十人一同北上。○7月20日,金尼阁率西士返抵澳门,携有大批西书,教宗保禄五世在书上亦加盖印玺。另带回圣师伯拉明致中国奉教士大夫书。随同金尼阁从欧洲出发的二十二名传教士,抵澳门时只剩五名,其中有邓玉函(Terrentius, 或 Joanns Schreck)、罗雅谷(Jacques Rho)和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熊三拔卒于澳门。○谢务禄改名鲁德昭,重入内地传教。○艾儒略至杭州,与李之藻、杨廷筠往返交游。不久又应瞿太素之子玛竇之请到常

熟开教。

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字道未,1591年生于德国科隆一笃信天主教的贵族家庭。早年在科隆耶稣会主办的公学习修辞学,校长以其学业优异送他去罗马日耳曼学院深造。他于1608年入校,1611年10月21日入耶稣会。汤若望在欧洲时精于天文学的研究,他与同会会士罗雅谷、邓玉函都是1603年创立于罗马的“灵系研究院”(Accademia dei Lincei)的院士,该研究院是后来的教廷研究院的前身。

邓玉函(Terrentius 或 Joanns Schreck),字涵璞,1576年生于德国(一作瑞士)的康茨坦茨(Constance),他以在医学、哲学、天文、数学方面的博学斐声于德意志全境。他通晓希伯来语、迦勒底语、拉丁语、希腊语、英语、葡萄牙语。他与汤若望、罗雅谷同为“灵系研究院”院士,当时院士中有欧洲著名天文学家伽利略。1611年12月,邓氏加入耶稣会,1616年5月,邓玉函在日记写道:希望在去中国之前伽利略能够告诉他推测日月蚀的新方法。以后,在天文学上,邓氏抛弃了利玛窦等带入中国的托勒密天体说,而采用第谷的假设“太阳与太阴绕地球而行,其他行星则绕太阳运行”。

罗雅谷,又名罗雅各,字味韶,1593年生于米兰古老的望族,少年时精于数学,曾在家乡讲授实验科学。1614年入耶稣会,1617年晋铎,前往印度果阿读完神学。1620年来华。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69~215页〕

1621年(熹宗天启元年)

徐光启门生、江苏嘉定人孙元化在北京领洗,圣名依纳爵。同年,孙告假回乡,先赴杭州杨廷筠家,邀请西士郭居静、曾德昭(即谢务禄)至嘉定开教。孙元化出资在家乡建一教堂,并在堂侧建教士住宅十余椽,与郭居静、曾德昭同住。此后二三年中,受洗者数百人,男女老幼均有。○5月,后金军破沈阳,陷辽阳,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御史张铨不屈死。6月,吏部召在天津养病的徐光启回京,15日陛见。徐光启呈谨陈一得以保万全疏,建议在

关以东坚壁清野,关以西筹集炮火,招募精兵接济。并建议时已复任光禄寺少卿的李之藻取西洋大炮仿制,并“建台护铕,以铕护城,以城护民”。当时,张焘所买四门火炮及所募葡兵,已在广州。但在朝众多大臣,包括已复任入阁的沈淮在内,群起反对,以为洋炮不宜用,夷人不可靠。于是张焘将葡兵遣回澳门,自备川资,将火炮运往江西广信。李之藻又遣门人孙学诗(圣名保禄)前往广信迎接。但徐光启仍在朝廷大声疾呼以西洋火器御敌。6月28日,徐光启连上申明初意录呈原疏疏、台铕事宜疏两奏折,称“急造台铕为城守第一要务”,但“非常之原,必须大破常格,尽除宿弊而后可”,并称“寺臣李之藻尽堪办此”。又说:“然此法传自西国,……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则之藻所称陪臣毕方济、阳玛诺等尚在内地,且携有图说,臣于去年一面遣人取铕,一边差人访求。今宜速令……访求前来。”○是年春,杨廷筠门人、晋江人张赓受其感化入教。杨氏又作《代疑编》,此书阐明天主教道理,并辟佛教,为一护教著作。王徵为此书作序,极力说明“信”的重要,更解释“死信”和“活信”的区别。○艾儒略开始用中文写作《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是为中文最早记述利玛窦事迹的著作。一说1630年撰于福州(1947年5月,北平上智编译馆出版向达合校本,以闽中景教堂刊本为主,而以牛津大学、巴黎国家图书馆、北堂图书馆、献县天主堂,陈垣先生所藏抄本及校印本加以校勘而成,最有价值)。艾儒略又到山西绛州建立教会。○是年,李之藻外调至广东任左赞政。○8月26日,邓玉函从杭州致函教宗御前植物学家法倍尔,希望转告伽利略寄赠其有关日月的著述。次年4月22日,邓玉函在嘉定再次致长信给法倍尔,提及他祝愿伽利略以新法推算日月蚀成功。○阳玛诺再回北京。

1622年(天启二年)

罗马教廷创立传信部,它由十三名枢机主教、两名高级教士、一名终身任职的秘书长组成。第一任秘书长为英格利(Francesco Ingoli, 1578~1649)。传信部得到加尔默罗会等修会资助,企图由教廷直接管理海外传教事业,摆脱殖民国家的影

响。○后金军攻辽东,关外四十余城陷。○是年,荷兰人侵占台湾地,筑室耕田,久留不去,国人呼为“红毛夷”。继又据澎湖列岛,犯漳州、海澄、厦门等地,官军却之。6月,荷兰入侵澳门,被葡人打退。时抵澳门的日耳曼耶稣会士汤若望参加了保卫澳门的战斗。○奥斯定会士在澳门西望洋山主教山建成静院和小堂一座。○徐光启受阉党排挤,辞官回家,抵上海时,邀请毕方济司铎来沪。毕方济抵沪以后,又去松江开教。徐光启致信谪官广东之李之藻云:“弟之既去,亦知翁丈之必有今日。”“吾辈所志、所言、所事,要可俟天下后世而已,他勿论矣。”○杨廷筠献杭州老东岳附近桃源岭麓大方井祖茔为西教士墓地。钟鸣仁、罗儒望、金尼阁、庞类思、伏若望(P. Forez)、徐日昇(P. Fiva)、黎宁石(P. Ribeiro)、郭居静、阳玛诺、卫匡国、洪度贞(P. Augeri)、殷铎泽(P. Intorcetta)、法安多(P. Faglia)、艾奥庭(P. Barelli)等耶稣会士,先后葬于此地。但杨氏捐地时,已卒者仅钟鸣仁一人。○沈淮入阁,诬天主教为白莲教倡乱,时大学士叶向高出而为天主教辩护。各地又逐教士,金尼阁、罗如望、邓玉函等西士避居杨廷筠家。艾儒略则从山西绛州避往河南陈州,会见马呈秀,又随马氏南下扬州。

1623年(天启三年)

3月,罗儒望卒,葬于杭州大方井西士墓地。○夏,杨廷筠为艾儒略《职方外纪》润色,8月付梓。此书为艾儒略根据庞迪我遗稿增补而成,有《万国全图》、《五大洲总图》及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四海等图说,并略述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



龙华民、阳玛诺在1623年制作的地球仪

船、海道等。欧洲记载较详，尤以以西巴泥亚（西班牙）、意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叙述最多，实为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著作。《天学初函》、《四库全书》、《守山阁》等丛书均收入。李之藻亦为此书作序。艾儒略又作《西学凡》，介绍欧洲大学所授各科纲要，文科译为“勒铎理加”（Rhetorica），理科译为“斐录所斐亚”（Pilosophia，即哲学），医科译为“默弟济纳”（Medicina），法科译为“勒意斯”（Leges），教科译为“加诺搦斯”（Canones，即国家法及教会法），道科译为“陡录日亚”（Theologia，即神学）。杨廷筠为之作序，称当时“六科经籍约略七千部，业已航海而来，且在在可译”，希望“假我十年，集同志数十手，众共成之”。○是年，艾儒略在杭州慎修堂著成《性学述》八卷，此书解生魂、觉魂、灵魂甚详，第七卷论记心、论梦，第八卷论夭寿，为当时国人闻所未闻。○瞿式穀在杭州杨廷筠家结识艾儒略，邀艾氏去常熟开教。瞿式穀从兄瞿式耜在艾儒略手中领洗，教名多默。○秋，李之藻罢官回杭州原籍，“结庐湖上”，与耶稣会士傅泛际（Franciscus Furtado）居于灵隐天竺之间，译《寰有诠》六卷，此书原名为“亚理士多德论天”，为科英布拉大学讲义。○沈淮被斥。○邓玉函致信欧洲，叙述在中国修历事。1630年，开普勒将此信发表于*Sagani*，题名为《邓玉函神父自中国致欧洲天文学界书》。

1624年（天启四年）

朝廷下令擢升徐光启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徐光启因魏阉乱朝，“逆焰方张，落落无出山志”，不就职。同年，徐光启与毕方济同撰《灵言蠡勺》，8月付刻。此书亦为高因勃耳大学讲义，专论灵魂。“灵魂”在拉丁文中为Anima，徐光启译为“亚尼玛”。此书结束时论天主为至善至美，为灵魂的归宿：“右所论至美好，是亚尼玛之造者，是万物之造者，是亚尼玛之终向，是人之诸行人之诸愿所当向之的。人幸认此，凡百无有差谬，如海舟之得指南，不迷所往也。”○7月，左都副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相继攻魏氏罪，均被下狱论死。○8月，北京东林党首领叶向

高被罢官,时年4月刚任顺天府丞的杨廷筠亦乞归。叶向高归里时路过杭州,遇艾儒略,“深为敬服”,邀往福建传教。○是年,王丰肃改名高一志,重入中国,被派往山西绛州传教。当地名孝廉韩霖(字雨公)闻道受洗(圣名多默),以后又劝兄韩云一同奉教(圣名未达尔),兄韩霞亦领洗(圣名伯多禄)。○8月初,耶稣会士安夺德神父(Antonio de Andrade)一行从印度德里出发,经过艰难的旅行,抵达中国西藏阿里南部古格王国首都扎布让。古格王印发了盖有玉玺的用波斯文书写的文件,准许其传播天主教,并让沿途信奉伊斯兰教者一同协助安夺德等耶稣会士的活动。○是年,葡兵六名入京,教习中国士兵放西洋火炮,演习时葡兵哥里亚(Correa)不幸因炮炸受伤而死,葬北京(1940年7月11日在北平西便门外青龙桥天主教墓地发现其墓)。

韩霖(1596?~1649年),字雨公,号寓菴居士。山西平阳府绛州(今新绛)人。奉天主教后教名多默。年轻时随父寓居松江府(上海),入青浦县读书。1621年(天启元年)中山西乡试。尝从徐光启学岳法,并向高一志习炮术,因谙熟兵法闻名于世。目前尚存的著作有:《守圉全书》、《慎守要录》、《金汤借箸十二筹》(与李盘、周鉴合编)、《圣教信证》(与张麋合著)、《辨教论》(与段袞合著)、《铎书》、《耶稣会西来诸先生姓氏》、《二老清风》。1644年初,韩霖于山西投奔闯军,以“参谋”身份从李自成入京,获授礼政府从事(相当于明朝正六品之礼部主事)。李自成兵败后,即举家迁于山西稷山,1649年(顺治六年)与两子同遭土贼杀害。

韩霖一家均奉天主教,其兄韩云,字景伯。1612年(万历四十年)中举,少亦受业于徐光启而“颇闻兵家绪余”,历任徐州“知州”,汉中府推官、葭州“知州”。韩霖父名杰,字汉卿,幼贫而废学,在江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经商致富,平生好行善修学,尝先后捐官获鸿胪寺序班(从九品)和署丞(正九品)衔。后因韩云之故获赠中议大夫。由于韩家人缘周济,财力雄厚,天主教会得以迅速开展在山西各地的教务。绛州知州雷翀甚至公开褒扬西士和西教。



进入西藏古格传教的安夺德神父

[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绛州的发展与反弹》,(台)“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集刊,第26期,1996年;观黄氏:《明末韩霖(铎书)阙名前序小考》,澳门《文化杂志》四十、四十一期,2000年春、夏季]

1625年(天启五年)

年初,景教碑在西安府盩厔地方出土,官府将其移置到西安府西城外的金胜寺屋后。金胜寺亦名崇仁寺。当地举人张虞虞将碑文拓下,派人送至杭州李之藻处,4月16日,李之藻作《读景教碑书后》,论证景教便是基督教。10月,金尼阁应陕西进士王洪灏全家领洗之请,到西安府购买房屋,准备建堂开教。他是第一个见到景教碑的外国人,并首次将碑文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是年,金尼阁在西安刊行《推历年瞻礼法》一卷,这是一部适合基督徒的历法书,预告周年瞻礼、教会规定和斋期,同时标明中国阴历和欧洲阳历。同年又在西安刊行《况义》一卷(道光二十年(1840),香港英人将此书重订出版,取名《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6月,魏忠贤党羽、御史智铤弹劾徐光启练兵一事,朝廷免徐光启礼部右侍郎衔。○6月17日,回到印度的耶稣会士安夺德再次出发前往西藏,8月28日抵达扎布让。○全国有二十三名耶稣会士,九所住院。○年中,艾儒略抵福州开教。在福州居住四个月后,四出往各地传教。

1626年(天启六年)

2月下旬,后金骑兵五六万攻宁远。宁前道副使袁崇焕率军力御之,“连发西洋炮相持三日夜”,后金骑兵大败而归,“关外九城,屹然拱护山海”,后金主努尔哈赤中炮负重伤,旋卒。子皇太极嗣位,次年改元天聪。○李之藻在家宅毗连外建小堂和司铎住房各一所,是年诸圣瞻礼日祝圣,并绘利玛窦遗像,挂于教堂左侧。○山西绛州有五百人受洗,次年又增五百人。○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在杭州刊刻,王徵为之作序。此书为音韵学著作,大体和利玛窦注音相同,音标符号总数不过三十上下,展转拼

合，再调以中国五声，可将明末的普通音概括无遗，比旧韵书的方法方便得多。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音韵学上的重要贡献。金尼阁在杭州刊印其所译拉丁文《五经》(Pentabiblion Sinense)一册。○龙华民所作《地震解》刊行，此书采用问答体，分震有何故、震发有几等、震因何地、震儿许大、震儿许久、震之豫兆等节。○汤若望著《远镜说》，述望远镜之功能及制造法，此书为1616年法兰克福出版之西都里(Girolamo Sirturi)所著之《望远镜》(Telescopi)之译本。○是年，李之藻、傅泛际开始译《名理探》，是书为科英布拉大学讲义，以诠释亚里士多德之《逻辑学》。全书三十余卷，译出十余卷。○4月，印度果阿省耶稣会会长派遣奥利维拉(Joao de Oliveira)、安鸠斯(Alano dos Anjos)和戈迪尼翁(Francis Godinho)抵达西藏扎布让，协助安夺德传教。12日，耶稣会士在扎布让为一所教堂奠基，此堂建于山坡上，俯瞰全城，上有一高耸之木十字架，以黄铜包裹，金光灿烂。○5月，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命瓦尔德斯(Antonio Carreno de Valdes)率远征军入侵台湾，占据鸡笼等地，军中有明我教士马地涅(Bartolome Martinez)等五名传教士，他们除在军中执行教务外，也向当地民众传教。

1627年(天启七年)

王徵任扬州推官，询问西洋机械之法于邓玉函，依其口授，写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自序称远西“巧器极多，……特录其最切要者，……最简便者，……精巧者”，“虽属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王徵另著有《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手稿，藏天水图书馆，未刊行。“额辣济亚”为拉丁文“天主宠恩”(Gratia)译音，“牖造”为天主默牖或启示之意。○耶稣会是年在嘉定召集会议，讨论中国礼仪问题和天主译名问题，出席会议的耶稣会士共有九人，徐光启、孙元化、李之藻、杨廷筠均列席会议，讨论结果，对于利玛窦容忍祭祖敬孔的方法仍予遵行，不以此种敬礼为宗教迷信。对于译者，则采用龙华民一派意见，以“天”和“上帝”不能代表创造万物的尊神。○北京耶稣会会计有龙华民、阳玛诺、



邓玉函著作《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书影

邓玉函、丘良厚四位司铎。○金尼阁奉调从西安回杭州，汤若望则奉派往西安传教。秋，杨廷筠收留阳玛诺、黎宁石二人来家避难，并筑华丽教堂一座、西士住宅一座及修道所一座。此堂建于杭州武林门内观巷（天水桥西），即今杭州天主堂所在地。12月，杨廷筠卒，享年七十一岁。其次子将田房原契交西教士，长子又加若干田亩，为杨廷筠所献之大方井墓地守护之需。其女依搦斯则在南京创立贞女院，继承父志。○9月，天启帝朱由校卒，弟朱由检嗣位，次年改年号为崇祯。廷臣弹劾魏忠贤逞私、殖党、盗弄关柄、陷害忠良、紊乱刑章等罪状。不久公布其罪于全国。魏忠贤自杀，磔其尸，穷治其党羽。○是年，叶向高去世。艾儒略作《三山论学记》，此书为艾儒略与叶向高论天主教道理之书籍，有黄景昉序、石水道人苏茂相序以及叶向高赠艾儒略诗。○韩霖兄弟在绛州城东南购置两栋房屋，改建成中国第一座由教徒捐建的天主堂。

1628年（思宗崇祯元年）

年初，徐光启复礼部右侍郎原职，并任詹事府詹事，回京任职。○瞿式耜被举为礼部给事中，上疏斥掌权佞臣，又请追恤前因东林党及魏阉之祸而被枉杀的大臣，起用被诬在戍官吏。杨涟、左光斗亦受洗白。并将前撰推重徐光启、孙元化的讲求火器之疏，重新奏进。瞿式耜在朝不满一年，因举钱谦益而被周延儒、温体仁谪贬，罢归常熟。○金尼阁司铎卒于杭州。○李之藻与傅泛际在杭州译成《寰有诠》六卷，这是一本谈宇宙学的讲义。李之藻在该书序言中说“惟是文言复绝，喉转棘生，屡因苦难搁笔”，可见翻译艰难。○艾儒略著《万物真元》，龙华民、傅泛际、费乐德同订。○王徵著《畏天爱人极论》，自述其研究宗教二十余年，最先奉佛教，然后是道教，最后才接受天主教。年初，王徵陪鲁德昭来西安，与汤若望会合，以纹银三百两购屋建堂，奉献圣母。又在官府协助之下兴建另一较大之教堂。○邓玉函译《测天约说》。○毕方济至开封传教。

1629年(崇祯二年)

徐光启转礼部左侍郎。李之藻丁忧在籍，奉旨起用协理修历。因钦天监按《大统》、《回回》历推算日食错误，徐光启乃受命成立历局，他率龙华民、邓玉函等西士合力推行改历事宜。又奏造望远镜三座，名“窥筒眼镜”。○是年，徐光启再次重申练兵制器之疏，思宗颇为嘉许。两广官吏奉朝廷之命转托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购置大炮。不久，葡人献炮十门，派葡将公沙的西劳(Consales Texeira)为统领，炮匠伯多禄金答以及耶稣会士陆若汉(Joannes Rodriguez Teuzzu)一同前往。陆若汉为葡籍耶稣会士，居澳门二十年，谙熟中文，此次膺命，乃任通事。公沙的西劳和陆若汉从广州出发，走了十个月抵达涿州。正遇后金军人寇，立即将炮安置于涿州城上，昼夜防范，人心稍安。年底，徐光启上奏，请自往涿州取炮。又再次上疏，请自在北京制造火炮。○后金军是年冬进攻京东，施行反间计，袁崇焕被捕入狱，极刑论死。○是年，李之藻编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名《天学初函》，共收入艾儒略《西学凡》、利玛窦《畸人十篇》、庞迪我《交友论》、利玛窦《二十五言》、利玛窦《天主实义》、利玛窦《辨学遗牍》、庞迪我《七克》、毕方济《灵言蠡勺》、艾儒略《职方外纪》、熊三拔《泰西水法》、李之藻《浑盖通宪图说》、利玛窦及徐光启《几何原本》、熊三拔《表度说》、阳玛诺《天问略》、熊三拔《简平仪说》、利玛窦《同文算指》、利玛窦《测量法义》、利玛窦《圆容较义》、利玛窦《勾股义》及《测量异同》。○艾儒略与张賡抵泉州郑孩如家，观赏十字架石。○汤若望译著之《主制群征》在山西绛州刊行。

1630年(崇祯三年)

徐光启晋礼部尚书，掌詹事府。5月邓玉函去世，徐光启上修改历法并请访用汤若望等疏：“臣等访得……尚有汤若望、罗雅谷二臣者，其术与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强，堪以效用。”汤若望、罗雅谷由此进入历局修订历法。○李之藻在历局任职不久，于11月在京去世，临终时以教务恳托徐光启。讣文传到欧洲，耶稣会总会长谕会士各举行弥撒一台。○是年，皮岛副将刘兴治倡



艾儒略著作《职方外纪》书影

乱，朝廷议复登莱巡抚，徐光启保荐门人孙元化（亦为天主教教友）出任登莱巡抚。孙元化乃以右佥都御史任之，驻登州。教友张焘亦以副总兵协守该城，葡将公沙的西劳率炮手二十五人效力。○是年，西藏黄教寺院僧侣乘安夺德神父返回果阿和奉教的古格王墀札西查巴德患病之机，从边地发动叛乱，拉达克王亦起兵响应，最后包围古格王宫。叛军以议和为名，诱骗古格王走出要塞，将其抓获，然后送往拉达克首府列城，投入监狱。耶稣会在西藏的传教事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法国耶稣会士方德望（Stephanus Faber）抵达澳门，派往山西，协助高一志传教。○Baldinotti 司铎将利玛窦《天主实义》刊刻于越南。

1631年（崇祯四年）

崇祯手敕徐光启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是年，徐光启、汤若望等先后两次进呈历书。○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由西安入北京历局供职。汤若望离别西安时，当地教友和民众十分怀念，一再礼送，官府亦为他备行轿一顶、驮载行李的牲畜若干。○王徵因孙元化及徐光启之保荐，出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协助孙氏守登莱。是年闰十一月，京中饷糈不到，游击孔有德率军叛乱，孙元化希望招安，令各县勿迎击。年底，孔有德率军至登州，孙派人招降，不成。○方德望神父抵达陕西，开辟洋县、城固县及汉中府等新堂区。○瞿式耜从艾儒略译《几何要法》。○朝鲜陈奏使郑斗源从登莱耶稣会士陆若汉处得到西洋望远镜，带回国内呈高丽王，另携有西炮、自鸣钟等西洋物品。○卢安德（Rudomina）司铎亦于同年将望远镜传入福建三山，嗣后又由艾儒略携至桃源、清彰。○浙江奉教士人朱宗元著《答客问》。

1632年（崇祯五年）

1月1日，高琦神父在福州附近小岛登陆，是为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首次来中国大陆。○正月，孔有德部进围登州，因辽人内应，登州城陷。耶稣会士陆若汉弃城逃走，葡将公沙的西劳夜间向叛军发炮，叛兵放箭，箭中心胸，向前倒地，次日身亡。孙元

化、王徵、张焘被执。孙自杀未成，张焘不降，自缢死。登莱兵变中，朝中群议以为孙元化谋反，徐光启力辩，并以全家担保。6月，官军复登州，孙元化、王徵同解京师，朝廷以孙元化失职论死，王徵原定谪戍，后遇赦回乡。在北京的汤若望曾经乔装炭商人狱，为孙行告解圣事。西士记孙元化受刑日为9月7日。受刑前数日，王徵以丝带一幅请孙元化题字，孙题两人交谊始末，文中言两人以“道义相许”，而此“道义”乃两人“同得之于西铎”，又言天启七年春元化受谴，送行者仅王徵一人，记曰：“两筐一咒，萧萧挥手，故知不避嫌忌，坐视行色者，先生一人！”提到朝廷本以高官许王徵，王徵为了道义，到登莱相助，使同遇不幸，不胜感慨！原文曰：“长安以势要相许者，不亚于余之道义，而余不顾势要之定夺与否，毅然请之，亦必知翁之自必不以势要夺也。不意一片痴肠，终成大梦，潦倒诏狱，卧废已死。翁同苦而尚以苦余，左右提挈子弟童仆之事，周至有加。”○徐光启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是年顷，徐为山西绛州景教堂撰碑记。○汤若望在宫中付洗内监和宫女嫔妃多人。宫监庞天寿领洗入教，取圣名亚基娄。○6月12日，艾儒略在张赓、颜尔宣陪同下抵福安德化，“问道者踵接”。

1633年(崇祯六年)

九月，徐光启上疏，敦请李天经担任历局官员，李氏为河北吴桥县人，字仁常，生于万历七年，万历三十一年中举，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初年任济南知府，崇祯初年任大梁藩台、陕西臬台，为天主教教友。11月8日，徐光启卒，“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然，敝衣数袭以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内阁以讣闻，特赐祭，赠少保，谥文定，遣专使护丧回乡。○7月2日，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与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cta Maria）到福建福安传教，9月24日，罗文藻在利安当神父手中领洗入教，取圣名额我略（格里高利）。同年，罗文藻随利安当神父去南京。

1634年(崇祯七年)

7月及12月,汤若望和李天经共译成历书一百四十余册,编成百卷、十一部,呈献朝廷,崇祯帝赐名《崇祯历书》。汤若望进呈星屏、日晷、星晷、窥筒(望远镜)诸仪器,并出版《真福训论》。○艾儒略赴泉州、兴化传教,数年之间,在福建兴建教堂八所,在小城建小堂十五所。○傅泛际在西安建天主堂,在堂继续翻译《名理探》。○山西发生大饥荒,高一志留方德望、陆有基在绛州,自己四处奔走,救助灾民,是年绛州及蒲州两地受洗者一千五百三十人。

1635年(崇祯八年)

艾儒略在福州初刻《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八卷,附有木刻版画,名《出像经解》。后杨光先曾刊入《不得已》,以攻击天主教。此书材料多取自《新约》,艾氏译 *Evangelium* 音为“万日略”,又译其义为“好报福音”,此为《圣经》最早的汉文节译本。○李天经又上历法条议二十六条,因魏文魁以及内宦阻挠,不能颁行。○是年,利安当在福建当地观察中国人祭祖祭孔仪式,认定此为迷信。他和多明我会士便禁止教徒祭祖,教徒中因此发生争论。利安当遂往南昌见耶稣会中国区区长阳玛诺商议,以后转往南京,当地教徒竟将他禁锢六星期,又派人押他回福安,利安当愤愤不平,将此事视为耶稣会士指使。11月22日,多明我会在福州和耶稣会傅汎际等人讨论祭祖问题,不得结果。12月20日,多明我会在福建顶头开设了自己的法庭,招来十一名教友,判定祭祖为迷信。○罗文藻偕利安当等往马尼拉报告中国教会内部的礼仪争执。○是年,艾儒略第六次到泉州,教友在离泉州城五十里许的李坑乡发现第二块泉州十字架石,后建堂置之。○方德望从山西转入陕西,在洋县、城固县和汉中县建立了堂口。

1636年(崇祯九年)

后金改国号为清。○1月21日、2月10日,多明我会在福建顶头自设的法庭继续开会审问,最后要十一名教徒都在口供上

画押，利安当带着这份口供往见马尼拉总主教，由马尼拉总主教转呈罗马教廷。但利安当在海中被荷兰人所擒，直到次年才抵马尼拉。○在华耶稣会区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会长，先为阳玛诺，本年改为傅泛际，南区耶稣会会长为艾儒略。○汤若望为明廷铸成火炮二十门，可容四十磅炮弹。又出版《主制群征》。○崇祯帝命李天经、汤若望、罗雅谷同魏文魁登台测验月蚀，李天经等所测独合。○阳玛诺译成《圣经直解》，文笔贍雅。

1637年(崇祯十年)

艾儒略在福建刻《西方问答》，这是一部介绍西洋风土人情的书，上卷分国土、路程、海舶、海险、上产、制造、国王、西学、官职、服饰、风俗、五伦、法度、交易、饮食、医药、人情、济院、宫室、城池、兵备、婚配、续弦、守贞、葬礼，下卷分地图、历法、交蚀、列宿、年月、岁首、年号、西土、堪舆、术数、风鉴、择日等。篇幅不多，包罗甚广。同年，艾氏又在福州刻印《天主降生出像经解》。○由傅泛际、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首五卷刊刻。次五卷在崇祯十四年前刻竣，另有二十卷待刻。是书原为葡萄牙高因勃耳大学讲义，论释亚里士多德之逻辑学著作。西洋逻辑学之入中国，当以《名理探》为最早。○是年，钦天监监官上疏言，西士等所讲天主教道理大悖孔孟之道，请禁止传习。○意大利传教士潘国光(Franciscus Brancati)来华，先在杭州学习中文，同年即抵上海，当时上海南门外双园有徐光启建的天主堂，上海、嘉定、杭州一带原由郭居静、龙华民、罗如望开教，但居上海最久者为潘国光，奠定了上海教会的基础。○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来到中国江南。

1638年(崇祯十一年)

礼部题叙“汤若望等创法讲解，著有功效，理应褒奖”。○3月，泉州苏戍相之太翁在水陆寺发现第三块十字架石，教徒于天主受难之前日(4月1日)奉入教堂。同月，教徒在泉州东禅寺附近田畔拜墓时又发现第四块十字架石，4月27日奉入教堂。这

两块十字架石的发现,使“入教者愈众”,对艾儒略在泉州的传教活动很有推动力。○罗雅谷司铎卒。○毕方济至淮安传教。

1639年(崇祯十二年)

是年冬,毕方济在北京上疏,条陈救国四策:明历法以昭大统,办矿脉以裕军需,通西商以官海利,购西铳以资战守。○潘国光初次到崇明岛传教。○是年全国有五千四百八十人领洗,有二十六名教士。潘国光在上海为一千一百二十四人付洗。

1640年(崇祯十三年)

汤若望进呈崇祯皇帝《耶稣行迹》(《进呈书像》)一册。黄伯禄《正教奉褒》记其事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先是,有葩槐国(Bavaria)君玛西理(Maximilianus)飭工用细致羊鞞装成册页一帙,彩绘各图为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又用蜡质装成三王来朝天主圣像一座,外施彩色,邮寄中国,托汤若望转赠明帝。若望将图中圣迹释以华文,工楷誊缮。至是,若望恭斋趋朝进呈。”这些图像,后曾刊行于世,杨光先反教著作《不得已》中有《临汤若望进呈图像说》一篇,所附“天主耶稣返都像”、“耶稣方钉刑架像”、“天主耶稣立架像”,均为临摹汤若望所进呈的图像。○是年,汤若望奉旨监造战炮,他在局内设台一座,上供天主像,每开炉熔铸,必穿司铎礼服,恭跪台前,祝祷降佑。这些炮铸成以后经验放证明为精坚实用,因而受奖。崇祯帝谕命他将铸造之法传授给兵仗局,并监制大炮名“无敌大将军”五百门。皇帝还赐金字匾额两方,一旌其功,一颂其教。○汤若望在宫中刻意传教,是年,宫内已有信教贵妇五十人,太监五十余人,皇族一百四十余人。○阳玛诺译教理书《轻世金书》,鄞人朱宗元润色,用谟浩体。○1月19日,郭居静逝世于杭州,葬大方井墓地。遗著有《悔罪要记》、《灵性诣主》。○4月19日,高一志即王丰肃逝世于山西绛州,其晚年在山西绛州传教,得韩云、韩霖昆仲协助,先后建堂五十余座,授洗八千余人,蒲州亦是他去传教的,后人尊其为



山西开教之祖。韩氏兄弟献地五亩,为高氏及其他西士葬地。○是年,上海旧堂不敷使用,潘国光得徐光启第四孙女玛尔蒂纳助,购世春堂,改名“敬一堂”,后称“老天主堂”。○利类思抵成都开教,居东阁大学士刘宇亮邸,并建住屋和教堂,他是第一个到四川传教的欧洲人。○葡籍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a Magalhães)来华。

位于山西绛州城西段家庄的高一志(王丰肃)及恩理格的墓

王丰肃即高一志神父著述颇多:(1)《教要解略》(《圣教解略》)二卷,关于耶稣受难及救赎。1626年初刻于绛州。(2)《圣母行实》三卷,1631年初刻于绛州。(3)《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为宗徒列传、教宗列传、致命圣人列传、精修及隐修圣人列传,贞女及圣妇列传,被逐澳门时所著,1629年初刻于绛州。(4)《四末论》,即死亡、审判、天堂、地狱。(5)《终末之记甚利于精修》六页,1675年北京刻。(6)《则圣十篇》一卷,1626年刻于福州,有孙元化序。(7)《十慰》一卷,刻于绛州。对十类遭难者的慰说。(8)《励学古言》一卷。(9)《西学修身》(《修身西学》)五卷十册,1630年刻于山西。(10)《西学治平》四卷(北京北堂藏有《民治西学》二卷,冯承钧疑为《西学治平》之节本)。

(11)《西学齐家》五卷。(12)《童幼教育》二卷,1620年刻本。
(13)《寰宇始末》二卷。(14)《斐录汇答》二卷。(15)《譬学警语》
二卷(论譬喻的哲学著作)。(16)《道达纪言》一卷(巴黎国民
图书馆藏)。

1641年(崇祯十四年)

崇祯帝因汤若望、龙华民、邓玉函等西士修历有成,谕吏部议赐爵秩。但诸西士固辞,以“不婚不宦,九万里远来,惟为传教劝人,事奉天地万物真主,管顾自己灵魂,望身后之永福”,请求收回成命。崇祯帝从其请,并敕礼部将御题“钦褒天学”匾额分赐各省西士祇领,悬挂于天主堂中。○徐光启的灵柩从暂厝的上海南门双园别墅营葬于徐家汇肇嘉浜北原。营葬典礼第一日,潘国光司铎率教徒一百四十人,穿丧服,执白烛,抬十字架至双园,置于徐光启灵柩前。第二日,上海教徒齐到双园,排队执绋,送柩到徐家汇墓地。第三日,潘国光举行追思大祭,祝圣墓穴。上海县知县代皇帝致祭,遂下葬。墓前有石人石马、华表牌坊。○利类思在四川成都为三十人付洗,其中有名伯多禄者,为皇室后裔。安文思神父亦从杭州抵川襄助传教。○毕方济在南京造一座以护守天使为主保的教堂,门上刻“护守山”。○方德望将陕西教友转交给郭纳爵(P. da Costa)和梅高神父(P. Etienne d'Ameida),自己去北京协助汤若望。

1642年(崇祯十五年)

清军攻陷松山、锦州,明督军洪承畴被俘降清。○多明我会区会长派黎玉范、利安当前往罗马,控告耶稣会士的祭祖祭孔宽容为悖教。但到澳门以后,利安当被阻,只剩黎玉范一人搭船赴欧洲。○艾儒略《天主降生言行纪实》第二次刊刻于北京。○葡籍耶稣会士孟儒望(Joannes Monteiro)所著《天学略义》在宁波付梓,是书解释使徒信经。孟儒望字士表,1637年来华,在澳门任修院院长,后抵浙江宁波传教,曾在浙省种植葡萄。○阳玛诺作《天主圣教十诫直论》,朱宗元作序。○8月28日安文思抵四川

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

1643年(崇祯十六年)

崇祯帝依督修历法的光禄寺卿李天经之请,对“劳勤年深”的汤若望,加给“酒饭桌半张”,并着吏部另行叙议其劳绩,又赐“旌忠”匾额一方。○汤若望与焦勛合作完成《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一书。此书上卷写造銃、造弹、造銃车、火箭、喷筒、火罐、地雷、制造测量、比例、起重、配料;中卷写制造、贮藏火药须知、试放新銃、运銃上下山等各种原理;下卷则写西銃之攻法及守城、海战、炮战事项。末附祷词一篇,祈求天主早赐和平。“则克”取自《礼记》:“孔子曰:我战,则克。”○2月,多明我会上黎玉范抵达罗马,上书传信部,控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方法,所陈述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事项有“守斋”、“女人领洗和终傅”、“放债重利”、“敬孔子”、“敬祖先”、“事死如事生”、“祖宗”、“牌位”、“敬礼皇帝”、“敬城隍”等等。耶稣会士曾德昭是年在罗马出版《中国风俗和宗教大观》,书中描绘各种祭祠和庙宇,多明我会士正好利用它来攻击中国礼仪。○徐光启之孙徐尔斗进京进呈光启之《农政全书》。○是年冬,李自成率农民军自襄阳破潼关,克西安、延安、西宁、甘肃,三边皆破。李自成派人延请王徽,王誓死不从,结果将其子永春捕去。后因乡人愿自赎,永春不得死。○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抵达中国。

卫匡国,字济泰,1614年生于意大利底罗肋(Tyrol)首府特兰托(Trente)。1631~1639年,他离开家乡,就读于罗马公学。曾随老师、德国耶稣会基尔旭(Kircher)学习自然科学。1631年10月8日加入耶稣会。1641年3月23日,他与同会二十一人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11月16日抵印度西海洋果阿。1643年抵中国,初在浙江传教。一年以后,当地被清军攻占,治安不靖,民众流离,卫匡国四处奔波,不敢定居一地,远至京城及长城一带。他曾发明了一种用磁偏差来测量经度的方法,于是乘此机会测量全国各地之经纬度。

〔高泳源:《卫匡国生平系年》;德马尔基编:《卫匡国:一位

十七世纪在中国的人文学家和科学家》；意大利特兰托大学，1996年，第40~43页]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

4月24日,李自成率农民军三十万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5月13日,清睿亲王多尔衮奉命经略中原。20日,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致书降清。26日,清军入山海关,与吴三桂合兵进迫北京。李自成出逃。6月6日,清军入北京。○6月,多尔衮谕令中、东、西三城居民,三日内搬迁南、北二城,汤若望所居之天主堂在此一范围中。为请求居留原处,汤若望上疏多尔衮,向清输诚:“幸逢大清圣国俯念燕民遭贼荼毒,躬行天讨,吊民伐罪,……此乃天主上帝宠之四方,隆以君师之任,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者也。”同时希望自己具备西方科学知识能为新朝赏识:“……而西方带来经书不上三千部,至于翻译已刻修历书板数架充栋,诚恐仓猝挪移,必多散佚。”多尔衮批准汤若望请求,准其居留原处,并张谕天主堂门前,禁止闲人扰乱。9月出现日食,汤若望推测比《大统历》和《回回历》更为准确,并算出全国各城市日食时刻。年底,清廷准用西法,由礼部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王徵听说京师陷落,绝食而亡(一说病逝)。○10月10日,罗文藻第二次赴马尼拉,途中遇大风,飘抵安南顺化。○明亡以后,陪都南京官吏拥立福王朱由崧为皇帝,6月7日即位,定明年为弘光元年。○是年春,张献忠自荆州攻克巫山,进入四川。召利类思、安文思二司铎,封其为“天学国师”,命其修订历法,并令二司铎造天、地球两个,用红铜为之,另造日晷配合,所需工匠人等,均由二司铎调度。不久,利类思、安文思制成二球。天球有各星宿、七政星宫环列其上,地球分五大部洲,国名、省名、城名历历可数,经纬线、南北两极、赤道、南北温带等无不齐备,观者称奇。○清军攻占北京后,将作为人质的朝鲜王太子李滉移置北京,李滉遂与汤若望结识,汤氏赠送李滉天球仪、天主圣像以及世界地图摹绘本,后李滉获准返国,将这些物品带回朝鲜宫廷。1708年,朝鲜李朝肃宗命崔锡鼎将汤若望摹绘之世界地图



利类思像

复制若干,以广流传。1919年1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报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报导汉城附近之奉先寺曾藏有一幅。

1645年(顺治二年)

年初,汤若望奏辞掌管钦天监印信一职,谕旨不准。耶稣会中国省会长傅泛际认为此事对天主教传教事业大有助益,乃劝汤氏接受新职。汤若望终于正式接掌监务,并在奏章中使用“钦天监正事”等衔。汤若望改《崇祯历书》为《西洋新法历书》一百卷,共十三套进呈,十二月奉旨:“新历密合天行,已经颁用,所进历书考据甚精详,理明数著,着该局官生用肄习,永远遵守,仍宣付史馆,以彰大典。汤若望勤慎可嘉,宜加叙赏,着吏、礼二部议奏。”○9月12日多明我会上黎玉范上书传信部禁止耶稣会士祭祖祭孔,传信部批复同意,教宗英诺森十世批准传信部答复,但加上“未有圣座另行议决前,须暂时遵守”字样。○5月20日,罗文藻抵马尼拉,入圣多玛斯学院半工半读,习拉丁文、西班牙文及哲学,凡两年半。6月,清兵下南京,弘光帝遇害,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建,以福州为福京,福建为兴天府,以图恢复,改元隆武。弘光帝在南京时,诏遣曾在藩邸结识之毕方济神父出使澳门,商议借兵购械事。毕方济抵澳门,南京失守,借兵未成。隆武即位以后,即召毕方济来朝供职,委以重任。毕氏与聿键早在常熟相识。○卫匡国从华北返抵杭州,并建教堂于兰溪。他在两地共居住四年,以后又远至漳州。

1645年9月12日,传信部颁发部令,该文件由教宗英诺森十世批准,这是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次表态。当时圣职部偏听了多明我会士黎玉范的一面之辞,作出了支持黎玉范,谴责耶稣会做法的裁决。

传信部 1645年9月12日部令

中国传教士的若干问题。下述意见是传信部发给圣职部的,由圣职部的专家们作出如下评估:

……

6) 在中国城镇和老百姓中间,有一种挨门挨户摊派的习

俗,每一街坊的居民都要捐钱的。这些钱用于庆祝新年、供祭、拜他们的异教鬼神、邻里请客、在他们的庙宇里节日设宴或其他项无所谓好坏的事。不好也不坏,只是一种表达公众欢乐的活动。问题在于基督教徒们和他们的传教士们,现在是否可以捐钱为此类活动出一份力?人们要求传教士捐钱一如要求街坊的居民出钱那样,如果基督徒不捐款,教外人士将会对基督徒制造麻烦。

他们决定只要此种摊派不是旨在搞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中国基督徒们可以接受摊派。假设情况正如上面所述,但讲得含糊不清;特别是如果他们先宣布(假定这是可行的话),他们捐这钱只是为了让大家过得快乐,只是为了赞助进行道德上属于中性范围的活动,或者,至少不违背基督教实践做法,他们可以捐钱。

7) 在中国所有的大小城市,你都可以看到城隍庙。中国人相信城隍是他们的保护神、他们的统治者、他们城市的守护神。根据中国已经规定的法律,所有城镇的总督(他们称为官员),在他们的任上,一年中每个月要两次去庙里,在祭坛前磕头跪拜城隍,否则将受革职的处分。他们烧香、点烛、献花、备酒、备饭,供奉城隍。地方官们上任时,在他们的偶像前要宣誓秉公执法。如果他们徇私枉法,他们甘愿受到城隍的惩罚。同时,他们祈求城隍告诉他们怎样当好这个地方官,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问题:鉴于中国人的这样的软弱,信奉基督的官员们出席时是否能带一个十字架去,把十字架藏在供坛上的供奉偶像的鲜花丛中,或者拿在手中?(他们的意愿并不是要供奉偶像,而是要崇拜基督的苦像。)当他们表面上在祭坛前做所有这些表示崇敬的跪拜行礼时,他们可以在心中默默地把这些举动作为对基督十字架的崇拜。如果不允许这些官员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将宁愿背叛我们的信仰,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官职。

他们决定绝对不允许基督徒表面上公开假装崇拜偶像,心里却崇拜他们拿在手上的,或者放在供坛上的鲜花丛中的

基督苦像。

8) 中国人有一个道德哲学的至圣先师，他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他的名字叫孔子。他的教导，他的律规，他的著作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的皇帝和臣民，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把他视作应该仿效的典范，至少把他当作一位先哲来尊奉。他们把他奉为圣人，在中国，每一个大小城市都建有孔庙。

地方官员每年两次要到孔庙去举行庄严的祭孔仪式，他们自己担负着类似司祭的职务。一年中，每个月两次他们要去祭孔，但不举行隆重仪式，一些读书人竞相以孔子来管理好他们地方的政务。他们祭供的东西有：整猪、整羊、蜡烛、醇酒、鲜花、乳香等。所有的读书人考中以后都要到孔庙去跪拜孔子，在其祭台前献上香烛。

所有这些礼仪——祭供、磕头行礼……——按其用意都是中国人感谢孔子在他的著作中留给他们的好的教导。祈求他以他的功绩赐福他们，赐予他们聪明才智。

问题是已经入教、或者将要入教的官员和读书人，受到召唤时，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入孔庙祭孔，或者参加祭孔仪式，在祭坛前跪拜，分享那些祭供偶像的供品？因为异教徒们相信无论谁吃了那些供品后可以学业上进，青云直上。

基督徒官员们和读书人，一如对前一问题加以说明的那样，是否可以手里拿着十字架这么做？如果禁止他们这么做，人们就会骚动起来，传教士们就会被驱逐，今后很难再劝人入教，所有皈依入教就会中止。

结论：不能允许这么做。由于如上描写的情况，基督徒们不能假装参加这种供祭活动。

9) 中国人有一种宗教式的遵循孔子的教导的习俗。在中国各地都建有祭奠他们祖宗的庙宇。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每年两次去祭祖。在盛大的祭祖仪式上，他们庄严地祭供他们的祖宗。他们把他们的先人和祖宗的画像或雕像供奉在漂亮至极的祭坛上，祭坛前点着蜡烛，烧着乳香，摆着鲜花。有一个

人像司铎一样主持仪式,还配有辅祭。他们供祭的东西有酒、饭、香、烛、祭牲的头等。

中国举行这种祭奠仪式是表示对祖先的感恩。感谢祖宗给予他们的,及他们希望得到的好处。他们在祖宗的祭坛前念念有词,跪拜祷告,祈求身体健康、长寿、丰衣足食、子孙满堂、兴旺发达、消灾消难。他们也在家里或墓地作这样的供祭,不过没有如此隆重。

问题:基督徒是否可以如上所说的那样假装在表面上参加这样的祭祖仪式呢?他们是否能和异教徒一样在寺庙,在家里,在墓地,公开地或私下地积极参加这样的祭祖仪式呢?可以允许基督徒参加这种活动到如何程度?如果绝对禁止他们参加这种活动,他们将会放弃信仰。或者,更好地说,他们外表的行为将不再像基督徒那样了。

结论:无论如何中国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假装参加这种祭祖仪式。即使表面上也不可以。他们不可以参加祈祷,或者任何异教的迷信礼仪,他们更不能积极参与这样的礼仪活动。

10) 中国基督徒坚持认为他们祭祖只是表示对祖先的敬意,一如祖先生前还活着那样。这只是一种纪念性的活动,对祖先表示子孙后代继承着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生前身后吃的、用的都是一样地供奉的。他们知道祖先已经死了,其灵魂进入来世了,他们供奉这些东西没有其他目的,并不想得到回报。

问题:如果只是基督徒们在庙宇中,在家庭里,在坟地上举行这些仪式而并非与教外人士同流合污。在进行这些仪式时,他们在先人祭坛上放一个十字架,只怀着这样一个意愿:他们在祖先像前供奉任何东西,只是表达他们的孝心,就像他们的先人活着时一样,他们供东西给他们吃,给他们烧香,以此来迎合他们的同胞乡邻,现在这样做法为了免遭麻烦是否被允许?

答案是:按照以上所说,建议中的办法,不论是安放一个十字架,或者没有外教人在场,或者自己意愿把违禁的迷信活动转变成对真天主的崇拜,都不足以替自己辩解,证明自

已无罪。

11) 中国人为了纪念祖先,就给先人立牌位,把先人的名字写在牌位上,他们把这种牌位称为先人的灵位,他们相信牌位上有先人的灵魂,先人们的灵魂会来享用供品的。先人牌位都放在各自的祭坛上,祭坛上都放了玫瑰、油灯、蜡烛和乳香,他们在先人的灵位前跪拜、祈祷、请求先人在他们的工作中和需要的时候帮助保佑他们。

问题:如果基督徒把那些异教的迷信和错误撇在一边,是否可以暂时用一下这些牌位?他们是否可以把先人的牌位和圣像放在一起,放在同一祭坛上,或者放在另外一个按上述装饰的祭坛上,以此来迎合教外人士?他们是否可以用上述意愿作上述祈求?

结论:他们不能以任何方式正式为先人设祭坛、立牌位,更不可以祈祷、供祭先人,即使其意图是装装样子也是不允许的。

12) 在中国,有一种看似不能违背的习俗:某人去世了,不管他是否是基督徒,都要在亡者家里设立灵坛,在灵坛上放一张亡者的遗像,或者放一个上述的亡者的牌位,在灵坛前点上乳香、蜡烛,放置鲜花,亡者的灵柩停放在灵坛后面。所有进屋来吊唁的人都要对灵坛和亡者的遗像跪拜,磕头三四次。他们匍匐在地,把头碰地,他们点上手里的蜡烛和乳香,把他们插在遗像前的祭坛上。

问题:是否可以允许基督徒,特别是传播福音的教士,心里当做是一种互相表达爱心和善意的表示来做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亡者是一些有名望的人士时是否可行?

结论:只要这张桌子只是一件普通家具,而不是一个正式专用的祭坛,且他们做的这些举动是在民俗和政治范围内,可以允许他们这样做。

13) 问题:我们传教士是否应该告诉准备领洗的望教者们,我们是否应该坦率地详细地教导他们供祭(先人)以及上述所有的事情都是违禁的,即使由此而可能产生麻烦,例如:

取消领洗,受迫害,传教士们遭到驱逐,甚至死亡等也在所不惜。

结论:传教士们必须告诉,所有供祭除了奉献给天主的以外,都是违禁的。必须放弃礼拜鬼神。他们所做的礼拜都是虚假的,是不能和对基督的信仰同日而语的。对每一个个案,须视望教者的接受程度而定。必须考虑具体情况、习俗和危险性。

14) 在中国的语言中,“圣”和“神圣”是一样的,在一些传教士们刊印的基督教义的书中,“圣”是指天主圣三,基督,童贞女圣母和圣徒们。

问题:在书中,有时候有必要提及中国人的先师孔子,或者某一个中国统治者的戒律,或者其他在中国被视作神圣的统治者,他们都是异教徒,是偶像崇拜者。对于我们传教士来说,是否可以把上述诸人称为“圣”?

结论:在我们弄清这个词的习惯用法和真正确切的含义前,不可对这词及其使用作任何规定。如果这个词在中国人中间有一种比较广泛的含义的话,传教士们可以使用它。但如果这个词的含义真的只是局限在神圣的意义上,那么传教士就不能使用它。

15) 在中国的许多崇拜偶像的庙宇中,总有一个金黄色的牌位放在一张桌子或祭坛上,还有蜡烛、鲜花和乳香。在这牌位上写着:“愿中国的皇帝万岁万万岁”。偶像朝拜者们习惯于一年二三次来此供桌前供祭,他们对它鞠躬、磕头、行礼。

问题:我们传教士们是否可以在我们的教堂里放这样一个供坛,上边也放牌位和其他上述的东西,而教堂内同时设有供天主的司铎举行奉献神圣祭品(弥撒)的祭坛。

结论:只要桌子上面不放祭品,也不正式把它叫做祭坛,其他东西只是表明民间尊敬的意义,或者被限于民俗的范围内,这是可以允许的。

尊敬的 Ginetto 枢机主教批复了上述的一系列问题和审查了为这些问题而专设神学委员会所作出的答复和决定。传

信部的枢机们同意了这些答复和决定。应传信部的要求，教宗陛下旨令严格要求每一个传教士都要不折不扣地遵守这些答复和决定，并付之于行动，并且注意其他有关人士是否遵守和实践这些答复和决定。教宗这么做是要求统一我们的传道和实践活动。耶稣会及各修会的传教士们，包括已经在中国的，或者准备去中国的都要遵守教宗此道敕谕。在教宗和教廷作出另外的决定以前，都必须遵守这道谕旨。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1~4页〕

1646年（顺治三年）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加升为正四品的太常侍少卿。○瞿式耜离桂林，居梧州，他不以立唐王为然，不入福建。瞿主张立神宗之孙、桂王第四子永明王朱由榔，8月，迎朱由榔及太妃至肇庆。11月，朱由榔监国于肇庆，瞿式耜进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兼掌吏部事，丁魁楚掌军国大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改明年为永历元年。受洗于汤若望之手的崇祯帝宫监庞天寿，辗转来到肇庆，永历帝用为司礼秉笔太监。○清肃亲王豪格带兵攻入四川，张献忠败死西充凤凰山，利类思、安文思两神父被俘以后押往北京。

1647年（顺治四年）

年初，清兵破肇庆，瞿式耜走梧州，又护帝至桂林。帝受他人之劝，入武冈，瞿式耜自留桂林，进兵部尚书、太子太傅，赐剑便宜行事。三月，清军大举进攻桂林，有劝降者，式耜不听。将军焦琏率军至，合力退敌。清将黄天爵被俘斩首。焦琏（亦为教徒）加太子太师，式耜封临桂世伯，进武英殿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师。时桂林守军寥寥无几，焦琏驻军白石潭，式耜夫妇倾家助饷。永历帝即位之初，式耜曾派庞天寿与毕方济赴澳门借兵，葡人遣兵三百名，带大炮数门而来，以瞿纱微（瞿安德，Andreas Xavier）为随队神父。年中，瞿式耜收复失地甚多。○4月，汤若望因宗教及

职务方面理由,奉准“戴太常寺少卿顶带,束带,免随朝参,不吃少卿俸薪”。○卫匡国著《速友篇》,以补利玛窦之《交友论》,共分上下二卷(一说刊于1667年)。○方德望回陕西传教。

1648年(顺治五年)

是年,德籍耶稣会士瞿纱微(安德)为永历皇室中重要成员付洗入教:(一)王太后,圣名烈纳(Helena),生于湖广。王太后并非永历帝生母,而是熹宗(天启)之妃,正后死,进位为后。既为先帝之后,于制应视为在位皇帝之母。(二)马太后,圣名玛利亚,为永历帝生母,永历帝即位以后,亦尊为皇太后。(三)永历帝正后王氏,圣名亚纳,苏州人。(四)皇子慈烜,圣名公斯当定(Constantinus)。此外宫中信教者尚有王太后之母,圣名犹莉亚(Julia),另一宫监洗名亚加大(Agatha)。别有妃嫔五十人、大员四十人、太监多人领洗。是年,永历帝遣使前往耶稣会教堂,献银香炉、银花瓶、银烛台,请行谢恩弥撒。明使抵澳门后,澳门耶稣会副省会长曾德昭(P. Alvaro de Semedo)于10月31日举行弥撒大典。葡萄牙总督设宴款待来使。澳门耶稣会士视此次盛典为象征中国归顺天主教的意义。○卫匡国在杭州付洗二百五十人,多为士大夫。○艾儒略与阳玛诺、范有行(Fr. Pascoal Fernandes)因清兵南下,避入延平,此城僻处山中。



南明王太后受洗图

1649年(顺治六年)

8月,艾儒略逝世于福建延平。葬福州北门外十字山。艾氏在福建各地先后建大堂二十二座,小堂不计其数,付洗万余人,文人学士均乐与之游。其晚年传教地点在邵武、建瓯、黄华山、武夷山、建宁(绥宁)等地。他在福建付洗的士大夫中以建宁李嗣玄、福清李九标和泉州张廌最为著名。○是年,毕方济神父亦卒于广州,其墓在广州小北门外流花桥明隆武君臣冢之中。○10月,汤若望升为从三品的太仆寺卿。

艾儒略著作极为丰富,主要如下:(1)《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取材《四福音》八卷。1642年、1738年、1796年刻于北

京。讲耶稣一生及受难始末。(2)《出像经解》一卷,为耶稣一生及受难始末图像,共五十六幅。1635年刻本。(3)《天主降生引义》二卷。1872年、1922年上海土山湾刻本。(4)《弥撒祭义》二卷,1629年福州刻本。(5)《涤罪正规》四卷,1849年重刻。(6)《悔罪要旨》一卷。(7)《万物真原》(《万有真原》)一卷,1628年、1694年、1791年北京刻本。(8)《三山论学记》(与叶向高谈话)一卷,1625年杭州刻本,1694年北京刻本。(9)《圣梦歌》(《性灵篇》),译自圣伯尔纳(St. Bernard)著作,1684年北京刻本。(10)《利玛窦行实》(又名《大西利先生行迹》)一卷,1630年北京刻本。(11)《张弥克遗迹》一卷。(12)《杨淇园行略》一卷。(13)《熙朝崇正集》四卷,福州刻本。(14)《五十言》一卷,1645年刻于福州,卷首有张赓序。(15)《圣体要理》一卷,1644年福州刻本。(16)《耶稣圣体祷文》,初刻于《圣体要理》之后。(17)《四字经》(天主教要理),1642年、1650年、1798年北京刻本,1856年土山湾刻本。(18)《性学概述》八卷,1623年杭州刻本。(19)《玫瑰十五端图像》。(20)《景教碑颂注解》,阳玛诺书,艾氏准印。(21)《几何要法》四卷,1631年刻本。(22)《西学凡》,有关西方科学,1623年杭州刻本。(23)《西方问答》二卷,有关欧洲事务的问答。(24)《职方外纪》六卷,1623年杭州刻本。(25)《口铎日抄》,与卢安德合撰。

1650年(顺治七年)

1月,罗文藻成为多明我会士,改穿多明我会会服。○是年,顺治帝于宣武门内利玛窦所建旧堂一旁,复赐一隙地,由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建一圣堂,是为宣武门“南堂”,又名“圣母无染原罪堂”。此堂地基作十字形,长八十尺,宽四十五尺,巴洛克式样。堂内各有祭坛五座,正中供天主像,周围环列天使及宗徒像,另设圣母玛利亚祭坛。○永历朝中大臣太监互相攻讦,粮饷匮乏,年底,清兵自全州进攻桂林,桂林沦陷。瞿式耜独守不去,与同难的张同敞被俘。清将孔有德劝降,瞿等不屈,囚中作临难表疏,又派人送信给焦璉,囑带兵来攻,信差为清军所俘。瞿式耜

与张同敞同时就义于桂林独秀山，合葬风洞山下。永历朝封瞿式耜为粤国公，谥文忠，清朝改谥忠宣。○澳门耶稣会士策动南明朝廷派遣使节前往觐见教宗和教廷，永历皇太后和司礼太监庞天寿极表赞成，耶稣会副省会长决定派遣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充任南明出使教廷的特使，前往罗马朝见教宗。是年11月，庞天寿将所有上书呈交卜弥格，并派两名侍卫一同前往。卜弥格先抵澳门，澳门主教先检阅皇太后上教宗书，命录事签证为正式文书，耶稣会副省会长亦写公函数封，证明卜弥格的身份，又附密函一件致耶稣会总会长，说明卜弥格奉使的理由。○利安当至济南传教。○耶稣会推卫匡国前往罗马陈述耶稣会关于准许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的主张，卫匡国接受任命之余，将在中国搜集之所有史地书籍及图册装运，并带领中国修士及第一位赴欧洲留学生郑维信(郑玛诺)，于年底离开杭州至福建，然后取道菲律宾前往欧洲。○全国教友五十万。



卜弥格像

卜弥格(Michael Boym)，耶稣会士，波兰人。出身贵族，原籍为匈牙利人。家居肋阿玻城(Leopol Levow)，1609年家中建一教堂，以雕刻绘画著名城中。卜弥格的生年，历史考据学者不能决定，大约生于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中学毕业后，于1631年入耶稣会，就读于克拉各委亚城(Cracow)。神学毕业后，在雅洛斯老城(Jaroslav)受耶稣会第三试，上书耶稣会总长 Muzio Vitelleschi 请派赴中国传教。卜弥格长于数学与生物学，耶稣会总长认为可派往北京，相帮钦天监中的同会会士。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由里斯本(Lisbon)乘船动身赴澳门。船近中国时，清兵已入关，明朝江山大半已入清顺治帝之手。卜弥格乃赴安南东京，时在1645年(顺治二年)。次年往海南岛，传教定安县(琼崖道)。在定安住了五年。被耶稣会远东视察员 Sebastiaod Amaya 遣赴肇庆，充任明永历皇太后使臣，往罗马觐见教宗。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53节]

永历皇太后致罗马教皇书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于依诺增爵代天主耶稣在

世总师、公教皇王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阆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坚信心，敬领圣洗，并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公斯当定）并请入教领圣洗，三年于兹矣。虽知沥血投诚，未获涓埃答报。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海，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圣父在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时特赐罪罚全赦。原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遣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如斯诸事，俱维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宣。今有耶稣会士卜弥格，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于我圣父前，彼能详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此处有朱印，印文系“宁圣慈肃皇太后宝”）。

明庞天寿上罗马教皇书

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联络水陆军务，提调汉土官兵，兼理财催餉，便宜行事，仍总督勇卫营，兼掌御马监印，司礼监掌印太监庞亚基楼契利斯当，膝伏依诺增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真主圣父座前。窃念亚基楼职列禁廷，谬司兵戎，寡昧失学，罪过多端。昔在北都，幸遇耶稣会士开导愚懵，劝勉入教，恭领圣水，始知圣教之学，蕴妙洪深，夙夜潜修，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稍息。获蒙天主庇佑，报答无繇，每思躬诣圣座，瞻拜圣容，詎意邦家多故，王事靡盬，弗克遂所愿，深用悚仄。但罪人一念之诚，为国难未靖，特烦耶稣会士卜弥格归航泰西，代告教皇圣父，在于圣伯多禄、圣保禄座前，兼于普天下圣教公会，仰求天主仁慈，照我大明，保佑国家，立跻升平。俾我圣天子，乃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钦崇天主耶稣，则我中华之福也。当今宁圣慈肃皇太后，圣名烈纳，昭圣皇太后，圣名玛利亚，中宫皇后，圣名亚纳，皇太子，圣名当定，虔心信奉圣教，并有谕言致圣座前，不以宣之矣。今愚罪人，愿祈圣父念我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多令耶稣会士来我中



南明皇太后烈纳致教宗英诺森十世书信（此图由梵蒂冈图书馆提供）

国，教化一切世人悔悟，敬奉圣教，不致虚度尘劫，仰微大造，实无穷矣。肃此，稍布愚悃，伏惟慈鉴，不宣。永历四年岁次庚寅阳月弦日书。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 61~66 页〕

永历皇太后上耶稣会总会长书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敕谕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予处宫中，远闻天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入圣教，领圣水，阅三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求尊会相通功劳之分，再多送老师来我国中行教。待太平之后，即着钦差官来到圣祖总师意纳爵座前致仪行礼。今有尊会士卜弥格，尽知我国情事，即使回国代传其意。谅能备悉，可谕予怀。钦哉。特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 569 页〕

1651年(顺治八年)

顺治帝亲政。8月,汤若望受封为通议大夫,加太常寺卿,管钦天监正事,其祖父玉函及父亲利国均被赠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祖母郎氏及母亲谢氏则获赠为淑人。若望父、祖两轴诰命,被邮寄至德国,由其家族祗领。○1月,卜弥格及两中国随从乘船前往印度,3月中旬,抵达马拉巴(Meliapor),该城为宗徒多默抵印度传教之地,总主教名贾尔科(Francisco Garcia),为葡籍耶稣会士,3月29日,贾尔科总主教写一信交卜弥格,向教宗介绍其奉使使命。5月,抵果阿,留住半年余。○卫匡国从福建抵达菲律宾,然后乘一荷兰商船抵达荷兰人占领的望加锡(Macassar, 印尼苏拉威西岛西南部海港),向荷兰叙述中国改朝换代经过,于是荷人决定派遣使团于次年向中国朝贡。然后卫匡国又抵达巴达维亚(雅加达),以后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是年,孙可望迎永历至安龙。

1652年(顺治九年)

汤若望进浑天球、地平日晷等仪器,获赐朝衣、凉朝帽、靴、袜等物。○宣武门天主堂竣工,顺治帝赐以“钦崇天道”匾额一方,礼部尚书及孔子裔孙亦各题赠堂额。○卜弥格由波斯入亚美尼亚、小亚细亚,再由斯米尔尼城(Smyrne)搭船赴威尼斯。年底,威尼斯共和国元首接见卜弥格及其随员。○罗文藻在福建汀州建教堂一座。

1653年(顺治十年)

顺治帝特敕汤若望为“通玄教师”,此一诰命由满汉文缮写在周边有双龙戏珠花样的木匾之上,悬于天主堂内耶稣会大客厅里。○是年春,卜弥格抵罗马,他本想要求教廷以钦使礼相迎,但耶稣会总会长尼格尔(P. Goswin Nickel)命他以传教士身份进教廷。传信部于4月1日、7月22日、9月16日三次召集枢机会议,讨论卜弥格出使事,最后议决由他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书。○8月31日,卫匡国抵挪威卑尔根(Bergen),经汉堡转往荷兰。



北京宣武门南堂

顺治帝嘉奖汤若望敕谕

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历为急务。羲和而后，如汉洛下闳、张衡、唐李淳风、僧一行诸人，于历法代有损益。独于日月、朔望、交会、分秒之数，错误尚多，以致气候刻应不验。至于有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未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积差矣！尔汤若望，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其时大学士徐光启特荐于朝，令修历局中。一时专家治历如魏文奎等，推算之法，实不及尔。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谕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比之古洛下闳诸人，不既优乎！今特锡尔嘉名，为“通玄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圣贤，佐佑定历，补数年之阙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故谕。顺治十年三月初四日。

〔张奉箴：《汤若望与中国：历法及天文学》，（台）闻道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 页〕

1654 年（顺治十一年）

利类思《超性学要》部分刊行。此为中古时代天主教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 (S. Thomas Aquinas) 之《神学纲要》(*Summa Theologica*) 之节译。本年刊行之部分为“天主性体”六卷。○5 月 29 日，罗文藻在马尼拉多明我会行剪发礼，并领受四小品，次日领受五品，6 月 30 日主领六品。7 月 4 日，罗文藻晋铎，马尼拉华侨举行盛大庆祝。○12 月 11 日，龙华民在北京去世。○李定国迎永历帝至云南。○6 月，卫匡国应教廷之召来到罗马，向教廷报告中国礼仪问题。卫氏认为，中国士人之祭孔，是“根据原来纯文化性的制定，用政治和文化礼仪，来承认孔子为先师”。至于祭祖，一般群众用迷信方式和学者以正常方式的敬拜是有所区别的。帝王和臣子对供祭和奉香，祭品有果子、肉类和丝绸，这是对亡者的尊敬和孝爱，可以摆脱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卫

匡国还向教廷描述了中国敬尸、葬礼、扫墓和宗祠叩拜等问题。这场辩论持续六个月。同年，卫匡国的《鞑靼战纪》(De Bello Tartarico)在米兰、科隆、阿姆斯特丹和比利时的盎凡尔斯(Anvers)同时出版。○8月24日，传信部召开枢机会议，再次讨论卜弥格出使事，出席枢机共十五位，决议将此事交审查委员会审查。9月6日，委员会成立，由Pallotta、Bichi、Albizzi、Chigi、Assolini等五位枢机组成。○李科罗(Victorio Riccio)由多明我会派至厦门宣教，蒙郑成功特准，在官邸对面建立教堂。

李科罗，又译利畸，他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1635年入多明我会。在罗马多明我会受训以后，曾在本会任教。1643年决意来东方传教。1648年抵马尼拉学习华语七年，后来厦门。

龙华民神父的著作有：(1)《死说》。(2)《念珠默想规程》。(3)《圣教日课》，为一本袖珍式祈祷文，1602年初刻于韶州，1793年有北京刻本。(4)《圣人祷文》。(5)《圣母德叙祷文》。(6)《急救事宜》，(7)《圣若瑟法行实》，1602年初刻于韶州，内容为St. Banlaam及圣St. Josaphi事迹。(8)《地震解》一卷，1624年、1679年刻于北京。(9)《灵魂道体说》一卷。(10)《答客难十题》，1642年刻于定州。(11)《有关中国人在宗教问题上的若干要点》，1701年刻印于巴黎。

1655年(顺治十二年)

1月7日，教宗英诺森十世逝世，继任者为亚历山大七世。○3月，顺治帝将阜城门外利玛窦坟墓两旁的坟地赐给汤若望，以为其将来的葬所。○7月，马尼拉多明我会省会长派罗文藻偕同会士郭洛那多(Domingo Coronado)、罗特理(Diego Rodriguez)及范莱(Raimundo del Valle)等回国，时清兵与郑成功在闽浙沿海一带激烈征战。○是年，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志》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计图十七幅，文字一百七十一页，其中中国全图一幅，分省地图有北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五幅，末尾附有日本地图一幅。地图册的地志部分对于各省的新老地

名、河流、运河、矿藏、人口、赋税、主要城市、渔业、建筑、天文、宗教、社会风俗、政府、礼仪、山脉等均有介绍。该图对于中国海岸线的描绘比其他任何地图更为准确，山东半岛、杭州湾喇叭口、珠江口均显现出来，珠江、黄河、长江的流向也大致准确。其准确性是基于作者的实测，从1647至1650年，卫匡国在中国十五个省中走了七个省，收集各地的经纬度达一千七百余处，可谓空前。书末附有古利乌斯(Golius)论中国(de Catayo)及卫氏《鞞鞞战纪》三十六页。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卫匡国为“中国地理学之父”。○传信部审查委员会于9月24日开会，讨论卜弥格出使事，决议回复明廷。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决定接见卜弥格，又于12月18日书信答复南明皇太后和太监庞天寿。○波兰籍耶稣会士穆尼阁(Smogolenski)与利玛弟(Matthias de Maya)及王若翰(J. B. Brando)至海南岛传教，在琼州、临高、定安付洗三千人。

教宗复明太后书(原文为拉丁文)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复书信仰耶稣基督之信女，大明皇太后烈纳。

可爱信女，谨候安好，锡予宗座遐福。

展读来书，词美情切，具悉天主之慈善，无量无限，出太后于暗昧之幽谷，登之于真理光明之坦途，教之以圣道之真谛，俾识至理之真原。此至理之真原，乃造物之天主。虽因人罪而震义怒，然慈心常存，施恩不匮，以成真理之美果。太后昔在天主前，本为微小之罪女，天主惠然眷顾，盖天主宁欲人敬其为仁慈之主，而不乐人惧之为军旅之帅、判罪之王也。夫一偌大之邦，昔不为人所知，邪魔曾据而有之，今则臣服耶稣基督，则天主神能广大深远，谁又能测之乎？昔每逢人谈此偌大之邦，余自信如闻稗史小说之语，盖大邦距此既远，又因信从邪神之教，乃使人少知是邦之事矣。然谁能相信真理之道，终能进入此绝域之邦矣。此绝远之域，与吾人远隔重洋，波涛汹涌，高山重重，沙漠无垠，旅路既遥，危险何堪胜计？天光晨辰，恍若别一天地。此天地于重洋广漠之尽头，复高树禁门，严禁外

人走入国境,使看重灵魂之救赎贵于印度玉宝金银之人,亦不能进城布道。然今日天主已庇佑若干自动献身之人,离乡弃家,无名利之思,无艰难之惧,远来此邦,宣传真理,使汝等识真理之途,是诚天主大恩,允宜衷心钦谢,永志不忘。且宜诏诫子孙,使常忆主恩,常守主诚,以增彼等信主依主之情。太子公斯当定暨官中多人,追随太后芳表,信仰真主,闻之不胜欣喜。又念来日信主之人日增月盛,皇帝可使全国弃邪神之教,余心之乐更增万倍。兹以慈父之情,祝福太后及皇太子,且如太后所请,代祷天主,赐太后之国土重归一统,永享和平,皈依信仰,能与余一心一德焉。

发自罗马圣伯多禄殿侧。1655年12月18日,登基第一年。

教宗复庞太监书(原文为拉丁文)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复书可爱信子庞天寿,永历太监,大明钦命总督粤闽恢剿……

可爱信子,兹候平安,锡赐宗座遐福。

天主之仁慈,自东迄西,自南至北,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在一未识耶稣真道之国,学者以圣道为嗤,忽烛照王室一太监,权高财富,使认识真主,恭领圣洗,身为天主之义子,名列天国之王庭,余心之喜,汝难忆料。汝既以天主赐汝之恩,衷心喜悦,宜朝乾夕惕,深明主恩之意。然汝如仰慕降生成人、以身作则之救主,追随圣表,则汝感谢主恩之责则易为矣。望汝誓志忠诚,使在汝国始兴之圣业能奏全功,则汝等之光荣书于圣经矣。圣道之光明,远路不能阻,海涛弗能拦,地虽僻远,人虽蛮化,圣道亦可照之。且圣道真光,夹有仁爱之风,仁风吹草,所过必偃。余深知汝信教虔诚,艰难困苦不能屈汝信心,故余以慈父之情,接汝于怀中,欣然赐汝宗座之遐福,祝此遐福常与汝偕焉。

发于罗马圣伯多禄殿侧。1655年12月16日,登基第一年。

1656年(顺治十三年)

3月22日,卜弥格带着教宗的复书,从葡萄牙里斯本搭船返回中国。同行者有八名神父,其中有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和鲁日满(Franciscus de Rougemont)两位神父。奥地利耶稣会士白乃心(Joannes Grueber)与德国神父苏纳(Bernardus Diestel)离开罗马,经亚美尼亚、波斯、忽而谟斯,再搭船前往澳门。○3月23日,圣职部根据教宗亚历山大七世颁布敕谕,批准卫匡国所请求容忍祭祖祭孔的做法,“……应准许中国教友参与上述礼仪,因为这似乎是民间和政治礼俗”。但对以前教宗英诺森十世的禁令,亦未予废止。○是年,穆民阁去世。

1656年3月23日圣职部给中国传教士的部令

……

3) 问题:基督徒文人考得学位后是否能在尊孔堂内举行接受各级学位的仪式?尊孔堂里没有有关偶像崇拜的司祭人员,尊孔堂里的一切都不是为偶像崇拜者而安排的,只有儒生们和文人们来对孔子行拜师礼。他们的礼仪,自始至终都是公认为民俗性的和政治性的,仅仅是为了表示民间世俗的尊敬。

所有考中的儒生们一起进入尊孔堂里。学官们、翰林们和考官们等在那里。他们在孔子的名牌前一起按照中国人的习俗鞠躬行礼。他们不奉献任何东西。他们所做的和所有的学生得到的荣升后对他们的还活着的老师所做的是一样的事。因而,对孔子行了拜师礼后,学官们授予他们各级学位,然后,他们就退了出去。除此以外,尊孔堂是一个健身房,严格地说不是所谓的庙宇,除了儒生,谁也不能进去的。

根据上述解释,圣职部规定,允许中国基督徒参加上述的仪式。这种仪式看来纯粹是民俗性的和政治性的。

4) 问题:基督徒们是否能参加文人们不带任何迷信意义的纪念死者的仪式?

另一个问题:基督徒是否能和教外亲戚一起履行被许可的仪式?

还有另一个问题:基督徒们尤其在公开表明其天主教信

仰以后能否出席教外人士进行的迷信活动？他们不能合作或赞同教外人士做的事。但是，如果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缺席的话，必然受人注意，这会造成敌视和仇恨。中国人并不认为亡灵是鬼神，他们并不希望或要求从亡灵那里得到什么。

他们有三种方式纪念他们的故人。

第一种方式，某人死了，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教会人士，他们总要在死者家中设置祭坛，放上亡者的遗像或者写有死者名字的牌位。在祭坛上点上蜡烛、乳香，放上鲜花。亡者的遗体躺在祭坛后面的棺材里。

所有前来吊唁的人都要在牌位或遗像前跪拜，磕头三四次。他们匍匐在地，额头碰地。他们点上蜡烛和乳香，插到祭坛上，或者放在遗像或牌位前。

第二种方式，一年两次到祠堂去。中国人不把祠堂叫做庙。这是真正家族的纪念堂。只有身居高位或富有的亲属才能有祠堂。故人的遗体不葬在祠堂里，而是葬在山上。祠堂里只放一张显耀的老祖宗的像，然后在台阶上按照辈份自上而下排列先人们的牌位。牌位上都写了该家族的先人们各自的名讳，他们的官职、头衔、性别、年龄、忌日，甚至他们儿子、女儿的名讳等。所有亲属一年两次到祠堂去，较富裕的亲属都带酒菜、蜡烛、乳香去供祭祖先们。穷人们没有力量设立这样的祠堂。他们把祖先的牌位供在家里专门的位置上，甚至为了节省地方放在和圣像同一个祭桌上，因为屋子太小了。他们并不崇拜这些牌位，也不放任何供品。他们把祖先的牌位放在那儿仅仅是因为没有另外的房间放它们了。中国人上述的祭祖仪式只是在祠堂里举行，如果他们没有祠堂，也就省却了这些仪式。

第三种方式：是祭坟。根据中国的法律，坟地都在离城很远的山上。子孙们、亲属们每年至少去祭一次坟，在四月初前后。他们去清除坟上的杂草、垃圾，他们像上述第一种方式一样哭泣、哀诉、磕头。他们摆上酒菜供祭先人。他们哭完后就把酒菜都吃了。

圣职部了解了上述情况后,规定中国的入教者可以进行这种纪念他们先人的仪式,甚至,可以和教外人士一起纪念,只要他们不做任何迷信的事情。甚至当教外人士做迷信的事情时,只要没有颠覆的危险,和否则不能避免他人的憎恨和敌意时,中国基督徒公开表明其天主教的信仰以后也可以在场。

教宗同意了对上述的问题的答复和决定。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5~6页]

1657年(顺治十四年)

2月,顺治帝巡视南苑,经宣武门内天主堂,顺治亲赐“通玄佳境”匾额,以及《御制天主堂碑记》。10月,汤若望以年高请辞职,但顺治帝下谕慰留:“汤若望供职有年,勤劳懋著,着益殚心料理,不必请辞印务。”○卫匡国从葡萄牙里斯本起程回国,同船十七名传教士有十二名死在惊涛骇浪中。

顺治帝《御制天主堂碑记》

自汉以还,迄于元末,修改者七十余次,创法者十有三家。至于明代,虽改元授时历为大统之名,而积分之术,实仍其旧。洎乎晚季,分至渐乖,朝野之言,佥云宜改,而西洋学者,雅善推步。于时汤若望航海而来,理数兼畅,被荐召试,设局授餐。奈众议纷纭,终莫能用。岁在甲申(1644年),朕仰承天眷,诞受多方,适当正位凝命之时,首举治历明时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台测验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独与若望歆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1645年)孟春之望,再验月食,亦纤毫无爽,岂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创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历,敕名时宪,颁行远迩。若望素习泰西之教,不婚不宦,只承朕命,勉受卿秩,洊历三品,仍赐以通玄教师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职。都城宣武门内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复取锡赉所储,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膺者,尧、舜、

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但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黼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赐名曰：通玄佳境，而为之记。

〔转引自渠志廉：《汤若望司铎年谱》，《磐石杂志》第1卷第9、10、11期，1934年〕

1658年(顺治十五年)

清兵出遵义由水西取鸟撒，永历帝败走永昌。○卜弥格抵达暹罗，想去澳门，澳门葡人恐得罪清廷，遣人通知，不准进入澳门。卜弥格不得已，由暹罗赴安南，7月，由红河至河内。11月20日，卜弥格在河南致信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元首，称已至中国安南边境，希望从那里进入中国，觐见永历帝。但南明败亡已定，卜弥格无路进入云南、广西。○许纘曾外补江西驿传道副使，理邮政，商民便之。迎母许太夫人于南昌署中，并建天主堂。○是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颁布通谕，为中国、安南东京、暹罗任命了首批两名宗座代牧 (Vicarius Apostolicus)，并且划分了管辖教务区域。这两名代牧是：(1)巴禄，汉名陆方济 (Franciscus Pallus)，安南东京宗座代牧，兼理中国南方滇、黔、湖、桂、川五省教务。陆方济为巴黎外方传道会创始人之一，原为法国图尔圣马力诺议事司铎，1658年在罗马祝圣。(2)郎主教 (Lambert de la Motte)，为交趾宗座代牧，兼理中国浙、闽、赣、粤四省教务。他在抵华前死于暹罗。传信部给宗座代牧下达三项指令：(1)尽可能多地培养本地神职人员；(2)要尽量适应本地文化传统，同时避免卷入当地政治事务；(3)重要问题，如主教祝圣，要征询罗马的意见。○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 (Ferdinandus Verbiest) 与卫匡国同船从欧洲回到中国澳门。

南怀仁，字敦伯。1623年10月9日生于比利时库尔特来 (Courtrai) 附近一个名比登 (Pitthem) 的小村。早年曾在布鲁日



南怀仁像

和卢汶攻读科学和哲学。1641年9月29日，他加入马利纳(Malines)的耶稣会初学院，曾任文学和修辞学教师。他立志去外方传教，于1657年，随同卫匡国神父从欧洲启程东来，他搭乘印度总督安·德·戴肋梅纳斯的船队东行，抵达澳门。

1659年(顺治十六年)

3月，阳玛诺在杭州去世，葬大方井。

清兵入云南，永历帝走腾越，李定国军退潞江，永历帝又走南甸，抵囊木河，入缅甸，至赫径，居士著草屋中。○卜弥格在安南与广西交界处，得知清廷征服全中国的消息，百感交集，心力交瘁，患重病，于8月22日去世。○5月22日，方德望神父在汉中去世。○南怀仁由澳门至西安传教。○是年，教廷传信部指示越南、印支新代牧，要求他们遵从当地的礼仪和风俗。同时教廷设立东京(中南半岛东京湾)及越南两个代牧区，兼理中国云南、贵州、湖广及四川传教事业。○是年，比利时耶稣会吴尔铎(Albertus d'Orville)、奥地利耶稣会士白乃心(Joannes Grueber)抵中国。○柏应理与鲁日满抵澳门，进入内地。

1659年传信部关于传播信仰的指令

只要中国人不公开反对宗教和善良风俗，不要去尝试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方式。有什么事情比把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的东西输入中国更傻的呢？不要把这些东西，而是要把信仰输入中国。信仰并不是要反对或者摧毁任何民族的礼仪习俗，只要这些礼仪习俗并不是邪恶的。恰恰相反，信仰要把它们保持下去。

一般来说，人们都珍惜及热爱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好。这是人之常情。没有比去改变一个国家的习俗更能引起对方的敌视和疏离的了，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民族。当你取消对方的习俗而用你自己国家的习俗取而代之时，这点尤其千真万确。不要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方式不同而藐视中国人的方式，反而还要尽力做它们习惯的事情。

赞赏值得赞赏的事情，不值得赞赏的事情不必去吹捧它。小心谨慎要求人们，不轻易下判断，或者至少不要仓促地、急躁地妄加指责。明显的邪恶，最好示意不同意，而不要用语言予以除掉。要抓住思想上具备接受真理的时机，再逐步消除邪恶。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6~7页〕

阳玛诺主要著作：(1)《圣经直解》，1636年刻于北京。本书为周年中各主日及节日规定诵念的圣经解释本，附有遵守教规思考，取材早期教文著作。(2)《天主圣教十诫直译》，1642年、1659年、1738年北京刻本。(3)《代疑论》一卷，1622年北京刻本。(4)《景教碑译》，1644年杭州刻本。(5)《圣若瑟行实》一卷，1674年刻本。(6)《圣若瑟祷文》。(7)《天神祷文》。(8)《轻世金书》二卷不全，1640年刻本。为 *Imitation de N. S. J. C* (*Imitatione Christ*) 中译本。(9)《默想书考》。(10)《避罪指南》。(11)《天问略》一卷，1615年北京刻本。

卜弥格有多种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学术：(1)《中国特产植物》，献给奥地利国王雷奥博特 (*Leopoldo Ignatio*)，介绍二十多种中国特有植物。(2)《中华帝国十字架的光荣》，附有景教碑。(3)《中国天主教状况及皇室皈依略记》，1645年巴黎版。(4)《医钥，中医脉搏学理》，此书在埋没二十多年后，由东巴达维亚医师公会主任 *Andre Cloyer* 搜集刊行。后经柏应理神父校订，1686年付印。全书分为A. 论脉搏四章，从中文译出。B. 按脉要诀。C. 由学习中医的欧洲人记录的中医拾零。D. 在中国学习中医的欧洲人通信摘要。E. 看舌苔色泽诊断疾病法。附有图画。(5)《中华帝国全图》。(6)《中国动物志》。

1660年(顺治十七年)

教宗选高多冷提 (*Ignatius Cotolendi*) 为中国南京宗座代牧，兼理苏、豫、晋、鲁、陕、东北以及高丽教务，他在抵达中国之前死于西印度群岛。○陆方济主教从欧洲起程前往中国。○汤若望于

利玛窦坟茔旁建造的教堂告竣。○南怀仁来京修历,5月9日从西安出发,6月9日抵达北京。○许缙曾任四川参政,承母意建堂于成都。○卫匡国译著《灵性理证》(《灵魂理证》)在杭州刊刻,为 Lessius 名著 *De Providentia Numinis et Animi immortalitate* 之一部分。

1661年(顺治十八年)

清廷杀郑芝龙,郑成功占据台湾,多明我会士亦来台湾传教。○吴三桂进军缅甸,缅人于阿瓦执永历帝献于吴三桂,押回云南。○是年,顺治帝病逝,康熙帝即位。汤若望奉旨改为“通微教师”。顺治立皇嗣时,曾征询汤若望意见,若望以康熙曾出痘,力主之,遂一言以定。6月,汤若望根据耶稣会总会长尼克尔(P. Goswin Nickel)的指示,指派白乃心以及奥地利传教士吴尔铎,另带一回民译员,自西安府出发,经西宁、青海,在沙漠旅行三个月进入西藏,在拉萨居留两月以后,然后翻越雪山至尼泊尔加德满都,经孟加拉至阿格拉(Agra)。当时荷兰人封锁澳门,海路不畅,汤若望指派他们从西藏回欧洲,亦有探路之意,此行目的是向教廷报告中国礼仪问题。○是年为汤若望七秩寿辰,京中友人及官吏文士相与为贺,诗文酬酢,计有金之俊、魏裔介、龚鼎孳、胡世安、王崇简、王铎、沈光裕、吕缙组、庄同生、艾吾鼎、邵夔、吴统持、陈许庭、潘治、钱路加、董朝仪等。○卫匡国在杭州天水桥附近所建教堂完工,该堂建筑得总督佟国器支持,肃亲王妾赵氏(圣名犹弟大)捐输,教堂之壮丽冠于全国。时杭州教务由洪度贞(Augeri)主持。6月6日,卫匡国去世,葬方井南。○潘国光向耶稣会总会长尼克尔写信,说每年有二三千人人教。

卫匡国主要著作有:(1)《天主理证》一卷,用推理法证明天主实有。(2)《灵魂理证》一卷,用推理法证明灵魂的不死不灭。本书取材雷西乌斯(Lessius)著作。以上二书合订一册,题为《真主灵性理证》,1918年上海土山湾再版,马相伯校勘并序。(3)《速友篇》论交友之道。作者从古人西塞罗、塞涅卡和克利巴尼神父(P. Scribani)著作撷取精华编成。1661年刊于

杭州。(4)《中国新图志》(内容见本书 1655 年记叙)。(5)《中国上古史》记载中国自古以来直至耶稣基督降生大事。1658 年慕尼黑出版,1692 年译成法文出版。(6)《鞑靼战纪》(见本书 1654 年记叙)。(7)《中国教友的人数及品德简报》,1654 年罗马出版,为卫匡国呈传信部枢机主教的一份报告。

1662 年(圣祖康熙元年)

吴三桂在昆明命兵士以弓弦绞死永历帝及太子慈烜,太子时年十五。马太后亦被缅甸人送至吴三桂军中,押至京师,路过黄茆驿时,在车箱中望见王皇后,但不得交谈,只能以手示意。一说他们同时“扼喉以死”。王太后和宫监庞天寿已先在云南去世。○3 月,郑成功在台湾召见李科罗,任其为特使,携带郑成功致菲律宾总督曼利克·特·拉喇(Manrique de Lara)书,5 月,李科罗抵马尼拉,洞内华人多被杀害或驱逐。郑成功大怒,欲派兵征菲,但于 6 月 23 日去世,其子郑经继位。李科罗回台湾,来到鸡笼(基隆),不少土人自山中来,携有玫瑰经、念珠及圣像等物,要求付洗,李科罗一一为其付洗。○是年,汤若望撰成《民历补注解惑》一书,但此书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才由南怀仁校刊印行。该书所署汤若望的官衔为“敕赐通微教师、光禄大夫、加从一品通政使司通政使、掌钦天监印务”,为文献中所载汤若望的最高官衔。○4 月 8 日,吴尔铎在阿格拉去世,白乃心继续前行,由一名叫洛特(Henricus Roth)的传教士陪同,由印度、波斯、土耳其而抵斯米纳(Smyrne),然后登舟航行至梅新(Messine),终于到达目的地罗马。在基尔旭(Kirchei)所编《中国大观》(*China illustrata*)书中,曾收入吴尔铎、白乃心二人的旅行报告《从中国到莫卧儿旅行记》(*Itere China in Mogor*),报告对各民族之服装、建筑、宗教、风俗均有介绍,并一一绘制成图,共二十七幅。○殷铎泽(P. Prosper

白乃心所绘拉萨图



Intoretta)与郭纳爵(P. Ignatius a Costa) 翻译《大学》与《论语》，题为《中国之智慧》(*Sapientia Sinica*)。○利类思《天学传概》在北京出版，驳斥杨光先的攻击。论证天主诫命的完美性和永恒性，并以大秦碑及利玛窦的史事说明天主教在华的悠久历史。

1663年(康熙二年)

4月8日，李科罗奉郑经命，再度出使马尼拉，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报告郑成功死讯，并表示返台以后力劝郑经与菲岛通商。总督盛礼款待李科罗，许华侨收回产权，并嘱李科罗带回致郑成功嗣子郑经书。该书作于7月10日。李科罗返台以后，再赴厦门。郑经对天主教并无好感，他派李科罗出使，纯为政治考虑。○柏应理司铎自湖广抵江南，得许缙曾太夫人捐献，曾重建不少教堂。○北京及其近郊有教徒一万三千人。○钦天监监副、汤若望门生李祖白撰《天学传概》。○郭纳爵著《原染亏益》刻印，论原罪及救赎。又著《身后编》二卷及《老人妙处》一卷。

1664年(康熙三年)

9月15日，杨光先在鳌拜等四大臣辅政的新的政治环境下，上请诛邪教状，掀起“康熙历狱”。诉状要点如下：(一)汤若望本如德亚国谋反贼首耶稣遗孽，假修历为名，阴行邪教，遍布京师及各地，共建三十余堂；(二)历官李祖白背叛本国，造有妖书一巨册，谓伏羲乃出邪教子孙，六经四书皆是邪教法语微言，而作妖书主谋者汤若望，谋犯共有利类思、许之渐、南怀仁、安文思、潘进孝与许谦；(三)汤若望藏身京师，窥伺朝廷机密，暗与香山澳(澳门)勾连；(四)于《时宪历》面题书“依西法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同时，杨光先进呈顺治十六年所著之《摘谬论》、《选择议》，攻击汤若望所传人之西洋天文历法，并严责汤若望选择荣亲王(顺治宠妃董妃所生，出生三月夭折)葬期失当，导致帝、妃不久相继去世。杨光先又将李祖白之《天学传概》一本、《邪教图说》三本、金牌一面、绣袋一枚、会期一张、《正国体呈》稿一本、《与许之渐书》稿一本，一并呈礼部。9月25日，清廷密旨

将汤若望及钦天监历科李祖白、杜如预等三十余员逮捕，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亦被捉拿问罪，由礼、吏、兵、刑、三法司等衙门审讯，又由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分别拟斩立决，各省教士由地方官拘禁候处，汤若望被提审二次，定罪凌迟。○是年，潘国光在江南的堂口内组织了多种善会：(1)“耶稣苦难会”，专为成年教徒，会员为热心教友，共聚一堂，默想耶稣受难事迹。有三十二个支会；(2)“天神会”，专为少年儿童，有四十小组；(3)“圣母会”，专为女信徒的，共一百四十个小组；(4)“圣类思会”，专为青年学生的；(5)“圣依纳爵会”，专为知书识字文人学士的；(6)“圣方济各会”，专为传教员的。后面三个会各有一组。还有一些秀才先生，每逢初一集会一次，各自准备一篇讲稿，内容有关基本教义，如内容无差错，就派到没有神父出席聚会的堂口宣讲。○许缵曾在河南就任按察使，时河南西教士恩理格(Christianus Herdtricht)开堂布教，许氏特新堂，奠定天主教在河南基业。○第一位中国籍耶稣会司铎郑维信(玛诺)在葡萄牙科晋铎(郑氏祖籍澳门，1633年5月生，1651年在罗马入耶稣会圣安德肋初学院，两年以后入罗马公学深造)。○宗座代牧陆方济、郎主教在暹罗都城大城府(Ayudha)建立总修院，专门培养亚洲神职人员。○从1650年至1664年，全国新增教徒十万人。是年全国教徒共二十五万四千八百人。

杨光先(1595~1669)，江南徽州府歙县人，明朝新安所千户。个性倔强，自认“禀中不和，气质粗暴”。明末时，他曾弹劾吏科给事中陈启新不成，又抬棺疏劾中极殿大学士温体仁，结果被谪戍辽西，从此得“敢言”之名。杨光先对历法并不精通，自认“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也“未习交食之法”，但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656年(顺治十三年)，杨光先从歙县来到北京，两年以后，见到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从此有弹劾天主教之念。于1660年(顺治十七年)作《摘谬论》，指摘汤若望新法十谬，又作《撰择议》，指责汤若望选择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之谬，并亲赴礼部呈告。但被礼部官员渥赫、王崇简驳回。同年，杨氏又

作《辟邪论》上、中、下三篇，刊行五千余册，批驳天主教，指出天由二气结成，非天主所造。耶稣是谋反罪魁，因事败正法，绝非造天圣人。并指汤若望“非我族类，其心必殊”。次年，杨光先又作《正国体呈》，又被通政司驳回。1661年年初，杨氏又赴礼科控告汤若望在《时宪历书》封面上写“依西洋新法”，目的是“借大清历以张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又指汤若望借西洋新法行邪教，而“谋夺人国是其天性，今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蜚之防”。

1665年(康熙四年)

4月中旬，辅政大臣拟定汤若望凌迟处死，并准备驱逐全国各地教士。但4月13日，天空中突然出现一颗彗星，两天以后上午，当判处汤氏极刑的公文送到皇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手中后不久，北京突然发生地震，皇宫与全城为之震颤，同时伴以飞沙走石，黑尘蔽天，地震持续三天。北京天主教徒认为此系对大冤狱的警示，太皇太后以汤氏为先帝之重臣，力主开释，同时被释放的有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西洋教士。但辅政大臣仍将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五位奉教历官斩首，为教会书作序者或为造堂捐款的大员御史许之渐、臬台许纘曾、抚台佟国器皆被罢黜。○耶稣会士二十五人，方济各会一人，多明我会四人由各省拘送京师东堂，再押往广州。○利类思著《不得已辩》，驳斥杨光先。○是年，由于西教士被逐，多明我会国籍神父罗文藻一人承担全国大部分教牧工作。

安双成著《汤若望案始末》一文，历数汤若望、杨光先双方争论要点：

在审理本案过程中，汤若望、杨光先多次在法庭上交锋，杨光先从天文、历法、地理、宗教诸方面对汤若望进行批驳，汤若望也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现将双方争论的要点罗列如下。

1. 进历之争 中国历代王朝都很重视制订历书，视其为国家兴盛之象征。杨光先指责汤若望只呈进二百年，是其不忠，因为“天将笃祐皇家，享无疆之历祚”，应该推算出“万年历

书,才能谓为臣子”。汤若望指出,以新法推算出的历书,“不仅有二百年,亦有无疆年表”,之所以分为前二百年历书、后二百年历书,只是为了方便而已。

2. 《时宪历》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五字之争 杨光先说,汤若望在颁行天下的《时宪历》封面上特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是借大清之历以张大其西洋,而使天下万国晓然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实欲天王西洋而鲁大清也”(原文如此)。汤若望指陈,在《时宪历》封面上所写“依西洋新法”五字,是“掌印戈承科之事”,并非他自己有意书写。

3. 时刻之争 杨光先说,按旧法将一昼夜分一百刻,再分为十二时,每时为八刻三十三秒三十三微三十三纤三芒。而新法不知计算秒微纤等数,将一时改为八刻。又说,中国“自古不用九十六刻,而用百刻计算”,这是历代成法。汤若望说,将百刻分为十二时,必有余数,难以计算。将九十六刻分为十二时,则无余数,不难计算。太阳行一昼夜,或以百刻计算,或以九十六刻计算,均不增减,区别仅在于计算之复杂与简便。

4. 置闰之争 杨光先指责新法于顺治十八年置闰七月是错误的,应置闰十月;汤若望则坚持应置闰七月,而置闰十月是错误的。为此,汤、杨二人在法庭上进行了一次辩论。杨光先说:“一月之内有一节气、有一中气,此常月之法也。有一节气而无中气,则以上半月为上月中气,下半月为后月之节气,此闰之法。”据此,他进一步分析顺治十八年历书,他说,若照新法推算,闰七月十四日酉时正初刻交白露,八月节。那么,十四日以前作七月用,十四日以后作八月用,这就是有节气而无中气的置闰法。但是,新法又定十二月十五日申时正三刻交立春,正月节。倘若果真如此,此月有节气而无中气,与置闰七月法相同,岂不是一年有两个闰月吗?而实际上,顺治十八年实闰十月,新法谬闰七月。汤若望说:“凡闰之月,太阳之躔某宫,先后会月者三。是本月之内,太阳不及交宫,因无中气,遂置为闰月。乃旧法置闰用平节气,非也。新法用太阳所躔天度以定

节气,与旧法不同。”他指出,“某年中气若见于下月内,则某月无中气,仍属下月之中气,故置上月为闰。”因此,“顺治十八年七月之后一月应为八月,但八月之中气仅见于下月初,是以置七月之后一月为闰七月。至十二月之中气,既见于十一月三十日,又怎可以置十一月为闰?”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中气者,即指进入宫宿矣。每月皆有宫宿,不可有误。十一月之后一月已入十二月宫宿,而七月之后一月尚未进入八月宫宿,是以置闰七月者,无所质疑矣。”因此,置闰十月谬。审理此案的各大臣对二人观点孰是孰非无法判断,所以又传钦天监各官、博士等二十余人,当堂讯问顺治十八年应如何置闰。结果,有曰按新法推算应置闰七月,有曰按旧法推算应置闰十月,终无定论。

5. 节气之争 杨光先说:“按节气,当从赤道十二宫均分,每一节气该一十五日二时五刻一十七秒七十微八十三纤。今新法以黄道阔狭之宫算节气,故有十六日、十五日、十四日之差,所以置闰、立春皆错。”汤若望说:“旧法平分节气,以十五日为限,此与天数不合。新法则按天度推算,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或十六日置一节气,多寡不一。”

6. 二至二分之争 杨光先说,至分之数,时刻均齐,无长短不一之差。自冬至至夏至,夏至至冬至,自春分至秋分,秋分至春分,均为一百八十二日七时半,这是因为太阳日行一度所致矣。汤若望说不然,自冬至至夏至为一百八十二日二时,夏至至冬至为一百八十三日一时弱;自春分至秋分为一百八十六日九时二刻十分弱,秋分至春分为一百七十八日五时五刻五分,这是因为太阳之行迟疾所致。

7. 太阳行迟疾之争 杨光先说:“太阳之行,原无迟疾,一昼夜实行一度。夏至太阳躔申宫参八度,参八出寅宫入戌宫,昼行地上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昼长,夜行地下度一百四十六度强,故夜短。苟因夏至之长而谓太阳之行迟,则夏至之夜短,太阳应行疾矣。迟于昼而疾于夜,有是理乎?冬至太阳躔寅宫箕三度,箕三出辰宫入申宫,昼行地上度一百四十六度强,故昼短,夜行地下度二百一十九度弱,故夜长。苟因冬至之

昼短而谓太阳行疾，则冬至之夜长，太阳应行迟矣。疾于昼而迟于夜，有是理乎？”汤若望说：“昼夜之分，历家皆从子午起算，一岁行度，日日不等，其差较一刻有奇。新法独明其故有二，一缘黄首道夏迟冬疾，差四分奇；一缘黄赤二道广狭不同距，则率度必不同分也。”又说：“夏至昼长夜短，冬至昼短夜长者，与太阳之行迟疾有关，即与夏至太阳在地上所行轨道长、在地下所行轨道短有关。冬至反之，在地上所行轨道短、在地下所行轨道长。天下各省昼夜长短不一，北辰与各省相距亦不一。若按杨光先所言地为方者，则各省北辰高应为相同，诚然如此，各昼夜长短亦为相同矣，杨光先言太阳入戌宫，行地上度二百二十九度，诚然如此，各省所见北辰皆相同矣，岂有此理？杨光先所言冬至、夏至亦皆非矣。”

8. 更调觜参之争 杨光先说，四方七宿，俱以木、金、土、日、月、火、水为次序，“今汤若望更调参水猿于前、觜火猴于后，古法火、水更调矣。”汤若望说：“在《恒星历指》、《新法表异》以及顺治十四年呈部声明中皆言称，将火、水分为觜火猴、参水猿者，皆系为人为定编次序矣。诸曜渐次东移，实行天度，自然于新法内定参水猿在前、觜火猴在后。查诸考论，务必从天，每日抬头可见，全以为凭，无须多言。若按火、水次序，不更调参水猿于前、觜火猴于后，则必不合于天。”

9. 删除紫气之争 杨光先说：“古无四余，汤若望亦云四余自隋唐始有。四余者，紫气、月孛、罗睺、计都也。如真见其为无，则四余应当尽削。若又隋唐宋历之为有，则四余应当尽存。何故存罗、计、月孛而独删一紫气？”又说：“夫紫气者，乃东方木生之气，万历丙辰年东方出现一道白气，直冲紫微垣，经观测后，奏以紫气所变。不久，太祖皇帝兴兵，不到三十年，世祖皇帝进入北京一统万邦。紫气乃我朝创业之吉祥星宿，而汤若望将四余中独删去紫气一余，不知其为何意？”汤若望说：“紫气一余，已于顺治十四年呈部说明过，”

10. 颠倒罗、计之争 杨光先说：“罗、计自隋唐始有，而新法以罗为计、以计为罗，但不知若望何以知隋唐之罗是计、

计是罗耶？罗属火，计属土，火、土异用，生克制化各有不同，令民何所适从。”汤若望说：“顺治十四年曾将此事已呈部说明。罗睺、计都之名，原所有之，实因月之交行所致，故又称为正交、中交，亦有称为龙首、龙尾，或天首、天尾。盖亦以初宫为首，月行而交，谓为正交矣；以六宫为尾，月行而交，谓为中交。罗睺一星自初宫起计算，而计都一星则自六宫起计算，首尾分明，正中成次，杨光先何以妄言罗、计颠倒？若光先言罗属火、计属土，则天上象体数理无凭可稽矣。”又说，所谓各有吉凶者，“惑世诬民，莫此为甚”。

11. 中星之争 杨光先说，满天星宿皆拱天而不动，惟独七政日、月、金、木、水、火、土可动，若言二十八宿动而不在原处，则是见汤若望不知天象矣。又说，二十八宿及群星皆随天而行，一日过一度，久而久之，即为三百六十五日三时弱，比太阳差一分五十秒，此岁差矣。久而久之，经过六十六年又八月之后，天比太阳退度。汤若望说，宗动天自东往西移动，上列十二宫，此自古不变者。众星天自西往东移动，只其移动甚缓，每岁各行五十一秒，须日久方有感觉，各星宿向东移动，久而久之，自然与宗动天错开，故曰岁差。所谓子、午、卯、酉四宫，则为不动者矣；星、房、虚、昴四宿，则为可动者矣。动则不在原处。又说，倘各宿不往东移动，何以尧时冬至太阳在虚，今时冬至太阳在箕，而虚东移五十度？

12. 选择荣亲王葬期之争 杨光先说，汤若望等人不用正五行选择，而用《洪范五行》选择荣亲王葬期，因而年犯三杀，月犯生杀，日犯党杀，时犯伏吟，四柱无一吉者。又说《洪范五行》又名《天蛮经》。汤若望等人则说，历来选择都用《洪范五行》。

13. 立春前日起管之争 杨光先说，每年十二个月，有二十四节气，都以律管葭灰观测，此乃定理。康亲王杰韦等也说，汤若望等不遵《会典》旧例，每年立春前日起管，谎疏春气已应。汤若望说，飞灰观测，置而不用已久。再者，地有硬软干湿不平现象，实难求其吻合。又说，定例于立春前日起管，况且

立春前后,空气中已有不冷不热之地气,此时春气已应。

14. 地球圆说之争 汤若望曾刻印舆图十二幅,标有官分度数,杨光先见此极为恼怒,认为“天主教得行于中国”,就是因为推行“西洋新法”,而“新法之妄,其病根起于彼教之舆图”,因此他把汤若望绘制的舆图比喻为制造种种罪孽之根,而将自己的观点比喻为一面镜子,特撰写《孽镜》一文,以批驳汤若望的所谓错误观点。杨光先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是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确实让人解释不清。譬如,汤若望刻印的舆图是球体的,于是杨光先说,如果地球是大圆球,“万国错布其上下四旁,球之大小洼处,即是大小洋水附之”,那么岂不是“球上国土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人之脚心相对”吗?“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侧立之人”,只有“螺虫能横立壁行,蝇能仰栖,人与飞走鳞介咸皆不能”。又说:“予顺立于楼板之上,若望能倒立于楼板之下,则信有足心相对之国。”他又说,水是天下最平的,不平则流,“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难道有“圆水、壁立之水、浮于上而不下滴之水”。他又比喻满盂之水说,“若望能侧其盂而水不泻,覆其盂而水不倾,予则信大地有在旁在下之国土”,不然“则大地以水为平,而无似球之事”。他说,天和地“如二碗之合,上虚空而下盛水,水之中置块土焉。平者为大地,高者为山岳,低者为百川,载土之水,即东西南北四大海”。

15. 天主教之争 汤若望等人说:“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而来中夏者为伏羲氏。”又说:“中国太古之时,曾有天主教,秦始皇焚书之后,天主教也在中国失传。中国四书五经上所载‘上帝’者,就是天主教所供奉的‘天主’,上帝与天主,虽字不同而义相同。西汉元寿年间,天主耶稣降生,求赎世人,又派圣徒多莫来中国传教。”他还说:“天主教乃全世界之正理。”杨光先说:“天主教非正教,而是邪教。天主耶稣是叛国无君的贼,实如中国的白莲、闻香邪教。”

〔《历史与宗教——纪念汤若望诞辰四百周年暨天主教传华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辅仁大学,1992年,第279~

1666年(康熙五年)

汤若望出狱以后,与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同居一处,时若望七十三岁,因身系囹圄,猝患痿痹,口舌结塞,病情恶化,于是年8月15日去世,29日安葬。北京栅栏墓地汤若望墓碑上有门生李祖白所撰文曰:“吾师汤道未先生,讳若望,西海日尔玛尼亚人。幼龄学道,入耶稣会,以宣传天主正教为务,三十游中华,为天启二年。嗣以夙谙历学,岁己巳,由大学士徐文定公荐,应召来京修历,凡十余载。恭遇国朝建鼎,遂用西洋新法,造历颁行。游荷恩礼优异,迄今未艾云。门人李祖白谨识。”

汤若望在明、清两代所获晋授或敕封的职衔

年月	获授职衔
崇祯十四年	加尚宝司卿、治理历法
顺治元年十一月	修政历法、管钦天监监正事
顺治三年六月	加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印务
顺治六年十月	加太仆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
顺治八年二月	加太常寺卿、掌钦天监印务
顺治八年八月	通议大夫、加太常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
顺治十年三月	敕锡通玄教师、加太常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
顺治十二年八月	敕锡通玄教师、加二品顶带、通政使司通政使、掌钦天监印务
顺治十四年六月	敕锡通玄教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带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
顺治十六年六月	敕锡通玄教师、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
康熙元年二月	敕锡通微教师、光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掌钦天监印务

[黄一农:《耶稣会士汤若望在华荣思考》,见《历史与宗教:纪念汤若望诞辰四百周年暨天主教传华史研讨会论文集》,辅仁大学,1992年,第50页]

汤若望主要著作:(1)《进呈书像》,为向崇祯帝进呈“耶稣事迹图”的说明书。(2)《主制群征》二卷,1629年初刻于绛州。(3)《主教缘起》四卷,1643年刻于北京。(4)《真福训论》(《真福经典》),日期不详。(5)《浑天仪说》五卷。(6)《古今交食考》一卷,1633年北京刻本。(7)《西洋测日历》,1645年。(8)《学历小辩》一卷。(9)《民历补注解惑》一卷,1683年南怀仁刻于北京。(10)《新历晓惑》。(11)《大测》二卷,介绍平面及球面三角。(12)《星图》。(13)《恒星历指》四卷。(14)《恒星出没》二卷。(15)《恒星表》五卷。(16)《交食历指》七卷。(17)《交食表》。(18)《测食说》二卷。(19)《共译各图八线表》。(20)《测天约说》二卷。(21)《奏疏》四卷。(22)《新法历引》一卷。(23)《新法表异》二卷。(24)《历法西传》,内容为欧洲天文学史,包括哥白尼、葡王亚方索、托勒密、第谷著作,附有浅解。(25)《远镜说》一卷,1630年刻于北京。(26)《西洋新法历书》三十六卷,与徐光启、罗雅各合撰,成书应在1633年徐光启去世之前。(27)《崇一堂日记随笔》一卷,1637年刻本。(28)《刚克录》(《火攻挈要》)三卷,焦勳述、赵仲订,1643年刻本。(29)《坤輿格致》四卷,与李天经合译,专论西方矿冶术。

1667年(康熙六年)

康熙帝亲政。○监禁在广州的教士共有二十三人,其中耶稣会士十九名、方洛各会士一名、多明我会士三名。

1668年(康熙七年)

在广州之教士议决遵行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所准行中国礼仪各点。又决议以大圣若瑟为中华主保。○11月23日,康熙帝遣内院大学士李蔚等捧旨谕杨光先、胡振钺、李光显、吴明烜、安文思、利类思、南怀仁:“天文最为精微,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



康熙皇帝像

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争竞。孰者为是，即当遵行，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钦此。”24日至26日一连三天测验正午时刻，正午日影正合南怀仁所画之界。同月，南怀仁奉旨将吴明烜所造康熙八年民历、七政二本差错之处，列册缴呈御览。○是年前后，因“历案”造成大批西洋教士被逐广东，罗文藻担任了重要的教务工作。他的足迹遍及闽、浙、赣、粤、晋、鲁、湘、川、江南、直隶诸省，福建及沿海岛屿上成人经他付洗的有五六百人，其他各省约二千人，较当时全体教士三十年中付洗者为多。罗文藻成了除福建以外在全国惟一能行使神权的传教士。○是年，因康熙帝询问西洋风土国俗，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三人著《西方要纪》（又名《御览西方要纪》）进呈。○利类思《圣教要旨》在北京出版。为教理撮要著作，文字典雅。

白晋《康熙帝传》记叙历法测验经过云：

当皇帝只有十六七岁的时候，一次各部大臣全体会议，催促他作出一个关于中国天文学的决议。当时他还年轻，但他要亲自使这一事实真相明朗化：为了封住那些确有错误的人的嘴，他把南怀仁神父和杨光先召集到会上，问他们是否能作出一个明显的试验，以便人们当面用肉眼来鉴定，究竟这两种天文学哪一种最正确。杨光先什么也没回答，南怀仁神父却建议皇帝陛下给他们一根日晷针，针的高度可由皇帝随意决定，然后再由南怀仁本人和杨光先各自推算出第二天正午针的影子的精确位置。皇帝感到这个建议有理，就采纳了。在确定了日晷针之后，南怀仁神父计算了针的影子，并指出了这针的影子第二天正午达到的精确地点。计算完全跟事实相符，而杨光先呢？他既不会计算，又不能作出任何使人看到他的学说的试验。这样，皇帝就宣布他赞成欧洲的天文学。

〔《清史资料》第一辑，第220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载：

杨光先等曰：“我等不知推算。”帝曰：“先问尔等，既称能测日影，今怎说不知？”杨光先大言曰：“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

传之法，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皆法尧舜，岂独于历有不然哉？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矣！”

〔《中西交通史》第四册，第27页〕

1669年(康熙八年)

五月，鳌拜被黜。六月，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乘机上奏为汤若望平反，其奏折要点如下：(一)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以致汤若望蒙冤、李祖白正法。(二)佟国器、许之渐、许纘曾等被诬以在教革职。(三)利安当等二十余人押送广东，不容进退，而汤若望房屋被人居住，坟地被人侵占。七月二十日和硕亲王杰淑等议得：(一)汤若望通微教师之名复行给还，照原名级赐恤。(二)许纘曾、许之渐给还原职。(三)又工部已变之阜城门外堂及房屋原价并空地还给南怀仁等。(四)西洋人利安当等二十五人驿送来京。(五)照原官恩恤李祖白，流徙家属取回京，有职者各还原职。(六)杨光先即行处斩，妻子流徙宁古塔。康熙帝批示：“杨光先本当依议处死，但念其年已老，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利安当等二十五人不必来京，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或复立堂人教，乃着严行晓谕禁止。”但不久，在南怀仁的上疏请求下，康熙帝准礼部决定，“将通晓历法恩理格、闵明我二名送京，不晓历法汪汝望等十九名送各本堂”，而且准万济国(Francois Varo)随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到福建。这些传教士到各地以后都从事传教工作。康熙的默认和对南怀仁等传教士的重用，致使“各省官吏亦听任西教士自由宣传、招收教友，熟视无睹”。关于汤若望的平反昭雪，朝廷作了如下表示：(一)九月，礼部题请汤若望照原品级赐恤，即照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给予合葬之价，并给予一品致祭银两、遣官读文致祭，祭文由内院撰拟。(二)十月，皇帝赐银五百二十四

两,以资建筑汤若望坟茔并表立墓碑石兽。(三)十一月十六日,皇帝遣礼部大员国舅佟国刚、侍卫赵昌至汤若望墓前致祭,捧读祭文。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等供设香案跪迎,恭听宣读。祭文内容如下:“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管钦天监印务事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恩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如有知,尚克歆享。”(《熙朝定案》)○是年,朝廷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南氏呈辞官衔,只愿供职,未允,再辞始准,仍以监副给俸。○11月3日,杨光先出京,行至德州,病疽发背而死。○郑维信司铎潜回广东,分担罗文藻神父的传教工作。○11月20日,教廷传信部经教宗克莱门九世批准颁令,宣布卫匡国关于中国礼仪的意见书有效,而多明我会士的意见亦同样有效,由传教士按自己的良心判定情况。○是年,南怀仁《教要序论》出版,此书谈天主教由来,一再重印,并被译成白话文和上海方言。

1670年(康熙九年)

利类思所著《弥撒经典》出版。利类思此著,为适应1615年教宗保禄五世批准将《圣经》及弥撒经译成中文,便于中国司铎以中文行圣事。此书共五卷,封面大字烫印“MISSALE ROMANUM”,教宗保禄五世钦准。这是完整的弥撒经中文译本。除此以外,利类思还著有中文《司铎日课》(《司铎典课》)为罗马日课经本,包括周年瞻礼经文以及一般公教礼规,主要有关于耶稣瞻礼的日课经文,诸圣宗徒和圣女瞻礼通用的日课经文。○在广州的利安当等二十余人,前往各省居住。○葡王使节 Saldanha 在居广州两年之后,抵达北京。康熙帝优礼以待,不久葡使因病卒于中国。

1671年(康熙十年)

工部建造孝陵大石碑坊,需用石柱六根、坊子等石十二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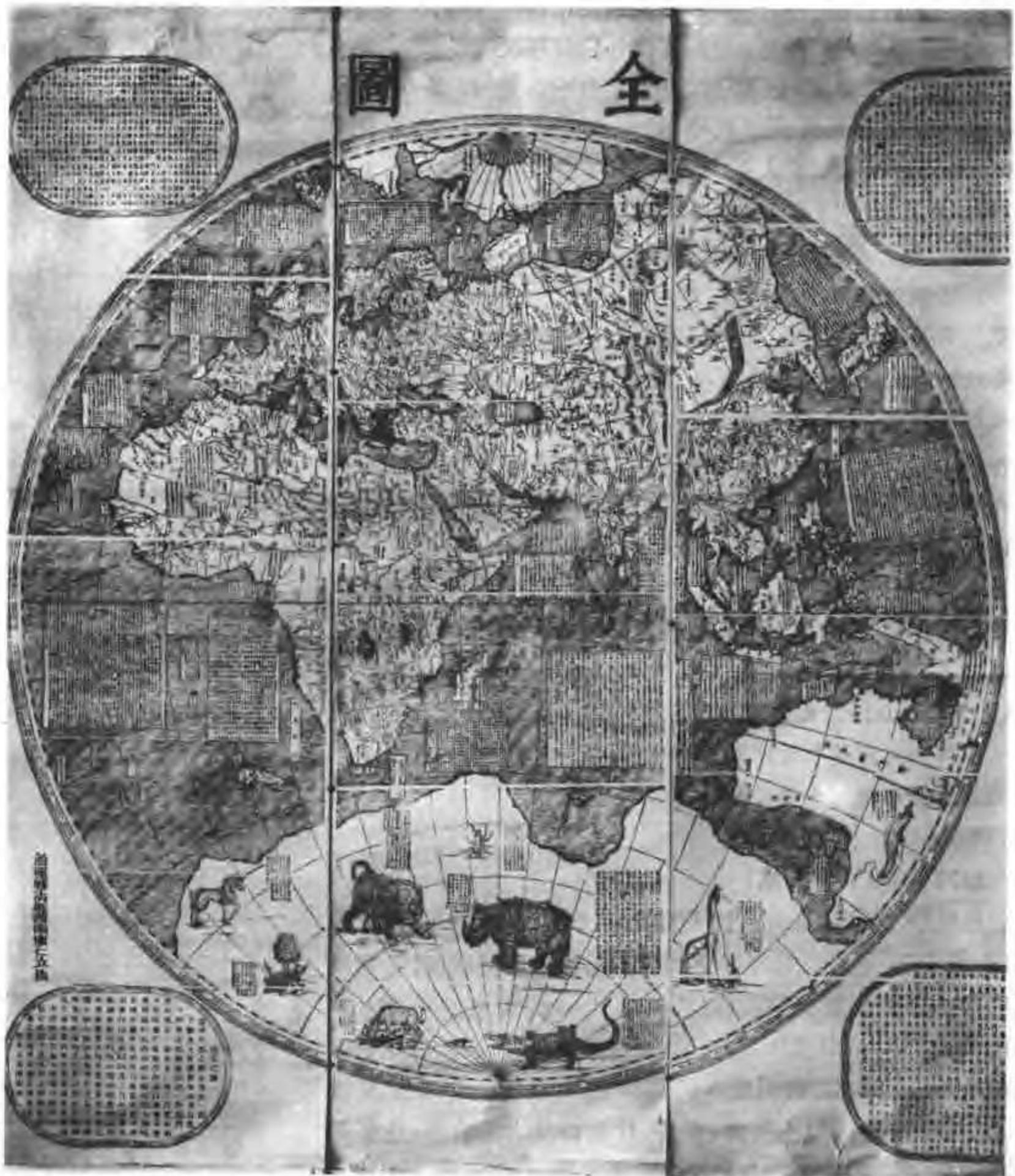
利类思所译《弥撒经典》中文版封面

南怀仁奉旨以西洋“绞架滑车数具运之，每架用十余人，共出数百斤之力，俄顷过桥，甚为轻便，并无损伤，且省护桥之费”。时康熙帝狩猎归来，获此消息，立即赏南怀仁及各级官员鹿各一只。○是年，康熙帝御示“敬天”二字匾额，悬于南堂，并谕曰：“朕书‘敬天’即敬天主也。”康熙帝谕令恩里格(P. Christian Herdtricht)与闵明我(从广东人京，往钦天监供职。郑维信司铎奉命亦同往北京。○4月25日，潘国光因年老病衰死于广州，遗体运回上海老天主堂“敬一堂”，葬南门外教堂墓地。

潘国光著作有：(1)《圣体规仪》一册，内容是关于圣体圣事信条及领圣体仪式，附图，1881年土山湾版。(2)《十诫劝论圣迹》一册，1650年河南刊印。(3)《圣教四规》，内容为教会各项规定及解释，原稿似在山西绛州刊印，1849年重刊。(4)《未来辩论》，驳斥算命占卜。(5)《天阶》，通过各种受造之物，引导人心向主。1650年上海出版，1871年、1915年土山湾重印。(6)《天神会课》一册，为“天神会”写的教理课本。1661年上海出版，后多次再版。(7)《瞻礼口铎》，为一年中主日和大瞻礼的福音经注解。(8)《中国礼仪问题》(拉丁文)，又名《在中国传教三十四年的耶稣会神父潘国光答多明我会神父纳瓦雷特(P. Navarette)问》两卷，1700年巴黎版。(9)《徐阁老赞》，1641年主持徐光启葬礼时所写，用中文写成，格式欧化。(10)《圣安德肋宗徒瞻礼》，为瞻礼日导言。

1672年(康熙十一年)

恩里格、闵明我抵京入钦天监供职。○南怀仁《坤舆图说》出版(一说1674年)。○礼部奉旨派员同南怀仁属员抵澳门，迎接通晓历法之葡国教士徐日昇(Thomas Pereira)至京。○是年，吴县民人杨燦南刊印《真历言》一书，抨击西法谬误，杨氏将此书四处散布以外，亲赴通政司要求代递奏呈，后改在礼部疏告。9月31日，康熙帝命大学士图海、李蔚、杜立德及学士哈占、达都等共同测验。在观看南怀仁与杨燦南二人实测以后，素通历法的学士熊赐履、图海等上奏，杨氏不谙飞灰候气法，无从测验，康熙帝



南怀仁制作的《坤輿万国全图》

降旨将杨燦南交刑部议罪。刑部以杨氏“凡不系本职而条陈时务,任意刻造《真历言》一书,妄称历日舛错”,判处杨氏杖一百,徒三年。

徐日昇,字寅公,1645年11月1日生于葡萄牙(Braga)主教区的 S. Martinho do Valle 的望族。在 Brago 公学读书。1663年9月入耶稣会科因布拉初学院。1666年,去印度,先在果阿后在澳门完成他的全部课程。由于其在音乐上的才华,被南怀仁推荐入京效力。

〔费赖之:《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436~437页〕

1673年(康熙十二年)

康熙帝准毕嘉(Joannes - Dominicus Gabiani)居陕西堂,看守李方西墓。○第一任中国籍耶稣会司铎郑维信(玛诺)病逝于北京。○7月31日,传信部讨论决定将罗文藻提升为主教,同时决定:(一)每年资助罗文藻传教经费二百银元,此款由传信部供给,不由西班牙或马尼拉多明我会支付,免受牵制;(二)祝圣他带衔主教,与以前各代牧有从属关系,允许他与法国三代牧凭良心划分教区;(三)奉行罗马天主教公共礼仪;(四)由三位法籍代牧选择适当地点祝圣。10月2日,传信部再举行会议,请求教宗委任罗文藻为“教外地区”(Patribus infidelibus)主教,教宗加以批准。

1674年(康熙十三年)

1月4日,教宗克莱门十世(Clementus X)核准圣部申请,颁布《宗座之上》(*Super Cathedram*)通谕,引述了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对罗氏的推荐,并称罗文藻有虔诚、好学、明智、干练、清白和仁爱诸品德,任命他为巴希利(Basilitanensis)主教兼南京宗座代牧,分管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五省兼高丽的教务。○南怀仁奏请饬行《新制灵台仪象志》共十六卷,南怀仁被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衔。南怀仁辞,上不准。南怀仁制《坤輿全图》。○清贵戚之臣佟国器受洗于成际理(Felicianus Pacheco)司

铎之手。

教宗克莱门十世任命罗文藻为主教的诏书(节译)

教宗克莱门十世致可敬神昆被选为巴士尔街誉主教的罗额我略。

向可爱的神子问候,并致宗座的祝福。

在天主上智莫测的奥秘所安排的宗徒之长的宝座上,我们的心神常环视着全球基督徒的世界,为的是在上天托付我们为基督信徒们的精神导师的领域上,能有效地照管着。所以我们如同我们的前任教宗亚历山大第七世,任命了高依纳爵(Ignatius Cottolendi,即高多冷提)为中国南京的代牧兼其他数省的署理主教职,惜已去世。现在我们接受可敬的弟兄在中国、越南各地宗座代牧主教们的建议。他们切愿你惟一的中国司铎,因着你出众又正统的信德,并对基督敬爱的热忱,来继承上述高依纳爵主教的宗座代牧职……,为此我们以宗座的权力任命你、道明会菲律宾玫瑰省的会士,为巴士尔教区街誉的主教。因着你对天主教会的热忱、学问、明智、老练、清白、爱德和其他的德行,并因天主特别的信任你,为了灵魂的实效你将在主的葡萄园中工作。为得到现在的一切实效,我们赦免你现在和将来任何机会和任何法案所触犯一切所有的绝罚、免职罚、禁止罚和教会内所有其他的决案或惩戒罚并法律上或特判决的罚。并由我们可敬的弟兄罗马圣教会传信部枢机团的建议,任命你为中国南京的代牧兼掌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各省并高丽的署理主教职,但该依照我们的前任教宗亚历山大第七世及格肋孟第九世所留下的规定,并且在祝圣之后,要等待我们用简令的方式任命。一切已经给予高依纳爵主教和其他前面提及的代牧们的权利,除非上述圣部枢机们另有命令或安排,所提及的权威,我们以此公文建立而任命。而且特别给你与上述代牧主教们划分(代牧区界限)新的权柄。但资历较深的代牧可优先选择地区。一经划分以后,应早报告圣座,而予以核准。

其他方面,不论在念日课或做弥撒或施行其他圣职时,我

们禁止你用道明会的经典和礼节，而要用罗马教会公共的礼仪，使中国各处的教会，不但在教义上而且在礼仪上，一致为基督信徒有建设性。……

本公文已经足够清楚表达任何相反性质的文件，在本牧函中我们都特别宣告无效。

1674年1月4日发自罗马圣好大殿。我就任教宗后第四年。

〔原文为拉丁文，转引自(台)《恒毅》第三十四卷第十一期〕

1675年(康熙十四年)

利类思译《圣事礼典》出版，这是关于七件圣事的礼节经文，共一册。同年，利类思的《司铎典要》也在北京出版。这是专为司铎用的神工书，共两册，分别为(一)论司铎地位和职务，举献弥撒、虔诵日课、施行圣事。(二)关于超性三德、天主十诫、公教教规。○柏应理《天主圣教百问答》出版，该书是将天主教基本教理以问答形式撰写而成。

1676年(康熙十五年)

殷铎泽任中日两国耶稣会巡阅使，南怀仁接替成际理出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从康熙十二年至十五年，南怀仁共制大小炮一百二十门，“于每炮制成后，必在制造局内，设台供天主像，自穿司铎品服，虔诚跪祷，行祝炮礼，每炮赐以教中圣人名号，令凿刻其上”。南怀仁制炮事在欧洲有其他修会非议，但教宗英诺森十一世予以支持。1681年12月教宗致信南怀仁曰：“你的信中最令我高兴的是如何明智地、适时地应用世俗科学来拯救中国人民，和用它来提高基督教的信仰。”○利类思、安文思合译之圣多玛斯《超性学要》第二部分在北京刻印，本年刊行《三位一体》三卷、《万物原始》一卷、《天神》五卷。以后两年中，又相继刊行《形物之造》一卷、《人灵魂》六卷、《人肉身》二卷、《总治万物》二卷、《天主降生》四卷。○利类思《圣母小日课》一册在北京刊刻，教徒中贞女念诵此经很普遍

1677年(康熙十六年)

5月6日,安文思病逝。康熙帝“赐银二百两,大缎十匹,以示朕不忘远臣之意”。在安文思殁后数日,帝又差侍卫龚萨等三员至耶稣会住处,向利类思、南怀仁询问出葬之天主教礼仪,南怀仁恭缮仪单回奏。至出葬日,帝又差龚萨等三人至墓地,并谕:“到冢前,详看葬时天主教所行诸礼,及众奉教者群集跪念经文等仪,将所见者逐一回奏。”○柏应里去崇明岛传教。

安文思主要著作有:(1)《超性学要》。(2)《复活论》,根据托马斯理论,谈人肉身之复活。(3)《中国十二优胜》,1688年巴黎刊行。(4)《关于1664年后教难情况》。(5)《中国著名盗魁张献忠暴行纪要》。(6)《从江南到四川行程中的见闻》,1643年稿寄欧洲。(7)《中国史》,未完稿。

1678年(康熙十七年)

南怀仁在宫中尝试燃气机轮之发明。他自记曰:“当余尝试验蒸汽之力时,曾用轻木制成一四轮小车,长二尺,且极易转动。在车之中部设一火炉,炉内装满燃烧之煤,炉上则置一汽锅。在后轮之轴上固定一青铜之齿轮,其齿横出,与轴平行。此齿轮与另一立轴上之小齿相衔,故当立轴转动时,车即被推而前进。”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认为:“南怀仁之模型原理,可视为勃朗加(Branca)冲动式汽轮之试验,并推广其运用。……南怀仁曾负笈罗马,勃朗加为意人,其记载汽轮之书(LaMachine)系1629年出版于罗马,与南怀仁在罗马之时期极为相近,南怀仁获读此书可能性极大。南怀仁之试验,其眼光及应用范围,实较西洋同时期者为远大。就利用蒸汽为行车原动力言,较司蒂芬逊之火车早一百五十年;就利用蒸汽为轮船之原动而言,较西敏敦之轮船早一百二十三年,……故在世界热机史上,南怀仁之试验及其广泛之建议,实为勃朗加发明雏形冲动式汽轮后,所当大书特书者。”○是年,南怀仁致函罗马耶稣会总会长,请派教士来华传教。○南怀仁所著《康熙永年历法》告成。○康熙皇帝加南怀仁为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一级,南氏力辞,未准。○是年,葡萄

牙使臣本笃(Bento Pereyra)谋入内地贸易,得南怀仁协助,向康熙帝进贡一头狮子。利类思译著小册子《狮子说》在北京刊行,序云:“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日遐邦进活狮来京,从古中华罕见之兽。客多有问其相貌、性情如何,岂能尽答?兹略述大概。”书分六篇(狮子形体,狮子性情,狮子忘恩,狮体治病,借狮箴傲,解惑)。此为最早译为汉文的西洋动物学书籍,原作者为亚特洛望地(Aldrovandi, 1522 ~ 1607)。

1679年(康熙十八年)

在南怀仁引荐之下,李守谦由澳门奉诏入京,襄理历政。○教宗英诺森十一世登基。○利类思奉康熙帝命,写了一册《进呈鹰说》,后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第十二卷鹰部,亦为翻译亚特洛望地之书。满人喜养鹰,故康熙皇帝探询西洋养鹰奇书。

1680年(康熙十九年)

11月,传信部谕令将中国教务与安南划分开来,安南东京代牧陆方济(巴禄)改任福建宗座代牧,管理闽、浙、赣、粤、桂、湖、川、滇、黔九省,并统理中国各省教务。同时,传信部采纳陆方济建议,命在宗座代牧区内传教士,一律宣誓服从宗座代牧。○李守谦具表力辞钦天监工作,康熙帝御书“奉旨传教”,准其前往各省传教。○葡王彼得二世(Peter II)派使团出使教廷,交涉保教权事宜。9月,教廷枢机团讨论得出结论:(一)教宗未曾将亚洲教会的宗教机构交葡萄牙,只承认葡王可以在他所赞助和保护下的教堂中行使保教权;(二)不同意葡王管制他所不能控制的异教国家的天主教会;(三)葡属印度总主教的权利,不会因宗座代牧制而受损害;(四)派遣宗座代牧,不会对葡王的权利造成损害。○教廷任命威尼斯人、方济各会士伊大仁(Bernardinus della Chiesa)为陆方济之辅理主教,来中国主持教务工作。○毕嘉接南怀仁任为耶稣会副省会长。○奥斯定会士来到广东。○柏应理被选为中国耶稣会副省区理家(账房),并被选为教区代

表前往罗马讨论传教事宜。



柏应理像

1681年(康熙二十年)

南怀仁奉旨造八门一千斤重的大炮。○许母徐太夫人甘第大托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携金爵及珍品多种,带往罗马,献于耶稣会圣依纳爵堂。又赠梵蒂冈图书馆中国书籍四百多种。甘第大于9月3日去世。柏应理携礼物及吴渔山至澳门,准备一同前往罗马,但最终吴渔山没有成行,驻留澳门。12月5日,柏应理乘荷兰船离澳门西行,前往罗马。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起驾前往东部巡视,随驾有皇太子允礽,时年八岁,另有宗室贵族,各级官吏等七万人随行。南怀仁随康熙帝东巡,并著《鞑靼旅行记》。南怀仁记叙说:“我在这次长途远征中,获得了向许多贵戚高官传播教义的机会,使他们明白我辈的使命和欧洲精神秩序的目的和性质。而且不仅限于贵族和高官,皇族为了消磨旅途的寂寞,向我询问天空、星星和气象的事情,我们航海的情况,我回答时便乘机加进关于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知识。”又说:“人们目睹我骑着皇帝的一匹马,看见皇帝像在讲坛上讲演一样同我们讨论我们的信仰,又听到了我在大集会上讲演一样的讲话。”是年,南怀仁进呈《神威图说》,晋工部右侍郎职。○10月7日利类思卒,康熙帝赐葬银,并差侍卫三员送殡。○柏应理神父抵达罗马,将所携四百册书呈献教宗,其中有利类思所译中文《弥撒经典》,教宗命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但中文举行弥撒事,未获批准。当时教廷正与葡萄牙为保教权龃龉,故柏应理在欧洲居留十年。与柏氏同抵欧洲的另有南京人沈宗福,教名弥格尔。后沈氏自法抵英,至牛津大学晤东方学家Hyde, Hyde遗书中有沈宗福之拉丁文通信及《棋谱》、《升官图》、度量衡制及汉文与拉丁文对照之应酬语。○吴渔山在澳门加入耶稣会,受洗名为西满·沙勿略。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夏,南怀仁、闵明我再度奉命随驾前往西鞑鞑。○是年,巴黎外方传教会陆方济主教曾入台湾沙岗逗留五个月,因大陆战事纷乱,不能进入。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

恩理格卒。恩理格原供职内廷,经南怀仁降旨,往山西绛州传教。卒后康熙帝悯恤,御笔旌嘉,赐“海隅之秀”匾额。○康熙帝巡视至南京,传见西门内天主堂毕嘉、汪汝望二司铎。○巴黎外方传教会创始人、宗座代牧陆方济主教抵达中国福建,即派卜于善神父(Philippus Le Blanc)赴广州,公布传信部训令,命令宗座代牧区内传教士,一律宣誓服从宗座代牧。部令规定,拒绝宣誓者不能举行圣事,故有部分西班牙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随即离华返欧。北京主教伊大仁(Bernarelinus de la Chiesa)则劝各宗座代牧勿强迫执行训令。陆方济想从福建进入贵州,行抵穆洋,于10月29日病逝。继任者颜珣(Carolus Maigrot)主教坚持强迫宣誓。而法王路易十四亦下令禁止法国传教士宣誓,后虽收回禁令,但以对法籍宗座代牧为限。○7月2日,罗文藻上传信部部长书,历述迟迟不能接受祝圣为主教的原因。陆方济主教在穆洋临终前,曾希望罗文藻前往领受祝圣,不意在罗氏抵达前二日,陆方济已逝世。宁波兰溪教友上书罗文藻,请其早日莅临,领衔者为Cho Xe(祝石)。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

4月8日,罗文藻在广州,由伊大仁主教祝圣为主教。自教廷发布任命迄今,延迟达十一年零三个月之久,罗文藻由此成为第一任中国籍主教。○康熙帝命耶稣会士闵明我赴澳门召熟习历法之安多(Antonius Thomas)入京供职。○徐日昇随康熙帝巡视长城以外地区。○3月3日,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六名精通科学的法籍耶稣会士即洪若翰(P. Jean de Fontaney)、白晋(P. Joachim Bouvet)、李明(P. Louis Le Comte)、张诚

(P. Jean-François Gerbillion)、刘应(P. Claude de Visdelou)以及塔夏(Tachard)前往中国。此举既是响应南怀仁向欧洲宗教界所发出的号召,也是扩大法国在远东的影响,借以减弱葡萄牙保教权。法王又从国库拨九千二百磅年俸,供中国和印度两地二十名耶稣会士生活费用。他们从布列斯特港而非里斯本出发前往远东。9月抵暹罗。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康熙帝颁布谕旨,禁止僧、道各教,有些省份官吏认为天主教亦在应禁的邪教之内。○7月,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离开暹罗前往中国,塔夏则留在暹罗。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

6月19日,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等五人的商船,抵达宁波。浙江巡抚金铉上奏朝廷,朝臣中有人主张驱逐之,南怀仁上奏谓此五人精通天文、历数之学,力求皇上简用。康熙帝力排众议,谕令金铉驰送五人来京。洪若翰等人经杭州由运河北上。○是年3月,康熙帝再度重申“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其,……宜行禁止”。5月,南怀仁上奏“臣等所奉天主教祈照康熙初年未曾诬告之前,任随其便,不阻其门,以断绝妄指之诽谤等语”。不久,康熙帝又颁谕:“天主教应行禁止,部议极当。但见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礼部相应移咨山东、河南等处巡抚。至于传教自由,康熙依议政大臣会议“止令西洋人供奉”。8月3日,康熙帝召见南怀仁、徐日昇参加御前会议,同时出席者有礼部全体官员,皇帝宣布:一、南怀仁即便本人不能出席御前会议,仍可保持相应的荣誉和利益;二、天主教神父只要持有南怀仁的印鉴,可以自由通行全国传教。○柏应理回到欧洲,在巴黎印行《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又称《西文四书直解》(缺《孟子》)。○殷铎泽任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副省会长。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

1月28日,南怀仁去世。康熙帝特下谕旨:“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军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应得恤典,察例从优具奏。该部知道。钦此。”3月,南怀仁出殡,康熙帝差内大臣一等公固山佟国舅及一等待卫四员,送至茔地,并特赐南怀仁丧葬银二百两、大缎十端。4月,康熙皇帝依部议,赐南怀仁谥号“勤敏”,并赐内库银七百五十两,交徐日昇祗领,以资筑坟树碑,并立石兽。年底,康熙帝遣礼部左侍郎席尔达,率本部官员十名,至南怀仁墓致祭。○2月7日,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白晋、李明、张诚、刘应等五人抵达北京,他们都是精通天文、历法和舆地的传教士。他们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宗教、发展科学和扩张法国的势力。洪若翰等人抵京后,进呈浑天器、象显器、千里镜、量天器、天文经书等物,总计大小三十箱。○六月,徐日昇、张诚奉命随同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纲、马喇及汉臣张鹏翮、陈治安北往塞外,与俄国会议两国边界。既抵色棱额固,适厄鲁特侵略喀尔喀部,路途梗阻,俱奉召还。康熙帝宣徐日昇至内廷,询问良久。○8月1日,罗文藻主教在南京为吴渔山、刘蕴德、万其渊祝圣为司铎,是为罗文藻培植中国籍司铎的重要步骤。祝圣之后罗主教训曰:“你们是什么人,竟能晋为司铎?我是什么人,竟能受祝圣为主教?只因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教友,乃有此荣幸,若在欧洲,你们在你们会中,我在我的多明会中,恐只能充任司阍而已。”两年以后的1690年8月28日,罗主教在杭州上书传信部,称三位中国籍司铎:“他们充分通晓拉丁文。1685年我上钩部的若干函件中,并未说明我将用何种语文祝圣,我希望祝圣的四五位司铎,但我一直愿以拉丁文祝圣,而不用中文。可是我亦会请示钩部准他们晋铎后可用中文。”○柏应理在罗马出版以拉丁文所撰之《一位中国奉教夫人许甘弟大传》。许母徐太夫人为徐光启孙女,嫁松江许远度,奉教笃诚,瞻恤穷人,供养教士,在松江附近造大堂九十座、小堂四十座,并将数百册宗教和科学书分赠堂口。该传后译成法文、西班牙文和弗拉芒文。



吴渔山像

皇帝谕祭钦天监治理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级、溢勤敏南怀仁之灵曰：朕惟设官分职，授时端重灵台；振旅治兵，利器爰诸武库。惟专心以莅事，斯运巧而成能，无忝厥官，官膺殊典。尔南怀仁远来海表，久掌星官。学擅观天，克验四时之序；识通治历，能符七政之占。非惟推步无差，抑且艺能兼备。铸为军器，较旧式而呈奇；用以火功，佐中间而制胜。恪恭不怠，奉职惟勤。术数咸精，造思独敏。方疏荣于苍佩，乃奄息于黄垆。念夙夜之成劳，良深軫悼；稽仪文于旧典，特示褒崇。呜呼！既赐以金，礼倍隆于存歿；载锡之溢，名永播于遐荒。尔灵有知，尚其歆享。

次年四月，钦赐南怀仁碑文。其文曰：

钦天监治理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级、溢勤敏南怀仁碑文：朕惟古者立太史之官，守典奉法，所以考天行而定岁纪也。苟称厥职，司授时之典，实嘉赖之。况克殫艺能，有资军国，则生膺荣秩，歿示褒崇，岂有靳焉。尔南怀仁，秉心质朴，肄业淹通。远泛海以输忱，久服官而宣力。明时正度，历象无讹；望气点云，星躔式叙。既协灵台之掌，复储武库之需，覃运巧思，督成火器，用摧堡垒，克裨戎行，可谓莅事惟精，奉职弗懈者矣。遽闻溘逝，深切悼伤，追念成劳，易名勤敏。呜呼！锡命永光乎重壤，纪功广示于遐陬。勒以贞珉，用垂弗替。

（按此碑文于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十七日启奏，经御览之后发下。黄伯禄《正教奉褒》载碑文所署时间，为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碑文刻有“钦赐”二字。）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第163～180页〕

南怀仁主要著作有：（1）《教要序论》一册，天主教教理撮要。1669年北京版，1677年、1799年北京再版。（2）《告解原义》一册，论告解圣事，北京版，1730年、1796年再版。（3）《圣体答疑》，关于圣体的问答，北京版。（4）《善恶报略说》一册，论赏善罚恶，1670年北京版。（5）《妄推吉凶之辩》一册，1669年北京版。（6）《妄占辨》，论占卜之荒谬。（7）《道学家传》，为一本记载离井背乡来中国传教的神父名册，1686年北京版。1925

年2月~11月上海《圣教杂志》刊载其部分内容。(8)《仪象志》，共十四卷，有关星象仪的原理，使用及制作方法，1673年北京出版。此书又名《新制灵台仪象志》。(9)《仪象图》，为有关仪器的图像。(10)《康熙永年历法》，共三十二卷，书中附插图及说明以及奏疏一份。1678年在北京出齐。(11)《历法不得已辩》一册，1669年版。(12)《简平规总星图》，为一总星辰简明图表。(13)《熙朝定案》三卷，为奏请康熙皇帝准用西洋历法的奏疏汇编。北京版。(14)《御览简平仪新式用法》，为皇帝专用投影机的说明。(15)《预推纪验》，对星象的预测记录。(16)《坤輿全图》，为大型地球图，直径1.65米(5古法尺)的东西两半球地图，1674年绘制于北京，刻有各种珍异兽类图像，注明每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距离以及它们的国力、物产和政治体制。在这幅巨大的地图边角上，有六个圆形图案附有说明：一边为“气行”、“风”、“雨云”，另一边为“海水之动”、“海之潮汐”、“或问潮汐之事”。(17)《坤輿图说》，计二卷，1672年、1674年北京出版，为“全图”之说明，上卷有坤輿图说、地体之圖、地球南北两极、地震、山岳、海水之动、潮汐、江河、气行、风等，下卷有亚细亚洲及各国各岛、欧罗巴洲及各国各岛、利未亚洲及各国各岛、四海总说、海状、海族和海产。又附有无对鸟、独角兽、鼻角、加默良、印度山羊、狸猴等异物图。(18)《坤輿外纪》一卷，保留前书关于各地珍禽异兽及神奇传说部分。(19)《验气说》，关于温度表的解说，1671年或1672年北京出版。(20)《几何原理满文译本》。(21)《满文语法》，其手稿于1870年在罗马学院发现。(22)《康熙年代在中国造的欧洲天文学机械》(拉丁文)，1668年北京版，有一百二十五幅插图。(23)《赤道南北星图》，1672年北京出版。(24)《1682~1683年康熙皇帝出巡记》，1685年巴黎出版。

洪若翰，又名洪若，字时登。1643年2月17日生于法国布列塔尼省的St. Polden教区，1658年10月11日入耶稣会巴黎省初学院。他曾在本国路易大帝(Louis-le-Grand)公学教授数学和天文学达八年之久，曾在法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其天文观测记录。他很早就申请去日本和中国传教，他与刘应、张诚、白晋、李明等应命以后，法王路易十四授他们“皇家数学家”荣衔，并赐仪器，法王又拨九千磅(Livres)年俸金，供中国和印度二十名耶稣会士之用。

白晋，字明远，1656年7月18日生于法国芒市(Mans)，亦为科学院院士，奉命携带数学及天文学仪器。法王还托他带一套装潢精致的画集，赠送给中国皇帝。

李明，字复初，1655年10月10日生于法国波尔多 Bordeaux 贵族家庭。1687年时入耶稣会 Guyenne 省初学院。他在东行的旅程中随时观测天文和自然现象。

张诚，字实斋，1654年6月11日生，1670年10月6日入会，他抵华后任法国在华耶稣会第二任会长(1700~1706)。

刘应，字声闻，1656年8月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在耶稣会办的公学里完成学业。1673年入法国耶稣会巴黎初学院，在文学、数学、神学方面有特长。

当时法国科学院奉法王之命，派遣专家至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的地理研究和测量，他们意愿打破葡萄牙保教权对印度和中国的垄断，故派传教士前来中国，扩大法国在远东的影响。他们不按惯例从里斯本起程，也避免在葡属果阿和澳门登陆，故选择从布列斯特出发，前往暹罗的航线。

[费赖之：《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486~518页]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

年初，康熙帝南巡，徐日昇、张诚赴内廷送行。驾至山东济南府，有西班牙传教士柯若瑟出城迎接。二月，康熙帝南巡至杭州，耶稣会士殷铎泽、潘国良(Emmanuel Laurifice)乘船前来迎接，帝悦，允至御舰入觐，并获赏银及嘉果、乳酥。康熙帝至江宁，耶稣会士毕嘉、洪若往迎。不久，康熙帝北归，经山东济宁至石佛闸，利国安(Joannes Laureati)前往迎接，并蒙召见。○6月，徐日昇、张诚奉命随内大臣索额图等前往尼布楚会晤俄国使臣，勘议两国疆界。7月24日，清廷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谈判期

间,两位传教士居间调停,功不可没。索额图从此成为传教士的朋友。回京以后,康熙帝召徐日昇、张诚至内廷,垂询会议始终各情,甚为嘉奖。○李安德生于陕西汉中府城固县。

徐日昇神父曾随佟国纲、索额图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并且著有《徐日昇日记》记叙此事,下面是日记中的片断,可以看到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中所起的作用。

48. 两个耶稣会士,尤其是徐日昇敦促俄国使臣作出决定

我和我的同伴提醒俄国使臣说,他是争取和平的使臣,纵然遭到出于私利的人们反对的时候,也应如此;困难是他本人造成的(在类似局势下此种情况屡见不鲜),也需他自己去解决。现在时已过午,我自清晨起便与他辩论,始终未能说服他采取决定性步骤,因此不免表现出焦躁激动,但其程度仍限于可能范围之内。我说,与我们的钦差大臣开类似的玩笑只会证实他们对俄国人的怀疑不无根据。我挺身站起,说既然整整一天他都不能作出决定,那么再等也属无益,因为很难指望他在十五分钟之内就作决定。俄国使臣在不远处和自己的人磋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磋商只能使事情更加困难和阻碍它的解决。为首的人应该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当俄国使臣听到我决定要走的时候(我若不是有把握地知道他一定会挽留我,我是不会这样说的),立即让自己的拉丁文翻译来挽留我。我的举止行动使我们的满腹狐疑的钦差大臣感到了一些满足,因为虽然不能说他们对我不信任,但至少他们会责难我逗留过久的。一些不太了解我的满人表示担心我的消极立场会有损于谈判;他们恳求我不要离去,不要发怒,可是他们忘记了使谈判几次面临危险的正是他们,而使之化险为夷的却是我。鞑靼人中有几个比较锐敏的观察者,对过去和现在的策略都是内行,他们赞成我的决断,把它看做是对付俄国人拖延手段的反措施。当他们看到我的威胁甚至不须付之实施便已收到效果时,大为得意。

在我向俄国使臣表示恼火的时候,我们的钦差大臣派来

了一名信使。钦差大臣们当时在离此仅一里格的一座山岗上等候,已经失去耐性了。信使传来给我和我的同伴的命令,叫我们回去禀报耽擱的原因。

49. 徐日昇劝中国钦差大臣再略事等候

由于俄国使臣已然请求我留下,我便乘此机会说:“你们看,我们的钦差大臣多么急于唤我回去。所以请你们不要把我发怒的事挂在心上。我以后要小心,一定把该办的事办妥。”我匆忙回来见我们的钦差大臣,到达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了。我发现那里已有一个俄国人,他也是来见我们的钦差大臣的。一位钦差大臣让我坐在俄国人对面的自己的座位上,这种光荣我没有料想到,而且受之有愧。我开始援引各种论据,用来安慰他们;我对他们说,既然他们已经等了那么多时日,今天他们还应该等候,因为毫无疑问,今天和约一定可以签订。

我辞别他们,又奔跑了整整一里格,可是半路上我不得不停下稍事喘息,否则我会气喘得不能把该说的话转达给俄国人的。当一切几乎皆已告成时,我再次回见我们的钦差大臣。这样,我便成了两个病人的医生:一个患者急躁难耐,另一个患者却是缓慢得要死;对前者,我多方安慰,迫使其忍耐;对后者,则用在此情况下所需要的言词加以刺激。

我把我的同伴留下翻译条约的各项条款,自己却抓紧时间去见我们的钦差大臣,以便向他们建议慢慢地启程前来,因为这样做可以减缓等待造成的急躁,同时为翻译条约赢得充分的时间。由于有一个词译错,译文不得不重抄了三次。在这方面俄国人非常认真固执,凡在提及大公的文件上造成了一个文字错误的人,就可能被判处死刑。

56. 耶稣会士最后一次访问俄营。中国人送给戈洛文的礼物

我们立即应邀前往,受到他的亲切有礼的接待。他向我们谈了很多往事。谈话中,我请他谅解我在某些情况下表示的不冷静,因为他可能会认为这有失礼貌。我请他理解我,因为我生活在异国民族之中已有多数年,我既然是受中国皇上委派,我

就应像他的忠实臣民那样行事；我若不这样作，那会造成严重后果。俄国使臣是个明智的人，他微微一笑，答说：“您这样做恰好反映出事实上您是什么人。您的行为若是另一种样子，您就会成为与您身分不合的人。您吃的是中国饭，穿的是中国衣，从而您相应地也成了另一个人，行为也应与此相适应。这样做，您才是真实诚挚的。我们十分清楚，我们有多少事曾仰赖于您，您为共同利益作了多少贡献。我愿意让您知道，我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您的帮助的。请您相信，用不了多久，莫斯科就会知道您的劳动成果，那里也会作此表示的。”他反复表示自己的谢意。因为这不只涉及我一个人，所以我认为把他的心情叙述出来还是恰当的。但愿上帝仁慈，使他履行自己的诺言，从而使罗马天主教信仰在这个伟大帝国里在新的高度上得以发扬！

当我们同俄国使臣谈话的时候，我们的钦差大臣派来送回礼的人到了。回礼比他们接到的礼物更为丰厚。其中有很多匹贵重锦缎，两只金碗，皇帝钦赐国舅旅途使用的华贵鞍鞴。俄国人见到礼物高兴异常，希望我们再盘桓几日，但是我们的钦差大臣归心似箭，未肯应允。

那一天，我向俄国使臣请求释放几名在正式战斗中被俘的鞑靼人。他彬彬有礼地答称，这种俘虏他有近百名，他可以全数释放。当他宽宏大量地释放了这些俘虏之后，我对他的恭敬心情更加深了。我还请求他把一个被俘虏的父母双亡的小孤儿交给我。我带着这个孩子返回中国营地，因为他的身体虽在縲继之中，灵魂却仍是自由的。今天，我希望这个孩子已蒙受上帝的仁慈，正享受上帝安排给他的奖赏，因为我们回到北京后，他患了天花病（这种病在他的同族人之间并不流行）。我向他传授了宗教的真谛，为他作了洗礼，他的灵魂便升入了天堂。我感到悲痛，同时我也赞美上帝的安排：上帝慈悲为怀，宽宏大度，使他所选中的人跻身于圣贤之列了。

57. 戈洛文释放俘虏所表现的宽宏大量

我们钦差大臣看到我如何心地纯正地为这些俘虏吁请，

又看到俄国使臣怀着何种基督徒的慈悲把俘虏交付给我，所以他们恳求我再为几名身陷囹圄的重要的喀尔喀人说项。我深知此次请求与前次性质完全不同，因为涉及的人完全两样，便决定小心从事。我首先探问拉丁文翻译，提出这类请求是否明智。他说：“俄国使臣在旅途中原来一直把这些喀尔喀人看做朋友相待，可是他们却残暴地袭击我们。他们有四万多人（我对此数字表示怀疑），偷走了我们一千二百匹马，幸而上帝保佑，我们把马夺回了。那已经是我们粉碎了他们，并把您想为之奔走的喀尔喀王公俘虏以后的事了。我国使臣已把所发生之事上奏大公，并且已经请旨如何发落俘虏。我想在未接到大公旨意之前，俄国使臣是无权处理这些俘虏的。不过，话虽如此，若是您愿意我与使臣谈谈，我可以马上办理此事。”

虑及这一切，我求拉丁文翻译什么也不要做。这次谈话过程中，翻译暗示我，俄国使臣非常希望得到一座鞑鞑帐篷（鞑鞑人以善于制造帐篷著名于世）供自己旅途中使用，因为鞑鞑帐篷更能御寒。我当即回答他说，这不会使他破费太大。回来后，我把此事告诉给皇太子的舅舅索额图。索额图生性慷慨，立即让出自己那座价值三十万瑞斯以上的帐篷，可是俄国使臣却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冷淡地收下了帐篷，只是说这座帐篷对他很适用。他的行为使他的身价在我眼中降低了一些，因为他的财富很多，纵然送礼的是皇帝本人，他也拿得起用来报答的回礼。

58. 中国使团踏上归途

9日，我们凌晨便已拔营。俄国使臣派了几名自己的人整天陪送我们，他们一直陪我们走到扎营宿夜。其中有一个荷兰人，命运支配他到了这个地方寻觅幸福。10日，俄国人返回了涅尔琴斯克，我们则继续赶路。这一天，我们的钦差大臣派遣两名信使先行回朝，奏报皇上和请求奖赏有功人员。当钦差大臣们面对成百位官员向信使指示该如何奏报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伴都未在场。关于我和我的同伴，钦差大臣们都说了些什么话，我在此不再重复，以免引人嫉妒，同时也出于我对谦虚

的注重。不过，我是一个诚笃的人，我不能把一切都略而不谈。我只重复结尾部分，至于前面的段落，留待善于揣摩的人去推测吧。钦差大臣们说：“奏报皇上，托陛下鸿福，已如所期获致成功；赖陛下英明睿见，遴选两位神父。我等负愧而言，此行多赖他们二位。此番事务每每濒于危殆，皆因他们而得以挽回。倘非二人来此，我等势必一事无成。向圣上奏明此事，不得稍有疏漏。”一些官员在告知我此事后，热情地向我们祝贺。我不解，他们为何如此，而他们却答说，此乃理所应当。直至今天，一些底层人士仍保有此种看法。

59. 中国钦差大臣赞扬耶稣会士所做的工作

当我终于搞清这些祝贺的原因后，决定去见钦差大臣，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正在聚谈，我按鞑靼人的习惯，微微低下头来，对他们的褒奖言词表示感激。我说，我和我的同伴所作的一切，都是出于对皇上的一片忠心，只要此点得达圣聪，对我说来就是额外的奖赏了。万一他们像那些毁谤先前的天主教神甫的人，也恶意地隐瞒此事，那可就糟了。我低着头，他们也低下头说：“本来应该是我们去见你和夸赞你；你反而来向我们表示感谢。我们若不这么做，那就是剥夺你们的名声，盗窃你们的荣誉，因为尽人皆知，全部功劳都应归于你们。”

一位官员说：“我们的名誉乃至生命得以保全，全赖于你们；若是没有你们，我们将有何面目回返北京呢？”当他们向我们祝贺成功时，我多次听到这类话语：他们总是转过身来重复我方才讲过的话。有一次，国舅说：“虽然我对你的看法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我却不曾知道你效忠皇上是如此尽心竭力的。”另一个人补充说：“我没想到你们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他们决定把和约再用鞑靼文翻译一遍。我说没有必要重新翻译时，他们不肯听我列举的理由，便说：“我们承认，此事成功全赖你们。我们只要知道你的意见就足够了，何必再列举各种理由呢？”除这些公开的言论外，我手里还保留一封皇太子的舅舅的亲笔信（他奉旨先于我们赶去作详细回奏）。信中说，他亲口将上述一切面奏皇上了。我保存这封信是

把它作为一件证据，以备有人企图歪曲所发生的事件时使用。赞美真主，由于上帝的恩典，枯枝才结出了硕果，而且是在如此困难，如此危险的情况下结出的！

钦差大臣回到北京，向皇上回奏之后，皇上说：“迁延二十余年之事，今朝终于告成。”由此可见，皇上是多么关切此事，当他听到奏复时，是多么高兴呵。他另一次又说：“此事完结，甚惬朕意。”

61. 耶稣会士觐见皇帝。回京后的第二次觐见

后来，皇帝在自己寝宫接见我和我的同伴。我向他请安，并且叩问我下一步应如何行止——陪侍他，还是先行回京。皇帝异常欣悦地接待我们，令人高声宣读如下圣谕，俾使人人皆知：

“朕躬甚好，尔等好否？朕知尔等如何出力，为朕效劳，以惬朕意。朕亦知和约得以缔结，实赖尔等之才智与努力，尔等为此事出力颇多。尔等可于明朝随朕舅先行还朝。”

我们于10月18日抵家，等候皇上狩猎后回銮。皇帝返京后，我们前去请安。一位太监接待我们，对我们说：“圣上面谕咱家，知道你们今日一定来，恐怕你们找不到可向圣上转奏你们意愿的人（当时我们的挚友和传信人赵某正在患病），所以圣上命令咱家来见你们，你们的一切要求都可告知咱家，以便转奏，因为圣上认为你们并非外人，而是宫廷内臣。因此，你们可以宫廷内臣的身份讲话，详细奏明你们为与俄人缔结和约所作的一切，哪怕涉及自己的功绩和个人的事，也不要省略不奏。圣上已经知道的事，也应回奏，因为圣上听你们亲口讲述一切会感到高兴的。”此时，所有其他的耶稣会神父都在场，我们大家都按习惯跪伏在地上。我奏道：

62. 当北京全体耶稣会士在场时徐日昇所说的话

“首先，我感戴圣上洪恩，赐予我们荣誉，派您来接待我们和把我们的想法转达圣聪。圣上把我们看做自己的宫廷侍臣，而不是外国人；而且不顾事件涉及我本人，意欲听取我亲口所作的一切有关与俄人交涉的奏陈。对于这一切，我只能报答

说,我虽是外国人,而圣上能容忍我,这一事实本身就超出了我的请求。我本是草芥无用之人,如今聆听圣上纶音,令我回奏,深感受宠若惊。圣上命我陈奏,我在此行中所做的一切,我只能说,我做的只是圣上令我做的事。倘若我之所为尚符圣意,我认为这种接待便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奖赏。假使我的言语有何乖谬,伏祈圣上宽恕。”

太监坚持说:“你真的对自己的功绩无话可说吗?”我答道:“若提及我的活动,那么其中并无善举可言。甚至我即使有话可讲,我也没有能力和才智来加以表达。”

太监笑了,带着我的回答回奏皇上去了。我们未被召见,因为圣上正为皇后服丧。过了一会,太监回来说,圣上谕令赐茶给我们大家吃,这是一种恭敬的象征,虽然茶本身并无什么价值可言,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受此恩典。既然我们已为皇上尽力效劳,皇上已感到满意,我们回家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十七世纪中俄关系史》第二卷第四册,第1080~1084页]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

2月3日,康熙帝召徐日昇、张诚、白晋、安多等至宫廷,谕以后每日轮班至养心殿,以满语授讲量法等西学。4月17日,耶稣会士毕嘉送验器等科学仪器至京,由赵昌、徐日昇引见康熙帝。12月,康熙帝以时将严冬,念徐日昇、张诚、白晋、安多、毕嘉、苏霖供职勤劳,张诚、白晋、安多又日进内廷授讲,赐紫绶貂袖羔袍、天青缎袍套各一件,貂帽各一顶。○4月10日,教宗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迫于葡萄牙的压力,下诏以南京、北京和澳门为正式教区,葡王仍有推荐主教的权利。同时任命葡籍的加匝(Joao de Casal)为澳门主教,意大利籍伊大仁为北京主教。○罗文藻任南京教区第一位中国籍主教。7月20日,罗文藻从上海至杭州,副主教偕行。8月,罗文藻推荐意大利籍副主教余神父(Juan Francisco de Leonissa)为继任人,他向传信部报告余神父所识中国字不少,能讲中国话,熟悉官场往来程式以及地



第一任中国籍主教罗文藻像

方风俗,而且他是意大利人,能保持不偏不倚。罗氏在报告书有这样的话:“我看到了每个国家都为自己争利。”

教宗亚历山大八世任命罗文藻为南京主教的诏书(节译)

向可敬的罗额我略原为巴士尔街主教现在选为南京主教致候。

罗马教宗……为扩展我们现今拥有南京居民的中国南京,经征询枢机团的意见后以宗座的全权并权威,建立并制定……上述南京教区的统制,因着与我们或继任教宗距离太远的缘故,以一年的时期开始生效,……凡是关于同上述的南京教区主教并牧者出缺时,应经过我们或继任教宗的任命,并且常保持这种方式而另文有更详细的规定。

我们任命你为南京教区的主教并牧者,把该教区的一切神形管理权完全托付于你。我们信赖恩宠与赏报的天主,使上述南京教区,因上主的照顾,在你幸福的领导之下,获益而顺利地得以发展,在神形各方面获得长进。以你爽快的虔诚在你的双肩上接受主的轭,小心翼翼,忠实、明智地执行上述治理教务的重任,成为南京教会应享有的贤能有效的牧者,除了永远的赏报外,你将更丰富地获得我们圣座的祝福和恩宠。我们愿意你在执掌南京教区的任何教务以前,先要在位教会内有地位的人士前举行信德并忠于职守的宣誓,并应在一定的期间送达罗马。在南京教会内咨议会及一切按教会法应有的人选并其他有关敬礼所需要的制度,按良心的责任,尽可能应早建立。……

1690年4月10日于圣母大殿。我们就任第一年。

[原文为拉丁文,转引自(台)《恒毅》第三十四卷第十期]

1691年(康熙三十年)

2月27日,南京中国籍罗文藻主教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洪若翰(一名洪若)为其举行盛大葬礼。○浙江巡抚、杨光先的至交张鹏翮出告示禁止人民信奉天主教,杭州教堂殷铎泽神父请求张诚、白晋设法阻止。张氏等请索额图周全。徐日昇、安多等奏请

准殷铎泽准留杭州天主堂。

1691年6月10日罗文藻的副主教余神父致信传信部报告罗主教去世的情况,全文如下:

枢机诸大人:

训令拜悉,职务所指,谨竭卑忠,上书奉讬,曾意斯职,必待他人他年也,此亦余之私愿,终究不得脱卸。训令谓:凡有传教区主教逝世者,当由其署理人,速呈报圣座及传信圣部,兹有南京主教罗文藻公于年内逝世,虽上主田园极需其工,而主命若此!不敏当其在世也,曾承错爱,充其副主教,既而又为署理,悲痛泣零,讬闻于圣座并诸枢机大人。

罗公于本年2月27日,在南京逝世,享年七十有五,德寿备考,然观目前情况,及教民心愿,其死犹憾实深。

去年10月底,彼在淞江传教,操劳过度而染疾。初只微感不适,饮食乏味,不为意,登程赴上海,病势加重,乃就医。稍愈,又示意返南京,虽大家百方谏阻,仍动身。谓:此行久在计划中,关系天主之光荣至大。经此路途劳顿,又适天时不佳,或因服药无定时,而旧病复发。至南京未八日,即病倒。初时尚能走动,不久已卧床不起,再就医,然收效极微,或竟无效果,大夫多断为肝火,认胃部无病,其症候为牵连现象。后知病因不在肝胃,而在疲劳过度,元气亏盈,病症昭然,而初不察焉。故始则饮食失味,继则呕吐,经久卧床,肋部又压肿成疮,痛苦难忍。

既知末日已迫,彼乃专心备善终。12月19日办总告解,追悔毕生罪过,并当众宣发信德;恭领临终圣体,一生或有冒犯处,概请众人原谅,又勉在场诸人,勤谨遵守主诫。诸事就序,乃欣然以待主命。3日晚后,照常饮服汤药,腹胃疾痛,卒昏失,似已无复苏希望,乃仓促傅圣油。少顷,痛势竟煞。次日晚,又依大夫意,饮服汤药,痛发如昨,不得已,乃暂止药用,斯时呕吐日遽,痛无间时,终日不得安息,迄至12月终,每日不进他物,惟吸米汁度命。1月初,偶得神医,着手成春,疼痛全煞,疮伤亦消,只呕吐未止,然前病未痊,后病又发。医甫他适,

而通身抖颤，气喘不已，急呼医至，气喘渐平息，病又有起色，似尚未临绝境，然至2月中旬，呕吐更频遽，饮食药物皆不久，或进少许，转时又呕出。

既知医药不能为事矣，乃谢医术，而祈天恩，略身体而专精神，病期每日在卧室与祭，及呕吐日遽，热心亦日加，领主也更勤，言语举动皆堪德范。

至此其神志清明正常，然闻耶稣玛利亚圣名，马上严肃如常，聚精会神，恭谨呼诵，屡自捶胸，仰视耶稣苦像，或近之，则热切亲吻，至死不替。最后营养不济，精力耗尽，灵魂乃安然谢世，面有喜色，有如进享永福之征象。

罗公明悟聪颖，判事果断，眼光远大，有先见之明，常防备不测，计划周密，履行恒毅，生性愉快，和气可亲，具备一切优长，使近之者，无不油然而生慕。

于此全美天事外，又备修诸德，心胸宽大，临险不惧，历生为主故，海陆奔波，冒生命之险也，不知凡几，故当死亡临头，而笑面相迎，实不足怪也。

其信德至坚，死前不久，见近侍之某孙哭，乃笑劝曰：快止泪！非安听主命，勤守主诚之亲人，吾不认为亲人。

其依恃天主至诚，故事无顺逆，惟主命是瞻，而视死如归，彼虽屡言：思及毕生诸罪，甚畏上主审判，及告以上主仁慈无限也，心情顿归平静，仰瞻耶稣苦像，意谓此其依时所寄也。彼恒喜气满面，此亦其故也。病人每忌听死，彼则乐闻，且每自畅不讳。

至论其热心，我又何言哉？彼乐听人论天主，久久不厌。病中常要一司铎在傍，以与言天上事。吾与耶稣会士刘应（Claudius Visselou, S. J.）神父轮流值侍，听者不厌，以期言者亦不倦也。于神志清明际，亦屡令念临终诵，彼必静听，或应和，偶而昏迷，及苏，必问临终经已念过否。虽告都已诵念，彼此令曰：再诵来我听。

其坚忍精神，可于病中见之。病苦缠绵已极，后因久辍床褥，皮破成疮，又倍其苦，每当痛达极点，彼则呼诵耶稣玛利亚

圣名，以增其勇。痛定，则谢主恩，仍复镇静如前。

对其修院规矩——圣道明会——无分大小都恪遵不遗。中国对于后事，备极讲究，彼则不此虑，惟独以修会规定之寿衣殓之。彼事前已用粗布制备矣。

彼对众人，尤其对贫困者之慈悲，亦非等闲可比，何以见之？某冬，寒冷异常，闻有死于饥寒者，彼会调查贫寒教友，出私资而济之。又于生命末日，既谢医，后叹曰：出此巨费，以济贫困无靠者，获益者不亦众矣乎！

其救人灵之热火，于生平事迹皆足见之，然观教难期所做所为，其笃切犹显。当其轻官缉，遍踏九州也，冒风雨，犯寒暑，跋涉不择季节，到处施行圣事，鼓舞信众，弱者励之，蹶者扶之，虽有百劳不辞。彼对司铎职守之勤勉，犹跻登主教之预课也。后果升格，然非其所愿。故初丧然若失，固辞不受，惧不胜任也。经因教宗及诸枢机大人再次坚持，迫于服从，乃俯首拜命，此举之得失，吾且勿轻言之，然初谓不堪其位者，及履新执事，乃胜任愉快，而证实其材也。

其于教会也，功丰业伟，上主亦集殊恩而报之。于同胞信者中，彼得首籍道明修会，首升司铎位，首膺主教位，此非偶然际遇也，或谓天命，信矣！

凡此天恩奇征，及其为主荣而鞠躬尽瘁，更观其福终，则彼已进享天福无疑矣！然职务所在，敢祈圣座及列位枢机大人，看其毕生矢忠尽孝之赤诚，以虔祷，以圣祭代彼邀叩天恩为荷！

于此请再容一言，罗公照护属下羊群，竭尽机警，不忍其偶或失牧。列位枢机既有令在先，准其遭遇不测之际，任命一人代理教务。钦此。彼于多人中，谬囑不敏补代其缺，在杭州立字成凭，将逝，又当证人申命。

彼既知如此布署，想必主命使然，故不揣冒昧，暂行署理。惟望上主扶持，克尽厥职，无违训章，以俟命而让贤焉。附呈报告书一纸，详载教区刻下实况，拜请赐阅。

恭率教区同人，及全体教友，跪伏圣父膝下，祈赐宗座遐

福,并拜祝诸位枢机大人,康宁高寿,上天加福。

南京署理主教余神父(Fr. Joannes Franciscus a Leonisa)

1691年6月16日于南京

由罗文藻亲自晋铎的吴历(渔山)在得知罗主教讣闻,曾作“哭司教罗先生”诗,全文如下:

呜呼讣至今信死,恸哭先生东铎始;初自西归七闽乡,须鬓苍苍称清伟。适遭纷议尽遣粤,辙环四方独劳矣;勋荣超世主教尊,所传铎品只三子。鸣道辛勤各远方,惟我追随久于此;讵料冲寒又离去,奄忽长逝如眠尔。北望金陵千里天,再哭泪血成红雨;云来幽幽晓梦状,恍若居常每提指。兹者学道日已少,道在咫尺谁综理;仰悲大岭出雾迟,俯悯狂澜若无砥。当其斋候讲经学,巷拥轮蹄门集履;又期勘雠崇正事,秋毫无不贯西史。日谈前圣励后修,更将老笔笔于纸;一生到处历险危,半在小西半东里。忆从勇渡黄浦潮,今瘞雨花台畔里;景移物换空后殊,空帷象设俨相似。萋萋宿草日复生,墓碑超行诚难谏;垆木萧萧未得春,庐居愿独三年止。千古万古修事业,一言遗重委西士;而今谁不悟死归,梦回情至难忘耳!

〔以上录自张奉箴:《罗公文藻晋牧三百周年纪念》,闻道出版社,1992年,第58~62页〕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

3月,北京礼部官员开会,讨论天主教传教问题。在索额图的支持之下,康熙帝于3月17日发出第一道弛禁谕令:“西洋人治理历法,用兵之际修造兵器,效力勤劳,且天主教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其进香之人应乃照常行走,前部议奏疏着摺回销毁,尔等与礼部满堂官满学士会议具奏。”(《熙朝定案》)3月19日,康熙又下一道上谕:“前部议将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止令西洋人供奉,已经准行。现在西洋人治理历法,前用兵之际制造军器,效力勤劳,近随阿罗素亦有劳绩,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将伊等之教目为邪教禁止殊属无辜,尔内阁会同礼仪议奏。”在此情形之下,礼部官员开会,索额图亦列席会议,草拟了解除天主教禁令的奏

文：“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造军器火炮，差往阿罗素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使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3月22日，康熙皇帝批示：“依议。”这一系列文献为康熙帝颁布的传教宽容法令的全部内容。为鸦片战争以前天主教在华“正教奉传”之惟一官方正式认可之文件。○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nius Thomas）出任耶稣会北京会院院长及副省会长，直至1703年。○杭州官吏停止拆毁天主堂，殷铎泽于3月22日晋京谢恩，并呈进方物十二件。康熙帝又谕命内务府营造员外郎董殿邦、畅春苑编管李熙与安多南下广东迎接闵明我，同时照顾殷铎泽回杭州。○柏应理再度来华，5月在果阿外海遇风浪受伤而亡。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

3月26日，福建代牧颜瑄公布一条禁令，禁止传教士在其代牧区内，称天主为“天”或“上帝”，也不准信徒参与尊孔祭祖的礼仪，“直至圣座决定为止”。○5月，康熙帝偶染疟疾，张诚、白晋等进呈金鸡纳霜，康熙帝病愈，大悦，以西安门蚕池口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旧府赐给张诚等，并谕工部修葺。年底竣工，名“救世主堂”，是为北堂。六年以后，张晋再求隙地以建较大之圣堂，康熙帝许之，并赐砖瓦、木材、银两及什物，越四年而成。计长七丈五尺，宽三丈三尺，高三丈，堂内无明柱，壁有半圆柱十六楹，柱顶镂刻花草，顶绘穹窿形，人物如生。堂落成后，康熙帝赐额曰“万有真原”，又赐御撰联曰：“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照拯济大权衡。”堂上刻有“敕建天主堂”字样。○康熙帝命白晋回欧洲，增邀教士来华，并携礼物致法王。

1693年3月26日，福建宗座代牧颜瑄发布于福建长乐的训令，全文如下：

颜瑭,司铎,福建的宗座代牧,巴黎神学院博士,索邦神学院院士,在基督内向本代牧区全体司铎致意,基督是众人的真正的救主。

自从我们在天主的眷顾之下,来到中国之日起,我们的宗座代牧区所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如果可能的话,结束传教士们之间长期以来争论的种种问题,另外要给予传教士一个准则,在理论和实践上同样地加以遵守,直到圣座解决纷争为止。我们很遗憾地注意到,经常发生一些给教堂带来严重损失的事情,即在有关崇敬天主和铲除偶像崇拜的事情上,传播福音的使者们之间意见不一。有的人不考虑做这些行为是不是犯偶像崇拜罪,而另外一些人允许基督徒去做,或劝他们去做。结果是不少人认为某些活动是迷信的。但为了求得安宁,暂时允许这些活动。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对邪恶的宽容,反而使得邪恶得以生根并一天天地蔓延。

1) 我们教区的不少传教士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非常希望不仅要消除不同意见,而且还要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出于对我们管理的代牧区的关心,他们征求我们的意见。他们不愿意始终处于无休止的良心不安、疑疑惑惑的压抑状态下,他们坚持要求我们至少暂时作出决定,因为这问题比较严重,我们没有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很快给予答复。因为前任福建代牧区的主教把其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就按照他的命令全神贯注地关心这些问题。但是,在教廷为这个宗座代牧区选择了我们出任代牧以后,似乎需要我们为此而更加勤奋努力。我们可以千真万确地说,我们并没有蓄意忽视过任何能帮助我们达到真理的东西,不管是出自中文的资料,还是出自于我们能够得到的用某一种欧洲语言写下的评论,或者出自与学者的谈话。当务之急,我们在每天的弥撒及热切的祈祷中祈求天主在黑暗中照亮我们,教给我们走他的道路,告诉我们在他的眼睛里什么是他喜欢的,是他欢迎的。

2) 教廷的敕令和宪章明确指出,宗座代牧们都有责任在他们自己的代牧区范围内为有关崇拜天主及维护伦理道德作

好准备。为了在这问题上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命令我们教区内的每一个传教士在教廷另作出新决定之前，都要遵守下列规定：

I. 除了在某种不规范的语言以外，不要用中文去表达无法表达的欧洲名词。我们宣布应称真神为天主（天上的主人），这已经是长期用了很久的名称了。另外两个汉词——天和上帝（最高的皇帝）应该完全取消。不要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在汉语中——天和上帝——就是我们基督徒崇拜的真神。

II. 我们严禁在任何教堂里置放刻上“敬天”二字的匾。不管在什么地方，放上这匾的，我们都下令在两个月之内去掉。凡把真神称为天和上帝的其他的牌子和类似意义的挽联也都要去掉。我们的意见是，所有这些牌子，尤其那些有“敬天”字样的不能被认为与偶像崇拜无关。即使事情并没有我们看得那么确凿，也真正暗示着有危险，看到传播福音的教士可以在神圣的地方放置某件令人厌恶的东西，会把我们从这类牌子前吓跑。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代牧区内那些不让把这些牌子放在自己教堂里的传教士们，在传播福音方面毫不逊色，他们劳动的收获并不比其他传教士们更小。

III. 我们声明，这些问题没有如实反映，已经越过我们，呈交给教宗亚历山大七世了。因此，容忍中国人中间已经盛行的祭孔和祭祖，传教士们不能依赖教廷作出的答复——教廷的答复当然是正确、明智的，但却是根据可疑及含糊地描绘的情况而作出的。

IV. 传教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基督徒主持、参与或者出席一年一度例行的祭孔、祭祖的隆重仪式，我们宣布这种供祭是带有迷信色彩的。

V. 有的传教士在他们传播福音的地方力求取消了在家里供先人的牌位；我们对这些传教士大加赞扬，我们鼓励他们继续做下去。但是，在有的很难这样做的地方，至少采取一种适当办法：把“神主”、“神位”、“灵位”等字取掉，只能把亡者的名字写在牌位上，至多只能加一个“位”字。在教廷就这些问题

作出裁决以前，我们不能完全反对以上述形式出现的此种牌位。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对这种牌位以迷信的眼光加以理解。所以，在私宅里，牌位放置的地方必须用粗体字写上一个声明，声明基督徒对死者的一些想法，和子孙应该对祖宗如何行孝道。我们在这个指令的结尾附了此种声明的一个具体实例。我们并不反对采用其他类似意义的声明，不过它首先应得到我们的同意。

VI. 我们注意到有些在口头上，或在书面上流传着的一些说法，正把粗心的人引向错误，甚至为迷信打开方便之门。例如：

中国人教授的哲学，如正确加以理解并没有什么和基督教法律相违背的；

古代的贤人用太极这词把天主解释为世界一切事情的缘由；

孔子向神灵所致的敬意其世俗意义更甚于宗教意义；

中国的《礼记》(有关中国所有的习俗的礼仪的书)无论对自然界还是道德修养上都是一部杰出学说的集大成。

在我们整个代牧区，我们严格禁止散播大量这类似是而非、错误百出的言论或文字。

VII. 要让传教士们注意，在学校里用中文教科书讲课的基督徒们不向他们的学生灌输这些书的原文及注释中层出不穷的无神论及其他迷信的东西。要让传教士们要求他们驳斥明显的错误，利用批驳错误趁机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的学生，基督教关于天主及其创造世界、主宰世界是如何解释的，传教士们应经常告诫这些基督徒们不要把他们在课上学到的违背基督教义的东西掺杂进他们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

其他有些问题我们目前还没有考虑到。我们是在可靠的信息来源的基础上来制订上述规定的。在很大范围内，其他一些事情也是根据这些信息来源。根据这些信息来源很容易规定并在实践中指出在其他事情上该如何去做。

如果某个传教士——但愿此事不曾发生——没有按我们的指令在两个月内把他们的教堂里或他管辖的屋子里的牌位和我们所指出的条幅拿掉的话，或者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努力把我们的准则带进当地的习俗，我们现在就撤消我们及任何其他宗座代牧和代理宗座代牧给他的权力，并且我们还要在上述指定的时间当众宣布。

这样，我们现在重申，并且公开声明，我们并不想给那些以前有另外的想法、并不按我们为将来而下的命令去行事的人找岔子。在这种事情上，所有传教士们如果意见不一致，各行其事，每人处理事情的做法自认为在主内更与真理保持一致，那是不足为怪的。但现在让我们大家尝试达到这一点共识，大家众口一词，我们就可以证明教会并没有被带上污点或缺点，它还是它，神圣而又纯洁的。和平与博爱的天主和我们在一起。

1693年3月26日于福建省长乐

颜瑄(Charles Maigrot)

福建宗座代牧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8-10页]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

康熙帝传徐日昇至黻座前，赐金牙扇一柄并御题七言诗一首。○耶稣会士闵明我回华复命，奏陈遵旨会商各情，帝嘉许之，赏赉甚厚，仍令治历供职。○纪理安(Kilian Stumpf)奉召入京，佐理历政。

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

闵明我任耶稣会副省会长之职。在中国共有耶稣会士三十八人(内有六名华籍)，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九人，奥斯定会士5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六人，方济各会七十六人。○七月，黄宗羲卒，年八十八岁，生前著述颇丰，其中《西历假如》、《授时假如》

两书为天文历法书,受西洋学术影响较深。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

3月,康熙帝亲统六军远征厄鲁特噶尔丹,命徐日昇、张诚、安多扈从。9月,康熙帝再次巡行北塞,整理军务,张诚扈从(张诚曾先后八次出塞,皆有详细记录,书名《鞑靼行纪》,收入杜赫德《中国暨鞑靼全志》)。○8月9日,罗马教廷传信部再下令划分主教管辖区域:北京教区管辖直隶、山东、辽东,南京教区管辖江南及河南,澳门教区如前。除主教区所辖六省之外,其余各省分隶福建、浙江、江西、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九个宗座代牧区,并任耶稣会士罗历山为南京主教,原任南京余主教调任湖广代牧。其他代牧如下:福建严当、云南勒白朗、四川利勇、江西贝纳文、山西张安当、陕西格肋茂纳、贵州都加禄(Turcotti)、浙江亚莱阿拉(代理)。○崇明岛有三千教徒,九处堂口。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

3月,白晋回到欧洲,并携带康熙帝馈赠法王之名贵礼物,计有装潢精致之书籍四十九册,是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有中国书籍之始。○是年二月,康熙帝视师宁夏,张诚扈从。○教廷任命多明我会士希氏(Petrusd'Alcala)为浙江主教。

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

康熙帝遣张诚、安多随大臣同往喀尔喀,措置该部事宜。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

3月,白晋再次来华,带来十名传教士,他们是:翟敬臣(P. Charles Dolze)、南国光(P. Louis Pernon)、马若瑟(P. Joseph-Henry-Marie de Premane)、雷孝思(P. Jean-Baptiste Régis)、巴多明(P. Dominique Parrenin)、颜理伯(P. Philibert Geneix)、卫嘉禄(Fr. Charles de Belleville)、利圣学(P. Charles de Broissia),他们从拉巴舍尔港出发,船抵好望角时,再会合孟

正气(P. Jean Domenge)和卜纳爵(P. Ignace-Gabriel Baborier)随船同行。法王托白晋带一套装璜精致的画集,转赠康熙皇帝。康熙特派苏霖和刘应前往广州迎迓。○春,康熙帝启驾南巡,张诚、白晋扈从。2月22日,至镇江金山,白晋招集九位来华西洋教士陈圣修、利圣学、颜理伯、马若瑟、翟敬臣、南光国、卜纳爵、巴多明、卫嘉禄登上御舰,与帝共坐一舱,帝询各人特长,并聆听他们演奏西乐。2月26日,康熙帝至苏州,杭州天主堂教士潘国良至无锡境恭迎。28日,潘国良至行宫向皇帝请安。3月5日,潘国良在杭州进呈浑天仪。康熙帝邀张诚、白晋赐宴湖舫,游览西湖。四月初三,康熙帝在苏州虎丘赐宴张诚、白晋与潘国良。次日,康熙帝赐银二百两,交潘国良修复被毁之天主堂。○遣使会士毕天祥(Ludovicus - Antonius Appiani)、穆天尺(Joannes Mullener)抵华,他们在广东学习中国语文,二人回到四川附近传教。○洪若翰回欧洲。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9月,教宗英诺森十二世逝世。新教宗克莱门十一世于11月23日当选,即命圣职部审查中国礼仪问题。在华耶稣会士得知颜瑯派人去罗马上书礼仪问题的消息以后,乃请求康熙皇帝声明敬孔敬祖的意义。11月30日,康熙帝批示:敬孔敬祖纯为表示爱敬先人和先师,不是宗教迷信。耶稣会将康熙的批示,由四条不同的路线分途寄往罗马。○张诚出任法籍耶稣会副会长。○是年,中国信徒达三十万。○卫方济(P. Franciscus Noel)译《中庸》,名《不变之中道》(*Immutabile medium*),抄本存比利时皇家图书馆。○都加禄(P. Turcotti)和利国安(P. Laureati)神父在上川岛沙勿略墓地旁建一小教堂。

黄伯禄《正教奉褒》将耶稣会申辩及康熙帝批示录下: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阳历1700年11月30日)治理历法远臣闵明我、徐日昇、安多、张诚等谨奏,为恭请睿鉴,以求训海事。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

前日曾有上諭。多羅好了。經見之際再諭。例多羅言。我未必等得皇上回來之話。朕其憐憫。所以將欲下之旨。朕諭。朕所欲與吾意者。近日自西洋所來者甚雜。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傳名為行道。雖以分辨是非。如今爾來之際。若不定一規矩。惟恐後來惹出是非。也。覺得教化王處有關係。只得將定例。先曉白曉諭。今後來之人謹守

法度。不能少違。方好。以後凡自西洋來者。再不同去的人。許他內地居住。若近年來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許住。此等今譬如立於大門之前。論人屋內之事。眾人何以厭之。況且多事。更有做生意。踏賣買。等人。豈不可分住。凡各國各會皆以教天主者。何得論此。一舉同居同住。則永無爭。是矣。為片曉諭。

康熙帝关于礼仪问题的批示

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也而拜也。祭礼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义，惟尽忠孝之念而已。虽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过抒子孙极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效天之黄礼，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效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御书敬天二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智训诲。远臣不胜惶悚待命之至。本日奉御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

1701年(康熙四十年)

12月5日,教宗在御前大会中宣布将派一使团出使中国,任命多罗(Carlo Tommasco Maillard de Tournon)为特使,加安地约基宗主教衔。使团宗旨为团结在华各修会士,解决教务上种种困难,同时也在于执行宗座对于中国礼仪的决议案。同时还负有在中国贯彻宗座代牧制的使命。○洪若翰带另外八名传教士从欧洲回到广州。○是年,全国有耶稣会士五十九人,方济各会士二十九人,多明我会士八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十五人,奥斯定会士六人。全国共有教堂会口二百五十处。○11月4日,白晋自北京致函莱布尼兹,讨论中国哲学及中国礼俗,其主要参考资料为《易经》。

多罗,意大利都林(Torino)人,生于1668年12月,父为多罗侯爵。都林时为萨伏依王国首府。多罗幼时在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入大学以后得教律及民律两科博士。晋铎以后来到罗马,在教廷各级法院实习,曾创立阿加底亚学社(Accademia Arcadia),不久被教宗宫官长钱启(Baldassarre Cenci)枢机收为养子。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未当选教宗时已认识多罗,赏识其才华。成为新教宗以后便任命他为出使中国的特使。

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

7月2日,教宗颁布 *Speculators Domus Israel* 通谕,声明多罗宗主教为教廷出使中国印度及附近各国巡阅使,加上等特使衔(Legatus a Latere),具有指挥和解决教务问题的全权。使团团员有 S. Giorgi, Candela, Mariani, de Mai, Maleotti, Mercado, Borghese, Sidotti, Nicolas de S. José, Sigotti, Marchini, Luigi, Luigi Angelita 等。7月4日,使团起程赴热亚那,再赴马赛,直抵直布罗托海峡,出地中海达西班牙西维利亚(Siviglia)海港。出使之前,教宗函告葡王彼得二世、法王路易十四和中国康熙皇帝,请予使团以方便。○樊继训去世,康熙帝赐银致悼。○法国遣使会士毕天祥、穆天尺从广东去四川重庆传教。另外两位巴黎外

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白日昇 (Jean Basset) 和梁宏仁 (Jean-Francois de la Baluere) 则去成都传教。

1703 年 (康熙四十二年)

3 月, 耶稣会代表卫方济 (Francois Noël) 与庞嘉宾 (Gaspard Kastner) 抵罗马向教宗奏陈有关礼仪的意见书。巴黎外方会代表四川梁弘仁 (Artus de Lyonne) 亦到罗马, 双方各执一辞。○2 月, 多罗使团从西班牙 Sivigla 港出发, 2 月 17 日抵 Canarias 群岛中的 Tenerife 岛, 三个月后换乘法王路易十四所派两艘大船, 11 月 6 日抵印度本地治里。○年初, 白日昇从四川前往西安, 回川途中, 路经陕南汉中, 吸收了两名男孩为传道人, 他们即是李安德和党怀仁, 从梁宏仁学习。○洪若翰再次回欧洲。

1704 年 (康熙四十三年)

山东大饥, 流民就食京师无数, 皇帝特谕在京三处天主堂西士云: “尔等远来, 本以爱人为主, 今发帑币, 特命尔等前往赈济, 庶饥民得沾实惠。”○7 月 4 日, 多罗在本地治里公布文告, 禁止耶稣会诺比利 (Roberto de Nobili) 倡导的迁就婆罗门的天主教礼仪, 引起果阿主教奥古斯丁的不满, 他散发文告, 指教廷特使命令为无效。7 月 14 日, 多罗从印度起程, 9 月 20 日抵马尼拉。○11 月,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和教廷枢机委员会讨论中国礼仪问题, 获得如下结果: (一) 应用“天主”而非“天”、“上帝”来称呼神。(二) “敬天”字样应从教堂中消除。(三) 如果传信部有过答复, 并非是对原来上诉的真与伪的判定。(四) 禁止在庙堂上以隆重礼仪祭祖祀孔, 但允许在牌位前或私宅里举行私人仪式。至于坟墓前或殡礼中的公共仪式, 准许被动性质的列席和提供物质上的协助。至于可以容忍什么, 采取什么措施预防, 这两个问题需留待圣座决定。(五) 禁止在牌位上刻一般人使用的碑文, 但准许在牌位上刻亡者的名字, 同时注明基督信仰对于死亡的解释。(六) 关于中国宗教的性质, 传信部承认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

判定，宗座视察员可以与中国主教及代牧磋商以后决定。11月20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颁谕，正式禁止“中国礼仪”。○南京主教耶稣会士罗历山卒。

1704年11月20日的决议，正式判定“中国礼仪”为异端，应予禁止。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的谕旨

谕旨确认了上述作出的答复，谕旨是经过仔细考虑以后发出的。

1704年11月20日星期四

罗马圣部和宗教裁判所在教宗宫殿举行会议，有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场，圣座指定的在普世教会里专门审查异端的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们参加了会议。

教宗确认并批准了上述答复。教宗自他就任时起就参加了各次会议，听取了由其前任教宗英诺森十二世指定的神学家和专家们的意见后，认可了上述各条答复。这些会议都是讨论有关上述问题和疑问的。教宗多次和贝鲁特和罗莎利亚的主教们以及现在旅居罗马的中国教区的代牧们进行讨论。他也留意听了耶稣会的总务长卫方济(Francis Noe)神父和庞嘉宾(Gaspar Castner)神父及中国教会的传教士们能或想要在这次争论中提出的任何意见。上述的答复是由各圣部会议当着教皇的面，经过了长久、认真的讨论和调查批准的。

教宗命令这些答复要发给查理·托马斯·德·多罗(Charles Thomas Mailland de Tournors)，他是安底奥基亚的宗主教和中国及东印度国家的宗座巡阅使，教宗还附加了看来是必须的、专门的、恰如其分的指示。目的是无论他，或者其他总主教、主教，还是在那些地区掌握权力的巡阅使、宗座代表，或宗座代牧，都必须注意每一个在那里的传教士，不管属于哪个修会、机构，甚至是耶稣会，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这些答复。他们应该注意在这些地区内的所有基督徒们都应认真遵守这些答复。不遵守这些答复的应该按教会法受到处罚。

出于种种合理和公正的原因，教宗认为这些答复在罗马和欧洲其他地区暂时以不印发为宜。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执行这些指示的。

罗马教廷和宗教裁判所书记员巴尔托利 (Giuseppe Bartoli) 记录于 1704 年 11 月 20 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位第四年。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 24 页]

1705 年(康熙四十四年)

4 月 2 日，多罗特使率使团抵达澳门，4 月 5 日，多罗穿中国服装，坐肩舆入广州城。多罗在广州寓奥斯定会院，该会和方济各会士都是西班牙人，不服从中国的代牧和主教管理。毕天祥前往广东迎接特使，请求经济援助四川教务，特使以其熟谙中国情况及华语，请他担任译员。6 月 20 日，多罗致函在华各修会会长，令各会传教士直属主教或宗座代牧管理。又在广州设立传信部驻华办事处，经管发放津贴、分发部派教士等事。多罗决意请在京葡萄牙籍耶稣会会长安多代奏，请求觐见日期。7 月 17 日，闵明我、安多、徐日昇、张诚以教宗特使已抵广东，缮折奏闻。康熙帝饬部行知广东巡抚优礼款待，派员伴送来京。又遣两广总督之子，同张诚、苏霖、雷孝恩等先期前往天津迎候。8 月下旬，多罗收到康熙帝批准入京的邀请。9 月，多罗由广州乘船北上，北京主教伊大仁在山东临清迎晤，皇帝亦派亲王迎迓，并换陆路进京。○12 月 12 日，多罗的医生去世，康熙帝派人致祭，见所行的丧仪与耶稣会士不同，便起了疑心。12 月 14 日（一说 12 月 4 日），多罗抵京，驻西安门内天主堂，康熙遣内大臣到堂问好，颁赐珍饈。12 月 31 日，多罗觐见，康熙赐座，亲执金樽赐酒，并赐宴，计金盘珍饈三十六色。当时多罗卧病在床，康熙帝特差官到北堂用肩舆迎入宫，在畅春园下。康熙帝见多罗病态，命免跪拜，并赐座。康熙帝感谢教宗派使的盛意，并命特使指定一员，携带朝廷礼物，往罗马答聘。多罗请康熙帝任命一中国教务总管，康



教宗特使多罗像

熙帝答复总管的人选应是熟悉中国事务并为朝廷效力的人，理应在朝的耶稣会士，这是多罗不愿意的，故此事未果。康熙帝也没有同意多罗在京城建堂的请求。同时，康熙问到了关于敬祖敬孔的批示，命多罗上书奏明。接见时，康熙帝态度和蔼，款待周到。○8月8日，奥地利籍耶稣会士费隐(P. 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来华。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

1月4日，康熙帝召多罗特使问往御园狩猎，多罗因病，派团员一人代行。2月27日(一说26日)元宵，康熙帝招多罗往城外御园观灯、烟火，并赐宴。次日回城。新年时，北京教友觐见多罗，特使随行秘书毕天祥(Appiani)告诫他们在礼仪上勿参与迷信，北京教友中即传言特使禁止祭祖。3月7日，教友特使多罗请愿，毕天祥和另一教士 Frossoloni 竟当面夺下请愿书扯碎。3月21日，有京外远道而来的教徒一百余人请见多罗，其中有人高举请愿书，多罗竟将请愿书掷于地上，毕天祥大骂教徒，禁止他们再进特使寓所。不久，康熙帝欲派使节去罗马报聘教宗，想派白晋为正使，沙国安为副使。但多罗不愿由耶稣会士白晋充正使，康熙帝因此想撤换白晋，多罗又恐教宗知道以后不满，遂停止撤换白晋。6月24日，康熙帝下谕：“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者，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一定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教化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先明白晓喻，命后来之人谨守法度，不能少违方好。以后凡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的人，许他回地居住；若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居住。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外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以服之？更有做生意，做买卖，此等人益不可留住。凡各国各会皆敬天主者，何得论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则永无争竞矣。”6月29日，康熙帝第二次接见多罗，礼节已不如前隆重，态度不如前和蔼，并一再追问他来华目的，多罗不敢正面回答，只说向皇上问安来。次日，康熙帝邀多罗游畅春园。两日内，康熙帝表示，西洋人如反对敬孔祭祖，则很难留居中国。7

月22日,康熙帝命颜珪往热河行宫,毕天祥、安多、巴多明、薄贤士同行。8月1日觐见时,颜珪说福建方言,巴多明翻译。康熙帝指御座后四字,问他是否认识,颜只认得一字。8月2日,康熙帝亲笔谕曰:“(颜)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3日又谕:“颜珪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8月11日,康熙帝再以上事谕示多罗,多罗请准离京,帝立即照准。20日,多罗离京南下。12月17日抵南京。同时,康熙帝下谕驱逐颜珪及浙江代牧何纳笃(Donato Mezzafalce)等出境,又将毕天祥发往四川,就地拘禁。并命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必须遵守利玛窦规矩,并且领票。是年冬,康熙帝召见所有在京之西洋人,面谕曰:“朕念你们,欲给尔等敕文,尔等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遂谕内务府:“凡不回去的西洋人等,写票用内务府印给发。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复回西洋,已经来朝觐陛见,为此给票。兼满汉字。将千字文编成号数,挨次存记。将票印成款式进呈。钦此。”○穆天尺在四川被捕,被押往广东,但中途脱逃,潜入北京。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七月初九日(8月12日)武英殿
总监造赫世亨奏报诘问西洋人情形折

赫世亨奏:窃照本月初八日晚奉旨:尔所奏多罗之事,稍有应当思虑之处,言语亦稍暗昧,似仍未明晓。着尔复行察明具奏。初九日报来时再降旨。尔亦打听奏来。钦此钦遵。初九日晨,赴多罗处,奴才称:昨日我在内庭,至晚而散。据我家人禀告,尔曾与毕天祥同去我家,等语。有甚事而往欤?多罗言:尔为我很辛苦,亦甚优恤我,今我将离京而去,故前往致谢于尔。等语。奴才遂曰:尔以为我对尔好,我若不将我之真心告诉尔,我亦成为骗人之人矣。我未曾为尔辛苦、施爱,皆皇上派我不时看望、不时施恩。此外,施我中国前所未闻、前所未见、格外之恩于尔,亦不计其数。虽尔频频生事、胡乱牵扯,皇上仍念教化王之所派,仅望改正。此次又劳圣心,数降训谕,尔不回奏

一句有理之言，惟称俟教化王定后遵行。尔如此背逆行事，且到我家我羞愧，并为尔甚是忧虑。非但我此处之人鄙视尔为无情无理，尔西洋各国之人岂有不说玷辱教化王派遣之理乎？况且，前日我令尔改写以轻重倒置之处，尔闪烁其词，未陈明是否修改。旨内之言甚明，且其尔西洋四五人彼此不能解释通晓之处，问我等颇为详细翻译之文，尔只装不懂自慰。今日来尔处，谅尔通晓旨意而往找我，是以前来。若知前去向我致谢，我无须前来尔处。多罗之情状，甚惧且愧，自坐处起身，跪请具奏。其言曰：旨甚深奥，我未通晓是实，皇上原先将我全恤优待之格外之恩，以及节次教训殊旨，我感戴不尽，我必依旨全行禀告教化王，即现降二旨，亦皆皇上但愿归善之仁意，我丝毫不向教化王隐瞒。再者，改易书写之处，亦照原译全行更改。若本月十九日不去，则二十日必去，昨去尔家，除致谢于尔外，我亦想将感戴皇恩之情告知于尔，并请皇上之安，是以前往。所有请皇上之安，笃切感念皇上恩德，钦遵皇上训谕全行禀告教化王之处，尔其代我具奏，等语。

奴才又打听得，巴多明等言，伊惟指望者，欲得旨内一破绽，传旨时得失言，得则为把柄，以解其咎而转嫁他人。今伊至愧且窘，复亦甚惧。倘若伊不以全行寄告教化王，则我等众人必寄于教化王，伊岂不知之乎？再者，皇上何其奇才，以我等浅见，事情皆归了结。今既得旨：言语亦稍暗昧，似仍未明晓，着尔复行察明具奏。钦此。复令诘问。多罗乃词穷至极，动转不得，无奈方言更改转写之处，感戴皇上之恩，愿将皇上之谕旨全行禀告教化王。等语。为此谨具奏闻。

朱批：朕已派赵昌。着尔等共同详加询明后奏来。

〔选自《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第434~4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七月初十日（8月13日）武英殿
总监造赫世亨等奏报西洋人情形折

赫世亨、赵昌谨奏：窃照赫世亨于初九日奏折，奏旨：朕已派赵昌。着尔等共同详加询明后奏。钦此钦遵。领旨问多罗

曰：尔到此即奏称：来中国之西洋教徒，蒙圣主体恤施恩，教化王闻之，感戴皇恩，特派我谢恩，此外并无他事。等语。朕以尔为教化王所遣之人，来自远方，体恤优待。尔于朕前屡次奏称并无他事，而今首告他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随意偏袒，以此观之，甚为卑贱无理。尔自称教化王所遣之臣，又无教化王表文。或系教化王所遣，抑或冒充，相隔数万里，虚实亦难断。今白晋、沙国安将赏物全行带回。嗣后不但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来中国修道之人，俱止于边境，地方官员查问明白，方准入境耳。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来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再者，尔若自谓不偏不倚，先后奏言毫无违悖，则敢起誓于天主之前乎？朕所颁谕旨，乃尔所奏所行诸事，尔虽隐匿不告知教化王，然朕处使此处西洋人，赍书尔西洋各国，详加晓谕。钦此。又问：尔答词内称，奉旨：今若不照朕之所定，共处犹如一家，而以我会你会，仍乱告不止。钦此。我天主教之例，若系一会之人，则如一家，财物同用，不分你我，共同生活。异会之人，虽教（化）王，不可逼迫其共处如一家，多罗我更不能。等语。将此答词，着尔具文，用图书给我等，我等为一凭证。我等本以为教化王谅能调和统辖尔等教徒，原来不能管理。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则我等管束何难之有。于是，多罗将伊答词，写汉文以给。而后，将多罗所给汉文内之言，问多罗曰：尔言蒙皇上之恩，如此教诲于我，即令我立功于天主前也。等语。览此言，即如皇上有伤于尔。然而，尔这般具奏，为何？答称：皇上派尔等降此谕旨，凡人亦皆得知待人无理。等语。又问：若是这样，教化王派人叩谢皇上之恩，非善意欤？尔这般为乱，皇上亦惟念教化王之颜面，如此教汝耳。但有令尔随意妄动之理乎？多罗又答称：若念教化王之颜面，则待人这般无理乎？我等乃言：尔之这般妄行，教化王尚不知而已矣。想尔教化王一有见识之人，果知尔如此行为，尔不但难会教化王之面，即尔同友亦不

可会见。多罗言：我如到教化王处，教化王我言而已矣。教化王甚为公正，若审问我，我亦将承认，等语。又问：尔之答词内称，尔所行之事，皆仰副皇上之意，以博皇上喜悦，等语。尔所谓仰副皇上喜悦者，系指何件事？自尔之来，为尔之教颁下数旨，尔又一次未从。况且，将既不识书又不通中国言语之严瑄，经尔具奏派往塞外皇上处，为尔等之教，皇上降旨开导，严瑄不晓，具强奏皇上之旨不合天主教。皇上犹念教化王之颜面，恐尔甚羞愧，并未数落严瑄而宽免。尔并不责斥严瑄，反为严瑄偏护，巧饰为是。尔之这般作为，可谓仰副皇上之意，以博喜悦乎？多罗理屈词穷，答称：我所写之文，情况全备，我无须再答对，尔等但以我书具奏，皇上览毕，知我情由。倘若皇上询问，我再答对。等语。奴才等问：先以尔教之故，皇上屡次降旨教训，尔自称全已知晓，然尔皆未明白。今又称皇上知我意，系指何事？多罗不答，亦不出声。是故，我等又言：尔这般不出声，则尔此含混之文，我等亦无颜具奏。多罗言：尔等催我说者，特勾引我说出对皇上不合之语，而后以为把柄也。我等乃言：我等非那样小人，我等亦系吃人食之人，岂有持似此入地心而行之理乎？我等言虽如此，尔亦不信，今供奉天主于此，我等可跪于天主之前，发誓谁有如此之心，当即进入地下。多罗甚惧且词穷，只不出声。伊又说赫世亨所奏之言，与伊言相违不同。赫世亨乃执所奏之折子，曰：尔若说如此，今我这所奏二折子内所写之言，若与尔言不同，有相违之处，则尔指出。等情。欲读折子告诉伊时，伊又说：尔读之奏疏，可乎？尔给赵老爷读之。等语。是故，赵昌取之欲读。时多罗与毕天详言谈颇久，而后说：我无须将尔等所奏之言，逐一聆听辩明。等语。我等又曰：将尔具奏之言，尔若不解释，我等不得明白，则我等亦不可具奏。伊乃不语，亦不出声。是故。将伊拟奏文稿，奴才等未得完全询明，半途给伊而出。

奴才等察多罗之状，明知已非，且伊断不认错。将此情由，向旧西洋打听，据称多罗之意，若在此即领其非，则伊到西洋之后，不能自释，难向教化王回话，是故死忍，只答其身无

过。希图将伊自无过之答词,及佯装以转奏之言与伊言不同,从中破坏伊事之诬赖之词,若奉旨不理,则伊反胜;若奉旨明辩,尽揭其恶其非,则伊尚可以我为天主教立定主意,耶稣会徒陷我,我不理睬。等情,禀告教化王。决计于此,方不顾人之如此耻笑,舍丑事而为之。等语。是以,将从其起草汉字书中抄录之汉字书,及开写将严瑛等不与多罗一同遣回缘由告知多罗之事之文,一并谨奏。

朱批:鉴多罗汉字奏稿,似并无大逆之处,惟尔等究诘得太厉害,故伊以为尔等向此处西洋人,先穷究而后害之,以致益加执拗。外国之人,若又倍加究诘,设或出言不逊,尔等不能忍受。今惟告伊:欲将尔前后之言,定毕具奏,则我等愿为具奏,等语。若伊说具奏,则应具奏其书。俟具奏时,朕另有旨。

[选自《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第435~436页]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

1月25日,多罗在南京向全国天主教传教士发布公函(于2月7日公布),宣称教宗已经禁止敬孔祭祖,算卜、祭天地、祭鬼神均应禁止,祭孔也应禁止,信徒也不能在家供祖宗灵牌,也不能以“天”或“上帝”称呼天主,如有违反,受“弃绝”处罚,教宗与特使保留赦免权。○2月,康熙帝开始作最后一次南巡,在扬州、南京、苏州、杭州、临清等地,均接见教士,凡不愿领票者,一律押解广州天主堂居住。○3月22日,张诚在北京去世。○4月1日,上谕命西洋人穆德我、安怀仁、李若瑟、瞿良士、索诺俱留广州修道俟龙安国、薄士贤一同前来北京,但不准传道。5月30日,直郡王允禔传旨:凡不愿领票者,一律押解广州天主堂。同时,康熙帝差户部员外郎巴哈喇、养心殿监造笔帖式佛保到广州传旨,命多罗出示来中国之教宗任命状及国书,否则押他往澳门。多罗拒不出示,遂被押解澳门。9月29日,康熙帝下令叫回白晋和沙国安,赠送教宗的礼品,一并收归国库。○6月29日,多罗抵达澳门,澳门总督 de Pinho Texeira 奉葡王若望五世和果阿总督训

令,将多罗视为国事犯,因多罗来华未获拥有远东保教权的葡国同意。澳门总督派兵看守多罗所住的会院,并禁止其行使职权。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在澳门的会长,均服从澳门总督和主教,但有多名方济各会士和多明我会士则服从多罗特使。11月25日,多罗上书传信部,报告当时中国只剩下伊大仁和白万乐两位主教,他因此任命刘应为贵州代牧,兼领湖广教务。刘应为法国耶稣会中反对中国礼仪的人士。又任命 Ventallot 为福建代牧,Laghi 为陕西、山西、四川代理主教。多罗被囚的消息传到罗马,教宗乃向葡王抗议,葡王不理。8月1日,教宗颁令,册封多罗为枢机。○是年八月,新来广州的西洋传教士十一名,康熙帝命将有技艺之庞嘉宾、石可圣、林济各送往北京,其余卫方济、曾娄思、德玛诺、孔路思、白若翰、麦思理、利奥定、魏济各等八名教士,俱留广州,不许出省。○是年,康熙帝先派耶稣会士龙安国(Antonio de Barros)、薄贤士(Antoine de Beauvillier)出使罗马教廷,向教宗作证,他于1700年写给耶稣会的关于中国礼仪的御批是真实的,但龙安国与薄贤士两位因遇风暴,死于海中。10月27日,康熙帝又派两耶稣会士艾若瑟(Giuseppe Antonio Provana)和陆若瑟(Raimundo José de Arzo)赴罗马,他们也都死于欧洲,没有完成使命。○在四川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士白日昇、梁宏仁不愿领票,被逐往澳门。李安德与党怀仁同伴前往。

1707年1月25日,多罗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教令,2月7日公布。当时他还没有收到教廷于1704年11月20日作出的决议,但他已知道教廷在文件中要禁止中国礼仪。故他颁布了这道教令,全文如下: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派往中国特别全权代表安底奥基亚的宗主教多罗枢机的教令。在此教令中,他规定基督的传教士在受到皇帝朝廷召见,并询问有关基督宗教时,应该作的答复,同时他公布了1704年11月20日罗马教廷发出的圣座有关中国礼仪的裁决。这个裁决给重大的中国礼仪之争划上了句号。

受天主及圣座的恩宠,安底奥基亚的宗主教,教宗克莱门

十一世的亲信大臣，教宗助理，罗马教廷及宗教裁判所顾问，宗座在东印度、中华帝国以及附近的各国各岛的特命全权巡回使多罗向各位致意。

各位尊敬的主教弟兄，各地的正权主教和宗座代牧，各代牧的代表，在中国的各位传教士，祝主内永远健康。

我们听说传教士们正受到皇帝召见，被询问有关我们神圣教会的一些事情。我们借此公开宣布，我们要能够把主的福音的好种子从带有迷信毒素的东西中区分出来，我们要一致作真理的见证和捍卫者。我们要心口一致地光荣天主，不要给在荒野里徘徊的人们作坏榜样。天主不是争吵之主。

我们忠于圣座的想法，忠于最近圣座和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个决定，是经过多年认真研究，详细审议了长期以来扰乱着传教士们的争吵后作出的。

为了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决定建议、公布和建立一个明确的法规，以便使大家将来共同遵守。我们以全权代表的权威，制订、命令、要求所有传教士执行，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各修会的传教士们，甚至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都要照此回答我们所听到的，和要被问到的问题。

如果他们被问到有关中国传统教导、法律、礼仪、一般习俗，他们是否同意这些东西，或者答允不攻击它们，不在口头上以书面反对它们时，他们都必须答复如下：如果它们是和基督教法律相容的，或者可以与之合法及恰如其分地相符的，答复是可以的，否则不行。

如果他们被问到在神律中是否有与中国传统的教导的不同之处，他们必须回答：有许多不同。当要求他们举例说明时，他们可以尽他们所能想到的，阐明算命、祭天、祭地、祭太阳、祭月亮、祭其他星宿和神灵等视之为人文学科和艺术的发明者的意义。基督徒只能祭万物的创造者天主，他们从天主那里得到祸或福。

当他们被问到敬祭孔子和祖宗的焦点问题时，他们应该作如下回答：不行。我们不能奉献这样的祭品。我们不允许听

从神律的人们祭孔和祭祖。

同样地,关于中国人习惯使用牌位以尊敬死去的祖宗,回答是:不行。

当他们被问到“上帝”或者“天”是否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天主时,回答:不是。

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想时,他们应回答:因为这些事情和对真天主的真崇拜不相容,因为这个决定是圣座作出的,而在信仰领域内,圣座是基督徒的不能错误的导师。

当被问到圣座决定是哪一天作出的时,他们可以说:众所周知,这个决定是1704年11月20日发出的。

然后,当问到“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决定的”时,他们可以回答:我们是从我们的上级,即安底奥基亚的宗主教所陈述的声明中得知的。根据他的职权,他亲自传达教宗的指示,我们一定得相信他。

我们就这样告诫并命令你们遵守。

本人不才,但蒙教宗给予宗座权力及全权代表之权力来处理问题。我们要求每一位主教,宗座代牧,各地的正权主教,传教士和司铎,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修会司铎——甚至耶稣会的——现在中国的传教士,以及将要来此地的传教士都有服从的义务。否则就遭自动绝罚的处分,除在临死前的情况外,只有教宗和我们保留其赦免权,任何人不能借口教宗们给予的特权而逃避这种绝罚,即使耶稣会的神父们也如此。必要时,由于我们为此目的而享有的特别权力,有权吊销或撤销任何与之相违背的特权。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回避此教令或者对它另作解释,比如说:求助于教宗亚历山大七世1656年发出的教令,或者借口会引起某种重大的危险。

根据罗马的特许,教廷把解释、宣布宗座宪章之权委托给了我们。因此我们声明,不管亚历山大教宗的教令如何说的,或者不管会引起任何严重危险,所有愿意留在中国传教区或者进入该传教区的人,必须以此教令为准来布道和回答问题,否则就会受到上述的自动绝罚。教会和中国传教区的最大利

益在于维持神圣配偶(即天主教会)的荣誉和纯洁。基督用他的鲜血赢得了其配偶,给她穿上了无缝的长袍。

安底奥基亚宗主教,宗座巡回使 多罗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位第七年 即1707年1月25日于南京

主管传教区的宗座巡回及宗教传教事务的秘书安德鲁·坎特拉(Andrew Candela)

1707年2月7日公布于南京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27~30页]

张诚主要著作:(1)《几何原本原理》,用满汉两种文字编写,康熙帝亲自审核,于1689年刊印。(2)《实用几何原理》,选自Pardies神父著作,遵旨写成满文再译成汉文。(3)《哲学基本知识》选自法国王家学院院士Deshamel著作,译成满文供康熙阅读。(4)《测星仪使用法》,1689年用中文写成。(5)《有关鞑靼史的一些记叙》。(6)《1688年—1699年间八次塞北之行记叙》。1688年、1689年与徐日昇同行。1691年与安多。1692年、1696年与安多、徐日昇。1696年、1697年、1698年三次均与安多同行。记载了当地自然、地理、居民生活、喇嘛教、长城和皇帝狩猎,还有各地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并第一次向西方介绍骡子的品种。(7)《实用天文学》,拉丁文写,供钦天监用。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

4月,雷孝思、白晋、杜德美三人,奉康熙帝之命,测绘万里长城位置,以及附近河流地貌。10月,费隐、雷孝思、杜德美奉命往北直隶各地测绘地图。○11月,徐日昇卒。上谕:“朕念徐日昇赍诚远来,效力岁久,渊通律历,制造咸宜,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秉性真朴,无间始终,夙夜殚心,忠悃日著,朕嘉许久矣。忽闻抱病,犹望医治痊可,遽尔溘逝,朕怀深为軫恻。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端,以示优恤远臣之意。特谕。”○穆天尺再度被捕,逐往澳门。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

2月2日,被软禁于澳门的多罗祝圣耶稣会士刘应为贵州代牧,但未到任。6月,安多去世。康熙发布上谕云:“安多自西以来,于天文历法事宜,甚实效力,今闻溘逝,朕深为轸恻,照赏徐日昇例,赐银二百两,大缎十端,以示优恤远臣之意。着李国屏、王道代送去。”○穆天尺与其他被捕教士,被押往巴达维亚,但不久又回澳门。○多罗在澳门为李安德与党怀仁行落发礼。后二人赴暹罗大城府修院学习。

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

1月6日,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马国贤(Matteo Ripa)、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 Bonjour)、庞克修(Joseph Ceru)、任掌晨(Gennaro Amodei)、潘如(Domenico Perroni)在澳门深夜晋见多罗特使。山遥瞻跪呈枢机小红帽以及教宗的策封诏书。17日,多罗在寓所举行正式接受枢机红帽礼。3月4日,多罗枢机上奏康熙帝,告知受封枢机,又奏新来教士六人,愿往宫内服务。康熙帝命官员传旨,申饬多罗奏折用五龙爪边违式,令其改正。4月25日,多罗病势加重,卧床不起,延至6月8日去世。两广总督赵弘烂奏报:“至传指示臣等诘问多罗情由,查多罗已于五月拾贰(阴历)病故,并无别情,取结在案,无庸申饬。”○6月,费隐、雷孝思、杜德美在黑龙江一带测绘地图。○7月,谕将山遥瞻、马国贤、德里格安插在广州天主堂内学习汉语。马国贤进呈所画之山水、人物画及临摹理学名臣陈献章遗像进呈御览。12月,德理格、马国贤、山遥瞻抵达北京。○是年,康熙帝谕命在江西临江的法籍传教士傅圣泽(J. Franciscus Foucquet)进京襄助白晋研究翻译《易经》。后傅圣泽又著有《道德经评注》,为拉丁文及法文合译稿本。

1711年(康熙五十年)

2月4日,德理格、山遥瞻、马国贤觐见康熙帝。德理格留在宫中从事音乐工作,马国贤则从事绘画。○3月15日,教宗克莱



马国贤像

门十一世颁布通谕，确认多罗在 1708 年 7 月 3 日关于“礼仪之争”的教令。○5 月 15 日，江西巡抚郎廷极奉康熙之命，送法籍教士傅圣泽进京，傅圣泽奉命与白晋共同研习《易经》，撰有《易经稿》，后因与白晋见解不同，改为从事修历工作。6 月 6 日，德里格、马国贤与耶稣会士若干扈从康熙帝出关。帝常询问教会中对礼仪问题的各方意见。○是年，雷孝思与新到中国的麦大成 (Joannes Fr. Cardoso) 奉命前往山东；杜德美、费隐、白晋及山遥瞻测绘长城西部，即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直抵哈密。测绘的技术指导，全由耶稣会士担任。山遥瞻属奥斯定会，擅长地学，在欧洲已负盛名，来华三个月即加入测绘工作。○卫方济所译《中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在今捷克布拉格问世，“六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及《三字经》。○法国遣使会士穆天尺从澳门秘密潜入四川传教，因官府搜捕甚急，乔装商人、挑夫等，辗转各地。

1711 年 3 月 15 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的文件确认多罗 1708 年 7 月 3 日的教令。

按：克莱门十一世的文件确认教宗特派员、中国和其他东印度诸国总巡阅使多罗枢机主教关于传教工作的教令、担任地方职务及对将来前景的展望。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备忘录

1. 1708 年，查尔斯·托马斯，罗马教会的枢机，又名多罗，由我们指派作为我们和教廷在中国和其他东印度国家的特命全权代表、总巡阅使。他听说澳门发表的文件正在这传教区蔓延开来，他受命纠正种种滥用职权藐视宗座权威的事情。他严格禁止任何传教士，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各修会会士，不论是哪个修会的，没有教宗特派员和总巡阅使多罗枢机主教本人的允许，不得擅自进入这些传教区。未被允许者被禁止在这些传教区从事工作；同样，未求得允许者也不得擅自离开这些传教区。这个禁令对违背者处以自动停止教士职务的处罚。

同时，他禁止任何人，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修会会士，在

没有得到特派员和总巡阅使多罗的准许，而以神长自居向他的属下或他的修会发号施令。违者将按上述教令亦受到同样的处罚。多罗的教令详细刊载如下：

多罗受天主和圣座的恩宠任安底奥基亚宗主教，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的亲任大臣，由上主安排作他的教廷助理，罗马教廷和宗教裁判所反异端的顾问，东印度和中华帝国及其附近国家和岛屿的宗座特命全权代表和总巡阅使等职，向主内每位传教士，无论教区司铎或任何修会的会士，及他们在中国传教区的神长们致意：

在我们看来，教会是一条由天主安排得很好的战线，天主把万物都安排得完美无缺，永不改变，他的意愿是不能有丝毫更改的。像战场上为其领袖战斗的战士那样，凡宣誓愿在耶稣基督的旗帜下当兵的人都要学会听从他们长上的命令。确实地，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根据宗徒的传统我们必须始终紧跟圣统制中的首领，按照每个成员的不同级别而相应地工作。作为长上，我们应当听基督的声音，尊崇基督的形象，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听从长上，即使长上情绪不好也要听从，向天主奉献我们的服从胜于向他献祭品。

如果说任何固定的地方都把秩序放在首位，那么这儿更应该如此。因为这儿是基督宗教的圣德应在其传教士健全的纪律中发出光辉的地方。教会圣洁的名誉，依赖于教士们的行为及他们作出的榜样，他们对天主的认识像一股馨香被显示出来。如果把圣殿的石子抛撒在各条马路的前面，福音还有什么荣誉呢？

当我们看到由一种完美的方式训练出的，且为了建设教会而聚集在一起的神父和教友们，由于对神圣建筑的稳固基石不服从，且忘却了这块是他们已坚守到至今的盘石，而呈现出松散现象时，圣殿的石子就被抛撒在一地了。

他们抵制治权，公开抨击他们的长上，而这些长上应作为增添光彩的角色而浮现。他们冷落自己的牧者，草率地擅自取代关心上主的羊群。他们对那些遵守天主“看管我羊群”的

嘱咐的长上漠不关心。他们也不回避那些不从大门进入羊栏的人的无法容忍的条件。

因此，由于那些有辱宗教的丑闻最近已蔓延至我们眼皮下的传教区里，他们对我们实施的宗座权力不屑以一顾，更痛心的，是那些通过对教皇已发了严格服从愿的人，现在来了一个无疑的宗教反弹，我们被迫与先知一起为金子失去其光泽及明亮的颜色被糟塌殆尽而悲伤。

我们不愿意白白伤心，我们身负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和教廷托付的重任，尽管我们不才，我们要采取行动反对此类滥用权力的行为。我们宣布并且决定任何传教士或司铎，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各修会的会士，包括耶稣会在内，凡已经在中国或者将要到中国传播信仰的传教士，不管什么修会，如果他们没首先向我们要求获得准许（书面的），或者没有得到我们的准许，就擅自从事了传教工作，或者他们没有经过要求与得到准许而擅自撤离这里，根据事实本身，他们的铎职将被自动停止。行使圣座给我们的专门权力，即在必须应用的情况下，暂停或者宣布暂停任何宗座特许和特权，包括耶稣会享有的特权在内，可以为实施法令作好准备并取得成效。

我们以宽大为怀，对于那些擅自不负责任地进入传教区的人，从本教令颁布之日起给他们四个月期限补办手续，时间是很充裕的。期满以后，他们的神职将自动地被停止，除非他们对所做过的事情表示悔过，并谦虚地请求我们宽恕和许可。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长上不能推卸罪责，他们没有通知我们，而私下把教会的管理权抓在手里。由于他们的坏榜样，甚至有时由于他们的忠告，他们把自己的属下引入了不服从的深渊。上主是反对他们这样做的，他通过先知之口抱怨说道：“我的羊群放牧在你们践踏过的草地上。”当这些属下仿效他们所看到的罪恶，羊群就被放牧在被牧羊人践踏下的草地上。因此，为了这个及其他原因，我们制定戒律，并在服从的圣德中命令：无论教会司铎还是各修会会士，甚至耶稣会会

士,在没有向我们咨询及得到我们的许可之前,都不能擅自在中国从事和行使超越他自己团体和修会及团体的领导权。

也许有人被任命为巡阅使、副巡阅使、省会长、副省长、特派员、或省会代表、或者任何长上的行为违背本教令者,须根据事实情况而停止其铎职处分,而此特权仅限于我们和圣座行使。我们有话在先,其所做的一切无效。不管他已经制订了或将要制订什么规章,我们都宣布它们无效,我们宣布他的属下无论在内心或在外表都不必听命于他。

这就是我们的教令,它具有圣座特赋的全权的权威性,这是我们的法规,我们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它。在天主的葡萄园里,高于工人们的人,在整个土地上扮演着家长角色。他的正确姿态应该是张开双眼,为他的工人们留神观察长上,是这些长上在为传播福音而努力工作。

安底奥基亚宗主教宗座巡阅使 多罗

参赞 萨皮诺·马利雅尼

负责火漆封印,宗座巡阅使公署秘书长 安德鲁·坎特拉
于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位八年,1708年7月3日

发自澳门,我们的常驻地

2.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份教令非常有助于正确地、富有成效地管理这些传教区,尤其在目前的情况下。因此,为了完成天主委托给我们的牧灵任务,我们希望规定它的可靠效力、力量和功效,以及它应采取的实施法。我们多次听取了我们的尊敬的弟兄们,罗马教廷枢机主教们,特别是那些受圣座特命专门调查各地教会中异端情况的枢机及传信部其他枢机主教,尤其是负责东印度事务的枢机主教们的忠告。为了解决当今我们遇到的这类问题,我们更把这些忠告收集在一起,并多次聆听他们。在我们这方面,出于我们的主动,经过确切的了解及深思熟虑,并由于宗座完全的权力与我们在一起;因此,通过本文件的要旨,我们同意并确认上述教令,包括其中所包含及表达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赋予它可靠的、无可置疑的宗座权威性的权力和力量。如果它有任何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缺陷,全

都由我们来承担。

除此之外,出于相似的决定,认知、审慎和完全的权力,我们根据文件的要旨,扩大它传播的范围并分别公布每一事件(的结果),如以上所说,即每一个想进入中国传教区并在那儿做传教工作的人要提出请求,并得到特派员和总巡阅使查尔斯·多罗枢机的批准。这不仅仅适用于特派员和总巡阅使多罗枢机本人任职期间,而且也适用于多罗的接班人作为特派员和总巡阅使任职期;他们不应当被取代或成为无功效的。这是我们和圣座的愿望。

然而,如上所说,由多罗枢机或那些地区其他的特派员和总巡阅使,或代替他们职务的人所发出的允准不应该立即被承认。那些申请获取允准者首先得发誓保证将非常谨慎地服从那份我们在去年9月25日签发的有关中国礼仪和祭礼的教令。

任何尝试回避此法令,或是口头不赞同,认为法令的实施应依赖于当时的环境,或是寻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或借口为自己开脱,都是完全不能被接受,并被宣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3. 有些人,如一些有地位、级别的人,或有神品的、卓越的、有尊严的人,或具有特别的价值、个人意向及认知的人;或是曾经,及在某些方面自称曾经实践过前述法令的人,不赞同此法令。他们没有被传询,被训斥和被要求服从,就认为发布此法令的理由不够充分并未加以足够的核实和证明。他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理由、借口、证据,甚至以教会法典为依据;他们可能提出此法令除了会引起巨大的,非常巨大的伤害之外,一无是处。

但任何时候,此法令不会由于欺骗、托辞或任何一个倾向于废除它的建议而使之失效。我们的意图是好的,同样,参与起草者的意见也是好的,整个议事程序是正确的,没有明显的缺点来动摇此法令的要旨。没有东西被忽略,也没有东西会被忽略。

反对者想要指责、攻击、搞垮、撤消和修改此法令,使之成

为争论的主题，使之变为法律上喋喋不休争吵的热点。他们想随心所欲地任意反对此法令，想为可能受此法令所伤害的人叫冤，要求赔偿，想从法律上，从我们的疏忽中，从过去所作的宽厚的解释中伸手取得某种补救办法。如果他们得到了这种补救办法，或者我们同意授与了这种办法，则他们会在法庭内外加以利用，或为自己谋好处。

我们决定宣布：本文件及其所有内容永远是坚定的和有效的。这文件将保持其完全的效力。凡文件所涉及的以及今后涉及的有关人员均应切实全面地予以服从并遵守之，决不能违背或曲解。以上所述，必须按我们的意图，由所有的法官，不论是本职的或是代理的，以及所有审理呈交给宗座法庭的案件的官员们予以论断和明确认定。罗马教会的枢机们和全权代表及圣座的圣使们都必须按这样的思路去考虑这文件。他们及他们的下属均不得对此有其他另外的论断和解释的权力。如果有人，不管他能有何种权威，故意或非故意地试图在这问题上另有说法，我们宣布这种尝试一概无效。

4. 以下的事并没有挡道：教宗发出的任何文件；任何一个大公会议、省级会议和教区会议颁布的文件；任何一个以任何教会、团体、修会、传教团、社团——甚至耶稣会、协会、省会、女修院、学院、隐修院和诸圣地名义制定的，以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章程和法规为基础的文件；任何一个由誓言、教宗批件或在其他的法令和风俗习惯上，或在其他特权上所确认提供的文件；同样的，任何一个由教宗赐下的特权和根据教宗文件，根据诸教会、修会、宗教团体——甚至耶稣会、协会、省会、女修院、学院、隐修院和诸圣地所确认而提供的文件；以任何样式和文字形式表达，但有可能降低此法令的力量的东西；任何一个可能使此法令无效的文件，如：教宗的其他法令，它亦具有等同的决定、认识和完全的权力的文件；或在一些人，甚至在国王和王子坚持下签发的文件；或其他根据世俗与教会权威的理智而要求引起关注的文件；任何有别于赞同上述所提起过的争论的事，不在乎已有多少次确定过、更新过或批准

过它。为了合适地使这些事,包括其中每一件事及它们的全部意向都成为无效,它们须全部被特别地提及。特别应直接与个别地、一字一句地表达而不能笼统地、一般性地表达,尽管这些可能意谓同样的事。其他一些小心翼翼制作出的框架可能不得不为这些目的而被保存。我们认为现在此文件是完全足够表达和暗含这些意向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话将继续具有权力来传递上述法令。至少,这是一个机会,我们特别与直接地使任何反对它的东西都宣布为无效。

5. 我们愿意给予此文件的抄本和副本,甚至刊印本以相同的、绝对信得过的权威性。但它们须被提供有公证处签字及由教会办公室掌管印玺的人盖章担保。犹如新文件要带出去展示的话,也须提供这些证明。

我们宗座在位第十一年即 1711 年 3 月 15 日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 35~41 页]

1712 年(康熙五十一年)

麦大成、汤尚贤(Petrus V. du Tartre)测绘山西省及河南省图,冯秉正、德玛诺(Romanus Hinderer)与雷孝思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各省图。○德理格、马国贤第二次随康熙出巡关外,以教宗诏书陈奉皇帝。○北京耶稣会三教堂自 1700 年以来共皈依五万名信徒。○9 月 1 日,耶稣会士殷弘绪(P. Fr. - Xav. d' Entrecolles)在江西饶州致信耶稣会中国和印度传教会会长,详细报道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瓷器制作方法。

1713 年(康熙五十二年)

5 月,帝命冯秉正、德玛诺、雷孝思测绘完河南、江南舆图后不必返京,即从彼处前往浙江舟山及福建、台湾等处测绘舆图。又命绰尔代、麦大成、汤尚贤、李秉忠等,往江西、广东、广西测绘地图。又命武英殿监视布尔赛、西洋教士费隐、山遥瞻、向导护军参领英柱、吏部郎中郎古礼、钦天监监副双德,前往四川、云南、

贵州、湖广各省测绘地图。是年复准：新地图系用御制新仪测得各省及各口处经纬度数，丝毫不爽，嗣后造历，着照新图推算。○是年，御制《律吕正义》编纂成功，是书上编曰正律审音、下编曰和声定乐、续编曰协音度曲，续编卷一完全论西洋乐理，解释五线谱之编造及用法，称为“五线界声”。

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

4月3日，雷孝思、德玛诺、冯秉正三人在厦门上船，赴澎湖群岛及台湾岛测绘地图。费隐、山遥瞻在四川、云南测绘，山氏在云南孟定因辛劳过度，且为瘴气所袭殉职。次年春，兵部奉旨，雷孝思等到滇，完成山氏之未竟之业。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

3月，直隶总督赵弘燊奏折内附有康熙帝朱谕一件，有“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处，若事无大关系，从宽亦可”等语。○6月，英柱、郎古礼、双德、常保及西教士费隐、雷孝思等完成云南全省之舆图测绘。同年10月，雷孝思、费隐等完成贵州舆图测绘。○3月15日，教宗格莱门十一世颁布《从登极之日》(*Ex illa die*)通谕，重申1704年的法令，载有以下副题：“必须完全绝对遵守圣座以前关于中国礼仪所订的法律，拒绝接受任何不执行这些法令的理由和藉口。”该通谕的主要内容为：(一)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天主；(二)禁止在教堂内刻上“敬天”字样；(三)禁止信徒在庙宇或家中祀孔祭祖；(四)禁止信徒在庙宇或家中为亡者献祭，主持或举行祀仪；(五)禁止信徒在牌位前或墓前献香；(六)禁止对教外人的迷信行为给予物质上的协助，以及明显或暧昧的认可；(七)禁止信徒在家中安放有灵位字样的牌位，准许安放只有死者名字的牌位，安放这些牌位时，应在旁写明基督徒对死亡的解释；(八)外教人习惯对亡者举行的其他礼仪，如果没有迷信成分，在宗座视察专员和中国主教代牧的同意之下，可以举行。应细心研究这些问题，俾能及时把天主教礼仪逐步引进，取代外教礼俗。○8月，意大利耶稣会士、画家郎世宁

(Giuseppe Castiglione) 以及外科大夫、传教士罗怀忠 (Joannes Joseph Costa) 抵达中国。广东巡抚杨琳奏曰：“七月十九日有香山澳本澳商人，从西洋贸易回船澳门，搭载西洋人郎世宁、罗怀忠二人，奴才于八月初六日传至广州，据郎世宁称，系画工，年二十七岁；罗怀忠称，系外科大夫，年三十六岁。俱于旧年在大西洋搭船，八月初十日至小西洋，今年四月十一日在小西洋搭船，七月十九日到香山澳，因天气暑热，在船日久，请假休息，并制作衣服，往北京天朝效力等语。”康熙朱批：“知道了，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在四川传教的穆天尺前往山东临清，由北京主教伊大仁祝圣为四川宗座代牧，他还须管辖贵州的教务。

郎世宁，字若瑟，1689年7月19日出生于意大利北方米兰。早年在该城 Carlo Cornara 学苑学习绘画，且受到特兰托城耶稣会士、著名艺术家波佐 (Andrea Pozzo) 绘风的影响。波佐是当时“透视法”的大师，设计了特兰托耶稣会教堂及罗马耶稣会总堂。1707年1月，郎世宁入耶稣会，以后被送到热那亚接受宗教教育。在热地亚修院教堂作有《圣·依纳爵在曼雷洞穴》以及《基督向圣·依纳爵现身》等作品。1713年，郎世宁赴葡萄牙，在科因布拉教堂也留下作品，并为葡王太子绘像。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434页〕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

1月4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致信葡王，要他支持教廷在“礼仪之争”上的立场。3月18日，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德西德利 (Ippolito Desideri) 抵达西藏拉萨。5月1日，德西德利晋见拉藏汗，呈送两块加斯帕尔石、一瓶巴西镇痛膏、一瓶治中风的药水。德氏获得准许在西藏自由传教。多米尼科 (Domenico da Fano) 和奥拉齐奥 (P. 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e di billi) 以及弗朗西斯科 (P. Giovanni Francesco de Fossonbrane) 三人于8月4日抵达西藏，10月1日到达拉萨，晋见拉藏汗，呈交教宗致拉藏汗的感谢信。他们与当时驻藏的耶稣会士德西德利取得联系，再度开辟了传教据点。○4月，康熙帝抵热河。7月，扈驾之西洋人杨

秉义(Franciscus Tiliseh),卒于口外,上震悼。○8月31日日耳曼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 Kogler)与严嘉乐抵达澳门,9月26日,戴进贤、严嘉乐、倪天爵三西洋教士起程进京。○11月12日、13日,康熙召集在京西洋教士,当面痛斥德里格:“……论中国的规矩,若不随利玛窦规矩,并利玛窦二百年以后的教传不得,中国连西洋人也留不得。朕数次与你说多罗与颜瑭的坏处,尔为何不将朕的旨意带信给教化王去?倒将相反的信写与教化王。尔这等写就是你的大罪。若朕依中国的律例,其(岂)可轻饶?”是年,康熙帝命官员将一项兼用满、汉、西洋文字刊印,盖有广东巡抚印的“红票”共一百五十份,散给各天主堂居住的西洋人以及外国洋船上的商人,让他们带往西洋,交给教宗,“红票”上有部分在华耶稣会上签名。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致我们主内的亲爱的儿子
杰出的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国王约翰

1. 您的特命发言人,我们的心爱的儿子,尊贵的德·封德侯爵(de Fontes),把陛下去年8月12日给我们的信交给了我们。我们收到此信后大吃一惊。我们理解您的抱怨。我们不同意您提出的在中国提升三个新主教的要求,您认真地向我们提出此要求,以便让所有生活在那个广阔的帝国的人从今以后能够有他们自己省教区的牧者来领导。

我们希望陛下理解我们对您的发言人详细陈说的理由。根据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在当今混乱的情况下中国传教区自己考虑提升新主教是不适宜的。我们会把您的要求保存在脑海中,过一段时间,我们希望等到基督教会在这地区能更自由地、更有成效地开展起来时再来考虑此事。

目前,关于此事,除了强调我们的目的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要干预或剥夺您的国王特权以外,我们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您可以相信这一点,而我们是经过仔细权衡才作出此选择的。我们对您作出的父亲般的极其友好的安排,倾注了我们对您的特权延伸之意向。

我们很了解葡萄牙的国王们对天主教会作出的杰出贡

献。我们的前任罗马教皇们也认为葡萄牙国王们对天主教会的贡献值得赞扬,对此他们都畅所欲言发表了意见。我们不想背离他们的足迹。

2. 现在,我们的法令解决了中国礼仪之争的案子。最近发出的一份宗座宪章驳回了所有想拒绝服从我们法令的理由或借口。尤其驳回了一条以害怕产生严重后果为依据的理由,即若执行我们法令的话,可能会威胁到传教团和传教事业本身。现在任何人不得以此为根据将此事重新加以讨论。所有宣誓遵从教皇决断的基督徒都必须遵循我们这些法令。我们的法令,像在我们宪章中所规定的那样,应被完整地、绝对无误地、不可违背地保存下来。

我们并不担心我们的法令会对这些地区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真理的传播造成任何损害。迄今为止,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中,我们思想中没有任何其他计划和目的,除了让那些地区的传教工作不仅仅能从斑斑污点中,且能从每一个迷信的可疑点中解放出来。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的撒下了圣言种子的土地能够被清除掉使它窒息的荆棘。天主会给它更巨大、丰硕的收获的。在主内,值得称嘉的是传教士们为了促进基督王国而甘冒危险辛勤耕耘的精神。但愿他们尽其所能在他们中间培养和维持平安和互相友爱的精神。这是他们的圣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对他们仔细地叮嘱过了。我们还将继续这么做。

3. 因此,我们要求得到陛下的帮助和支持。最近在呈交给您的我们的宪章中,我们怀着心灵所能拥有的强烈的愿望再次重提了我们的要求,请您用您国王的权力给我们以有力的支持。让我们获得我们努力奋斗而渴望得到的结果。毫无疑问,您会在各个方面和我们在一起,以非凡的、众所周知的情为天主教会谋利益。

我们真诚地希望您这样做会增加您的德行,尤其是人民到处称颂的您的虔诚。

我们请您赐恩听一听我们心爱的儿子,我们的特派员,掌

玺大臣若瑟·飞洛(Joseph Firro)的话。他将以我们的名义更详细地给您解释有关这方面的其他事情。宗座赐福,我们持久地诚挚地为您的健康祈祷。

我们宗座在位第十六年即 1716 年 1 月 4 日

于罗马圣母大堂 渔人玺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 40~41 页]

1717 年(康熙五十六年)

是年,赴云贵等地测绘地图之传教士陆续返京,所绘之图交杜德美编纂整理。康熙帝又派在蒙养斋从西士学习数学之喇嘛楚尔齐母藏布、拉木占木巴等前往西宁、拉萨等地测绘,于次年告竣。

1718 年(康熙五十七年)

2 月 24 日,吴渔山司铎逝世于上海,享年八十七岁。葬于上海南门外圣墓堂,同会孟由义(Emmanuel Mendens)立碑,碑存圣墓堂,又称圣母堂(1946 年 9 月 19 日,北平上智编译馆成立,陈垣将其子陈乐素在上海拓得的吴渔山司铎墓碑拓片赠方豪神父,以为贺礼)。吴渔山卒后一年,陆道准编成《墨井诗钞》二卷、《三巴寺》一卷,《画跋》一卷。○是年,兵部复议两广总督杨琳奏请,称西洋人立堂设教,仍照康熙五十六年九卿原议禁止,帝批示:“依议。西洋人之处,着俟数年候旨,再行禁止。”

1719 年(康熙五十八年)

全国测绘地图工作告成。内地各分省地图,加上西藏及附近各地,朝鲜及满洲地图合并成一全国地图,世称《皇舆全览图》,共三十二幅。二月,康熙帝谕内阁学士蒋廷锡:“《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尔将此全图并分省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过后面奏。”九卿奏称:“……从来舆图所未有也。……谨将

原图恭缴,伏求颁赐。”得旨:“图着颁发。”○9月18日,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宣布任命嘉乐(Carlo Mezzabarba)为出使中国及附近国家特使,加亚历山大城宗主教衔,组成庞大的使团。教宗先派两位“巴尔纳彼得会士”(Barnabites)奉送教宗致中国皇帝手书前来中国。○10月7日,北京主教伊大仁上书传信部,报告中国教务因礼仪之争陷入困境:“这边传教区的情形很衰败,一切的事,都悬在一根线上(看将来教廷特使是否可准敬孔敬祖),同时又常受各方面的打击,也因为许多人使自己的教友,希望圣座允许中国礼节。将来真正告诉他们一切都禁止了,他们必定不愿放弃这礼节,因此,在许多地方,教友已经像裂教人了。”(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42页)○10月,福建住堂西洋教士利国安(Lauretì, Giovanni)赴京陛见,康熙面谕:“尔等来中国者,有优劣不等。利国安系新会长,以后西洋来信,必先奏闻毋得隐讳!尔众西洋人内,如仍以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系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

由康熙帝任命的参加全国地图测绘工作的传教士传略如下:

(1) 费隐,字存诚。1673年生于奥地利蒂罗尔(Tyrol)省林茨城。1688年10月,年仅十五岁,入耶稣会奥地利省的Leoben初学院。他申请去远东传教,并获批准。1704年末抵印度果阿,次年8月8日抵澳门。他想去日本传教,但教会派他去江南镇江,不久因精通数学,奉召入京。

(2) 雷孝思,字永维。1663年2月2日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省罗纳河口的伊斯特勒(Istres)。1679年9月入耶稣会里昂省阿维尼翁初学院。1698年11月4日来华,由于精通数学、天文,奉诏入京协助测绘地图。

(3) 杜德美,字嘉平。1668年生于法国昂布伦(Embrum)。1687年十九岁时入耶稣会,尤长于数学,1701年9月9日来华。1708年与雷孝思受命测绘辽东及长城以外的地图。

(4) 汤尚贤,字宾斋,1669年1月22日生于法国洛林省的 Pont - ā - Mousson,在洛林公爵办的大学里完成学业,入 Champagne(香槟省)耶稣会(1685年10月)。1701年11月来华,从上川岛入广州,又去了江西。1712年,他和麦大成完成测绘山西、陕西、江西和两广的地图制作。

(5) 麦大成,字尔章,1676年生,1693年入会,1710年来华,次年抵北京,与其他教士测绘山东、山西、陕西、江西、两广地图,他是作为葡王向康熙皇帝呈献珍贵礼品(葡萄酒)的特使来到中国的。

(6) 山遥瞻,汉姓潘如,为奥斯定会士。

(7) 德玛诺,1669年9月21日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的 Reiningen。早年在贝尚松耶稣会公学读书。1686年9月入会,入耶稣会上莱茵省美因兹初学院。1707年来华,协助测绘河南、江南、福建和台湾的地图。

〔费赖之:《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散见各节〕

嘉乐特使为意大利北方巴维亚 Pavia 地方人,生于1682年。少年时晋升司铎,攻读法律。考取民律、教律两科博士。任教廷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法官,后升教宗国内多提(Todi)和撒皮纳(Sabina)两省省会长,年轻有为,出使中国时才三十七岁。

教宗此次通知葡萄牙国王派使一事,并请葡王予以方便。特使从里斯本动身,搭乘葡萄牙船抵澳门,葡王告诉澳门总督须以上宾之礼待之。使团由欧洲前往中国的旅费也由葡萄牙负担。

使团动身以前,教宗先遣两个“巴尔纳彼得会”会士奉送教宗致康熙手书,两人一名费理簿(Filippo Maria Cesati),一名何济各(Onorato Maria Ferrari),两人由海道赴广州,即赴北京。11月12日,他们在热河受到质询。康熙对他们的使命表示怀疑,要求官员“尔等速将此二人来历询问明白回奏。又先年自西洋来山遥瞻、德里格、马国贤三人,自称亲奉教化王差来之人,皇上待之甚厚。前年山遥瞻病故,德里格、马国贤二

人,看其行止,亦不似教化王差来之人。此二人果系教化王所差否?查明回话”。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40~147页〕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致鞑靼和中国杰出的至高权力的皇帝
(1719年9月30日)

杰出的至高权力的皇帝,祝您身体健康,天主的恩惠光照于您。

1. 在今年1月30日我们的一封短函里,我们告诉您有关我们卷入了一件麻烦事,我们意识到我们须尽快地实现我们计划中要做的事情,例如,要派一位高级官员到贵国,他的头衔是我们宗座的代表。我们隆重地派出这位宗座代表是要再次向您表示长期以来我们对您至高的尊严和高贵的品质给予高度评价。由于您的至高尊严和高贵品质,您的光荣的名字在世界上特别在欧洲到处受到赞扬。

我们希望通过这同一位宗座代表向您详细解释我们最强烈持久的愿望。当有机会让我们自由传教时,我们希望遵从您的愿望;并以此希望再次得到您通常仁慈的关注,我们希望您继续把我们的传教士置于您的恩宠保护下。

在我们上述提到的信中,您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相信早在这封信之前您已经收到了那封信。在今年年初,我们先派了两位可靠的传教士作为宗座代表的先遣人员到您那里去。现在我们热切地、高兴地把这位宗座代表派到您处。长期以来,在此远征途中存留下来的许多大障碍物最终已被消除干净了。

我们派我们的忠实弟兄,亚历山大的宗主教嘉乐作代表来担任此项任务。他出身良好,道德高尚。他将把这封信呈交给您,同时,他还将带一些在艺术和科学上知识渊博出众的人来为您服务。我们嘱他把这些人一起带去。

同时,我们还委任他担任传教区的神长和巡回使的职责。尤其他有决心做到在我们传教士中让牢固的真正和平与思想的一致有力地成长起来。希望您永远不会为了他们的缘

故而感到您的帝国遭受了打扰。我们恳求您真诚地赐恩欢迎我们的代表。从我们这方面，我们也一定指示他向您详尽地、谨慎诚恳地解释我们上述的为什么要派他到您那里去的缘由。

2. 首先他将以我们的名义，按照我们的吩咐，感谢您不久以前两次作出的杰出榜样，您所表现出的非同寻常的温和使我们牢记在心。若以前我们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用来公开地宣称您不仅仅是高尚的宽宏大量，并且是无可否认的、独有的审慎、公正、明智的话，那么这两件例子已足够，且远超过“足够”地说明了一切。

那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三年前，有人向您错误地描绘我们基督宗教的欧洲教师们，他们说成是在您广阔的国家里煽动群众制造事端的人。福音的传教员甚至还被怀疑以传教的名义试图组织军队造反：说他们聚集起教会内外的力量非法地、不道德地占据您的一些领土或地区。当他们被带到您的法庭前时，您运用您的德行，迅速地处理了这件事。您拒绝听控告者陈述，您并不是匆忙地严判此事，相反，您以洞察秋毫的敏锐智力揭示出您确实已知道这个控诉是恶毒中伤，且这些控告实际是诬告，被告亦是无辜的。

您以一种正义的行为实施于宗教人于。宗教不仅仅谴责这类非正义的、激起公愤的行为，并且还公开地教导和命令信徒尊敬和服从长上，且对统治者要抱有忠心。特别地，这命令束缚了它的讲道者要以这种思想和教导来向他人宣讲道理。您这种令人赞誉的行为，本身就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您的亲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所做的一切。

与此同时，我们只想让您确信没有人比欧洲传教士们对您更忠信了，也没有人更虔诚了，更时刻准备着为您服务了。这些在我们派到您那儿去传播我们神圣的宗教的人身上显得尤其真实。不单单是由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使他们乐意这样做，而且我们也公开与非常明确地乐意与命令他们这样做。

几年前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也表现出了您的与众不同的温和。那就是您派了教士安东尼·龙安国(Anthony Barros)和安东尼·得·薄贤士(Anthony de Beauvollier)来见我们,这是两位可靠的人,接着您又派来了另两位教士,即若瑟·艾逊爵(Joseph Provana)和莱蒙·得·陆若瑟(Raymond de Arxo)。他们要告诉我们您对他们诉说的一些事情。后来,您就再没有得到过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您对他们在我们这里做的事情一无所知。有不少人对我们存有坏心。他们蓄意说服您相信,后果归咎于我们对有关情况缺乏了解,甚至是归咎于我们藐视您的尊严。因此他们甚至还为您制定了反对我们传教士的一些条例,这些条例猛烈攻击我们,这肯定会使我们遭受史无前例的痛苦。

然而,您通情达理地克制自己不采取任何使我们不快的行动。尽管劝诱接踵而来,每次您都仁慈地阻止了触犯我们的事,并且寻求了解我们所说的后果的真正的原因所在。您还清楚地说明您对我们的看法。您认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出有愧于您在我们的心中至今以及始终所处的至高的、受人崇敬的地位的事来。

您再一次公正地对待了我们。您以您的仁慈所作成的新纽带很快地把我们与您又维系在一起了。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永远感激您,并记住您特别温和的性格。我们可以坦诚地说,您对我们的判断没有错。当这封信到达您手里之前,您就已经知道了,不幸的是,安东尼·龙安国和安东尼·得·薄贤士在去欧洲的路上已葬身于海难。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他们甚至没有能回到意大利来。所以,他们没能再回到中国,向您汇报您所委托他们的事情。我们也无法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从未能把这些问题送达给我们。

至于若瑟·艾逊爵和莱蒙·得·陆若瑟,他们安然地到达了罗马。莱蒙·得·陆若瑟和若瑟·艾逊爵一起执行了您要他们做的事——不久前,莱蒙·得·陆若瑟从这里出发回

您的国家去了。如果命运的安排是让他安然地到达目的地见到了您的话,他已经以我们的口气向您作了解释,告诉您我们十分满意您的非同寻常的公正。但是,不幸的是,他也同龙安国和薄贤士一样,在回去朝见您的路上,生了重病,死在西班牙了。

若瑟·艾逊爵因为病重留在了意大利。他不得不在意大利呆很长时间。他还不能忍受如此漫长艰难的旅途辛劳,如果不是他有坚强的意志,尤其是在强烈地希望服从您的愿望的驱使下,他还要留在此地一段时间。这意志和愿望给他虚弱的身体增添了勇气和精力。这些支持了他,使他踏上了到您那里去的归途。几个月以前,他不顾一切危险,毅然决然地启程了。

您没有因为您的代表迟迟没有回中国而责怪我们。而您把这一切归咎于其他原因。这就是天赋于您的伟大心灵,致使您作出如此决定的。我们想我们已经对您说得够多了:我们怎样清楚地看到并完全同意您的明智决定是出自于您对正义的热爱。

我们希望若瑟·艾逊爵安然无恙地到达您的门前。我们向仁慈的天主祈求使他这次旅行获得成功。我们不停地为他祈祷。他将向您详细地说明我们是如何热忱、仔细、勤勉地考虑他和他的伙伴以您的名义向我们提出的所有事情。同时,他还将告诉您他所陈述的事情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关注,以及我们是怎样怀着同情与谨慎的判断态度对待这些事情。

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但是,他是一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登上了旅途。我们为此行的后果非常担忧。因此,我们真诚地恳求您以非凡的仁慈屈尊倾听我们宗座代表亚历山大宗主教向您陈述的一切。这些问题若瑟·艾逊爵应该已经递呈到您面前了。

3. 与此同时,我们对您保证,我们允许您这个享有声誉的国家中的天主教徒或将要进教的您的臣民举行与我们的宗教教导可以和睦共存的礼仪习俗。但反之,对于那些我们相信

是与我们的宗教相违悖的礼仪习俗，则我们不赞同它们在教徒中举行。当然，我们从未想过这个禁令会触犯您。

出于您的无可比拟的仁慈，您的仁慈将载入基督教史册让永世铭记。您在几年前庄严地发出谕旨，同意和允许您的国家里的任何人自由地信奉基督宗教，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下这个结论，即您同时也同意和允许，如同我们在写给您的其他信中所说的那样，您的进教的臣民，可以遵循我们教会的习俗，因此，换一句话说，他们已被允许放弃与我们教会相悖的礼仪习俗。

如果得到您如此显著的恩惠和好处的我们神圣的教会所遭到的处境比同样获得允许在您的国家里存在的其他宗教遭到的更坏，这将与您的令人称道的公正不相适合了。我们听说对其他宗教的信徒你们并不要求什么，也不过问他们是否遵守中国的礼仪习俗。他们被允许按照他们宗教的律法、习俗宁静地生活，只要不缺乏对你应有的服从。而在这点上，正如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的信徒们总是超过其他宗教的信徒。

4. 因此，极有权势的皇帝请展示您的宽大，您以您的伟大的名义恩赐我们神圣教会无以畏惧地在您的帝国各地得以传播：保护它的讲道员们，鼓舞他们，庇荫有加，排除教徒们的困难，阻止那些找他们麻烦的人。因为，用不着害怕我们的教徒。我们要求他们服从、祈祷、恳求，要对统治者和所有重要的人物感恩报德。教会强调教徒有责任表现出谦卑、忠诚与忠心。教会决非不赞同它的教徒对自己的祖先怀有感恩之情，他们意识到自己欠祖先是太多了。相反，教会严格命令自己的孩子们对他们的长辈要倾注全部的尊重和敬意。这样，孩子自己也会得到降福，并在世上获得长寿。除此以外，我们的宗教为公众的利益和统治的稳定还规定了许多其他的条例。他们理所应当地博得他人的庇护和支持。

最后，我们真诚地恳求您给予我们宗座代表亚历山大的宗主教以强有力的庇护，在任何时候，需要的话鼓励他的勇气，帮助他正确地执行我们给他的任务。请您像信任我们一样

信任他，就像我们在和您交谈一样。最后，权力极大的皇帝，我们衷心地祈求天主赐福，愿天主恩惠的光照与长久的安宁永远陪伴着您快乐的一生。

我们宗座在位第十九年即 1719 年 9 月 30 日

于罗马圣母大堂 渔人玺

〔原文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 43~46 页〕

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

6 月，樊守义从西洋回国，在广州将其历年在西洋事情写成报告面陈两广总督杨琳，并将葡萄牙王所给护身票及书信一封交给清朝官府。7 月，杨琳遣人护送樊守义进京（樊守义，字利和，山西平阳人。1682 年生，1707 年随艾逊爵〈Joseph - Antonius Provana〉司铎往欧洲，求学于都灵，继至罗马，于 1709 年入耶稣会，后晋铎，后从里斯本航海归国，艾氏死于中途，乃携艾氏尸骨回广州并葬之）。他奉康熙钦诏入勤，9 月在热河面见康熙帝。进呈所著《身见录》。为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嘉乐特使于 3 月 25 日由里斯本出发，9 月 26 日抵澳门城内，澳门主教和总督盛礼接待。10 月 28 日动身北上，11 月 25 日，船过江西界，12 月 25 日抵北京城外窦店。康熙遣四官员问嘉乐来华使命，嘉乐答以“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中国人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次日，传来康熙帝严厉的批示：“尔教王所求二事，朕俱俯赐允准。但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28 日，康熙命嘉乐等暂到五哥房居住。29 日，在京教士共同译出教宗禁约及嘉乐的八项妥协办法：（一）准许教友在家中供奉祖先牌位。牌位上可写亡人姓名，但旁注天主教孝敬父母道理。（二）准许中国对亡人的礼节，但这应为非宗教性的社会礼节。（三）

准许非宗教性的敬孔礼，孔子牌位若不书灵位，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和亡人棺材前叩头。(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声明不从流俗迷信。(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及亡人的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申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七)准许在新年或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蔬果，但应申明不从流俗迷信(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52~153页)。12月31日，康熙帝第一次觐见嘉乐特使，赐宴。○11月18日，康熙帝召见在京西洋教士苏霖、白晋、巴多明等十八人至乾清宫西暖阁，面谕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淫乱，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前多罗来，俱是听教下无赖妄说之小人，以致颠倒是非，坏尔等大事。今尔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共同答应：‘中国行教俱遵利玛窦规矩，皇上深知历有年所。况尔今来上表，请皇上安，谢皇上爱养西人之重恩，并无别事。汝若有言，汝当启奏皇上，我不能应对。’尔等不可各出己见，妄自答应，又致紊乱是非，各宜凛遵。”○四川苏宏孝修士晋铎(一说在1722年)。

樊守义《身见录》

起自澳门，登巨舰，备资粮，浩浩洋洋，洪无际涯，向西南而昼夜行焉。行二月，经过之国：巴辣哥亚也、莫尔乃阿也、玛辣加也、盘嘴也、稣玛尔辣也；及多海岛，地气至热，物土丰厚，人烟稠密，产丁香、胡椒、桂皮、稣木、檀香，佳果终岁不绝；人之容颜，带有紫色，性情和平；大概如是。内玛辣加国，有大府名巴打斐亚者，乃河濫打国商客集居之地，有洋船二百余艘，停泊海口，兵马护守城门，昼夜不懈。其城内街市，中界一河，道旁树林遍植河沿。凡大小西洋与夫中国种种货殖，靡不毕具。缙绅之家，构园囿于城外。余于是府停舟候风十五日而后行，约行三四月，始见大狼山，因舟中乏水，遂至亚墨里加洲巴以亚府，府之前乃平水湾，有大船百余艘，更有极高大而甚坚厚者为战船，上置大炮。此地富厚，地气清爽，天时无寒，产巴尔撒木香、刀伤油、鼻烟、桂皮、白糖，长米粮，畜牛羊，而金若

银，多且易取。波尔都尔国此处有地，靠海边，府内建立天主堂、圣人堂、修道会院，咸极崇固；诸种器具，悉用雕金。置大学中学，各方俊秀，多会于此，人品聪颖清和，总理其间者若巡抚然，而以下文武共襄其事。有一耶稣会院，在山之巅，修道者百余。士人凡所需之物，则制机轮，用一人在内行走，即时挽上，其巧妙如此。然其地不产石，所盖大堂，乃先于大西洋制就石料，移此凑成。有屋一所，甚宽，其间多藏珍重，上层为书库，藏书五六十架，不啻数十万卷，乃是巴以亚府之实绩也。是年八月初，始抵大西洋波尔多勒尔国，进海口，多有筑防守炮台，凡洋物至此，则发号炮查明报知有司，方许入。行五里，即见京城，城有大河一道，从内地出流于海，停泊洋船三四百。是日也，余登岸，居耶稣会院，修士乍见，殷勤如故，即送安顿，银器俱全。视风景，壮丽可观，允称富国，无物不备。

地多泉穴，其房俱三四层不一，而公侯王府，更极崇美，若天主堂、圣母堂、圣人堂，纯用石造，奇峻特异，雕饰供器，悉以金银。修道院颇多，而每院修道者凡数百；并设学校，分小学四品、中学二品、大学三品，且有养济院数处，甚广大，更多富贵园囿。第三日国王召见，其宫殿之崇美，目所未睹者也；外设兵卫，内侍群僚，王之右有第三人，王年近二旬，容颜温励谦和；异日复见王，命朝内游，见红帐覆墙，或锦或绣，若绘画然，夏以磁器掩下截，玻璃窗，花毡垫，金镶凳，水晶桌，炫耀人目也。而朝内亦有天主堂，王之便于瞻礼者，往谒大臣者，华差减耳。又翌日，王与后往宗堂谢主，其舆服华丽，则又不可胜述矣。国王之诞，余与往祝其礼，国王上立，旁群臣，仰上鞠躬凡三，躬近王前，亲王手，或问答，或退班，约略如是。时康熙四十八年正月也。居其国已四月矣。及辞行，给水陆照各一纸，赠程仪，王公大人各有所馈，爰起程往东行，过意大利里亚国、地中海，南望亚非利加，北眺大西洋，程途一月，风阻巴斯尼亚国，有城如波尔多勒尔亚国者，忘其名矣。又一地，人皆安分，不炫富贵，爱清雅，惟喜亭囿，大率如是。两月后乃至意大利里亚国界，曾入一国，宫城官室，悉以石造，多天主堂，产阿里伐果、榛

子树，风土温和，最为丰厚；有耶稣会院，无论内之规模，见其外貌庄重，已令人景羨矣。余于此留住一日，因大舟难进，易小舟行，二月下旬，至蛇奴划国，其属国名格尔西加者，风土无非富足，亦产阿里伐果，可造油；多城郭，人情与前各国无异，惟喜出外谋为，王公大族，门楼峻大，金银珍宝，容人觐玩，在西洋郡称是国为冠也。所盖之精，宫室之美，人才之盛，世家之富，难以尽述。城外则近海有大小洋船百余，建塔于海口，每夜有以灯照远客船。至都司格纳诸侯之国里务尔诺府，城虽不大，然坚固齐整可观，风土人情丰厚。余于此始行陆程，至比撒府，乃古府也，犹有古时宫殿宝塔遗址，周城水绕。又至西捺府，有总学，招四方弟子学习格物穷理。有耶稣会院，余居数日而后行，往教化王之国，其京都名罗玛府，乃古来总都，城围百里，教王居焉，城门暮夜不闭，余至此二日，见教王，承优待，命阅宫殿内外房宇，几万所，高大奇异，尤难拟议；多园圃，有大书库，库列大厨，无论其所藏经书之多，即书柜书籍，总难屈指开辟；迄今天下万国史籍，无不全备。教王普理圣教事，下有七十二宰相及主教司铎，本国文武，共勦王事。朝外兵卒日数更替，法虽有绞斩流，而犯者卒少。有宫殿二所：一在伯多禄圣人堂左，为常居；一在石马山，为教王夏月居焉。公侯家绣缎饰墙，金花镶凳，宝器无价，摆设床帐，不啻万亿；其出入车马鞍帑，华美难比，使役仆卒，各以衣帽分职。城内外花园有多景，致每年修理，春夏憩息，摆列珍玩；又凡各国使臣，务极浮华，为国君光彩，邻邦货物，靡不悉具，邻邦英俊，群集城内。人造一高粱，长九十余里，引远高山大泉之水，流入城内，挖洞得泉，十字街堆石山，凿石人，四傍冒水；街道铺石，各家俱有水法。货物成市，必有其类。修道者每会不计其数，天主堂、圣人圣母堂，无论内外之美，即一祭台，令人看玩不尽。大概以石为之，而祭台则更以珍贵之石为之也。供器无非金银，耶稣会有十院，又有三堂，堂中所用器皿祭衣，镶珠玉金宝；又一堂系一夫妇年老者所建立，因夫妇年老乏嗣，愿献家产于圣母，而未经创制，忽夫妇同兆，见圣母指示盖堂之处，有雪者是也，时乃

炎天，果见有雪处，随奏教王查阅，建一圣母堂，因名圣母雪堂。有一圣若望堂者，旁有古教王宫殿，堂内深大，雕成十二宗徒白石像，中有圣物库，四面铁门，有一完石空塔，可容千人。有一所，非官非殿，其房如塔，形圆，上下五层，相连有万余间，周围窗户层层便看，乃古时养狮处，今已坍塌其半矣。有一大桥，名天神桥，两旁多造天神石像，各执耶稣受难之具。有一天爆台铁栅，乃护守宗堂之要。有一大堂，名圣伯多禄堂，堂门外有一石塔座，下四石狮，厄日多国送来，上有字迹，乃厄日多国文字。堂门外两旁乃石围廊，内广上平，高可三丈，二百四十八石柱，前后左右白石圣像二百位左右，有水泉，宽二尺，水上涌，堂前面有大门七所，上面有大高石造成门楼数层，其殿宇阔阔，不一而足；柱围六抱，柱墩尤大，宝盖高十丈，门窗数千，顶上空球内，可容二十人，远望百里；旁宝盖二座，地铺花石板，柱用彩石墙，露造圣像。又有圣人伯多禄圣像堂，内葬伯多禄圣身。总言之：则殿处看人若孩。又耶稣受难像，在铜柱亭内，有圣额我略、圣盎伯洛削、圣热乐尼莫、圣奥斯定四位圣人之像在焉。凡石柱旁空处，则更有石圣像。堂门外左向，约行里半程，纯用石环洞相连，至教王内廷之路，统计伯多禄圣人堂悉用石造，并无寸木。以前略言其概。罗玛府城内学宫：一乃热尔玛尼亚国公侯子弟之学宫；一乃厄肋西亚国世家子弟之学宫；一乃各国世家子弟统学宫；一乃本府总学，无分贵贱，各有分师，但不若各国者在内居住，俱属耶稣会管理，别院不知其详。然所学之事，皆格物穷理之学。城内有多养济院，有兵役养济院、过客养济院、穷民及痼病养济院，皆受益焉。富贵家蠲助，延内外医生，药室各有专司；其病人之床，洁净可爱，大约千间，器皿全具，而且洁净也。又有孤子院，衣食俱备；圣伯多禄曾于狱中化人时，画十字于地，即得水泉，以便领洗，至今尚在。瞻礼日各堂音乐大成时，洋洋充满，恍若天国，难以言语形容。教王祝朝与夫赐宴，威仪情状，亦复难比。城外二十里，有国君奉教名各斯当底，曩者建圣保禄堂，有圣保禄泉，当时保禄为道致命，圣首下地，三掷即成三泉，余曾饮是泉水。王公

家筑园于城外三十里。有城名夫辣斯加的，如园囿、水法、水琴、水风，种种异奇。又有城名底伏里，亦去府城三十里，类如此，虽西洋亦素著名园者也。居罗马五月，乃至热尔玛尼亚之属国挪波里国，中路经各所，富足无比。入加蒲亚府，有耶稣会院，因入挪波里国都城，地土华美丰厚，人性和乐，城外临海，各国船集。有山出火烟，城内宫殿有遗址，并有圣迹：一乃拏禄圣人之血，收藏堂中，此圣人去世多年，然每遇圣人瞻礼之日，堂中所存圣人本身之血，向系干涸，而诵圣经之时，其血复化流如新鲜，瞻礼毕又变为干；一乃若翰圣人之血，当日为道致命，而门人收葬圣人，惟留取圣人本身之血保存焉。无非思念圣人之功德。圣若翰以迄于今，去世已一千七百余年矣！而圣人之血尚存堂中，不独存而已，且于每遇若翰弥撒，诵圣若翰经，则圣人本身之血，亦化如新，变为多矣。及弥撒诵经毕，随又变干而少，此圣迹，不论何日，惟圣若翰弥撒经为定约，余诚目睹者也。复回至罗马府，进见教化王，赐见，降福，赐大赦圣物。在罗马起程，回至都斯嘴纳国都城，名福乐冷济亚府，内宫殿露台，堂殿学宫，修道会院，略与罗马府相同。有一堂经造二百余年未完，坚固精巧，难以言语形容。于此往见国王，即圣德贤，王赐见，赐坐，命冠，赐问，赐饮食之物，着人送至馆；又赐游看宫殿、宝藏、花园；又往一园内，畜虎象异兽之类，另赐宝药奇异二箱，又赐车马送至交界；又到波罗尼亚大府，乃古时一都城，地极丰丰，人民富庶，公侯世家繁众，城池官室极华，而府内人民聪俊好学。后至莫得纳府诸侯都城，又到巴尔玛大府诸侯之都城，此府官室人物之美，不能述记；诸侯赐见。又过巴未亚等府，难以述记；又至弥辣诺大府，古时龙巴尔的亚国地方，土产极丰，人性和平，府内人民俱富饶，露台宫殿，尽美难言；公侯世家俱多，造物主之圣堂有百余所；又有一总堂，建造至今，数百余年，尚未成就，其两旁之墙垣亦未成工，一边其柱墙如古，其一边尚未砌完。有大学官，甚多大养济院，俱系宰相圣家禄盖造。又有修道会院极多，金银宝藏花园亦不乏；有古时宗王宫殿之形迹尚存焉。此时有撒索尼亚及波禄尼亚二

国世子游至此府，欲见余，往见时，赐坐赐宴，在大众之前，有音乐，后及辞，过诺瓦辣府极多城池。到物尔车利名府，又有则济利亚国王长子赐顾，余即回见焉。后又到都利诺府都城，此府虽不大，见伯孟得诸侯，此府土产丰厚，人性坚强有勇，好交往，又好学，又多公侯世家，臣民俱忠诚，内官室房屋，均平一体，贫富相等，乙式高大，即穷人亦与大富之相同耳。又有一宗堂，在国王宫殿之内，堂中间有祭台，其台上有珍宝箱柜，外金宝镶嵌，内藏天主耶稣受难去世至宝之物，遗留与门人，至今显迹于万世焉。于次见国王而国王赐见，亦谦恭待人，又罕见希奇之物，有二不知何人巧作，用一大架水盘，上用一巨木为柱，柱上又小转轮数个，不用人力，其轮自转，作就缘线，旁着二人，可抵五六百人之工；其一有巨木，欲为板者，不用人力，乃制之水中，其锯自能推收其木；又用一绳，自能伸缩相凑，便成为板矣。又至都林府，有默想会院一所，在于城外，每年有王侯缙绅世家皆往此院，修省平日善恶无亏，以八日为度，去而复更。院内楼房宫殿，清雅洁净。后又至鄂洛稣国，二诸侯之子，起身时，往罗肋多府拜圣室，其圣室在一大堂内，堂右有一大宝藏，右旁有教王行宫一所，甚坚固高大，圣室即圣母之室，乃天神朝报天主降孕之处，先载如德亚国纳撒肋府后，因年久人民不诚，天主降罚，许寇贼入境，戕害之，圣母预令天神拔举圣室渡海而置之玛际亚国中，乃圣母初迁是国也；越四载，国民亦复如是，圣母又徙至意大利里亚国，有弟兄二人，因往者多，利益日繁，致相虐害，圣母又弃之，徙其室于罗肋室，今数百年矣。不复移动，竟成罗肋多府矣。盖圣母屡迁之后，遐迹流传，朝礼者甚众，所遇困难，万种疾病，苦难灾侵，一入圣室，其病立愈消除，所以王侯公卿，所赠金银极多。四海之内，奇珍异宝，概聚圣室之中。曾有盗贼，闻圣室厚积，顿起谋心，望见圣殿之顶，即若雷击，惊栗失措，不能移步，遂逃归焉。于是圣教宗主，大兴营造，宝石名木，外立巨殿，包围圣室，又以文锦奇珍彰之，置左六院所，聚博学成德之士，供之使之，或主教，或祭祀，或拯济穷民之匮乏，至于奉教主，并大小官职，悉感圣室

之圣威灵验，所以老弱贫病、士民人等，无不得其养者。余拜圣室之后，即往返焉。至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复回波尔多噶利亚国，复见国王，即赐见，温厚赐问良久，又赐黄金一百，于五十八年三月初旬至大西洋波尔多噶利亚国起身回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至广东广州府，于是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京，于九月初五日到热河，九月十一日在于波罗湖同北三十里叩见皇上，赐见赐问良久，此乃余往大西洋之略志也。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第 856～862 页〕

1721 年（康熙六十年）

康熙帝于 1 月 3 日、1 月 5 日、1 月 10 日、1 月 14 日数度召见嘉乐特使，赠嘉乐宗主教鼻烟壶、火镰包、荷包、珐琅碗、葫芦瓶、貂冠、青袍、里衣及靴袜等物，嘉乐亦回赠教宗的礼物。第四次觐见时，康熙说关于礼仪问题：“尔如再辩，朕必与尔辩论至极，据尔所奏之言，事体可以明白。再颜瑯等不通小人，妄带书信，颠倒是非，委屈当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罗历山、徐日昇等旧西洋人行悖教之事。如此妄书妄信，亦当不必再存，伊等负屈，朕深怜悯。”○1 月 18 日，由马国贤、冯秉正、雷孝思、喜大教（或名倪天爵，Nicolas Giampriamo）翻译的教宗“自登极之日”通谕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心中很愤懑，朱批曰：“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可如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同日，德理格、马国贤被捕。○1 月 20 日，康熙召见嘉乐并众西洋人至清溪书屋，面谕：“朕先已有旨论道理，语言必重，尔西洋人自己流入异端之处，自己不知，反指中国道理为异端。及至辩论之际，一字又不能答。且中国称上帝，人人皆知，无不敬畏，即朕躬膺大宝，凡事法天，罔敢或教；六十年来，朝乾夕惕，只承帝命。中国敬天之道如此。岂尔西洋人只知为造物主区区祈福求安者所可比拟哉？况祈

福求安，与佛道之理何异？”○1月26日，康熙在宫内接见嘉乐特使，作辞岁觐见，次日，康熙又在宫中设宴款待俄国使臣与教王使臣。2月10日，嘉乐特使参加畅春园新年灯节，看放烟火。2月14日，又蒙召见，康熙面谕使臣事已经完结，嘉乐可以回欧洲，皇上不写信给教宗，一切由嘉乐传达。○2月17日，康熙赠教宗及葡王礼物，又命耶稣会士张安多（Antonio de Magalhaens）陪嘉乐赴里斯本。○2月20日，康熙再召见嘉乐，以《嘉乐来朝日记》出示，命他转送教王。该日记为嘉乐抵宴店直到1月21日觐见的经过，其中多为康熙的谕旨。日记后有苏霖（Jose Suarez）、穆敬远（Juão Mourão）、林纪格（Franziskus Ludwing Stadtlin）、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倪天爵（J. B. Gravereau）、严嘉乐（Carl Slaviczek）、戴进贤（Ignatius Kögler）、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白晋（Joachim Bouvet）、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马国贤（Matteo Ripa）、莫大成（J. F. Cardoso）、费隐（Ehrenbert Xavier Fridelli）、罗怀忠（Giuseppe da Costa）、张安多（Antonio de Magalhaens）、李若瑟（J. Pereira）、徐茂盛（Giacomo Filippo Simonelli）等十八名传教士的签名。德理格因拒绝签名再度被捕。○康熙因防嘉乐偏信一方之言，不呈报教宗，乃遣耶稣会士喜大教于3月13日携带该日记，取道莫斯科前往欧洲觐见教宗。2月26日、27日，嘉乐两次进宫，观看皇上所赠礼物。3月1日，康熙帝盛仪接见特使，准他动身回欧洲。3日，嘉乐由北京动身南下，4月7日抵南昌，5月9日抵广州，5月23日离广州赴澳门，澳门总督及主教盛礼迎接。11月4日，嘉乐向全国主教和神职人员发出一牧函，声明“八项特准”只能“在必须和有用”时，才可使人获知。不可将此译成中文和其他东方文字，违者绝罚。12月9日，嘉乐特使离澳门回欧洲，起运多罗尸骨棺材前往罗马。○3月，法国传教士杨嘉禄（P. Jacques）、宋君荣（Antonius Goubil）乘船离开法国前往中国。○是年，费隐建造圣若瑟堂（东堂），由利博明督造，郎世宁创作了各种装饰绘画。正祭台之形样颇像罗马之圣类思祭台。此堂建筑宏伟，彩绘壮丽，见者莫不称奇。○是年，教宗

克莱门十一世去世,新教宗本笃十三世(Benedict X III)继位。10月2日,新教宗致函中国皇帝,表示祝愿,并请皇帝善待嘉乐使团。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

德玛诺任中日耶稣会巡阅使。○4月,康熙帝闻艾若瑟棺柩运抵广州,特遣内务府大臣陈所社往广东营葬。6月27日,宋君荣、杨嘉禄抵广州。○7月,广东住堂西教士李若瑟、郭忠传报称:新到洋船带来新任教宗致康熙帝表文一函,通报新教宗于上年掌教。此项表文系用金袱金索封固,由两广总督杨琳派专差呈送北京。○12月20日,康熙帝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遗诏命雍亲王胤禛继位。○戴进贤著《策算》刻于北京。

1723年(世宗雍正元年)

苏奴家族蒙难。苏奴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四世孙,与雍正帝为从昆弟行。康熙帝曾委苏奴为纂修玉牒总裁官,以辅国公镇国公任都统,治领八旗蒙古全军,又任奉天将军等职。苏奴有子十三人,获罪时存者十一人,全家大小共七十四口,都先后领洗人教,而且极其虔诚。雍正帝将苏奴全家治罪的原因之一是苏奴及子帮助康熙第八子允禩谋继位,其二是因其全家奉天主教。是年3月17日上谕斥苏奴第六子“勒什亨为俭邪小人,伊父苏奴系七十(人名)之党,……勒什亨不可在内廷行走,着革职发往西宁,跟随允禩效力。”苏奴十三子乌尔陈进紫禁城为哥哥求情,结果二人一同发往西宁充军。○3月,宋君荣北上访问开封犹太人。4月9日,宋君荣抵达北京。○10月13日,郎世宁为庆祝雍正登基,作《聚瑞图》,绢本设色,画瓶中瑞莲瑞谷。○10月,马国贤因父亲、伯父、叔父相继去世,恳请给假,获准返意大利,雍正帝赏赐甚厚:暗红白瓷碗一百件,五彩龙凤瓷碗四十件,五彩龙凤瓷杯六十件,上用缎四匹。马国贤另带四名中国修士吴露爵、谷文耀、殷若望、王雅敬一同前往欧洲。

陈垣所考苏奴十三子本名、受洗名、年、禁所及年岁如下：

本名	受洗名	受洗年	禁所	年岁
一 沙勿略		雍二	右卫	雍二卒 年五九
二		雍四	右卫	
三 苏尔金	若望	康六十	右卫、北京	雍五卒 年近六十
四 赫世亨			甘州、开封	
六 勒什亨类思		雍元	西宁、北京	雍五 年四九
七 鲁尔金	伯多禄	雍四	右卫、济南	
九 福尔陈			右卫、太原	
十 书尔陈	保禄	康五八	右卫、南京	雍五 年三五
十一 库尔陈	方济各	康六十	右卫、北京	
十二 乌尔陈	若瑟	雍元	西守、北京	雍五 年三三
十三 木尔陈	若翰达尼老	雍三	右卫、苏州	雍五 年二十

此外尚有库章阿一人，见于谕旨，为苏奴之孙，长子沙勿略之子。圣名及受洗年、卒年均不可考；禁于右卫及杭州。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下），第46~47页〕

1724年（雍正二年）

1月11日，雍正帝批准闽浙总督宝满奏，除在京教士外，全国教士限于六个月内迁居澳门，后复准居留广州，时居广州的传教士约有五十位。○1月5日，巴多明、冯秉正和费隐三位教士被召进宫，雍正帝对他们表明了其对天主教的严厉态度。○6月27日，雍正帝召苏奴入朝，宗人府卿命其跪听谕旨，历数其先人及本人之罪，立即革职。上谕说：“……苏奴与我父子兄弟骨肉之中谗潜离间，暗中钻营，惟扰乱国家是务，苏奴不可留在京师，煽惑众心，着革去贝勒，其属下佐领，着撤回存贮公所，止留伊府



西洋传教士所绘身穿洋服、戴假发的雍正皇帝像

佐领。着伊同北京诸子，于十日内带往右卫居住。到彼之后，若不安静自守，仍事钻营，差人往京师，首将苏奴明正国法。”时苏奴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十日期满，兵部派大车若干辆，载苏奴一家男女老幼七十四口和奴仆三百多人，押赴配所右卫（今山西西北右玉县），皇上又来谕旨，不许在右卫停留。右卫将军将其全家安置在右卫二十里外荒僻小村新铺子，苏奴不久死在那里，死前可能领洗。雍正余怒未熄，又差官往右卫将其子孙等人，锁拿至京，褫去黄带子，除去宗室名，降为庶人，然后再发往卫右。○6月31日，西洋人戴进贤奏请勿令催逼西洋人往住澳门。雍正帝朱批：“朕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往往澳门一事，皆由福建省居住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廷议之奏施行。政者公事也，朕岂可因私恩惠尔等，以废国家之舆论乎？今尔等即哀恳乞求，朕亦可谕广东督抚暂不催逼，令地方大吏确议再定。”然11月两广总督孔毓珣、江苏巡抚庄有恭俱奏请禁止天主教。○10月，教宗派遣两位圣衣会士噶哒都（Gottard Emeric Plaskowitz）和易得丰（Ildefonso de Nativitate）为使臣访华，他们又带三名方济各会士，从比利时 Oostende 海口上船前往中国。○马国贤率领吴露爵、谷文耀、殷若望等中国修士来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创立圣家书院（Collegium Sanctae Familiae），亦称“文华书院”。书院不以华人为限，凡有志于来远东传教者，悉可就读。

耶稣会士冯秉正于1724年10月16日自北京致信欧洲，报告雍正帝召见他们时的谈话记录如下：

朕的先父皇教导了朕四十年，在朕的众兄弟中选定朕继承皇位，朕要仿效他，一点也不离开他既定的治国方针。在福建省的欧洲人想要取消朕的法规，迷惑百姓，福建省的主管官员们向朕告了他们的状，朕必须制止不安定因素，这是国家大事，朕对此负有责任，现在朕不能够也不应该像朕还只是一个普通亲王时候那样处理问题了。

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朕相信这一点，要是朕认为它是伪教的话，谁能阻止得了朕摧毁你们的教堂，把你们赶出

去呢？那些白莲教之类，以传教为借口，煽动造反，才是伪教。但是，如果朕派一队和尚喇嘛到你们国家传布他们的教义，你们该怎么说呢？你们将如何接待他们呢？

利玛窦万历元年来到中国。朕对当时中国朝廷的做法不作评论，朕对此不负责任。但是，那时候你们的人很少，简直不足挂齿，各省还没有你们的人，也没有你们的教堂。只是在朕的先父皇时期，各地才到处造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地传播开来。朕当时看到了这种情况也不敢说什么。你们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

你们要让所有中国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是你们教会要求的，朕了解这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前途又如何呢？作为你们国王的臣民，作为基督教徒，你们只承认你们自己，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朕当时心里很明白，现在可以无所顾虑了。当成千上万只船远道而来，就可能出乱子。

中国北面与俄罗斯人为邻。不可小看俄罗斯人。它南面又有欧洲人的王国，他们更值得重视，它西面又有与中国人打了八年仗的鞑靼亲王策旺拉普丹（音）。朕要让他呆在他自己的领地，阻止他进入中原，朕恐怕他惹出乱子来。沙皇的大使朗日，要求我们允许俄罗斯人在中国各省建立商业分支机构，我们拒绝了，我们只允许他们到北京做生意，至多只能到喀什地区的土库班沁。朕同样也允许你们留在这里或去广州，你们愿意留多久就留多久，不要抱怨，如果抱怨的话，朕就连这两个地方也不让你们居留了。朕绝对不愿意你们在地方各省居留。朕的先父皇迁就了你们，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许多。我们圣人们留下的规矩是丝毫不能更改的。朕不能容忍朕当朝期间在这方面给人留下一点点话柄。朕的儿子孙子即位后，他们可以按他们的想法去做，朕对他们的作为不会感到不安，就像朕对万历的作为不会感到不安一样。再说，你们不要以为朕反对你们，或者以为朕想要压迫你们。你们知道朕当皇子时是如何对待你们的。辽东有一个信仰你们基督教的官

员不祭祖,遭到他全家的反对。你们很为难,来向朕求助,朕调解了这件事。现在,朕是皇帝,朕惟一关心的是要治理好国家。朕从早到晚为此操心。朕甚至没有时间见皇子和皇后,朕只召见负责国家事务的大臣们。这种状况,在整个守孝的三年期间要延续下去。三年以后,朕也许会像平时一样召见你们。

〔朱静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105~107页〕

1724年8月20日巴多明神父致欧洲信中谈到苏奴亲王一家奉教及受难经过:

……苏奴亲王在其儿子们的影响下也开始经常去教堂,他甚至还奉献香、烛等。他接见传教士们,很客气地对待他们,送他们水果及其他物品。他的儿子们都很高兴父亲的变化,对他入教抱很大希望。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时候福建省刚发生教难,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直到去年(1723年)12月25日,我们才得知福建省的两个主要官员被人告到雍正皇帝那里,皇上命礼部处理此案。

按理,这个消息应该使其他基督教徒们很受震惊,他们将受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热情未减。他们为传教士们出主意,为他们祷告,尽力帮助他们。但是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1724年1月12日颁布了禁教令。苏奴亲王很为他的儿子们担心。当他看到传教士们并没有被赶出北京,他把心放下了。他儿子中的基督教徒继续去教堂。由于皇帝严厉禁止一切聚会,我们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措施,嘱咐基督教徒们分散来教堂,太大的聚会可能使教堂被封闭了。葡萄牙的神父们也叮嘱这些热情的王爷们不要未得太勤了。这些王爷们还满不在乎,只答应来教堂时不兴师动众,起早坐轿子未作首批弥撒。他们的虔诚很令人感动,在欧洲,像他们这样身份的人都要找最显眼最舒服的位子,而他们不引人注目地跪下祷告,有的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有的避开众人跪在某一个角落,只有上帝才看见他们,他们能看见祭坛上的牧师。他们很少做完第一次弥撒就离开,往往一直到最后一次弥撒结束才走。他们习惯于对皇帝卑躬屈膝,他们以为慢待天主也是罪孽深重的,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欧

洲教堂里的情景一定会大吃一惊。

（保禄亲王在自己的府邸造了一座中西式教堂，他请巴多明神父去参观了他的教堂，巴多明神父在他的信中描述了这座中西式建筑。）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美丽的教堂，我甚至可以说，如果把它置放在欧洲某位君王的王宫里也一定不会使之逊色。保禄亲王特意选了一块僻静的地方砌了一道美丽的围墙，一点没有破坏王府原来的格局。从一道漂亮的大门进入教堂，首先看到一个三法尺高的平台，很宽很深，铺着白色的石块，平台周围砌了整齐的经过抛光上釉熠熠发亮的砖，整个平台看来好像是一整块石似的，平台后面是教堂的主建筑。它的木构架、门窗，不管镀金的油漆的都金碧辉煌，它的楼角上的砖瓦石块都经过艺术加工，有许多中国式的点缀。屋顶上镂刻花纹繁多，却一尘不染。我还没有进入楼内就被它的外表看得目瞪口呆。

教堂有四扇门，全上了红色油漆，夹有金色的、令人喜欢的图案。这四扇门中平时只开中央的两扇门，这是两扇朝里的折叠门。边上两扇门平时总是关闭着的。如果逢到重大庆典，来的人多了，四扇门可以一起打开，甚至可以卸掉，以便人们宽敞地出入。那楼前的平台也可以站人，使空间扩大一半。

教堂底放了一幅镀金的欧式壁画。中央是一幅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画，一边是一个守护天使，另一边是圣若瑟。这是一位中国画匠作的油画。不过，米兰的耶稣会士郎世宁教士作了修改，他是位杰出的画家。

祭坛，阶梯长凳，十字架，烛台，花瓶，鲜花，香炉及其他设施都很典雅得体。总之，无论镀金的、油漆的都熠熠生光。平台非常光亮，必须铺上地毯以防打滑。

我称赞保禄亲王对于上帝的热情，他打断了我，问我是否还有什么遗漏，他可以立即补上。“没有遗漏了，只缺一大批热爱上帝的人。”我说道。

他说他家里人及他兄弟和他侄子们的家里人都等着这座

教堂落成典礼来受洗，做祈祷。他请我催促苏霖神父尽早来主持这个仪式。

典礼的日子终于确定了。他们邀请了六位传教士。结果只有四位能够出席。我们到的时候，保禄亲王的许多兄弟们、侄子们、侄孙们和他的教友们都已到了。我们按照罗马教会的礼仪庄严地为这座教堂举行了落成庆典。然后每个人各就各位跪下作祷告。

我们正要离开教堂时，所有大小亲王都跪下，用额头碰地向我们表示感谢。我们按照中国的方式回了礼。大家起立，有几位神父给了保禄亲王几件十字架、圣牌等圣物。他跪着无限崇敬地收下这几件圣物，他高兴无比，溢于言表（殊不知，雍正已下决心禁教，迫害已经开始了。雍正皇帝责怪苏奴亲王允许他的子孙皈依基督教，他下令把苏奴亲王及其全家逐出京城，发配边疆）。

苏奴亲王期望雍正皇帝回心转意。他向大臣会议询问皇上是否息了怒，得到的回答是，皇上看了他的奏报，仍要他立即离开京城不得迟延。苏奴亲王为了让皇上息怒，决定亲自绑子上殿，这是满人的习俗。他把儿子们和侍卫们叫来，又叫人拿来镣铐。他一挥手，命人不由分说地把若望亲王铐上了，接着又铐了保禄亲王。弗朗索瓦亲王不等待卫来铐他自己就伸出手来。铐上了儿子们，苏奴亲王准备进宫奏报皇上。临行前，他命一个侍卫到这几个儿子府邸去马上把教堂、祭坛拆了，把基督像、十字架、念珠等都送还到传教士们的教堂去。传教士们很担心会又引起一场教难。

苏奴亲王进宫没有得到皇上的召见。大臣会议的首辅大臣听说了此事，对苏奴亲王的用意并不以为然。一方面，他知道那三位基督教徒亲王不会屈服，另一方面，他也担心皇上会发更大的火，反而怪罪于他。他不愿意奏报皇上。他对苏奴亲王说：“一切都完了。您只有服从。惩罚您的儿子们和您自己。”

苏奴亲王回到自己王府，命人把儿子们解开，什么也没有对他们说。于是，全家准备被放逐出京。

他们离京前，来看望他们的人川流不息。我们不敢去看他们，因为我们得知他们的房子被监视了。我用满文给他写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我尽力鼓励他们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信仰。我让一个教徒把信送给若望亲王，并且带给他几件圣物作礼品。

13日，苏奴亲王带着他的子孙们去向祖先告别时，必须路过葡萄牙神父的教堂，保禄亲王、若望亲王、米歇尔亲王都起了早，到教堂去听弥撒。苏奴亲王的第二个儿子还受了洗，名叫让·巴蒂斯特。

苏霖神父来到保禄亲王府，他的祷告多次被福晋们的眼泪和唏嘘打断，他鼓励她们为了耶稣基督接受流放的磨难。他指出，她们的磨难是暂时的，她们将得到无穷无尽的补偿。她们应该感谢天主给予她们成为其他人的表率的机会。他讲完后，她们都跪下磕头，表示感谢，请求他经常为她们向天主祷告。苏霖神父一口答应，他说：“我年纪大了，死期不远了，我在天上等着和你们相见。”他要求她们听到他的死讯后为他作祷告。他的话又引得大家一片哭声和唏嘘声。苏霖神父赶快离开亲王府。若望亲王、保禄亲王、米歇尔亲王等在大院门口向他道别。和他们的神父离别，使他们泪流满面，痛苦得说不出话来。苏霖神父眼看着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也无话可说。

15日，苏奴亲王和他全家离开京城，出发去流放地。和他同行的儿子、孙子、重孙共有三十七人，还有福晋们、格格们也有三十多人，还有三百个男女仆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受过洗的。

……

〔朱静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108-119页〕

1725年(雍正三年)

5月2日，谕戴进贤治理历法，补授钦天监监正，并加礼部侍郎衔。据《清文献通考》：“(康熙)八年，定汉监正用西洋人，名曰监修。雍正三年，实授为监正，去监修名。”可见以西洋人实

授钦天监监正，实自戴进贤始。○10月22日，教宗所派遣之使节噶哒都、易得丰来京师，呈上教宗国书，并于11月7日蒙雍正召见。教宗在国书中恳请释放毕天祥、计有纲(Antonius Guignes)二教士，雍正当即应允。同时，雍正帝回赠的礼物，交西士巴多明、冯秉正领取转致。雍正回赠之礼十分丰厚，总计七十一项，有各色妆缎、锦缎、大缎、次缎各二十匹，人参十斤、茶二十瓶又二十团，各式鼻烟壶二十个，各样扇子一百把，各种名纸二百张，画绢五十张，墨二十匣，貂皮一百张，各式样瓷器、漆器二百五十件。○中国籍司铎樊守义前往苏奴家族发配之地右卫，前往探视和接济，并为之施圣事。本年底，苏奴十三子受洗于樊司铎之手，取圣名达尼老(Stanislas)，其他受洗者尚有四十余人。○是年，刊刻先帝康熙御制《律历渊源》，内有《历象考成》四十二卷、《律吕正义》五卷、《数理精蕴》五十三卷。○是年，巴黎印行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纂之《中华帝国及其属领鞑靼之地理、历史、纪年、政治与自然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共四巨册，所利用之手稿书信来自南怀仁、柏应理、安文思、洪若翰、白晋、张诚、卫方济、李明、刘应等二十七人。引起欧洲学术界、政治界和宗教界人士对中国兴趣，奠定欧洲汉学的基础。○四川宗座代牧穆天尺，祝圣了苏宏孝、朱彼得、斯提凡徐三人为神父。○在暹罗求学的李安德、党怀仁由 de Cice 主教祝圣为神父，成为中国籍司铎。

教宗致雍正皇帝第一封国书

教化王伯纳弟多恭请中国大皇帝安。窃惟无始无终全能造物之天主，照临下土，眷顾四方，遂使苦乐悲欢并发于一时，盖因先帝大行之哀诏，忽尔惊传，中心痛切之至；乃大皇帝御极之喜音，同日恭闻，又欢乐无限，此诚在天之主预为调剂，以慰此苦也。伏思先帝以至公无私之恩德，赏善罚恶，俾率土臣民，久安长治，俟制作具，然后大行；随以万民悦服之圣躬，丕承鸿业，庶几所得之喜，竟倍于所失之苦焉。若不如是，何以解之？先帝之恩逾于父母，即据西洋修道诸人而论，其多年抚养，

言难尽述，区区远国，适当莅政之初，追维往事，满望将来教恩广益，倘或其时惟知先帝力行不获，即闻大皇帝践祚之喜，万难解此刺心之忧苦。可知明天之上惟一主宰，多方眷顾，不令人久怀郁郁也。由此心以观，仰见大皇帝盛德上智，统驭广大之幅员，从今瞻望之心，比前更切，故敢竭未尽之诚，献兹微悃，约有三端：一为表先帝大行，虽属僻远之君，而恻悲靡极；更遥忆大皇帝大孝大哀，必然身受难言之惨痛；一为表大皇帝即位临民，享玉帛冠裳之朝会，居豪华富丽之名都，特申贺敬；一为表教化王之位，本来不愿续承，乃勉徇众请耳。渎陈此意，想睿照之下，未有不乐闻教。三端之外，侧闻御极后，即宽释一西洋人，其余者俱许专务修道；不容行无益之事。似此仁爱有加，令人愈深企仰也。先教化王之使臣加乐，蒙先皇帝给以宝物，倘获拜登，必什袭珍藏，以征旷典；奈因海舶被焚，徒深浩叹。然所失之宝，已珍藏心内，永存而不忘也。今特将些微土物，附陈数语，用达远怀。每思竭力图报，维以仰合大皇帝之欢心，而无可适从。所望大恩广被，凡西洋修道之人在中国者，俱邀庇护，此诚无可报效之恩施，惟有恒求无声无臭生物生人之天主眷顾圣躬，常享太平之福，使域中臣庶，共凜国威，不忘人物之本原，藉万善之根基。不胜幸甚！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

雍正帝下令释放计、毕二教士谕曰：

礼部为遵旨事。雍正四年六月初五日内阁交出给赐两西洋教士，敕谕意达里亚国教王。览王奏：“请援释放德里格之例，将广东监禁毕天祥、计有纲一体施恩释放”等语。查德里格于康熙五十九年，因传信不实，又妄引陈奏，我圣祖仁皇帝，念系外国之人，从宽禁錮。及朕即位后，颁降恩诏，凡情罪可原者，悉与赦免，开以自新，德里格所犯，与赦款相符，故得省释。彼时广东大吏未曾以毕天祥、计有纲之案入于大赦册内，具题上闻。今据王奏请，朕查二人所犯，非在不宥之条；即王不行陈奏，朕亦必察出施恩。今特降旨与广东大吏，将毕天祥、计有纲释放，以示朕中外一体宽大矜全之至意。兹因使臣回

国,再寄人参等物十六种,用展朕怀,王其收受。故兹敕谕,钦此!相应行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将毕天祥、计有纲从速释放,即行报部可也。

教宗致雍正皇帝第二封国书

教化王伯纳弟多恭请中国新皇帝安。切思在天之主,降特达之聪明,成新皇帝之功用:所具者非常之德,所秉者广大之权;享太平巩固之鸿图,乐国富民安之厚福,宜乎称颂尊威,赞扬美誉,遍及西洋诸国也。仰自御极以来,公义覃敷,仁慈普被,钦兹二德,照着万方,迄今薄海内外,共乐升平,皆由无限之新恩所致。且即如德理格脱离牢(狱)之苦难,见兹宽典,满望传教之人,必能广扬天主,鼓舞作新,仰承德化,故惟有实心实意,引领颂谢而已。尚有一事冒渎,向闻西洋人毕天祥、计有纲监禁于广州城内,悯此二人可怜,久禁未宽,俯恳新皇帝特颁公义仁慈之命,亦如赦免德理格之恩;俾其早脱系刑,同沾仁泽,虽报效无由,而朝暮焚祝,祈求天地神人万物之主,时垂宠佑于国家。仰见一人有庆,万福无疆,此区区之本愿也,伏祈睿断施行。

教宗致雍正皇帝第三封国书

教化王伯纳弟多恭请中国大皇帝安。切思自古历代帝王,皆用公义仁慈二德,享受永远太平之福。今见大皇帝初登大位,二德即发,光辉普照,我国闻知,众心喜悦,很慰我心,因大皇帝掌万国之权,随发恩旨,释德理格,脱离灾难,照旧容其效力,我心很乐,感恩不尽。还望大皇帝照顾天主圣教;再求大皇帝公义仁慈,如放德里格之恩,再放先皇帝时禁在广州府毕天祥、计有纲,得沾此恩,感谢不尽。虽无以报答,惟求造化主宰保护大皇帝万寿无疆,率土人民乐享永福于世世。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9~42页]

1726年(雍正四年)

苏奴妻临终前领洗。6月,雍正帝下诏迭数苏奴之罪,又曰:“苏奴,七十之子孙内,有奸恶不可留者,俱着详察,指名奏请候

旨。”结果，苏奴之子勒什亨、乌尔陈着仍在诚亲王允祉处禁锢；赫世亨、鲁尔金、福尔陈、书尔陈、木尔陈、库章阿着押往河南、山东、山西、江南、苏州、浙江等处，分交该处督抚，在衙门内禁锢；其余着交右卫将军，入于右卫兵额内，严行约束。又照大逆罪将苏奴戮尸扬灰，抄没家产。葡萄牙传教士穆敬远因与允禩交往密切而遭审讯，雍正认为穆氏一大罪名为传授允禩西洋字，二是在西宁时和允禩过从甚密。8月5日，穆敬远被发配到西宁，次日，狱役在饭中放毒，穆敬远于8月18日卒于西宁。○11月，张安多完成康熙帝派遣他前往欧洲的使命，伴同葡萄牙王使臣麦得乐来到北京。雍正帝赏张安多缎胎熏貂皮帽一顶。○是年，巴多明神父所著《德行谱》付梓。○李安德、党仁怀被派往广东传教。

1727年(雍正五年)

5月，葡萄牙使节麦德乐观见雍正帝，清廷礼待尚佳。此次葡使晋京，带随从八十余名，其意在于请求清廷维持中国的教务，但未获允准，所带来的四名教士获准留下。同年5月28日(四月初八)上谕说：“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奴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7月21日，皇上召苏霖、马盖朗、费隐、戴进贤、雷孝思、巴多明、宋君荣、郎世宁等前往圆明园，严词指责天主教，并谓葡使麦德乐不当请求传教自由等事。○10月21日，理藩院尚书图礼善与俄官伊立礼议定《恰克图界约》，其第五款规定：“俄使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俄馆盖庙，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遗三人，于此庙居住，俄人照伊规矩，礼佛念经，不得阻止。”东正教正式获准在北京传教。

据宋君荣神父1727年7月21日的信，雍正皇帝对他们说：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任用西藏喇嘛，这两位君主因此受到了中国人的憎恶。先皇让尔等在全省建立教堂，亦

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洲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喇嘛教最接近尔等的教，而儒教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尔等称天为天主，其实这是一回事。在回民居住的最小村庄里，都有一个敬天的“爸爸”（即阿訇——译者），他们也说他们的教义是最好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稣——译者），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木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如同尔教一样，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难道我们满洲人在我们的祭祀中所竖立的杆子不如尔等的十字架荒唐吗？（原文如此——译者）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都很少有人理解他们那一套教义，就像尔等当中很少有人理解尔等的教义一样。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清代西人闻见录》，第145~147页〕

1728年（雍正六年）

4月18日，李明在法国波尔多去世。○在京教士得居留者，外籍主教一位，神父六位，中国籍神父三位。南京匿居主教一位，耶稣会士七位，方济各会士一位。陕西山西湖广四川匿居主教一位，中国籍神父三位，耶稣会士三位，方济各会士四位。广州有耶稣会士十五位，方济各会士十位。

李明最重要的遗著是《中国现状新志》，共两册，1696年巴黎出版。多次再版，译成八种文字。本书形式为书信集。第一册共八封信：(1)致 M. de Pontchartrain，叙述暹罗之行和北京之行；(2)致 Nemours 公爵夫人，叙述觐见皇帝经过及对北京都城的描绘；(3)致 Furstenberg 枢机主教，有关中国城池、建筑物和其他工程叙述；(4)致 Crècy 伯爵，有关中国气候、土壤、河流、物产的叙述；(5)致 Torcy 侯爵，有关中华民族特点、悠久历史、高尚品德、风俗习惯、优点缺点的叙述；(6)致 Bouillon 公爵夫人，谈中国人的雅洁和华丽；(7)致兰斯(Reims)大主教，介绍中国语言文字、书籍和伦理道德；(8)致 Phéliepeaux 国务秘书，论中华民族特性和精神面貌。第二册共六封信；(9)致 Estrees 枢机主教，有关中国政治和行政；(10)致 Bouillon 枢机主教，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宗教信仰；(11)致 M. Rouille 国家谏议员有关天主教在中国的创建和进展；(12)致法王路易十四听神工指导司铎拉雪兹神父(P. de la Chaise)谈传教方法和新教徒的虔诚；(13)致 Janson 枢机主教，有关最近公布的准予传教的皇谕；(14)致皮尼翁神父(Ab. Bignon)谈印度和中国两地传教中应注意的事项。

1729年(雍正七年)

雍正帝令耶稣会士巴多明挑选满、汉子弟，入馆学习拉丁文，准备栽培外交人员，但成绩不理想。1月，雍正帝在养心殿与巴多明、德理格、苏霖、白晋、张安多、冯秉正、郎世宁、罗怀忠、费隐见面，西士行礼，雍正帝赏其藕粉吃。○山东布政使费金吾上奏，山东济南西教士南怀德去北京后，还留有房产未动，“因部文未经指明，所以尚有房屋八间，坟地七亩，不敢一并改为公用，以致西洋人仍暗中托人每年潜收租息”，而临清康和之副主教进京以后，“尚有房屋三十七间，并地四顷九十三亩，亦系西洋人暗中托人每年潜收租息”。在直隶的清河、广平、莒州、南皮、东光等地，均有教士从事传教活动。○郎世宁与中国画家年希尧合作，将波佐(Andrea Pozzo)论“透视”的著作《画家与建筑师用透视

学》编译成中文出版,名《视学》(《视学精蕴》)。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洋透视法,时人称为“线法”。

1730年(雍正八年)

杭州德玛诺被逐,天主堂改为天后宫。○10月,北京大地震,波及近畿村镇,压毙十余万人,京城南、北二天主堂均受损伤,德理格受伤,郎世宁无恙,雍正帝拨银一千两,以资修葺天主堂。○德玛诺连任中日耶稣会省巡阅使。○6月28日,白晋在北京去世

白晋主要著作有:(1)《几何原理》,满文汉文合编,北京,御制本。(2)《自北京去广州之行》,为1693年康熙派白晋赴欧前的行记。(3)《中国现状图解》,1697年巴黎刊行。(4)《康熙帝传》(即《一个中国皇帝的写照》),献给法王路易十四。(5)《“天”和“上帝”两个中国名词的探讨》,此书因赞同利玛窦主张,被多罗宗主教禁止发行。(6)《古今敬天鉴》,白晋编,赫苍璧和马若瑟译成拉丁文。(7)《中法小字汇》手稿本,存科学图书馆。(8)《易经释义》(拉丁文原文:*Idea generalis doctrine libri I-king*),是关于《易经》爻象的诠释。(9)《旅行日记》手稿本,共一百九十一张,存慕尼黑。(10)致莱布尼茨的信。介绍中国哲学、礼仪和教会。白晋介绍了一种特别的观念:他认为德国哲学家设想的“二进制原理”,与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根源于“八卦”爻象,两者之间不无共同之处。等等。

1731年(雍正九年)

被雍正帝下狱之内大臣赵昌在狱中领洗。赵昌原为康熙最亲信之大臣,经常受托办理与教士交涉事,与传教士稔熟。雍正即位以后,赵昌因被谗而下狱论死。本年狱中来了一位奉教的看监武官,给赵昌代洗,取圣名若瑟,时年七十五岁,不久即死于狱中。○法国耶稣会神父胥孟德(P. Labbe)来到湖北谷城县北六七十里地方的磨盘山(又称木本山或谷山)中传教。他在山上竖起一座大十字架,给这一带起名“教友谷”,有十四个教友村,总

人数达二三千人。他们不与外界沟通,开垦耕种,自给自足,胥神父搭了几间茅屋,以为祈祷之用,每日举行弥撒。○西洋人李若瑟、纳味达(那味达)请求返回西洋,获雍正帝允诺,赏赐甚丰,计有武夷茶四锡瓶,六安茶四锡瓶,上用缎八匹,锦缎四匹,五等人参二斤,暗花龙白瓷碗五百件,五彩龙凤瓷碗八十件,五彩龙凤瓷杯一百二十件。

1732年(雍正十年)

5月,郎世宁与中国画家丁观鹏等为端午节合绘《午瑞图》一张。○8月20日,谕令将聚居在广东之传教士全部逐出国外,其中三十五名传教士遁入澳门,内有桑主教。教徒被拘禁者甚多,在京之教士都限制在堂内。据樊国樑《燕京开教略》称,只有遣使会上德理格一人可以自由出入。○7月25日,由教宗钦准的马国贤创办的那不勒斯圣家书院始开业。○是年,西洋人吴钧(字多禄)、赵加彼以及龚当信来华。○法遣使会上毕天祥及其他被软禁在广州之传教士,被驱逐至澳门。○李安德起程入川。

1733年(雍正十一年)

1月16日,戴进贤上奏陈情,为西洋人求情,被拒。3月,郎世宁与戴进贤致书被逐入澳门之西教士,告知皇帝已经允诺彼等中之三人可再回广东。○7月6日及12月23日,北京方济各主教(Francisco da Purificao)为统一教内礼制,两次发出告示,要求信徒遵守嘉乐“八项特准”。8月19日,毕天祥在澳门去世。○冯秉正神父著《盛世尧尧》问世,书题是“远西耶稣会士冯秉正端友指示,从教后学任伯禄付梓,杨多默纂录。内容分溯源、救赎、灵魂、赏罚、异端等五篇。用通俗白话文写成,文辞优美,流传甚广,在嘉庆元年及二十三年重印二次。○澳门外籍神父(P. Bazilius a Glemona)著中拉(丁)字典,名《汉字西译》。○北京南堂及东堂有耶稣会七十一位,辅理会士五位。北堂有会七十二位,辅理会士一位。

1734年(雍正十二年)

年初,雍正帝赏西洋教士巴多明、费隐、索智能、冯秉正、罗怀忠、宋君荣、郎世宁、陈善策、安泰、孙璋、戴进贤、徐懋德等多人每人小花荷包一袋,内银镲两个。○3月,李安德回到重庆,时四川代牧穆天尺不表欢迎,视本省为遣使会辖区。○3月,巴多明奏有西士曹士林、吴钧随舶东来,居香山澳,请求入京,获准。○巴多明译达内(Danet)“拉丁字典”为汉文。○是年,北京有领洗者一千一百五十七人。

1735年(雍正十三年)

10月7日,雍正帝逝世于圆明园,乾隆帝继位,不久,即赏巴多明、雷孝思、费隐、德理格、冯秉正、戴进贤、宋君荣、孙璋、沙如玉、索智能、曹士林、吴钧、罗怀忠、郎世宁等西士每人貂皮两张,缎一匹、宁绸一匹,以向西洋各国示好。○由杭州被逐出境的德理格又从越南潜入中国大陆,在云南传教,付洗一千零七十二人,终缚六十五人,办告解七千六百四十一人。○江南省有一千零二十七人领洗,告解者有七千六百二十八人。

1736年(高宗乾隆元年)

乾隆即位后,大赦天下。有一获释官员回家,设宴庆贺,其妹却奉教,因宴会上有迷信活动而没有参加。该官员甚怒,上奏控告天主教,主张严禁旗人信教。乾隆帝命礼部下令禁止旗人人教,否则处以重刑。○巴多明、戴进贤等乘郎世宁例行进宫作画之便,托其带奏折给皇帝。5月3日,乾隆帝赴如意馆观赏绘画,郎世宁跪帝前面奏,哀请缓和教禁。帝曰:“你可放心,并告诉神父放心,朕必不禁天主教,只是禁止旗人信教。”嗣后,官吏对信教者持宽松态度,迫教事件减少。9月,西洋人苏霖病故,戴进贤、徐懋德、巴多明上奏,领取赏银二百两。12月,郎世宁、唐岱、陈枚画《圆明园图》和《朝岁图》。○9月26日,教宗克莱门十二世宣布北京方济各主教两项告示为无效,宣布调查嘉乐“八项特准”的由来。○是年,樊守义神父再至右卫,为苏奴全家施行圣



郎世宁所绘乾隆皇帝像

事。○戴进贤与徐懋德合著《睿鉴录》刻于北京,于次年告成。○12月17日,马若瑟在澳门去世(一说1734年)。

马若瑟主要著作:(1)《圣母净配圣若瑟传》一册,1721年后完成。(2)《六书析义》,六种造字方法基本意义。有法译本。(3)《杨淇园行迹》。(4)《圣若瑟行实》,手稿。(5)《在书经之前的史前年代里的探索》。(6)元朝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众所周知,伏尔泰改写的《中国孤儿》是以《赵氏孤儿》为蓝本的。(7)《中国文范》(*Notice sur la Langue chinoise* 或 *Notitia linguæ Sinicæ*),为马若瑟最受称誉的作品。1728年在广州时写成。1831年在马六甲由基督教会出版。内容包括:引言:A. 中国书籍总论,阅读方法、查阅各类字典、字的声韵和四声表达;B. 常用词目录。第一部分:论通俗语言和常用语体,介绍语法和句法及中文某些词的独特用法及不同体裁,有否定式、婉转式、增强式、叠用式、前缀、后缀、重复句、反复句、询问句及成语。第二部分:专论书写文及其文体研究,重点是虚词的运用,及由一、二、三、四个单字组成大量单句的词汇。第三部分已佚。(8)《在中国古籍中发现天主教主要信条的痕迹》手稿,存法国国家图书馆。(9)《书经》摘译。(10)《诗经》八篇译文。(11)《马六甲海峡航道》,供海员用。(12)《拉汉对照词汇》(与赫苍璧合编)。(13)《拉汉对照词汇》供耶稣会士专用,手稿本。(14)《中国方言使用要诀》,西班牙语和汉语两用本。(15)《领会五经入门》手稿共九十八页,存法国国家图书馆。(15)《神明为主》。(16)《耶稣我的一切》(*Jesus meus et omnia*),法文诗。(17)《宗教大全》中译本。(18)《敬礼耶稣圣心》一小册。

1737年(乾隆二年)

5月,西洋人戴进贤、徐懋德、郎世宁、巴多明进呈西洋画颜料,奉旨交郎世宁使用,并赏每人缎纱各一匹。○是年冬天,京师教徒刘二为婴儿代洗,被外人看见,控到官府,刑部官员满人乌杰山,竟判刘二死刑,后减刑。刑部堂官张照发布禁教布告。

戴进贤、巴多明、陈善策等又谋保教。最后郎世宁再次到御驾前，跪下哭奏，再三哀求，乾隆帝朱批：“天主教非邪教可比，不必禁止，钦此。”由此下级官吏不敢过于迫教，被流放到澳门的西洋教士又微服潜回中国内地者，足有四十多人。○四川代牧穆天尺在罗马要求之下将名山、彭山、雅安、嘉定、叙州、邛州等地划归巴黎外方传教会。○党怀仁入川。

1738年(乾隆三年)

戴进贤任中国耶稣会副省会长，徐大盛任中日耶稣会巡阅使。在北京共有耶稣会士二十二名，其中六人供职宫廷，又有五位为中国籍会士。○冯秉正神父在北京刊刻了《圣年广益》一书，这是一部一年中每日敬拜的诸圣列传，流传甚广。○是年，桑伯多禄(官方文献称白多禄，Petrus Sanz)主教与多明我会的四名神父：费若望(Joannes Alcobel)、德方济各(Franciscus Serrano)、华若亚敬(Joachim Royo)、施方济各(Franciscus Diaz)潜回福安传教，一时教务十分兴盛，仅福安一县就有信徒二千六百余人。○是年，法国耶稣会士王致诚(J. Denis Attiret, 又名巴德尼)来华。

王致诚，又名巴德尼。1702年7月生于法国多勒(Dole)一个绘画世家，在孩提时已经在父亲办的学校里从事绘画了。在Broissia侯爵鼓励资助下，他曾去罗马深造，以后又回国在里昂作画。1735年7月，他加入耶稣会成为助理修士。三年以后来到中国。王致诚擅长历史画和人物画。

1739年(乾隆四年)

8月，王致诚奉命为“万方安和”挂屏画油画，以后又奉命在启祥宫行走。○是年，耶稣会士汪达洪供职宫廷，制造时钟。○9月，卡普清修会长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 di Billi)神父率领十名传教士抵达印度昌德纳戈尔，准备进入西藏。

1740年(乾隆五年)

4月,西洋人林济各病故,奉旨赏银二百两,大缎十匹。○是年,郎世宁、王致诚因画《元日舒长》图受赏。○冯秉正刊行《圣经广益》,分首卷和上下两卷,“弁言”介绍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倡导的八日避静,称其“身不避而心同于避,外不静而内自能静”。○夏,四川彭山大旱,民众迁怒基督徒,李安德及习拉丁文之生徒二人被捕,马青山亦被捕,不久释放,被赶出县境。○是年德玛诺在江南省付洗九百五十六人,听告解八千四百人。○12月19日,葡籍耶稣会士索智能(Polycarpe de Sousa)被定为北京主教的继任者。

1741年(乾隆六年)

9月29日,西洋教士巴多明卒,奉旨赏银二百两,缎十匹。12月,西洋教士鲁仲贤(Joannes - Walter,波西米亚人,音乐家)入华,照例赏灰鼠皮袄一件,皮褂一件,宁绸一匹。○索智能在澳门祝圣为北京主教。○是年1月6日,卡普清会传教士奥拉济奥一行进入拉萨,受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欢迎。9月9日,西藏王颇罗鼎正式接见传教士。奥拉济奥等呈上教宗礼物,有豪华挂钟、望远镜、显微镜、珍珠珊瑚、琥珀项链,刻有教宗像的金牌,波西米亚水晶石,同时呈上教宗致颇罗鼎的信。颇罗鼎则签发了允许传教士自由传教的谕令。9月18日,第七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接见了卡普清会传教士,奥拉济奥呈上教宗的礼品和信件,达赖喇嘛亦作了回信。并于同一天签发了准许传教士在西藏自由传教的谕令,全文如下:“大霍尔国(中国)被皇帝称为达赖喇嘛持金刚者谕令:致普天下之众生,拉业尔、米本、甲本、十长、达若卡等所有文武官员,全藏之宗本、仲科(原噶厦政府俗官)、头人等文武官员,欧洲神父即西方教士卡普清会上或称白人喇嘛者,到此不为经商,仅出自对教宗之尊敬,并受其派遣普济众生而来。在藏域无非礼之行为。对其住行,任何人须尽力相助。所到之处,让其活动方便,工作平安,往返安全。铁鸡年于布达拉宫。”(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第478页)○德玛

诺在江南付洗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听一万一千五百零八人，次送圣体九千八百十二人次。○索智能在澳门领受主教祝圣典礼。

教宗克莱门十二世致藏王颇罗鼎信

卓越的和最有权威的藏王，谨祝玉体安康及上主恩宠光照！最近，我可爱的孩子卡普清会士本纳的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喜悦。他回到罗马以后详尽叙述了您十分亲切地接待他及其他传教士，他们在您的王宫里礼遇优渥，盛情款待；他特别讲述您有天赋的美德和超人的智慧。在向陛下讲解基督信仰奥理、伦理规范以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时，陛下深受感动，赞许不绝，啧啧称善。的确，受我教会光辉形象所吸引而不抱任何成见者，对此是明若观火的。我们获悉陛下对我们的教律喜闻乐听。由于陛下虚怀若谷和探求真理的愿望，以及您对这些传教士优礼有加，从而您已以最甜蜜的绳子将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了。我们怀着感恩的回忆，决定呈书陛下，使您明了我们知恩之心，不论您过去或今后给予我们多大的保护，我们都不由自主地产生如下希望，并请您尽快接受：我们怀着对您渴望的心情，命令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带领一些辅助他的传教士再回到您那里，他以不亚于我们的超凡的圣德深受陛下垂青；他去的目的仍是为传扬福音，向陛下子民传送福音真理。愿陛下深思只有福音才是打开永远幸福的惟一门径，此外别无他途。现在我切切恳请陛下以更博大的胸怀，使他们享有陛下权威的保护，并给予迄今他们业已体验到的优惠待遇。您胸怀坦荡，名扬遐迩，不会使人怀疑我们的愿望不能付诸实现。我们深切地愿陛下清楚地认识到，我们非常关切您及您的子民获得不朽的生命，此乃我们宗教事业的天职，这也是您对公教信仰所梦寐以求的事情。为此，我们才催促这些出色的人，不畏艰难险阻，为宏扬和管理教务勇敢地踏上征途。

为了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竭诚地恳请陛下颁发玉旨手谕，使我们现在和今后派遣到贵地的宣传公教信仰的人，不仅在拉萨王室御前，而且在您统辖的全境内享有宣传福音戒

律的权利,我今热诚期望陛下决意身先民众,以您的表率带动全局。果真如此,我们将感到喜上加喜、锦上添花。诚然,您以仁政施济民众,民众理应对陛下感恩戴德,但陛下应进一步沉思,这些都不会给您及您的子民带来什么更深远的利益,除非将惟一的永远幸福的长生之路,置诸更重要的位置上。我们渴望尊贵的陛下深思明辨。

教宗克莱门十二世

1738年9月24日发自罗马

藏王颇罗鼎复教宗函

我致书问候制定和护卫律法的教皇阁下,您统理着欧洲中部的辽阔地区,引领世人走向无涯无量的喜悦和欢乐,您的形象似须弥山那样宏伟,如日月光芒从远方灿烂照耀。您的律法给人类带来了和平,您派遣所属喇嘛携带着您的亲笔信和许多珍奇物品,一张非常精致的您的画像和一些金制礼品来到我处馈赠给我,使我体会到您如此爱好和平的善美心情;信函和礼品均已安全抵达,我的心万分喜悦和激动。我自思也是如同父母一样恩爱民众,对您和您的属下尤为如此。我们愉快地款待他们,因为他们不畏路途艰辛,从遥远地方到此,不为经营财富,志为宣扬福音,我已将一颗最诚挚的、火热的心交予他们。其中一位喇嘛(指派来的一位监牧神职)专心训导戒律,另一位教士也是位医生,辛勤地治疗疾症,解救痛苦。您仅以此目的派遣他们不畏艰难险阻,行程万里来到此地。您的此般热情,多么伟大,多么高尚!全球之重心系在尔邦,故此您肩负着全人类的重担,实堪景仰、赞颂和感激!

您那备受尊敬的喇嘛医生(指乔亚钦神父——引者),所有旅居西藏的传教士,以及奔赴汉地和许多地区的所有传教士,皆是仅为济善众生而别无他求和欲望。因此,我们乐于给予援助,决不使之遭受任何窘迫和攻击,这样我们也满足了您的愿望和要求。

至于论及传播此种教律或实行那种教律的问题,由于人民中间有不同的信仰方式,我们不惯用强制手段使人放弃我

们的教律而强迫人去信仰另一种教律，否则便是迫害人民的自由。虽然如此，如果有人自愿信仰，公开地承认并执行天主的诫律，我们仍然丝毫不加禁止和阻挠。我们两地虽相隔万里，但我们的应近如毗邻，望书简不断，是为至盼。

今奉送五块金板、一匹中国锦缎、一百个麝香，若干西藏金纸片等微薄礼品，聊以致意。

发自拉萨宏伟的王宫，铁鸡年、月之吉日（原拉丁文的文本加注：即1741年10月11日）。

教宗致第七世达赖喇嘛代理嘉色活佛信

当代伟大人物阁下，谨致以崇高的问候，并祝主的宠爱之光恩照！

我可爱的孩子卡普清修会会长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神父，向我们汇报了有关您对他及其同僚宗徒传教士们的热诚情感和许多事情。对此，我们感激之至。毫无疑问，您的大名将在我们心中永葆丹青。为此，我们情不自禁地写信给您，作为对您忠诚的最确实的标志；尤其使我们非常喜悦的是，您的聪明才智和乐于纳善的广博胸襟，使您认明我们公教会之灿烂光辉，以及热爱真理和重视教会传授的最为重要的伦理规范方能使人类得到心灵的安静和抵制命运的摆布。我们确信这些已经在您的心田上萌芽，因为一个善良的人，其天性就是教导者，在心灵净化后，必然种上真理的种子。

我们知道您的良知和您的宗教的教导，使您最能倾向于正义和美德的修养。因此，您终将仰赖天主的仁慈而达到以下境地：您会清晰地看到，获得长生之幸福只有追从福音的教导，舍此别无门径可循；您将发现它与您的制度很接近；您卓有成就的治理、您的善良和权威，将会引导如您期望的广大民众在您的神圣土地上，和您一起获得充满神奇的、十分必要的主的恩宠。我们敬劝您，如若恩准我可爱的孩子弗朗西斯科·奥拉济奥及其同僚，能够在您的全体人民居住的各个地区传扬基督的信仰，我们确信上述情况将会很快到来。

我们责令最热爱您和一切人那样的那些人，怀着依靠您

这种对他们宽仁和不抵制我们教律的态度，长途跋涉回到您那里；我们更热切地祈求天主恩宠助佑您，增加您既已权威显赫的荣耀，并恳求您欣然接纳我们的传教士。

发自罗马，1738年9月21日

第七世达赖喇嘛复教宗函

今谨呈我的亲笔信与当今和平统治罗马国的教皇克莱门十二世陛下：

钧座藉派遣卡普钦修会欧洲籍神父来西藏之机，转交您言简意赅的手函和诸多馈赠礼品，计有：一件玻璃粘结的三棱器皿，一顶琥珀花冠，一顶镶嵌十二个宝石银底透明的鸟形冠冕（古帝王将领的礼冠——译者），八件大小相同而玲珑剔透的水晶杯，一个非常华美的大望远镜，四个不同形状的望远镜，六个不同形式的放大镜，两个多棱镜子，一个镶银边的水晶镜子，上面雕刻烘烤着的羔羊和醒目的斜体文字，四十八枚嵌上深蓝色玻璃的宝石球，一箱内装不同品种的、用小瓶装的药品，一串珊瑚花环的珊瑚珍品，三个勇士雕像，十二个刻写用小刀，两盒锦缎包装的象牙签，若干绣花针，一张艺术性很高的喇嘛或是枢机大臣的画像（是枢机主教贝鲁加神父的画像——引者），一尊琥珀教皇像，一个针绣的锦囊，两件茶具，一只黄铜色镀金的时钟，一件价值连城的奥古斯都的银钟，一些教皇、帝王、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葡萄牙国王和一些杰出人物的印版像，数卷地理图册，八张解析德国的地图和将欧洲分成五个方位的各种地图，一匹绯红色的骏马像，一块黑花岗石的刻文，一个用麻线编织的礼品，两个大号角，两个宝石松香盒，一枚铸有教皇面像的古币等多种珍品。对此不胜感谢。

至于论及治理国家，不论属于何种形式的国体，均需要举国安定团结。我确知，您的崇高品质，无与伦比的才能，丰功伟业，光辉的超凡圣德，以及最善良的心愿，均已表现在已博得万人皈依的仁爱上，您派遣仁人志士，分往世界各地济众行善，是上述仁爱的具体表现。这种治世之道，无论如何不应限制，只要芸芸众生顺从心悦，得享安宁，就应子称赞。

您倾慕景仰我们之心驱策您肯于致函予我，谨请今后鸿雁不辍，并望互祈实现国泰民安、德积功行，友谊与日俱增，始终不渝。我们彼此虽远隔重洋，天涯各一方，但我们的友情亲密无间，敬请多多赐教。

今奉送白丝披肩一件，金板五块，镶金天蓝色宝石冠一顶，火红色披肩两件，中国制金丝刺绣物三件，微薄礼品，聊表寸心。

铁鸡年秋季丰收的第一个月最吉祥日（拉丁文抄件加的注释：即 1741 年 10 月 7 日）

〔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68 ~ 477 页〕

1742 年（乾隆七年）

教宗本笃十四世颁谕《本笃十四世宪章》禁止教士再争论中国礼仪问题，废除“八项特准”，禁止一切祭祖祭孔活动，传教士且须宣誓服从，遵守禁令。○8 月，戴进贤、孙璋、宋君荣奏报新来西教士赵圣修（Louis des Roberts）进京，照例赏灰鼠皮袄一件，皮褂一件，宁绸一匹。○戴进贤、徐懋德偕汉人梅珏成、何国宗、蒙古人明安图撰成《历象考成后编》。○12 月 17 日，法遣使会士、四川宗座代牧穆天尺在成都附近村中去世。

教宗本笃十四世宪章（1742 年 7 月 5 日）

天主的安排使得欧洲开始了解西印度和东印度这些国家。其结果是，圣座在最近的时间里满怀热忱地将福音传播者送往这些国家。从教会的初创时代起，圣座在将福音的真理之光传到世界各地时便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并努力使之远离错误的阴影。偶像崇拜在哪里蔓延，就必须在哪里把它完全地根除，福音的工作人员们必须在良好的土壤上才能播种基督信仰的种子。他们必须把这些荒野的、未开垦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茂盛的葡萄园——在这葡萄园上会结出丰硕的、生命永恒的果实。

在圣座心中特别关注的地区中，确实包括广阔的中华帝

国。无人能否认基督的信仰已经在那里前进了一大步。如果要取得更大的进步,就必须有赖于圣座中途调整航向,使派往那里的传教士们弥合分歧。

1. 这些分歧是由于中国人敬奉哲学家(孔子)及其祖先的特殊礼仪习俗引起的。一些传教士争辩说,这些仪式和礼仪纯粹是民间性的,因此,对于那些放弃偶像崇拜和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人来说是可以准许的。另外的一些人则持反对的态度,他们说这样的礼仪,带有迷信的色彩,决不能准许,否则会教会带来损害。多少年以来,这样的争执确实引起了圣座的关注和忧虑。特别是从外面来看,杂草已经在天主的田地里扎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必须尽快地清除它们。

2. 首先向圣座的法庭提出问题的人怀疑这些中国的礼仪带有迷信色彩。有关它们的一些问题已经提交传信部。在1645年,该部已经同意神学家们作出的回答和决定,他们判定这些仪式和礼仪确实染有迷信色彩。因此,教宗英诺森十世在上述该部的要求下,命令每一个传教士都必须小心翼翼地遵守上述的回答的决定,并且在圣座没有作出另外的决定之前执行之,违者处以只有圣座和教宗有权赦免的自动绝罚。

3. 但不久以后,同一传教区的另外一些传教士向同一个传信部提出了有关中国礼仪的另外一些问题。根据这些问题,那些仪式和礼仪似乎完全不是迷信。因此,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将此事提交宗教裁判圣部。由于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描绘这些礼仪,该圣部判断,其中一些是属于民间性的和政治性的,但是另外一些则不能被容许的。1656年教宗亚历山大同意并确认了这些观点。

4. 然而,第三次同样的争论又被提交到了教廷。许多问题被提呈宗教裁判圣部,还问及教宗英诺森十世的戒律是否还仍然有效。正如上所说,他命令遵守传信部于1645年作出的答复和决定,违者处以自动绝罚。

除此以外,人们还询问到,根据最近提出的问题,是否要继续执行那些答复和决定。职部于1656年发出的部令似乎坚

持这样做。这是关于一些以其他方式解释的和在另外的情形之下考虑的问题。它们是由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们提出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考虑到在这些问题中提出的东西仍然有效，该圣部声称 1666 年上述传信部所发布的部令依然有效。那份部令并没有被圣部 1656 年发布的部令所否决。无论怎样考虑这些问题和当时的情势，以及所有无法意料的情况都必须遵守它。

同时，它还声称应该以同样的方式遵守上述 1656 年圣职部的部令，无论怎样考虑这些问题，当时的情势，以及从中发生的其他事情。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同意了这一训令。

5. 所有上述的训令是根据对提交上来的情况的不同解释签署和发布的。中国礼仪之争并没有结束，相反，争论越来越激烈。传教士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其结果是思想和判断的尖锐的分歧。传道、训练和教导开始变得不调和不一致。这产生严重的坏表样，在信仰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我的前任教宗英诺森十一世了解到了这些不协调的情况。他认为他的责任是结束这些有害的分歧。他命令圣职部对整个礼仪之争进行一个彻底的、非常仔细的调查。

他觉得如不竭尽全力调查此事的真相是没有意义的。怀着极大的关注，他下令同意了圣职部的意见。

6. 由于教宗英诺森十二世的去世，对这些问题的审查中断了。他的继承者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充满着他前任一样的热忱，要求当他的面彻底查清楚这些问题。后来，1704 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确认了，并以教宗的权威同意了圣职部根据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所作的回答。这是在对此事经过长时期的、全面的和非常仔细的考虑以后所作出的决定。充分听取了双方提出的理由，每一方都有广泛的机会申诉他们的争辩。由于中国礼仪带有迷信色彩，被禁止了。

教宗命令将这些答复送交宗主教多罗，他是驻中国的教务巡回使和教廷宗座代表，他将要求每一个传教士严格地执行，并对那些不赞同者加以法典上规定的惩罚。

7. 当然，安底奥基亚宗主教多罗，公布了圣座的决定。他还增加了一份要求完全遵守的训令。但是，那些认为中国礼仪仅仅是政治性的或民间性的人仍然试图回避它。他们提出种种愚蠢的争辩试图逃避它。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命令必须完全地、绝对地服从他以教宗权威确认的答复。通过宗教裁判圣部于1710年发布的部令，他做到了这一点。在该部令中可以看到他还命令做另外一些事情，可以读到这样的话：

8. 有关完全地、坚定地遵守宗教裁判圣部就中国礼仪的仪式作出答复的通谕。这些答复由教宗本人钦准。这份通谕还提出另外一些要求：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发布通谕并声明由宗教裁判圣部作出的有关中国礼仪的答复，对每一个有关人员来说必须坚定地和无疑问地执行。由安底奥基亚宗主教、中国教务巡回使兼宗座代表多罗枢机发布的谕令也须同样遵守。教宗克莱门十一世是根据各位可敬的枢机主教仔细地、和长期地讨论此事以后得出的观点发布了这份通谕。在过去的一年中，枢机们不止一次集体开会讨论此事；最近的一年中，又有多次是在教宗亲自出席的情况之下开会讨论的。

1710年9月25日，罗马教廷普世宗教大会听取了众位枢机们的意见。该大会在教宗圭里那官举行会议，教宗克莱门十一世亲自出席。教宗指定了枢机们组成反对全基督教世界敌人的总裁判所。

该圣职部严格遵照教宗的通谕作出了有关中国礼仪问题的答复，并由教宗陛下于1704年11月12日加以确认和同意。教宗宣布这些答复和多罗枢机的谕令都必须遵守。否则就要受到谕令和通谕所公布的惩戒罚的处罚。无论什么人，无论是本地司铎或修会司铎，甚或是特殊人物，或在传教事业上荣获荣誉的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别有举动，向教宗提出上诉。教宗陛下宣布，任何这样的上诉都将被驳回，事实上，已经被驳回了。

多罗枢机在上述提到的谕令中说明他同意教宗于

1704年11月20日发布的决定。然后，教宗宣布谕令或者通谕，包括其中所含的惩戒罚，都必须按照圣职部答复的标准加以执行，必须知道对于上述的答复不能有任何增减，其中任何内容都必须按照现在公布的上述谕令和通谕理解。

当教宗陛下听到人类的敌人并没有停止在那些广阔的地区上一天天地播撒莠草时，不胜悲哀。他不想放弃在那些地区神圣的有益的传播天主教的工作。他想以更大的热忱和更充满精力去推动这一事业。只要他能够，他想以更大的努力和热忱去消除那些分歧，正是这些分歧，使得基督信仰的丰收正在被荆棘所遏制，就像它已经这样被遏制了一样。他及时地下达了一个命令，以中止上述的事情及其他相关的事情。教宗命令只要多罗枢机留在那个地区，就必须将这份训令送交给他。如果多罗离开那里，就必须送交他的继任者，以及那些地区的主教和宗座代牧。这份训令看上去有助于执行教宗的通谕，有助于传教士们达成谅解，有助于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

不同派别之间长期存在着激烈的争吵，这是一个坏榜样。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写不胜写，必须加以限制。教宗陛下严厉禁止印行和出版任何形式的有关中国礼仪的东西，这种禁止针对任何修会、团体、教会机构和团体的任何成员——甚至于那些献身出版事业的人。它也针对所有本地司铎和修会司铎，也针对传教士和平常信徒，不管有什么身份、条件和荣衔。将来他们不得擅自寻找任何借口或托词来印行或出版，不管是有意地或无意地涉及中国礼仪，或争论中国礼仪，或由于它而引起任何事情的小册子、报告、论文、传单或任何种类的书写品。没有教宗陛下，或教廷普世宗教裁判大会的同意和特准，任何这类出版物都是禁止的。

为了加强强调这项禁令，教宗陛下要求并申明：所有违反者将受自动绝罚。修会司铎，无须进一步申明，将被剥夺主动和被动的发言权，教宗陛下和他的继任者还可决定进一步的惩罚。

而且，他要求将有关礼仪之争的小册子、报告、论文、传

单或其他写作品,无须任何申明,都要加以禁止。尽管其中现在加以禁止的作品将来或许会出版。违者将遭受禁书目录所规定的惩罚和惩戒。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同意以前出版的此类作品。所有这些都要作必要的预防措施。

他命令,对于那些印刷者,除印刷那些作品所蒙受的损失以外,他还有权根据罪行严重和程度,给予金钱上的和肉体上的惩罚。任何人或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违反者开脱——即使 Giuseppe Bartoli, 罗马教廷普世宗教裁判大会检察官也不行。

9.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通谕也不能克服顽固的思想。故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在 1715 年发布一个宪章,他的目的是要克服那些过分活跃的思想,他再度庄严地确认了先前圣职部作出的答复。他命令必须准确地和逐字逐句地遵守这些答复。他堵死了那些具有反叛意识的人可能会违反这些规定的任何途径。通谕全文如下:

10.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关于完全绝对地、整个地和不可违反地遵守他本人在另一场合公布的有关中国礼仪的决定的训令。他反对以任何没有根据的理由或借口来拒绝执行这些通谕。他为在那些地区或将去那些地区的传教士们规定了一个宣誓的格式。

下面是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的备忘录。尽管本教宗很卑微,但因为天主的需要,本教宗必须担任为天主教会领航。因为这个罪恶的时代,因为它的意义是如此深远,我们肩负着沉重的、并充满着挑战性的负担。为了掌好舵,首先我们必须做什么?应该结束在中国传教士中已经开始的激烈的分歧。日复一日,这些分歧已经变得越来越尖锐。它们与某些用以表达神圣和难以表达的上帝之名的中国词汇有关,它们也与中国人民举行的某些礼仪有关。有些传教士认为这些东西是迷信的。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它们仅仅是民间性的,准许举行它们。我们希望天主的圣断能愉快地结束这些争执。这些分歧阻碍了基督宗教和天主教信仰的传播扩展。当这些分歧结束

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能达成一致，人们说一样的，想一样的东西，人们将光荣天主，他们也将耶稣基督内成圣。

本此心情，在1704年11月20日，本教宗确认和同意了关于这些事件所引起的不同问题而作的答复。首先是长久的调查，这是在我们可敬的前任教宗英诺森十世时即开始的。在我任教宗时期的那几年继续进行下去，关于我们听取了争执双方的意见及许多神学家和专家的意见，还有许多弟兄们，诸位枢机主教的意见，他们是由教宗任命的审判和反对异教徒的大法官。接着就宣布这些答复：在中国话中无法用欧洲词汇适当地表达上帝的名字。“天主”一词，意即天堂之主，应被允许指天主，它已被中国传教士认可，并在信徒中长期得到认可并且使用着。但是另一个“天”字，和“上帝”（至高无上的皇帝）则完全应该加以反对。

刻有中国字“敬天”的牌位不准在基督教堂中使用，那些已经放置牌位的地方将来不准再保留。

基督徒也不准主持、服务或参加按照中国风俗习惯每年春分或秋分时节举行的祭孔敬祖时的献祭和敬奉礼仪。这些仪式带有迷信的色彩。

同样，基督徒也不准参加在纪念孔子的神祠里举行的奉献仪式、礼仪，中国人将那种神祠称为庙。这些敬孔的仪式、礼仪和奉献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的时节都要举行。它们由京官、地方长官首脑、其他官吏和学者主持，在京官、总督和地方官吏上任之前和至少在上任以后都要举行。最后，儒生们在得到学位以后立即会到孔庙中举行奉祭典礼。

除此以外，基督徒也不准许向供奉在祠堂和庙宇的他们的祖先奉献祭品，虽然与祭孔相比，奉献要少一些，也没有那么庄重；也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主持或服务或参加其他的礼仪和仪式。

同样，基督徒不准在敬祖宗的牌位面前奉献供品，举行礼仪和仪式，也不准他们服务和摆设这些东西，这种禁止适用于私人家中，也适用于祖先的坟前；适用于亡人跟前，也适用

于在埋葬他们的时候，在任何有外教人或没有外教人参加的仪式时都必须遵守这项禁令。

所有这些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和思考过，并经长期的仔细讨论。人们发现，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履行这些仪式，它们就不可能与迷信分开。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准许基督徒参与这些仪式的原因，甚至即便他们公开或秘密地发愿他们与礼敬亡者的宗教性尊崇无关，只是民间性的或政治性的，也不祈求从他们（亡者）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也不予准许的原因。

这并不意味着对仅仅是身体的参加以谴责，当教外人在举行迷信活动时，人可以站在一旁，在内心和外表上都不要同意那种做法，也不要主动参与。有时需要基督徒参加这类迷信活动，否则，仇恨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方便的话，他们应该首先表白自己的信仰，并确信没有这种信仰的危险。

最后，不准许基督徒在自己的家里保留已亡故的祖先的牌位。这个国家的风俗是把亡故的祖先保留在刻有中国字的牌位，上面刻着某某之灵的灵位，甚至上面写着少量字的牌位也不准许保留。

至于只刻有亡者名字的牌位，只要它们不带有迷信色彩，也不会起坏表样，就可以被容忍。这就意味着，只要非基督徒不会认为基督徒保留这样的牌位是出于同他们一样的考虑就行了。还有，他们应该在这些牌位的边上清楚地标明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以及儿孙们应该敬奉他们的祖先什么。

即便如此，有人还是说不能防止另外的礼敬亡者的礼仪。即假设另外也有一些有教外人举行的习惯上的仪式真的不是迷信的，看上去也不像迷信的，而是在民间的和政治的礼仪范围之内礼仪。

那些礼仪是什么？应该注意些什么才可以宽容它们，必须留给宗座巡阅使和处在这样地位上的人去判断，还要让处在世界上这一部分地区的主教和宗座代牧去判断。然而，同时他们也要小心，尽其热忱和勤勉，完全避免教外人的礼仪。渐

渐地,天主教会对于亡者规定的那些礼仪,应该成为基督徒真正履行的礼仪。

约六年以后,即1710年9月25日,我们发布通谕并宣称这些答复应当被每一个有关人员准确地和小心翼翼地遵守。在枢机们长时期地和非常仔细地讨论此事以后,我们听取了意见并再度重申了这一点。我还在1707年1月25日发布了一个严格的训谕或通谕,它是由可敬的,当时还活着的多罗枢机公布的。那时他还是安底奥基亚的宗主教,中国教务总巡回使。他发布的训令完全与另外一些枢机们的答复一致。我们需要他们的答复以及多罗的训令在其公布的谕令中规定的惩戒的监督之下得到执行。这里没有任何借口或托词可以规避。不管对本教宗或者对圣座所决定的,都不要作阻止执行的上诉。我们宣告任何这样的上诉都会立即遭到驳回。而事实上我们已经驳回了,这可以在有关此事的很长的通谕中看到。

这些通谕足以根除敌人在田野里插下的莠草。所有的信徒将恭恭敬敬地遵行和服从本教宗和圣座的命令。尤其是,本教宗确认和同意的上述答复,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这一事件现在已经结束了。

本教宗很遗憾地听说,在中国,长期以来,人们回避,或至少是长期拖延执行本教宗如此坚定地规定的答复。这对宗座的权威是严重的损害,对信徒也是坏榜样,并有损于拯救灵魂的工作。认为本教宗会推迟执行这些决定或本教宗不会适当地公布它们的借口是错误的和空洞的,它错误地认定了决定前的条件。在执行决定之前必须鉴定条件是否具备,而所基于的事实却没有得到证实。这就为我们就有关此事作进一步的声明提供了一个理由。令人害怕的是:如果这些训令得到执行,传教士和教会本身将会面临更大的危险。最后,必须求助于很久以前发布的这份通谕,即1656年3月23日发布的有关中国礼仪和仪式的那份文件。如上所述,它是经过枢机团、教宗亚历山大七世和我的前任教宗同意由枢机团发布的。

为了完成传教的职责,天主委托本教宗必须完全清除和

结束这些困难、迟疑、逃避和借口，以使我们为信徒的灵魂的拯救工作带来安宁。因此，在枢机们的劝告和本教宗的倡议之下，在了解了确切的情况和经过成熟的考虑之后，运用教宗完全的宗座权力，公布了现在的宪章。凭借着神圣的服从，本教宗命令以前公布的每一项答复，以及其中包含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准确地、完全地、无可逃避地和坚定地加以执行和遵守。它包括中国及其邻近国家和省份的每一个总主教和主教。

不仅如此，它还包括传教士，无论是本地司铎或任何修会司铎，甚至耶稣会的司铎；它也包括那些现在在中国和将去那里的人；它也包括在那些地区主持神修工作的教会官员和代牧，以及其他教区神长。违者将处以绝罚。没有任何人，除非将死的人，能被只有本教宗或任何在当时的教宗才有权赦免的绝罚。

至于修会司铎，他们还将被剥夺主动和被动的发言权。违背者无须进一步申明，将自动受到惩罚。他们的长上将尽其所能执行这些指示。他们决不敢贸然违反这些指示。没有任何理由能为这样的行为辩护。也不能以任何其他理由、动机、急迫借口或托词拒不执行。

此外，据此宪章，本教宗宣布并命令任何一个去传教或定居住在中国或其他国家或省份的教士，应该而且有职责宣誓他将踏实地、完整地、不容亵渎地遵守本教宗的谕命和训令。我决意运用与意志相等的知识、考虑和全部的权力做到这一点。对违者处以绝罚，并剥夺其主动和被动的发言权。它适用于本地教区司铎和上述修会组织，甚至是耶稣会司铎，包括那些由圣座及其神长已经派往或将被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们，也包括那些现在已经生活在那里，或将来要生活在那里，无论拥有何种名衔或权力的传教士们。那些已经被派去的传教士们应该尽快获知本宪章。那些即将被派去的传教士在开始履行其传教工作之前必须宣誓服从。宣誓的程式可以参照本宪章的结束部分。

在履行宣誓和签署宣言之后，他们必须将宣誓交给当时在中国的宗座巡回使或者他的代表；如果他不在的话，就交给他们所在或即将前往的教区的主教或宗座代牧，或者他们的代表。然而，修会司铎，则应该交给修会的长上，或者同一地区他们的代表。

每个宣誓的人都要亲自签名。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准履行或继续任何传教活动。它适用于那些由主教或地方神长晋升的司铎，也适用于修会司铎，也适用于任何不管拥有何种名衔、理由或特权的司铎，这需要特别明确地提醒。他们决不能听信徒的告解，也不能传道和主持圣事。他们不能运用其任何职权，无论是由圣座或各自的修会组织团体，甚至是耶稣会个别或集体授予的。除了上述的处罚以外，上述每一个授予的职权应完全停止，它们是完全无价值的，理应取消。

上述宣誓的程式如下：即“(姓名)由教宗或其神长决定派去中国或邻近国家(名称)和省份(名称)的传教士，将完全地和信服地遵从由神圣的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陛下发布的宪章中所包含的有关中国礼仪和仪式的谕命和训令。该宪章规定了宣誓的程式。我将准确地、完全地、绝对地和坚定地遵守教宗的通谕。我将毫不犹豫地完成它，我已经充分了解了它，我已经仔细地阅读了克莱门十一世的宪章。

“然而(但愿没有此事)，如果我以任何方式违反了(宪章)，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我承认并且声明服从上述宪章所加予的惩罚。我的手放在神圣的《圣经》上面，我这样承诺，并且宣誓，天主和《圣经》助我。”

此外，本教宗希望并且发布命令，这份宪章，或者抄本，甚或是印刷品，应该引起上述修会、团体、机构，包括耶稣会的注意。本教宗希望引起各修会总会长(superiors general)和修会总管(procurator general)的注意。本教宗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和他们所代表的团体的名义，忠实地执行和服从宪章。本教宗希望他们送回一份书面报告以证实作出了这样的承诺。他们应以各种方式尽快将宪章抄本送到居住在中国及邻近省

分的下属手中。他们应该命令其下属坚定地、完全地、诚实地、真正地执行和服从宪章中的每一项内容,并履行其中每一个细节。

要将像这样的原始的书面文件在每个地方的公众面前展示出来是很困难的。本教宗希望并命令任何副本、抄本或印刷本如将予以出版应具有同原件一致的可靠性,这样的抄本必须有公证人的签字,以及主管传教事务机关人员的盖章,教廷内外的人必须遵守它们。

本教宗在职十四年即 1715 年 3 月 19 日于罗马圣玛丽亚大教堂 渔人室

11. 通过这样一个庄严的宗座宪章,教宗克莱门十一世(F. Oliveri)公布了一个结束礼仪之争的宣言。对于那些自称是对圣座的权威怀有最大的敬意,完全谦卑地、顺从地服从教宗的判断,不会再继续引起广泛的反对的人们来说,它似乎是正确的和公平的。

但是,那些不愿服从和喜好争论的人们并不认为必须准确地服从它。他们说这只是一种类型的训谕。他们说它只具有传教训令的效力,而不是日常遵守的法律。他们认为这份宪章的效力由于亚历山大宗主教嘉乐所发布的有关中国礼仪的特许而减弱了。当时嘉乐是驻这一地区的宗座巡回使。

12. 我认为上述宪章保护了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它试图保持这种信仰免于迷信的沾染。我绝不准许任何人鲁莽行事,胆敢反对或蔑视该宪章,并继续执迷不悟,好像这不是一个高水平的宗座决议似的,好像这是一个与宗教没有关系的事件,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而且是可以变更纪律性的策略似的。

因此,要运用全能的天主赋予的权力,我将完全维护该宪章的效力。以全部的权力,不仅赞同和确认它,而且,只要我能够,我将以全部的力量和精力去加强它、支持它。认为并且宣布它本身具有完全的宗座宪章的权威。

13. 一些人试图根据他们所获得的特许来减弱宪章的效

力。这些特许来自于由两个长期住在中国的人提出的某些答复。他们回答了某些传教士提出的关于执行和实践宗座宪章的一些问题。这些答复,伴随着他们试图所解决的疑问,送给了上面提到的那个亚历山大宗主教。教宗并没有作表示同意的签字,他本人没有任何表示。他们向宗主教提供信息,宗主教根据形势的需要使用它们。然而,教宗保留着最终不变的权力,可以同意,如果发现它们不能被服从,或与上述宪章不符合的话,也可以有权推翻。

14. 当亚历山大宗主教嘉乐一进入中国,他就意识到自己处在麻烦之中。他被迫出版了上面提到的两个人对所提出的问题的不准确的回答,而八项特许正是从中推断出来的。这些特许也包含在宗主教的牧函中,它这样写道:

15. 由于天主的恩宠,亚历山大宗主教嘉乐,作为宗座驻中国以及邻近国家和岛屿的总教务巡阅使,拥有对上述地区所有主教、宗座代牧和传教士的管辖全权。他在拯救全人类的主内获得欢悦。

在天主、耶稣基督之父、仁慈之父、为所有人带来安慰的主内得到荣升!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他安慰我们,他也使我们得以慰藉其他生活在困苦中的人。

从天主眷顾我们的时候开始,我们就来到了中国。除了让所有的传教士在传教的园地里亲如弟兄以外,我们别无所求。我们想见到你们,分给你们精神的帮助,以使你们强大。我们要以我们拥有的信仰安慰你们。

但是我们不说这世界上的智慧,在你们中间我们怀有恐惧和颤抖。为了平息威胁你们传教士的风暴,我们将尽其所能将它抛入大海,以便于止住你们的颠簸。我们的帮助是以天主的名义的,正是天主,他在大海上,在狂暴的波涛中为我们开辟道路。我们说的应该是基督的真理,我们不能说谎。我们的良心可在圣灵中得到见证。我们的悲伤是巨大的,我们的心灵永远是哀痛的,因为我们不能面对面安慰你们。我们只能为你们做一点好事,并通过你们转达给你们周围的人。

但是我们不能亲自来做，只能在信里表达。首先我们感谢天主通过耶稣基督降临你们大家。由于圣灵，你们获得热情并加固信心，你们将勤勉地服从圣座的指示。将你们的心交给天主，天主说：“抚育我的羊群。”天主握有大卫之屋的钥匙，如果他打开，没有人能够关闭；如果他关闭，没有人能够打开。你们所有的人，拿出勇气！保持你们睁开的眼睛，保持信仰，勇敢地去行动，并且不断地强大。你们在天堂里的报偿是巨大的，执行你们的圣职，在开始做什么和说什么之前思虑周详。要成为灯，以你们的行为照亮更多更多的人，在你们的布置工作中发光发热。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退缩怠慢工作，兄弟们，以耶稣基督之名，我们将祈求你们。希望你们中间不要有分歧，思想要一致，使你们的判断也一致起来。让你们每个人以同样的谦卑和服从遵守圣座的指示，然后你们的服从将为众所周知。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使你们了解教宗克莱门十一世陛下的指示，它们已经公布了。我们也无需授权毫不迟疑地执行它们。我们不会作出修改，我们将原封不动地保留。我们绝不会撤销教宗克莱门十世陛下于1715年3月19日公布的有关中国礼仪的宪章。我们不会准允它所禁止的东西。

某些传教士对于一些习惯上履行的仪式怀有疑虑。我们提请注意其中的一些是可以准允的。我们希望每个在天主园地工作的人能够精力充沛，坚毅果决。我们将就个别提出的问题分别予以准许。但是我们听说这些话已经在那些思想不明确、心怀焦虑的和心地善良的基督徒中传遍。因此之故，你们必须小心。以你们全部的热忱和勤勉，完全地去除异教的礼仪。渐渐地，天主教会庄严地规定的礼仪将由基督徒和为了基督徒而付诸实行。

第一，中国基督徒在家中被允许使用上面仅仅刻着亡者名字的灵位，在这个灵牌旁边必须附有一个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的恰切说明。立这块灵牌必须没有任何迷信的暗示，必须避免一切坏表样。

第二,不是迷信的,也不会怀疑为迷信的礼敬亡者的民间礼仪,可以得到准许。

第三,对孔子的民间性礼拜是准许的,也准许用牌位敬拜它,牌位上必须没有迷信的刻字,并且需要伴随着对天主教的信仰的声明。同样,在修订过的牌位前准许点燃蜡烛、焚香和供设食品。

第四,允许在葬礼上使用蜡烛和香,只需将已经写好的东西(指天主教对死的信仰)加以申明就行了。

第五,在修订好的牌位面前,以及棺木和亡者面前允许叩拜和匍伏敬拜。

第六,桌子上可以准备美味珍肴,水果,肉和其他按风俗习惯供给的食品,在灵柩前面或周围可以放置修订过的牌位。也必须加以说明,没有任何迷信的暗示。所有这些都是向亡者表示热爱和尊敬。

第七,可以准许在中国新年和其他节期向着修订过的牌位叩头。

第八,在修订过的牌前可以燃烛和焚香。在墓前也可以供设食品,只要保持上面提到的小心谨慎即可。

传教士们相信教会是洁白无瑕的,是没有缺点的,让他们将手放在犁上,不要回头看。弟兄们,时刻关注着你们的圣召。不要做听众,而要去实践律法,这样去做的人才会取悦于天主。我们请求你们应该走在圣召的道路上,务须小心在和平的范畴内保持精神的团结。

我们并不是想要以教训人的面孔来行事。我们想通过这封信给你们以父亲般的劝告。请听听那个想早上出去雇佣帮工耕作他的葡萄园的园主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你们整日闲站着,你们都到我的葡萄园来。”仔细想想天主说的话,就会明了法官会说什么,也就明白了你是怎样的一种人。天主将会帮助你。为天主的话面工作,你将会得到慷慨的回报。天主将赋予你不朽的荣耀之冠。

不要让任何人以空洞的言辞诱使你们违背真理。如果

你遵行天主转达给你的声音,那你肯定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报答天主。如果任何人为了任何理由认为他应该抛弃传教工作,那么他就伤害了他自己,他必定要为了其他人灵魂而受到永恒的审判。

一个人将用自己的灵魂去交换什么?其他人将用他们的灵魂去交换什么?天主是真正的葡萄树,你们只是些树枝。枝干不能负担天主的果实,它们将会枯萎。它们将被收集起来,捆成一束,扔进那不灭的炉火中燃烧。

走在路上,我主耶稣基督除了无花果树的叶子,没有发现什么。他说:“你再也不要结果。”枝干会变得酸腐,我们希望它们有一天会长出葡萄,但它们除了荆棘什么也没有长。要知道天主发恨,暴怒和愤慨的那天!要记住天主还是仁慈的时候通过他的仆人说的这些话。

转到你的天主那边来,留在他的怀抱里。如果天主与你同在,他将洁净你,你将会产出世界需要的果实。

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履行了传教的职责。我们并不回避讲出天主想要告诉你们的话。对于你们的罪行你们将没有借口。弟兄们,正是在服从中,你们将找到幸福。你们将感到充实,你们将树立一个好的榜样。相互和谐团结。成为拥有和平的人,而爱与和平的天主将与你们同在。

我们知道并不需要将此信告诉新来的望教者,他们正准备服从宗座的训谕,正如他们应该做的那样。根据宗座宪章所作的指示已经足将他们引向拯救之路。根据这份文件的指示,凭藉着神圣的服从,我们禁止任何人将这份文件及其包含的内容透露给任何不是传教士的人员。它适用于任何团体、组织、机构和修会,甚至是耶稣会中的每一个人(然而,它不适用于八项特许,这八项特许只有必须和有用的时候,才能谨慎地让人获知)。无人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他自己或其他人,以口头或书写的方式透露这份文件。无人能将他译成中文或其他东方语言文字。如果违反此项禁令将受绝罚,除了即将死去的人才能由我,或由教宗予以赦免。对于修会司铎来说,违反

者将被剥夺主动和被动的发言权。这些惩罚将是自动发生的，无须任何声明。

——发自澳门我的住所，1712年9月4日

16. 亚历山大宗主教在上述牧函中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新来的望教者无须知道这封牧函，只要尊重和服从宗座训谕即可。只要依循宗座宪章的指示，他们足以找到拯救之路。

除此以外，他禁止任何人将此信译成中文或其他东方文字，也禁止任何非传教士谈起这件事情，违者处以绝罚。他所发布的八项特许，只有在有用和需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谨慎地让人获知。

从他提出的方式来看，接受牧函的每一个人都会明白，当他提出这八项特许时，他的思想是如何烦难，如何不确定和如何困惑。由于考虑到时间和地点的形势的需要，他于是权宜行事。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他将此事与那些关注基督信仰纯洁性和服从宗座宪章的主教们和饱学之士讨论商量，他会收回他的决定的。

17. 但是，这些特许是与宗主教表达的意愿相违背的。后来，令人惊奇的是，北京的主教通过两封牧函命令该教区的全部传教士，遵守八项特许，而且要严格遵守《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宗座宪章，否则将自动被剥夺神权。他维持了这八项特许，而这些特许是特别参照了上述宪章中庄严禁止的内容的。除此以外，他还命令一年中有四次在特殊的宴会节日中对基督徒展开教育，既要教导他们宗座宪章中禁止的内容，又要教导他们亚历山大宗主教牧函中准许的内容。

18. 我的前任，教宗克莱门十二世，不能容忍北京主教的胆大妄为。他认为他有责任谴责和完全拒绝这两封牧函。在1735年公布的宗座简函之中他这样做了。在这份通谕中，他为自己和教廷保留了告诉中国基督徒他和教廷对这些事情和有关中国礼仪的事情如何想法的权利。这份通谕内容如下：

19. 教宗克莱门十二世宣布最近去世的北京主教方济各的两封牧函应该撤销和无效。他的两份牧函发布于1733年

7月6日和12月23日。

教宗克莱门十二世,提请我们不要忘记,由天主赋予我们的宗座监督的责任告诉我们,只要天主允许,我们应当努力去除和消灭那些被知道是妨碍传播天主教信及其成长的事物。最近去世的方济各,当他任北京主教期间,于1733年7月6日和12月23日发布两封有关中国礼仪的所谓牧函,引起本教宗注意的是这两封信在中国这些地区的传教士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能够阻碍或迟缓慈母圣教会所期望的由派往那片天主之园地的传道者们辛勤工作结出的传教硕果。

本教宗想对此作适当的补救,消除所有的分歧,在传教士中间恢复他们所惯有的和平与和谐。本通谕已经完全地、充分地、准确地说明了这一事件,它针对着信中所说的内容,包括特别地和个别地提到和表达的内容。本教宗在此宣布:由方济各会士,前任北京主教发布的两份牧函、惩罚措施,以及其中提到的任何其他内容和他们所有的每一个结果,甚或是将来某时会有的结果,已经完全和永远地无效、无用和废止了。

本教宗采取此一行动,是受到了尊敬的主内弟兄、罗马教廷枢机们的劝告,为了本教宗发布此项命令,他们小心地和费力地检查了那些信函。这也是以本教宗的意志,用确切的知识,经成熟的讨论,并运用本教宗完全的宗座权力而作的决定。

然而,为了预防万一,也是因为必需这样做,本教宗集中了意志、知识、讨论以及运用完全的权力对那些信件里的内容宣布废止和无效。本教宗将绝对地和完全地剥夺它们的权威和效力。本教宗希望它们将被永远认为是废止的、无效的和没有权威的,就好像从来没有写过它们,绝对和完全地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效力。

除此以外,在仔细考虑我们将此事做何决定以后,我们将保留我们自己和罗马教廷向中国基督徒说明我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

本教宗在职第六年即 1735 年 9 月 26 日于罗马圣玛丽亚大教堂 渔人筮

奥梵利枢机 (F. Cardinal Oiveri)

20. 教宗克莱门十一世为他自己和教廷保留的想说给中国基督徒听的正是有关八项特许的事。他已经听说了这些事情,也听说了接踵而来在传教士中间引起的巨大争论。一些人坚持如果八项特许付诸实施,《自登基之日》宪章将会失去效力。另外一些人认为只要履行八项特许即可免除宪章的义务,……他们说,这是符合宪章本身规定的。

因此,前任教宗提出将八项特许的全部事实加以非常仔细的调查。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要保持基督宗教的纯洁性。在那些地区,必须严格遵行宪章。通过这样做,他希望最后结束此一争论。他要求神学家和负责罗马天主教会宗教裁判所的枢机们仔细地和小心地讨论此事。

他命令每一个去中国的传教士在罗马时都要被召集起来聆听训谕。并且,每一个从中国来到欧洲的年轻人也应该受到教育和学习基督教义。所有的人都要按法典之规定,被召对这些问题接受测验。他这样做是想在公布关于八项特许的最后决断之前充分了解事实。

21. 本教宗遵循前任的足迹。怀有同他一样的火热的宗教热忱。在天主的帮助下,要完成他因过早去世而未完成的伟大工作。本教宗已亲自以极大的关怀和勤勉逐项审查了八项特许。这并非本教宗一人的任务,本教宗也向宗教裁判所的枢机和顾问们了解了情况,听了他们的劝告。

现在我们知道那些特许从未经圣座同意,它们不符合并且违反教宗克莱门十一世的宗座宪章。它们使得那些由宗座宪章禁止的中国仪式和礼仪得以进行。它们与宗座宪章中避免迷信危险的规定相抵触。

22. 本教宗不希望任何人再使用这些特许。这样做是一种奸诈的行为,它会推翻宪章,对基督宗教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我们确认和宣布那些特许应该被认为是从未存在过

的。我们绝对地谴责和斥责它们是迷信的。

我们的这份宪章具有永久的效力最后定论。据此我们废除、撤销、废止并且声明八项特许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具备效力。我们说明和宣布它们将永远被认为无效的。

23. 在《自登基之日》宪章中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加上了这些话：“我们所说的话没有防止他们实行敬拜亡者的礼仪，如果有任何这样的事，那是因为这不是真正的迷信。”我们在此说明和宣布，“如果有任何这样的事”，应该理解为区别于教宗在其宗座宪章中加以禁止的东西。我们以不亚于他的权威宣布结束这些特许，它们绝不受法律的庇护。我们绝对地谴责那些特准，它们不会在任何地方受到欢迎。

24. 我们严格禁止任何总主教、宗座代牧、传教士、本地司铎和任何修会、组织、机构，即使是耶稣会的司铎，以及其他特殊人物公开地、私下地、公然地、秘密地运用这些特许。除了已经陈述的话之外，我们也决不擅自解释宪章中的内容。

25. 在上述罗马天主教会枢机的劝说之下，也出于本教宗的意愿，运用所了解的确切的情况，经过仔细的讨论，凭藉着宪章和神圣的服从所赋予的完全的宗座权力，本教宗命令我们所发布的宪章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准确地、完整地、绝对地、无可回避地和不可变更地加以遵守。这份严格的命令针对的对象是现在居住在中国及其接壤和邻近的国家和地区的总主教和主教，也适用于即将去那里的人。

如果他们执行此事时运用主教权力迟疑不决，或者不让教会知道此事，那将受到绝罚的处分，它也针对他们的教会官员，负责灵修事务的代牧们，和那些地区的其他神长和代牧，以及在这些代牧区中并非是主教的宗座代表。

它也针对所有的传教士，包括本地司铎和任何修会、团体、机构，包括耶稣会的司铎。如果他们在履行其神职和司铎权力时迟缓不决，那将受到失去神权的处罚。这种处罚将自动发生，无须声明。最后，只有本教宗和将来的教宗才有赦免的权力。此外，只有临死的人才能被赦免。除此以外，修会司铎

如有违反,将被剥夺主动和被动的发言权。

所有的人不仅要自身服从宪章,他们还要注意看每一个从中寻找精神指导和帮助的人是否也小心翼翼地服从它。他们不应该擅自寻找任何借口、理由、机会和托词,以任何方式违反和反对本教宗的宪章。

26. 天主禁止任何修会、组织、机构甚至是耶稣会的传教士拒绝服从本教宗在宪章中准确地、完整地、绝对地、无可回避地和严格地规定的内容。如果有任何人拒绝,本教宗以服从神圣的名义命令他的省会长和总会长,毫不迟疑地将这些顽固、罪恶和反叛的人们逐出传教区,他们的神长应该立即将他们召回欧洲,并向我们报告,以便我们根据他所犯罪恶的严重性加以处惩。

如果这些神长,包括省会长和总会长,不服从我们的命令,或玩忽职守,我们将毫不迟疑地反对他们。我们将永远剥夺他们遣送修会会士前往世界的那部分地区教会的特权和职权。

27. 我们要求保持我们的宪章的效力,它所有的内容将持续永远有效。我们还要在教宗克莱门十一世规定的宣誓程式中加进一些内容,我们认为这些增加的内容是非常必需的。因此之故,所有上述宪章要求宣誓服从,否则将受处罚的人们,从现在起都要遵循以下的程式:

“我(姓名)由圣座,或由神长,按照教廷赋予的职责,作为派往或注定要前往中国或邻近国家(名字)和地区(名称)的传教士,将完全地和忠实地遵守由教宗克莱门十一世发布的有关中国礼仪和仪式的宪章中的宗座训谕和命令。在这份宪章中规定了宣誓的程式。我十分了解圣座的指示,因为我已经完整地读过了这份宪章。我将准确地、绝对地、不加回避地服从它,我将毫不迟疑地去完成它。我将尽我所能,我将看到中国的基督徒将按照我给予他们的灵性上的指导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

“更有甚者,只要我能够,我决不让这些基督徒履行由亚

历山大宗主教在其牧函中准许的中国礼仪和仪式。该牧函于1721年11月4日在澳门发表,后来受到教宗本笃十四陛下谴责。但是如果,我有时经常违背了它,我承认并且宣布我要受到上述宪章加予的处罚。将我的手放在《圣经》之上,我这样作出承诺和宣誓,天主佑我,《圣经》佑我——我(姓名)发誓。”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天主,会降福我们的工作。我们为他在人世行事,长期地从事这非常重要的工作。让福音之光明亮地、辉煌地照耀在那片广大的土地之上,让天主全能的手引导我们忠诚的努力,让那些地区的牧人完全理解和相信他们必须听从和服从我们的声音。

我们也相信,他们将停止不必要的担心,即以为严格地服从教宗的指示会迟缓异教徒的皈依。可以肯定的是,天主的仁慈决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如果他们无畏地传播基督教的真理,并将它如同在圣座那里接受到的一样纯洁地传授给他人,那么天主的仁慈将永远支持他们的工作。为了传扬真理,他们甚至应该准备流血,就像追随神圣的宗徒和其他著名的基督教信仰传播者的好榜样。只要他们的鲜血能够使福音传播免于迟滞,那么它就会使天主的葡萄园更加茂盛,并产生出更多的信徒。

我们祈求全能的天主赋予他们的灵魂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我们将提醒他们,当他们被分配传教工作时,应当自视为耶稣基督的真正的门徒。他们应当相信他们是由天主派遣的,不是为了短暂的欢乐,而是为了伟大的斗争,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谦卑;不是为了休闲,而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退却,而是为了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信仰的果实。

29. 我们要将这份宪章誊抄下来。……等等。

[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47~62页]

1743年(乾隆八年)

6月4日,费隐病逝于东安门内天主堂,享年七十一岁。戴



清代一位天主教徒墓碑拓本,碑文中有敬拜天主与孝敬先祖并行不悖的内容

进贤上奏称：“西洋人费隐，熟谙天文等学，于康熙四十四年间来京效用。康熙四十七年奉旨测画舆图，费隐由口外等处至直隶各省，周流十有余年，忝邀供奉效力三十八年。”上赐银二百两。○10月，徐懋德(Andreas Pereira)卒于北京，生前曾与戴进贤合著《历象考成后编》，上赐银二百两。○11月1日，王致诚致信欧洲，详叙中国园林、绘画、建筑风格，以及他与郎世宁等在如意馆之绘画生活：“吾人所居乃一平房，冬寒夏热。视为属民，皇上恩遇之隆，过于其他传教士。但终日供奉内廷，无异囚禁，主日瞻礼，亦几无祈祷暇晷。作画时受掣肘，不能随意发挥。”○是年，殷宏绪《主经体味》刊行。

1744年(乾隆九年)

10月，朝廷准西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吴植芳、艾启蒙(Ignaz Sichelbarth)、那永福进京效力。○11月，戴进贤上疏编定一部新的天文历法书：“伏查康熙十三年，蒙圣祖仁皇帝命，原任治理历法兼工部侍郎南怀仁制造观象台测量日月星辰仪器六座，又纂成《灵台仪象志》一书，有解有图有表，皆阐明仪器六座所用之法。此书乃臣监中天文科推测星象所常用者。其中诠释用法，仪详理备。但志中原载星辰，循黄道行，每年约差五十一秒，合七十年则差一度，今为时已久，运度与表不符，理宜改定。”经乾隆批准以后，戴进贤与鲍友管(Anton Gogeisi, 德人)、刘松龄(Augustinus Hallerstein, 南斯拉夫人)详加细测，于乾隆十七年(1752)告成，赐名《仪象考成》。○江南耶稣会士共有八人，所辖教徒约六万人。

1745年(乾隆十年)

4月20日，奥拉济奥会长率领最后一批卡普清会传教士撤离西藏，标志着该会三十余年在西藏传教工作的失败，拉萨及塔布宗纳村的传教站亦长久关闭。5月6日，党怀仁卒，葬于凤凰山。○直隶中部有天主教徒四千五百余人。

1746年(乾隆十一年)

福建福安县桑主教下乡行竖振礼,乘机与同会费若望、德方济各、华若亚敬、施方济各四神父聚首,被人告发至官府,株连教徒十四人,其中五名贞女,一并押送福宁府,后又押往福州。福建巡抚周学健多次提审,并施酷刑,并于是年7月上奏朝廷。8月12日,乾隆下谕:“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女礼拜诵经;又以番民诱骗愚民,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潜散各省,亦未可知。可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飭地方官,严加防缉,如有天主教引诱男女,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勿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高宗实录》,转引自张泽《清代禁教期的天主教》,第67页)桑主教等人狱后,经大小审讯九十四次,每次都受重刑。○3月,钦天监监正戴进贤卒,监副刘松龄升补,帝赏三百两银子、十四匹缎子为治丧费。12月,德理格卒,赐葬银二百两。○是年,湖北谷成一县有一百五十名教徒被捕。在襄阳亦抓获教徒曹殿邦,竟带有用西洋字写的信。

1747年(乾隆十二年)

年初,罗怀忠卒,上赐银二百两。○5月24日刑部部文抵福州后公布,26日周学健将桑主教斩于西门外,时桑主教年六十七。四位神父监禁候决,教徒分别治罪。○是年,葡萄牙神父黄安多(Antonius J. Henriques)、意大利神父谈方济(Tristan d'Attimis)被人告发,被捕于苏州。苏州、太仓、镇江、浙江嘉兴各府官吏,倾巢出动,搜捕教徒。○是年,圆明园西洋建筑工程开始营建。西洋楼为郎世宁设计,为巴洛克式,门窗仿波洛米尼式(Borromini),楼房颇像热亚那王宫,意大利风格颇为浓厚。蒋友仁则负责设计及建造喷泉(大水法),有兽战、林中猎狗逐鹿和喷水时钟式样。还有按中国十二时辰,以十二生肖铸成的铜像,排列在庄严赫奕的欧式宫殿之前,每个动物口中喷水两小时,表

现全日时辰,流水的声音成了宫廷里的音乐。

1748年(乾隆十三年)

5月,在福州被押的四位神父费若望、德方济各、华亚若敬、施方济各脸上被刺上“斩犯”二字。秋天,新任巡抚陈大受上奏朝廷,说西洋教士四人俱病死狱中,实际上德、华、施三神父被绞死狱中。9月12日,黄安多、谈方济二神父在苏州监狱中被秘密处死。教徒唐德光、沈陶氏二人充军边外,其余教徒各杖一百、八十、四十不等。○6月28日,冯秉正去世于北京。○全国有一百座左右教堂被关闭或充公。○是年全国有耶稣会士四十名左右,方济各会士七人,多明我会士一人,奥斯定会士一人,加尔默罗会士一人。

冯秉正著作有:(1)《圣体仁爱经规条》为“圣体会”会规,一册。1719年北京刊行。该善会在北京成立,奉圣母为主保,专事虔敬耶稣圣体。(2)《圣心规条》,为敬礼耶稣圣心的简要经文,一册。(3)《盛世刍蕘》五卷,北京刊行,1733年、1796年、1818年出版。内容:A.论天主实有及创造万物;B.论元祖背命和救赎恩功;C.论人灵;D.论善工与罪罚;E.论异端邪教及其谬论。(4)《圣年广益》,为一年内每日规定敬礼的圣人列传,共四卷,1738年北京刊行。本书曾出满文本,1805年被嘉庆皇帝取缔。本书是Croiset神父所写的《圣人行实》的简译本,为略具文化知识的信徒所欢迎,流行甚广。(5)《圣经广益》,为每日弥撒中福音经的诠释,两册,1740年北京刊行。内容见本书1740年所述。(6)《求真自证》,论祈祷功夫,一册。(7)《朋来集说》,供教友相聚时之谈资,写于1722年之后。(8)《圣依纳爵神操》,中译本。(9)《避静汇钞》,该书列举了避静规则,默想专题及目录及阅读材料。(10)《中国通史法译本》(*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共十二卷,1777年至1783年巴黎刊行。后由Fr. Rossi译成意文。该书以《通鉴纲目》为蓝本编译,但充实了“纲目”以外的很多史事,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历史。冯秉正以六年时间完成,1737年赠予里昂图书馆。

1749年(乾隆十四年)

清廷迫令澳门葡萄牙当局不准华人传习天主教。○西洋教士席澄元(西澄元, Adeodat)入华,在皇宫内做钟处行走,技艺高超,备受器重。

1750年(乾隆十五年)

耶稣会士钱德明(P. Jean-Joseph-Marie Amiot)抵澳门,钱氏精通满汉文,乾隆帝已有所闻,谕令入京,以后一直供奉内廷,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曾将乾隆御制《盛京赋》译成法文。又著《中国兵法考》(*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孔子传》(*Vie de Kong-tse*)、《中国古今音乐记》(*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anciens que modernes*)、《满法辞典》(*Dictionnaire tartare-mandchou-français*)等书(详见其著目表)。○是年,在京西洋人立刻石碑,称“价典旗地许可碑”(1911年发现于北京附近长辛店天主堂旧址)。○3月,那不勒斯圣家书院有中国青年修生八名卒業,并奉召入罗马由枢机主教主考,成绩优异,教宗颇为嘉许。其后,即有郭元性、赵多明、赵西满、蔡文安等四人回国传道。

“价典旗地许可碑”全文如下:

十二月初十日奉旨:民人私典旗地,定例綦严,屡经飭禁。但念郎世宁等系西洋远人,内地禁例原未经通飭遵行,且伊等寄寓京师,亦藉此以资生计,所有定例后价典旗地,着加恩免其撤回。如原典之人自行用价收赎,仍听其赎回。此系朕加恩远人,恩施格外。今禁例既经申明,嗣后西洋人于此项地亩之外,再有私行典买旗地者,与受之人定行照例治罪,并将此次恩免撤回之处从重究治。郎世宁等既经宽免,所有典出之蔡永福等,并失察之该管各官,均从宽免其治罪议处。至河淤地亩,亦系郎世宁等价典之地,俱免圈撤。但蔡永福于认买公产之外,所有多得河淤地亩典价,并非伊份内应得之项,着该部照例查办,钦此。

〔录自杨伯达:《清宫廷画家郎世宁年谱》,第58~59页〕

1751年(乾隆十六年)

高慎思奉召进京,后被任钦天监监正。○郎世宁等制成“万年欢”戏剧机械人表演模型,庆贺皇太后七秩寿辰。乾隆亲到如意馆观看,予制作者厚赏,在京耶稣会士大得体面。○中国修生杨德望、高类思至法国,在 La Fleche 公学习法文和拉丁文,后人耶稣会及遣使会攻读。

1752年(乾隆十七年)

4月,南京方主教(Mgr. Francois de Santa Rosa)去世,由葡王若瑟推荐,5月,罗马教宗本笃十四世委任耶稣会士南怀仁(Mgr. Godefroid Xavier de Laimbeckhoven)为南京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四川、贵州、云南传教事务。11月,由已故戴进贤、现钦天监监正刘松龄、监副鲍友管遵旨增修之《灵台仪象志》、《恒星经纬度表》告成,书名用《仪象考成》。造办处奉命将新测恒星图像制造天球二份。时戴进贤已卒,最后数册得傅作霖(da Rocha)之力完成。○已故戴进贤的《黄道总星图》刻于北京。

南怀仁,字羲德。1707年1月9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望族。1722年1月入耶稣会奥地利省区初学院,1725年至1728年,在 Leoben 和 Gratz 读文学和哲学。并在林茨执教二年。以后又在维也纳完成数学和神学学业。1735年,他前往葡萄牙,被派往东方,同年晋铎。1736年4月25日,他从里斯本起程,到莫桑比克传教一年,次年9月抵果阿。一路上,他与刘松龄神父一同测定航行地理位置,收集天文观测资料。1738年5月8日从果阿起航,8月5日抵澳门。从1739年至1743年,他被派往湖广地区的武昌府、德安府、胡金店等地传教,一度被捕,又获释放。1746年,他被任命为传教区监铎,巡视河南、湖广、江南各省的教务。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934~936页]

1753年(乾隆十八年)

耶稣会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著《性理真诠》四

卷,因卷帙过繁,故又作《提纲》一卷。其书设为后儒先儒问答之体,作者以先儒自况,引证广博。○是年,北京法籍耶稣会士共付洗小儿四千四百十七人。○10月22日,宋君荣致信耶稣会总会长 P. Visconti,报告中国教会情况曰:“乾隆帝对在北京的教会尚能有限宽容,但不论满人或汉人都察觉皇帝仍然歧视天主教,而且他决计不准任何传教士在他省存在,也不准任何官员信奉天主教。因此,很少人敢阅读教理课本,或谈论天主教道理。教友中的信仰也在逐渐涣散,我不知朝廷上还能否找到一个人敢在皇帝面前提起作为传教士的西洋人,我们每次试图提及,总被断然拒绝。”

1754年(乾隆十九年)

南怀仁主教在澳门祝圣。领受神职以后,南主教急欲上任,但因时局不宁,无法去江南,于是走遍湖北、湖南、河南三省,夜行昼伏,一年之中,旅行十一个月,八个月在水上,三个月在山上,艰辛备尝。他写道:“教友争先供给我所需一切,他们对自己司牧的感情与尊重,是我称颂不尽的。”○是年,江南五位葡萄牙神父李若瑟、费地窝尼小、张若瑟、龚安多尼、刘玛诺一同被捕,囚于南京大狱,官吏严刑拷打,牵连受刑审教徒八百多人。○7月初,乾隆帝前往热河避暑山庄外八庙,迎接远方归顺之格尔穆克部阿穆尔撒纳,王致诚随同前往,后因病返京修养。不久,王致诚、郎世宁、艾启蒙再赴热河,完成全部的该部酋长肖像画记录。○8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奏,在福安县城生员刘渭家中,有男女集会,讲解天主教,并查获天主像、十字架、经卷,另抓获教徒冯文子、蔡灼。刘渭被革去生员,冯、蔡则流放边地。

1755年(乾隆二十年)

是年,郎世宁奉命画阿穆尔撒纳等脸像十一幅,又作《阿玉锡持矛荡寇图》。○7月2日,教宗本笃十四世将和德里列为真福品。○7月22日,南怀仁在澳门接受主教祝圣礼。○四川省有教徒五千名。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

两江总督鄂容奉乾隆帝谕旨，将押在南京大狱的李若瑟、张若瑟等五名外籍教士解往澳门。署理两广总督杨应琚、广东巡抚鹤年派人去澳门晓谕耶稣会会长季类斯，不许再派人潜入内地传教。○方济各会神父郭玛米亚北上济南传教。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

蒋友仁进呈西洋水法机器式样，乾隆帝命仿造。○5月26日索智能主教卒于北京，8月，南京南怀仁主教受命兼理北方教务。山东历城教友李松引西洋梅神父到北京、直隶威县和山东临清传教。○法国教士、巴黎科学院驻华通讯员汤执中(Petrus d'Incarville)卒。汤氏曾服务于圣彼得堡科学院和伦敦皇家科学院，来华后曾进呈菜蔬花果种籽，植入御苑。○四川省的中国籍神父李安德走访了全省三十七个传教点(“会口”)。

汤执中精植物学，其主要著作有：(1)《中国人制作“明角灯”的方法》，1755年版；(2)《有关中国漆的记录》；(3)《中国焰火制造法》；(4)《乘 Danae 号三桅船来中国记行》；(5)汤执中将翠菊花籽寄往欧洲并种植成功(1748年)；(6)《按西文字母编排的北京地区植物和其他自然界生物的目录》，1842年发表于《莫斯科自然科学家学会论文集》上；(7)《植物志》(*Herbier*)，是欧洲对中国植物有系统了解的第一部著作；(8)《丝蚕养植》，附有彩色图片；(9)《法汉字典》稿本，一千三百六十二页，于1752年2月20日完成。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

郎世宁七秩寿辰，帝设宴庆贺。○中国籍沈东行神父的《易简祷艺》在京刊行，此书讲论祈祷，为禁教时期中国神父自著之稀有品，文笔亦佳。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

五月初一上谕：应照平定伊犁之例，绘画舆图。明安图、傅

《通报》第4卷第1号上发表。(6)《大唐史纲》，1791年和1814年 Nyon 和 Treuttel 刊行。手稿于1753年11月4日寄出。(7)《西辽史》(《第十二世纪的鞑靼族》)手稿，存 Ste Geneviève 公学图书馆。(8)《中国的编年史探讨》，此书手稿于1793年9月23日寄往巴黎，直到1814年才发现并发表。(9)《东京、交趾、西藏、琉球群岛各地记叙和伊留特(Ēleuthes)征服记》，其中关于琉球的地理、政治、宗教、风俗记载尤详。希望对法国的在远东的商业发展有所助益。内容采自徐葆光《中山传信录》。(10)《步天歌》译文。《步天歌》为隋代丹元子所作，译文及注释手稿于1734年寄出。(11)《中国的犹太人》，宋君荣在赴北京途中于1723年3月去访问了开封的犹太人，他把开封城内犹太会堂四幅碑文译成法文，于8月18日寄给杜赫德(du Halde)神父。(12)《两“至”(冬至和夏至)记录和日晷子午线投影》，1809年出版。(13)《1748年北京彗星出现观测记》。(14)《〈易经〉和〈礼记〉的法译本》。(15)《蒙古史(1206—1370)》，存 Ste Genevieve 公学图书馆。(16)《日本和高丽地理》手稿，1729年巴黎收到，由 M. Cordier 加注后发表于1898年《通报》第9卷。(17)《成吉思汗的祖先和成吉思汗的死亡》。(18)《中国典籍中载有天文学观测记录汇编，公元前147年至公元1368年元朝末年》，手稿，1749年寄出。等等。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

5月，郎世宁、王致诚、安德义、艾启蒙绘“追取霍集占首级”、“黑水河打仗”、“阿尔楚打仗”、“献俘”、“郊劳”、“丰泽园筵宴”等十余幅绢画。○韩国英、方守义两位神父抵京，服务宫廷。韩国英为耶稣会士中之大生物学家，来华后详细报导中国之野蚕、香榛、木棉、草棉、竹、荷、玉兰、秋海棠、茉莉、荸荠、牡丹、橡、栗、灵芝、白菜、哈密干、葡萄、皂荚、艾等植物蔬果生长状况，并于乾隆四十五年将植物标本附汉名目录寄往法国，至今犹存自然历史博物院。韩氏本人又为圣彼得堡学院通讯员。○四川李安德神父在日记中记载：全省有一百三十多个传教点(“会口”)，每个会口有六十至八十名信徒，分布于农村乡间。

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

由宋君荣测绘、蒋友仁完成制作的“坤輿全图”进呈御览。此图名“乾隆内府铜版地图”，又名“乾隆十三排地图”。该图主要分下列各部分：(一)亚洲西部略图，以皇輿全览图为基础，参酌利玛窦“万国图志”、“万国輿图”，南怀仁“坤輿全图”、“坤輿图说”制成；(二)亚洲俄领图略，根据俄国所献輿图制成；(三)准噶尔及回部地图，由左都御史何国宗、蒙古正白旗生员五官正明安图督率西洋教士蒋友仁、高慎思等实地测绘而成。该图之优点为注重中亚方面輿地以及中俄边界的沿革。6月24日，四川官府在李安德成都的寓所搜出拉丁文书及弥撒祭衣，并逮捕一些教徒，李安德从近郊赶回自首，于是被捕者均被释放；李氏一人被拘于一小客栈。官府原判他戴枷二月，因年老改为一小时。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

法国禁止耶稣会。○乾隆帝西征，郎世宁与王致诚绘疆场征战奏捷图。西洋奥斯定会士、意大利籍画家安德义(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奉命在如意图馆行走，从事绘事。○是年澳门耶稣会士共二十四人被葡政府拘执。○李安德获释，赖借债度日。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

西班牙禁止耶稣会。○1月，毕业于那不勒斯圣家书院，回国后在四川、河北传道的中国籍司铎谷文耀逝世于北京。○方济各会方纪谷(Magni)任秦晋代牧。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

Petrus Kerthervē受任为四川宗座代牧，他自觉不能胜任，推荐李安德自代，但李安德双耳已失聪，不能管理学校，而专志于教授学生，培养司铎，他在成都附近凤凰山建立一小学校，取名圣诞修院，训练约十二名修生。五年后关闭。

1765 年(乾隆三十年)

5月,传旨将郎世宁等所绘之《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等处得胜图十六幅,发往西洋,制成铜版。另有郎世宁所绘之《爱玉史诈营稿》、王致诚《阿尔楚尔稿》、安得义《库尔满稿》一同发往西洋,制成铜版。这批画原准备送英国,时广东主教范布尔(P. La Febure)力陈法国美术的精美,故广东官吏和十三行决意送往法国。这批图画送至法国以后,法国皇家画院院长(Directeur de l'Academie royale de Peinture)马立涅(Marigney)命令柯钦(Charles-Nicolas Cochin)主持雕版工作,并精选雕刻名师勒巴(Le Bas)、圣多本(Saint Aubin)、布勒佛(B. L. Prévot)、阿里默(Aliamet)、马斯克立业(Masquier)、讷伊(Née)等,历时多年雕刻而成。于1774年送回中国,乾隆皇帝深为嘉许。

1766 年(乾隆三十一年)

郎世宁作《格登鄂拉斫营图》(局部)

7月16日,郎世宁病逝。郎氏居京五十年,历康、雍、乾三朝,享年七十八岁。是日,乾隆帝特下谕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



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着照戴进贤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内务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钦此。”郎氏葬京西阜城门外滕公栅栏，通称葡萄牙墓地。○是年，北京最后一批耶稣会士之一的晁俊秀(Bourgois)在书信中谈及南怀仁主教的苦况：“年已七十岁的南怀仁主教，憔悴不堪，在一个面积比意大利还大的教区中，终年奔走，服装和普通农夫一样，头戴箬笠，短褐敝履，藏身于狭小的渔船上，煎熬于酷暑的气候，日夜承受着虫虱的叮咬，而且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希望能舍舟登陆，在一间破屋中暂住两三天，以解除疲劳，恢复健康，但又怕连累教徒，给他们增添麻烦。他白天忍受痛苦，黑夜为教徒听神工。”○在钦天监佐理历政的安国宁神父使林德瑶(又名林安多)所译《崇修精蕴》十卷刊行。

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

蒋友仁“坤舆全图”木刻告成。○四川教士范益盛(Franciscus Pottier)被教廷任为四川宗座代牧及云、贵二省署理主教，两年后在西安祝圣，习称博主教。时四川境内中国教士仅李安德、李路加二人。○缅甸人入侵暹罗，原巴黎外方传教会设于大城府的修院迁往越南 Hondat。○八月(10月)上谕，江西庐陵县属吴、萧等姓，仍有信教之人。更有吴均尚于二月间会同蒋日达前往广东，寻西洋教士林若汉来本村传教，在广东被拿获。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

2月3日(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江西庐陵县民吴均尚，引西人传教，发配伊犁为奴。西洋教士安当、呢都押回本国。

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

京中传言教徒行剪辮邪术，历局中二十二个奉教官员被革职或遭申斥。○湖北磨盘山发生逮捕教徒事件。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刘德胜(M. Gleye)在四川荣昌附近为病人傅临终圣事时被发现,被捕入狱。直到八年以后,北京傅作霖神父奉旨赴金川绘图,路过成都,得知刘神父在监,为其说情,终被释放。○是年,梅神父(Venerabilis Dei Servus Joannes Martinus moye,又译茂益或慕雅)来到中国,不久前往四川,被委任管辖一大教区。当时四川约有教徒四万。○耶稣会士贺清泰(Ludovicus de Poirot)来华,贺虽为法人,但长在意大利,早年就读于佛罗伦萨耶稣会初学院,来华次年晋铎。贺清泰以绘画供职宫廷,但他的卓越贡献为翻译《圣经》。他所译《圣经》名为《古新圣经》,译出部分有:《造成经》之总论、《救世之经》、《肋未子孙经》、《数目经》、《传法度经》、《若耶稣之经》、《审事官录德经》、《众王经书序》、《如达斯国众王经》、《厄斯达拉经序》、《若伯经序》、《达味圣咏》、《撒落孟之喻经》、《智德之经》、《厄格肋西亚斯弟个》、《达尼亚尔经》、《圣保罗谕罗马教友书札》、《圣保罗谕各林多教友书札》、《与加拉漆亚札》、《与厄斐尔札》、《圣史玛窦万日略》、《圣史马尔谷万日略》、《圣若望圣经》、《诸徒行实经》、《与斐理伯城人札》、《与格落梭城人札》、《与得撒落尼加札》、《与弟莫德阿书》、《与弟多书》等等。○已故宋君荣所译法文《书经》(*Chou King*)在巴黎出版。○由暹罗大城府迁往越南 Hondat 的修院再次迁往法属印度本地治里。○四川省有教徒一万二千人。

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

鲍友管卒于北京,上赐银二百两。高慎思奉旨补授钦天监监正。○在内廷供职的魏继晋神父编写《圣咏续解》出版,此书实为圣母小日课中之圣咏诠释。另外他还著有《圣若望泉玻穆传》。

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

梅神父在贵州婺川与许多教徒被官府同时逮捕,梅神父受刑几乎丧生。释放以后继续传教,直到1788年因病回国。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

罗马教宗克莱门十四世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两西西里王国的压力之下，被迫于7月21日颁布敕谕，宣布取缔耶稣会。○是年，全国司铎八十三位，其中外籍四十九位，中国籍三十四位。○同年，朝廷诏开四库全书馆，其中收录天主教士所著科学书为《乾坤体义》、《圜容较义》、《天问略》、《新法算书》、《表度说》、《简平仪说》、《天步真原》、《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奇器图说》、《坤舆图说》、《职方外纪》等，有关宗教的书则仅存目，列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计有《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辨学遗牍》、《交友论》、《七克》、《西学凡》(附《大唐景寺碑》)、《灵言蠡勺》、《寰有诠》、《空际格致》。

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

1月23日，四川著名中国籍神父李安德去世，享年八十二岁，一说八十三岁。博主教在闻其死讯后云：“李氏有传道书多种，人品高洁，无瑕可指，其传教热心，至死不懈。”李安德神父能用明晰而且正确的拉丁文书写日记，他留下了一部重要的“李安德日记”，所记之事起自1746年6月15日(乾隆十一年五月初八日)，迄于1759年5月30日(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在历时十四年的日记中，有他个人的生活，传教工作的历程，向外方传教会驻澳门办事处的报告，各教徒集中地的圣事统计，上传信部书及致中国神父与外国通信人上书札的部分底稿，四川主教穆天尺(Mullener)主教的传记。日记记叙了历次“教难”的经过及原因，官府捉拿信徒及教士的布告，教士教徒下狱和受刑的情形。日记亦可使读者了解四川教会的若干规礼，如元旦及除夕所诵经文，豁免婚姻阻碍的申请书格式，主教及教徒出殡仪式，传教员的任用及管理等等。据载，当时四川全省有教徒八千人，杂处于教外人中，地区广大，最远者须步行三日才能到达，全赖两位中国神父维持。在某一时期，李安德为四川全省惟一幸存的神父，有十年时间，他在精神上是全省教区的首长，他曾以一个中国人治理一个教区，生活在孤苦无依、一贫如洗的环境之

中。李安德在日记中还记载了外籍教士对中国籍神职的歧视：在澳门时，多罗曾措词严厉地说：“中国人傲慢，反复无常、忘恩负义，因此不能领受司铎品职。”在广州时，外方传教会办事处郭纳(Conain)神父亦说：“李安德所要写的一切，我毫不置信。中国神父与欧洲神父绝不相同，他们若没一严格规定，即不知何所适从。”“只有西洋人谦逊、有恒、感恩、服从、正直、人格完美。”这些言辞使李安德终身难忘。○是年，钦天监监正刘松龄卒，上赐葬银二百两。傅作霖代理监正职。

1775年(乾隆四十年)

南京主教、兼理北京教务的南怀仁责成公布有关教宗克莱门十四世解散耶稣会的通谕。是时在京耶稣会士十七位、江南三位、湖广六位、广州一位，中国籍会士共十一位。○是年南堂失火，全部焚毁，康熙御赐匾额亦毁，乾隆帝赐币银一万两重建，又亲题匾额对联。○宁安国授钦天监监副。○耶稣会士钱德明在北京撰《中国古史实证》，认为中国纪年体古史较其他各国历史更为信实。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南怀仁主教为一位叫姚若翰的中国司铎祝圣。姚氏为安徽徽州人，1763年入耶稣会，在北京习道以后派往南怀仁主教处。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

是年秋，在四川传教的西籍教士冯若望(Joannes Desiderius De Saint-Martin)派教友张万效(孝)到广州取钱，同时嘱他带领教士一同来川。张万效抵广州后，带白银三百两，又经西洋人斯德纳宗介绍，会见了冯若望早已认识的法国教士都费斯。都氏改名李多林，5月7日，随张氏来到四川成都。李多林后又改名徐德新(Joannes Gabriel Taurinus Dufresse)，时年二十七岁，年富力强，往来于新都、安县、锦州、剑州、广元等处传教。李多林之辖区共十三县，一部分属川北道，为成都至西安必经之路。若干县距

成都近,若干县则较远,如锦州、广元,最远的县须十一日方可抵达。○孙本笃晋铎,奉命管理贵州教务。

李多林,法国人,1750年生,1774年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修道院,1775年12月4日离开巴黎,次年登舟东来,1776年9月至澳门。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

南怀仁主教移居崇明岛,巡视教务,他试图与日本传教区取得联系。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

湖北谷城磨盘山教徒被逐,有的被罚往边疆服劳役。○2月,葡萄牙政府建议教廷任命安德义为北京教区主教,教廷将有关任命书寄里斯本,以便葡王副署。○教士刘加略(Thomas Hamel)、艾若望(又名娄德胜, P. Gleye)及梅茂益神父在云南龙溪建立修院,四年后迁四川宜宾落壤沟。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

法国教士刘加略神父在靠近四川边界的云南龙溪建立一个修院,是培养修生出国留学的预备学校。○葡萄牙政府将澳门圣若瑟堂及修院交法籍遣使会士管理。○高慎思补授钦天监监正。○南怀仁主教移居南京。○是年,艾启蒙年逾七十,乾隆帝赐御书“海国耆龄”匾额一方,送至馆舍悬挂。此外帝又赐佳绸六匹,朝服一袭,玛瑙一串。御赐贺礼,以八人肩行,前导十字架,乐队二十四人随之,满官四人骑马同行,遍游全城,观者如堵。10月6日,艾氏去世,上赐葬银二百两。8月8日,韩国英去世。○4月20日,安德义在没有接到教宗敕谕的情况之下,自圣为主教,北京二十六名教士中,有十二名不服从他的管理。○自利玛窦来华至是年在中国耶稣会士共四百七十二人,其中八十一人为中国籍,四十八人为司铎,三十三人系辅理修士。

韩国英主要遗著有:(1)《中国古代史探讨》;(2)《大学》、《中庸》译文;(3)《野蚕概述和培植方法》;(4)《中国香椿筒

介》；(5)《木棉和草棉的区别》；(6)《竹子的种植和用途》；(7)《中国温室简介》；(8)《中国某些植物、灌木等简介》(荷花、玉兰、秋海棠、茉莉花、牡丹、橡树、栗树)；(9)《关于皇帝农耕祈年仪式》；(10)《略论中国园林》，1774年著；(11)《关于麝香和麝的简介》；(12)《介绍蘑菇蕈、灵芝、白菜》，该手稿寄往圣彼得堡科学院，韩是该院通讯院士，该院译成拉丁文，于1774年出版；(13)《有关米酒、烧酒、醋和醋的制作法》；(14)《关于作为药物的鹿血》；(15—23)《关于中国的芍药、皂荚(皂角)、蜜蜂、蜂蜜和蜜蜡脱法、关于玉石、关于燕子、关于鹿、关于“知了”(蝉)》；(24)《关于中国陶器》；(25)《关于中国工部；即中央六部之一》；(26)《试论中国园林及历代王朝对园林的扩建和布局》；(27)《哈密王国概述》；(28)《中国实用工艺、铁器及瓷器和石面上着色技术》；(29)《关于丹砂》；(30)《关于珊瑚》。

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

索德超奉旨补钦天监监副。○葡籍遣使会士至果阿接管耶稣会传教事。○安德义患病去世。○巴黎外方传教会迁往本地治里的修院关闭。

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

《四库全书》编成，内收西洋教士所编科技书籍如《天问略》、《表度说》、《坤輿图说》等十数种。○法国为维护法国传教区利益，建议教廷辟奉天为主教区，与北京主教区分开，法国务大臣贝尔坦(Henri Bertin)建议钱德明为奉天主教候选人，但为教廷婉拒。○是年，教廷委任方济各会士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a)为北京教区主教。○四川龙溪的修院迁往落壤沟，地在宜宾县，距龙溪七十里，叙府二百里，院舍乃一教徒家庭奉献，学生有二十名左右。○二月十二日，据署直隶总督郑大进和前署直隶总督英廉奏称，宝坻县知县王锡璵查获该县老家庄民人李天一、张仕隲、张其让、张其汉、张其端、田琦、张万宝、王廷秀等人奉天主教，“各在本家持斋念经”，“又私盖天主堂，聚众念经”，还派人



钱德明像

“赴京向天主堂西洋人崔姓讨取瞻礼单，并添买天主图像及经卷、乐器，悬设堂内”。官府将李天一发配边地充军，“虽年已七旬，不准收赎”。张仕陇等其余数人，“杖一百，枷号一月，满日，各责杖四十板”。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

罗马教廷根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请求，批准由法国遣使会接管法国旧耶稣会士在北京开创的传教事业。路易十六和巴黎国会通过传信部有关决议。派往中国第一批遣使会士有罗广祥(Nicolas - Joseph Raux)、吉德明(Jean - Joseph Ghislain)和巴茂正(Charles - Joseph Paris)三人。○朝鲜李旭东、李承薰父子出使北京，李承薰在北京北堂学习天主教道理，并在那里接受汤士选主教洗礼，取圣名伯多禄，是为高丽天主教事业的开始。○孙本笃神父至贵州，又至四川长寿县、万县和陕西传教。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

甘肃巡抚福康安捕获许多甘肃省教徒，其中有刘多明、刘必约之嗣子刘臣和侄子刘刚、张继勋、徐健、李文辉。又在甘、凉二府地区继续查出杨生荣、韩守元等七十二名教徒。其中有数人在澳门习教，又在渭南与方纪谷主教取得联络，此次一同被捕。○葡萄牙遣使会改澳门耶稣会若瑟院为本会修院，授拉丁文、中文、哲学、神学、数学，葡国王后出资修葺院舍，赡养全院师生，称为王家书院。○南怀仁主教制定了《昭示堂规》共十八条，以规范教徒生活。南主教还在苏州城中一教友家中为四位中国修士举行祝圣铎品，此四人为李若翰、谢弥格、弓伯禄，另一位佚名。○李承薰返回高丽，携带了一批宗教书籍，包括七件圣事、教礼问答、圣经注释、圣人传记和祈祷手册。第一年便有四千多人接受他的洗礼。○澳门主教秉承传信部的意旨，派遣传教士进入内地。先由两名湖广人、一名福建人蔡伯多禄，到广州西教士居留地哆罗夷馆去，延请赛撒利(P. Sessari)等四名西洋人同往湖广，又邀了乐昌县人谢伯多禄、高要人谢茂禄一同出发。他

们几个人从广州沿着各地传教点潜入内地,每到一地,即由教徒接送到另一传教点,历经湖南湘潭、湖北樊城,然而在襄阳被官府兵丁拿获。兵士在呢吗、方济各身上搜出书信一封“系广东罗马当家(会长)所发往陕西传教,令蔡伯多禄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高宗实录》)。湖广总督特成额立即奏报朝廷,乾隆帝大怒,降旨申斥广东巡抚孙士毅关防不严:“西洋人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伊等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员弁何以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外洋由广州偷入者,恐不止赛撒利等四人。”经稽查,广东、福建、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山东、山西、直隶、甘肃数百教士、教徒被捕。首先在广东,隐藏在一客栈的意大利人陶若瑟(P. della Tone)以及七十二岁的中国籍艾神父被捕,次年死于狱中。其次,湖广石若翰神父,传教四十五年,解赴北京时,死于途中;另一中国籍刘菲理神父,也被解京入狱。再次,陕西巡抚毕沅根据湖北襄阳刘七的供状,在西安逮捕教友焦振纲、焦贵明父子,他们又供出陕西渭南县是西北传教中心。本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曰:“……近闻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肃)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毕沅奉旨严拿,除呢吗、方济各外,在渭南查获外国传教士王亚各比、马诺等多名,此外还抓到教徒徐宗富、杜兴智、刘西满、薛成林、曾贵、王天德、刘三等数十人。○孙本笃与罗宋氏在达州同时被捕,孙戴枷三月,卒于狱中。

1785年(乾隆五十年)

2月8日,四川副主教冯若望在天全州大川地方被捕。李多林神父听说后,从川北回到崇宁县,于2月24日在新锦州被捕。两天以后,二人被解送成都;3月22日,又解送北京。途中走了三十八天,直到4月28日才到北京。当时监狱里的外国神父多达十八位。自四川已经先来的有吴斯德和彭若瑟,吴、彭二铎均因严刑拷打,死在狱中。除此以外,还有七名中国神父。冯若望、李多林初到北京时,宫中西教士曾设法相救,但无法入手。三

个月以后，他们用一百三十两银子，买通狱卒，请他们善待教士。不久乾隆降旨，西洋教士永远监禁，中国教士永远充军。但到11月9日，乾隆帝忽然谕令释放全部西洋教士，宣布将他们驱逐出境。12月11日，西洋教士出离北京，由官吏二人兵卒十八人押送至广州，次年2月抵达。他们中大部分人搭乘西班牙船到马尼拉去了。○西安人刘必约，接引意大利两位神父汉色勒木和阿兴大多到直隶涿州传教，就在那里被捕。原住京师天主堂的葡萄牙籍梅神父在藁城县被捕，顺天府各地亦有教士教民被捕。○4月，法国三名遣使会士罗广祥、吉德明、巴茂正抵达北京。5月8日，遣使会与耶稣会在北京举行了交接仪式，出席交接仪式的有北京教区主教、法国旧耶稣会士与遣使会士。○11月9日，上谕释放在押之方济各会上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并委任他为钦天监监副，兼管国子监算学馆。○是年，山东巡抚明兴查拿教士、教友，密派兵士赴历城县东谷家坟庄，抓获教徒李松（圣名禄爵），在其家中搜出《天主实义》等教理书三十六本，还有瞻礼单、苦像等物。除此以外，还搜出《圣教四规》等项书版四十七块，这是为印书用刻制的木板。○是年，江南各堂口约有教徒三万人。但只有南怀仁主教一人和一位葡籍教士安玛尔（P. Martin Correa），安年龄比南怀仁更大。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

晁俊秀司铎奉帝命而作圆明园铜版图二十幅。铸工皆华人，为郎世宁门生。原图不可考，今巴黎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皆有藏本。○四川、南京、贵州教务略有发展，成人领洗共有四百六十九人。○圣诞节前夕，李多林自马尼拉返回澳门，拟自福建再回四川，未能成功。

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

遣使会士巴保黎供职内廷，制造钟表。○5月22日，南怀仁主教病逝于上海附近浦东汤家巷。遗体安葬于苏州白鹤山教徒公墓。○设在云南龙溪的修院迁到四川叙州县的落壤沟。

南怀仁主教遗著有：(1)《圣母领报会规程》，经教宗庇护六世(1775~1799)于1778年批准，由南京主教颁行。以后多次再版。(2)《昭事堂规》，在教堂内奉行敬拜天主的各种礼规，及教友遵行各种准则，以及1784年2月25日颁布的若干训令。(3)《圣母圣衣会恩谕》，由圣衣会士那永福、字修德编著，内容有关圣衣会缘起、历史及会规。

南怀仁在禁教的情况下维持江南地区的教务，风餐露宿，艰辛备尝。

1756年他致信 d'Oliveira 司铎信说：

“切望能分担我的神父们的工作艰苦，如蒙天主不弃，尤愿参与他们致命之荣。我还得帮助我的羊群，正在遭受折磨的羊群，并准备为他们献出我的生命。我即将跨入湖广，接近江南边境了，无奈条条通道关卡密布，无从穿越。三年之久，我只能东躲西藏，经常变换隐蔽之所，以避免那些仇教者的告密。虽身为主教而无法进入我的教区；虽身为牧羊人，而无法照顾我的羊群。我经常流窜在接近江南的边境，只能遥遥地抚慰和支持我的教区。我已决定去河南一行，这也是我份内应照顾的一个省，那里只有一千五百名教友。”

以后他再致信 d'Oliveira 说：

“我正处在一筹莫展的处境里。我的教友们被日夜追捕的恐怖困扰着，他们切望我能去救助他们，而我自己却陷于极度穷困之中，更清楚地说，我惟靠哀矜度日。我外无救济，内无积蓄，个人生活毫无着落；真是内外交困，进退两难，我好比是在铁墩上受到锤打着的一块烧红了的铁。向谁呼吁？向谁投奔？到哪里去叩门呢？”

1771年南怀仁致总会长 P. Laurent Ricci：

“既然，五年以来，我生活毫无接济，而葡王在他保教权范围之内，又不准有一个耶稣会会士的存在，连惟一支持我的果阿总主教也把我抛弃了；对我来说，辞职让贤可能是上策，我切望父台许我到德国的公学里去度过余生吧！……总之，惟尊命是从，但愿父台始终承认我是耶稣会的成员之一，您治下的

一个孩子!”(未发表的信,存耶稣会总院档案处)在他致 d' Oliveira 神父的另一封信上说:“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我四十五年来,即使为了神工服务,我从未接受过教友们的馈赠;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体验到天主上智慈母般的关怀,常在巧妙地照顾着我。”

1776年7月31日晁俊秀神父写道:

“年逾古稀的南怀仁主教虽处于贫困和衰老的困境中,仍在不停地奔波在比整个意大利更大的一个辽阔的传教区里;一副乡巴佬的模样,头顶草笠,身穿粗布衣服,脚踏无跟布鞋,有时躲在小渔船上,有时藏在无棚的赤膊船中,任凭烈日的曝晒,日里夜里更有虫虱的叮咬,时刻面临着被捕的危险;一幅真正传教士的画像。他正希望能有机会舍舟登陆,让他找到一个破草棚,聊以安定地休息几天,休养一下抱病的身体;但又不敢贸然出此,惟恐会给在苦难中的教友再带来更多的麻烦;经过了白日一整天的困苦,夜间还得听神工,行圣事;但是欧洲的那些当权者们还在无情地进行克扣,甚至是他的生活经费!二十多年来历经沧桑,饱受各种患难,但南主教仍然满腔救灵热忱,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的职守,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还在勉挑青壮年的重担。”(一封未发表的信,抄件存徐家汇藏书楼)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937~942页〕

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

被遣送出境的冯若望、李多林两神父,于10月20日,冯化名郭恒开、李化名徐德新,又从澳门起程,越过数省,回到四川。○江南传教事务由遣使会上接管。河南传教事务则由北京法籍教士兼管。○高慎思卒,上赐葬银二百两。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

1月14日,徐德新、郭恒开回到重庆,住教友罗宋氏家。后郭恒开前往成都、徐德新则住重庆,照顾川东教务,管辖巴县、长寿、江北、大足等十二个县,又兼川北广安、顺庆、蓬州、达州等

地。○耶稣会士晁俊秀刻成圆明园铜版图二十幅。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

在山东济南一带传教的郭玛米亚神父去世。郭隐蔽达三十四年之久，时济南有教友二千四百三十五人。○中国籍姚神父(安徽徽州人)来到长江口崇明岛，开辟了一个堂口。两年以后，他又来到海门建立堂口。1796年去世，他是江南最后一个耶稣会上。○贵阳仅有教友十余人。

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

遣使会神父刘方济(克来)来到澳门，不久即潜入江西、湖广、河南各地传教。○葡萄牙籍遣使会士福文高(Domingos Joaquim Ferreira)和李拱宸(José Ribeiro-Nuñez)至澳门，任教于圣若瑟修院。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

四川宗座代牧范益盛主教(又名博主教)去世，冯若望继任代牧，并立即请求徐德新作为辅理主教，多年以后始获批准。有黄神父(Petrus Trenchant)前来作徐德新助手。○四川省有教徒二万五千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索德超升钦天监监正。刘方济各神父至湖北磨盘山传教。○包西欧主顾修女会会祖梅神父逝世。○那不勒斯圣家书院中有二人应英国政府之聘，充马戈尔尼使团(Lord Marcartney)之译员，其中一人为李自标司铎。○10月8日，钱德明在北京去世。他在华居留四十三年。○全国约十五万教徒，较1700年少了一半。

钱德明神父主要著作有：(1)《拉丁诗歌》，1743年10月作。(2)乾隆皇帝《御制盛京赋》，满文和汉文的法译本，1770年巴黎Tilliard刊印。(3)《满语语法》，1788年巴黎Nyon刊行。按法语的一般语法和句法分类编成。(4)《满语词典》三册，

1789~1790年巴黎版。共一万二千条。(5)《满语字汇》，1752年北京刊行。(6)《多种语文字典》，北京刊行，1783年钱氏赠送法国皇家图书馆。共用五种语言(梵、藏、满、蒙、汉)及三种文字(藏、满、汉)编写而成。它在皇宫内编成，由通晓满、藏、汉的文士协助下完成。(7)《满族礼规》，1804年巴黎版。(8)《满族胜利的颂歌》，这是清军在攻陷大小“金川”之后的赞歌。1792年巴黎刊行。(9)《对乾隆皇帝在厄鲁特战役胜利后御制汉文诗篇的注释》，1772年10月译作。(10)《从文献中对中国古代史的考证》，1775年北京刊行。参考文献有司马迁《史记》等以及《书经》、《诗经》及《春秋》。(11)《历代和当代中国各藩属的介绍》，1787年北京出版。(12)《中国历代皇帝纪年表》，1769年北京刊印。(13)《中国历代皇朝简史》，1770年北京刊印。(14)《有关通古斯族(Tourgouths)三十万移民从里海沿岸进入中国石碑的译文》，1771年11月北京出版。(15)《对M. Paw所著〈有关中国和埃及的哲学研究〉一书所作的调查实录》，这些调查反映了当时人口、经济收入、多妻制、宦官、溺婴、政治、天文等情况。(16)《孔子传》，1784年北京出版，此书是钱氏备受称誉的作品，附有孔子家谱以及图画。(17)《孔子生平事迹简介》巴黎版，无日期。(18)《孔子主要弟子略传》，1784年或1785年北京出版，包括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子路。(19)《中国兵法法译本》，1772年巴黎版，Didot刊印。(20)《中国古今音乐篇》，1776年巴黎刊行。(21)《禹碑手稿》。(22)《北京皇历》手稿。(23)《针灸穴位铜人像》，供实习行针之用。(24)《关于中国绘画的解说》。

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

北京主教汤士选应高丽天主教教徒请求，派中国籍神父周文谟(周雅各)到高丽去。

1795年(乾隆六十年)

湖广主教郝彬被捕，卒于狱中。○苏味隆神父被捕，死于广

州狱中。○四川彭县袁若瑟晋升神父。○乾隆帝在位已六十年，禅位于太子永琰，以明年为嘉庆元年。○贵州遵义有两家八十余人信教。○北京一带，十年中增加教徒二千人。○周文谟秘密进入汉城。

1796年(仁宗嘉庆元年)

意大利籍奥斯定会士德天赐(Adeodat de St - Augustin)供奉圆明园，制造钟表。德氏曾被清政府赐为奉宸苑卿(六品顶戴)。○重庆教务发展迅速，本年教徒已从八年前的三十人增至一千二百人，有学校五所：三所男校、两所女校，由教徒出资办理。

1797年(嘉庆二年)

婺川毛田村之罗神父(Potter)来到贵州遵义龙平场，吴国盛受洗。吴氏为遵义人，乾隆三十三年生，原信佛教，读书颇多，性耿介。付洗后取圣名伯多禄，不久，当地教友达一百二十人。贵州贵阳刘文元亦于同年领洗。是年，贵阳有五教徒被捕。

1798年(嘉庆三年)

贵阳五教徒释放。全省计有教徒六百人，但半数仅准备入教而已。

1799年(嘉庆四年)

2月7日，乾隆帝去世。

1800年(嘉庆五年)

罗马教廷委任徐德新为四川冯若望主教的助理主教。当时冯主教已久病在身，徐神父携李姓教徒一人，自渝至蓉，在黄家坎晤见冯主教，两人已十一年不见。经李姓教友医治，半月后冯主教病愈，于7月25日为徐主教祝圣，襄礼者有罗神父(Joannes L. Florens)及中国籍周安德神父。10月21日，徐神父返回重庆。○澳门圣若瑟修院成为遣使会住院，葡女王还命将原耶稣会

的北京东堂转交遣使会。○贵州张大鹏领洗。○全国教徒二十一万五千余。四川省有教徒四万人。

1801年(嘉庆六年)

11月15日冯主教去世,徐德新升任四川宗座代牧,云、贵二省教务由其署理,前往成都就职。行前升任黄神父为辅理主教。○葡籍遣使会士福文高和李拱宸抵京,供奉内廷。在北京的汤士选主教将东堂转交给他们。11月,福文高授钦天监监副。○高丽基督徒从四千增至一万,官府搜捕周文谟。5月,周氏自首被杀。同年,有三百名信徒被杀。

1802年(嘉庆七年)

7月25日,徐德新为黄主教祝圣,罗玛弟及袁在德二华铎襄礼。次日,祝圣唐光仁神父,命其主持川东教务。8月,徐主教返崇庆州黄家坎。当时,徐主教的辖区,共有教徒四万人,两位主教、两位欧洲教士,十六位中国籍神父,地区辽阔,神职人员稀少,教徒中对教理有若干误解,各地教规亦有歧异,徐主教乃准备召开四川教务会议。○是年,北京遣使会士罗广祥去世。

1803年(嘉庆八年)

9月2日、5日、9日,徐主教在四川崇庆州黄家坎举行了有名的“四川教务会议”(Synodus Setchouanensis)。当时徐德新为四川省宗座代牧,署理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教务,以成都为驻地。这广大地区又可分为三区:第一区包括川西、上川南及川北大部分,由驻成都之宗座代牧直接管理;第二区包括川东与川北一部分及贵州全省,属于重庆之若干教士管理;第三区包括川南与云南全省,由驻叙州的一位教士负责。参加此次会议共十四人,只有两位外籍神父,即李多林主教和罗副主教(Fr. J. L. Florens)。根据《1720年至1780年四川省中国圣职人员录》记载,这次参加四川会议的中国神父名单是:朱荣、罗玛弟、童鳌、甘玛窦、李路加、刘安多、唐伯辉、刘若瑟、严西满、马文生、杨本笃、罗廷

凯。会议讨论了四川各地出现的教理和教规问题,最后订立出适合中国情形的教会法典。法典共分十章:(1)七件圣事;(2)洗礼;(3)坚振;(4)圣体;(5)弥撒;(6)告解;(7)终傅;(8)神品;(9)婚配;(10)神职人员对自身灵性生活之省察及牧灵工作之指导。会议结束以后,将拉丁文议案送呈罗马。后译成中文。

1804年(嘉庆九年)

葡籍耶稣会士毕学源(Gaetano Pirès Pereira)、高守谦(Verrissimo Serra)抵达北京东堂。○四川印州刘达陡晋铎。○遣使会士巴茂正去世。教宗庇护七世擢升在北京钦天监供职的毕学源为南京主教。敕谕送到澳门后,葡教士礼士德托广东教徒陈若望递送北京德天赐神父。当年九月陈若望抵京。见到德天赐。○四川有十八名中国籍神父、四名欧洲传教士在从事牧灵工作。

1805年(嘉庆十年)

德天赐因直隶、山东一带教士在教务问题上有纠纷,欲向传信部报告中国教务情况,便将一张传教地图和信件交陈若望,托其带往澳门。陈若望南下路经江西时,被江西巡抚秦承恩部下拿获。秦承恩于2月9日上奏,将德天赐革职。随后清廷将德天赐交刑部审讯,德天赐又供出在京西洋教士仆人都是教徒以及山东的两名教徒。嘉庆于是发现京城和各省均有传教士活动,四月,御史蔡维玉、韩鼎青参劾天主教。嘉庆帝于6月27日颁布上谕,将所有人犯,如陈若望、周炳德、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汪茂德、陈杨氏、简恒、佟恒善等,均发往伊犁,给额鲁特为奴。德天赐解往热河,在额鲁特营房圈禁。两天以后,嘉庆帝又批准大臣们拟订的取缔天主教章程:(一)步兵统领衙门派官两名,率部下五人看守教堂门,两日更配一次,以监视入堂者;(二)西洋人所奉之祈祷日,旗人等不准参加,更不得结交。供职钦天监之西洋人,出人有土官一人同行;(三)四堂附近诸堂,着行拍卖;(四)海淀地方有西洋各堂下处四所,不许旗人出入,西人因公到那里住宿须经许可;(五)西洋人欲寄信本国,须先告知该司员,且交俄

人译成汉文。由欧洲寄北京之信，由两广总督译成汉文，一并交在京本堂官查验，再交西洋人收领；(六)西洋四堂服役之人不得增添，并造册登记；(七)满人旗人奉教加倍治罪，如系军民人等，发配烟瘴地面(《清代禁教时期的天主教》第182页)。○8月13日，嘉庆帝又查出宗室图钦、图敏、魁敏、窝什布等人奉教案件，他们是苏奴的曾孙。图钦圣名弥额尔、图敏圣名辣法厄尔，二人都在北京跟遣使会士南弥德(Louis - Francois Lamiot)学习教理，图敏曾居北堂五六年之久，担任过传教员。他们被拘押到刑部，被再三逼迫出教，但坚决不从。嘉庆大怒，下谕：“图钦、图敏俱系苏奴曾孙，雍正间，苏奴因犯罪黜革宗室，降为红带子。是该二犯本属罪人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仍敢私习洋教；经该部再三开导，犹复始终执迷不悟，情殊可恶，图钦、图敏着革去红带子，并于玉牒末除名，发往伊犁，枷号六个月，再行充当折磨差使。魁敏、窝什布尔亦坚称不愿出教，甘心受罪，着消除旗档，发往伊犁，枷号三个月，再行充当折磨差使。图钦等四犯，自外生成，情形背叛，俱永远不得释回，并着该将军不时稽查，严加管束，如该犯等或在配逃脱，及有别项滋事等处，即应恭请王命正法。”(《仁宗实录》卷一四六)○李拱宸授钦天监监副。○山西阳曲县教徒李如，接引意大利教士若亚敬回乡传教，雇得教徒麦丙忠船只，又有教徒倪若瑟搭乘，于四月二十七日由佛山出发，至乐昌即被捕。若亚敬押往热河额鲁特营房关押，后改为留禁广东，中国教徒发配极边。○是年，四川王作经、王世贵叛乱，五月初，上谕成都将军严拿，并查禁天主教，将“其私自刊刻之书籍、板片等，一并查出销毁。如有教师在彼煽惑，一经访获，即按律惩治。”

德天赐(Adeodat)托教友陈若望递送西字书信及地图一事，为嘉庆间一大教案，牵涉甚广。据方豪所录本案原始文件如下：

刑部谨奉为审明定拟奏闻，仰祈圣鉴事。据江西巡抚奏承恩查复事：“广东民人陈若望，搜有西洋字及汉字各书信，并山东登州等处地理图一张。经军机大臣讯明，地理图系天主堂

西洋人六品顶戴德天赐托寄；请将德天赐革去顶戴，交刑部审拟，具奏等因。”奉旨：“依议，钦此！”当将德天赐押送刑部。臣等查天主教曾于乾隆四十九（1784）、五十（1785）等年节次严查惩办，钦奉旨谕：“西洋人传教惑众，最为人风俗之害。除已获解京之巴地哩呔等，定案时，另降谕旨该处夷人外，现在各省号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利其财物资助，申明后，应拟发伊犁厄鲁特为奴；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为惩儆。至内地人民，因祖父相传，持戒奉教，自当勒令悔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火。照例办理。钦此。”圣谕煌煌，自宜共知感畏，何以迄今仍有各处传教之事？虽此时传惑已众，势不能追名究办，亦应将听从西洋传教，如号称神甫等项，严行究惩，俾愚民各知例禁，醒悟改悔，以维风化而正人心。

当向德天赐讯问，据德天赐一味回护，狡饰支吾，不但不肯供吐神甫项等民人姓名，即被惑习教之人，亦供年久人多，均不能知其住址、名字。复将德天赐跟役翟喜、萧斌、吴永太、黄德等，查传到案，设法推鞠，并与德天赐质对。德天赐见势不能隐瞒，姑据供认：天主共有南、北、东、西四堂，德天赐在西堂办事。四堂共有先生八人，内姜姓已故；顾姓、赵姓、何姓，现在分赴外省传教；卢姓、尤姓，刘姓，并镶黄旗汉军马甲周炳德，现在各堂诵经讲道，管理一切传教事宜。又于七年（1802）间，将海甸杨家井地方旧有西洋人寓所，改为圣母堂，分男女两堂，会长六人，已故张廷贤在外之杨姓，并现获刘朝栋、赵廷珍、朱长太，内务府正白旗闲散，现在畅春园看门之汪德茂；女堂会长民妇陈杨氏，名□讲经传教，每月男女来堂念经，煽惑甚众。并究出西堂习教之代认汉字先生、山东惠民县人王世宁、直隶景州人吴西满、山西平遥县人张明禄、山东临清州人简恒、直隶威县人伊思敬、正蓝旗汉军马甲佟恒善、佟明、养育兵佟四、正黄旗汉军马甲蔡勇通等，分别查传行提出去后。旋……先后将先生周炳德等及江西拿上之寄信人陈若望，至顾姓、何姓、杨姓、刘姓、赵姓、卢姓、尤姓，亦均躲避未到。臣

等就现犯逐加审讯；周炳德等认在堂讲经传教惑众属实；并供出近年编造汉字西洋经卷三十一种，流传各处，冀图易于煽惑；入教人甚众，板片现在天主堂存贮。至简恒于去年到堂，替德天赐到威县请人传教；民人费二系在直隶景州习教；李珩系在直隶丰润县传教各等情。

臣等谕以正义，勒令出教；詎各该犯奉教甚坚，受法甘心，不愿出教。旗人佟恒善虽非先生、会长，而蛊惑尤甚，并有‘虽奉谕旨，亦不敢悖违天主’之语，实堪切齿。其被惑习教之旗人佟明等，及在西堂识认汉字之先生民人王世宁等，一经开导，俱俯首叩头。据称：“天主教实不知是所禁之事，今蒙晓谕，情愿出教”，并踩踏十字架，自称悔悟，尚属出于畏法真心。

臣等复向德天赐究讯，欲将山东登州地理图寄回西洋，是何意见？据供：“此图原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因传教犯事，业经治罪之梅神甫所遗，内自山东登州至直隶广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隶景州，俱系西洋传教地方；近来各堂要争往传教，想将此图寄往西洋，求教主传谕各堂不许争竞，并无别意。这陈若望系去年到京，各堂托他寄带书信，送至澳门，不想被江西查获。各书信内，除所寄地理图，是求教主传谕，其余别信，均系音问故套，并无违碍”等语。检查各信与各供无异；质之陈若望，所供情节，亦均与德天赐所供吐相符，反复推求，毫无遁饰。查此案德天赐本系西洋人，天主教系西洋各国遵奉，断无因德天赐来京当差，不准奉教之理；但与内地人民，理宜共遵法度。至各旗世仆，尤应各知根本，不得被惑妄行。除现在逃脱之先生顾姓，严拿催解法办外；其现已到案之寄信人陈若望、在堂讲道之旗人周炳德、会长民人刘朝栋等，往来寄信，或展转传惑，均应照传教人发往伊犁厄鲁特为奴。该犯于乾隆四十九、五十等年严行惩办之后，尚敢怙恶不悛，更属知法犯法；且经再三开导，坚不出教，尤为可恶。应将各犯先行重枷号三月，分发各门示众，共知晓谕，即日咨送兵部。佟恒善等均各销除旗档。德天赐跟役翟喜、萧斌、黄德、吴永太及民张明禄等五名，讯止入教，应照违制律杖一百，并先行枷号，交城看守。

俟该犯等于何日情愿出教，即于何日报明释枷，照拟发落。西堂代认汉字之民人王世宁，一经晓谕，即愿出教，应请即行省释，毋庸置议，以为执迷不悟者劝。

德天赐或即回堂，或应遣回本国，应俟圣裁。西洋阎诗模者等，讯不知寄图情事，应请飭交内务府，仍令回堂当差。所刻汉字西洋经卷，开单进呈，请交内务府管理堂务大臣，查起板片与已刻各书，一体销毁。并由工部行文各值省督抚军提、镇及在京提督衙门、都察院、五城顺天府，一体严密搜查，如有前项经卷，即行销毁，毋任流传。并再出示晓谕军、民、旗人，务宜痛改悛悔，各保身家，毋得仍蹈覆辙，至干重罪。所有失查习天主教之各该管各司，交部分别查议。

此案发生于嘉庆十年，距雍正初年禁教，已将近一世纪，乃在京城皇帝耳目密布之地，教会竟仍如此兴盛，陈援庵先生《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文中，称之为“禁者自禁，传者自传，并未停止”，亦可谓为奇事。递送地图与西文书信事，经德天赐、陈若望等解释后，朝廷已无甚怀疑，朝廷所最痛恨者，乃旗人中竟亦有不少人入教，甚至连畅春园看门人亦有信教者，可谓违反祖宗家法，因此乃又产生另一严厉谕旨。

《仁宗圣训》卷九九载嘉庆十年四月三十日（5月28日）上谕御史蔡维钰奏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一折云：

西洋人信奉天主教，在该国习俗相沿，原所不禁；即京师设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参用西法，凡该国情愿来京学艺者，均得在堂栖止，原不准与内地民人往来滋事。乃德天赐胆敢私行传播，讯明习教各犯，不惟愚民妇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复信教，并用汉字编造西洋经卷至三十一一种之多。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辟异说而杜歧趋？且该国原系书写西洋字，内地民人无从传习；今查出所造经卷，俱系刊刻汉字，其居心实不可问。此在内地愚民已不得传习，而旗人尤不应出此。关系人心风俗者甚巨。所有寄信人陈若望、在堂讲道之汉军周炳德，会长民人刘朝栋、赵廷珍、朱长泰、汉军汪茂德；或往来寄信，或辗转传惑，着照刑部所拟发往伊犁，给额鲁特为奴，免用重

枷号三个月,以示惩戒。

民妇陈杨氏,以妇女充当会长,尤属不安本分,着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不准折枷收赎。民人简恒曾代为寄信,请人传教;汉军佟恒善,经反复开导,执迷不悟,俱着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伊犁,给额鲁特为奴。周炳德、汪茂德、恒佟善既自背根本,甘心习学洋教,实不齿于人类,均各销除旗档。

至一经晓谕,即情愿出教之民人王世宁、柯添福、尹思敬、吴西满,汉军佟明、佟四、蔡勇通,尚知悔过,应行省释。但恐该犯等,因一时畏罪饰词,未必出于至诚,仍着该管旗籍各官严加管束,如敢再行传习,即加倍治罪。

德天赐以西洋人来京当差,不知安分守法,妄行刊书传教,实为可恶!该部奏请或飭令回堂,或遣回本国,均属未协。着兵部派员解往热河,在额鲁特营房圈禁,仍交庆杰,随时管束,毋许与内地旗民往来交涉,以杜煽惑。

管理西洋事务大臣常福,于德天赐寄信刊书传教等事,未能先时查察,着交内务府议处。其失察旗人习教之历任都统、副都统等,着军机大臣查明,奏请交部分别议处。该堂存贮经卷,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派员检查销毁,毋许存留。其刊刻板片,并着五城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一体查销;并出示晓谕军民人等:嗣后倘再有与西洋人往来习教者,即照违制例,从重惩究,决不宽贷。余着照刑部所议行。

关于德天赐一案,荷兰汉学家葛罗特(J. J. M. de Groot) 1903年出版所著《中国各教派受苦史》(*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书三八七至三九四页,即曾加以研究,并将各上谕节译为英文。据云:德天赐乃意大利籍奥斯定会士,曾在北京居住达二十七年。作者亦曾在《传信年鉴》第四册(*Annales de la Foi IV*)发现1818年1月12日(嘉庆二十二年阴历十二月初六日)传教士勃洛松(Brosson)一函中,述及往马尼拉与德天赐相通,讨论传教士为北京附近一堂区之管辖权,德天赐曾向传信部寄一地图与其他文件,但被查获,并送呈皇帝。又云:德天赐曾被充军四年。

西堂为北京四堂中之较小者，奥斯定会在当时中国各修会中，微不足道；意大利人亦不如荷、西人之占领台湾，葡人之占领澳门，西班牙人之占领菲律宾，受人疑忌；而德天赐之送地图于传信部，亦确为请求划分堂区，与政治无关；引起皇上注意的，乃是禁教一事，虽三令五申，历时近百年，而京师尚有如许坚信之教友，更无论外省偏僻之地了。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221~225页〕

1805年（嘉庆十年）6月20日（五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云：

前因京师西洋堂人有与旗民往来习教，并私刊清汉字书籍传播之事，叠经降旨严行饬禁，并令将各堂所贮书籍检出缴销，当交军机大臣将查出书籍查看，旋据签出各条呈览。朕几余披阅，如《教要序论》内称，其天主是万邦之大君。《圣年广益》内称，所信降生之耶稣系普天下各人物之大君，又称，中国呼异端为左道，未必非默默中为承行主之而有是言。又称，凡在天地大主之下，自君王以至士庶，人人弃邪归正，圣教大行，未有不久安长治者。又称，我教之主，真正是天地人物之主。又称，凭他有道之邦，多系世俗肉身之道。又称，圣人欲乘此机会传教中华。又《婚配训言》内称，外教者如同魔鬼奴才等语。支离狂妄，怪诞不经，不一而足，而其中尤为悖谬者，则称，听父母所命，相反于天之命为大不孝，有圣女巴尔拔拉不肯听从逆命，被顽父亲手杀之，天主教怒至公，即以暴雷击死之，为人父母亲友阻人事者，当以此为鉴等语，蔑伦绝理，直同狂吠。又称，当时有一个贝子，终日行非理之事，福晋极力劝之不从，一日有一群魔鬼拉贝子下地狱，天主以福晋有德行，默启他使知伊夫火海永远苦难，可见不听善劝，决不免天主永罚等语，尤为肆口乱道，贝子、福晋之称，西洋人何从知悉，自系从前与旗人来往谈论，知此称号，妄行编载，事属已往，今亦不加深究。至其所称贝子被魔鬼拉入地狱之语，皆系凭空捏撰，毫无影响，似此造作无稽，充其伎俩，尚有何言不可出诸口，何事不可笔之书，若不及早严行禁止，任令传播，设其编造之语悖谬更

有重于此者，势不得不大加惩办，与其日后酿成巨案，莫若先事豫为之防，前已谕令派出管理西洋堂事务之大臣禄康等公同议立章程，随时稽察，兹特揭出书籍所载各条，指示申谕，嗣后旗民人等务当恪守本朝清语骑射，读圣贤书，遵守经常，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亟应湔除旧染，勿再听信邪言，执迷不悟，背本从邪，自不齿于人类，有负朕谆谆训戒至意矣，将此通谕知之（见《上谕档》嘉庆十年五月二十日，页二四五，奉上谕，转引自庄吉发：《清代前期对天主教从宽容政策到禁教政策的转变》）。

〔《历史与宗教——纪念汤若望四百周年诞辰暨天主教传教史研讨会》，辅仁大学，1922年，第324~325页〕

1806年（嘉庆十一年）

毕学源祝圣为南京主教，但朝廷不准他离开钦天监故仍驻北京。○是年全国有西教士三十一位，中国籍教士八十位。○四川徐德新主教移距黄家坎二十五里处，又迁邛州城五十里。黄辅理主教去世，乃命罗神父为辅理主教。

1807年（嘉庆十二年）

英国新教伦敦会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于5月12日在纽约搭乘美国商船“三叉戟”号，经近四个月的海上航行，于9月8日抵达中国广州。他的到来，标志着基督新教传华的开始。○原巴黎外方传教会所建的由暹罗迁往越南和印度本地治里的修院在马来亚槟榔屿重新开放。

1808年（嘉庆十三年）

福文高补授钦天监监正，兼理算学馆事务。○北京汤士选主教逝世。由葡萄牙遣使会沈东行（Joaquim de Sousa Saravia）继任，但由于清政府不许他进京，他命李拱宸为代理主教管理教区。○罗马教廷正式升四川罗神父为主教。

1809年(嘉庆十四年)

云南约有教徒二千五百人。贵州约有教徒一千五百七十八人。○德天赐在热河配所并无不轨行为,刑满获释回京。

1810年(嘉庆十五年)

全国有外籍教士三十一位,中国籍教士八十位。○6月29日,徐德新在四川黄家坎正式祝圣罗神父为主教。○四川总督常明查禁天主教,只在顺庆府一县即查获七百几十户教徒,在巴县也搜出二百十户。四川渠县共有教徒一千五百人。

1811年(嘉庆十六年)

陕西中国籍司铎张铎德被官府逮捕,供认为北京主教汤士选派往陕西传教。○是年,北京尚有欧洲传教士十一人:福文高、李拱宸、高守谦(Verrissimo Serra)、南弥德(Louis-Francois Lamiot)、毕学源、吉德明、贺清泰(Louis de Poirot)、德天赐以及另三名教友。7月19日,嘉庆皇帝下谕旨重申严禁内地人民信奉天主教,违者判刑充军。旗人信教罪加一等,销去旗档。○北京西堂发生火灾,北京西堂传教士在离开以前,变卖教堂财产,将西堂以六百两银卖给了清政府。○四川籍给事中甘家斌奏请定禁天主教治罪专条,嘉庆帝颁惩治条例,刑部正式列入《大清会典》中。

1811年(嘉庆十六年),四川籍给事中甘家斌具折奏请严定天主教传教治罪专条,原奏经刑部议复,嘉庆帝针对直隶和内地传习天主教,颁降惩治条例,其谕旨曰:

谕刑部议复甘家斌奏请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一折。西洋人素奉天主,其本国之人自行传习,原可置之不问,若诬惑内地民人,甚或私立神甫等项名号,蔓延各省,实属大干法纪,而内地民人安心被诱,递相传授,迷惘不解,岂不荒悖。试思其教,不敬神明,不奉祖先,显畔正道,内地民人听众习受,诡立名号,此与悖逆何异?若不严定科条,大加惩创,何以杜邪术而正人心。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

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其传教蛊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着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着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至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着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着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至粤，附便遣令归国，其在京当差之西洋人，仍当严加约束，禁绝旗民往来，以杜流弊。至直省地方，更无西洋人应当差使，岂可容其潜住，传习邪教，着各该督抚等实力严查，如有在境逗留，立即查拏，分别办理，以净根株。

该谕旨经刑部等衙门奏议，正式写入《大清律例》之中，《钦定大清会典》条文内容如下：

西洋人有在内地传习天主教，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拟绞立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拟绞监候，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旗人消除旗档。如有妄布邪言，关系重大，或持咒蛊惑诱污妇女，并诬取病人目睛等情，仍临时酌量，各从其重者论。至被诱入教之人，如能悔悟，赴官首明出教者，概免治罪，若被获到官始行悔悟者，于遣罪上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倘始终执迷不悟，即照例发遣，并严禁西洋人不许在内地置买产业，其失察西洋人潜住境内并传教惑众之该管文武各官，交部议处（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嘉庆二十三年武英殿刊本卷六一〇，页十四）。

〔庄吉发：《清代前期对天主教从宽容政策到禁教政策的转变》〕

1812年（嘉庆十七年）

白莲教起事，京师震动。湖广发生官府搜捕天主教事件，教民被告里通白莲教。○同年1月，西藏发生驱逐传教士马齐（又



北京东堂

作马齐)事件(《仁宗实录》卷二五一)。○北京东堂的传教士在夜间搬书时,不慎将灯火翻倒在书籍之上,发生火灾,东堂神父福文高、李拱宸上书引咎处分,请朝廷赐银两重建。嘉庆皇帝下令没收东堂房址,又令传教士与南堂合并居住。

1813年(嘉庆十八年)

湖北省查拿天主教,有京山县教徒畏死自首,嘉庆帝批示免罪。○四川乐至县刘翰佐晋铎。

1814年(嘉庆十九年)

教宗庇护七世颁谕,恢复耶稣会。○吴国盛在遵义探视教友时被捕,同时被捕者有三十余名教徒,一齐被解送省城贵阳,刑逼背叛,吴氏宁死不从,又被解回遵义监禁。他在狱中仍给狱囚讲道,九月被绞死,时年四十六岁。同年,贵州都匀人、教徒张大鹏被妻弟告发被捕,在狱中与吴国盛一同向狱囚讲道。○九月,四川宜宾县有人向官府告密,称有泸州纳溪、宜宾落壤沟天主教教友阴谋起事,四川总督常明下令查拿全省天主教徒。教徒四处藏匿,处在落壤沟的小修院也被迫解散,院长罗主教率修生二人逃往云南,以后逃往安南。不久,罗主教在那里去世。○四川赵斯定司铎(朱荣)在邛州被捕,解往成都。次年1月27日被杀。

1815年(嘉庆二十年)

四川官府在全省缉拿天主教徒,被捕教徒无数。徐德新主教逃往邛州、崇庆一带。4月7日他给法籍杨神父(Escodeca)写了一封信,告诉杨,如果他被捕,由杨接任副主教。此信被人发觉。

5月18日，徐主教被新津县知县捕获。知县王恒对徐主教职为优礼，次日解往成都，拘于神庙。四月后，正式开庭，判处死刑。八月二十日，徐主教在成都北校场受刑。尸体由教徒秘密埋葬于凤凰山。○徐德新主教被捕前数日，朱荣（赵奥斯定）、童鳌二神父被处绞刑。张万效以八十高龄被称为“怙恶不悛”，判以“永远枷号示众”。其余在押教徒均被充军边疆，永世不得回乡。

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

四川中国籍袁在德神父被捕。袁氏圣名若瑟，四川彭县人，乾隆六十年晋铎，传教于川东、川北边界地区。和袁神父同日被捕的还有合州城内若干教徒，后均死于戍所。

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

2月15日毕学源在北京正福寺墓地祝圣方济各会士Joachim Salvetti为山西和陕西宗座代牧。○3月5日至18日，罗马教廷传信部开会，讨论前此传信部秘书波尔日亚（Etienne Borgia）提出的提升中国籍神职人员当主教的计划，未获通过。○6月23日，袁在德神父在成都被绞死，年五十一岁。○四川刘翰佐神父被捕。刘氏圣名保禄，四川乐至人，他在嘉庆十八年三十五岁时升司铎，传教于成都以北地区，常扮作行商农人，夜间去访问教徒。他被告发后被捕，押往成都。○全国共有澳门、北京、南京三主教区。山西（方济各会）、四川（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及福建（多明我会）三代牧区。

1818年(嘉庆二十三年)

正月十七日，京中批示到省，刘翰佐神父被押往成都东场绞决，年四十一岁。同年，又有四川綦江教徒邹老楞佐因奉教被捕，不久被处死刑。○官府在湖北磨盘山捕捉教徒。○北京再度刻印教理著作《盛世台堯》。○张多默（Thomas Zhang Pignero）、张绍台（Simon Zhang Pires）、金逸云（Paul Jin da Costa）、沈经伦（Mateus Chen de Sequeira）四位中国籍遣使会士晋铎。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

五年以前在湖南被捕的意大利籍神父蓝月旺(多明我会士),在长沙被绞死。○遣使会士刘克来神父在南阳附近靳冈被俘,解送省城开封,以后又送往湖北武昌,备受刑讯。次年,刘神父在武昌判处绞刑,时年七十二岁。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

9月2日,嘉庆帝驾崩。○北堂教士南弥德被逐(一说1819年),葡国遣使会士高守谦代管北堂,又兼钦天监监正,有中国籍薛玛窦神父暂充北堂上司职,兼管修院。

1821年(宣宗道光元年)

是年,《大清律例》中增补有关查禁天主教条文,大意如下:(一)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者,拟绞立决;(二)入教而不知悔改者,发配新疆给额鲁特为奴;(三)如有散布邪言,或符咒蛊惑诱污妇女并诬取病人目睛等情,仍临时酌量各从其重者论。至被诱人教之人,如能悔悟,赴官府申明出教者,概免治罪;倘执迷不悟,照例发遣并严禁;(四)西洋人不许在内地置买产业;(五)失察西洋人潜往境内并传教惑众之该管文武各官,交部议处。○刘瑞廷神父在川东渠县赵家湾庆祝瞻礼时被人告发,刘神父和教友二三十人被一齐缉拿,后又被解往省城成都。

1822年(道光二年)

法国里昂城保利诺才理谷创立传信会。○时西教士在钦天监工作者有福文高、李拱宸、毕学源三人。同时还有吉德明、高守谦看守北堂和修院。○多明我会士在澳门出版第一份葡文报纸《中国之蜂》(*A Abelha Da China*)。○四川凤凰山有教徒掘出徐德新主教遗体,在其地建堂纪念。

1823年(道光三年)

11月,在渠县狱中被押两年之久的刘瑞廷神父被处以绞

刑。○李拱宸授钦天监监正，兼管算学馆，毕学源授钦天监监副。
○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翻译完毕并出版《圣经》。马礼逊最初于1808年开始翻译，先据天主教士巴设译本翻译“新约”，于1813年译完《新约全书》。在广州秘密雇佣排印工人一共排印两干部。1814年起，马礼逊又着手翻译“旧约”，请伦敦会另一名传教士米怜合作。他们前后花了五年时间，于1819年译毕，在马六甲排版，于本年出版，取名《神天圣书》，共装订成二十一卷线装书正式出版。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介绍到中国，马礼逊为第一人。

1824年(道光四年)

福文高司铎卒于北京，上赐银二百两，为茆葬之费。

1825年(道光五年)

青岛成为监牧区。○罗马教廷批准1803年“四川教务会议”通过的决议，并谕令中国其他各省以及安南、朝鲜教会遵行。

1826年(道光六年)

吉德明卒，时任钦天监监正的高守谦鉴于北京乏人，想回欧洲召募传教士来华辅助传教。他上疏皇帝，托言请批回国奉养老母。道光帝批准他回国，却不准他推荐别人再来。高守谦只得前往澳门。高氏走后，李拱宸当年10月便去世了。北京只剩毕学源主教一个外籍教士，独撑教务。中国籍薛玛窦神父除管理北堂以外，还兼管苦修院。

1827年(道光七年)

道光帝下谕，没收北堂，将房产以五千两银子卖给一姓于的官员，大堂也被拆毁。管理北堂的薛神父躲到南堂去投奔毕学源，后又到塞外西湾子去躲藏，在那里暗中照管着教徒。西湾子，现称崇礼县，地处北京西北长城外高原上，当时属察哈尔盟，地区偏僻，能避官府查拿。这里是北京教区多年经营的地方，教徒很多，是附近各教区的中心站。北京四堂被拆毁以后，这里成

了北京教区的根据地,从北京出逃的神父多在此驻足。○同年,毕学源受命管理北京教区,但他已年老多病。

1828年(道光八年)

从本年直至1847年,北京教区大部分神职人员迁往西湾子,当地一千余名百姓中,有六百七十六名是教徒。

1829年(道光九年)

遣使会又遣华籍张多默、张绍台、金逸云、沈经伦司铎赴法国深造。

1830年(道光十年)

江南不隶会籍司铎黄伯禄(字斐默)生于江苏海门。日后他著有《正教奉褒》等多种汉、拉丁、法文著作,皆在徐家汇出版。

1831年(道光十一年)

高丽传教事务原由北京教区代理,是年,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应高丽教友之请,派遣巴黎外方传教会士抵高丽,成立第一个代牧区,脱离北京教区管辖。当时高丽已有四万名天主教徒。

1832年(道光十二年)

耶稣会在欧洲重新恢复之消息,为北京教区教友获悉。4月25日,北京教友给耶稣会总会长罗当(Roothaan, S. J.)呈上请愿书,该书追述了昔日在华耶稣会士在科学和传教方面的业绩,感叹目前教区司铎的缺乏,呼吁总会长派遣像旧耶稣会士那样的数学家、天文家、工程师、建筑师来中国,“这样的一批神父,才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皇上及周围大臣们所希望的”。○甘肃武威修生张蕴华、山西榆次修生阎玉亭抵那不勒斯圣家书院求学。

1833年(道光十三年)

9月,北京教区教友再度直接上书教宗额我略十六世,据

说此次上书由毕学源主教及宗室伯尔明祥阿亲王发起。请愿书谈到了中国教区存在的危机,陈请“最好还是派遣一批耶稣会神父来到我国,……可以肯定,假如他们带着宗座的使命来北京,全国人民以及高级官员,必将衷心欢迎。不久整个帝国将接受信仰。因为平民与士大夫之间,在皇帝朝廷之中,耶稣会的声誉受到特别尊重”。不久,湖北、湖南、山西、陕西等省教友,均有上书向耶稣会请愿。

1834年(道光十四年)

5月18日,耶稣会罗当总会长给中国教友复信,感谢中国教友对耶稣会士的感恩和怀念,并表达了重返旧日传教区的愿望。○5月,葡萄牙国内禁止修会活动。○贵州贵筑教徒刘文元,圣名伯禄,早年因奉教而发配黑龙江达三十年,释回后,又于本年被捕,四月初在贵筑被绞决。○莫耳(Mohl)在Stuttgard印行雷孝思所译之拉丁文《易经》,五年以后出第二册,书名为《中国最古之书易经》。○北京毕学源主教因担心他死后北京南堂及栅栏墓地无人照管,遂委托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大司祭代管。

1835年(道光十五年)

澳门圣保禄大堂失火。○法国遣使会神父董文学(Jean-Gabriel Perboyre)抵达中国澳门,不久潜入湖北传教。○法国遣使会士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由澳门北上,抵北京,未能进城,后去了内蒙古西湾子教区传教。1840年成为内蒙古的第一位天主教主教。

董文学,1802年1月6日生于法国Montgesty的Puech,圣名若望嘉卑厄尔。1818年12月入遣使会,1821年至巴黎读神学,1823年9月至Montdidier学院任教,1826年9月晋铎,后至Saint-Flour大修院任教。1831年5月,其弟病逝于赴中国途中,董文学立志来华。1835年2月获准来华,3月从法国勒阿富尔港起航,8月29日抵澳门。



澳门圣保禄大教堂立面(上图,即大三巴)
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下图,作者摄于2000年6月)



1836年(道光十六年)

车公庄明清传教士墓地

董文学神父由湖北到河南南阳的靳冈传教，在那里住了一年半。○高丽教会派金大健、崔良举、崔方济到澳门学道。

1837年(道光十七年)

江南传教士听了一万二千余次告解，送了一千余次终傅。○毕学源因病辞去钦天监监正职，委托了一位在京城俄国东正教魏教士收存其地契文约。

1838年(道光十八年)

11月2日，毕学源主教在京去世。中国籍遣使会士韩若瑟将主教遗体、南堂和栅栏墓地转交俄国东正教传教团。不久，道光帝下谕，将南堂归魏教士。直到咸丰七年中法续订条约，规定归还天主堂，魏教士的继承人才将毕主教所托文契归还天主教会。葡籍遣使会士赵神父(Joao Franca Castro de Moura)任北京署理主教。○由传信部派遣，从澳门潜入湖广的意大利圣家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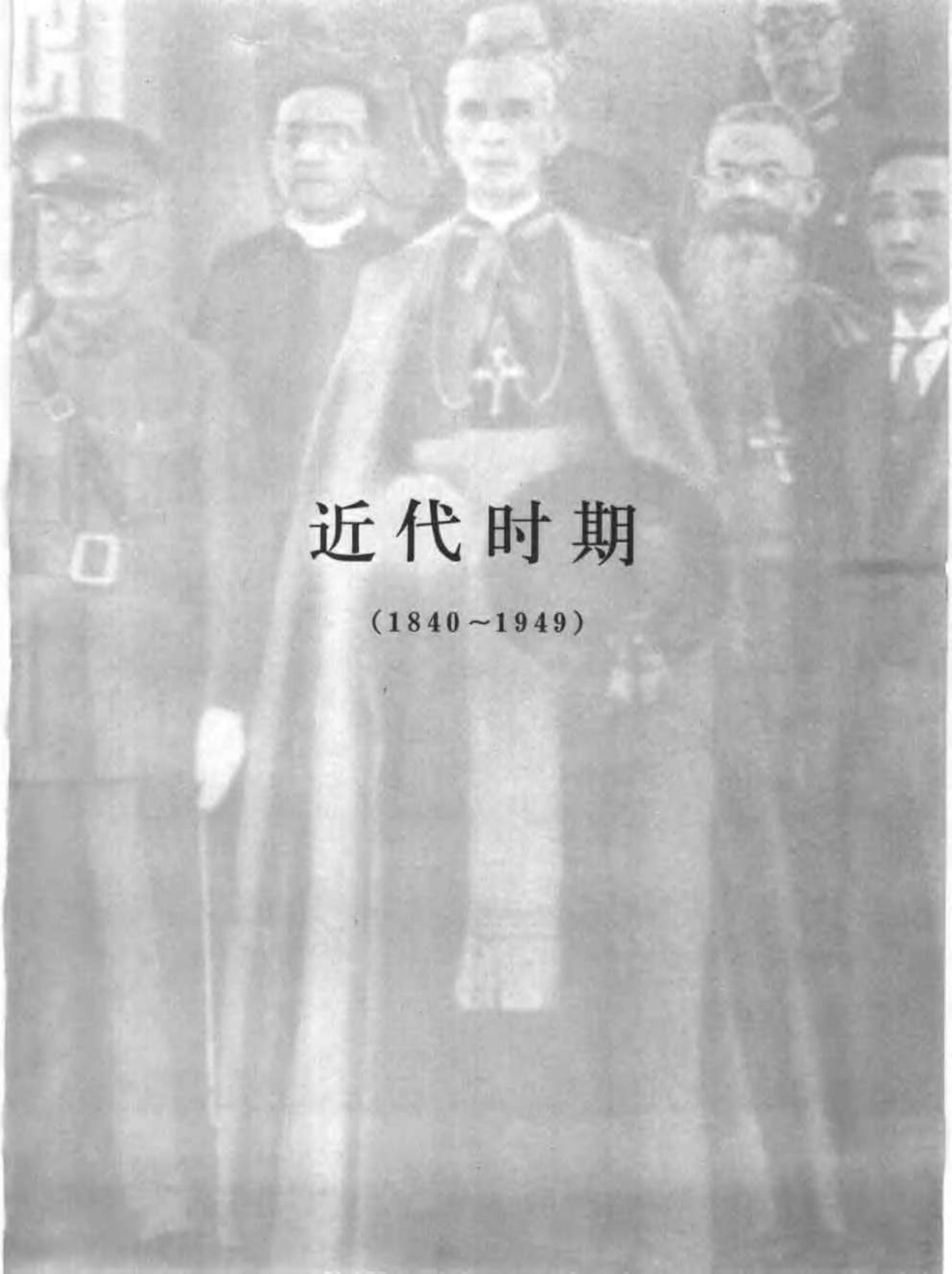
1838年(道光十八年)

351

传教士罗伯济(Louis de Bèsi)来到江南,取代南京代权的法国遣使会士盛若翰。○董文学至湖北谷山茶园沟传道。

1839年(道光十九年)

江西教徒上书教宗,请派耶稣会士来华。○贵州教徒郝开枝,圣名若亚敬,被官府逮捕,令其背教,不从,被杀,时年五十七岁。○是年,汉中官府逼迫三百教徒集体背教,仅一人例外。西安有不少教徒被流放至蒙古。○9月16日,遣使会士董文学在湖北被捕,先押往襄阳,后解送武昌。



近代时期

(1840~1949)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中英爆发鸦片战争。○1月10日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委任罗伯济(Louise de Bési)为山东代牧,兼管江南教务,其所辖之区域有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法遣使会士孟振生被任为蒙古代牧。○满洲宗座代牧以马内·维罗勒(Emanuel Verrolles)向教廷建议,在中国建立圣统制,将全国教务分由北京、四川、安南东京三总主教区管理,传信部对此曾加以研究。7月15日,法遣使会士董文学在武昌被判死刑。9月10日被杀害。○李杓(问渔)生。马良(相伯)生。

罗伯济又称为罗类思,意大利圣家书院传教士,1834年即抵澳门。当时有一名杜保禄的中国教徒,常年到澳门,领取传教士的经费。他听说罗伯济新从罗马来澳门,误认他为耶稣会士。回到江南后,遍告教友。江南教友乃由王若望、张西满两位华铎领衔,呈请当时北京主教毕学源派罗伯济为江南副牧,代理教务。毕学源表示同意。此为1838年10月之事。1838年至1839年冬春,罗伯济由湖广来到江南。1840年1月,教宗即委任他为山东代牧,兼管江南教务。罗伯济来江南后,藏匿在浦东金家巷,与他合作的有两个法国遣使会士、四名中国神父、五名葡萄牙遣使会士及另外数名中国神父。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70~271页;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11页]

1840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六),马相伯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父松岩,母姓沈,原籍江苏丹阳马家村,其家族世奉天主教。据传远祖为元初江西乐平人、《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当时马松岩已弃文从商,兼为中医。生有四男一女,长男早卒,次为女,故马相伯行四,却为次子。

马相伯,名良,以字行。曾名为德,字斯臧;又曾用名乾、钦善、建常,改为良,字相伯,或作湘伯,芑伯。曾笔名求在我者。晚年自号华封老人。出生满月,即付洗为天主教徒,教名若瑟,故又号若石。

1844年入塾,但对“经学”没有兴趣。1851年,独自由镇



马相伯像,此图为张充仁所绘

江前往上海,入法国耶稣会办的徐汇公学,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很感兴趣,深得校长、意籍教士晁德蒞器重。以后几年中,习国文、法文和拉丁文。1862年5月29日入耶稣会,同年进入新成立的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开始研究中国文学、拉丁文学和神哲学。

[朱维铮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5-1348页]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耶稣会总会长罗当(Roothaan)在传信部的要求之下,派遣耶稣会上南格禄(Claudius Gotteland)、艾方济(Franciscus Estève)、李秀芳(Benjaminus Brueyre)来华,协助罗伯济的工作。4月28日,这三位耶稣会士从法国乘“埃里戈纳号”前往中国,9月23日抵马尼拉,10月21日抵澳门。○法国遣使会古柏察神父(Regis-Evariste Huc)于2月20日离开澳门,6月17日到达当时直隶省赤峰附近的西湾子法国传教区。(1844年8月3日,古柏察在其长上秦噶啞神父(Joseph Gabet, 1808~1853)陪同之下开始横穿中国的旅行。他们历经热河、蒙古、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等地,于1846年1月29日抵达西藏首府拉萨。居住了两个月以后,被当时清驻藏大臣琦善奉清廷之令驱逐,解往四川。1846年6月抵打箭炉,然后经四川、湖北、江西,于1846年9月末达广州,同年10月中旬回到澳门。古柏察神父于1847年至1849年在澳门写了著名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于1851年首次以法文在巴黎出版。古柏察还写了一部《中国·鞑靼和西藏的基督教》于1857年首次在巴黎以法文出版。)○4月22日,教廷命令“香港岛及其周围六里”地方脱离澳门教区,成为宗座监牧区,由瑞士籍教区司铎、传信部驻澳门代表若瑟神父(Fr. Theodore Joset)为首任宗座监牧。主要照顾驻港英军(大部分为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宗教需要。○葡王想任命北京署理主教赵神父为正权主教,但教廷只同意任命他为代牧。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与英国订立《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南格禄、李秀芳、艾方济于7月11日搭乘英国帆船“安娜号”抵达上海。当时江南有教徒四万八千人。○西班牙籍圣方济会纳路华神父(Fr. Michael Navarro)抵港。○若瑟神父去世。12月11日,意大利籍方济各会费神父(Fr. Anthony Feliciani)被委任宗座监牧。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法国创立圣婴会,专门救护教外婴孩。○江南教区在张朴桥已有修生二十二名,其中十七名属江南教区,五名属山东教区。○香港天主教会开办第一所男童学校。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7月3日,清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耆英与美国外交使团团团长顾盛签订中美《望厦条约》。○8月13日,法国外交使团由拉萼尼(Theodore de Lagrene)抵达澳门。与拉萼尼同行抵华的还有六名耶稣会士,即葛必达(Stanislas Clavelin)、鄂尔璧(Joseph Gonnet)、笄良仁(Louis Taffin)、郎怀仁(Adrien Languillat)、辛斐禄(Pamphile Sinoquet)和瓦尼(Adame Vanni,因病中途折回)。10月24日,拉萼尼和耆英分别在中法《黄埔条约》上签字。《黄埔条约》给了法人在华传教很大的便利和特权。10月17日,拉萼尼照会耆英,要求天主教弛禁。11月11日,道光帝从耆英奏,开天主教禁(限于五口地方)。12月14日,诏弛天主教禁。12月28日,耆英通告天主教弛禁。○西湾子及江西南昌三桥修院,相继成立。○遣使会秦噶哗神父著《中国教会一览》,批评当时教会内部的殖民主义色彩及本地化的迟缓。○河南脱离南京成立代牧区。

中法《黄埔条约》中有关天主教的条款如下:

第二十二款: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棧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



耆英像

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济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照例严拘重惩。

第二十三款：凡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居住，或往来经游，听凭在附近处所散步，其日中动作，一如内地民人无异，但不得越领事官与地方官议定界址以为营谋之事。……佛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佛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佛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第二十四款：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听其任便雇买办、通事、书记、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请士民人等教习中国语音，缮写中国文字与各方土语，又可以请人帮办笔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各等工价束脩，或自行商议、或领事官代为酌量。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语及外国话者，亦可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62页〕

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卷）第277页指出：

按上述条款规定，所有法国人，无论做什么的，都有权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建房，有权自由雇佣通事、书记及教习汉语的文人，有权同被雇佣的人组织教习汉语和外国语，有权出售法文书籍。建造房屋和建造教堂、医院、周济院、学房及坟地同属一类性质，和建屋建行混为一谈了。拉萼尼所以不把诸如“传教”和“传教士”这类词写入条约，是为了证明法国人可以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从事文化活动，即传教士可以在从事文化活动的掩护下，以普通法国侨民的名义创办学校，甚至还可以把学校办成神学院。

两广总督耆英奏为姑允法使所请弛禁天主教片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1844年10月22日）

再，查佛喃哂之崇奉天主教，与大西洋相等。考诸往籍，该夷在前明曰佛郎机，于正德十三年遣使臣咖唎丹味等入粤请

贡，未许，因留不去。迨嘉靖二年，遂寇新会，渐据澳门，故澳门之为夷所据，自佛喇晒始。嗣后大西洋人丽玛窦来澳寄居，传习天主教，佛喇晒人辄以澳门让大西洋而自归其国。该夷权力什倍西洋而甘以地让，在服丽玛窦之教也。近年住澳番僧，多系大西洋之意大里亚人，而佛喇晒有番僧咭啞、玉实二人，能为华语。该国夷目谢西耳、真盛噫等于二十一年间连次进省谒见，在事诸臣托为助攻英夷之说，均系番僧咭啞为之居间传译，其请将天主教弛禁之意，盖已早萌于心。此次夷使喇嚒呢到粤，虽将啞啞等屏而弗用，或该番僧先将此意通知国主，故喇嚒呢奉令而来，期于必得请而后已，亦未可知。奴才督饬委员，连日与之反复辨难，实已不遗余力。乃驳诘愈严，请求愈坚，总因该夷素称强悍，自矜为西洋大国。此次以兵船多只航海远来，既劳且费，所冀非止一端，既欲假助顺之名观光上国，又思藉代防之计窃据偏隅。迨见咪喇啞北上业已中止，无可效尤，而咖嚒喇久在中华，略识天朝法度，晓然于虎门建楼之请必不能行，该夷使已无计可施。若仅照咪夷旧式定一通商章程，则彼贸易无多，又未免徒劳往返，因而专求天主教弛禁之一途，以为回复国主，夸耀邻封之计。其术已穷，其志已决，若过为峻拒，难免不稍滋事端。奴才悉心体察夷情，熟权其轻重缓急，似应姑允所请，以示羁縻，仍申明分别治罪条例，严定禁止夷人擅入内地传教章程，以存限制。至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咪夷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其税钞亦愿遵例输纳，并无异辞。惟据称丁香、洋酒二项，均系伊国出产，税例似觉较重，求为减则。查该二物每岁进口，均属无多，其税则之增减，无关餉项之赢绌，尚可俯如所请，以示体恤。除俟回省后，再行会同抚臣程裔采、海关监督臣文丰查核具奏外，理合附片陈明。再，奴才于拜折后，即率同藩司黄恩彤等由澳启程回省。谨奏。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着耆英就弛禁天主教一节向法使婉转开导的上谕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1844年11月6日)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耆。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耆英奏设法筹办夷务渐有条理一折，览奏俱悉。所谕夷使各条正大得体，亦是实情实理，甚属可嘉。现在该国夷人咖嚒喇既向喇嚒呢逐款言明，自不至再有妄求。惟所请天主教弛禁一款，着谕以天主教系该国所崇奉，中国并不斥为邪教，实因我国习教之人藉教为恶，是以惩治其罪，并非禁该国之人崇奉也。似此婉转开导，该夷定可帖然。该督务当坚持定见，折以大义，仍随时体察夷情，妥为驾驭，不可节外生枝。至通商事宜，俟商定条约后，再行具奏，请旨办理。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着耆英再就弛禁天主教一节向法使婉转开导的上谕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1844年11月11日)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耆。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奉 上谕：据耆英奏体察夷情，请稍宽禁令，以示羁縻一折；又另片奏该夷请求愈坚，似应姑允所请，并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等语。览奏俱悉。该夷使于天主教弛禁一节，渎请不休，着该督再行婉转开导，以天主教来自西洋，在中国并未指为邪教，亦未尝严申禁令。从前因有藉教为恶之人，是以明定刑章，惩治其罪，与该国之天主教毫无干涉。即内地近来并无习教犯案之人，可见此教实未禁止，既未申禁，更无所为弛禁。该夷使久住澳门，自必有所闻见。似此明白晓谕，虽杜其所请，即所以遂其所求，该督必能仰体朕心，妥为驾驭，正不必家喻户晓也。该督接奉此旨，向其开导。该夷使情形若何，着由五百里驰奏，以慰廑念，其通商章程及税则增减，着俟查核后，再行具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着耆英如法使坚持不移可相机办理弛禁天主教事密谕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1844年11月11日)

军机大臣密寄两广总督耆。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奉 上谕：本日据奏佛夷请弛习教禁令一节，已有旨谕令耆英再向该夷使明白开导矣。该夷使果能闻言辄悟，固属甚善。倘仍

坚持前说，哓哓不已，竟有不肯转移之势，该督即相机办理，谕以我朝于该国天主教本未严申禁令，且近年来中国亦无传习此教之人，现在该国条约内既经载明，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即许以开禁，亦无不可。惟此事大有关系，万无明降谕旨通谕中外之理。其应如何措词晓谕该夷准其弛禁之处，着该督细心筹度，既可令该夷输服，且不至有伤大体。即行酌拟檄谕迅速奏明，候旨遵行，将此密谕知之。钦此。

耆英奏为已姑允法使所请弛禁天主教并酌拟简明节略附呈折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44年12月14日)

两广总督奴才耆英跪奏，为遵旨细心筹度，酌拟妥办，恭折由驿密奏，仰祈圣鉴事。窃照佛喇哂夷使喇嚒呢请将天主教弛禁一案，前经奴才缮折具奏，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初二日奉该谕：“据耆英奏体察夷情，请稍宽禁令，以示羁縻一折。又另片奏上夷请求愈坚，似应姑允所请，并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等语。览奏俱悉。等因。钦此。又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同日奉上谕：本日据奏佛夷请弛习教禁令一节，已有旨谕，令耆英再向该夷使明白开导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跪诵再三，仰见我皇上圣明，指示剴切周详，于慎持大体之中，寓俯顺夷情之意，下怀不胜钦服。惟查该夷使请求各款，多属非分之干，业经奴才严行拒绝。其天主教弛禁一节，亦屡经往复辩难，折以法度，谕以情理，不啻舌敝唇焦。无如驳诘愈严，请求愈坚，中间齟齬情形，几成决裂。迨经藩司黄恩彤委曲求全，婉转开导，始定为姑允所请，以示羁縻，仍申明治罪条例，严定禁止夷人擅入内地传教章程，以存限制。该夷使亦情愿恭候谕旨，不敢别有请求。旬日以来，时而峻拒力争，时而罕譬曲喻，一切驾驭之术，固已竭尽无余，即使再向开导，亦不能出乎历次辩论事理之中，恐未能顿然悔悟。且奴才回省后，该夷使于十月初一日来省，经即选道潘仕成借给栈房，捐备食用，奴才复率同藩司黄恩彤等出城加以款接。该

夷使极为欢怍，已于初九日回澳，其兵船八只陆续驶出外洋，仅有火轮船一只、中巡船一只，尚在澳洋寄泊。察看夷情，甚属安静，不至别生枝节。此时若再赴澳，向其辩论，该夷使必虑及所请未蒙允准，顿启猜疑，势将晓谕不休，又或未定之局转觉于事无济。伏思天主教虽与白莲、八卦等项邪教不同，究属久干例禁。今该夷使再三吁请，始将旧例量为变通，诚如圣谕，万无明降谕旨通谕中外之理，似亦无庸颁发檄谕，晓谕该夷。奴才细心筹度，谨依贴黄述旨事例，由奴才将天主教弛禁之处，酌拟简明节略附陈，并拟谕旨依议二字粘贴黄签，恭候钦定。如蒙俞允，奴才即行知该夷使钦依遵照，并移咨各省督抚一体查照办理。再，该夷使既无国书呈递，与咪喇哩事体不同，应请无庸降诏答奖。所有奴才酌拟妥办缘由，理合恭折，由驿密奏，并将简明折一件粘贴述旨黄签，恭呈御览。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大历史系编：《清末教案》（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9页〕

1844年，法国遣使会秦嗜啐神父著《中国教会一览》小册子，批评当时教会内的殖民主义色彩，主张中国教会实行本地化。秦神父说：当时教会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已经变成了在中国的外国机构：“既然神父是外国人，自然而然的结论，教会变为外国机构，是敌人侵略应用的手段。教友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形成了不知目的的秘密组织的分子，它的领袖只是外国人的从当。因此，激发人们为首的感觉就是不信任和怀疑。这种教会为外国机构的经纪人的成见，是教会传入中国的最大障碍；政府相信有责任禁止，良善国民为表现爱国，仇恨它，用各种手段致它于死地。”在第六章，秦神父指出，传教士应当学习中国的语言，熟习中国文化传统：“忽略研究语言，也不去研究当地的风俗、流传的迷信，就不能尽好讲道的责任。好像播种的人，把种子藏在仓库里，他们的传教丝毫收不到效果，所以不能不归罪于他们自己。”（由于这本小册子所提出的看

法十分尖锐,所以被当时的教会判为禁书)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8月23日,法使拉萼尼与耆英会于虎门,提出有关天主教弛禁四事,否则不换约。耆英允之。8月25日,中法《黄埔条约》在澳门互换。法使随即北上视察。12月2日,拉萼尼胁迫耆英,要求明降谕旨,弛天主教禁,发还雍正年间被充公没收的教堂旧址,并请对耶稣教(新教)一视同仁。12月22日,耆英宣布对西洋各教均不加禁止。○高丽六品修士金安当抵上海,在浦东金家巷祝圣为神父。○教廷谕令成立单独的西藏宗座代牧区,委托四川的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据统计,本年江南有耶稣会士十六人,方济各会士三人,传信部司铎二人,教徒六万人。

拉萼尼提出弛禁天主教的理由,是依据康熙于1692年颁布的传教宽容法令。他将这一点写成备忘录交给耆英。耆英在奏请道光帝时亦将此作为理由。这份备忘录这样写道:“为照复事,本月初五日接准贵大臣公文一件,俱皆道达,畴昔吐露雅怀,并为金石之论。……本大臣尤乐闻贵大臣速为奏闻大皇帝,将来中国内地人民明奉此教,为善者概不罪禁。此行作成,于贵大臣实有令闻令望,缘本国皇上及诸臣工莫不洽怀,国内人民尤为欣羨,从此尽闢开衅之隙。本大臣当即飞达本国遍悉此意,此贵大臣鼎力知无不能。本大臣即敬录康熙三十一年奏礼部议准弛禁原案送上查照,请烦核览,将原案移复,俾得归卷备查,随将案文奏闻,大皇帝自必圣览,推原准予。谅此事本大臣于所议事宜经圣恩准定交互执照之日,亦必邀圣恩准予矣。此时本大臣所有诸事毕完,庶可以回国矣。以后两国再无衅隙,不挠万年之和好。”拉萼尼胁迫清政府弛禁天主教的做法,得到一部分传教士的称道。传信部驻香港账房费利切尼(Antoine Feliciani)在呈罗马的报告中说:“法国代表拉萼尼神父为在华传教做了不少工作,相信他会继续做下去的。”遣使会巡阅使盛神父(Jean-Ferdinand Faivre)甚至说:“由于您极关心传教士和教徒,您赢得了他们的感激、尊敬和友

情。这也是尽人皆知的，拉萼尼先生的名字将在中国教会史上永放光彩。”

〔卫青心：《法国在华的传教政策》（下），第433页〕

供奉天主教十字架等项可毋庸查禁但不得藉教为非的上谕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1845年9月20日）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耆、广东巡抚黄。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奉上谕：耆英等奏佛夷已就范围约册亦经互换一折，览奏均悉。此次夷使喇嚒呢因闻内地学习天主教之人仍被查拿，忽生枝节，经耆英奏明前往面议。兹据奏称，驰抵虎门，与喇嚒呢面晤，该夷使仍执前说，再四请求。经该总督同赵长龄等力与辩议，该夷使理屈词穷，仍称天主教实系劝人为善，不应混行查拿等语。察其情词迫切，迨经该督晓譬百端，于曲示笼络之中，寓严加拒绝之意。所请各条，如习教辨别善恶及习教办罪之人概予释放两条，均已据理驳斥。惟所称供奉十字架等项，既系天主教规矩，自可无庸查禁。其设有供奉天主处所，亦可听从其便，但不得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诱，并不法之徒藉称习教结党为非，及别教之人溷迹假冒，俱属有干法纪，仍各按旧例治罪。现在该夷使既已允从，该督业经定稿钞给阅看。该国寄来约册各条，亦无更改，并有该国主印信，当经彼此互换，所有现议章程，均已飞咨各省查照。嗣后该督等惟当宣示恩威，优加抚慰，内存防范，外示肫诚，期于悉泯诈虞，免致再生枝节，是为至要。又另片所奏前留琉球国执事、通事二人，已有旨令刘韵珂俟接到该督文书即咨行琉球国王知悉。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清末教案》（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12页〕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1月17日，道光帝命耆英允如法使所请，出示弛禁天主教。2月8日，道光帝明降谕旨，弛天主教禁，并发还康雍乾禁教时期没收之天主堂。这标志着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天主教正式

弛禁,而且还引起了许多“给还旧址交涉”事件。但根据法令,外国传教士仍不准擅入内地传教。○教廷设西藏打箭炉为代牧区、南昌为代牧区、宁波为代牧区、贵阳为代牧区。

西藏的打箭炉教区为后来的康定教区。教区初创时,有主教一位、神父三位。其中 Krick 及 Bourry 两位神父远赴拉萨等地传教,被杀于 1854 年 9 月。倪德隆(Giraudeau)主教生于 1850 年,任主教四十六年,创办了藏语印刷厂,卒于 1943 年,享年九十三岁。

〔包万才:《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华大事录》,引自罗光:《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第 135 页〕

法使请求解禁天主教并给还教堂旧址之照会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846 年 1 月 17 日)

照得大喇嘛晒国及泰西各国所奉天主教,原系劝善惩恶,乃是正教,实非异端。前经贵大臣奏将中国传习天主教为善者概免治罪,已蒙圣恩允准,朱批依议。嗣因各省仍行拿办销毁供奉天主教之规矩等物,此地方官意皇上犹未全允弛禁之故。复经议定,凡有中国人传习天主教为善者,无论在何地方设立供奉天主处所,会同礼拜,敬供十字架、图像,念诵本教之书,讲说劝善道理,均可听从其便,毋庸禁止。既已概为允准,本大臣与贵大臣亦量斯为全备,故将照会通咨各省,以为地方官必能遵守。迨近日周历五口,目睹之事,与意料殊不相符,在宁波、上海、厦门等处,亲见未有晓示贵大臣通行之札。地方官于十月间犹云未接。多人还未知觉,近邻之省,犹未知有皇上旷典,更恐远省尤为难觉。如是则大皇帝之洪恩诚为虚负矣。本大臣回国,须详奏国主,以所办之事理宜完备,相应设法,以祛将来之疑惑谓弛禁天主教为不真诚者,必要众人不得以未知藉口,而各省地方官亦不得任意查拿供奉天主教之人,以成全此事,故特请贵大臣奏明,恳求大皇帝明降圣谕,凡中国传习天主教为善之人,无论在何地方设立供奉天主处所,会同礼拜,敬供十字架、图像,念诵本教之书,讲说劝善道理,俱毋庸查禁。自康熙以来所建天主堂之处,其有原旧房屋尚存

者，仍给回该处奉教之人，作供奉天主处所。如官员有违悖不遵，仍将传习天主教为善之人拿办者，即治以应得之罪。候圣谕颁下之日，即恭录通行各直省，俾文武大小衙门即行出示张挂晓谕，使中外人民咸感大皇帝之洪恩，而中国与佛囑晒国往来更增广大光荣也。兹特着委员咖嚒喇送此公文，凡贵大臣有下问之事，伊可悉达，为此照会。顺候德祺日新。须至照会者。

朱批：览。

〔《清末教案》（一），第15～16页〕

将康熙年间旧建天主堂勘明给还该处奉教之人的上谕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

军机大臣字寄协办大学士、两广总督耆、广东巡抚黄。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习学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藉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诱，或别教匪徒假藉天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耆英在接到上谕后，于同年3月18日发出告示，其内容称：

为恭录晓谕事，照得本部堂（院部）具奏习天主教为善免罪一折，于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奉上谕：前据耆等奏，习学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

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习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借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诱，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借端滋事，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旧例办理。仍照现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为此谕令知之。钦此。合行恭录晓谕为此示，仰官吏及军民人等咸宜钦遵知照毋违。特示。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57页〕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山东代牧罗伯济主教回欧洲，江南教务由赵方济主教管理。耶稣会中国区会长南格禄决定在徐家汇营建耶稣会修院。梅得尔(Mathurin Lemalire)是营造会所的负责人。3月，耶稣会在徐家汇买了一块土地开始营建总会院，常熟的一位刘姓教友捐了一笔哀矜，用于偿付地价和购置新会院的设备，并向北营造了一排房屋。同时耶稣会还开始营建徐家汇藏书楼。○仁爱会修女来澳门。○10月14日，日本宗座代牧兼香港监牧夥尔加助(Mgr. Augustinus Forcade)向传信部建议，主张在香港召开中国主教会议，讨论中国教务，由于法国和葡萄牙反对，后未果。○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来港。○巴黎外方传教会将总务处搬香港，暂管香港监牧区，至1850年为止。○葡籍署理主教赵神父回澳门，孟振生被任为北京署理主教，葡萄牙在北京的传教事业结束。

1847年，耶稣会在徐家汇营建了一座藏书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主要贮藏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名贵西文书籍八万册，据1993年刚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Shanghai Library Catalog of Western Rare Book*)的介绍，上海图书馆目前收藏的西文珍本书籍，相当一部分来自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Bibliotheca Major Zi-Ka-Wei)。譬

如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Juan Gonzalez de Mendoca: Dell' Historia della China*, 1586年威尼斯); 卫匡国《鞑靼战纪》(*Martino Martini: 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 1654年安特卫普)、《中国新图》(*Novus Atlas Sinensis*, 1655年阿姆斯特丹); 莱布尼茨《中华新事萃编》(*Gouu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tz: 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s Temporis Illustratura*, 1697年); 曾德昭《中华帝国志》(*Alvarez Semedo: Emperio de la China*, 1642年马德里); 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记》(*Nicolas Trig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Societate Jesu*, 1615年奥格斯堡); 李明《中国现状新志》(*Louis Le Comte: Nouveaux Memoire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a*, 1701年巴黎)等等。下层专藏中文书籍, 有徐宗泽神父从各地搜集而来的省府厅县志和各省名贵碑帖等十二万册, 书志二千一百余种以及各种古币等文物, 据徐宗泽神父遗著《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明清间教会书目》, 可知该馆藏有明清以来耶稣会士和中国教徒所撰的教理和教史著作数百种, 其中有《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三山论学记》、《圣经直解》、《主经体味》、《弥撒经典》、《主制群徵》、《主教缘起》、《超性学要》、《名理探》、《七克》、《圣母行实》、《大西利先生行迹》、《天学传概》、《景教碑颂正诠》、《徐氏庖言》等名著。

[徐宗泽:《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明清间教会书目》,《上智编译馆馆刊》卷二,第4、5合期]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沙尔得保禄会修女来华。○全国中国籍司铎一百三十五人。○传信部于5月11日批准在香港召开中国主教会议计划, 并指令十五名主教和宗座代牧会聚香港。6月20日, 传信部训令教廷驻华办事处专员费利切尼(Antonius Feliciani)指示, 研究在中国建立圣统制的议案。但因法国政府和法国代牧的反对未果。○意大利耶稣会士、著名教育家和汉学家晁德莅(Angelo Zottoli)来华。○原在澳门读神学及拉丁文之三修生回浙江省, 继

续在嘉兴与硖石之车辐滨肄业，是为浙江有修院之始，后移定海，再迁宁波。○意大利天主教教士赵方济 (Mgr. Francois Xavier) 接任罗类思为南京教区主教。

晁德莅，字敬庄，著名教育家及汉学家，马相伯、马建忠和李问渔神父，均出其门下。1826年生于意大利那波里，1843年入耶稣会。1848年来华，1902年逝世，一直寓居徐家汇。历任徐汇公学校长、初学院院长及神学院神师。著作有拉丁文巨著《中国文学课程》(*Cursus literature sinicae*)，该书分为五巨册，凡中国文学作品，自幼童《三字经》，以至诗、词、歌、赋、八股文、尺牍、楹联、小说等，无一不包。1882年出齐。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洪秀全在两广起兵反清。

1850年(道光三十年)

2月25日，道光帝去世。○上海耶稣会创立徐汇公学，这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学校。○在那不勒斯圣家书院毕业之张蕴华、阎玉亭以及沈静渔回国，在苏州、常熟、昆山、松江、上海金家巷、高桥、南桥、董家渡、张朴桥、马桥一带传道。

据徐汇中学首任校长晁德莅报告，1857年时公学有八十二名住宿生，分居三院。有九名中国教师，均非教友。主要教授中文课程，优秀生教法文课程和音乐、图画。最初学校招收穷人子弟，后来为了培训神职人员，又开了拉丁文课程。1875年，徐汇中学有九十名学生。1878年学校二度扩建，1917年建成更大的学校校舍。1920年学校建校七十周年时，已有学生四百四十六人。学校设有小教堂，宗教课程称为“圣学课”。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天主教的本地化，徐汇公学也将培养教外子弟列为重要的目标。

1851年(文宗咸丰元年)

11月17日，在上海董家渡天主堂举行天主教全国主教会



徐汇公学

议,出席的宗座代牧和宗座监牧有孟振生(Mgr. Joseph - Martial Mouly)、安若望(Mgr. Jean Henri Baldus)、夥尔加助、赵方济(Mgr. Francois Maresca)、孔神父(Mgr. Florent Daguin)和徐类思(Mgr. Luigi Celestino Spelta)。传信部训令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圣统制是否合宜,会议研究认为可行,并拟以中国行省为教省。孟振生曾草拟向法国政府呼吁帮助在华传教的文书,未获全体主教同意,特别是方济各会的徐类思主教拒绝签字。会议规定:(一)中国教区总主教须欧洲人担任,中国人名义上可选为主教,但须获三分之二以上主教的选票,而且是欧洲人的选票;(二)中国修士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到那不勒斯“圣家书院”读书,但不得到欧洲其他地方留学。

1852年(咸丰二年)

巴黎外方传教会梅司铎,得上海罗礼思司铎之助,雇海船至高丽传教。○贵阳成立修院,称纳丁学堂或纳丁书院。

1853年(咸丰三年)

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在南京、扬州等地,都有天主堂被焚毁。○上海董家渡圣方济沙勿略主教座堂落成,3月20日举行圣堂落成大礼。法国军舰“贾西义”号的舰长和士兵,以及上海的外侨和教友一万多人参加教堂落成典礼。○12月9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在南格禄及葛必达两神父的陪同之下,乘坐“贾西义”号抵达南京,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接待了他们,双方会谈不得要领,布尔布隆声称此次南京之行是为探讨在太平军占领期间如何保护天主教徒。

1854年(咸丰四年)

传信部为中国圣婴会事业,捐助三十一万一千法郎。○4月,法国教士孟振生在直隶安肃县被捕,11月,孟被押往江苏。

1855年(咸丰五年)

上海徐家汇创立中国籍献堂修女会。○4月,江南赵方济主教回欧洲休养,11月,赵逝世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德格定(Auguste Desgodins)来华,后在西康传教五十八年,编有《藏法字典》。1913年逝世于吉林。

1856年(咸丰六年)

2月29日,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潜入广西传教,在广西西林被知县张凤鸣所杀,是为西林教案。7月25日,法国公使顾思(De Courcy)以马神父被杀一事,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惩凶。12月25日,法外相训令布尔布隆英法美三国合作,一致向清朝提出修约要求。○教宗庇护九世于5月30日公布谕令,将北京教区划分为三个宗座代牧区:即北直隶、东直隶和西直隶。原在葡萄牙保教权管辖下的北京教区作废。3月29日,罗马教廷传信部谕令撤销南京教区,建立江南宗座代牧区,命法国耶稣会士年文思(Andreas Borniet)为第一任代牧。此一宗座代牧区由耶稣会巴黎省会管

辖，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耶稣会士称之为“江南传教区”。○罗马教廷任命范若瑟（Eugène Jean Claude Désfleches）为首任驻川东主教。范若瑟为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838年来华，1840年潜入四川。1878年回欧洲。○“神爱小姊妹会”（Daughters of Charity）来华。

1857年（咸丰七年）

上海耶稣会士郎怀仁祝圣为主教，管理直隶教区教务。○2月21日，罗马教廷和葡萄牙政府缔结政教公约。公约第四条规定中国广西省不再属于澳门教区，第五条规定香港亦不再归澳门主教管理，第六条规定“澳门主教的治教权和葡国在中国的保教权从今以后，只包括下项数区：澳门、广东和附近岛屿，广西和香港除外”。公约的第一号附加声明，对公约第六条附加声明，谓澳门主教对于广东和海南岛等待一年后实行治理，葡国可加派相当数目之传教士。根据这次公约，葡萄牙在中国原有的保教权，缩小到广东和海南岛；其余所谓南京、北京两教区，都不包括在内。而实际上，在本约签订以后，连广东和海南两教区，仍旧属于以前的两广监牧区管辖，并没有据约归属澳门教区。○在那不勒斯圣家书院毕业之昆山修士陆霞山晋铎，回国传道。

1858年（咸丰八年）

米兰外方传教会士雷纳（Fr. Paul Reina）、高神父（Fr. Timoleon Raimondi）和达撒尼修士（Bro. Tacchini）抵香港。○耶稣会上海董家渡天主堂祝圣三修士。○汕头、广州、香港成立监牧区。四川分为川东和川西两代牧区。广东、广西脱离澳门教区独立。○教廷委任法籍遣使会士董若瀚（Jean Baptiste Anouilh）为直隶东南部主教，驻节正定。○英法联军北上天津，6月27日，中法《天津条约》签订，法国宣称依据该条约第十三款取得在华保教权。○孟振生派中国籍神父邱安（云亭）至天津开教。

《天津条约》第十三款内容如下：“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具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崇信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如处，概行宽免。”

法国政府正是根据《天津条约》第十三款，声明在华拥有保教权。法国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在条约上允许中国人民信奉天主教，这种信仰自由，不仅有中国国法的保障，而且又有国际条约的保障。如果中国皇帝或地方官吏禁止信教时，法国政府可根据条约向中国政府交涉，提出抗议。《北京条约》的第六款，实际上是运用了《天津条约》第十三款的保教权取得的成果，因为第六款所定的是具体的事项：第一，清朝皇帝发布上谕允许人民信教；第二，处治迫害奉教者的官吏；第三，偿还充公的教会产业，这三点都是运用保教权所得到的权益。

当时清政府并不懂得保教权的意义，也不知道法国保教权的历史背景。

法国保教权起源于法国与土耳其所订的条约。土耳其原为信奉伊斯兰教国家，且因巴勒斯坦圣地的归属问题与西方十字军战争数百年。但16世纪以后，土耳其国势衰微，法国在欧洲势力强大并向近东渗透。1535年，土法两国订约，允许通商等事后，1569年、1597年、1640年逐次修订条约。直至1740年增订土法条约，这个条约法文称为Capitulation（即分章条约）。该约规定，在土耳其境内的法国人及信奉天主教的人民俱受条约的保护。法国因此自视为近东天主教的保护者，要求教廷予以承认。教廷允许近东等地教会和土耳其政府如发生问题，由法国政府代表教会向土耳其政府交涉。但是对教会内部的宗教问题，教廷则派宗座代表常驻君士坦丁堡，直接代表教宗予以处理。因此法国在华的保教权，是仿效法国在土耳其的保教而设的。不过，在以后长时期内，法国并不允

许罗马教廷向中国派驻任何宗座代表，这点和土耳其又很不相同。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78页〕

1859年(咸丰九年)

罗马教廷传信部为了解中国详细的传教情况，将时任湖广宗座代牧的徐类思召回罗马述职，徐类思立即起程赴罗马。○南京耶稣会士年文思在董家渡祝圣为主教。○多明我会郭德刚(Fernando Sainz)、洪保律(Angel Bofurull)两神父重来台湾高雄传教，并建高雄玫瑰圣母堂。○12月，直隶总督恒福奏，在天津行医传教的中国籍神父邱云亭被捕，起获十字架、经牌、夷书等物件，官府将其押回广东原籍。○是年，两广及海南明主教(Philippe F. Z. Guillemin)要求在广州城中建堂，拿破仑三世允拨三十万法郎，地方官员允许不论城内外旷地均可建堂。明主教竟然指定于藩司衙门、两广总督衙门及一道观处任选一地。广州地方官员在法军的威吓之下，将两广总督衙门让给明主教建堂。



广州石室天主堂

1860年(咸丰十年)

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于1月24日下诏任命徐类思为中国天主教教务巡阅使。徐于5月返抵香港，7月抵上海，8月视察江南教区，12月视察河南教区。教宗还请徐向清朝皇帝带呈书信一封，未果。○英法联军北犯，10月18日焚毁圆明园。10月25日，中法签订《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并赔款八百万两。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第六款中私自添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文句。○遣使会恢复其在北京的传教事业。10月29日，北京南堂重新开放，北京宗座代牧孟振生主教向英法两国全权代表和联军士兵发表演说，盛赞拿破仑三世，并为联军的胜利唱《凯旋颂》和《谢主颂》。不久北堂亦相继开放。11月12日，孟振生收回了位于北京西郊的明清传教士墓地。○四川叙府成立代牧区。○中国籍神父



北京圆明园遗址（作者摄于2000年9月）

邱云亭在递解回籍途中在上海获释。○加诺沙修女（Canossian Sisters）在香港建立教会。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云“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坟莹、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但依据该约法文本的译文是：“按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公之天主堂、慈善堂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

法文和中文出入颇大，特别是中文本中“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堂自便”一语，是有人作弊添加的。美国著名教会历史学家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和耶稣会历史学家史式微（J. de La Servière）都认为作弊者是充任译员的法国传教士艾嘉略。

艾嘉略 (Louis Delmarre 1810 ~ 1863), 生于法国鲁昂, 1833 年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 1834 年升神父。1836 年抵澳门, 1837 年潜入四川, 在四川传道二十三年之久。1860 年去香港, 曾给法使葛罗当译员。《北京条约》签订以后, 他返回四川, 发现“条约没有得到执行”, 遂拟重返北京到法国公使馆指控中国官吏, 但未抵北京, 在汉口暴卒, 有人怀疑他是被人毒死的。

[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下卷), 第 666 页]

1861 年(咸丰十一年)

3 月, 法主教江类思 (Alois Moccagatta) 请查还济南城内高都司巷旧堂, 上谕谓如查还不便, 可照原亩数另拨官地或购民地抵给。○湖南衡州府拘禁教士。○3 月 30 日, 法使以传教谕单二百八十张送请总理衙门交顺天府盖印, 单内载明教士非官员, 不准干预地方公事。○5 月, 恭亲王奕訢奏曰: 法国要求归还山东济南府旧有的天主堂一座, 占地十三亩; 以及杭州旧有的地基。恭王奏曰: “体察情形, 如旧地可还, 则还之; 否则, 照依旧址亩数, 另行择地, 酌量给予。”○7 月, 法国教士梁多明面见山西巡抚英桂, 要求查还绛州的“东雍书院”。该院清初为教堂, 雍正禁教后改为书院, 祀奉孔子诸贤。地方官绅自然反对。年底, 总理衙门照会拒绝。但法使哥士耆 (Michel - Alexandre Kleczkowski) 坚决要求归还原址。○同年, 贵州主教胡缚理 (Louis Faurie) 为庆贺《天津条约》成立, 擅自乘紫呢大轿, 雇用吹鼓手, 盛设仪从, 招摇过市, 激起贵阳绅民公愤。清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联名致函全省官吏, 斥天主教为“异端邪说, 最为害民”, 教会“肆行无妄, 心实叵测”, 号召“如有来自外方之人, 谬称教主等项名目, 欲图传教感人, 务望随时驱逐”。候补道缪焕章著《救劫宝训》, 刊刻于贵阳, 号召排教。6 月 12 日, 贵州提督署理巡抚田兴恕派团务道赵畏三率兵焚毁贵阳青岩鬼家关教会学堂, 杀教徒四人。法使哥士耆与云贵总督劳崇光谈判, 议定在贵州指定地点张贴天津、北京条约文告, 赔偿教会损失, 抚恤死者家属, 但新任贵州巡抚

韩超拒不执行。○法使请查还河南南阳天主堂旧址。○10月,法使请查还江西南昌吴镇天主堂旧址。○上海城内老天主堂由官府还给天主教会。○原北京北堂神父卫儒梅奉派来天津传教,他通过法领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获得崇禧观十五亩地永租权,并准备在上面建造望海楼天主堂。○12月9日,法使布尔布隆为湖北徐类思总主教索还湖北省城楚北平湖门内花堤、抚院街、汉镇仁义司三处旧天主堂。

1862年(穆宗同治元年)

2月,法使请给予直隶深州仓厂地基,供教民使用,清廷批准。○2月18日,贵州开州知州戴鹿芝处死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文乃耳以及教民吴学圣、张天申、陈显恒、易贞美等。○江西南昌士民拆毁筷子巷、袁家井、庙巷三处天主堂。法国教士以《天津条约》为护符,要求清湖南巡抚以宾礼接待,并在衡阳、湘潭等处占地建堂,据湖南巡抚毛鸿宾报告,“其教不择人而授,往往内地痞徒混入其中,藉人教之势,敢为猖獗。即如在湘潭传教之龚修理,本系湖北兴国州平民,而乘坐四轿,拜谒地方官,招摇挟制,凌藉士民,以致百姓愤怒,激成重案。”3月间,湖南士绅公议驱逐天主教,手段极为激烈,“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寄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并撰《闾省公檄》二揭帖,指斥天主教不敬祖宗,不敬君上,不分男女,伤风败俗,是“邪说异类”。此一文献流传甚广,湖南以外,江西南昌、赣州、直隶广平府、河南南阳府,均有流播。不久,衡阳、湘潭民众纷起焚毁天主堂、学堂、育婴堂、药材房。法使哥士耆向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清政府将署衡阳、湘潭两知县革职,赔修教堂,赔偿书、物等损失结案。是为衡阳、湘潭教案。○是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罗安当(Antoine Anot)在江西索地建堂,时湖南《闾省公檄》传入南昌,“众论沸腾”,檄文被印成数十万张,“遍贴城内外通衢”。3月17日,南昌民众焚育婴堂、教堂及罗安当坐船。罗乘夜逃亡。旋南昌街头又遍贴《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号召全省士民“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

悉成劲旅”，以驱逐天主教。但次年清政府令江西巡抚沈葆楨以赔银一万七千两，重建教堂结案。是为南昌教案。○4月6日，法使请求总署将奉谕旨开禁天主教者刊印二百张，盖上国玺，以备各处教堂教士存用。○8月，直隶清河县天主堂旧基查交郎怀仁主教。○7月31日，江南教区第一任主教年文思在去直隶途中感染霍乱去世。○12月31日，法使哥士耆向总理衙门提出议结贵州教案办法：黔抚韩超革职，永不叙用，提督田兴恕、团务赵良三、知州戴鹿芝解京处斩，被总署拒绝。○法国遣使会士谭卫道（Armand David）抵华，在法国巴黎博物院及教育资助下在中国进行其生物学研究。○拿破仑三世派出七名欧洲传教士及十四名“神爱小姊妹会”修女来华，协助遣使会在华北之传教工作。

谭卫道，1826年生于法国 Bayonne，1848年入遣使会，同治元年（1862）抵中国。谭氏注重生物学上的研究，同年即去长城及内蒙古考察。次年至京西各山采集。1865年11月至东北考察旅行，1868年至1870年，游历江苏，并远至川康境内，此后曾回欧洲休假。1872年至1874年来华作最后一次考察游行，足迹遍及晋、陕、豫、赣、闽、浙等省。他在动植物学方面发现新种甚多，许多品种冠以谭氏之名。谭氏精于地质学、软体动物学、飞禽学及哺乳动物学。所得植物3100种，送存巴黎博物院者1570种，内新种达247种。谭氏还著有著名的《谭氏植物名汇》（*Plants Davidianae*）。他在北京时还创立了北堂自然博物院。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记曰：“馆在北堂左近，内储珍禽奇兽，大小无虑四千种，翎毛鲜洁，栩栩如生，又有奇异木石金宝之类，多不胜数，皆博物家所罕见者。开馆后，远近闻名，争来游赏，王公巨卿，亦多来者。此虽世俗事，然可藉以考求物理，开扩眼界。”

1863年（同治二年）

3月10日，重庆绅民反对向四川主教范若瑟腾交崇因寺，将天主堂、医院、学堂悉予捣毁，连续骚动三日。川东道

吴镐撤任，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交部议处。○4月27日，总理衙门以河间府法主教郎怀仁遵守西士风范、安心传教，函致法使嘉勉。○7月，九江关道蔡锦清与罗安当议结南昌进贤等地教案，共赔偿教士、教民银一万七千两。○10月，酉阳天主教公信堂被拆毁。○11月9日，法使柏尔德密偕川东主教范若瑟至总署催办重庆教案。○10月，山西主教派教士张武良至绛州接收东雍书院。○在那不勒斯圣家书院毕业之江苏海门修生黄廷彰回国，布道于湖北。○12月，在法国新任公使柏尔德密(Jules - Francois Gustave Berthemy) 的战争恫吓下，清政府议结贵州教案，韩超交部议处，田兴恕发配新疆，其公廨改建为天主堂，缪焕章永不叙用(何冠英、戴鹿之、赵畏三已死，毋庸议处)，赔款一万二千银两。○多明我会士郭德刚在台湾屏东建万金天主堂。

1864年(同治三年)

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亡。○2月，四川丰都县高家镇绅民焚毁天主堂、义学、药房及教民房屋多所。○9月22日，教宗庇护九世宣布直隶东南区的郎怀仁主教调移江南。提升耶稣会士杜巴尔(Edouard Dubar)为直隶东南区宗座代牧。○11月，因驻藏大臣满庆等奏请，总理衙门再咨成都将军等阻止外人入西藏传教。○教廷指定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陕北三边地区为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传教区。

1865年(同治四年)

2月2日，教宗庇护九世诏书抵达中国直隶。法国传教士与浙江会稽地方官因购地基时发生争执。2月20日，法国公使柏尔德密与总理衙门达成一份对《天津条约》第六款的补充规定，即《柏尔德密协定》，“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买置田产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与奉教人之名”。2月19日，郎怀



北京西堂遗址

仁主教祝圣了其继任者杜巴尔代牧，前往天津，晋见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3月22日抵达上海，接管了江南的教务。○同年，法国耶稣会士刘德耀（Henri Le Lec）来到中国，他曾在斯通赫斯特天文台学习，带来了大量天文仪器，准备在中国传教区建立一座天文台。○第一批圣母圣心会教士四人，在会长南怀仁（Theophiel Verbiest）率领下来西湾子传教。○8月，法籍传教士玛弼乐（Francois Mabileau）在酉阳被杀，法国公使以派兵到四川相威胁，川督骆秉章以冉老五抵命，徒刑两人，赔款八万银两。○11月，四川委审局与川西主教洪广化议定传

教规条十四款，呈请成都将军核行。○米兰外方传教会（Seminary of Foreign Mission of Milan）开辟河南为传教区。

1866年（同治五年）

因南京旧天主堂已改作仓房，清政府将西城一空地调换归还。○3月，酉阳民团围攻纸房溪等处教堂，教民多人被害，是年民教一再互斗，双方均有伤亡。○10月，英国新教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带领二十余教士至杭州，开始了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在中国的传教活动。○12月，总署行文停止引用前通行之洪主教传教条规。陕西巡抚乔松年将西安府与教士高一志（Eph. Chiais）议立保护教士条款四条，咨呈总署备案。○内蒙圣母圣心会南怀仁代理主教祝圣四名中国籍神父。○北京西堂重新恢复并开始礼拜。

1867年（同治六年）

1月1日，孟振生主教主持北京北堂在恢复重建后第一次弥撒。○3月7日，郎怀仁主教接到圣职部部长枢机以教宗庇护

九世名义的邀请书，参加由全世界主教参与的在罗马庆祝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殉教一千八百周年纪念。3月22日，郎怀仁主教离开中国，前往罗马。5月18日在罗马受到教宗的接见。郎主教转达了董家渡教友的一笔捐献，作为伯多禄宗座的库金，同时在祝词中称教宗为“智王善牧，圣教元首”。○拯救炼狱亡灵女修会会士（简称拯亡会）随郎怀仁主教于10月回到中国，是为拯亡会在华传教之始。○费赖之（Aloysius Pifister）来到江南，开始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历史作大量深入的研究，并负责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英敛之（华）生于北京城西宛平县。○米兰外方传教会受教宗委托，全面负责香港教务，高神父任宗座监牧。○山西有四名欧洲传教士、六名中国籍神父、一万三千八百三十二名信徒。○山东有七名欧洲传教士、七名中国籍神父、一万多名信徒。

1868年（同治七年）

1月，法国神父韩伯禄（Pierre Heude）抵达上海，在徐家汇创立了隶属于耶稣会的自然博物馆。这是上海最早的自然博物馆。○12月4日，北京孟振生主教去世。继任者为遣使会士田嘉璧主教（Louis Gabriel Delaplace），同年，他在栅栏建了一座圣弥额尔教堂。○5月，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正式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翻译馆译员。在以后三十余年时间里，他单独翻译或与他人合译西学书籍达一百二十九部，其中七十七部在江南制造局出版。○7月，四川酉阳团民焚掠教堂教民。○9月，两江总督曾国藩以教士办理育婴堂易招流言，请总理衙门及各公使商议禁止。○12月，四川酉阳法籍教士李国安与教徒四十一人被杀。○12月27日，由马国贤创立于1731年的拿波里圣家书院（亦称文华书院）被意大利政府没收，当年留学该院的中国修士河南时炳文、湖南唐福元及袁永隆三人，遂转入传信部大学。○拯亡女修会（Société des Auxilatrices des Ames du Purgatoire）抵上海传教。



曾国藩像

那不勒斯圣家书院留学生略历统计表

(以出国先后为序,那不勒斯学生多以抵欧洲入学之年为出国年)

	姓名	字号	籍贯	生年	出国年	求学地	回国年	卒年	卒地
1	郑玛诺	惟信	广东澳门	1635	1650	罗马	1671	1673	北平
	沈福宗		江苏		1680	里斯本、罗马	1694		
3	樊守义	利如	山西平阳	1682	1700	都灵、罗马、里斯本	1709	1753	
4	谷文耀	若翰	古北口	1701	1724	那不勒斯	1734	1763	北平
5	殷若望		河北固安	1705	同上	同上	1734	1735	湘潭
6	黄巴桐		河北固安	1712	同上	同上	1760	1776	
7	吴露爵		江苏金山	1713	同上	同上		1763	罗马
8	Gab Belisario		菲律宾	1713	1736	同上		1738	那不勒斯
9	赵多明		四川成都	1717	1738	同上	1751	1754	常德
10	赵西满		湖北江陵	1722	同上	同上		1778	巴东溪沙河
11	李若瑟		广东顺德	1717	1739	同上	1755	1776	
12	郭元性		陕西渭南	1728	同上	同上	1751	1778	
13	蔡文安		福建龙溪	1720	同上	同上	1751	1782	广东
14	刘必约		四川重庆	1718	同上	同上	1755	1785	山东
15	刘成仁		四川铜梁	1718	同上	同上	1755	1785	流徙伊犁
16	康 (译音)			1728	1740	巴黎	1750	1750	
17	刘汉良		河北		同上	同上	1750		
18	蓝方济		河北		同上	同上	1753	1796	
19	陶 (译音)				同上	同上	1753		
20	曹貌禄		广东		同上	同上	1753		
21	张月旺		广东始兴	1712	1750	那不勒斯	1761	1782	广东
22	杨德望		河北	1733	1751	巴黎、里昂	1765	1798	
23	高类思			1733	同上	同上	1766	1780	
24	萧安多		湖北松滋	1735	1754	那不勒斯	1764	1766	澳门
25	刘道路			1726		同上	1758	1796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生年	出国年	求学地	回国年	卒年	卒地
26	吴伯铎		广东广州	1738	1754	同上		1763	那不勒斯
27	曾清贵	信德	陕西临潼	1740	同上	同上	1767		
28	马功撤		广东香山	1740	同上	同上	1769	1796	北平狱中
29	戴金冠	则明	广东惠来	1735	1756	同上	1761		
30	严雅谷		福建龙溪	1736	同上	同上		1762	那不勒斯
31	戴德冠	则仁	广东惠来	1737	同上	同上	1764	1785	广东
32	刘嘉祿		陕西城固	1742	同上	同上	1771	1820	
33	黄多玛		广东潮州	1741	同上	同上	1771	1772	Gadibus
34	蔡若祥		福建龙溪	1739	1761	同上	1767		卧亚
35	艾亚柯		湖北谷城	1741	同上	同上	1765	1765	Gadibus
36	常纳巴		湖北襄阳	1741	同上	同上	1767	1797	
37	王加祿		广东潮州	1739	同上	同上	1766		
38	郭儒旺		山西壶关	1743	1766	同上	1775	1817	
39	刘明莪		陕西临潼	1747	同上	同上	1774	1828	
40	郭雅歌		山西壶关	1747	同上	同上	1775	1779	
41	章儒瑟		广东潮州	1742	1770	同上	1774	1778	
42	王儒翰		陕西渭南	1748	同上	同上		1771	那不勒斯
43	刘恺弟		湖南沅江	1752	同上	同上	1775	1785	
44	殷玛玕		四川铜梁	1753	同上	同上		1774	那不勒斯
45	王正礼		陕西盩厔	1754	同上	同上	1773	1819	
46	徐格达	适之	甘肃张掖	1748	1773	同上	1778	1801	流徙伊犁
47	陈廷玉		同上	1752	同上	同上	1783	1829	
48	李汝林		河北涿县	1754	同上	同上	1783	1802	广东
49	范天成	之仁	河北景县	1755	同上	同上	1783	1828	
50	柯宗孝		河北	1758	同上	同上	1792	1825	
51	贺明玉	文琳	四川巫山	1759	同上	同上	1785	1827	
52	王英		陕西渭南	1759	同上	同上	1792	1843	汉中
53	李自标		甘肃武威	1760	同上	同上	1792	1828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生年	出国年	求学地	回国年	卒年	卒地
54	严宽仁		福建龙溪	1757	1777	同上	1792	1794	天门七屋垵
55	韩芳济		山西		1785	同上		1829	那不勒斯
56	张玛谷		广东始兴	1761	1789	同上	1802	1829	江西
57	斐如汉		山东济南	1770	同上	同上		1804	那不勒斯
58	朱万禾	寿官	山西祁县	1770	同上	同上		1812	同上
59	王保禄		山西太原	1770	同上	同上	1802	1843	太原
60	潘如雪		北平	1773	同上	同上		1847	那不勒斯
61	戴勿略		广东惠来	1772	同上	同上		1832	同上
62	潘路加		广东乐昌	1772	1795	同上	1817		
63	严甘霖		福建龙溪	1774	同上	同上	1823	1832	武昌洪山
64	钟理珍		广东广州	1783	1802	同上	1826	1851	香港
65	汪振亭		同上	1784	同上	同上	1823	1867	武昌洪山
66	唐多尼		同上	1785	同上	同上	1823	1830	天门七屋垵
67	谢斯德		同上	1786	同上	同上		1806	那不勒斯
68	余恒德		陕西城固	1795	1821	同上	1831	1854	
69	陈良		山西长治	1805	同上	同上	1831		
70	张保禄		山西太原	1804	同上	同上	1831	1861	
71	王多禄		山西长治	1804	同上	同上		1829	那不勒斯
72	郭约安		山西阳曲	1805	1824	同上	1834	1884	阳曲圪料沟
73	王梯达		山西文水	1805	同上	同上	1834		
74	李(陈)	若瑟	湖北沔阳	1805	1828	巴黎	1832	1855?	
75	邱(方)	安之	广东	1808	同上	同上	1831	1874	
76	赵某		湖北枣阳	1810	同上	同上	1831	1869	北平
77	吕某		江西清江	1802	同上	同上	1831	1858	南城
78	谭某		广东	1808	同上	同上	1831	1857	泰和
79	田广益		山西长治	1809	同上	那不勒斯	1839	1885	衡阳
80	任万有		山西太原	1810	同上	同上	1839	1852	沔阳杨义湾
81	唐永贵		甘肃皋兰	1810	同上	同上	1839	1861	谷城茶园沟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生年	出国年	求学地	回国年	卒年	卒地
82	刘安得		山西太原	1811	同上	同上	1831		
83	张蕴华		甘肃武威	1810	1832	同上	1850	1864	上海
84	阎玉亭		山西榆次	1811	同上	同上	1850	1871	武昌洪山
85	沈静渔	光辉	湖北天门	1816	1834	同上	1850		同上
86	罗振铨		湖南衡阳	1820	同上	同上	1849		湖南
87	梁 (译音)		广东		1836	罗马			
88	胡 (译音)		湖北		同上	同上			
89	王乐瑟		山西太原		1840	那不勒斯	1852		
90	罗振钊		湖南衡阳	1823	同上	同上	1852		湖南
91	罗振锐		河南	1820	1843	同上		1874	
92	罗达理		河南	1823	同上	同上		1890	
93	张天义		湖北谷城	1826	同上	同上	1853	1895	老河口
94	李乾元		山西	1820	同上	罗马			
95	连 (译者)		山西	1822	同上	同上			
96	刘廷贵		山西	1824	同上	同上			
97	唐逢泰	景山	江苏奉贤	1832	1849	那不勒斯	1858	1893	天门岳口
98	张懋德		江苏松江	1834	同上	同上	1858		
99	陆乐默	霞山	江苏昆山	1827	1850	同上	1858	1876	武昌洪山
100	黄廷彰	琴溪	江苏海门		1854	同上	1864	1876	上海
101	沈明达	文忠	同上		同上	同上	1861		
102	韩长生					同上		1854	新加坡
103	李毓如		江苏南汇	1837	1855	同上	1858		
104	沈顺坤		江苏海门	1838	同上	同上	1868		
105	钱淦	馥洲	江苏南汇	1840	同上	同上	1868	1912	荆州寸金陵

1868年(同治七年)

385

(续表)

	姓名	字号	籍贯	生年	出国年	求学地	回国年	卒年	卒地
106	高西孟		江苏上海	1840	同上	同上	1866	1868	上海
107	郭俊堂		湖南衡阳	1837	1856	罗马			
108	涂知松		湖北沔阳	1839		同上			
109	王佐才	化南	湖北应城	1842	1861	那不勒斯	1891		
110	郭栋臣	松柏	湖北潜江	1846	同上	同上	1873	1923	汉口
111	吴承烈	必发	湖北天门	1848	同上	同上	1873	1880	武昌洪山
112	张懋功		湖北郢西		同上	同上	1866	1887	谷城茶园沟
113	范祖大	春圃	湖北武昌		同上	同上		1867	那不勒斯
114	邓文道		湖北沔阳		1865	同上	1874	1911	武昌
115	张定养		广东新安		1871	同上			
116	邓国太		广东新会		同上	同上			
117	潘上登		广东南海		同上	同上			
118	罗禧仔		广东番禺		同上	同上			
119	卢成带	立棠	广东南海		同上	同上	1884		
120	邓文爽		湖北沔阳		1876	同上	1884		
121	张连三	逸亭	江苏松江		同上	同上			
122	王永振		河北宛平	1865	同上	同上			
123	陆秉仁		南京		同上	同上		1886	那不勒斯
124	陈国章	锡畴	湖北沔阳	1863	1886	同上	1892	1915	武昌小龟山
125	高作霖	云程	湖北天门	1866	同上	同上	1892		
126	周昌琅		湖北江陵	1866	同上	同上	1893	1901	宜昌
127	钟思德		湖北郢西	1864	同上	同上	1892	1904	老河口
128	张道发	睦多	同上	1867	同上	同上	1891	1892	同上
129	时炳文	慎修	河南镇平	1867	同上	同上	1894		
130	唐轮光		湖南湘潭	1865	1887	同上	1893	1898	衡阳
131	袁永隆		同上	1868	同上	同上	1891	1898	衡阳

(以上同治前出国者凡一百一十三人。最后十八人,系同治后出国者,因同为那不勒斯留学生,与以前诸人关系甚深,且此辈事迹,亦为近人治留学史者所不知,故附见于此)

[方豪编:《同治前赴欧留学生略历统计表》,其中大多数毕业于那不勒斯“圣家书院”,见《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印,1948年]

1869年(同治八年)

2月13日,醇郡王上奏复修约,主张焚毁教堂,诛灭天主教。○3月21日,法国公使罗淑亚以西阳州又起教案,提出惩办犯人等四款。○3月25日,酉阳纸房溪华籍教士覃辅臣,纠集教民攻杀平民十八人,烧毁民房十余间。4月13日,覃辅巨又纠集教民再度攻杀平民百余人(数月间民教互相攻杀多次,计民团死亡一千四百八十七人,教民死伤四百三十七人)。12月9日,李鸿章抵重庆查办酉阳教案,川东新主教梅西满“任意要挟”,官府以杀民众何彩,教民王学鼎,办乡绅张佩超,赔银三万两(一说一万八千两)结案。○5月,广平府久旱无雨,“四乡人民进城赴庙求雨,行抵该处,咸以天主教不奉神明,以致上千天和,祈祷无灵,时武生魏长庆遂携锯上房,将十字架锯毁,乡民亦哄然进堂,将家俱等物砸毁。”○6月14日,贵州遵义因绅民在炎帝庙打醮求神驱逐疾病,与教民发生冲突,竟至聚众数千人,将新老城中天主堂及附设学堂医馆,悉行捣毁,教民被杀二十余人,法司铎一人受伤而死,是为遵义教案。○年初,法国天主教教士韩石贞(Pierre Hende)与英国内地会教士密道生、卫养生抵安庆,购地建堂。6、7月间,湖南反教揭帖传到安庆,时值府院考试,各地文武考生云集安庆,在揭帖号召下,反教情绪激昂。10月,考场附近贴出揭帖,约期击毁教堂。11月3日,英教士密道生、卫养生乘轿往府署,要求查办,考生和民众起而拦阻,并捣毁东、西右坊教士住所,密、卫二人避入府中,韩石贞逃往上海。英使阿礼国、法使罗淑亚向总署交涉,清政府派员至安庆,拨城内官地及仓廩为教会堂基,赔偿四千银两,惩办肇事者。是为安庆教案。

○圣衣会修女来华，居住在徐家汇。○4月25日，纪肋明主教（Mgr. Guillemin）在广东上川岛建成两座教堂，一座在沙勿略墓上。○11月26日，美国新教长老会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 Martin）牧师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学校为其举行就职礼，总理衙门官员和美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卫三畏前往参加。○那不勒斯圣家书院出版中国籍郭栋臣神父所译之拉丁文《三字经》。○12月8日，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在罗马梵蒂冈召开，参加会议有七百四十四名主教、代牧和修会负责人，其中欧洲代表五百人，其余来自亚非传教区的代表。中国传教区的负责人（绝大多数是欧洲籍）均前往参加。传信部部长巴尔纳博（Barnabo）枢机乘此机会，将中国的代牧主教召集于传信部官邸，举行多次会议商讨中国教务。12月24日，传信部通令中国各教区主教对是否要建立圣统制发表意见，结果争论十分激烈，赞成与反对者参半。

1870年（同治九年）

3月，米兰外方传教会三位神父抵达河南老河口，开始了老河口代牧区的传教工作。○“天津教案”爆发。6月20日，天津民众因官府捕拿的拐犯供认与教堂有关，又因5月以来三四十名孤儿院孩童因瘟疫死亡而被埋葬，怀疑教堂与此事有关，因而包围望海楼天主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拜访法领事及谢福音神父，达成检查教堂协议。6月21日，民众围教堂，天津法领事丰大业（H. V. Fontanier）闻讯，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因崇厚只派去几名官兵，丰大业直奔崇厚衙门，咆哮公堂，并向崇厚开枪恫吓，捣毁衙署器物，出衙署后，丰大业遇天津知县刘杰，又开枪打死刘杰随从高升，民众怒不可遏，当场殴毙丰大业及秘书西蒙（Simon），法国领事馆、天津望海楼天主堂以及英美讲书堂被焚，法人死者十七，俄人三，比人二，英意各一人，是为震惊中外之天津教案。22日，俄、西、英、法、美、德、比、日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29日，法国兵舰抵达大沽，鸣炮示威。7月4日，曾国藩由保定前往天津办理此案。14日，曾国藩咨复总



天津望海楼天主堂

理衙门,力辩天主堂挖眼剖心之诬,并力主避战求和。曾国藩在审讯人犯及亲赴教堂调查以后对津案提出三点质疑:(一)武兰珍(拐犯)供词时供时翻,且原籍在天津,与所供晋宁不符;(二)教堂有男女一百五十余名,由各自家庭送来养育,非迷拐而来;(三)亲自询问拦舆递禀的数百名百姓,所谓教堂挖眼剖心之说,并无一人亲眼所见。曾国藩分析一般士民对教堂怀疑心理的来由:(一)教堂大门终年关闭,过于神秘,社会上都以为里面的地窖是“幽闭幼孩”。但事后勘察地窖是为了“隔去潮湿,度置煤炭”。(二)去教堂治病某人,因信教不肯回家,外界怀疑教堂给人吃迷药。(三)教堂收养无依无靠之子女,甚至“贫病将死”之人,不明何故。(四)教堂中庭院错落,甚至母子亦居异处,有乖人情。“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曾国藩在奏章中写道:“天主堂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

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但是，曾国藩认为，外国传教士在条约保护之下肆意妄为，引起民众反感，是引发教案的重要原因：“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吃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20日，法公使罗淑亚照会曾国藩，语气凶悍。26日，曾国藩病重，力奏以中国目前之力，实难遽起兵端，力主避战求和。8月29日，上谕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10月5日，李鸿章公布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天津知府刘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滋事人十五人正法，二十一人军流。以后又有五人正法，四人发配。12日，赔偿法国损失金额二十一万两，抚恤金二十五万两（内包括英比人恤银），又赔偿俄人恤银三万两。○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继续开会。7月，通过载有教宗“永无谬误”条款的《永恒牧人》宪章。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大会仓促结束。10月，宣布无限期休会。7月14日，在传信部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教区绝大多数外籍代牧都反对在中国建立圣统制，也反对派驻宗座代表常驻北京。这些代牧对中国教会的本地化也表示悲观，他们不相信中国籍神职人员能够很好地管理中国教务，并请传信部上级不要过分夸大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才具。关于保教权，有些代牧认为应在1860年《北京条约》换约时，向清政府要求新的权利。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竟带头起草了一份中国代牧主教致法皇拿破仑三世的请愿书，感谢法国对远东教区的所谓“保护”。那时，中国的代牧主教共三十一位，其中十六名为法国人。○马相伯通过耶稣会通考，成绩特优，并祝圣为司铎。开始在安徽宁国和江苏徐州传教出散家财，抚恤百姓，教会以违规禁止。○据统计，当年全国教徒为三十六万九千四百十一人。

直隶总督曾国藩奏复目前病情并拟赴津办理教案折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九日（1870年6月27日）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侯臣曾国藩跪奏，为钦奉谕旨，
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军机大臣密寄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查各省打毁教堂之案层见迭出，而殴毙领事洋官，则为从来未有之事。此次法国领事丰大业以激犯众怒，群殴毙命，案情较为重大。外国于各省教案稍为轆轳者，往往挟制多端，如七年扬州、台湾之案，该国均派兵船前往；八年贵州、四川之案，亦带兵船溯江上驶。闻该公使回京之时，颇以携带兵船为得计。此次领事伤毙，该使尤为忿恚，其由香港、上海等处调派兵船来津，乃意中之事。惟该使将调兵船必先与总理衙门商论及之，如总理衙门多方劝阻，令其不调兵船自为上策。如不能先事阻止，则臣等在津亦必无能阻之势，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彼即调派兵船，不过虚疑恫吓之举，无所容其疑惧。现闻罗淑亚声称，此案必需请示本国君主，固系张大其事，推波助澜之词。然此等重案，该使未曾经历，其言不敢自主，或亦实情。总之或调派兵船，或请示国主，计皆展转需时，非一两月间所能速了。目下二者未露端倪，如何办结之法未暇骤行议及。惟此案起衅之由，系因匪徒迷拐人口，牵涉教堂。昨据天津镇道来牒，武兰珍所供之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武兰珍是否果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抑系确有证据。此两者为案中最要之关键，审虚则洋人理直，审实则洋人理曲。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牒亦须浑舍出之。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若其曲不在洋人，则津民为首滋事者尤须严查究惩，推求所以激变之由，不能不从此两层悉心研鞠，力求平允，以服中外之心。至传教、习教之人伤毙若干，中国、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者若干，皆须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皆系目前要务，想通商大臣崇厚必能妥为料理。谕旨飭臣前往，仍谆谆垂询臣病。臣之目疾系属根本之病，将来必须开缺调理，不敢以病躯久居要职。至眩晕新得之症，现已十愈其八。惟脾

胃亏弱，饮食减少，月余以来在署登阶降阶需人扶掖，因医者言，眩晕之症，恐一跌辄半身不遂也。此等重要案件，臣不敢因病推诿，略加调理，练习行走，数日内稍可支持，即当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商办。其刻下急宜查讯各事，仍一面先派候补道员博多宏武陈重迅速赴津，会同天津道府详讯办理。法国之在津者丰领事、谢教士既已殴毙，尚无主持之人，各道府趁此时查讯衅端，当易就绪。至该公使将来如何举动，是否调派兵船，臣等随时请旨遵行。所有微臣奉旨飭赴天津缘由，谨缮密折复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清末教案》（一），第783~785页〕

直隶总督曾国藩等奏为查明天津教案滋事情形折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三日（1870年7月21日）

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侯臣曾国藩，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臣崇厚跪奏，为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国藩于六月初九日静海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初八日奉上谕：曾国藩奏起程赴津筹办情形一折……钦此（上谕内容见前，此处从略——编者）。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愤，激成大变。必须确查虚实，乃能分别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国藩抵津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与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又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原供在晋宁者不符，亦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

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中国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之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其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猝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

之故矣。

今既查明根原，惟有仰恳皇上，明降谕旨，通飭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并请将津人致疑之端宣示一二。天津风气刚劲，人多好义，其仅止随声附和者尚不失为义愤所激，自当一切置之不问。其行凶首要各犯及乘机抢夺之徒，自当捕拿严惩，以儆将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惟当时非有倡首之人，预为纠集，正凶本无主名。津郡人心至今未靖，向来有曰混星子者结党成群，好乱乐祸，必须佐以兵力，乃足以资弹压。顷将保定铭军三千人调扎静海，此军系记名臬司丁寿昌统带。该员现署天津道缺，一俟民气稍定，即以缉凶事件委之该署道督同府县办理，当可胜任。至武兰珍犯供既已牵涉教堂，经臣崇厚飭令地方官赴堂查验，实为解释众疑起见。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谣，亦即如此办理。其后丰大业等之死，教堂公馆之焚，变起仓猝，非复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酿成如此巨案，究系官府不能导化于平时，不能预防于先事，现已将道府县三员均行撤任，听候查办，由臣国藩拣员署理。同日另片具奏其杀毙人口，现经确查姓名实数，惟仁慈堂尚有女尸五具，未经寻获，其余均妥为棺殓，交英国领事官李蔚海收存。俄国三人，已由该国领事官孔气验明掩埋。谨开列清单，恭呈御览。法国公使罗淑亚业经到津，议及赔修教堂事宜，臣等拟即派员经理。余俟议有端绪，续行陈奏。其误毙俄国之人命、误毁英美两国之讲堂，亦俟议结，另行具奏。所有查明大概情形，谨具折先行会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清末教案》（一），第809~811页〕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为出使法国仰恳天恩俯加训示折
同治九年十月初一日（1870年10月24日）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奏：窃本年五月三十日奉旨：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着充出使大法国钦差大

臣。钦此。当即具折恭谢天恩。旋于七月十八日，交卸来京，跪聆圣训。彼时因天津教案，尚未办结，未能即时前往。现在该处教案，业经大学士臣曾国藩查明拟结，奏奉谕旨。奴才自当即早起程，敬谨将事，宣布皇仁。所有应赍国书等件，即当祇领，恭赍前往。惟奴才赋性愚鲁，当此重任，陨越堪虞。合无仰恳天恩，俯加训示。俾得钦遵办理。

御批：知道了。

附件 清政府致法国国书

同治九年九月二十日(1870年10月14日)

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国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永敦和好。同治九年五月间，天津民人因匪徒迷拐幼孩，怀疑滋事，先后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等，前赴天津，秉公查办。又降旨令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地方官，一律随时保护。嗣经曾国藩等将办理不善之地方官，交部治罪。于刑部定议罪名时，复从重将已革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已革天津县知县刘杰，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戒。至滋事人犯，经曾国藩等先后申明情节轻重，当即正法者二十犯，问军徒者二十五犯。并令各直省地方官，晓谕居民，毋再滋事，务期贵国之人，得以相安。至天津之事，变生民间，朕与贵国和好有年，毫无芥蒂。兹特简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双眼花翎、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赴贵国，代达衷曲，以为真心和好之据。朕知崇厚干练忠诚，和平通达，办理中外事务，甚为熟悉。务望推诚相信，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谅必深为欢悦也。

〔《清末教案》(一)，第954~955页〕

1871年(同治十年)

北京总理衙门拟订管理教士章程八条，呈送各国驻华使馆。但遭到各国使节及在华天主教会和新教差会一致抵制，未果。○前南京教区署理主教罗伯济在意大利去世。○上海佘山

耶稣会会长谷振声(Corte della)开始营建佘山老堂。○马相伯任徐汇公学教务长。○广东、福建等地,流言四起,说天主教传教士散发一种“神仙粉”,服食后即得病,惟有教士有解药,但患者须先皈依基督教,各地民众愤怒,数月之内,广东东莞县城及该县所属之石龙墟、福建古田县以及所属之安洋、十八都、杉洋等处天主堂,悉被捣毁。

总理衙门所拟《传教章程》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1) 教中所立育婴堂向未报官立案,而收养幼孩,其中事难明白,因此酿疑起衅者有之,何不将外国育婴堂概行裁撤,以免物议。

(2) 各教堂内凡中国妇女概不准入堂,即外国女修士亦不准在中国传教。

(3) 传教士居住中国当从中国法律风俗,不得自立门户,尤不可有违国法官令,僭越权柄,以及坏人名节,凌辱民人,令人多疑而犯怒,……遇有教民涉讼,听凭地方官从公审断,传教士不得插手帮讼,……倘教士干预讼事,地方官将请托原稟呈督抚咨报本衙门将教士撤回本国。

(4) 中外相居密迩,用法两无所偏。

(5) 法国传教士所往何省传教,于所领执照内必将某省某府详注照内,指定在某省传教,不得暗赴他省。并注明某人收执,不准转给他人。

(6) 传教士本系劝人为善,当于收入入教之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罪之事,当收者收之,不可收者去之。应照中国所有庙宇知会地方保甲登记册内,便于查核之。

(7) 洋教士在中国,当照中国规矩,不可干名犯义,擅用关防印信于大小衙门送递照会。

(8) 嗣后教士不得任凭私意指请索还教堂,以免启衅。所有教中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当与公正原业主在该管地方呈报,……可照同治年定章注明契上系中国教民公共之产,不可伪托他人买产成交,更不得听信奸民蒙蔽私自买卖成交。

各国驻华公使在收到上述《传教章程》后立即加以全部拒

绝，“各国皆置之不理此章程”，“此件到欧洲各国政府不甚嘉纳，意谓中间所指教士劣迹无据非真，且谓总署所见得一失二，偏而不该。

传教士则更加反对，天主教主教雷蒙声言这些章程条款是“闻所未闻”，基督教传教士杨格非认为“这些要求是要打击在华基督教差会的根基，如果答应的话，就要关闭在中国的每一座教会、教堂和学校”。

〔李刚已：《教务纪略》第3卷下，第4~12页、第14~15页；《教务杂志》1871年4月，第149页〕

1872年(同治十一年)

8月，江南教区的耶稣会士在郎怀仁主教的主持之下，在上海徐家汇召开会议，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准备开展科学和文化传教工作。同年，徐家汇天文台创设。○北京创立若瑟女修会。○同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中国有五名主教、七十二名欧洲传教士，六十九名本地司铎，七座修院和学院，三百十四所学校及二十一所孤儿院。

与会耶稣会士认为：“忆及过去老天文台曾为中华帝国的宣传福音事业起过很大的作用，立过很大的功勋，激励人们希望利用科学来传教，以便引起中国学者的尊敬与信任，引导他们归向耶稣基督；……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来愈显天主的光荣，拯救人们的灵魂，为宗教事业服务，这是创办科学机构的真正目的。”早在19世纪60年代，郎怀仁主教就决定创办一个科学机构，1872年8月，在郎怀仁主教的主持之下，耶稣会士们在徐家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他们成立了“江南科学委员会”，将其工作划分为四个部分：(一)在徐家汇建立一所“与耶稣会相称”的天文台，将气象记录和观测所得编成杂志，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二)在韩伯禄(P. Heude)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所收集的标本材料，以此为中心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并将记录和论文整理出版；(三)在费赖之(Aloysius Pfister, 1833~1889)神父指导之下研究中



徐家汇天文台

国史地,其中包括江南传教区的历史情况,收集整理老传教士的传记和信件,重印教区常年报告书,确定绘制江南教区的详细地图;(四)用中文出版一本讲科学和护教的杂志。徐家汇耶稣会科学工作的中心是建立天文台和博物院。

徐家汇天文台创设于1872年,其创立者是刘德耀(Henri Le Lee)神父和高龙倍(Auguste Colombel)神父,他们都来自法国斯通赫斯特天文台,并从欧洲带来仪器观测天象。初建之时,天文台只有三厅,西厅分两间为神父卧室,中厅加一层平面屋顶,仪器只有从罗马寄来一架气象记录仪,几支寒暑表和气压表,高神父自制了一架简单实用的测风车。

但到了后来,天文台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任正式任命的台长是能恩斯(Marc Dochevrens),他到任以后立即添买了地磁记录仪,从事学术的研究。在以后几任台长:蔡尚质(Stanislas Chevallier)、劳积勋(Froc)和龙相齐(Cherzi)的主持之下,日渐扩大,到了20世纪共设有六个部,分设于上海徐家

汇及佘山两处。此六部为(一)天文研究部,设佘山;(二)地磁研究部,也设于佘山;(三)大气物理研究部,一处设佘山,一处设徐家汇;(四)地震研究部,设于徐家汇;(五)标准时刻部,设于徐家汇;(六)气象研究部,设于徐家汇。

[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05~206页;陈岳生:《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概况》,《科学世界》第16卷1期(1946年),第19~20页]

1873年(同治十二年)

同治皇帝成年,大婚并且亲政。○1月,河南副主教安西满(Simeon Volonteri)向总理衙门提出条陈,要求归还已改为浙江会馆的南阳旧天主堂。5月,开封绅民驱走寓居宝兴斋之安西满,并打毁该店铺。○7月19日,四川黔江县绅民殴毙法籍司铎余克林与华籍教士戴明卿。

1874年(同治十三年)

上海圣芳济学校创立。○江苏海门天主教会收养婴孩达三千多名。○同治帝驾崩。○9月24日,传信部开会讨论,拟分中国代牧区为五大区,预备日后设立教省,由传信部征询当时正在罗马的香港代牧意见。○香港监牧区升为代牧区,高神父任首任代牧,11月祝圣。○4月,圣母圣心会士德玉明(Fr. Alfons Devos)和费尔林敦(Remi Verlinden)来到内蒙南部鄂尔多斯的城川开教,随后又有司福音(Jan-Baptist Steenickers)、桂德贞(Edward Cuissart)前来相助。他们学习蒙古语言文字,并将天主教教义译成蒙文,并开办学校,还进行公益及生产活动。

1875年(德宗光绪元年)

四川南充刘多默司铎外出,教堂被毁。○包西欧主顾会修女来到沈阳。○四川营山发生教案,官府以赔偿二万八千银两了结。○广西教区成立,委托巴黎外方传教会管辖。

1876年(光绪二年)

2月,英国新教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创立《格致汇编》,这是晚清最早的一份科普杂志。4月,两江总督沈葆楨、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具奏,清廷授傅兰雅三品衔,林乐知五品衔,以表彰他们在译介西学方面的贡献。○安徽与江苏交界处的宁国府因剪辮谣言而起教案,教堂被毁,黄方济(廷彰)神父于7月13日被杀。8月16日,两江总督沈葆楨将肇事者何渚等人拘押江宁府监狱。四川江北厅及邻水民教冲突,教民及民众各死二十余人,教民二百余家房屋被毁,两起教案共赔款五万二千银两。○马相伯出耶稣会,入山东藩司余紫垣幕。

1877年(光绪三年)

直隶、山西、河南大旱,教会从事赈济事业。○广西西林绅民阻挠传教。○香港创办第一份天主教报章 *The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雷鸣远神父于8月19日生于比利时刚城,洗名味增爵。

1878年(光绪四年)

11月27日,郎怀仁主教在上海去世。12月,罗马教廷任命助理主教倪怀纶(Valentinus Gamier)为继任的宗座代牧主教。○甘肃成立代牧区。

1879年(光绪五年)

奥斯定会士重来中国(湖南)。○6月25日,罗马教廷传信部颁发部令,划分中国为六大区:第一区,直隶、满洲、蒙古;第二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第三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第四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澳门;第六区,广东、广西、福建、香港。传信部同时训令各区主教于部令颁布一年以后,举行区会议,但直到1880年,六大区主教才分别举行会议。○常德、吉安分别为代牧区。○德国圣言会传教士来华,驻山东兖州,当时圣言会在中国的教务由传教士安治泰(Jean Baptiste

Anzer)负责。○上海耶稣会中国籍神父李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天主教报纸《益闻录》。○基督新教圣公会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将此已经设立的培雅、度恩两校合并,成立约翰书院,后来发展成为圣约翰大学。

李枋原名浩然,字问渔。1840年8月12日出生于浦东唐墓桥附近的西李家。1852年入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受教于晁德荏校长。1862年5月29日,李问渔和马相伯等入耶稣会。1869年他们同时祝圣为神父。1871年以后,先后在松江、南汇、青浦和安徽传教。1875年到小修院教习中文。1879年创办《益闻录》,以后一直在徐家汇办报,译著宗教书籍。上海第一份报纸是1868年新教林乐知牧师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为《万国公报》),第二份是1872年创办的《申报》。《益闻录》是上海第三家报纸。李问渔于1906年兼任震旦学院院长,同时教授哲学。以后又在南洋公学教授哲学和伦理学。一生著述达六十余种,最著名者有《理窟》、《哲学提纲》、《续理窟》、《新经释义》、《客问录存》、《拳祸记》及《天演论驳义》等。并辑有《徐文定公集》、《墨并集》等。

1880年(光绪六年)

河北老河口创立圣方济各第三修女会,正定创立圣若瑟修女会。

1881年(光绪七年)

巴塘梅玉林司铎前往盐井,在三岩被杀。○国际地理学会在威尼斯为和德里建立铜像,以示纪念和崇敬。○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赖神父(Jean Marie Delavay)由广东调往云南,他以研究中国植物著名。

1882年(光绪八年)

山东兖州成为代牧区。○河南卫辉成为代牧区。○德国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得到方济各会的允许,来到山东南部地区传

教。○6月,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贡罗斯(Louis Dominique Conraux)在黑龙江呼兰县强买郭定恒土地修建教堂。郭氏向官府控诉,贡罗斯恃强不允。清副都统博栋阿与贡罗斯会谈,争执中贡罗斯竟开枪打死都统署官员一名,并诬“旗兵滋事”,清政府反赔三千银两,是为“呼兰教案”。○黄伯禄所撰《函牍举隅》出版,该书将传教士和官吏间往返公牍,编纂成书,其中多为江南(包括安徽、江苏两省)教区各堂之函稿,以供全国各教堂参考,此书不出售,亦不赠送。大部分函件与教案有关,为研究咸、同年间教案的重要资料。

1883年(光绪九年)

苦难会(Trappists)西格尔(Seignal)修道院院长率传教士来到河北杨家坪山区,建立苦难会修道院。○云南浪穹县发生民教冲突,张若望司铎及众教民被杀。○热河、绥远、厦门成为代牧区。○中国籍黄伯禄司铎撰《正教奉褒》二册出版,将道光六年(1826)以前,历代教会及教士获得之各方表扬文字,汇为一册,末附《教士姓名华洋合璧》,配以拉丁文和中文对照。○法籍耶稣会司铎蔡尚质(Stanislas Chevalier)来华,在上海徐家汇天文台工作,后任佘山天文台台长及徐家汇天文台台长等职。

1884年(光绪十年)

中法在安南发生冲突,意大利驻华公使卢伽(de Luca)赴汉口,将三十六份意大利文证书分发给意籍教士,返回上海以后,于11月1日将此事通知总理衙门。○是年,内蒙代牧区共有三十七位圣母圣心会会士,九位中国籍神父,同年5月8日,巴主教(J. Bad)获传信部批准,将代牧区划分为三:他自任蒙古中区代牧,又祝圣两位神父,分别任蒙古西南区(宁夏、绥远)和蒙古东区(赤峰、热河)的代牧。

1885年(光绪十一年)

中法因安南问题爆发战争。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因顾及

中法开战而牵累受法国保教权庇护的传教士，于2月1日致信光绪皇帝，感谢清帝保护传教士，并申明在华各国的传教士，无论哪个国籍，俱系罗马教廷所派，其传教任务是教宗委任的。同时，教宗亦表示，传教士应该服从所在国法律，敬重所在国国主。此信由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久里亚耐里(Francesco Giulaireli)带来中国。久神父抵京后，往谒北京主教达里布(Mgr. Franciscus Tagliabue 又名戴济世)请他转呈总理衙门，但达里布竟拒不受理。久里耐亚里只得通过英国驻华使节呈送。总理衙门在接到教宗信函以后第三天复函。○11月7日，李鸿章派天津海关税务司英人敦约翰(John George Dunn)前往罗马，向教廷交涉迁移蚕池口教案并拟与罗马直接互派外交使节事。敦约翰是爱尔兰人氏，信奉天主教。他准备先到英国伦敦，再由英国枢机马宁(Card. Manning)的引荐，前往罗马教廷。在此之前，李鸿章已另请驻英公使曾纪泽遣驻英使馆洋员马加尼(George Earl of Macartney)往见英国总主教马宁枢机，请他代转清朝愿与教廷通使的意愿。因此，在8月14日，马宁已经致函教廷国务卿雅各彼尼枢机(Card. Jacobini)转达中国的建议，并请加以善意的考虑。○是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罗神父(Fr. J. J. Rousseille)等人在香港创办纳匝肋印书馆。○罗马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院教士初次来中国陕西汉中。

教宗良十三世致光绪皇帝信节录如下：

大清皇帝陛下：

由于近期贵国一些地区出现了战争，我们不得不做出一切努力，赢得皇帝陛下的同情和宽恕，以避免战乱给天主教带来不幸。我们正在履行我们应尽的职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应该尽最大努力保护天主教。我们的先驱曾不止一次地为保护欧洲传教士和教民恳求过皇帝陛下的先辈，我们现在也在这么做。

使我们感到极大安慰的是，即便在这种非常时期，您也为教徒做了许许多多的事，从而证实了您的善意。其实，在战乱出现的初期，陛下就曾降谕，要尊重教徒，不得伤害法国传

教士。

皇帝陛下，在这方面，传教士无不感激您的公正和仁慈，何况在繁荣昌盛的中华帝国居住并传播福音的教士都是受罗马教宗委派的，教宗付于他们使命、重托和一切权力。这些人不是从一个国家招募的……这完全符合基督教的性质，因为基督教不是某一民族的宗教，而是所有人的宗教；基督教不分国籍和种族，通过博爱，把全人类联合起来。

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人，他们的事业是非常有益的，对国家、政府也是同样有益的。他们不应该过问政治，而应专心宣教和捍卫耶稣基督的教义。基督教的基本戒律之一就是敬畏天主，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彻底地、真诚地主持正义。因此，他们也应该服从法官，敬重国主。当然，这种敬重不应该是因为害怕触怒国主，而是要发自内心尊重。从劝人为善和维护治安的角度看，具备上述美德是最好的办法。

其实，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强盛的中华帝国履行使徒的职责，根本没有给官府和百姓招惹任何麻烦，相反地，任何人都可以证明他们帮了许许多多忙。他们最初到中国，是宣传基督教的精神，接着便是传播文化艺术，即西方的文明。既然现在这些人也是本着同一想法和愿望，从基督教教义方面入手，对中国人进行教化，您就不必怀疑他们是否始终情愿和忠实地顺从陛下了。

大皇帝陛下，一系列事实证明，您对他们是非常仁慈的。我们向您表示万分感谢。同时，在目前局势下，我们恳请皇帝陛下大发慈悲，关怀和保护这些传教士，使他们免遭不幸，并能在陛下的支持下，充分享受履行职责的自由……

〔原信为拉丁文，发表在1885年3月23日的 *Osservatore Romano*（《罗马观察家报》）上，法文译文在1885年4月3日于《公教教务杂志》上发表。转引自卫青心：《法国对华的传教政策》〕

据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件，他此次派使出访罗马，其目的在于以中国与教廷建交来否定法国在华的保教权：

“至与教王商办教案，彼此派使互驻一节，亦系欧洲通行之例，藉可潜移奉教各国抱揽挟制之权。……教王兵饷两缺，断不能因教案兴戎，近日明白洋务时局者，多持此论。”

另外，李鸿章与敦约翰有如下的问答：

李：“尔见罗马教王及教王外部商议，日后遇传教案件，中国与其商办，不由法国经理可乎？”

敦：“如中国果有此意，罗马教王无有不悦之理。近闻各处天主堂教士言中国待教士可谓厚矣。然传教之案，由法国公使与总理衙门商议，屡次插入他事，藉端为题，诸多要求，实非教会所愿。若中国派一使臣常川驻扎罗马城，该教王亦可派一员驻扎京都，彼此通气，遇有教案，易于商办，可无庸由法国经管。至法国悦与不悦，其奈我何。盖从前天主教民，由法国保护者，恐国家不允设法保护耳，今中国若特再申明保护教民之意，使天下人皆知之，自无庸法国保护，万一遇有教案，由教王所派之人妥办，则法国不得过问矣。”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83～185页；《致译署遣英士敦约翰赴罗马》，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一日；《与敦约翰问答节略》，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载吴汝伦编：《李文忠公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一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

1886年(光绪十二年)

2月2日，敦约翰代表李鸿章晋见教宗，呈上李鸿章文书，一封致国务卿，另一封致教宗。教宗询问清廷意欲与教廷通使的意图，敦答以清廷愿与教廷直接商谈传教事宜，不愿意有第三国的干涉。教宗欣然允以最同情的考虑。教廷国务院枢机团于2月中旬举行会议，决定教廷派大使驻华，同时向法国声明不废除其保教权。但事实上，宗座使节抵中国以后，法国保教权将名存实亡。4月15日，教廷国务卿行文法国外交部，文件有如下要点：(1)教廷本身有独立接使和派使权，不能拒绝清政廷建议；(2)教廷感谢法国所给予在华传教士的保护；(3)教廷派使中国并不侵犯其他国家与中国所订条约；(4)教廷在没有得到法国回

复前不正式答复清政府。对此,法国表示强烈反对,5、6月间,法公使贝合尼亲往教廷,与雅各比尼争执不休,“第一,要保护各天主教会之在中国者;第二,要保护在中国之传教者;第三,要监督在华各教会事件;第四,天主教与地方衙门大小官员交涉之事,法均要管”。李鸿章电示敦约翰,“永远不承认法国为保护在华天主教会及天主教人”。对法国的立场,教廷不予理睬,8月1日,教宗正式任命阿里雅底总主教(Antonio Agliard)为宗座驻华大使,阿里雅底时任教廷国务院非常教务副国务卿,又任驻印度宗座代表。8月14日,教廷将此项任命通知法国。17日法国提出严重抗议,威胁撤回法国驻教廷使节,教宗不为所动,令阿里雅底总主教于9月25日由法国马赛起程前往中国。9月12日,法国政府向罗马教廷发出最后通牒,声明如果教廷派使驻华,法国将与教廷断交,“国中教士每年俸银五十万兆佛郎概停不发”。迫于强大的压力,教宗决定驻华使节改期赴任,所谓改期,实为“无期”。○4月30日,敦约翰往见意大利外交部长,未遇,外交部头等秘书葛洛比阿惟伯爵接见了。葛氏请敦约翰转告李鸿章:(1)意大利传教士今后不再受法国保护;(2)意大利愿意见到中国,与教廷建交;(3)意大利认为宗座使节的地位不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之下;(4)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可为意籍教士申请到内地去的护照;(5)如中国朝廷命各国教士向本国申请领护照,意大利会予以协助;(6)意大利感谢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对意大利教士的保护。可见意大利排斥法国保教权的意图十分明显。○5月29日,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奉李鸿章命与天津副主教樊国樑(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商订迁移蚕池口教堂(从西安门内蚕池口移至西什库)合同。蚕池口教堂又名北堂,原为康熙皇帝赐给耶稣会,1703年建成。耶稣会被解散以后,传信部于1783年转交法国遣使会。1860年以后恢复宗教活动。因其地处紫禁城旁,为慈禧太后不喜,故有迁堂之议。其要点为:(一)蚕池口教堂(即北堂)教士迁出时,应保持原状,迁出日期由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五年二月初完毕;(二)在三个月内,朝廷以西什库房屋赐赠教士;(三)斥银三十五万两另建;(四)皇上颁发上谕说



樊国樑像

明北堂迁移原委，并在西什库教堂外立碑，雕刻皇谕；（五）新堂高度以五丈为限，比原堂降低三丈四尺，原堂内一切珍奇古玩，家具风琴，均留堂内，以作报效。7月，樊国樑受李鸿章之命前往罗马，交涉迁移蚕池口教堂一案。不久，教廷与中国通使事因法国的反对失败了，教廷为避免与法国再起冲突，便示意中国与法国直接交涉，因蚕池口教堂当时所居住者为法国遣使会士。12月15日，樊国樑回到北京，他建议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就议定的条件，直接展开谈判。11月27日，李鸿章正式上奏朝廷，报告此案议结经过。其搬迁以两年为期，自光绪十三年正月初一起计。嗣后，为了赶修南海宫苑，要尽早将北堂收回一并动工。李鸿章又与总理衙门会同教会商议，增补搬迁费二万两，经达里布主教画押同意，提前一年，于光绪十三年除夕以前迁让。12月21日，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将北堂迁移到西什库事，晓谕天下人民。同时奖励办理此事有功人员：北京主教达里布赏赐二品顶戴，樊国樑赏赐三品顶戴，敦约翰赏赐三品第一宝星，天津税务司德璀琳赏赐三品顶戴，法国领事赏赐二等第三宝星。○英美教会要求在重庆建堂，民众要求地方官吏禁建未果，发生民教冲突，致使三千民众焚毁城内外教堂及英领事馆。结果，民众被处死两人，赔款二十三万五千银两。○杨家坪苦修院正式成立隐修院。○方济圣母传教会修女来华。○是年，马相伯应台湾巡抚刘铭传召抵达台湾。不久，他建议李鸿章设国家银行，发纸币以资开矿，未果。○德国政府颁布《和平法令》，结束其在国内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德国圣言会安治泰在山东建立了包括曹州、兖州和沂州三府及济宁县在内的独立教区并出任主教。据记载，其“主教住宅被装扮一新，一面巨大的德国国旗高高飘扬，钟声齐鸣，人们高唱‘皇帝颂’和其他德国歌曲”。○罗马教廷与葡萄牙正式签订政教协定，葡萄牙对中国的保教权正式结束。同时教廷正式委任葡萄牙远东传教会管理马六甲的圣伯多禄堂区及新加坡圣若瑟堂区，直接隶属澳门。同年，澳门教区重建了现存的望德圣母堂。原址上的麻疯病院迁居大横琴岛及九澳。

李鸿章致译署罗马派使管教(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前派英使敦约翰赴罗马都城商议各节,业于上年十月初一日详陈在案。南海教堂择地迁移,据敦约翰罗马来电,该教皇无不遵允。是以本年四月间,经鸿章督同税司德瑾琳、北堂教士樊国樑酌议办法,由樊主教齐带所订合同条款赴罗马禀候教皇批准,又于五月初三具奉钦奉谕旨照行矣。

樊教士去后,旋接敦约翰密函,谓移堂仅教务中一事。罗马意思极愿与中国和好,因令德税司电商敦樊二人,请教皇再减让移堂银十万两或五万两,更显友谊,未知能否办到?俟有续电,再行奉闻。至罗马派使赴华专管教务一节,近年明白洋务时局者,多持此论,原以分法人藉教胁迫之权。西洋各国无不行天主教,即无国不有罗马专使;未闻归法国管辖者。仅土耳其小国,有罗马小公使,乃由法使统率,最为各国所诋笑。查咸丰十年法国和约第十三款,但指明传教请执照一层,并未载明天主教归法国管辖保护之语。厥后遇有教案,法使则攘臂而争,甚至调兵船要挟,推波助澜,气焰日张,皆由罗马无使驻华,法人得以攘窃其权,而中国不揣其本,亦复习而安之,堕入彀中而不觉也。此次罗马初议派使,法廷多方阻难,欲照土耳其办法,经敦约翰力争,罗马君臣亦有定见,始改为专使,不受他人节制,似尚名正言顺,于中国体统无伤。所有罗马外部复鸿章信,及敦约翰叠次密函,德瑾琳致敦约翰两电,谨汇钞呈览。

译敦约翰来电(光绪十二年八月十九日)

西历8月间,法庭致教皇哀的美敦书,迫令答复,辞意严厉。教皇心志来摇惑,法见不受恫吓,即弯转说项,以为教皇暂且可派钦差,教皇乃依违未应,然已派定使臣,拟于九月二十六日上船动身矣。别国暗中帮助教皇,法庭另有传言云,教皇若果派使,则法与教皇所守条约全行撤毁,国中教士每年俸银五十万兆佛郎概停不发。各教士恐绝生路,因而环求教皇,切勿遣使赴华。教皇闻之,心甚踌躇,拟设法解免此难。虽来改动初心,暂且不派公使。

北堂一事，教皇曰中国尽可自行作主，飭令迁出。与中国有约各大国均言按地主之例，可将北堂移让。教皇甚望中国善抚教人，加意保护，毋为法国有所藉口，是为至要。

[吴汝伦编：《李文忠公迁移蚕池口教堂函稿一卷》，商务印书馆 1921 年版]

1887 年(光绪十三年)

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圣心报》，为近代天主教历史最长刊物，至 1950 年停刊。第一任主编为李杕(问渔)，继任者有潘谷声、丁汝仁、王昌祉、丁宗杰等。○汉中成为代牧区。○巴黎外方传教会司铎邓明德(Paul-Felix-Angele Vial) 抵达云南省陆凉县天生关，在罗罗族人中传教。不久，移居路美邑，是为离路南县城一小时的村落，居民均为罗罗人(撒尼族)，以后他在罗罗族人中传教达三十余年。○四川大足县龙水镇天主堂被民众击毁。

1888 年(光绪十四年)

1 月，德国公使勃兰德(Von Brandt) 致信俾斯麦，建议扩大在华传教事业，并攫取保教权。同时，勃兰德亲赴总理衙门，与清政府达成关于宗教问题两项决定：(一) 凡德国政府发给在华德人(无论教士或俗人)的护照，其效力不亚于法国护照，且持照会人享受最惠国待遇；(二) 清政府对于在华德国人所持护照，如非德国当局所发者，概不签字。○西什库天主堂正式落成。○意大利政府为自己在华的传教士签发护照，行使其保教权。○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孔类思(Louis Dominique Conraux) 在呼兰因置地产被传讯，法国提出抗议。○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会(The Franciscan Mission of Mary) 在芝罘(烟台) 开教。

1889 年(光绪十五年)

11 月 10 日，遣使会士董文学由教宗良十三世列入真福品。○多明我会修女初次来到福州。○英敛之入教。马相伯为



北京西什库北堂

英敛之《万松野人言善录》作序云：“弱冠后，始得耶稣旧教之书而读之。读之既久且多，因多而疑、而问、而思、而辨，弗谦弗信，信岂句然已哉！”○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书院求学之郭栋臣神父，将《和德里游记》译成中文，题为《真福和德里传》，由武昌崇真书院刊行，并附有注释。○山西有十一名欧洲传教士、二十名中国籍神父，一万九千零六十五名信徒。

1890年(光绪十六年)

4月，沿江一带哥老会周汉等散布传言，谓教中女医迷拐幼童，民众遂起焚毁教堂，丹阳、江阴、无锡、如皋、武穴、宜昌、九江等处先后发生教案。○8月，四川大足县龙水镇法籍教士强迫知县禁止灵官庙会，余栋臣、余翠坪等率众打毁龙水镇教堂房屋，杀教民，清政府派桂天培带兵到大足“查办”，当地团练成立安民局随同清军镇压。余栋臣率众撤出龙水镇，转入西山。四川总督刘秉璋以赔偿五万两缉拿肇事者结案。○是年，俾斯麦被解职，德国国内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结束，德国政府加强了对在华德国天主教会的支持，8月，山东圣言会安治泰主教领到了德国护照，脱离了法国保教权。11月，教廷同意他们自行选择保护国。山东圣言会受德国保护。○江西省有一所修院、六所学校、五所孤儿院、四座大教堂与二十一座小教堂。○浙江省二所修院、六十四所学校、八座大教堂和二十一座小教堂。

1891年(光绪十七年)

5月，芜湖天主堂诱拐幼孩之传言流播到芜湖，10日，有天主堂两修女外出探视病人，将两名孩童带回教堂，路遇乡人，发生争执，路人将修女送保甲局和县署。法教士闻讯，亲赴县署交涉，要求释放。5月12日，一妇女到鹤儿山天主堂，要求领回寄养该堂的幼孩，一时民众聚集教堂，英国芜湖领事要求芜湖关道派兵弹压，民众愤而焚毁教堂和育婴堂，转攻英领事公署及海关，清官吏下令江中兵船开炮，驱散入群。事后，英、法、美、德、比等九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杀王光金、傅有顺二人，将芜

湖关道成章及知县王焕熙撤任调省申饬。又赔偿教堂十二万六千银两。○9月1日,湖北宜昌法国天主教圣母堂收养吴有朋送进的游姓小孩,次日,游姓亲属到天主堂索还,民众聚集堂外,并向官府报告。知县随即带兵役到堂检查,一时群情汹汹。此时,天主堂隔壁的美国圣公会中有人向民众开枪,击伤一人。激起众愤,数千人怒焚美国圣公会、法国圣母堂、天主堂,洋教士住宅,击伤法、比、意教士四人,事后,英、法、美、意、比、德、俄、日等国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英法战舰驶入武昌并放炮演习,迫于压力,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令宜昌地方官“悬赏缉凶”,最后将朱发金、赵宗雅等十余人充军或笞杖,赔英、法、美银十七万五千余两,是为“宜昌教案”。○罗马教廷开始考虑在华建立“圣统制”是否合宜,教廷国务卿郎博拉枢机(Mariano Del Tindaro Rampolla)委托兖州代牧德籍圣言会士安治泰通过李鸿章,询问清政府是否允许在北京和南京两地设立总主教区。7月26日,安治泰到天津晋见李鸿章。呈上郎博拉枢机的信,信中表示:(一)罗马方面不通知法国,将不会有所举动;(二)询问如果教廷在中国建立“圣统制”,清政府是否会原则同意?李鸿章就此征询樊国樑的意见,樊主教详细介绍了天主教中教宗、总主教、主教的职权,李鸿章认为此系纯宗教事务,故无答复之必要。○北京宗座代牧都士良邀请六名圣母会士由法国来华管理北京南堂法中学校,这是第一批来华圣母会士。

1892年(光绪十八年)

1月16日,樊国樑向教廷国务卿郎博拉枢机报告:李鸿章明了建立圣统制不含有政治色彩,而纯属宗教事宜。清政府准备承认总主教和主教的地位。主教不须经总理衙门,直接与地方督抚讨论宗教问题。如果罗马派遣宗座代表的话,可以直接与总理衙门交往。樊国樑表示,教宗会兼顾中国朝廷的愿望,以及中国的订约国(德国、法国)等的考虑,最重要的是,教宗先想自由自主地建立圣统,继而指派宗座代表。10月1日,李鸿章致函郎博拉,建议在华北直隶省先设总主教,且建议樊国樑为人选。

李鸿章还授意樊国樑向罗马建议，一并邀请德国籍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前往罗马参议洽商。但罗马对此建议不作答复。○襄阳、光化、谷城一带传言教士投毒于井，许多教堂房屋被毁。○宁波创立拯亡修女会。○马相伯游英法考察商务而返，任清政府驻长崎领事，旋改任使馆参赞。○加诺沙修女会在汉口、山西、河南开教。

1893年(光绪十九年)

7月，湖北麻城发生教案，结果被处死两人，徒刑七人，赔款四万二千银两。○9月，法国表示反对建“圣统制”，因为担心这会危及“保教权”。○教宗将在乾隆年间被杀之桑主教及其他教徒列入真福品。○圣母小昆仲会士初来上海。○同年，清吏杨毓辉拟《整顿中国教务策》：“为今之计，宜由钦差大臣就近与各国外交部会商，请罗马教皇简派名望使臣来华，专理教务。各国教堂胥归统制，并将教士严行管束，有越分妄为者，照例治罪。”

1894年(光绪二十年)

1月30日，法国新任驻华公使阿施兰抵华前先觐见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教宗表示，在中国建立由宗座领导的代牧制，可以结束初创和殖民时期的教会，将中国教会和教廷行政机构联系起来。阿施兰则表示法国将不会放弃在华保教权。○8月，教宗良十三世宣布撤销在华建立“圣统制”及与清廷建交的计划。○热河建立圣母无染原罪女修会。○烟台设立代牧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法籍耶稣会士夏鸣雷(Henri Harvet)任上海耶稣会徐家汇会院长。他曾撰著著名的《景教碑考》，另著有《崇明岛志》、《安徽省志》、《天主考》等。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5月28日，四川成都再次发生教案，余栋臣率众捣毁成都天主堂，法主教杜杭(Mgr. Marie Julien Durand)受伤。打教波及乐山、屏山、宜宾、雅安、灌县、阆中、泸州、大邑、冕宁、新津等十

一县，全省焚毁耶稣教堂三十余处，天主教堂四十余处，英美法派军舰在长江示威。结果，四川总督刘秉璋被革职，各县知县受处分，民众处死六人，徒刑十七人。清政府赔成都各教堂银七十万两，川南法国各天主堂银二十一万余两，四川所有英、美教堂银余万两。○清政府战败，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二亿三千万两。○意籍米兰外方传教会和神父(Mgr. Ft. Louis Piazzoli)继任为香港代牧区第二任宗座代牧。○是年，南洋大臣张之洞请人翻译美国国会文件，发现法文本《北京条约》并无传教士可在内地“租买田地，建造白便”之句，他将此事报告总理衙门，总署据此照会法国公使施阿兰，施复以《柏尔德密协定》为据，总理衙门只得不了了之。传教士在中国的特权，并没有因为张之洞发现其作弊而受损害。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法国遣使会上包世杰(Jean Maries Vincent Planchet)抵北京传教，直至1932年回国。著有《庚子北京殉难录》。○3月24日，御史陈其璋拟《奏定教案章程》，要求由教廷派使驻华。总理衙门认为：“现在教王势弱，意大利、法兰西诸国复将教王权力多方裁制，教王仅拥虚位，屡有教士贡议，请中国与教王立约。臣等权衡其事，利害参半。教王派使可免法德各国借保护为词，遇事要挟；而教民概隶教籍，中国地方官不得过问，亦非保民之道。故数年来教王之约，迄未与商。”○直隶中部有天主教徒一万人。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吉安创立圣母亚纳女修会，11月1日，山东巨野县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二教士能方济(Franz Nies)、韩理(Richard Henle)夜宿巨野县张家庄本堂神父薛田资(George Maria Stenz)家中，当夜即被大刀会众所杀，薛田资则以宿他处得免。久思侵占中国港口的德国政府即以此为借口，于14日出兵强占胶州湾，并于19日提出六项侵略要求：(1)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

(2) 赔教堂六万九千银两, 并敕建碑石一座; (3) 严办凶犯; (4) 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5) 中德合资建筑由胶州至北京铁路, 沿路矿产由德国经营; (6) 赔偿德国占领胶州湾全部军费; 德军还占领了青岛的炮台和胶州府城。是为“巨野教案”。德皇威廉二世于 11 月 6 日致电德外交部: “我现在已坚决放弃我们原来过于谨慎且被东亚视为软弱的政策, 并决定要以极严厉的、必要时将以极野蛮的行为对付中国人。”德国以传教士被杀为借口, 强行在胶州湾登陆。结果, 山东巡抚李秉衡被革职, 处死民众二人, 徒刑三人, 赔款二十二万五千银两。中方在济宁、曹州、巨野代建德国天主堂三处, 并立碑, 上刻“敕建天主堂”。○马相伯通过沈则恭神父, 与教会重新建立联系, 将未成年的儿女托教会保育, 只身重返徐家汇, 将家产捐给教会, 以为兴学之用。前往佘山避静。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

3 月 6 日, 迫于德国军事压力的清政府与德国就“巨野教案”达成协议: (1) 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 不再任大官; (2) 赔偿教堂三千银两; (3) 清朝代德国在济宁、曹州、巨野建堂三处, 每处建筑费六万六千两, 后二处拨地十亩, 堂前立石碑, 刻“敕建天主堂”。又须在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武城、曹县、鱼台等七处建教士住宅各一所, 共付二万四千银两。(4) “凶犯”两名斩首, 三名徒刑。(5) 朝廷降谕保护德国在华教士。○清政府还与德国订《胶澳租界条约》, 规定胶州湾全部划为德国租借区域, 由德国行使主权, 借期九十九年。准许德国筑造胶济铁路, 沿线矿产由德国开采, 山东全省划为德国势力范围。○6 月 11 日,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宣布变法自强, 先举办京师大学堂。9 月,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废除新政。○当时光绪帝锐意变法, 欲筹设译学馆, 梁启超请马相伯主其事, 马相伯请设馆于上海, 并邀教士襄助, 议成而政变突发, 遂告中止。是年冬, 马相伯与弟马建忠积二十年写成《马氏文通》六卷, 初版行世。马相伯爱弟才华, 命独署其名。○9 月湖北宜昌发生教案, 董若望(Victorin Delbrouck) 司铎被杀。○



吉林成立代牧区，广州创立圣母无染原罪会。○8月17日，《益闻录》与《格致新报》合并为《格致益闻汇报》。
清末北京西什库教堂樊国樑主教与信徒合影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2月，毓贤补山东巡抚，暗中怂恿义和团攻击教堂。○3月，清廷公布《传教章程》：(1)按教中品秩，总主教与主教，其品位与督抚相同，应准其晋见督抚；(2)总主教及主教应将所派与官府交涉之司铎姓名、住址通报督抚，以便接待；(3)总主教及主教无事不必赴省城面见督抚，司铎更换新到，可照品秩往见司道府厅州各级地方官。○9月，义和团在山东平原县、恩县打毁教堂。10月，义和团蔓延直隶阜城，竖大旗上书“传神助教灭洋共和义和拳”。10月18日，袁世凯军在山东平原击散义和团朱红灯部。11月，山东大刀会红拳会频频打教，地方文武弹压不得，巡抚毓贤有意袒护。12月6日，调毓贤来京陛见，命袁世凯署山东巡抚，一意主剿。永平成立代牧区。○在山东巨野教案中逃脱的德国圣言会士薛田资在德国发表《在华教士经历》详述该案经过。○樊国樑被任命为天主教北京代牧主教，并获清政府颁发二品顶戴。○蒙古地区有一百二十位圣母圣心会教士，十八位中国神父，三万名教徒，六十三个堂口。

清廷颁布的《传教章程》原文如下：

奏定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

总理衙门奏：近以民教多不相安，叠次钦奉谕旨严飭各省地方官切实保护，不啻三令五申而各省教案仍复层见叠出，办理殊形棘手。因思地方官保护教堂教民，必须平日与主教教士善为联络，情意相通，而后彼此悉泯猜嫌，小事可消化无形，大事可和衷商办。昨由臣等与法国主教樊国樑商订地方官与教中往来事宜各条，并由樊国樑送交法国驻京使臣毕盛阅看。据称，所订甚为周妥，应请奏明照办。该使亦分行各主教遵照等因，兹特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通行各直省地方官切实遵行，或亦消弭教案之一助。

兹因天主教现在中国各省建立教堂，久奉国家允准奉行，欲使民教相安，便于保护起见，议定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各条如下：一、分别教中品秩，如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倘主教因事回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印务之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一、总主教或主教应将所派专与官长交涉办事之各司铎名姓、教堂住处，开单报明督抚以便飭属照章接待。凡请见地方官及专派办事之各司铎，均应泰西人充当，或有时西司铎未能熟习华语，可暂令华司铎帮同传译。一、总主教或主教居住外府，无事自不必远赴省城请见督抚。遇有新督抚莅任，或总主教、主教更换新任，或贺年节均准其向督抚修书，或寄递名刺致礼，督抚亦如礼答复，至各司铎更换新到，应持有主教函据，方可照品秩请见司道府厅州县等官。

〔李刚已：《教务纪略》，上海书店 1986 年影印，卷三，第 30~31 页〕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

是年，中国天主教信徒增至七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二人。○姚宗李(Mgr. Prosper Paris)任江南(南京)代牧。郭德礼(Clemens



义和团使用的战牌，上有“二毛教匪胆战心惊”之句



义和团攻打教堂年画(上)

“庚子事变”以后,山西太原官府迫于压力为被害教徒所建的纪念亭(下)

Coltelli)任陕北代牧。○4月,义和团由山东蔓延至山西,由山西而发展至直隶,最后进入北京。5月19日,北京天主教主教樊国樑致书法国公使,请求召海军入京保护教士教民。29日,驻京外交使团决议召海军入京防卫。6月9日,义和团蜂集北京,毁京津铁路。10日,英海军提督西摩尔(Sir Edward Seymour)率英德法美日意奥联军二千入自天津北上京师。11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北京永定门外为董福祥甘军所杀。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Baron Freiherr Von Ketteler)在北京崇文门被甘军所杀。是日,董福祥率甘军及义和团开始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北堂,并大肆捕杀北京城内教士教民。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弃尸于御河中,而平民之误杀者亦多。”(杨典诰:《庚子大事记》)。6月21至22日,朝廷下谕向八国宣战,并杀主张议和的袁昶、许景澄、联元、徐用仪、立山五大臣。北京城内所有外侨、外国使馆人员、教士教民均撤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什库北堂及监理会会所据险死守。6月30日,保定的天主教会遭受攻击。山西全省发生大规模民教冲突事件,山西巡抚毓贤下令捕杀教士教民。太谷、大同的天主堂均被焚毁。由山西逃入陕西的教士亦被杀害。东三省亦发生大规模袭击教会事件。7月,盛京副都统晋昌亲自带兵攻击沈阳南关天主堂,一名法国主教、两名神父及一百多名教徒被杀,仅奉天一省,教民被杀者有一千五百人。许多新教徒亦同时毙命。内蒙古天主教区共划分三大区:东区因滦平知县郑文钦仇教,教堂被毁,神父被杀;中区西湾子总堂共有教徒五万六千人,虽作武装抵抗,但在拳民和清军包围进攻之下,有三千二百余名教民被杀,内有神父五人;西南区的教民被杀八百余人。在山东潍县、乐陵、泰安、滨州、魏家仓、朱家寨等地,均有教堂被毁,教士教民被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在“庚子事变”中,共有五位天主教主教、三十一位欧洲传教士(八名耶稣会士、五名方济各会士、四名遣使会上、三名圣母圣心会士)、九位修女被杀,中国教徒死亡者逾三万人(赖德烈: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p512)。基督

教传华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传教士们承认：“这个全球最大的传教领域的工作瘫痪了，许多传教据点被抛弃了，传教士们纷纷逃往口岸城市及朝鲜和日本。”○同时，被围困在京城西方传教士和教民在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很多人四出抢劫并搜索义和团。法国总主教樊国樑从8月16日开始，率众连续抢劫八天，并为此张贴布告。樊自称抢劫的数字是“二十万三千余”银两，而美国《纽约先驱报》报道樊主教仅在王府立山家即抢劫了一百万两银子。许多司铎还以随军神父身份加入联军。

天主教北京主教樊国樑，在法国公使同意之下，下令教徒在八国联军进京以后参与抢劫，从8月16日开始，连续抢劫八天。据1902年《遣使会年鉴》（合订本）第69页记载樊主教与法国公使有如下对话：

樊：在救出了那受法国保护的人们之后，是否让他们死于饥寒呢？

法使：不，主教。中国政府显然应该而且必将赔偿的。

樊：然而这些赔偿是有得等待的，即使你尽量催逼，恐怕六个月之内什么也得不到。在这之前，我们全体教徒势必要冻饿而死了。

法使：主教，你需要什么；就到周围去拿吧！

樊：由于迫不及待，我们必需拿生活必需品：粮食、木炭、衣服和必要的钱。

樊国樑主教居然出“布告”下令教徒参加抢劫，并规定教徒抢劫不满五十银两的，勿用上缴。“布告”称：

我在北堂，曾获法国公使批准，得以为你们这些丧失一切的难民准备吃、穿、烧等日用必需品。……为了使众信徒免于冻饿而死，一切抢来之物都应归公，堆放一处，然后大家均分。为此，我颁布以下命令：

(1) 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以后八天之内所抢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其总值不超过五十银两（折合一百七十五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必需。

(2) 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银

两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甫,将多余之物归公。

〔《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230页〕

据樊主教自己报称抢劫的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银两又五十枚”(《传教杂志》1902年〈合订本〉第121~123页)。可是据美国《纽约先驱报》1901年1月9日报导称樊主教仅在一处王府即立山家里抢劫的财物珍宝价值约一百万两银子。

以下是宗座代表刚恒毅对于“庚子事变”前后天主教会所扮演角色的批评:

“在镇压拳民的时候,北京城由外国军队任意处置,拳民被杀,家也被抢了。樊主教乘机让人携掠银两以及在一个拳民友人亲王府里的艺术品,并接受法国士兵给他送来的银两,赵主教和程主教,当时还是小修院里年幼的修生,他们对我说,他们也参加了那次掠劫行动。我说出这些惨痛的事实,并不是想要清算旧账,而是使人知道,如果想明了中国的皈化问题,不可不知道某些事实。日后有一天,法国的社会党人,要在法国的议会里,公开指控樊国樑主教。”

〔《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第43页〕

“为了拳民给北京教友和教区所造成的死亡和损失,无论在北京城里,或宗座代牧区内,清政府被迫作出一笔数目很大的赔款,据林懋德主教告诉我,法国把中国所付的这笔赔款——五百万金法郎转交宗座代牧区。”“不幸地,教会和义和团问题勾搭在一起,有些教区竟然发了‘拳匪财’,因此,教会在知识界中成了不可解开的结。”

〔同上〕

“在外教群众的心目中,北堂是外国人的宗教组织,是一些从事传教生活的外国神父的团体,是一个与法国使馆保持密切联系的机构,是一个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势力,超越中国法律以上的公司。如有一个家道中落的满族亲王,想出售一座王府,他首先前往北堂求售,一旦如有动乱的危险,由于北堂是不受中国法律管制的地方,那些富有的绅士首先把财宝送往

北堂,或到那里避难。相信北堂的宗教,对外教人简直就是承认自己是外国的奴隶,等于放弃自己的祖国。”

〔《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第48页〕

“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是建立在特权的结构上及制裁上,外国人因享有治外法权而不受中国法庭的处理,教会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也和这种结构联系在一起,这自然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教会也默认在外国条约的范围内。因此传教士以外国人的身份来中国,中国人认为他们与列强同流合污。”

〔《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一),第49页〕

“有时听一些传教士说,中国人没有良心。其实不是的,中国人知道感恩;可是他们对于自己人格的尊严,抱有一种高傲的观点。施恩有损于他们的人格尊严,含有侮辱的意味。这样的恩惠,不会引起,也不可能引起他们的感恩心。”

“我们距使徒们的方式多么远!”

〔《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第49页〕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2月,清廷在列强压力之下加惩“肇祸群臣”,载漪、载澜均发新疆,永远监禁。载勋赐自尽,毓贤正法,刚毅追夺原官,董福祥革职,英年、赵舒翘革职定斩监候,后赐死。徐桐、李秉衡革职,撤销恤典。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右侍郎徐承煜革职。开复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原官。5月,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议定“庚子赔款”数为四亿五千万两,四十年偿清,年利四厘,自本年7月1日始,1940年12月31日止。○1月4日,法国遣使会允准雷鸣远(Vincent (Frédéric) Lebbe)到中国传教,2月10日,他从马赛启航,驶往东方。3月30日,雷氏抵达天津。樊国樑主教安排他到北京南边的安家庄。当时,庚子事变刚刚过去,教会里的人正追述教友殉难的事迹,但雷鸣远则更多地看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欺压,他写信给弟弟说:“欺压的原因是这个民族的颜色与我们不同……我们的军队所过之地,血流成河,劣迹昭彰。”(《雷鸣远神父书信集》,第33页)在晋铎以前,他向主教坦诚直

言：“在这里，事实上我们造成了一个外国身体教会，天主教地区像一个小小的殖民地。”10月27日，雷鸣远在北京晋升司铎。○圣母女修会抵达永平。○于斌生于黑龙江省兰西县。○全国信徒七十二万零五百四十人。中外司铎一千三百七十五人。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1月，驻津法领事致函天津关道唐绍仪，要求将老西开并人法国租界，唐绍仪以其为非分之求，置之不理。○慈幼会司铎初次来到中国澳门。“圣神之仆会”(Servants of Holy Ghost)传教士来华。○1月20日，雷鸣远到大口本堂区担任副本堂，以后又在武清县传教。○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立《大公报》，以“启民智、宣民隐、倡民德”为宗旨。发刊次日，即发表《大公报出版弁言》，指出慈禧太后在辛丑年回銮以后的新政，“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乃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而酿成这种“偷惰苟安”之原因在于“士大夫鉴于戊戌之变，政府压力过甚，倘于指斥时政者，则目为奸佞，不难加之以罪”。文章明确表示，它要“知无不言”，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趋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五天以后，该报又发表《论归政之利》，意谓只要太后归政，即“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闈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是年，英籍基督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用庚子赔款在山西太原创立山西大学堂。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教宗良十三世去世，庇护十世即位。○是年年初，在南洋公学任职的蔡元培，每天到土山湾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以后又介绍南洋公学二十四人来学习，马相伯征得耶稣会的同意，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为校舍，开办了著名的“震旦学院”。马相伯又作《拉丁文通》，为学院教材。○浙江宁海天主堂被焚毁，中国籍教士



天津老西开天主堂

朱国光被杀。○南宁创立圣家女修会。○玛利亚方济各会开教四川成都。○全国信徒八十一万一千四百人。外国传教士一千七百零五人，中国籍神父四百四十九人。

《圣教杂志》记震旦大学创立概略

1898年，梁任公请驻京法使转江南主教倪大司牧，令马公相伯主持筹备设立于北京之译学馆。马公相伯即上书清廷，请将译学馆设于上海；并陈请徐家汇耶稣会诸司铎襄理校务，所请悉允，事垂成矣，而慈禧太后复临朝听政，拟设之译学馆，遂随戊戌政变而中止。1903年之岁首，马公相伯已迁居土山湾，南洋公学教授蔡子民等三人，率学生数人往访，请创立一校而肄业焉。马公欣然允之，且为请于耶稣会，于是诸司铎偕来赞助，此新校遂以成立，命名曰震旦。1903年2月之杪，即清光绪二十九年也。斯时任公先生避居日本，办《新民丛报》，闻震旦成立则大喜，刊布其章程于丛报中，且志评语，谓中国研究泰西真学问之机关，自震旦始。梁任公先生五年前创立校



震旦学院

以造译材之愿，至是始偿，宜其闻之而色喜也。当3月1日开始授课之际，肄业者二十人耳。至1904年岁首，学生增至十倍，马公相伯谓锐进之时机已至，即请耶稣会尽力相助，安徽传教司铎南从周，遂被荐至沪，而为震旦之教务长矣。南公尽考旧章，学生抗不从命，马公恐以一己之故，阻南公之施教，辞职而去，学生大哗，相率离校，震旦遂暂行停办。而离校学生于吴淞复创一校，曰复旦。然震旦虽创立未久，而名已大著，学者多不忍其中辍，相率致书诸司铎，请重行开课，而缙绅先生复表同情于震旦，益以复课为请。于是李问渔司铎遂由震旦校董会公推为校长，而南公则仍在任教务长，暂行停顿之震旦，遂于1905年8月重行授课矣。

〔《圣教杂志》，第17卷第12号（1928年），张若谷：《马相伯（良）先生年谱》综刊〕

记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经过（摘录）

想当年创办震旦，我因游历欧美回国，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这是理想。事实是这样开始的，蔡子民先生介绍了二十四名青年，从这第一班学生，

逐渐增加,形成学院。

〔徐景贤:《马相伯先生国难言论集》,文华书局 1933 年 4 月出版〕

我教了二十四名学生稍稍有点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闯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而大之的必要,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 Akademic 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

〔王瑞霖:《一日一谈(马相伯述)》,新城书局 1936 年 2 月 20 日出版〕

1904 年(光绪三十年)

四川重庆天主堂出版《崇实报》。○安老会修女抵上海。○巴尔玛外方传教会士来华。○湖北施南法籍德希圣(Mgr. Theotimus Verhaegen)主教、中国籍神父董明德被会党杀死。○雷鸣远在京东一带传教,是年全北京教区有一万二千人领洗入教,雷氏的传教区域不过占教区七八十分之一,但当年即有二千人领洗入教。○耶稣会派南从周(François Perrin)神父至震旦学院任教授。○德国圣言会士韩宁镛(Mgr. Augustin Henninghaus)继安治泰以后任山东教区主教。○教宗庇护十世遣使谒见清帝,通报新教宗即位之事。圣方济各沙勿略外方传教会(St. Francis Xavier for Foreign Missions)到河南传教。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

樊国樑主教去职,林懋德(Mgr. Stanislas François Jarlin)继任为北京主教。林懋德将雷鸣远升为涿州总本堂神父。雷鸣远将涿州本堂上悬挂的代表法国保教权的法国国旗拿下,换上中国的龙旗。此举在教会内部引起不少争议。北京教友王子真在雷鸣远的鼓励之下在京开办“国民捐款”,希冀协助清政府解决庚子



雷鸣远神父像



1900年后重修的涿州天主堂

赔款问题,雷鸣远也经常到其宣讲所讲演,鼓励教友爱国。雷鸣远在文贵宾(Joannes de Vienne)神父协助下,在涿州开办了一所现代学校,向教友传授新式学问。○耶稣会指派的南从周神父成为震旦学院的负责人,并与学生发生冲突,马相伯因不愿与教会再起冲突,辞职他去。在两江总督周馥支持下,与严复、熊师复等另建复旦公学。7月26日上海天主教《汇报》刊载《震旦学院开办约》,招收新生。震旦学院在解散五个月以后重新开学,教政由耶稣会负责,校长为李问渔神父。经考试以后第一批录取学生共二十五名。○4月12日,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吕海寰上书朝廷,“因近年来各省教案棘手,动辄酿成交涉,请特派专使赴罗马,面谒教皇,议订新约”。朱批:“交外务部查核办理。”2月,法国天主教王安之(Mgr. Jean Marie Lacroche)在天主堂宴请南昌新知县江召棠,强求推翻前年了结的新昌棠浦旧案,以扩大传教权益。江坚拒,争执中王安之竟以餐刀等利器刺死江召棠。消息传出后,全城鼎沸,25日,各县民众数万人聚集于百花洲畔,

连毁法、英教堂四处，杀王安之等教士九人，法、英公使多次向清外务部施压。最后，清政府竟判处民众十人死刑、二十七人徒刑，江西巡抚胡廷干、臬司余肇康、布政司周浩等人撤职，赔法教士银五万两、教堂银二十五万两、医院银十万两。是为“南昌教案”。○四川巴塘喇嘛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毁天主教堂，杀法籍教士及中国籍教士吴以忠。○7月，师神父（Mgr. Fr. Dominic Pozzoni）被教廷委任为香港代牧区第三任代牧。○圣母圣心会士田清波（Fr. Antoon Monstaert）至内蒙古城川传教，后著有《蒙法大词典》等多种汉学著作。○宜昌创立方济各第三圣婴会。○圣神忠仆会修女初次来兖州。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雷鸣远调任天津总本堂，住河楼天主堂，他将堂内外的法国国旗扯下，另换上了清朝的龙旗。○是年，英敛之将《大公报》报馆迁往天津日租界，并与雷鸣远神父相识，成为莫逆。○安徽建德会党打毁天主堂。○南昌城外马厂天主堂被毁，法籍王安之司铎被杀。郑州升为监牧区。○4月14日，清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吕海寰再次上奏，提出五条处理教案措施：（一）考查别国教例，并仿行之；（二）改订中外商约，收回治外法权；（三）日后改约时删除传教条款；（四）联络罗马教廷，摒弃法国在华保教权；（五）仿行日本明治维新办法，先与罗马教廷建立联系，去除法国保教以后，再辞退罗马教廷的官员，由清政府自行管理教务。○玛利亚方济各会开教四川叙府。○全国信徒八十八万一千三百零一人。中外神职人员一千七百七十七人。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南昌创立圣母善导女修会。○雷鸣远经英敛之介绍，认识清朝宗室弟子、肃亲王之侄锡钧，共同商讨中国与罗马教廷互相派驻使节，建立外交关系事宜。雷鸣远写信给弟弟伯达，索要有关教廷与公教国家通使的材料以为参考。此事后无结果。○上海天主教《格致益闻汇报》更名为《时事科学汇报》，主笔为李问



李问渔神父像

渔。○赣州城内天主堂被毁。○河南卫辉天主堂被毁。○10月13日,上海天主教广慈医院举行落成典礼,医院法文名称为“圣玛利亚医院”(L'hôpital Sainte-Marie),上海主教姚宗李将此医院委托给仁爱会修女管理。○马相伯为英敛之政论文《也是集》撰序,批驳清政府借口人民程度太低的言论。年末,马相伯应梁启超之邀,去日任“政闻社”总务员。○中国天主教信徒增至九十万二千四百七十八人。是年西藏有九十人、云南有六百六十三人、广东二千零三十七人、广西五百九十二人受洗。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震旦学院迁至卢家湾吕班路。耶稣会任命的院长为法籍耶稣会士韩绍康(Allain),此后历任院长均为法籍耶稣会士。重订的学校章程将肄业期从预、本科共四年改为六年,学生入学年龄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改为十五岁至二十岁。课程设文、理两科,毕业则给文凭,相当于法国的文科学士和理科学士。○澳门主教以肇庆专托葡籍耶稣会士管理,另将由他辖治的海南岛转交广东代牧管理。○清廷外务部取消地方督抚接待主教司铎章程。○上海《时事科学汇报》改名《汇报》,仍由李问渔主笔。

1909年(溥仪宣统元年)

天津教区奥国神父师林嘉组织“传信会”。时甘肃中国籍王远志神父、山西中国籍成玉堂神父也成立类似组织。雷鸣远将天津的“传信会”改名为“公教进行会”,并在天津总铎区普遍推广,动员教徒分担和参与教会工作,扩大了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秦州成为监牧区。○六名加拿大圣母无原罪传教会(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修女来广东。○中国天主教第五区第三届教务会议在香港举行。○李问渔司铎搜集吴渔山史料,编成《墨井集》,并附有所著《渔山行状》。

1910年(宣统二年)

3月,圣母会在北京栅栏建成其会所“山”字楼及女殉道者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

纪念堂。○埃及方济各会传教修女初次来湖北老河口。○兖州创立圣家女修会。○河北保定、四川建昌、浙江杭州先后成立代牧区。○10月,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落成,举行祝圣典礼。新堂为法国哥特式,钟楼高十七丈,堂脊高八丈,中阔十丈,深二十五丈,可容两千五百人同时举行弥撒,堂内大小楹柱六十四根,成为上海最大,也是全国著名的天主堂。○富成功(Mgr. Joseph Fabregues)任冀中代牧。由冀北分出冀中代牧区。○全国中国籍司铎五百二十一人,教徒一百三十六万四千六百十八人。

1911年(宣统三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延安成立代牧区。○6月8日,李问渔神父去世,享年七十一岁。8月12日,《汇报》停刊。○上海著名天主教实业家、慈善家陆伯鸿出任上海南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并获英、日贷款,更新设备,并在遣使会协助下偿还贷款。陆伯鸿生于1875年,祖籍四川,先祖由徐光启劝化奉教。陆氏早年上海董家渡天主堂小学接受宗教教育,后任法国某律师秘书。○自1697年至本年,遣使会士在中国传教者有五百九十三人,其中十一人是蒙古族,一百八十五人是汉族。○陕北建立代牧区,隶属方济各会加泰罗尼(Catalonia)省。○直隶包括内蒙一部分有信徒三十六万零四十六人,甘肃有十六万零二百八十人,四川有十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四人,山东有十万四千七百九十人。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氏在北京就职。5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七款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上海耶稣会为代替停刊的《汇报》而创办的《圣教杂志》(月刊)于1月出版,主编是曾任徐汇公学校长和震旦大学副校长的潘谷声(秋麓)神父。○2月24日,雷鸣远移铎天津,将《教理通告》由盐山移至天



《圣教杂志》

津,改名《广益录》,作为周报出版,发行量增至一千份。英敛之作《发刊词》称:“本报为专门宗教之报,以研究真理、正人心、厚风俗而终于爱群强国为宗旨。”甘肃王近仁(远志)、山西成捷三(玉堂)和刘浚卿(锦文)筹组中华教友联合会,旨以教友协助阐扬宗教,以《广义报》为华北通讯机关,雷鸣远为监督神父。○5月,遣使会士柯来盟(Clement)任北京东交民巷本堂神父,创办法文《北京公教月刊》(*Bulletin Catholique de Peking*)和《中国神职月刊》。○7月4日,遣使会杜保禄(Mgr. Paulus M. Dumond)到天津就职直隶海边宗座代牧,设主教府于望海楼天主堂,天津从直隶教区中分开治理,杜又任命雷鸣远为副主教兼望海楼总本堂。该教区有外籍神父二十人、中国籍神父九人、圣母小昆仲会上十一人、仁爱会修女十二人、若瑟会修女二十五人,教堂十三座,教徒三万四千五百七十人。○9月20日,英敛之偕同马相伯联名上书罗马教廷,要求在中国建立公教大学。英敛之与喀拉沁王福晋及夫人爱新觉罗淑仲女士,向皇室请领香山静宜园,兴办女学女工,英氏被推主其事。○两名圣母圣心会教士到青海西宁府开教。○全国有中外籍神父二千二百九十八人,其中外国传教士一千四百六十九人,中国籍神父七百二十九人。全国信徒为一百四十三万一千八百五十八人。

马相伯、英敛之上罗马教宗请兴学书

至圣父师慈鉴:今年八月间,蒙令虔祷宗会同心虔祷,为我中华失路之羊,同归一栈,此谕此恩,适吾政体改造,约定信教自由,一切礼文,对于生者死者,均免跪拜,所有以前阻碍奉教之条,删去已为不少,经言顽石可成亚巴郎子,此其时乎!我华人数居天下四之一,顽石不为不多,端赖合众祈求,得邀圣神之嘘植。圣神之嘘植,固无东无西;顽石之可成,亦无东无西。奈自有元,得奉十字教后,苦无司牧相承,中绝者二百年,由明末清初至鸦片烟之战,其中不绝如线,无他,三十八年之瘫病,手足徒具,动辄须人,人固不能常应我求也,以是一瘫三十八年。水动而不能自动以赴之,必待有非常圣迹,而后能兴。有元之传布福音,虽不可考,大都以元主多用客卿,而教士

相借以来欤？有无圣迹，以广福音，亦不可考。而明末之传布福音，则奔走先后，专藉学问。此固无上圣智，对于我华特别之作用。既无大圣如方济各·沙勿略者，以圣迹为开教之先声。则仿利、艾、汤、南用学问为诱掖之具，断不可无。况圣学与科学具根于天主。物理之有伦有脊，在在证明惟一真原，固与教旨不相刺谬也。乃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即以北方而论，我圣教不独无大学也，无中学也，并正式高小而无之。只有法文学校，学成之后，只可依外人谋生而已。前清亦尝以京师大学托我传教士矣，诃竟辞不受，致使教外人代之。由是该教生徒，自旧清已跻政府，于今更盛。而我教独见摒焉；非见摒也，盖来华传教士喜用学问诱掖者有几，只观在会与不在会之修道生，其资遣往罗马书者有几，则其培养教友之存心，不愿追步利、南等可想。利、南等固竭当时欧学，上自天文，下至水龙溉地，而实行输入我华者也。无怪明末清初，人才辈出。今也何如！教中所养成者，椎鲁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时务，援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落如晨星。致令我国，虽改为民主，而教中能备选国会议员者无人，省会议员者无人，府县议事会员者无人；一乡一市之议员者，亦无务人。岂非放弃利权，自居淘汰之数乎？不与圣座谕令，竞争国会与地方议会事权之用意背道而驰乎？侧闻圣座，令在日本，创一东京大学，说者谓时机已迟。而在我华，则时机方熟。善迎之大足以养成教内外通国之子弟，联络教内外通国之父兄，其为益胜于和约之保障，十百千倍。伯多禄舍鱼以渔人之术智，其在斯乎？倘我罗马圣教，不我退弃，不终漠然置之于异教人之手；则亟望多遣当今博学良善而心谦者，广为师傅，其奉遣之人，能不拘何国，不限在会，似更相宜。倘拘定一国，则政治家视为国教，而启猜疑；倘限定在会，则不但会与会此疆彼域，猜忌争权，且因人性喜同恶异，往往视不在会者如征服之国民。不巷议则腹诽，防御之惟恐不严不密。此就同会而不同国者之感情可推而得也。其有碍扶持之义，广扬之道，尚待言乎？但一国之广扬，以往例今，端恃本

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譬为一家之内，贵能有自食其力者，万不能专恃外债以生存也，明矣。方今我国政治之不良，科学之不明，实业之不精，土地之荒芜，工艺之疏窳，学堂之浅陋，随处皆然。其求助欧西之文化，不啻云霓。而稍明时局者，亦渐知民德归厚，舍宗教无由。以故诚得我至圣父师，大发慈悯，多遣教中明达热切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创一大学，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因学问，迎受真光，不但天下四分之一，同归一棧，既不负此番普令祈祷之盛心，亦不虚救世主心在普救人世也。至应如何奖励，奉遣之方，圣座自有神用。特先鸣感。

1912年9月20日谨状

〔《辅仁生活》1939年第二期，第9页〕



陆伯鸿像

1913年(民国二年)

全国公教进行会联合天主、基督、佛、道、回教反对定孔教为国教。○上海公教进行会成立，推举陆伯鸿为正会长、朱志尧为副会长；3月30日在董家渡天主堂开成立大会，时称“江南公教进行会”，首批会员共有六十五人。是年，陆伯鸿又开办慈善机构新普育堂。○4月，雷鸣远在望海楼北面租赁广东会馆举行救国讲演会，邀请马相伯、英敛之讲演，他自己也发表演说，会后，讲演稿辑成一册出版，名曰《救国》。其宗旨是“天主教是真宗教，既能救灵，又能救国，中国人人奉天主教，则国必强”。不久，雷鸣远请准于暑期回欧洲募捐，以便在天津创办公教日报。○7月19日，台湾脱离厦门教区，成为监牧区。○英敛之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辅仁社，招收教中子弟研习国学和圣教历史。所拟习题有“太古中西同源考”、“元也里可温考”、“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贤著述辨”等等。○于斌全家迁往黑龙江省海伦县海北镇天主教村，时入教，教名保禄（一说1914年）。○叙州创立圣道贞女会。○沈阳创立圣母圣心会。○江苏、安徽耶稣会士为五千一百零五名成人及六千一百五十五孩童付洗。

1914年(民国三年)

教宗庇护十世崩,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继任。○2月,雷鸣远在欧洲募得六万法郎回到天津,将《广益录》改为《益世主日报》(周刊)重新出版。○10月18日至25日,公教进行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在天津举行,但未成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西湾子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为该会传华五十周年举行庆祝活动。○是年,陆伯鸿在西门子公司支持下,开辟租界与南市间电车,后并入南市电力公司。○汕头及附近地方成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的宗座代牧区。○全国教徒达一百五十一万九千人,外国传教士一千五百十人,中国籍神父七百四十五人。



教宗本笃十五世像

1915年(民国四年)

马相伯为陈垣重刊汤若望《主制群征》作序,又为重刊利玛窦《辩学遗牍》作跋,英敛之亦为该书作跋。○雷鸣远邀请华籍教徒刘浚卿(宋荣)和杜竹萱创办《益世报》,设报馆于天津荣业大街,于10月10日出版第1号。○9月,天津法租界工部局在老西开地区散发传单,强迫当地居民纳税,激起民愤,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发起维持国权国土会,力谋抗争。雷鸣远极愤于法国人的强霸,遂请天津警察局设岗于老西开。法国领事弄清原委以后特由主教陪同,前去质问雷鸣远,经雷鸣远据理驳斥后忿忿而去。11月,法国驻京公使孔蒂(Alexandre Maurice Robert Conty)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飭令天津地方官员撤回驻老西开的中国警察,被严正驳回。○上海陆伯鸿在杨树浦开办诊疗所,以后又在松江设立诊疗所。○贵阳创立圣心修女院。○埃及方济各修女会(The Franciscan Sisters of Egypt)来湖北传教。

1916年(民国五年)

4月,英敛之所撰《万松野人言善录》出版,马相伯作序。《益世报》创北京版。○5月间,法国人在老西开一带修桥铺路,企图霸占老西开,雷鸣远请中国天津警察局设岗,法国领事再次向杜保禄主教施加压力。在杜主教安排下,6月24日,遣使会中国省

安塞齋日記

此下百餘字皆有誤字經潤于
即日冠可看畢其心甚自去午
和日九有所感理及待時則
不備矣又上運回口保不可
或為性可六矣以此性過有佳
予前所於有而除為之不修
也或身去北南奔馳去寄或
同新以歸此京外至望
庚子之歲散火去道隨道
前中必有清德德奉天而
小羊廣德德池七游道也
言運距蘇等有去寄又六
批去取於各也此建等北海內
大難往來也札寄新運履
遊詞者去處月度陶于書力
修却疾常也日之也此也
可運往來時多往於頭以
與今社採積情神新運至
辦作數官之言皆重臨之所
而已正實秋七月庚子

日下英社自有記

英效之手迹

的罗视察员将雷鸣远调往正定。天津的教友聚集教堂前示威，抗议法国领事的霸道和杜主教的不公正。天津各界人士成立了“维持国权国土会”，派六名代表去见杜主教，要求将雷鸣远调回来。7月14日，包括中国神父、教徒和地方名士联合写信给外交部，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而另一名传教士汤作霖(Cotta)则与天津人民站在一边反对法国的侵略(汤作霖为生在埃及的希腊人，1891年十九岁时入巴黎遣使会总修院，与雷鸣远相识，后调往马达加斯加岛传教，1906年，在雷鸣远邀请之下来中国传教)。9月，杜主教在众人压力下，将雷鸣远调回天津教区，但将他安置在天津教区最南端的庆云县，任庆云县副本堂。就在9、10月间，汤作霖神父起草了向罗马教廷的请愿书，全天津教区二十四名神父中有十九位签字，没有签名的五名神父中只有两位持反对态度。汤作霖还附有关于中国教会的报告书，称当时的中国教会为“精神的殖民地”，对天津教会当局支持法国的侵略行径表示极为不满。○10月17日，法国不顾天津人民的反对，正式派兵开进老西开，解除中国警察的武装。天津教会的高级领导人竟声明支持法国的行动。在此情形下，雷鸣远应天津人民之请来到沧州，在他的建议下，天津爱国士绅组织了在法租界的全面罢工罢市，并在经济上抵制法货。机关、电厂工作的中国职员

都拒绝上班，商人不做生意、工人不作工、巡警不巡逻，法人家庭中的佣人全部辞职，租界陷于瘫痪之中。在强大的压力下，法国驻华大使孔蒂被召回国，代理公使允诺归还老西开的土地。天津人民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是年，段祺瑞政府恢复的国会在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基础上，提出“天坛草案”，草案第19条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马相伯、雍剑秋等在北京联合天主教教民，聚会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又成立天津信教自由会，联合基督新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信徒，拥护信仰自由。先后撰文有《〈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天坛草案〉第十九条问答录》、《书〈天坛草案〉十九条问答录后》、《书〈请定儒教为国教〉后》、《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代拟〈反对孔道请愿书〉五篇》、《宪法向界》、《〈约法〉上信教自由解》、《信教自由》等等。○于斌考入齐齐哈尔第一师范学校。

1917年(民国六年)

3月19日，巴黎遣使会来电，调雷鸣远至江南嘉兴传教，而将汤作霖调往南美的基多城。这无疑是对他们的惩罚。汤作霖不从，杜主教则夺去了他的神权，并断绝了他的日常费用。○伊苏登会司铎初次来到贵阳。○汉阳成立方济各第三会院训蒙院。○山东兖州圣言会创办《公教白话报》。○7月11日和14日，《罗马观察家报》出现两篇由教廷国务院授意写的文章，使教廷与中国可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变得公开化了。文章认为，教宗将在中国派驻代表的性质是纯宗教的。○6月，英敛之作《劝学罪言》，开宗明义即曰：“夫传教之法，固非一端，而信今传教，流布广远，要不能不以文字为第一要务。”又曰：“本国人不通本国文字，何以接人？何以应事？论其效果，不过自绝于高尚社会，自屏于优秀人群而已。此等是非最易了解，尚何足辩？惟我中国奉教人，独受其毒，处于不中不西夹缝中，故成其非驴非马之种类。一言及中国学问，则鄙薄之情，竟成第二天性；再问及西国学问，则答以中国无此语言，足以译之……因察教中最为我国所谓上等

社会第一口实者，则为不尚学问之一端；而不尚学问之弊，则由我当权者，量狭智昧，不知以大体为计，不能以圣教会之心为心，以致人才消乏，百事隳堕，自处于劣败之数，此无能为讳者也。”
○是年，熊希龄任赈灾督办，聘英敛之为北京慈幼局局长。○美国玛利诺会(Maryknoll)华理柱(James A Walsh)到远东旅行，选择广东南部和广西西部为传教区域。

1918年(民国七年)

3月12日，荷兰籍王老松(Van Rossum)枢机出任教廷传信部部长。不久，由陆徵祥领导的中国外交部请求摩纳哥亲王驻罗马代表卡彼罗伯爵(Capello)充当中国与教廷建交斡旋人，并希望通过他与教廷建交。○7月12日，吉塞佩·白菜里(Abp. Petrelli)总主教被任命为宗座使节出使中国。7月17日，中国政府则任命驻西班牙兼葡萄牙公使戴陈霖为驻教廷使节。法国知道以后大加干涉，外交部长毕盛(S. J. M. Pichon)声称教廷向中国派使节，会严重危及法国的保教权。法国亦向中国提出抗议。8月22日，教廷国务卿嘉斯巴里枢机通过巴黎总主教阿梅德枢机(Card. Leon Adolphe Amette)，送交了一封官方信件给法国政府，其要点为：(一)驻北京的宗座使节并不损害法国在远东的保教权；(二)宗座使节任命的目的是纯精神和宗教的；(三)外交性质虽然不是必需，但具有很大的益处；(四)认为法国使节便是教廷使节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五)保教权没有宗教功能，只限于物质方面，与宗座使节属于两个不同范畴。8月14日，《罗马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文章，虽未署名，但属巴斯卡里手笔，首先说明宗座使节出使中国的理由以及教廷使节的任务，最后说明法国政府没有阻止的权利和理由。法国见对教廷施压无效，便转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当时中国正感到《二十一条》的压迫和痛苦，不敢再得罪法国，于是便被迫通知中国与教廷双方使节互派延期。○9月7日，美国玛利诺会第一批传教士来到广东江门，他们是 Thomas Price、华理柱、Francis X. Ford 和 Bernard F. Meyer。○全国天主教信徒共一百九十六万三千六百



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主教

三十人。

1919年(民国八年)

5月“五四”运动爆发。于斌被推为齐齐哈尔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团团长,领导省城游行示威活动。○6月10日,天津的爱国教友组织了“公教救国团”,号召教内同胞“奋发风云,誓保国土,……为全国之一助”。教徒聂醒吾于6月12日《益世报》上发表《为外交泣告教中人书》,指出法国利用保教权侵害中国的事实。在相近的时间里,上海耶稣会出版之《圣教杂志》,亦以《公教友之热心救国》为题,发表社论支持天津教友的爱国行为,表现出南北之间的呼应。○6月17日,罗马教廷任命法籍巴黎外方传教士、广州代牧光若瀚(Jean Baptiste Marie de Guebriant)为宗座巡阅使,带着教廷所拟的问题,视察全国教务,征询各教友神长的意见。教廷所拟问题有三十二个,光若瀚删为二十八个,且没有完全向各教区传达。光氏先到上海,然后于10月抵天津调查老西开事件。11月16日至23日,光若瀚召开华北主教会议,以宗座巡阅使身份发表《致直隶司铎书》,严厉指责教会内部的爱国运动和改革思潮:“一、不容受教于众庶之无神品者。彼此既将中国政府旧有之上下等权威的推翻以后,改造共和国家,遂梦想教中治理亦然改变,其思想之纒繆,盖无甚于此矣!二、不容受教于报界,报界中虽有教中人主政,但为欲悦报人起见,亦不能不大放阙词,恣意之余,轻率悖谬,不诚信,不确凿,盖往往而有矣!三、不容受教于耶稣教人,该教于基督要理且不同心,而于煽动人心,则用种种方法,有时且危及公安,意在增其名誉,展其权力而已。”(《圣教杂志》1920年4月号)○11月30日,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通谕虽然对普世教会而发,但切中在华天主教会积弊。通谕说:“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先务,当就所在民族、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自相投合,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地人心,当何等惊奇耶?且较其他一切人等稔知何法可令输诚服教,加以地方上又可随便进出,往往为外国司铎,欲置足而不能者矣。……盖筹备本地铎曹,非令其以

较卑之服务，辅佐外来传教人也；乃令其负荷天主之任命，于管理本籍人民，终有一日确能承受之也。”通谕认为，于异国传播圣教者应将父母之邦的利益和光荣置于教会的利益和光荣之下：“假如见有传教之士，竟忘却本位身份，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之权威出乎中道之外而伸张之，母国之光荣加于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乃为宗徒用功极猛之疫症。”（《教宗本笃十五世通牒》，《马相伯文集》，第231~235页）○是年，马相伯为陈垣《明李之藻传》作序。又为重刊《灵言蠡勺》作序。○马相伯撰《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批评西方教士垄断教会权利，向教廷呼吁实现中国教会本地化。

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通谕

凡通牒，言皆足法。此译悉按原文语意及字义，且句法之先后，非不得已，亦不敢颠倒。大抵西方句法，先言果，后言因，故梵译为免颠倒，每用何以故等句以间之。今亦不敢承用。然所译似尚勉强可懂，足见华文亦可达精深之理也。阅者谅之。

爸爸，教宗之通称。通牒普天诸宗支诸首领大司牧、诸总司牧及众司牧，为圣信应普传天下事。爸爸本笃十五世祝诸可敬神昆之安泰及宗徒之降福！

开章言圣教会历代之任务。

夫至大至圣之任务，其为吾主耶稣基利斯督言归圣父之顷，所托付门弟子者，曰“汝其往普世，传布福音于万民”也。此任务断不以宗徒在生为限，然当以其嗣位之人继承之而不绝。不绝至世界终穷，不绝至世上有人尚赖真道可获救乃已。

由是“门徒即起程遍地传扬”天主真言，卒至“彼众之声传出普地，彼众之说遍及坤舆”。而圣教会不忘主命，历世以来，从未间断遣使四方，布告天主传授之道妙，辅相基利斯督为人类得救之常生焉。

盖当首三世纪欲摧抑新生教会，狱魔正狂煽风波，层出不穷，而信人之血方到处殷流，但开闢福音先路之声，已广被于罗马帝国之四境矣。

迨后圣教会既得公然享受平安与自由，则宗徒之事业愈益张大于普天之下，类如圣德有名之士，其勤劳之收效亦良多也。就中有额我略号光照者，实引归亚尔默尼亚于基利斯督名下者也；而未多利诺则引归司第利亚焉；弗罗门爵又引归哀弟约比亚焉。尔时巴特利爵之于爱尔兰，奥斯定之于英吉利，高隆巴及巴特弟乌之于司高第，皆使自基利斯督而得常生者也。其后以福音之光照荷兰国者，则有格肋孟未理布劳尔，是乃乌特拉也登第一司牧也；其劝化日尔曼人信受基利斯督者，则有波尼法爵及奥斯加略，而劝化司拉弗人则为西理路与麦多弟乌也。

自是而后，步武宗徒之人，得见开教之区益加推广，于是魏列而莫字路白路克者，遂将圣信之炬烛彼蒙古，而真福额我略十世又多遣首先开教者于中华焉。缘此接踵而往者，则有方济各亚西新之门弟，所建信人会所，不为不多，乃不多时后，仇教之风波大作，遂致散亡焉。

及至亚美利加洲甫经寻获，而效宗徒之士人、之徒众，首当纪念者，厥为巴尔多禄茂拉司加撒，诚多明我会之荣耀也、光明也；专以捍卫哀怜无告之土著为己任，一则免受外人之虐待，一则挣脱魔鬼之囚虏焉。同时又有方济各沙勿略其人者，实足与宗徒比并，在东印度及在日本为显荣基利斯督及救拔生灵事，亦既劳瘁异常矣，乃又谋入中华，抵边关而逝世，俨若以其长逝也者，为开新布福音之路，以通此广廓之区，俾后在华有如许著名之修道会、传教会，热切宣扬圣信之人，得经种种时事之变迁，犹可担任宗徒之事业也。

最后乃寻获澳特利亚之洲，而亚非利加腹地，亦由新进之奋勇坚毅，探测沟通，业皆领受基利斯督圣信之宣言矣。于是虽极太平洋之浩瀚，几无辽绝之岛屿不为吾传教之士有作有为之毅力所深入而周巡者也。况教士之中，既以同胞之得救是图，其奉宗徒之芳表，诞登圣域之极峰者固多，而于宗徒任务之上，冠以致命之荣，毅然流血，证明信德者，正复不少也。

出题，言今日之任务。教外人尚有十万万。

言念我人为敷宣圣信，所服勤劳，既若此多般矣，所尽心力如此其巨，所树坚强不屈之仪型又如此其盛大，而坐于黑暗死影之中者，依然不可胜数，能无惊讶欲绝也哉！盖以最新之统计，教外人尚有十万万之多云。

故余哀念如许灵魂，数既众多，而地位又堪痛哭，按宗徒圣职，使共沾天主救赎之恩，余无有更先之务矣。乃者普天公教善人等，于开拓展申远方传教之义举，因天主圣神之感动，既实多且繁，日增月盛矣。余见之，诚心感心谢，故为相机提倡，策励进行此等之义举，一如余职分及挚愿之所宜，又多行祈祷之工求主光照扶助，乃致是书于汝可敬诸神昆焉。将以劝勉汝众暨汝铎曹原文古义有哲人解，今专指有主祭神品者。铎指司铎之铎。与教民等，为欲讲明此等重要事务，有何良法可利遄行也。

首言主任传教事务者，其职分所在。

兹余所陈言，首对于诸司牧、诸代牧、诸监牧，即凡主任传教事务者是矣。盖圣信之传扬，其责任关系于彼者为最切，圣教之广扬，其希望倚仗于彼者为特甚。

至其传教之热忱为何等，余岂不知？其应制胜之困难，遭遇之危难，为何等多且大？而自顷年来，不但于其所建设及所进行，令无退转而已，又当使天主国有以发皇；事之重大固余所深知也！再者，彼等之对于宗座，其恭顺孝爱，素所著明，为此，慨然布余腹心，若父与其子者然。

职分一，当为传教区内之灵魂。

以故诸务之先，一切主任首当思念者，即如俗云各为所管传教区内之灵魂也。故宜以言、以行，身立善教，教彼所属之司铎及凡助彼职务之人，更宜增益其精神而策励之，惟择夫尤善者是适是从也。盖凡佣于主之葡萄园者，无论何若，当使人人因经验而知之，了然觉悟现今主任传教区者，乃真慈父，勤敏诚恳富于仁爱者也；各人各物，皆以极精之思虑而萦绕之，怀抱之，僚属而事顺，则与同乐；事违，则与同忧；有所雄图，有所创设，其可嘉许者，无不扶持而赞助之。总之，无论僚属有何

事，视如己身之事而已。大抵传教各区，其境地与遭遇，悉视掌管其区者为何如，若居其上者不足以任，或微有不称，则其殃及该区者可至巨也。

且夫人离母国，远至亲，志在传扬基利斯督之名者，率涉长途，时冒险阻，必欢欣踊跃，迎受诸般痛楚，只望能为基利斯督多救灵魂而已。乃如之人苟得一诚恳之长上，长上之贤明仁爱必于诸事有以左右之，则他日之施为，其多收效果可无疑。苟为不然，保无渐因劳苦及拂逆之频仍所困，终至心神不振，而自纵于怠荒者有矣，不大可危惧也哉！

职分二，当将传教之区全行开辟，多建新治，为日后新司牧教区之中央。

再者凡传教之区，其主任自当以区内之进行无已、发展无余者，为第一要义。盖为教务划分之疆土，广袤不论如何，既以全境任命之矣，则居其土者，人人得预于常生之寻获，当然惟主任者是问。纵或于大多数教外人中，引之信教者已有若干千数人矣，断不可因此心安意足。其已得受生于耶稣基利斯督者，固当敦率之，呵护之，煦妪之，勿使有一人为魔害死也，然即自信供职，如职所宜，则不可。必孜孜然尽力无少间，使其他极大多数之人，亦能领受基利斯督之真道与常生，乃可。

故欲人人得耳福音宣讲之言，愈速且易，按其裨益颇多者，即于传教之区，别建总分治所任所，以备将来改作若干新代牧或新监牧区域之中央，待时机已至，不难将原有教区一一划分之。因此余所极愿赞扬者，即诸代牧志事恰符余上所言，恒筹增广天主国，日新又新，设或助理之人，同侪之数，不足以应付所事，则取才于本会本团修士之外，固其意所极乐而心所素存者也。

职分三，当摒除邦族排外之心思，摒除修道团体门户之意见。

反是而以天主之田园，画归其经理之一分，竟据为独有若私产然者，至不愿有一毫得经他人之手，则其当谓让为何如耶？尤其教友之数本不多，而四围错居之教外则极多（此余所

痛陈者,固往往而有也),职既当训导之矣,而已与所属讲道人
数实不胜任,乃犹不肯征用他人相助为理,则其当被天主审判
之严,复何如耶?

然而以传公教为主任者,心之所切本该无他;除非显荣天
主,超拔人灵而已。遇必要时,应从各方面征求辅佐,佐我至
圣之仔肩。其为本会本国人,抑他会他国人欤,何足系念?止须
基利斯督有一切法以传扬之。且辅佐之人不独士子,又有女
士若修女辈者,亦大可用之于学堂、育婴堂、医院、病院及诸慈
善之建设。以上种种,恃主眷怀,知其中有不可思议之神能,以
广传圣信焉。

职分四,当招集神昆时相砥砺。

准此,则善掌一传教之区者,勿以区界自封,视凡界外之
事,宛如局外之事也,惟以逼于爱基利斯督之心,心欲光荣
之。凡见以为有益者,则其有益于己也亦以为实多,当然与邻
界诸同寅,思所以通声气而敦往来矣。盖往往有许多事件,每
与一方公共情形有关系,设非公共解决,其不能也固显然明
白。

然则大有裨于教会者,即传教区所有主任,能一一于约定
时期同聚一堂,使彼此得交换意见,而以互相讨论者匡扶磨砺
也已。

职分五,当施圆满之功,陶成本地铎曹。

今最后一言,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先务,当就所在
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设之,此与新厄格勒
西亚译言公教会传自宗徒,其系统惟圣伯多禄一系未绝承其
统者,号曰罗马教宗。被任命而与教宗直接分治一方得授人神
品辅理之者,号司牧。有国内司牧管理之区,乃可称国内之厄
格勒西亚。所据以有希望者甚大也。因本地司铎与本地人民,
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皆自相投合,谓痛痒相关少隔膜。则
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地人心,当何等惊奇耶?且较其他一切人
等稔知何法可令输诚服教,加以地方上又可随便进出,往往为
外国司铎,欲置足而不能者矣。谓人地不生疏而公私消息又灵

通也。

然欲本地铎曹克如期望而收功效，第一要务是善于陶熔，善为造就，但勿当以一种初级粗浅之教课，使仅仅能行司铎事为已，庶几有成也；必当以充足圆满科目，详尽之教课，一如文明国例当施于司铎者然。盖筹备本地铎曹，非令其以较卑之服务，辅佐外来之传教人也，乃令其负荷天主之任命，于管理本籍人民，终有一日确能承受之也。诚以天主圣教既属至公，公则无一国民，无一邦族，可据为私有而令他族。可目为外来之客教。然则各国人民当然有居圣职神司者，为本籍人民等主诚之明师救灵之先导而从顺之矣，以故不论何地，凡本籍铎曹治理颇敷，学术颇优，而于本位圣召亦足以相称，然后人谓其地传教之功业，已庆告成，教会之根基已然确定，是乃理所至当；纵或而今而后，仇教之风波大作，思有以摧残之，但其地教会，既得此基础，具此根基，仇敌之猛攻，庶不惧其肆害也矣！

承上所言，如此重要职分，宗座已再三敦促各方传教区长，真心注重实力奉行矣。夫宗座关怀此种之诤谏，则罗马修学院，有古有今，用以陶植外方神品，尤以陶植用东方礼者，皆可证明之也。乃经历代教宗谆谆训勉以还，惜乎尚有多处，迄今已数百年为公教信光所朗照，而求本籍之铎曹，非名次较低者不可得也。且间有数国人民，早被福音之光化，步趋人道而弃獠俗，驯致各种文明之艺术皆有超众之人材；又有阅多世纪，为福音与教会超生之道力所熏陶者，然尚不能乡贡司牧等，而受其统治，或司铎等，有典型足以感格乡人者也。

从知各处至今，所习用以陶冶铎曹，供传教之职者，其规制不无残缺不完，谬讹不当之处。余思有以去其阻碍，特命传信部院，按殊方异域所可适宜者而规定之，其秧田院原译意犹秧田苗圃，寓有期望成材之意。比译修道院似较明了。或为每一分区所独用者，或为多数牧区即归司牧权下者。所共用者，凡应建设者则图维之，凡已建设者则厘正其管理之方，但尤当加意忧勤，凡属代牧与否之其他传教各区，所有新神品等，务使长养有成也。

次言传教士职分所在。

余今告尔有众，至亲爱诸神子，既一一佣作于主之葡萄园，是则在尔掌握之中，有如许人灵而待救援，及基利斯督之上智而待阐扬者，至切近也。尔有众第一要心目前思维职务之崇高阔大，尔所殚竭勤劳而不置者何耶？此与世人小知小识相去远甚，盖所托付于尔者，乃神乃圣，乃凡倒卧于死影者，而移近以光明，奔堕于死亡者而开示以天路也。

职分一，当旨趣清明，毋以世间母国加诸天国之上。

故洞明“忘尔乡民，忘尔父家”，是向尔各人言之者，则当省念尔非传布世人之邦国，乃传布基利斯督之邦国者也；亦非为在世之本乡，乃为在上之天乡而收录郡人者也。

噫，堪哀痛矣！假如见有传教之士，竟忘却本身位分，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之威权出乎中道之外而申张之，母国之光荣，加于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实为宗徒功用极猛之疫症，使传福音之喉舌，于爱灵之筋力全弛，而于民间亦亏损其信用之权也。盖人即羌蛮粗鲁，亦颇知传教士自所谋者伊何？求于彼者伊何？苟非彼众之神益而别有所营求欤？则其寻声逐臭，亦颇锋利无前，有不期然而觉察者矣！设令传教士但有几分参用尘世谋为，并不全以宗徒之为人自处，且示人于本邦国事已亦宣勤，则其种种事功，立即招来万众之疑猜，疑猜本易引人到此理想，即以基利斯督之教为某外洋邦族之私教云，而凡奉此教者，遂见以为服属于外洋郡国之保障与政权之下，而反脱离本邦郡国之关系也，名分也。

其致余以大恫者，厥惟所发近年教务周刊等记注，记注中显见其猷为于恢张天主教国不如增益本郡国之版图也。再余所骇怪者，其人曾弗丝毫顾虑已所记注者，足以离间外教人心距远圣教为何等耶？

职分二，当坊表清廉，不自私不自利。

夫传公教，而欲名实相符，讵可如此？然当常自回思，万万不为本乡邦族，实乃为基利斯督效其使命，必如此立身行己，足使人人一无犹豫，即深信其为教会之有司也。教会者，固

包举万民，凡以神明、以诚实，钦崇天地大君者胥是，天地无一国民可屏诸身外国外。盖“教中本无四裔，犹太外皆称四裔。与犹太、割身与未割、戎狄与夷蛮、臧获与主人等类别，惟知有基利斯督真是万有万类，基利斯督真在万有万类”而已。

又有一事，传教人当加意防闲，毋愿于人灵外有其他营利之为是矣。但此事不待多言也，盖人为贪利心所牵缚者，如何能一意图维天主之光荣，悉如其职之所宜；乃又止为丕显主荣，康济人于安全之地，遂甘心罄竭其所有与性命也耶？加以为斯之故，损减其信用于教外人前者实多；若营求财物之心，心以从恶之如崩也，或以流为怪吝之恶习，则损减尤锐甚；况吝恶之秽德，无有更为轻贱者，亦无有更为天主国尤不相宜者也。故善布福音者，又当于此勉随四裔宗徒之后，谓圣保录。且不独于其劝谕弟貌德所云“有食，有衣之盖体，当知足”已也，抑且于其推尚俭德之高风，甚至万机丛集之躬，犹以勤劳手自谋食也。

职分三，当致其知知必要明于庶物。

但为传教士者，于未赴宗徒职务时，即先当用精深预备之功，虽有人言不须有如此众多之学问，为往与人文阻远之人民而传以基利斯督也。盖使人心改迁得救，虽道德之光仪较胜于文学，此固无可疑议者也，然苟不以道味之腴，善自培养，则有许多可助收神职之功效者，已将时感其困乏也。往往是因书籍之无多，又少博学士可与往来咨询，而凡有考求种种抵排信德之端者，详答之，职所宜也；又凡疑问，纵或难乎其难，剖析之，亦职所宜也。为此，愈见其练达，则民间推崇愈甚，若与相处之人民，以求道求学为重为荣者则尤甚。倘于此类，宣传真道者，反为从事诡道者所压胜，亦太不成事矣！以故凡蒙主召，供传教使命诸修道学生，学生时应如法陶养之，而按各科课程，圣学欤，俗学欤，凡为传教士所需要者，法当一一教授之。上所言预备事，余亟愿恰如理所当然者，亦推行之于教宗午而巴所设之传教部大学院，院中余并命独建一讲座，与传教职务有关之专门学，自今而后，世世讲授之。

职分四，当精熟传教处国语国文。

夫传教异地者，将致身超度其人民也，自当有所讲求有所精研。研求之必要，首屈一指者，当属异地之言辞。言辞仅略有所知，詎可心自满足？必也言能达意，而无乖词理乃庶几！盖对于人人，庸众欤，学士欤，其应负之责等也。且谁不知人善辞说，何其能易致众心输诚服教耶？尤其传教士果勤恳，则于讲解圣教要理，不可委诸助教问答之人，当视如独有之权，职守中极重要之分而自操之。因奉天主差遣，岂为他故？无非使宣传福音而已。又间遇应如圣教中之信使经师也者，而与民间之首领相周旋，或为文人学士邀相聚会，苟格于辞命之未谐，不克表诠其所见，何以保守其分位乎？

近者余每萦怀此事，谋所以增多恢广公教之名籍，故于罗马特建讲学之簧官，俾愿献身修宗徒之业劝东方之人者，于东方语言礼俗，得以融会贯通，其余应有之修能，亦得朝薰夕慕以迈往焉。此等建设，以余视之大为合宜，遂利用此机会，敦劝诸凡职掌修道之家众而奉任命传教于东方欧洲之东，非亚细亚乎？之长上，务使所管学生，拟往该方传教者，咸得按此模楷善自培植，而加以琢磨也。

职分五，当励德行心于祈祷而爱内修。

然凡善自振奋，效职于宗门者，必须有所修备焉。万事之先，有一关系极大又极重要之事，其即余上所言一生之德行乎？盖欲称扬天主者，须为天主之人；谕令痛恨罪过者，须自痛恨罪过。何况未信之徒，其为情感所左右，胜于理论，则宣扬圣信，德表之为功，胜于口说多多矣！以故传教者，固当富有神智心力，为众所称，渐摩以各种道艺，涵濡以各类人文，但弗附益以行谊之无愆，则于超救人民，其效力无多，或且一无所有，而能致害于己于他人者，则至巨也。

因此传教士须守谦听命，而身心贞白，尤莫要于虔诚，专务祈祷圣功，与天主常相契合，又在主前为众居间恳切以求焉。盖与主愈心契者，蒙主圣宠神助亦愈丰也。盖聆宗徒之训言：“汝众应如天主所预选者，所作圣者，所钟爱者，惟德是衣，

衣仁爱之中肠，衣慈善、谦恭、端方与忍耐也。”藉此德行之功，用以潜除一切障碍，开一平坦之途，径达人心，心志绝无如是冥顽，至能坚拒之而无难色也。

是故传教者果能如吾主耶稣爱德炽然，纵或外教中有无赖之极者，但既同为天主所救所赎，自当列之于天主儿女之中，不因其无人道而生忿怒，不因其风俗颓败而加疏慢，不之眇视，不之厌憎，不猛不刚以相待，惟根教友恺悌之心，施诸德惠，谋所以诱导之，终有一日，纳诸善牧基利斯督怀抱之中也。

准此，有《圣经》一段，可常存想：“主何其善哉甘哉！尔神之于万物也，故于有过者则分番以谴责之，犯罪者则董戒之、提命之，俾与罪恶分离，得信向于尔焉。主乃自主其神能者，既宽和以审判我等，又大加虔敬以安排我等也。”异哉！主治人犹以虔敬，人治人当何如？

夫为耶稣基利斯督之使臣而如此，尚何困难烦扰危疑之有，可令抛弃前功哉？盖必无之事矣！且必竭诚感谢天主，主委己以如此崇高职任，任何违忤艰巨之投遗，为坚忍一切，凡劳苦、凌辱、困穷、饥饿、死亡，死亡纵极凶残，无不具大雄心以迎受之矣！只愿救拔一灵魂于地狱之口焉耳矣！

传教士情所感发，心所操存，端于吾主基利斯督，及宗徒之坊表有如是，自可往奉其职而无惧，但己所凭恃诸理由，仍全在天主也。余已言阐扬基利斯督之上智，全属天主之工，盖惟天主能深入人心，以真实之光，朗照明悟，以德义之炬，熏炙欲司，并赋与人以相当之道力，使所知为真者善者，既信从之，又实践之，故传教人虽劳勤，主勿左之右之，勤奋亦徒然。然不可因此而不奋励无前，以趣事功，要惟仰恃天主圣宠之呵护，天主圣宠固未尝有求之而或负者也。

又次，言妇女辈宗徒之事。

兹有不容默而置之者，厥惟妇女乎？妇女自教务开创之初，即殷勤辅助翼戴福音开道之先驱焉。其尤足称赞记注者，即自献于天主之贞女。贞女辈靖恭奔走于传教之区，委身于教

育儿童及各种慈善之举者久矣，余兹愿称述其功勋者，使其立功于圣教会，愈益振奋精勤而已，然当详确无疑者，愈刻意勤求一己之修成，则所作之工亦愈占胜利也。

复次，言教中人之职分。

今愿告语普众，凡蒙慈悯天主之宏施，具有真正信德者，且缘信德得沾无数恩膏者，首当注意对于传授未信之徒圣教者，众有何等尊严之职分以赞襄之，盖天主“命令各人念其亲近”，同类也亲近之祸灾愈大，则命令之煎督之也亦愈严重。然人类之急需兄弟相援者，孰有甚于未信之徒？既不识真主，而为无目无羁之情欲所牵拘，服属魔权之下，万般奴隶无更惨痛者矣！故凡各量财力资助以光照之，尤其辅翊传教人之善举者，可谓于极大之事，克充道谊之分，又以极欢愉之致，报谢天主信德之恩也。

但所谓辅翊云者，其类有三，皆足以股肱传教，而为传教士所不断虔求者也。

第一类，为传教者祈求，即虔祷宗会是矣。

第一为人人可自靖者，即仰求天主福膺传教是矣。余已一再言之，传教士虽殫竭勤劳，苟无天主圣宠滋培之，皆泯没而无用。圣保禄有言曰：“吾栽植之；阿宝劳灌溉之，然惟天主与以生长。”而求得此圣宠惟一之途，端在谦恭祈祷有恒而已。诚以吾主有言：“于种种事，凡有所求者，我父将与以有成也。”今于此事而有祷求，他事姑弗论，此则于天主无更嘉尚者，无更快慰者，其不能阙无功效有断然矣。故如义撒厄人方与阿玛勒之战争也，时则有每瑟在山颠，举手仰求天主以援助焉。今传布福音之士，在主葡萄园劬劬自效时，诸为基利斯督信徒者，不当以祈祷神工拥护之乎？正为善尽此职，所以有名为虔祷宗会者之设焉。是会也，余特叮咛嘱咐善信徒众，甚望无人自外于是会，苟不能以事实，要皆愿以心志预与宗徒事业之勋劳也夫？

第二类，挽救传教人之阙乏，职在诸司牧及掌修道院者，有以辨别圣召而煦妪之。

第二事，传教人之阙乏，应有以补救之。以前本即无多，于今战事告终，其少已极，致有吾主许多田亩，治佃无人。为此余特属望于尔等之忠勤。勗哉可敬神昆！事在尔等力行之，无更足为爱护圣教之征者。倘于所属铎曹及秧田院内人，苟显有宗徒道种，则当勤勤恳恳以滋培之，勿为表面之理、俗人之见所感动，俨如容许往外传教，即于尔牧区之利益有亏也。盖遣一人往外，天主将于区内，为尔曹振兴多多有用之司铎以代之矣。

凡管领精修等会会务，传教外方者，余且求且恳，其委赴若尔神工者，要莫非会中之上选，形于外则品行无瑕，爱主热而救灵切者也。又凡管领者，既知本会传教士颇能善导某族人民，去其旧染之异端，归向基利斯督之上智，且立有基础巩固之教会者，此乃基利斯督之精兵，宜遣往他处，使振拔其人民于魔鬼之手；且凡为基利斯督所寻获者，甘留与他人培植长成，益臻于善而无所吝惜焉。夫如是，其救灵也不啻收获之丰穰，而各人本会将邀天主仁爱之施亦极浓厚也。

第三类，各按财力扶持传教之功，如传信会圣婴会圣伯多禄会传教会等。

最后则财源也，所亟需以保持传教事务者，且孔多矣。尤其大战以后，其需要之增加，至无限量；诚以如许多之学校、施医院、留养所及其他救济贫困等施設，俱被摧残荡灭无存也。余由是向诸善人等为将伯之呼，呼起好施之德，各如财力以自呈也。盖“凡有今世货财，见兄弟有急难而封锁其慈肠者，爱主之德何能存在于彼耶？”夫若望宗徒仅就窘于身外物用之需者言之，已如是，然则今既事关传教，其爱德之规箴当如何益加虔守？盖不独聊为接济无数人民之贫乏困穷及其他患苦而已，抑且特为救拔若尔巨数之灵魂，从傲魔权下，复得天主子姓之自由也，子则不奴，不奴则自由。

是故于传圣教有便利者，其建设余尤愿公教人等慷慨输将焉。而其功业则以所称传信会居首，既屡经历任教宗优奖之矣。由是而冀其效果之极佳者，以后益臻丰盛，余因命传教圣

部，务尽心力以维持之。盖最重在应由此会供给资财，凡传教之区无论已建者，与夫日后当建者，胥赖其补助也。际此传播异端者，既盈于货，又阜于财，余深信普天公教，决不忍令吾党传扬真道之人，反与困穷奋斗也。

其次，余所竭诚嘱咐大众者，即圣婴会之功是矣。功在眷怀外教儿童，俾于去世前得领洗礼；而其所以尤当推奖者，即在我等儿童亦能与会，使早岁洞明信德之恩之重大，则习与他人共致其功以推暨此恩也。

再次不应忽而不论者，即众所称圣伯多禄之会是矣。其职帜端为培养栽成传教区内本籍之铎曹。因此余愿前任教宗良十三世所规定者，举谨敬遵守之，每逢三王来朝瞻礼日，在普世圣堂捐集献仪，为赎非洲之虏者，其钱财应悉数收齐，寄来传教圣部可也。

然欲余所志愿愈切实奉行而廓充之，职在尔可敬诸神昆，应格外设法，指引所属铎曹，规模计划趣向传教之功乃可。大都信众每倾向传教之人，而乐于资助之，事在尔曹善用此等心理之倾向，以求传教各方莫大之利益耳。汝众当知余切愿普天公教司牧区内，皆设立现今所称铎曹联合传教会，会径隶于传教圣部，余为此事已畀圣部全权。此事发起顷自意大利，未几已遍于各方，既足以发展余所谋谟，业由余以教宗恩赦重重宠饰之矣。此固事所至当，盖此会之设，大足以善导诸铎曹之举动，俾启牖信人，救援如许多之外教，又足以推行宗座为利传教计，诸所恩准此类之善工也。

结论，导往深处。

此余论公教圣信遍传于普天，所欲寓书汝众可敬神昆者也。今若人人各如分所当然，教士在外，教友在家，以尽其职，则余深望传教事务，于大战时所遭极大伤损，无几将仍复元矣。余今乃宛闻吾主纶音，曩谕伯多禄者；亦命余曰：“导往深处。”原文“导往高处”，犹言导往海中央也。使余慈爱炽然，愿导今生无数之人置于吾主怀抱之中也。

夫圣教会既恒因天主圣神以生存健在，而则效宗徒之人

又有如许，其职帜非他，自古迄今，犹然以扩张圣教为服务，断不能一无功果矣。再此坊表，庶几激动多人，因善众之恺悌输将，得为基利斯督救护灵魂之数，极充盈也。

伏望天主母，宗徒之后，垂佑大众心愿，使宣布福音者皆得充满天主圣神，而此神恩之征兆及余慈惠之左证，余特慨然颁予汝众可敬神昆暨所属铎曹与教众，以宗徒之降福焉。

1919年11月30日，即位之第六年，罗马圣伯多禄堂颁发：教宗本笃十五世。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97页〕

马相伯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

中国北京教友王学臣、魏子轩、赵乘喆、艾达天、王子真、郑景权，谨上书教宗座下：

远东教务，夙荷哀怜，今所另遣巡阅使光主教，于去年十一月间安莅北京。北京教友等虽请见无由，但光主教去后，由别处抄来法文二十八条，谓系圣座垂询之件，并准教友据实陈情。故敢具书，择其考虑会同者依次奏答，其归主教商定者则谨付阙如，壹本信仰之诚，用副哀怜之意云尔。恭肃，跪请圣安，统祈慈鉴。

附呈奏答一扣，法文二十八条一纸。

降生后一千九百二十年二月。

一问：圣教会应用何法以免华人疑忌，不再视为西来之客教，与西国官员之教务？

答：中国教务，自来主教会长等等，皆西来教士，近则西官每多干涉，凡属某国修道会者，且必用某国主教与会长矣。乃欧战既开，西来教士且充兵役矣，何怪体面外教人，亦疑问教友随去当兵否？从知所谓吃教者正指吃粮耳。能无疑虑中外一旦失和，以教友为汉奸，西来教士为坐探耶？但反此以观回、佛，亦属西来客教也，拜墓求经不绝，经像皆非中国文、中国法，……而中国人不生疑虑心者何欤？非以管理其教之人皆中国籍，故不立于国际对待之地位耶？由此以推，主教与会长等

等，既甘断绝俗情，来华传教，何妨按国籍法，亦改为中国国籍？改为中国国籍，则不含各该教士本国政府之臭味，益以证明教宗良十三，于中法战时所与光绪书，在华传教士，悉归宗座派来之语矣。窃谓果能行此，则一切疑忌心，不待烦言而自解。大抵人见强权与之谈道，心怀利用者有之，心先不服者有之。此无他，口教不如身教，身教之开端，毋抑改为中国籍欤？《经》记天主降生，尚愿报名注册矣！

二问：教友应设何等会社，以便感化国人？

答：各堂口应先培植人才，或仿古所设讲道会，或仿今所设公教进行会，皆可。

三问：传教有何种方法？有保守院否？应用何法，俾收实效？

答：北京教区，尚无真正保守院，亦无宣讲所、看书处，以及与外教人接待等事。

四问：能否统一教理问答及经文等？

答：旧有经言问答，本来统一，新译之书，能采用旧译名词更妙。但中外修士不观旧译之书久矣！

五问：誓反教如何传布？其重要处何在？何以大奏功效？应如何防制之？

答：誓反教颇能迎合现今社会，结交官长，征集会友，广立学堂，培养科学适用之人才，重要之点其在斯欤？似不宜徒托空言，“彼无天主圣宠，传教终无大益”；换言之，即听其下地狱可也。

六问：主教区域分合之规画。

答：主教管辖之区，往往因本国或本会修士不多，徒占地盘。又不准他会或他国修士，设立高等学堂，乃关于科学等种种建设，而又不能抵制誓反教人，殊属无谓，徒令区内外教人，少许多改邪归正之机会耳！窃以为大城市，居民至六七十万之多，则学堂与善举，凡可以引人入教者，理应多多益善。为此，断非一国、一会、一主教之精力所能胜任。况如北京与天津，尤为绅商所辐辏者乎？故大城市主教区域，虽分数会数国，各

尽其长以管理，不为多也。

十问：有大区域尚未传教否？

答：外蒙古、西藏、伊犁，以及内地无堂口之区，尚颇大颇多。

十一问：教中会所，应如何改良，以诱进教外？

答：见第二问。

十三问：自来选举传教神长是如何？本地司铎有选举权否？

答：本地司铎向无选举权，更无被选权。

十六问：该传教士学习华语否？其举动能将就人民之习尚否？勉力诱劝外教否？能亲口讲道否？不但借助讲要理先生及教友等否？

答：中国亦有普通语言。语言通，而后社会情形、往来礼俗，始能不隔膜，不猜疑；文字通，而后与士大夫交际有道，观感有方。可惜西教士十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十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至令教与教外，判然两国，格不相通。由此所著之书，所讲之道，惟老教友之明白者，尚可勉强会意，而主教由此则更深居简出矣。

十九问：本地男女修会之建设，其维持之也如何？

答：北方向无本地男女修会，只有名为女修会者，因无真正会长，似难发达。

二十一问：关于修道院，有何热心以选取高等子弟？院内用何方法及何课程，以提高神品之教育？

答：颇闻修道院内，中国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则较前更低。圣教历史且不讲求，科学更无论矣！但中国现今批驳教友者，不独教外人与誓反教，诚以游学欧美、能英语者有数万人，能法语者有数千人。或于报纸，或于杂志，译有欧美教育家、政治家、社会家、历史家、科学家等等名姓书籍，以批驳圣教会者，往往而有。传教之士，学问不高，何以开启华人，维持教务？

二十二问：应合许多教区，设公共之修道院否？何以不遴

选学生遣送罗马？

答：苟不选送罗马，则修道院中，中国司铎永无真正教授资格。能选送中国文已通者更妙，盖读拉丁文更易。然中国人十六七岁中文举者，往往而有，则使十六七岁已通中文，亦不难也。要在遴选者，加之意耳。

二十三问：本地司铎其才能若何？令其担承各等职权否？与闻主教之会议否？派充传教各等职权否？其待遇之也较之西洋教士若何？

答：颇闻西国教士，同会而不同国，同国而不同会者，彼此尚有微言，其书信往来，苟无一二言嘲笑中国人、中国官、中国事，则以为不足动听，有石印铅印可证。故其待遇本地司铎，能令外教人，一望而知为小小当差耳。

二十六问：有大学院否？有为上等社会之学校否？可设立一教会中央区域，研究学问，刊发报章否？学校兼收教外生否？其利其害？

答：窃以为刊发报章，研究学问，诚今日诱进教外人之急务，然非众主教通力合作，则人才不足，钱财不足。

〔《马相伯文集》，第360～363页〕

1920年(民国九年)

圣高龙庞外方传教士初次来到汉阳。○多明我会外方传教会修女初次来到香港。○山林圣玛利亚上智会修女初次来到河南开封。○河南南阳创立圣母无原罪会。○3月，雷鸣远随光若瀚回到欧洲。8月，他前往比利时马林城晋见曼西埃枢机(Card. Mercier)，并推荐赵怀义、程有猷、徐神父和成玉堂可为未来中国主教候选人。在曼西埃的引荐之下，12月27日，教廷国务卿嘉斯巴里枢机(Card. Gaspari)接见了雷鸣远，谈到了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性。○12月28日上午，教宗本笃十五接见了雷鸣远，教宗给了雷鸣远十万里拉的捐赠，请他转交遭受水灾的中国人民。在任命中国主教事宜上，教宗认为症结决不是所谓中国人素质低下，关键是神学训练。雷鸣远认为中国神父的培训是

能够保证的。教宗要雷鸣远将其估计通报王老松枢机。○7月，教廷免去杜保禄直隶海边代牧，调任赣南代牧区署理主教。教廷任命文宾贵为直隶海边代牧。以后教廷又任命遣使会上海办事处经理文致和(Schraven)为直隶西南代牧。○全国司铎九百六十三人，教徒一百九十万四千八百八十三人。

1921年(民国十年)

苦难会会士来到湖南辰州。○7月，法籍司铎于溥泽调任天津耶稣会代理院长并筹备在天津建校事宜。○8月8日，传信部奉教宗谕旨，将江南传教区划分为江苏宗座代牧区和安徽宗座代牧区。江苏南京代牧为姚宗李。○玛利诺会六名修女来华。○9月，大名县城天主堂竣工，名“宠爱之母”堂。○全国公教信徒二百五十六万六千三百三十人。

1922年(民国十一年)

1月22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去世，2月6日庇护十一世(Pius XI)当选。○6月12日，斐乌墨(Fiume)的刚恒毅主教(Celso Costantini)接教廷传信部王老松枢机信，告以教宗将派他为驻中国的宗座代表。7月18日，刚恒毅觐见教宗，接受任命，并在传信部档案室仔细并急切地研究中国教务问题。8月11日，教宗颁布委任敕令。在动身之前刚恒毅将教宗、国务卿及传信部部长训示归纳为如下要点：“(一)我的宗座代表职务，只有传教的宗教性质，因此不得有任何的政治的联系和色彩。(二)对各方我都应尊重。尊重中国政府，尊重外国权利。但是我要保全我的自由，不能为任何外国的政治利益服务。我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教宗。我不代表任何别的政权，我只代表教宗。(三)圣座不干涉政治，有时政治走进了宗教的范围，圣座偶尔也办政治。(四)圣座对于中国，没有帝国主义式的野心。中国应该是属于中国人的。(五)传教事业是为教会服务的。主教的人选，通常是选自各地的本国人中间。外国传教士，为给教外人宣传福音是不可少的。但是一旦在传教区内，若有些地方可以选择本籍神长以建立



第一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像

教会，外籍传教士既能收获自己的工作成果，便要退到别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新的本籍教会。”（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20页）11月8日，刚恒毅抵达香港，登岸后将传信部致中国各教区主教的公函分寄各教区，正式宣布自己来华的使命。12月1日，由香港抵澳门，受到澳门主教 Da Costa Nunes 的欢迎。6日，离开澳门前往广州（7日~11日），期间访问珠江口小岛上的石龙麻疯病院，然后回港。12月20日，离开香港前往上海。27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29日抵达北京，在北堂受到欢迎。30日，刚恒毅拜会法、意两国驻京公使，但婉拒由他们陪同去向中国总统致贺新年。自记云：“我愿意在教会的权益之内，保持我的自由。”○同年，天津工商学院建成。天主教河北献县教区耶稣会正式确定校名为天津工商大学，并以该校将要招生，通知华北各教区。由于溥泽神父任第一任校长，共有教授九人。该校在罗马教廷立案并领取津贴。年底，部分教职员宿舍落成，学校四处延聘教授和讲师，购置教学仪器设备。○6月，传信部王老松枢机部长以书面要求全美本笃会会院全力合作，促成在中国建立一所公教大学。○于斌入吉林省大修道院。○上海天主教《磐石杂志》出版。○宁夏成为代牧，安龙成为监牧区，大同亦成为监牧区。○圣心司铎会来云南大理。○比布斯二心会来广东琼州。○包勒杜马利亚若瑟女儿会来热河。○勒奴维尔天神母后会来贵阳。○圣乌苏拉罗马联合会来广东汕头。○圣若瑟小姊妹会来山西潞安。○汉中善导会成立。○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胡爱德（Huarte）祝圣为安徽宗座代牧。○圣母圣心会在大同成立联合神职学院，并加山西雁门关以北六个县为传教区。大同成立监牧区。○宁夏、绥远脱离蒙古成立代牧区。○甘肃废南北制而改东西二区，陇西成立代牧区。

庇护十一世颁布在华设立宗座代表谕令（1月11日）

教宗庇护第十一世，为制定遗典事。按中国公教，传布已广，所立宗座代牧区及宗座监牧区，亦已甚众。兹欲对于中国人民愈显余雅爱之谊，及煎迫于余心之传教热情，特俯顺该处多数主教之请求，钦定一驻华宗座代表使职。以增圣教之保

护及声誉。余之怀此意，实欲使立此宗座代表使职后，中国人民愈知余慈父之心切念中国，而欲以加惠也；使中国之主教，密相联络，以尽其所任之职责也；使在此广袤之中国，亦如其他国中，得宗座代表之率领，而圣教有优新之发展也。为此余先听取掌理传教事务之罗马圣教枢机等之意见，并将此事各面之关系，慎思熟虑之后，由余自动，按照确定之知识，与慎重之计虑，以余之宗座全权，颁布此谕，创此驻华宗座代表使职，而建立之，至其权限，着以中国五大教区及其所属岛屿，悉隶属之。惟台湾宗座监牧区不在其内。此乃余所钦定；并钦定此项谕文，坚定有效，永久保留，常生应有之效力。现在及将来，凡与此谕令有关之人，悉应充分奉行之。如有反此谕令之人，无论其身有何种权位，知与不知，俱按此谕文以审查判决其行动，悉为无效。以往宗座法典律令及其他与此谕相反之条例，一并申明作废。此谕。

教宗颁布刚恒毅代表的委任教令(8月1日)

今欲遴选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余与职掌传信事宜之罗马圣教枢机商议后，因重视阁下所具之品德才干，欲委阁下以驻华宗座代表之职。因是颁此谕令，遴选并明令公布委任阁下为驻华第一任宗座代表。按此谕教之命令，以余之权威，授阁下以一切必须与适宜之权力，俾阁下能顺利执行宗座代表之职，而能有成。余并训令各方有关人士，认阁下为驻华之宗座代表，使阁下能自由执行全部职务，且在凡百事上有以协助。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18～219页〕

刚恒毅 (Celso Costantini, 1876～1958) 意大利人，字高伟。1876年生于乌地纳。早年随父习泥水工，有艺术天赋。十六岁入修道院。1897年9月，入罗马大学肄业。1899年12月23日晋铎。1901年3月，任公高蒂亚(Concordia)总铎。1906年编有《艺术史》。1913年在米兰创刊《圣教艺术》杂志。1915年任亚奎莱亚(Aquileia)代表总铎。1917年11月至罗马任战地医院服务司铎。1918年12月，任公高蒂亚副主教，创立战时弃婴院。1919年2月，任亚奎莱亚历史博物院院长。

1920年4月,任斐乌墨(Fiume)署理主教。11月,意大利与南斯拉夫订约以斐乌墨为自由市。1921年,教宗本笃十五世擢升刚恒毅为领衔主教,8月24日祝圣。1922年6月12日,刚恒毅接到通知,新教宗庇护十一世拟派刚氏为宗座代表(Delegatus Apostolicus)驻华。自1922年至1932年任驻华宗座代表期间,积极推行天主教本地化运动。1932年因病回意大利休养。1935年6月29日,主持陆徵祥晋铎典礼。12月10日被任命为传信部秘书长。1939年12月8日,发布传信部令,允许中国教友祭祖敬孔。1946年2月18日,田耕莘册封为枢机,刚恒毅宣读册封状。1952年10月30日,教廷宣布册封刚恒毅为枢机。1958年10月17日逝世。著有《残叶》、《零落孤叶》、《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两册)。

1923年(民国十二年)

1月1日(元旦)刚恒毅在北京辅理主教文贵宾的陪同之下,拜会了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1月8日,刚恒毅任用北京西堂中学校长遣使会教区神父赵怀义为私人秘书。1月12日,刚氏离开北京,经保定、正定、卫辉、郑州等教区,23日抵达汉口暂住。3月19日,刚恒毅在汉口向全国代牧发出一份牧函,其要点:(1)把握时机,充分利用已享有的宗教自由;(2)关注转折中的中国,可能出现一个对基督教友善或敌对的新中国;(3)抵御西方物质主义入侵,迫切需要办更好的学校,教育青年。5月15日至6月15日,刚恒毅在汉口召开了一次为次年全国主教会议作准备的预备会议。他召集了五大传教区里各国籍、各修会神长二十三位,其中中华籍七名,共同筹备,刚氏自任主席。此次筹备会议分为七个部,每部三人,都来自不同教区。每部负责整理各自的讨论材料,详细讨论后再将各部的议案汇集在一起,同时将以前历代主教会议的议案汇集参考。会议主要讨论教会的前途和困难,对于中国新文化思潮以及国民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动等对教会有较大影响的问题也纳入了讨论的议题,并以天主教的法律和传信部最新的规定加以框定。此次会议的宗旨是

所有应该讨论的问题都写成议案系统整理，有秩序地提交明年的全国主教会议讨论。○3月1日，北京天主教徒发起募捐活动，在北京奉献一座宗座代表公署。刚恒毅得知以后表示感谢，希望未来的宗座代表公署只须与宗座代表身份相称，无须奢华，并希望是一座中国式的建筑。当有人建议将公署建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内时，刚恒毅明确地表示反对。他说：“使馆区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堡垒形的东西，它的由来是1901年拳乱之后订的条约。主要的使馆都在里面，四周围着高墙，在墙垛上架着机关枪。这个地方构成了一个可耻的纪念品，招惹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自然的，早晚其会消除的。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的耶稣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国人的地区，中国人也赞赏我这种观点。”（《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一〉，第107~108页）6月18日，刚恒毅回到北京，住进定阜大街宗座代表公署。○10月初，刚恒毅与杨家坪苦修院长汪神父（Abb. Louis Brun）、北京教区德副主教（Venderseke）穿越长城到塞外巡视，抵双子树教友村及宣化访问。○10月28日，刚氏从北京出发前往东北沈阳，在当地受卫宗藩代牧（Mgr. Joannes Maria Blois）欢迎，并拜见张作霖。不久，访问吉林，受代牧高德惠（Mgr. Auguste Gaspais）迎接，最后到哈尔滨。刚氏访问哈尔滨的目的是：当时在苏俄统治下海参崴有不少被放逐的拉丁礼天主教犹太人，大部分为波兰籍。教廷任命波兰籍的司利窝夫斯基（Sliwowski）为主教。因在当时的海参崴不能举行祝圣礼，故刚恒毅决定在中国哈尔滨俄人居住区为司利窝夫斯基祝圣，10月23日星期天，刚恒毅在哈尔滨为司主教举行了祝圣礼。高德惠和奥斯特劳斯基神父为襄礼。11月5日，刚恒毅回到北京。○7月2日，天津工商大学第一届招生工作开始，分为工、商两科，学制初步定为本科四年，预科两年。9月15日，新生入学，正式上课。全校教授九人，本科生四十八人，预科生五十一人。鉴于学校初创，且地处偏僻，当时入校者甚少。○2月，教宗庇护十一世捐助北京公教大学创办费十万里拉，并鼓励本笃会来华办校。8月7日，全美本笃会集会，决定接受教宗委托，并议

决由美国本笃会联席会议主席兼圣文森会院院长司泰来(Aurelius Stehle)负责,其他各会院全力支援。救世主会修士初来福建邵武。○蒙弗拉笃进教久佑会修女抵广东韶州。○鲁汶奥斯定会修女抵宁夏。○南林劳来笃修女初抵汉阳。○汉阳、汀洲成立监牧区。○甘培克外方传教会来华。○美国圣言会传教士到甘肃西部、新疆和河南南部传教。○12月12日,教宗任命中国籍司铎成和德为蒲圻监牧,是为自罗文藻以后第一位中国籍主教。○陆伯鸿在上海开办圣心医院,又扩充新普育堂。○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神父抵中国。○全国信徒共二百二十三万三千三百名。全国共五十七个教区。

德日进 1881 年生于法国, 1899 年入耶稣会, 1911 年晋铎。1920 年在巴黎大学讲授地质学, 因教廷对其思想有所疑惧, 被迫离法, 来华考察。德氏在华二十三年, 遍历京津沪、包头、宁夏、榆林、献县、河南、热河、察哈尔、陕西、周口店、沈阳、长春、张家口、吐鲁番、迪化、阿克苏、山西、四川和两广。他曾发现泥河湾无定河及河套地之骨化石, 对中国新生代地层及脊椎动物化石之研究, 贡献卓著, 而且还参加周口店“北京人”发掘工作。著有《神的氛围》(*The Divine Milieu*, 1927 年)和《人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 1940 年)等著作。

刚恒毅抵华以后, 对于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的历史作了仔细的研究, 得出了必须废止保教权的结论。刚恒毅指出:

“外国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是建立在特权的结构上以及制裁上。外国人因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庭的处理。教会在中国的法律地位也和这种结构联在一齐, 这自然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教会也默认在外国条约的范围内。因此传教士以外国人身份来中国, 中国人认为他们与列强同流合污, 教会的地位常常是这样的吗? 不少的传教士说: ‘不要擅自改变条约。’ 天主教会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国中而又在外国政府保护下, 是可想像的事吗? 假如是外国的代表团, 那还使人了解, 但是教会, 那是不可思议的事了。我们来中国不是组织外国机构

而是建立教会。”

〔《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一),第49~50页〕

关于在教案中,中国政府向教会的赔款问题,刚恒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法国保教权的看法。他认为,索要赔款,尤其是政治性赔款是不符合天主教精神的,他将这一反赔偿的问题,反映到罗马教廷后,教廷公布原则,以便在中国的天主教各教区来遵守,其内容如下:

一、凡传教士被杀害,不得要求赔偿,为死难的血而要求金钱赔偿,与天主教会之精神背道而驰。

二、若请求补偿教区物质之损失,应注意以下三点:

(1) 受害的教区要求补偿,须先经教区权力人同意。

(2) 必须向实际负责人请求,若为匪徒所伤害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除非因某些因素的存在。

(3) 以所损失之限度内。

三、有关向中国官员直接谈判事宜,若宗座代牧或监牧向省政府办理时,应尽可能避免外国政府的牵入。若向中央政府交涉得由宗座代表办理。

四、该地区若需要请求补偿时,应有一定限度和爱德,这样符合由天主接收博爱、和平之传教任务,于教外人中宣传福音而牺牲生命。以往以列强之武力所逼之赔款遗留下深痛之血痕,危害教会非浅。

五、若被害传教士之亲属,藉领事及其外交官向中国政府要求适当赔偿,圣座不参与这项交涉。

〔同上,第149页〕

刚恒毅对天主教会与不平等条约联系的批评:

自由传播宗教的准许以及教会拥有财产的权利是1844年拉克内,1858年及1860年葛罗斯,1865年白德眉,1895年热拉得所订立的条约。由此发生法国的保教权,以后其他的国家也订立类似的条约。

中国犯了两种错误:即关闭自守,妄自尊大,不了解西方

的进步也不了解按照国际建立外交与商业关系上的需要。就如日本，不能了解错误，与外国人对抗，有理是不够的。但是必须有力量去尊重本身论证。在国际关系的结论，不幸地，最后的话是以武力为后盾。

中国有高尚的伦理文化，并不过于重视军事上的技巧。这固然是文明表现。可是，在这个新时代愿意与西方国家平等相待，是需要武力的，并且以权力的保证执行法律的威信。

无论如何这些是无关重要，我们感到兴趣的，是研究中国人对教会的心理状态。他们想到这些基督徒国家的行为，给与他们一连串的损失及侮辱。也看到了教会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紧密的关系。不幸地，在以后公布一些使馆的文件中，显然某些传教士协助使馆。

有些公使是财迷或无神派，处理教会案件或卫护自己利益，常用铁硬的手段。有些欧洲政府把一些会士驱逐出境，也不承认他们有公民权，可是在中国传教区却竭力保护他们。假若在中国内地有触及到传教士的利害，在传教士的后面立刻出现了领事的影子；远远地还有在北京的公使。如果教会受到了损失或是一位传教士被害，就强迫中国赔偿。

中国法官处理教友的案件，常怕传教士的干预。因着不平等条约，以及外国人特别享有法外治权，传教区成了帝国中的帝国。

我读到慈禧太后传，在其中有段慈禧太后与直隶总督曾国藩的谈话。曾氏是位大将军，精通儒家思想，以平灭太平天国最著名，也安定南京。下面是有关教会的谈话，慈禧太后说：“我们要坚决自卫反对侵略，传教士继续不断地给我们制造困扰。”

曾国藩回答说：“确实是真的，传教士最近到处制造困扰，传教士与奉教的本国人压迫不愿奉教的人。明年我们应当好好地讨论教会问题。”

刚恒毅论西方传教士在教会内的特权（1923年6月25日在汉口的日记）：

我在汉口就职后几天，有位颇有地位的人来拜访我，他说的一口流利的法文。

谈话的时候，他忽然降低了声音，好像要告诉我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

“我请求发布一项废除向传教士叩头的命令。应当用民国成立后所颁布的鞠躬。以往向传教士叩头作法，现在行不通了。可是，在内地还有这样的作法，并不是我们教友不尊敬传教士，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教外同胞嘲笑或轻视我们。”

这次的谈话，给我深刻地感慨，我很小心地询问一下也了解了以往在传教区订立普通的惯例，凡是有事去见传教士的，普通都要叩头。我所说的“普通”，因为也有例外的时候。教外的绅士是不守这项惯例的，见传教士也不必叩头。

叩头在东方是极其严肃的礼貌上的礼节。当然不会引起我们的反感，对圣体叩头仍然要保留。

应当注意到这种陋习是传教士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得到的效果。而使自己比中国人要高一级。他们受外国政府的保护，因了治外法权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有一个时期，传教士因为皇帝谕旨与知县列为同等，所以他们到衙门去受到仪仗的欢迎。

传教士接受这一切，是由于供职在朝廷而得的名望，希望这种名望有助于传布信仰。

一位老传教士告诉我，中国人的子女每年有一二次在父母前叩头，普通来说，是表示他们的孝心。他说：“因为我们是教友精神上的父亲，他们对我们也有一样尊敬。”

不错，理由很正确，但是，不能让我心服口服。叩头即便是中国人的习俗，但是，我认为与理不合，同时也不适宜在传教方法学上。

耶稣基督亲自给宗徒洗脚，并且告诉他们为给他们立榜样。有一次，他对宗徒们争居首位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你们中却不可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就当作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来不是受服事，

而是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作赎价。”(若，二十，25 ~ 28)

圣保禄宗徒把他的传教方法学放在“一切为群众”，为软弱人，自己也变成软弱的人。

在宗徒大事录上有这么一段事实：几个士兵请伯多禄同他们到凯撒勒雅科尔乃略百夫长家中去：“科尔乃略召集了自己的亲戚和密友，等候他们来。伯多禄进来的时候，科尔乃略去迎接他，跪伏在他脚前叩拜，伯多禄拉起他来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个人。’”(宗，十，24 ~ 26)

科尔乃略所拜见的不是一位传教士，而是基督所立的教会的首领。

传教士固然应当注意中国的习俗，但是我以为首先想到基督教会是个新的教会，应当以天主的爱以及人类兄弟之谊来改良习俗。

刚恒毅论传教区受外国庇护的弊端及中国教会本地化(1月30日日记)：

老河口宗座代牧恩理济主教，答覆有关赔偿问题的信。我认为对这项严重问题应当以宗徒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在任何事上，为避免这职务受诋毁。”(格后，六，3)

恩理济主教的信这样说：“我不敢苟同，没有保护国的保证，中国教会能有今天的进展吗？”

这是全体、至少绝大多数主教的意见，连我也包含在内。是不是正确？假若以人类智慧之光，也就是圣保禄所说的血肉的智慧来讨论这项问题，显然地是绝对正确。

事实上，有不少的教外人，特别贫苦阶级的人，他们进入基督教会是找一所避难所，能得到保护与救助。

某些教区应用丰厚的财产、政治的影响来开办学校，维持教理讲授学校，保护教民等等。在乡村能获得显著的新望教的人。传教士应用熟练的保护方法，在中国法庭上维护教民和望教的人，能使全乡村归化。连那些普通犯罪人，把传教士的保护，当作有利的藏身地。这样的归化教会还引以为荣吗？

我想过分地强调人为的方式，可能因为这种狭隘而微不足道的看法，使人走入迷途。每位宗座代牧只是以自己的传教区和目前工作成果的关系来衡量问题。我是以我们职务的身份来观察问题，就像观察一幅巨大的远景。现在越研究问题，我越相信人为的助力确实增加庞大的数字，可是给与宣传福音整个组织上带来了亏本的精神负担。

中国是个极其古老的国家，它有它的尊严感，像似一位落魄、穷困、软弱的贵族。可是仍然保持着昔日的高傲，尽可能以它以往财富来炫耀。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仍然保持着关闭自守，自满自足的习惯，现在感到在西方人前本身的衰弱，物质文明落后，以前认为西方人是野蛮民族。

国家战败了，得到了可怕的耻辱，日日感觉着血淋淋的创伤似的耻辱，也感到伤害到尊严的深处以及失去了国家的高傲。

不幸地，教会与义和团的问题勾搭在一齐；显然地，有些教区竟然地发了“拳匪财”。因此，教会在知识界的心目中成了不可解开的总结与不良的影响。

此外，上等社会的人，看到一群群的人投入了挂着外国旗的教会。当然穷人的灵魂与富人的灵魂有同等价值的，但是在教外人的知识界及中产阶级认为天主教会显然地是个下等人的教会，或者如同他们所说的：吃教人的教会。

中国自从废弛帝制，一切还没有走上轨道，加以连年土匪到处蠢起，时常有事件的丛生，赔偿问题接二连三的发生。

应当注意的，除了少数国家，大多数的外国政府对中国抱有侵略政策，中国无法应付，也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但是，内心却不屈服。

再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观察这项问题，以中国知识界人士来接受基督教会教义，就等于否认中国过去的光荣历史，不尊重伟大的传统以及对祖先的孝道；也等于说，出卖祖国，失面子，与穷苦人为伍。

那么，目前的问题是在一个广阔范围上的看法。

前几天,天主教大学学生委员会愿意请我做他们的主席,我叫他们请北京的主教。他们向我说:“我们欢迎主教,因为是教宗代表,我们非常尊敬,爱戴法国主教,可是我们不愿丢脸,让教外人说我们是法国人的奴隶。”

西方世界的人归向基督并没依赖政治庇护与赔款。为什么中国人民拒绝归向基督呢?为什么回教传布的那样广呢?为什么佛教拥有那样广大的地区呢?的确回教的教义比基督教会浅易,可是佛教有它的严肃的一面。实际来说,佛教、回教没有带外国政治色彩。

因为受外方列强的庇护,无论在礼仪上,圣教艺术上,在装潢,可以说整个中国教会,我们没有逃脱了西方的统序。对礼仪方面,没有经过研究及罗马的认可,不能擅自修改,可是在其他方面可以不带西方的色彩。

我是传教士中的最末的一个,虽然我的权力是首位,以我的浅见,中国传播福音的工作过于应用人为的方法——如外力的庇护,种族优越感,不公道的财物,已到了历史的末期了。或许也会给某些传教行动个案上带来优势,但是给整体带来莫大的损害。

如何去补救呢?以我看有两种方法:

一、更替——以中国法律的保障来代替外力的政治庇护,这也是光主教视察传教区教务的报告所提到的。我们相信这样的更替不会带来直接的效果,或者至少也含有很大的效果。当然也不会把以往的以及在我们身上可怕的负担,一下子一笔勾消。或许中国人说:“你们的殉教者和在教难时受的损失,我们都还清了!”假若在好的方面来说,能够得法律的保障,判断就会改变了。外籍传教士还是受到公使的保护,因为他有义务保护自己的侨民。这是国际法,也不能伤及任何人。

二、毕竟要建立本籍圣统——有些人说,中国人的才能比较低。现在我们必须说,中国人与我们有不同的地方。少数的西方人顾虑到他们比较迟缓,比较温顺,有时在心理上有些不稳定。但是有特殊本质:勤劳,节俭,深厚家庭感,崇尚文学

及艺术。此外，并不是说一位中国主教被委派去管理欧洲教区，而是中国主教被委任照顾自己的同胞。

中国教友并不比欧洲人低下，往往比他们还卓越。中国教友也有些变节的，可是西方世界的人更群起不绝。中国人也知道为了爱，为了信仰而倾流鲜血，如同教会初期的西方教友那样的活跃。

我想，仇人们从这一方面来协助传教区，马上教会就受到他们的害。“天主岂不是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妄吗？”（格前，一，20）”

〔选自刚恒毅《在中国耕耘》（一），第42~43页、141~145页〕

1924年（民国十三年）

4月15日，教廷成立直隶蠡县宗座监牧区，由中国籍的孙德桢任监牧。○5月15日至6月12日，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全国主教会议，教廷将此会议定名为“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出席大会者有四十二位主教、四位监牧（内两位中国籍）、一位监理、三十六位参议司铎（内一半为中国籍）。宗座代表刚恒毅任大会议长，其次为主教监牧，他们在会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还有投票权；其次是修会的省会长及会长，他们处于顾问的地位，无投票权。其他与会的职员还有动议员、秘书员、证案员和神学顾问，他们在精神上与会议有密切的联系，其他还有纠察、尚仪、门卫、干事多人。大会之组织可分为三个阶段：（一）委员会议（5月16日~30日）先由议长征求列席主教之意见选派委员会，分为五组讨论大会的议案，作公共会议的准备。每组有一位主教任主席。（二）公共会议（5月30~6月11日），就是全体出席的正式会议，会议在洋泾浜圣若瑟堂大厅内举行，宗座代表、全体主教、顾问司铎及所有列席人员均参加，主教们对议案自由发表意见，由秘书和证案员征求投票，否决或通过议案。（三）盛礼会议。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计有5月11日开幕大礼，5月22日追思已亡故主教大礼以及6月12日闭会大礼。所有决议案寄呈

罗马,经传信部用四年时间考量,稍加增益,于1928年由宗座钦准(罗马传信大学中国学生会编:《刚总主教到华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54~55页)。大会使用教会的通用语言拉丁文,没有邀请列强在华外交使节参加。大会决定中国神职人员只要资格相符即可任教会内任何职务,并严禁传教士涉足俗务及政治。大会废除了自19世纪以来中国教会中流行的教徒向教长行的叩头礼。刚恒毅在徐家汇答谢前来欢迎的众多教友的演说中指出:“中国管理灵魂之主教,会于上海,非徇私利,非为政治,惟欲表示服从神长之命令,并欲引人共同服从长命。各位主教为中国求天主,切望中国平安、中国兴盛,至于内政外交,概不干涉。”(《圣教杂志》,《中华全国主教公会议专号》(1924年第7期))会议另外决议将中国教区重新划分为十七个大教区:即蒙古、东三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苏皖、河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黔桂滇教区。大会决定:(1)将成立圣经译委员会;(2)编纂一本供全国使用的统一的要理问答;(3)将成立一个机构,以便在学校、印刷、公教进行与送青年出国留学等事务上协助宗座代表。该教育机构应做到:(A)在天主教学校里为男女学生开设宗教、伦理、国学与科学课程;(B)认真准备适宜于各级学校的教科书;(C)促进天主教修会间的合作;(D)在适当时机出版有关课程方面的书籍;(E)出版无政治色彩的书籍与刊物,供知识分子阅读;(F)译译外文书籍及《圣座公报》(*Sedis Apostolica Acta*);(G)准备送青年出国留学。会议期间,刚恒毅率全体主教赴佘山朝拜圣母。○《新北辰》杂志在天津出版。○江门成立监牧区(1927年升代牧区),武昌成立监牧区(1930年升为代牧区),察哈尔代牧区改为西湾子代牧区,满德始被任命为保定代牧。○6月,传信部长王老松枢机报告:美国本笃会同意办理在北京的公教大学,拟将大学分为五院:(一)神哲学院,(二)中西文学院,(三)自然科学学院,(四)社会学及历史学院,(五)矿业及工程学院。○于斌赴罗马传信大学攻读神学。○加拿大宝血会修女初次来到河北献县。○太原创立贞女传信教授会。○是年,香港代牧师主教去世,斯巴达神父(Fr. J. M.



1924 年第一届全国主教公会议(上)
刚恒毅与参加全国主教公会议的主教们摄于佘山(下)

Spada) 被委为署理主教。○全国教徒二百二十六万三千四百八十七名、外籍传教士一千五百二十五名、中国籍神职人员一千一百十八名。在办事处工作外籍传教士三十二名,外籍苦修会司铎十五名,中国籍苦修会司铎十一名。

列席公会议之主教暨监牧姓氏(以被选之先后为次)

- | | |
|---------------|----------------|
| 1 赵 主教 浙江东境 | 2 舒+ 主教 四川东境 |
| 3 倪* 主教 西藏 | 4 叶 主教 蒙古东境 |
| 5 武 主教 直隶东境 | 6 林* 主教 直隶北境 |
| 7 姚 主教 江苏 | 8 翟 主教 山西南境 |
| 9 翁 主教 湖南南境 | 10 凤 主教 山西北境 |
| 11 韩 主教 山东南境 | 12 施* 主教 贵州 |
| 13 罗 主教 山东东境 | 14 徐 主教 江西吉安 |
| 15 金 主教 云南 | 16 刘* 主教 四川南境 |
| 17 希 主教 陕西中部 | 18 富 主教 直隶北境 |
| 19 田 主教 浙江西境 | 20 刘 主教 广西南宁 |
| 21 樊 主教 江西九江 | 22 易 主教 陕西北境 |
| 23 谭 主教 河南东境 | 24 贾 主教 河南西境 |
| 25 宋 主教 福建福州 | 26 杜 主教 江西 |
| 27 田 主教 江西 | 28 法* 主教 甘肃 |
| 29 蓝 主教 察哈尔 | 30 实 主教 广东汕头 |
| 31 文 主教 直隶天津 | 32 葛 主教 内蒙古 |
| 33 马 主教 福建 | 34 骆 主教 四川成都 |
| 35 翟 主教 湖南北境 | 36 包 主教 河南南境 |
| 37 刘 主教 直隶东南 | 38 卜 主教 四川建昌 |
| 39 康* 主教 陕西 | 40 费* 主教 甘肃宁夏 |
| 41 雷 主教 广东 | 42 瑞* 主教 山东 |
| 43 辛* 主教 高丽元山 | 44 文 主教 直隶 |
| 45 高* 主教 福建厦门 | 46 高 主教 吉林 |
| 47 林 主教 河南北境 | 48 俄 主教 广东(北海) |
| 49 卫 主教 奉天 | 50 恩 主教 湖北西北 |
| 51 胡 主教 安徽 | 52 南 主教 东蒙古 |

53 巍 主教 广东 54 邓 主教 湖北西南

55 贾 主教 贵州南笼宗座监牧

56 高 主教 新疆宗座监牧

57 成 主教 湖北蒲圻宗座监牧

58 孙 主教 直隶蠡县宗座监牧

59 濮 主教 甘肃西境宗座监理

60 J. E. Walsh(华理柱)江门(广东)监牧

61 陶 主教 甘肃宁夏

(以上凡名字有 * 者指未列席,有 + 者在任故世)

列席公会议之司铎姓氏

汪大院长—直隶隐修院

代牧:满公(直隶中) 索公(湖北汉口) 德公(香港)

主教代表: Mannel Litta(澳门) 韩公(山东北) 欧公(甘肃东) 费公(上海) 康公(陕西南) 福公(广东) J. Cdoherly(湖北)

修会省长及会长:刘公(浙江西) 贾公(绥远) 罗公(天津) 任公(东蒙古) 石公(察哈尔) 杜公(山东东) 黄公(厦门) 吴公(山西南) 石公(山东南) 富公(湖北西南) 达公(山东北) 明公(福州) 文公(湖南北) 万公(江苏) 索公(湖北西北) 卜公(直隶西南) Langenbache(湖南) 华公(大同,译音) 钱公(安徽) 富公(山西北) 石公(湖南) 侯公(安徽) 安公(陕西北) 戈公(安徽)

委员会名单

第一组

主教:谭(河南开封) 马(厦门) 刘(直隶献县) 文(直隶正定) 恩(湖北老河口) 南(热河) 巍(广东广州)

司铎:晁(徐汇) 张(察哈尔,华铎)

第二组

主教:宋(福州) 蓝(察哈尔) 文(天津)

包(河南南阳) 卫(奉天) 胡(安徽) 邓(湖北宜昌)

司铎:孟(北京修院院长) 成(山西,华铎)

第三组

主教:富(北京) 易(陕西咸阳) 高(吉林) 高(新疆监牧)

司铎:德(香港) 黄(福建籍) 卜(献县耶稣会会长)
富(湖北) 胡(宁波,华铎)

第四组

主教:武(直隶永平) 韩(山东兖州) 希(陕西西安)
贾(河南项城) 葛(绥远) 实(汕头) 雷(韶州) 成(蒲圻
监牧,湖北人) 孙(蠡县监牧,北京人)

司铎:法(甘肃主教代表) 吕(福州多明我会长) 万(江
苏耶稣会会长) 福(广东) 艾(湖北)

第五组

主教:樊(九江) 翁(湖南衡州) 骆(四川成都) 凤(山
西太原) 汪(苦修会大院长)

司铎:恪(香港) 康(陕西) 罗(遣使会监铎) 濮(山东
南区)

〔《圣教杂志》,1924年《中华全国主教公会议专号》(第三
十年第七期)〕

1925年(民国十四年)

2月,美国本笃会圣文森会院司泰来院长率领奥图尔博士(Dr. George Barry O' Toole)等一行来华从事筹建公教大学事宜,辅仁大学建校工作正式展开。本笃会以二十万美金,购得前清载涛亲王之贝勒府为校址。3月2日,双方完成承租签约仪式,地点位于北京西城定阜大街,计地六十余亩,房屋四百余间。签约以后,本笃会发表创立公教大学宣言,由英敛之拟为中文,马相伯润色修改。不久,即先开大学预科一班,名辅仁社,聘英敛之为社长。邀请陈垣、张蔚西等任教。英氏著《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并译成拉丁文分送全国神职界。○4月,刚恒毅在河北保定为满德胎主教祝圣。○青岛成为代牧区,沅陵及永州成为监牧区。○4月24日,上海青浦佘山新堂奠基。○本年为

天主教第一次大公会议一千六百周年纪念，教廷在梵蒂冈举行传教展览会，中国各教区均有展品参加，展览会于12月10日闭幕。○开倍克外方传教会抵四平街。○司各包罗勃培夫外方传教会抵处州。○印五伤司铎会士抵易县。○奥斯定第三会教学修女抵常德。○孔万仁爱会修女抵辰州。○方济各会服务医院修女抵济南。○汕头代牧区中其余区域都划给美国玛利诺会。○内蒙古地区有一百八十七位圣母圣心会士、三十位中国籍神父、一百二十六座教堂、十四万信徒。

美国圣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

《易》云，穷则变，变则通。古语云天不变，道亦不变。骤观二说，若甚相反者，然其实所谓不变者，乃形上万古常新之真理，所谓变通者，乃形下因时制宜之事物，初无背触，殊非不相为谋者也。

圣本笃诞生于千四百年前，当欧亚文野诸国变迁纷扰时代，北欧蛮族南侵罗马，致希腊拉丁文化渐灭殆尽，故于不变变通两端俱收并蓄，乃欧洲不绝如缕之文化，非惟卒赖以绵延而保存之，且实为刮磨蛮野陶铸文明之大枢纽，史册昭昭，讵容诬罔。今本会创设大学于北京，一本斯旨，不避烦赘，更申言之，即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最精者，并保存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舍短取长，不使偏胜，此物此志也。

中国与本笃会，于精神上有特别融洽之点，兹特视缕于下：中国以尊古右文为隆，而本会亦以则先法古，补苴而张皇之为事；中国农业国也，而本会亦以服田力穡，传种改良为职；中国古国也，而本会成立亦千数百年；中国人民喜修持，尚净业，琳宫梵宇，远近相望，而本会则重汲引，务神功，修院亦蔓延于欧美。然则本会之来，可使中国博爱高尚之士，集思广益，得所皈依，而形上形下道德事功，皆可满其欲望矣。

今日之中国为何时耶，乃分崩离析，喧呶攘夺之秋也。当此之时，无论身外之货财，固可见攘，即身内之志趣，亦将被夺。夫天下之事，千人成之不足，一人毁之有余，千日成之不足，一日毁之有余。今数千年固有之道德学术，竟吐弃



北京辅仁大学旧址

进绝毫不顾惜，将使有断种绝根之忧，有心人能不怒焉伤之，最可惜者，粗解横书浮慕西法之辈，袭取人之皮毛，牺牲其所可贵，买椟还珠，邯郸学步，此其类矣，而本会适于此际来华，冀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亦为昔日之效忠于欧洲社会也。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东海西海，理同心同，非可限于种族，囿于邦国也，苟但醉心欧化，裨贩唾余，致失其固有之良，岂非下乔入幽，而不善变者耶。今本会办此大学之人，虽皆美产，然其来华本意，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群之士，本此志愿，同功合作，数十年后，不假外力，该会该学，纯为中国自主自立之机关，即达其志愿矣。

至于本学之课程，此际尚难拟定，盖必审查社会所需要，及人民所缺乏，以定从违，其属必要之门则有五：（一）神学及哲学，（二）中外文学，（三）自然科学，（四）社会学及历史，（五）矿质及建筑，此外仍需添设预科，以备门径，至何时始能完全成立，则预算建筑设备诸端，约以四十年为期。

中国今日情形，渐入实业革命时代，与欧洲 18 世纪正同。欧洲煤铁物质之文明，已插足于中国沿海各省，由今观察，旧者日渐消灭，新者日渐灌输，但新者纯为物质文明，又安能包罗超越旧者之纯粹蕴蓄高尚优美乎？杜威博士之言曰，当 18 世纪，欧洲所谓改良时代者，举数千年之文物制度，皆摧枯拉朽而唾弃之。今中国亦蹈此覆辙矣。故旧者虽善，亦被淘汰，而惟新是求。据哲学家及实验家与思想家之眼光观之，世界各国，未有及中国者也，即欧洲实业革命时代，亦不如也，历史中无二最老最大最特别，而又自足之旧文化，能再生于世乎，此不得不改良者也，不然则日就灭亡矣，但改良变化之事，于融合新旧于一炉，乃奇难奇大奇繁之事，故风潮所驱，非数十辈醉心欧风者，所可转移也……杜氏此言，对于中国目下情形，可谓甚合，但彼谓旧文化之重生，与过去时代毫无关系，则不免谬误。请征之历史，可知其是非之所在，当千四百年前，欧洲为极黑暗时代，其时优美之罗马文化，被野蛮种族蹂躏无余，而亚力安邪说，乘时盛行，欧洲大陆，且占三分之二，幸斯时有高隆邦、本笃，二大圣出，联合同志，尽瘁鞠躬，力施拯救，而亚力安邪说乃逐渐渐灭，正如旭日当午，阴霾自消，从前野蛮破坏之情形，徒留历史污点，而今日所修明补正之旧文化，非特重生，而且光华优美，反远超于昔日。

今日中国奇衰庞杂，吊诡涛张极矣，破坏既终，建设未始，而人心之坏，时局之危，虽五尺之童亦知之。顾挽救之术，言人人殊，垂危之疾，方剂杂投，一误岂容再误，然则非有久经试验之名医不可。今真道纯得之于欧洲，往绩既已如彼，岂有不能起我疣疴，引我正轨之理乎。须知破坏者止知破坏，而惟一神圣之建筑，无古今，无文野，具本其真爱，以施维持补救之方，而颠扑不破，历古常新，虽偶晦翳于一时，终必昭明于永久，此固非夜郎自大，妄事矜张，千百年之往事具存，实可历历考也。

本会之宗旨既宣述如右，然创此大学之动机及经过，想亦诸君子所乐闻，一一详述，则连篇累牍，殊劳人目，兹特约略言之。当 1912 年秋季，有二人焉，一为江南耆宿，一为燕北寒夫，

二人者，因见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乃发愤上书于罗马教廷，请遣高才硕德，且非同一国籍之教士，设大学于北京，以示公教之公，非一民族，一邦国之所可限制，旋经欧战，事遂停顿。前教宗本笃十五虽徂落，今教宗庇护十一接位后，注重中华，一视同仁之意，有加无已，以为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会，提倡道德，培植人才，刻不容缓，故不惟以肫诚恳切之词，鼓舞会众急起赴此事功，且更亲捐该校十万义币，以为之倡，并许此后凡属华籍出版著作，均寄赠该校一份，以示珍重。综核前后，关于兴学之事，若燕北蹇夫之于1917年，再上罪言也，教廷之派员巡视各省，详加复核也，奥图尔博士之来华，调查教育也，并亲赴罗马进谒教宗，陈述情形也，又谒传教部总长，罗列利害也，又晤全球本笃会总长，请求进行也，奔走鼓吹，不辞劳瘁，1923年8月7日，全美本笃会，开大会议，而北京建学之事，始行通过。教廷得此复牒，欢忻无量，致函极表嘉奖感谢之忱，因此举使华人最易了然，公教非一民族一邦国之教，而实为普天率土至一至圣至公之教也。其间复杂原因，曲折情节，非数纸所能尽。盖此事动议于1912年，直至1923年，酝酿成熟，始由教廷简定最适宜之美国本笃会总其成，而本学组织之方针乃定，此其大略也。筚路蓝缕，缔造维艰，所望我会士持坚固耐久之心，鼓勇猛精进之气，更望中国贤人君子，鉴此真诚，指导辅翼，以开化最早，地大物博之中国，驯至化民成俗，一德同风，安见其不与欧美并驾齐驱，或更轶而上人，曷胜馨香祝祷之至。

北京公教大学谨述

1925年9月

〔《辅仁生活》，1940年第四期，第12页〕

1926年(民国十五年)

1月10日，英敛之去世。○3月2日，教廷授英敛之圣大額我略骑尉勋章，此章由刚恒毅代表申请。○2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颁布《扩充传教事通牒》(*Rerum Ecclesiae*)，声称：“以后不

得藉口任何事情去阻碍中国籍司铎做本铎区，或竟是本牧区的首领。要依着天主的圣意，从速创立本籍主教的本牧区。”又说：“本籍神品阶级当如初世纪时与客籍司铎待遇平等。……夫以本籍之神品阶级，不能主理本族之教务，无异务农者，不能耕其本家及本乡之田亩，是何道理？使汝等为劝外教者，弃邪归正，易于抽身，得住一处，再往他处，而常行前进，以辟新田。因而以教务业以成立之处，舍而委之以本籍司铎，使其自行保守，而扩张之，此岂非一最为便捷之法乎？”（《圣教杂志》第十七年第十一、十二期）○6月15日，教宗又颁布 *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is* 通牒，声称：“圣教会者，只观此公教之名，大公大共之教也，万国万民兼收并纳，不有种族之区别者也；此盖基利斯督教首之本旨也。……至派遣传教士者，非世俗长官，乃由天主所召，以奉行此神圣事工。……圣教会特别注意使全体教士，尤其是遣往传教各方之上，不稍图谋本国之利益，抛弃私利私业，专务基利斯督之事。”（《圣教杂志》第十八年第十期）○3月30日，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公布教宗将亲自祝圣第一批中国主教的决定。5月，汾阳成立代牧区，由中国籍主教陈国砥任代牧。宣化成立代牧区，由中国籍主教赵怀义任代牧。8月，台州成立代牧区，由中国籍主教胡若山任代牧。海门成立代牧区，由中国籍主教朱开敏任代牧。9月3日，刚恒毅率朱开敏、胡若山、赵怀义、孙德楨、陈国砥前往上海，成和德单独赶往。9月10日，刚恒毅偕同朱开敏、胡若山、赵怀义、孙德楨、陈国砥、成和德等六名中国主教搭乘美国邮船“亚当号”离开上海，经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印度等地，10月16日抵达意大利拿波里，受到盛大欢迎。意大利政府拨一节头等车厢作为中国主教专用。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为六名中国主教在梵蒂冈伯多禄大殿举行隆重的祝圣典礼，刚恒毅在一旁襄礼。雷鸣远特地从比利时赶赴大典，喜极而泪。大典从上午八时至下午一时全部完毕，六名主教走下祭台，祝福人群。晚间，教宗再度接见六名中国主教以及前来观礼的中国人士。然后，刚恒毅陪同六名中国主教开始了一系列的朝圣旅行，他们参加了真福和德理逝世六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巴黎



1926年六位中国主教赴罗马祝圣，此为登轮离上海时的留影

圣母院受到杜朋亚 (Pubois) 枢机的接见，然后从法国转道比利时，12月21日雷鸣远在鲁汶率群众欢迎中国主教，场面至为热烈。比国王后也接见了各位中国主教。○11月，天津工商学院(大学)教学大楼落成，大楼具有欧洲文艺复兴样式。同时，校图书馆落成开馆。12月15日，斐百纳校长到教育部路政司询问铁路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情况，以便确定学校教学内容，茅以升代表路政司司长答以“办理工科以土木科最为适用，并以英文教授为宜”，斐百纳校长“称善而去”。○恩理觉神父(Fr. Henry Valtorta)继任为香港代牧区第四任代牧，6月13日举行祝圣主教仪式。○罗本(Lopham)本笃会士抵四川西山。○卡普清会士抵甘肃。○方济各特规会士及白泛外方传教士会抵齐齐哈尔。○圣高龙庞传教会修士抵汉阳。○美国匹茨堡圣若瑟会修女抵辰州。○贝来圣母赎拐会修女抵抚湖。○加罗沙圣母会教学修女抵猷县。○耶稣圣心会修女抵上海和嘉兴。○救世主会修女抵邵武。○玛利诺会开始在东北(满洲)东南部传教。

六名中国国籍主教简历：

两位中国监牧升任为正式主教。他们是：（一）宣化教区主教赵怀义，圣名雅各伯，北京长辛店人，生于1878年，早年入北京北堂小修院，1904年升神父，长期在遣使会北京教区服务，并担任毓英中学校长。刚恒毅来华以后，任宗座代表秘书。（二）汾阳教区主教陈国砥，1875年生于山西潞城，早年慕方济各之苦行，入方济各会继续修道，1903年升神父，在太原主教座堂本堂。1921年任临汾总铎区总本堂，是太原中国籍神职界领袖。（三）台州教区主教胡若山，1881年生于浙江定海，祖先十二代均为天主教徒，幼时入定海小修院，曾在修院中指导外国修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字。1909年升神父，一边传教，一边在宁波大修院中讲授哲学。（四）海门教区主教朱开敏，圣名西满，1868年生于上海董家渡，早年入董家渡小修院和徐家汇大修院，后入耶稣会初学院，1898年升神父，并在上海浦东、江阴后澄及常熟鹿苑传教达二十年之久，1924年任江苏南通总铎区总本堂，次年兼任海门区总本堂。（五）由蠡县监牧升为主教的孙德桢，圣名默尔爵。生于1869年，1897年升神父，他的拉丁文在当时中国籍神父中是首屈一指的。1901年以后，他在北京北堂小修院中讲授拉丁文达十二年之久，后又在天津、仓县、京东等地传教。因学识丰富而被选为主教。（六）由蒲圻监牧升为主教的成和德，圣名奥多利各，湖北襄阳人，幼时入方济各会，尤长于圣乐。据说他出任蒲圻监牧是由于汤作霖的推荐。

[《赵主教怀义事略》、《陈主教国砥事略》、《胡主教若山事略》、《朱主教开敏事略》、《孙主教德桢生平所记》，见（台）《恒毅》月刊，第1卷第4期。成和德事见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第376页]

1926年9月，刚恒毅偕同朱开敏、胡若山、赵怀义、孙德桢、陈国砥、成和德启程赴罗马参加由教宗庇护十一亲自主持的祝圣大典。抵达次日，即受到教宗的接见。

10月28日，祝圣大典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行，共襄

盛举的刚恒毅在其回忆录中曾记录了这一声光动人的历史时刻：“早晨六时，人群涌入了大殿，……右边高处是罗马贵族席，左边是外交使团，殿内两旁是教会首长，以后是修女、群众。祭坛上的蜡烛都点燃了，照耀着大理石闪闪发光。……突然，大殿入口处侍卫队号令传来，全殿立即肃静，当教宗驾到时，正祭台的灯和殿顶上的灯大放光明。抬轿的人都穿着红锦缎制服，抬着教宗的御轿。瑞士士兵、贵族侍卫队在前徐徐而进。教宗的后面是新主教及其随员。……教宗的祭服是辉煌耀目的，戴着镶嵌宝石的高冠，登上祭台，在大弥撒礼中祝圣六位新主教。青年歌咏团天使般歌声的衬托使仪式更显得引人入胜。新主教伏在地上表示服从，再由教宗手中领油和牧杖，教宗分施圣礼时，又把金冠加在每位主教的头上。新主教则向教宗献上两个饼、两瓶酒，金色器皿在明烛辉耀下构成一幅美景。在优美动人的低音歌声中，教宗在每位主教面颊上施以平安礼。典礼中最动人的是弥撒礼成以后，新主教坐在伯多禄的宝座下，静听教宗的训言。这几位头戴金冠的亚洲人，平日很少有表情的面容，现在却大为感动……。”

持续五个小时的祝圣大典才结束，六位新祝圣的中国主教就从祭台走向大殿外的广场，向聚集在那里的人群祝福。从比利时赶来参加盛典的雷鸣远跪在宣化主教赵怀义的面前祈求降福，两人都感动得泪洒满襟。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享受最大的幸福，不会说话，也听不见人说话，七窍不通，完全白痴，想不到享福享到最深处，竟什么也不觉了。”对比清代初年，罗马教廷公布了对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的任命以后，不少外籍主教竟以中国人不胜此职而不愿为之祝圣。1926年，这六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的声光动人确乎表现了中国天主教中的今昔之不同。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一）第344～348页〕

1927年（民国十六年）

1月26日，刚恒毅乘日本邮船起程从意大利回中国，2月22

日抵香港，不久回天津。3月7日，赵孙二主教回北京。○巴尔马乌苏里拉圣心会修女们来到蚌埠。○圣方济各第三会仁爱会修女来到湖南永州。○广东北海创立圣母会和无原罪会。○2月11日，应河北安国孙德楨邀请，雷鸣远自法国起程返回中国。3月27日抵上海，不久即回到彝县。○9月底，晋军与奉军激战于宣化，赵怀义主教与教外人士一同创立难民救济会，下设收容所，办理救济事宜。5月，刚恒毅视察河北献县、冀州、威县赵家庄、彰德、正定教务，然后回到北京。10月14日，赵怀义猝然去世。刚恒毅立即派程有猷至宣化任代理主教，同时委托程氏主持创办主徒会的工作。○11月，辅仁大学在中国教育部备案。○信阳成立监牧区。○7月5日，陆徵祥进入比利时布鲁日(Lophem-Les Bruges)有八百年历史之久的本笃会圣安德会会院为修士，取名天士比德(Petrus coelestinus)，以六十岁之高龄学习拉丁文及神哲学。当日来院观礼者有中国驻比公使王景岐、驻法公使陈录、驻荷公使王广圻、驻葡公使王廷璋等。○南京代牧区中划出海门代牧区，由朱开敏任代牧。○1月26日，教廷任命希贤(Mgr. Eugenio Massi)为汉口代牧。



陆徵祥像

1928年(民国十七年)

年初，北平成立公教教育联合会，设宗座驻华代表公署内。由下列人员组成：圣言会士苗德秀(P. Teodoro Mittler S. V. D.)负责印刷；巴黎外方会传教士雍守正(P. Georgio de Jonghe)负责学校；美国本笃会奥图尔、遣使会胡神父(P. A. Hubrecht)和程有猷负责中文书籍。○4月，程有猷被命为宣化代牧，7月1日由刚恒毅祝圣。同时程主教着手创立主徒会，在宣化城外购得背山面河、清正远俗之地百亩，于是年秋季正式建成。此会定名主徒，取义耶稣复活以后，二位宗徒赴厄乌马，路遇耶稣，挽留耶稣，以及耶稣分饼赠二位宗徒归耶路撒冷宗徒聚会之处的全段故事。此会暂属本区主教，等成熟以后将隶属罗马教廷传信部。会长为中国籍司铎吴耀翰，目前由西班牙救世主会神父协理，会规亦从救世主会。要求会士具备有学识、礼敬圣体和坚决服从

教宗之热忱。待基础稳固以后将完全由中国人管理。○6月,刚恒毅迁入新的宗座代表公署,该公署原为荣亲王王府。○孙德桢主教委托雷鸣远在彝县成立耀汉小兄弟会,会士皆以兄弟相称,会首称家长,亦称公仆,入会即废本有姓名,雷氏自号“万桑兄弟”,以九字为祈祷意向:“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完全吸收华籍会士,融隐修与显修为一体,“在会院中为苦修士,在外为传教士”。○5月,位于天津工商大学之内的北疆博物馆向社会开放。6月,天津工商大学首届毕业生毕业,华北各教区主教应邀参加毕业典礼。○刚恒毅通令全国教区成立公教进行会。○8月1日,教宗庇护十一世通电承认中国国民政府,是为“八一通电”。8月,教廷驻日本宗座代表贾狄尼总主教(Mgr. Mario Gardini)与米兰外方传教会总会长马纳(P. Paolo Manna)访问北平,见刚恒毅及北京辅理主教富成功。○9月6日,富成功在法国政府支持下在北平成立“道明”学校,不久垮台。○奥斯定重整会会士初来湖南归德,拉克劳司卒世。朝拜方济各会修女初来武昌,山东兖州创立传信协助会。○香港出版《公教报》月刊。○兴安、延吉成立监牧区。依兰、齐齐哈尔为自立区。○11月13日,成和德主教逝世。11月26日,富成功去世,保定代牧满德贻调北平。○12月12日,于斌在罗马晋铎。○中华公教进行会在北平成立,并着手在各教区成立分会。

教宗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八一通电”

圣父以强烈的兴趣关注过并继续关注在中国的事变进程,不仅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关注,而且也以真挚的态度和最显著的同情,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亲手为第一批中国主教祝圣以示关注。对中国内战的止息,圣父衷心地高兴并向至高上帝报以感恩,祝愿在那个国家里得以从此恢复持久的和卓有成效的和平,不仅国内保和平,国外也有和平,并且是建立在仁慈与公正原则基础上的和平。为了达到这样的和平,圣教父表示希望,将给予中国人民的合法愿望和权利以完全的承认,这是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又具有古老的文化、世世代代都有伟大和光辉业绩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们能沿着公正和有秩序的轨

道百折不回地前进,是不会缺乏一个伟大的前程的。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进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1926年6月15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领袖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基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

最后,圣父重申他对中国和平昌盛的希望和祝愿,恳求全能的天主将他丰盛的祝福给予一切子民。

国务卿嘉斯巴里枢机

1928年8月1日于梵蒂冈

〔《教务杂志》,1929年1月〕

1929年(民国十八年)

1月11日,刚恒毅离开北平,14日抵达上海,会见王正廷外长。21日,动身赴南京,由助理主教惠济良(Mgr. Augustus Haouisee)、海门主教朱开敏与中国籍司铎张路加和上海公教进行会会长陆伯鸿陪同,22日在南京拜会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26日,刚恒毅与王正廷商讨未来订立政教协定的一些事项,就以下原则达成共识:(一)保证宗教信仰自由;(二)承认天主教会拥有产业之权,设法以新规定处理教产之方式;(三)承认天主教会拥有创办学校之权利,但须遵守政府有关法令,至于各神哲学院及修道院课程政府不加干涉,但与公共秩序和卫生问题例外,另外小型学校和经文教理学校则完全由教会管理。(《在中国耕耘》(一),第86~87页)不久,法国闻知此事以后又在报上大事批评,以后的谈判只得搁置了下来。1月6日,法文《上海日报》



1929年刚恒毅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

发表《罗马外交》(*Diplomatie Romaine*)一文,认为“将教会交给中国神职之手,会使教会恶化下去”。3月18日,法文《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刊文“宗座代表刚恒毅在各地旅行,法国保教权威望受损”。○2月2日,刚恒毅访问浙江嘉兴遣使会初学院。○5月29日中国天主教青年总会在北平宗座代表公署成立,程有猷任会长,雍守正任指导司铎。○7月14日,刚恒毅到江西省鄱阳祝圣余江主教徐重庆(Mgr. Eduard Sheehan),时赣州主教和若望(Mgr. O'shea)和吉安主教梅雅谊(Mgr. Gaetano Mignani)、汉阳主教贾尔文(Mgr. Galvin)在场。8月16、17日刚恒毅访问唐山煤矿。○9月16日,方济各会士邓炳文主教及柳文德神父(P. R. Fynaerts)在四川巴东山区被土匪杀害。○2月2日,教廷诏令从西湾子代牧区分出集宁代牧区,由中国籍主教张智良为代牧。4月9日,教廷颁令成立赵县监牧区,任命中国籍神父张弼德为监牧。○5月,文贵宾、满德贻、孙德楨在河北清苑县东间主持盛大的朝圣活动,以后东间朝圣成为成规。○9月,

辅仁大学开学,11月3日,刚恒毅为新校舍举行奠基礼,并发表演说:“一个民族复兴的所有危机,是思想方面的。外在社会组织的革新,首先应是内在的革新,是精神上的革新。这座大学愿意作高深的文化工具,愿对中国的复兴有所贡献。”○于斌在传信大学获神学博士并任中文教授。○是年,雷鸣远在安国主持成立“德来”女修会,会规同耀汉小兄弟会。两会会士训练,分为精神、技能、社会、生活等四类,并以各尽所能,自给自足为准绳。设印刷、缝衣、编织、木作等,并创办施食会、平民学校、盲入院等。○美国俄亥俄州若瑟山仁爱会修女初抵武昌,英琴波圣十字架修女初抵齐齐哈尔,圣方济各沙拉修女初抵朔州。○汉中创立宝血会,烟台创立圣母创教会。四平设立监牧区,易县成为自立区。

1929年11月3日刚恒毅在辅仁大学的讲演:

播种者于4月的一个上午,用铁锹掘开土地,把生命的种子埋在地下。我们所祝福安置的基石,不是一个死的东西。我高兴地视它为生命的细胞。因为我要说的不只是这座物质的建筑物,而且也是一座精神的建筑。

“旧约”圣祖雅各伯在一次长途旅行后,非常疲乏就在途中睡着了,有了一个神视(看见有天使由此有的上天,有的下降),醒来之后便在那个地方立了一块石碑作为纪念:人类在其亿万年的艰辛途中,举目向天,渴望能给可怜的人类赋给一个更高的意义。

一个民族复兴的所有危机,是思想方面的。外在社会组织的革新,首先应是内在的革新,是精神上的革新。

这座大学愿意作高深文化的工具,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金言,愿对中国的复兴有所贡献。

那些负责创立这座大学者都是信仰虔诚、富有学识之士,他们是已有15世纪教育经验的本笃会士。

当罗马帝国崩溃时,灿烂的文学、艺术与惊奇的法治组织等也随之瓦解;无数的蛮人闯入帝国,他们的帐篷直搭在罗马的城墙下;这时本笃会建起神奇的精神避难所,那就是在欧洲

各地所创立的许多修院。

古代智慧的火把就在这些修院中延续滋长，同时也蕴育西欧民族的基督文化的种子，并使它发扬光大。

中国目前正由根基起而革新；我们希望这个伟大的民族能突破目前的混乱骚动的局面，能快速完成复兴大业。当我们欣赏如北平的天坛、皇宫，山东曲阜的孔庙之际，我们深受感动，觉得中国人民能在过去的建筑物上，创出这样雄伟的，如以教宗庇护十一世对中国所希望的，能在公义与秩序上立足，那一定会达到复兴革新的目的。

中国文学革新了，正如一个时期在意大利以及整个西欧会发生过的一样，即由拉丁文融入蛮人的土语而产生新的语言。但丁撰写《论方言》(*De vulgari eloquio*)一书与用方言吟撰《神曲》；亚西西的圣方济也用方言咏唱《万物之歌》(*Il Cantico delle Creature*)。

辅大的任务不但要发扬保存古典文学，而且对现代语言也要尽力推广，因为在辅大已预计建筑一座庞大的图书馆，其中将收购珍贵的古今图书，它将是辅大之光。“从这座宝库里，提出现代的与古典的”。

辅大在艺术的园地中，对中国古老文化遗产，愿提供自己的力量。当我看见北平古城墙被拆毁和多少著名的艺术品任其荒废时，我们的心真感到万分痛苦。当看见开始整修重建这些古老建筑时，心中方感到舒服一些。

这种对古老艺术与古老中国文化的重视，可在建筑风格上找到印证，因为这座大厦所采的风格并非呆板的抄袭的建筑，而是中国有建筑风格的复兴，同时也适于现代生活的需要。

这座大学是美籍本笃会士的智慧与慷慨之结晶。我们不愿忽视这些宗教人士的宗教特质，因为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构想，正由于这个宗教特质方能保证创办辅大的意念纯正卓越。

这种宗教特质保证学生的精神受到尊重，宗教学也将以尊严的态度讲授，但学生可自由参与，并非强迫。

如众周知,在天主教思想中孕育着何等的丰富的种子,去完成个人的修养与社会的重建工作。

因为天主教徒在此大学将找到为完成高深教育最稳固的保障。这些修道士的宗教特质也给你们担保辅大并非是个政治结构,亦非是一个商业性的投资,在这方面连提都不曾提,这座大学是民族间兄弟友爱的产物,基督徒之间合作的凭证,是全球天主教友对中华民族纯正而高尚的友谊的表现,尤以美国也是对中国古老与现代文学的进步提供经验与合作。

负责创办这座大学的本笃会士的心意纯正高尚,这些美籍神父已着手准备未来大学中国籍领导者,以便时机成熟时,将此已日渐繁荣的事业交给中国人掌管。

在此大学中除研究学问外也致力于人生活教育的培养,即用严肃的生活纪律陶冶青年,使他们成为的确良善、能干与为祖国有用的公民。

这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对青年学生们的期望。所以教授们在工作认真与服从政府领导方面应为青年们的表率:这就是天主教道德的基本原则。

诸位先生现在把我们的理想和祈祷奉献给天主,它是所有智慧与福祉之源。希望它祝福这块大学基石,使这座大学能成为圣德的温度,分散光与热,即培养基督徒之爱与无限的力量去改造重建世界。

〔录自《在中国耕耘》(二),第139~141页〕

1930年(民国十九年)

1月31日,刚恒毅动身从北平去四川,经郑州、汉口,2月10日抵重庆,住重庆主教尚惟善(Mgr. Alois Gabriel Jantzen)公署。2月24日,刚氏在重庆祝圣中国籍王泽溥神父为万县主教,王文成神父为嘉定主教。尚惟善及叙府富主教(Mgr. Fayolle)襄礼。3月初,刚恒毅经万县、宜昌、汉口、沙市、上海、青岛回到北平。○3月20日、4月1日、2日、5日、9日,法文《北京日报》(*Journal de Peking*)连续发表文章,攻击刚恒毅在中国的活动旨

在破坏法国的保教权并减损法国在远东的威望。并为法国倪神父 (P. Garnier) 为诋毁雷鸣远所写的《魔鬼在中国》(*Diabolus is Sinis*) 一书喝彩。3月30日,刚恒毅致函法在华公使表示关注和抗议。○5月16日,刚恒毅由秘书马神父 (P. Massi. O. F. M) 陪同,前往保定巡视教务,17日赴东闾,18日在东闾举行大礼弥撒。24日返天津。○10月26日,刚恒毅从北平动身回意大利,行前拜访英国驻华公使蓝普生爵士 (Sir. Lampson); 11月3日抵香港;9日,前往韶州,为已故的韶州雷鸣道主教的继承人耿其光 (Ignatius Kanazei) 主教举行祝圣典礼,广州魏畅茂 (Antonius Fourquet)、江门华理柱主教襄礼。20日,刚氏离港回欧洲,12月20日抵意大利布林的西港。22日抵罗马觐见国务卿巴切利 (Card. Pacelli, 即后来的庇护十二世); 23日,觐见教宗庇护十一世;24日见嘉斯巴里枢机。○1月,满德贻被任命为北平辅理主教,保定教区交中国籍神职管理。○蚌埠、安庆、衡州成为代牧区,永年成为监牧区,中国籍神父崔守恂被任命为监牧。○平凉成为监牧区,新疆、梧州成为自立区。○汾阳代牧陈国砥逝世,刘锦文主教继任。○香港仔神学院(后为华南总修院)奠基。○美国本笃会修女初来北平,嘉布遣会第三会圣家女修会修女初来平凉。○安徽宗座代牧区划分为芜湖、蚌埠和安庆三个宗座代牧区,耶稣会卡斯蒂利亚、莱昂、都灵省会各得其一。○全国教徒达二百四十九万八千零十五人。

1931年(民国二十年)

1月14日,为元代来华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真福和德里逝世六百周年,意大利教会在其故乡 Pordenone 及葬地伍地纳 (Udine) 举行纪念仪式,刚恒毅发表演说。○3月5日,刚恒毅在罗马传信部作《中国的危机》及《中国传教区的悲剧》为题的讲演,时传信部部长王老松枢机在场。3月8日《罗马观察家报》以及巴黎《十字架报》刊载其演讲。○6月10日,刚恒毅从特累斯特 (Trieste) 港乘船赴美国纽约,住玛利诺会。后访问波士顿、底特律、巴尔的摩、费城、华盛顿、旧金山。8月17日返北平。○3月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法军防守上海法租界(上)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徐家汇天主堂保卫团(下)



姚宗李主教像

26日,中国籍遣使会士周济世出任保定代牧,临清成为中国籍监牧区。赵县升为代牧区,张弼德任赵县代牧。益都、澧州、丽水成为监牧区。威海卫成为自立教区。榆次、大理、三原、岳州、齐齐哈尔为监牧区。○门德斯始孕无玷会修女抵济南。○耶稣孝女会修女抵安庆。○海门创立小德肋撒会。○兰州创立圣家女修会。○是年华北水灾,教宗庇护十一世捐助十万里拉,刚恒毅募集四万二千余元赈济灾民。南京代牧区募集五万余银元寄往灾区。○是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东三省。马相伯以九十二岁高龄,应《益世报》之请,向华北同胞发表十二篇演说,在10月发表的《日祸敬告国人书》中,沉痛地说:“最令人痛心疾首者,我国今日,尚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愤之状态耳!希望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不许枉费一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11月1日,香港南华总修院正式开幕。○上海代牧姚宗李去世,法籍耶稣会士惠济良继任为上海代牧。○内蒙古圣母圣心会石扬休(Mgr. Gaspar Schotte)主教创办了鄂尔多斯草原上第一个蒙文印刷厂,印刷课本和圣书。○全国传教区共一百十六个,主教八十三位。外籍司铎二千零七十九位,中国籍司铎一千五百位,教友二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一人。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1月28日,日军从上海虹口租界一带向闸北一带发起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上海的天主教徒有非常突出的爱国表现,天主教会的房屋、学校有十处改成伤兵医院,收容伤兵二千余人。震旦大学医科学生奔赴前线,施行救护,广慈医院也大量容纳伤兵。南京新普育堂亦辟为伤兵医院。惠济良主教偕同神父多人,连日分赴各院慰问。教会设立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以及徐汇中学二十七间寄宿舍均辟为难民救济所,教区共收容难民一万二千人。对于天主教信友的爱国善举,《申报》、《新闻报》、《圣教杂志》多有报导(刘大洲:《淞沪之役公教信徒爱国赤诚的一点表现》,见《磐石杂志》第34卷第一期)。○1月15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请求教宗在目前严重的形

势下,为中国主持公道,但教宗回电中对日本的侵略无片言只字谴责,仅表示“至现在东亚发生一种可恶之纠纷固不能不以恳切心求天主,祝望中日两大国民族,蒙早日恢复和平”(《益世主日报》1932年第十期,第2页)。○《益世报》聘上海《新月》主编罗隆基为主笔,倡言武力抗日,抨击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呼吁息止内争,共同抗日,并专辟“抗日舆论”,刊登民众抗日言论,销量激增,供不应求。○4月7日至12日,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有几位著名天主教徒被邀参加。(1)马相伯,时年九十三岁,由其弟子徐景贤教授代表;(2)陆伯鸿;(3)天主教公进会总会主席魏丕治;(4)天主教青年会主席张怀。○6月30日,法文《十字架报》(*La Croix*)发表了一份《中国主教就东北事件致国联调查团公函》,反映了中国传教区部分高级神职人员坚决反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立场。这份公函逐条驳斥了日本提出的吞并中国东北的所谓理由:(一)日本认为中国四分五裂,不能管理自己,世界将会高兴地看到日本民族代中国整顿一下。公函指出,日本对中国的描绘太离谱无稽,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已逐渐走向团结和有序。(二)日本认为中国人有仇外之根性。公函驳斥说这种指控完全不符合实际,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愿意与世界各友好国家和民族交往。至于抵制日货事件是在侵略中国之后才发生的。(三)日本担心中国会共产主义化,故充当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公函指出中国国民绝大部分是农民,爱好和平,不愿从事阶级斗争。而战争带来的动乱会使他们流离失所,转而投奔共产党。消弭国内革命的方法是维持和平,发展经济。这份公函除第三点反映了天主教会一贯的防共立场之外,其抵制日本侵略的意愿是十分明显的。公函最后呼吁:“如果以战争从事入侵,兴起被人类诅咒的可怕战争,屠杀无辜百姓,……这种行为不仅为国际公法所不容,而且也为永恒定律所不许。我们的人民在财产上所受的损失,无法估计。尤其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更是无法形容。只有天主知道究竟我们吃了多少苦。在这件正义的事件上,天主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诸位调查委员先生,天主也将襄助你们,作一公正无私的调查,它关系着五亿人民的幸福啊!”○5月15日,刚恒



陈路加所作中国风格的宗教画

毅在宗座代表公署小教堂为画家陈缘督付洗，取教名路加。陈以画中国风格的“圣母与圣婴图”而著名。○9月18日，为“九一八”事变一周年。马相伯思念铁蹄下的人民，悲从中来，写下“还我河山”四大字，并自题“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暴力发动强占我东北，今年三月又一手演成满洲伪国傀儡一剧，一周年间，河山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11月11日，马相伯在北平倡不忍人会援助抗倭将士。○12月6日，传信部批准中华公教进行会组织大纲。○赤峰成立中国籍监牧区，抚顺、周村、凤翔、洪洞、盩厔、蕲州成立监牧区。大同升为代牧区。河北永年成立圣神修女会，献县创立圣母救亡会。○上海天主教光启社重刊利类思、安文思合译之圣·多玛斯《超性学要》，由马相伯补校。○王老松枢机去世。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占领临榆县城。○1月17日，林懋德主教去世，满德贻(Paulus Leo Corn Montaigne)正式继任北平代牧。○2月1日，刚恒毅因脚病回国医治。3月8日返抵威尼斯。3月14日，毕翁弟(Fumasoni-Biondi)升枢机及传信部部长。11月3日，刚氏获准向教宗递呈辞职书，11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委任时任圣伯多禄宗座事业善会总秘书、名誉主教蔡宁(Mgr. Mario Zanin)为第二任宗座驻华代表。12月4日正式擢升。○4月20日，因长城战起，已加入中国国籍的雷鸣远创立不忍人会分会，率耀汉小兄弟会士及教友六百余人，组织救护队，工作于喜峰口等处凡半载。7月，雷鸣远出遣使会。○6月11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圣彼得大堂为三名中国籍代牧——永年崔守恂、集宁樊桓安、四川雅州李容兆“补充祝圣”。同时祝圣的还有印度阿提伯主教(Giuseppe Attipety，印度西南东方礼 Antivari 教区主教)、越南董主教(G. B. Tong，海防附近发艳 Phat-di 教区主教)，时刚恒毅在旁襄礼。○圣言会美国省接管北平辅仁大学，该会总会长康代(Grandel)为辅大荣誉校长。该校成立中国语言文字学、史学、社会人种学研究所，着手建立大规模学生

宿舍。○湖南衡州创立玛利亚亚松大方济各会第三修女会。善牧会修女初来上海,奥斯定常律会士初来西藏,圣母圣心会司铎初来徽州。○是年为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在天主教界人士徐宗泽和学术界人士竺可桢、向达的共同努力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纪念徐光启的活动。上海耶稣会办的《圣教杂志》出版了纪念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的专号,在二十二卷第十期上,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发表了《惠主教赞徐文定公语》;著名天主教人士陆徵祥则发表了《陆徵祥为徐文定列品事上安国孙主教书》,希冀教廷将徐文定公列为教会圣品。徐宗泽发表有《奉教阁老的传略》、《奉教阁老与圣教》、《奉教阁老与家庭》、《奉教阁老与民族》、《奉教阁老之政治经济》、《奉教阁老与科学》、《奉教阁老著作的存佚》等文章。丁宗杰撰有《徐光启与利玛窦》,裴化行撰有《现代中国文化之前驱徐光启》。同年,天主教上海上山湾印书馆出版了《增补徐文定公集》,由徐宗泽编辑,陆徵祥题签并作序。同年还重印了1903年为纪念徐光启入教三百年而出版的《徐文定公墨迹》。○《马相伯国难言论集》增订再版。裴化行(Henri Bernard)神父所著《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出版。裴化行为法籍耶稣会士,20年代末来华,任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后至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工作。裴氏著述颇丰,有《中国智慧和基督教哲学》(1935)、《利玛窦神父在科学方面对中国的贡献》(1936)、《在鄂尔多斯发现的景教遗迹》(1935)、《利玛窦时代中国的基督教艺术》(1935)等等。○11月,于斌返国,先回东北老家。12月8日抵北平。次日出任“中华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处”总监督。由教徒袁承斌任秘书长。○加尔默罗女隐修会抵香港。○12月13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公布《划分南京教区诏书》,将原来的南京代牧区一分为二,一为上海代牧区,另一仍名南京代牧区。教廷计划上海代牧区仍由法国耶稣会管理,由原南京代牧惠济良(Mgr. Augustinius Hauisee)辖治,而南京代牧区则交中国籍神职人员。

蔡宁,1890年4月3日生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斯省灰尔脱莱城。早年入本教区小修院,受初等及中等教育。后入该省Beluno大修院习神哲学,又赴巴度圭城国立大学研究哲学与

文学,1913年7月晋铎,任Beluno省大修院副院长及主教秘书,1922年至1926年从事教会慈善事业。1926年调罗马传信部供职,管理出版事业。1930年升任圣伯多禄宗座事业善会之总秘书,加名誉主教衔。

陆徵祥在上书中说:“祥视欧洲各国人民,对于本土本邦之圣贤,每加意崇敬,此无他,本土本邦之圣贤,一则后人有助功报德之责,再则其训嘱,其表式,更能适合国人之性格时尚,更便易国人则效也。文定公爱主爱人之德,传教保教之功,可以促醒我华教友,勉力前进于灵修之途,并激发其拯救同胞之神火。庶几人人彻悟,即寻常教友于修己救己之外,更有传教保教之职。或讲劝亲邻,或从事著述,人各运用其社会之地位,同心协力,补神级之勿及,谋教会安全。诚如此,教务而平靖,则可以广传;教难而兴起,则可以抵御;我华教友人人能法文定公之遗表,则中华全国,归向真主,亦非难事矣。”

〔摘自《陆徵祥为徐文定公列品事上安国孙主教书》〕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1月7日,传信部部长翁毕梯枢机为蔡宁举行欢送仪式。3月31日,蔡宁抵达香港。在港期间,出席香港信友欢迎大会及华南公教进行会联合会议。5月8日,抵上海,上海公教进行会在大码头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处特派专员,假上海国华广播电台播送欢迎节目。5月14日,蔡宁及参赞安僮仪主教、上海教区惠济良主教、海门教区朱开敏主教、中华公教进行会会长陆伯鸿及子陆隐耕,在南京拜会中华民国主席林森。下午二时,前往中山陵谒陵。5月29日,蔡宁北上,经兖州、济南,31日抵天津。天津文贵宾主教、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等前往迎迓。次日,在西开大堂举行弥撒并参观天津工商大学。6月2日抵北平。在平期间,拜会军分会代委员长及东交民巷各国公使。访问辅仁大学、西什库北堂、北平中央医院,并巡视宣化、张家口和大同教务。10月24日,自北平南下汉口巡视教务,同行者仅秘书和于斌等人。先后抵达武昌、蕲春、九江、安

庆、芜湖、南京、蚌埠、徐州、归德、开封、郑州、卫辉、正定、保定，返北平时已是圣诞节前后了。○1月7日，“中华公教进行会”成立男子部和青年部全国指导会，21日，又成立妇女部全国指导会。以后又成立学术研究部和社会事业部。○1月，雷鸣远发愿人耀汉小兄弟会，3月，应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之请，设残废军人教养院，不久又迁北平清河镇于庄。又建农场，命名为“八德村”，取《圣经》“真福八端”之意。○曹州、沅陵成为代牧区。○2月10日，为罗马教廷与伪“满洲国”建交事，吉林教区法籍主教高德惠（Augustus Ern. Gaspais）访问伪“满洲国”外交大臣谢介石，事后长春天主堂公布“天主教会发表书”，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国”，东北各教区脱离中国教区而独立，高德惠被任命为驻伪“满洲国”宗座代表。此后，东北各教区另编印《“满洲国”天主教教务年鉴》，而上海教区编印的《中华全国教务统计》从此也不包括东北各区。罗马教廷是继日本以后，首先承认伪“满洲国”，此举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愤慨，亦为广大天主教教友难以理解和接受。○陆伯鸿又创立上海北桥普慈疗养院，以治疗心理疾病为主。○是年，南京代牧区中又划出上海代牧区。4月，《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出版了一期《公教与爱国》专号，刊登了马相伯、雷鸣远抗日手迹，于斌撰写了《公教人的爱国精神》卷首语，指出：“我们公教人深切希望世界和平，极讲国际间的正义人道，尊重别个民族的正当权利，不嫉视别个国家繁荣向上；同时却也不甘心受强暴的侵略。良心也不许我们对本国利益采取旁观的态度。所以我所谓的民族意识并非过激又不背正理，人人应当设法培养。”同刊发表的还有陆徵祥于1932年用法文写的《根据曼西埃枢机著作以天主教教义看对满洲的侵略和占领》，由金思义译成中文，题为《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东四省事件》。陆氏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乃沈阳事变爆发，不见哀的美敦书，不闻两国公使下旗回国，而无数敌军，无数战舰，乱人吾境，杀戮吾士民，焚毁我城廓，神州将见陆沉，所谓空前绝后之远东太平洋大战，凡有以此为导线之势。于世界希望和平最切之时，而帝国主义者竟不畏天命、不恤人言，横施其侵略政策，瞻望前途，感叹



1934年5月蔡宁拜会国民政府代表

“无极！”表达了公教信友在山河破碎时的悲愤。在陆徵祥所著的这篇报告中列举了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5年强迫中国订立“二十一条”以及1931年以来侵占中国领土的种种罪行，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的野心。对于“二十一条”，身历其境的陆徵祥明确指出，“其目的在得到满洲、蒙古、山东、福建，以及扬子江流域等之完全权利与特殊权益；并得干涉中国之内政，特别干涉中国之内政、财政、军事、教育，期获得实际保障中国之保护权。”

伪《满洲公教月刊》公布之《天主公教会发表书》

罗马教宗将满洲帝国领土内之天主教会，所有各教区长代表名义，委托于吉林及新京之教宗代理高主教奥斯定阁下，以办理关于在帝国天主教教会之关系事项，得与满洲国政府交涉。吾天主教会，无论在任何国家传教，对于其国民之幸福，则绝不能付于等闲者，已属周知之事实。故罗马教宗，常使其传统忠实之代表，以使之将关于天主教会所有问题得与既成

之国家交涉耳。

〔顾裕禄编：《梵蒂冈对华政策资料百则》（1922～1982），《宗教研究通讯增刊》，1982年第5期，第27页〕

在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悍然出动，占领了比利时的国土。比国马林城（Malines）的枢机主教墨西埃（Cardinal Mercier）不畏强暴，依据天主教的立场和观点，发表了许多布道演说辞，痛责德军暴行，号召人民拒死不承认侵略者的统治的合法性，申言公理必将战胜强权的大道，博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陆徵祥认为，墨西埃枢机的言论，极好地阐发了天主教对于不义战争的立场，德国以强凌弱，侵占比国的情形，也与日本侵略中国相同。所以，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陆徵祥引用了墨西埃枢机的言论，阐述了“公教教义中仁爱与公义之几项原则完全施用于被敌人无理侵占之国家”。首先，陆氏引用墨西埃的话说，天主教有其当然的爱国观：“公教将爱国观念立为法典，凡非纯全爱国者，即非纯全的信友。”继而，对于侵略者以爱国为借口，对他国横施侵略的暴行，予以严辞驳斥：

“公教神学曰：否。法律非他，和平而已。即所谓国家之内有秩序，基于公义也。公义只是人与造物主及人与人间之根本关系，故为绝对的。是以为战争而战争，乃是罪恶，战争只用作保持和平必需之方法时，可告无罪。圣师奥斯定曰：不为兴战争而求和平，然得为和平而作战。”

欧战期间，德国在比利时炮制了一个卖国的傀儡政府。墨西埃枢机指认这个政府为伪政府，按天主教的法律不予承认，特发表教书，通谕全体神职人员。陆徵祥认为，中国的天主教会，也应以此种态度对待伪“满洲国”。故将墨西埃的教书摘录如下：

“此类政府，非合法之政府。故今后汝等心中不须尊敬归附或服从之。在比利时惟一合法之政府，为属吾国王，其统治，为吾国代表之政府。惟此政府，能操吾人之权威，惟此政府有受吾人爱戴与服从之义务。代表强权之占领国的一切行政

措施均不生效力,但合法政府为公众利益的举措,人民皆当默准之。”

按照天主教的教义,人民有权反抗占领者的非法行径,这非但不是一种狭隘的复仇主义,而且是出于仁义的德行:

“一国破坏他国之主权,非个人谋害罪。社会处于死刑,可比拟也。……故为公义而报复之精神,为一种美德,仇恨为恶德,二者不可相混淆。仇恨出于破坏,而公义报复起自仁爱。勇毅将恐慌逐出心外,恐慌一旦消除,则正直之人能知其职责之所在;视破坏真理、消灭公义,与侮辱天主,犹侮辱自身然。爱主及爱人之双重心火顿起燃烧,宁可牺牲一切,不愿忍诟受辱,仁爱与热心实为此种行为之动机。”

〔顾卫民:《国难与中国基督徒》,《史林》,1995年第2期〕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5月,蔡宁由中华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陪同视察献县教区。7月2日,罗马传信部函复吉林代牧高德惠(Augustin Ernest Gaspais),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6月29日,陆徵祥在比利时布鲁日日本笃会圣安德会院晋升为司铎,刚恒毅专程从罗马赴



布鲁日参加陆氏晋铎典礼，并发表演说。参加典礼者有中国政府代表李向宪驻比代办、驻荷公使金问泗、驻西班牙公使钱泰、驻俄大使颜惠庆、培德夫人家属。时陆氏年六十四，在院中以清水面包为食，躬任洒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匾额“乐道爱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赠“德邵道粹”。○9月8日至15日，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十五省的一百八十三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国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分别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大会致电国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愿尽其所能，对我国建设有所贡献。关于道德方面，尤愿协助政府竭力促进。”○12月，伪蒙古军和日军进攻张北等地，傅作义率三十五军抵抗。雷鸣远应傅作义之邀出任前线救护队队长，组织担架队四百人，效力于玫瑰营子一带。出征之日，正逢除夕，或劝稍待，雷鸣远说：“前线惟二种人：或卫国，或盗国，卫国者有殉职之虞，但灵魂不可不救，盗国者出卖灵魂，更不可不救，抢救灵魂，急于星火，何能稍延？”



1935年中华公教进行会在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推举陆伯鸿（右）、朱志尧（左）为正副会长

据徐宗泽神父在1935年的统计，当时中国籍主教及其所统辖的教区已达二十二个，列表如下：

省份	地名	主教名	祝圣年
蒙古	赤峰	赵庆化	1932
	集宁	樊恒安	1933
河北	安国	孙德祯	1926
	赵县	张弼德	1933
	保定	周济世	1931
	宣化	程有猷	1928
山东	永年	崔守恂	1933
	临清	胡修身	1931
	阳谷	田耕莘	1934
山西	汾阳	刘锦文	1930
	洪洞	成玉堂	1932
陕西	蓝屋	张指南	1932
	凤翔	王道南	1933

江苏	海门	朱开敏	1926
	南京	于斌	1934
河南	驻马店	王伯禄	1933
四川	顺庆	王文成	1930
	万县	王泽溥	1930
	雅州	李容兆	1929
湖北	蒲圻	张敬修	1929
浙江	台州	胡若山	1926
广东	广州	杨福爵副	1931

〔徐宗泽：《近十年来天主教在我国之状况》，《圣教杂志》，第24卷第8期（1935年）〕



南京石鼓路天主教堂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刚恒毅出任传信部秘书长。○绛州成立监牧区。○7月7日，教廷任命在罗马传信大学任中文教授的北京教区司铎张润波为宣化代牧。同日，教廷又任命时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中国公教学校视察专员于斌为南京教区代牧主教。南京教区辖有无锡、南京两总铎区，十几个本堂区，约有三万教友。主教座堂设于南京石鼓路天主堂。时南京为国民政府首都，因此南京教区有特殊之地位。9月20日，宗座代表蔡宁在北平西什库堂为于斌举行祝圣典礼。○于斌邀马相伯从上海移居南京。○7月11日，雷鸣远获准免遣使会士终身愿。11月中旬，雷氏率救护队和神父教友八九十人，合傅作义部两骑兵连，携土炮八尊，在红格尔图与日伪军万余人血战三昼夜，将敌击退。全国瞩目。○安国孙德楨主教辞职，王增义为署理主教。○徐州、嘉应、洛阳设立代牧区。○圣母圣心会大同神学院在绥远分设哲学院。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沦陷。由雷鸣远派驻《益世报》的经理生宝堂和主

笔罗隆基决定继续发行《益世报》，每日出一单张，报告平津抗敌消息，每上街发卖便抢购一空。不久，生宝堂在天津意法租界之间的万国桥上被日本特务绑架杀害，9月《益世报》被迫停刊。7月22日，南京主教于斌向代牧区内神职人员及教徒发出牧函，如争取和平失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人人应有守土抗战之职分。○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雷鸣远在《益世报》发表《我们需要什么》，谓国人有三分之一肯牺牲，国即可得救。不久，雷氏率领耀汉小兄弟会会士投奔国军第三师第三十六团，在易县训练担架队。8月19日，下耀汉、德来二会总动员令，第二天即组成救护队，队员一百八十人，皆高阳、清苑二地教友。雷氏自任唐淮源所率十二师卫生连连长，率救护队转战于涞源、易县、涞水、高碑店、满成等地，历程数千里。10月，中国军队在娘子关与敌激战十五昼夜以上，雷鸣远率队员担架运送，经数十战，至沁县，战士疲惫至极，有人要求换防。长官请雷鸣远讲话，雷以天堂大休息，医院小休息为勉，士气大振。时雷氏“以马负弥撒祭具，仍肩行囊步行，囊储一日课、一日记、一衣、一裤、一袜、一巾、一笔，合共体重不逾六十公斤，公常以此自豪”（方豪：《雷故司铎鸣远事略》）。12月，经安泽、洪洞抵王和镇。○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调动七十万军队在上海与日军决战。14日，国民政府发布自卫抗战总动员令。上海天主教教友积极参加抗战，天主教会所办的广慈、安当、圣心、若瑟等医院均投入战时救护工作，震旦大学大礼堂及新教学大楼全用于安置伤兵，广慈、安当属第三伤兵医院，共收治伤兵一千四百二十四人次。大通路天主堂、普慈疗养院均向社会开放，收治伤兵。随着战区的扩大，难民人数日益增多，租界已无法容纳。11月10日，防守南市之中国军队撤退，上海沦陷，同一天，日本通知英美法诸国，将轰炸南市，令外侨撤退。时任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负责人饶家驹神父，提出设立南市难民区建议，经他奔波周旋，取得中日双方同意。11月8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宣布南市难民区“系国际间一种难民救济性质，绝不损害我方丝毫领土主权，所有区域内治安维持，仍由我方派警负责”。9日，南市难民区成立，区域以方浜路



南京主教于斌



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上海天主教会赈济难民

为界，东、西、北至民国路为半月形地界，约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当天即收容难民二万人。该区共设一百个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达十万人以上。天主教徐汇中学亦开办了一个收容四千难民的大型收容所。○10月7日，日本进攻正定，商震部三十二军阻击失利，日军攻入城内，屠杀中国平民。9日，日军冲入正定教堂，抢掠教堂内难民。当晚，日军冲入教堂，将九名欧籍教士和教友遮眼捆绑，拉至主教府外一处塔下杀害并焚烧尸体，其中有荷籍文致和(Franciscus Schraven)主教。○10月，于斌出国，从事抗日国民外交，经香港赴欧洲巴黎、伦敦等地。12月中旬赴美国和加拿大，向国际社会发表演讲，宣传中国抗战，并为难民募捐。○是年，内蒙有圣母圣心会学校九百三十七所，学生二万余人，并在绥远(今呼和浩特)建有一所公教医院。10月底，蔡宁命文宾贵署理正定教务。○11月，教廷任中国籍耶稣会司铎赵振声为献县宗座代牧。○是年，沂州、归德、周村成立代牧区，石阡、湘潭、屯溪、西宁成为监牧区。○是年，教廷授陆伯鸿袍剑爵士勋位。12月30日陆伯鸿被刺。○全国教徒三百零一万八千三

百零三人。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2月,雷鸣远随军回晋东,5月抵侯马、新绛,7月入中条山。国民政府授其陆海空军甲种二等奖章。9月4日,军事委员会乃电邀雷氏至武汉,任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主任。10月,服务团成立,离武汉西上,沿途有志抗日青年,纷纷要求加入。○7月中旬,于斌返国,经越南至昆明赴汉口。○9月10日,教宗庇护十一世接见伪“满洲国”“亲善使节团”,该团首席代表韩云阶奉伪“满洲国”皇帝令,向教宗进呈书信和礼物。10月10日,教廷秘书长巴赛里枢机与高德惠主教接到教宗庇护十一世书信,转达给伪“满洲国”皇帝溥仪。○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大后方昆明复刊,以牛若望为总监督,参与办报者还有马在天、阎宗临,雷鸣远仍为名义上的董事长,曾亲到昆明报馆,勉励报馆同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马相伯应于右任之邀,从桂林迁往昆明或重庆,后病殁于越南凉山。○建宁、桂林、宝庆、威海卫、邵武、新疆成立监牧区。嘉定(雅州)、施南、建昌升为代牧区。

1. 据《梵蒂冈画报》1938年9月号,第748页载:

十日瞻礼七,教宗在冈道尔夫别墅会议厅中特别接见“满洲国”特使团。特使团首席代表为韩云阶部长,奉“满洲国”皇帝陛下令,向当今教宗庇护十一世进呈书信一封与礼物。

特使团由“满洲国”驻意大利一等秘书(Yu Hsiao Lan)与教廷国务部若瑟·赫莱主教陪同入见。

教宗聆听了特使团首席代表的致词,首席代表呈上国书与皇帝的书信,并称皇帝有礼物进呈教宗。教宗温词答谢,说明宗座所以欣然接受礼物的原因,是礼物可使宗座思想上心目中忆念不忘;宗座对于礼物,对于皇帝陛下的馈赠感到最大的欣悦,对于皇帝陛下的书信,也感到同样的欣悦,书信是思想与情感的遗赠,表达出皇帝陛下,对于圣座,对于耶稣基督的代表,对于天主教,有如此善意,如此高尚,如此真率的思想与情感,宗座也愿以同样的同情与善意的心情作为回答。宗座

嘱特使团首席代表传达于皇帝。宗座对此再三致意，并附加说明，皇帝可以相信教宗的同情，皇帝如愿教廷与“满洲国”的关系日益增进，为谋求人民与国家的幸福，使“满洲国”繁荣的天主教传教事业成为全世界天主教会中极有前途的丫枝，则可以，而且应该相信宗座合作。

2. 教宗庇护十一世致“满洲国”溥仪皇帝陛下 祝健康昌盛！

在刚才逝去之9月间，我人以对其应有之荣耀，接待了陛下所遣特使韩云阶先生阁下。

陛下派遣特使和由他带来如此友好的信件，我人向皇帝陛下表示深切的感谢。皇帝陛下为我宗座的繁荣昌盛向我人亲切表达的良好祝愿，我人亦同样衷心祝愿于陛下。我人还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接受了陛下热情惠赠的礼品精工玉刻香炉。见此内心的象征，曷胜欢欣。因为我人衷心为贵国以及全人类幸福、和平及繁荣之恳切祈祷上达于天，一如含有祈祷意义之烟香，香氤缭绕，上升于天主台前。

借此良机，对信仰天主教的信友和教会机构于满洲帝国内享有合法自由，向陛下表示我人诚挚的感谢。由此，陛下亦可深信——在其他方面亦很清楚地显出——关于爱国和尊敬服从国家权力，天主教友是不甘落在人后的。

此外，尊敬的皇帝，我人为皇帝陛下及我人至亲爱的陛下人民，祈求全能天主，赐以繁荣和幸福。

1938年10月20日，我人在位的第十七年，发自罗马近郊冈多尔福宫

〔顾裕禄：《梵蒂冈对华政策资料百则》〕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1月，于斌第二次赴欧美展开国民外交。1月18日晋见教宗。2月8日由巴黎抵纽约。28日在巴尔的摩神职班报告中国教务及日寇侵略中国情况。3月19日在巴尔的摩募捐。4月6日至新奥尔良。4月27日在费城为中国难民募捐。5月至底特律。



1939年顾维钧祝贺教宗庇护十二世加冕

6月筹备在美各地宣传及募捐,后去美国中、西部大城市。7月抵丹佛。8月3日抵旧金山。10月11日抵夏威夷。10月18日抵香港九龙。28日返重庆。12月于斌托人在美发行英文《中国日报》(*The China Monthly*)。○3月,教宗庇护十一世去世,庇护十二世继位。3月10日,新教宗庇护十二世致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通告膺选教宗的消息。3月12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顾维钧作为特使参加新教宗的加冕典礼。○3月14日,驻华宗座代表蔡宁向全国主教发出一封信,要求全国教牧人员及教徒在日军占领中国期间遵守“不偏左,不偏右”的政策,绝对保持中立。此信一出,舆论大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认为蔡宁的信件与“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国策相违背,国民政府授权顾维钧向教廷驻法国公使 Vce Lelio Valeri 主教提出抗议,指出蔡宁的无理干涉违反了中国的国防政策和中国天主教教徒应有的爱国主义精神。○4月5日,国民政

府向马相伯颁发褒奖令。4月6日,全国各地举行遥祝马相伯百龄典礼,各界各党派纷纷电贺。教宗亦派代表颁赐祝福。11月4日,马相伯卒于凉山,举国同悼。○11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授权传信部发布部令,解除对中国礼仪的禁令,该部令由刚恒毅签署,主要内容有:(一)中国政府屡次申明人民信仰自由,政府不愿对宗教事务颁布法律。政府所举行或下令举行的敬孔典礼,不是向孔子予以宗教敬礼,乃是向这位伟人予以相称的尊荣,兼以尊重本国文化的传统。因此,公教教友可以参加在孔庙或学校内,在孔子像或牌位前举行的敬礼。(二)同样也不禁止在公教学校内悬挂孔子像或孔子牌位,如怕误解,可以申明公教教友敬孔的意义。(三)公教官员和学生,如应上命参加公开礼仪,仪礼颇有宗教迷信之嫌,则可按照教律第一二五八条条文,以被动方式参加随众行礼。如有误会危险,则宜申明自己执行仪礼的意义。(四)在亡人前,或在亡人像前,或只写姓名的牌位前,鞠躬或是行其他社会敬礼,乃属善举,理应准行(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第144页)。○阳谷升为代牧区,由中国籍田耕莘任代牧。

蔡宁致全国主教的信

最尊敬的主教:

我信而坚持,负有神圣职务之人中,无一人对于政治愿有丝毫之参与,一如教会训令所严禁者。

在目前危险的时局下,是项禁令更亟须遵守。因此,请各位可敬的主教郑重告诫属下司铎,常以明智和忍耐,埋头于神圣职务,不偏右,不偏左,即表面上的行动也当避免。因为,目前最可怕的事例教训我们,这些行动能给人以攻击教会住院的报复借口,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迫切又迫切地请你们嘱咐注意并遵守圣教法典和中国第一次公会议关于这些问题所规定的事项。

“在顺境和逆境”,都要小心翼翼,警惕机灵,对鲁莽轻率以致行为不慎的不明智者,应加以训斥。

事关传教区生命,不要因个别人的不明智而贻害整个团

体！只有一视同仁的爱德，才能获生获救！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蔡宁

1939年3月14日北京

〔《公教教育丛刊》(Collectanea commissionissynodalis)1939年5月号,第454页〕

传信部关于中国礼仪的有关仪式与宣誓的指令

众所周知，东方国家的一些礼仪，尽管在早期与异教的礼仪有关，但岁月流逝，随着风俗和思想的变迁，应被仅仅视为对先人、对爱国主义，或者对其同胞的尊敬的一种民间性敬奉的表示。

因此之故，传信部经教宗庇护十一世同意，在1935年和1936年公布了关于此项事宜的标准。根据天主教法典第22条，这些新标准已经发布给满洲和日本的各教区长，这些标准与当今的形势是相适应的。

最近，负责传信部工作的枢机们，于本年11月4日召开大会，考虑是否在其他地区，由于时间的流逝也会发生的同样的明显的情势变化，也应支持(赞同)同样的行为。

在仔细听取了赞成和反对意见以及谨慎和经验丰富人士的想法以后，枢机们决定作出如下申明：

(1) 中国政府已经反复地和公开地说明：所有的人有自由选择他们愿意信奉的宗教。政府无意在宗教问题上发布法律和命令。因此，公共当局任何表演的或规定的尊孔仪式的履行，都不含有宗教崇拜的性质，而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即培养和表达对一位著名的伟大人物的适当的崇敬以及对祖先的传统应有的尊重。由此，天主教徒可以在孔子的肖像和牌位前，为敬奉他而造成的建筑物里或学校里，出席尊孔的仪式。

(2) 在当局要求这样做的情况下，天主教学校悬挂孔子肖像，甚至树立刻有他的名字的牌位，或者鞠躬致敬，都不应禁止。如果有坏表样，应当明确地表明正确的天主教意愿。

(3) 如果信天主教的教师和学生被命令出席带有迷信表征的公共礼仪,根据法典一二五八条款的指示,只要他们保持消极的态度,就可以参加。他们所做出的尊崇应被视为仅仅是民间性的。有时,出于避免对其行为的错误解释的需要,他们应该陈述上面的话,使他们的意向昭著于世。

(4) 在亡者或其画像前,甚至在刻有亡者姓名而别无其他内容牌位前,鞠躬或行其他民间性的敬礼,都应该被认为允许的和适当的。

除此以外,枢机们也看到:根据1742年7月宪章(*Constitution, Exquo Singulari*)做出的有关中国礼仪的宣誓,曾经对所有在中华帝国以及接壤的或邻近王国或省份的传教士都有约束,已经不再适用于传信部在最近做出的决定。他们看到,宣誓作为一种纪律的工具,已经不再需要了。所有的人都明白从前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已经结束了。更有甚者,传教士和其他司铎已经不再需要由宣誓来强迫他们效忠圣座。为此,不论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他们决心要免除仍带有强制性的宣誓所规定的义务。就最近的部令给他们带来的变化程度而言,教宗本笃十四所作的另外一些指令仍来解除,尤其是严禁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

在11月7日的觐见中,在下面签名的传信部部长枢机,将枢机们讨论以后作出的决定提交教宗庇护十二世陛下。陛下屈尊同意并且完全批准。

1939年11月8日 发自传信部大厅 罗马, 圣母无罪
始胎节

传信部部长毕翁弟枢机

传信部秘书长刚恒毅

[选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英文版),第88~89页]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耶稣会创立四百周年纪念。○1月10日,雷鸣远在山西晋

阳成立政治工作队，替代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的工作。2月，退至磁、涉县而至林县。3月9日，雷氏与耀汉小兄弟会会士暨政治工作队队员在林县与八路军发生摩擦被八路军俘虏。4月17日获释，5月下旬至洛阳，时雷鸣远已患黄疸症。6月14日，国民政府派飞机送雷至重庆，6月24日医治无效死亡，7月18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9月15日，传信部部长以教宗名义致电安国王增义主教表示哀悼。○3月24日，《益世报》迁往重庆出版。○6月17日至19日，蔡宁在北平栅栏总修院召集保定周济世、永年崔守恂、宣化张润波、安国王增义、赵县张弼德、献县赵振声、正定陈启明、江苏海门朱开敏、山西洪洞成和德、山东阳谷田耕莘、蒙古集宁樊恒安等华籍代牧主教讨论传教问题。周济世任大会秘书。○全国当时有主教区一个，代牧区九十个，监牧区四十六个，共一百三十七个教区。全国外籍传教士三千零六十四位，中国籍传教士二千零九十一位，全国教友三百零一万八千三百零三人，发行定期刊物一百五十种。全国小修院及预备修院一百九十所，学生五千一百十四人。大修院三十六所，学生八百七十人。

1941年(民国三十年)

5月，日军在华北对敌后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大批乡村教堂和学校被拆毁，神职人员亦被迁至日军占领下各堂，保定东闾大堂亦被拆毁，多名神父主教被捕被杀。赵振声主教亦曾被捕。○10月，重庆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审查委员会国际外交组对外交部工作审查意见中有“请外交当局注意与梵蒂冈作进一步联系”一项，在大会上以一百四十七票对二十一票通过。○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美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对德、意、日宣战，不久，香港沦陷，天主教《公教报》被迫停刊。○12月24日，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在重庆成立。理事长为于斌；常务理事及理事有：于斌、牛亦未、康思诚、杨慕时、高思谦、袁承斌、潘朝英、方豪、阎宗临、何方理、苏雪林、龚持、熊震、邵鹤亭、张烽等。该会以促进中国天主教文化为宗旨，在国内各主教区设

立分会,以天主教教友为会员,亦吸收教外具有同样理想的人士参加。其职任为(1)倡导会员进修互助;(2)推动城乡各种服务事业;(3)促进国际文化经济合作。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耶稣会重来江南传教百周年纪念。○凤翔成立代牧区。由中国籍王道南任代牧。田耕莘改任青岛代牧。○3月,日本派使抵梵蒂冈。3月19日,代表中国天主教会立场的《益世报》,敦请教廷不要与日本建交,指出:(1)日本并非天主教国家,在日本国内及占领区屡屡发生迫害教会事件;(2)日本的侵略暴行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5月9日使原田健晋见教宗,呈递国书。中国政府接到驻欧美各国使馆建议,亟向教廷派使,不宜迟缓。○4月8日,行政院长官蒋廷黻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一)在中国之德、意天主教教士,虽为敌国国民,但系教廷派来中国,故其待遇与敌侨略异;(二)天主教会之财产并非私有财产,与经商之敌产情况不同,故区别对待,予以保护。○6月7日,外交部训令中国驻瑞士代办谢寿康与教廷驻瑞士大使柏纳底尼总主教(Abp. Bernadini)接洽,教廷同意接受中方使节,教廷驻华代表则暂时不换。○10月,国民政府宣布废除自1842年以来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除澳门、香港及附属岛屿以外所有租借地的主权。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谢寿康公使于1月30日抵罗马,时中国与意大利为交战国,谢寿康由罗马火车站直入梵蒂冈。2月25日,谢氏觐见教宗,呈递国书。谢氏致辞,教宗答辞。○教宗庇护十二世册封江苏青浦佘山圣母大堂为乙等圣殿。○3月,于斌第三次出国开展国民外交,他从重庆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由亚洲经由非洲,渡大西洋过南美而至北美。4月13日抵美国迈阿密,计程一万七千余公里,费时二十七天,他向美国朝野呼吁,要求增拨作战供应物资,早日修复滇缅公路,增加空运,以军火汽油输华。5月

11日,于斌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演说中,特别谈到东北问题,使绝大多数美国人一致认为东北确系中国领土,战后理应归还。

谢寿康,江西赣州人氏。生于1894年,少年留学法国和比国,为比京大学经济系博士,擅长法文,喜好艺术,著有法文中国戏曲本,为比利时最高皇家学会会员,曾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三年,驻比使馆代办一年。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247页]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8月,经宗座代表蔡宁与日本占领当局谈判,被关押在潍县的外籍传教士除少数人留下外,均迁往北平各修会会院。○9月,于斌自美返国途中赴罗马述职觐见教宗庇护十二世。10月返国。○日军占据永平代牧主教府和圣母修女会会院。○顺德、榆次、三原和驻马店均升为代牧区。○9月,教廷派重庆代牧尚惟善主教代表宗座驻华代表,处理与国民政府事宜及教务。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初春,于斌率团往滇缅地区劳军,所过之地有昆明、保山、密芝那、贵阳、腊戍、南突、芒市、曲靖等地。4月,于斌再度赴美,4月24日抵旧金山,参加旧金山会议。7月12日赴欧洲,首访英国。7月31日赴法、比,8月9日抵罗马,次日晋见教宗庇护十二世及国务卿毕翁弟。8月12日返国,经开罗、印度,25日返抵重庆。○4月23日,《益世报》在西安发行西北版;9月,《益世报》恢复北平版;12月,《益世报》在天津复刊,刘豁轩任社长,刘易之任总经理。○8月2日,思高圣经学会在北平成立。○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5日,香港师人杰、马奕猷创香港公教进行社。○12月24日,罗马教宗任命青岛主教田耕莘为远东第一任枢机。○内蒙古城川主教石扬休(Gaspar Schotte)邀请宗座代表蔡宁在山西大同祝圣三位蒙古族神父:马元牧、马仲牧和石生玉(一说马仲牧、石生玉由穆青海(Ludovicus Morel)主教



西安三原油房道天主堂

祝圣于归绥)。○11月初,蔡宁首次访问重庆。

田耕莘字聘三,世居山东阳谷县张秋镇,生于1890年。父为教友。1901年,田耕莘受洗入教。田氏自幼年即熟读儒家经典。1904年至1910年,在小修道院求学,1910年至1916年在大修院研读神哲学。1918年6月晋铎,以后则在易水、王庄、戴家、汶上、巨野、单县、诸城、范县、鱼台县等处传道。1929年加入圣言会,受训两年后调嘉祥、郓城。1933年2月任阳谷监牧区监牧,下辖阳谷、寿张、观城、朝城及范县、濮县等地。全区司铎十二人,教友一万三千人,设座堂于坡里庄。1939年7月,教廷任命田氏为阳谷宗座代牧,教宗庇护十二世愿亲自祝圣。当时中日战事正烈,田氏穿越战线,自上海乘轮赴欧,未至苏伊士运河,英法已对德宣战,原船折回,田氏改乘他船前往,11月29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祝圣。1942年11月,调任青岛主教。青岛教务发展迅速,财政亦有结余。1945年12月24日,田氏被教廷任命为枢机。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第341~343页〕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年初,田耕莘乘美国海军“互克非德号”军舰离青岛抵美国洛杉矶转飞纽约,与二战期间任美国陆海空三军宗教总监的史贝尔曼枢机(Francis Joseph Spellman)会合,然后一同飞罗马。2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亲自为田耕莘、史贝尔曼等三十二名新枢机举行祝圣典礼。田在欧洲逗留一个多月以后,又飞抵纽约,5月27日,乘美军部飞机返回中国。○4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宣布建立中国教会圣统制,分全国为二十教省,七十九主教区,三十八监牧区,共一百三十七教区,每省会设一总主教座。二十教省为南京、北平、绥远、沈阳、济南、太原、西安、兰州、安庆、开封、重庆、汉口、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南宁、贵阳、昆明。又任命田耕莘枢机为北平总主教、于斌为南京总主教、周济世为南昌总主教。二十名总主教中,仅田耕莘、于斌及周济世三人为中国籍,而全国近一百四



著名历史学家方豪神父像

十个传教区中,有一百十名主教是外国人。○5月8日,益世电台在南京成立,6月15日,《益世报》发行上海版。由范争波任社长。○方豪司铎应马星野之邀,任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兼“文史周刊”主编。6月,方豪应北平田耕莘枢机之邀,得南京总主教于斌同意,于6月15日与田耕莘同飞青岛,7月7日抵北平,出任新设之上智编译馆馆长之职,该编译馆为田耕莘枢机所设之重要事业,目的在于以文字对知识阶级传教,编译教中外文资料,有辞典、历史、神学、哲学、文艺等部门,包括英法德日意拉丁等文字,9月19日,上智编译馆举行落成典礼,11月,《上智编译馆馆刊》出版第一卷。○7月6日,教宗发表建立驻华公使馆谕令,任命黎培理总主教为首任驻华公使。黎培理于12月4日抵上海,28日至南京呈递国书。在南京设立公使馆。○8月10日,教宗任命陆徵祥司铎为比国刚城圣伯多禄本笃修院名誉院长。○9月10日,中国政府任命吴经熊为第二任教廷公使。10月,吴经熊所译《圣咏》出版。他以《诗》、《骚》古体风格,翻译大卫的《圣诗》,能传达作者的神韵。○10月24日,教宗颁令,将庚子年在湖南及山西太原被杀的方济各会三主教、四神父、一修生以及方济各圣母传教会七修女,并中国国籍五修生、九教友共二十九位列为真福品。○香港《公教报》复刊。○12月,教廷首任公使黎培理抵华,方豪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欢迎教廷驻华公使》一文,建议天主教在华应有中国神职人员自己治理教务,实现教会的本地化,外籍教士应精研中国文化,颇触时讳。

黎培理(S. E. Mgr. Antonio Riberi),1897年6月15日生于意大利摩纳哥公爵领土蒙特卡罗城。父母均属意大利籍。青年时代入意大利北境古奈阿城(Guneo)修院学习,攻读神哲学。1922年6月29日晋铎,转学罗马额我略大学,攻读教会法律,考取博士,被选入教廷外交学院(Accademia Ecclesiastica)。毕业以后,于1925年派驻教廷驻玻里维亚大使馆工作,继任秘书。1930年调往教廷驻爱尔兰大使馆任参事。1934年,升教廷驻东非英属殖民地宗座代表,领总主教衔。在任时迭次召集东非主教会议,厘定传教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

后,意大利对英国宣战,英殖民地要求教廷撤回原籍为意大利的宗座代表,黎培理回到罗马,任教廷救济外国侨民事务所主任,探视意国境内英美俘虏集中营。1946年7月7日,罗马教廷正式发表其为驻华公使。

吴经熊字德生,浙江鄞县人。1900年3月28日生,幼年入本城实效中学。1913年入上海震旦附中,1917年入天津北洋大学攻读,后入上海东吴法学院。192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是秋,放洋赴美,入密尔根大学,考得法学博士。以后又入法国巴黎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法学。1923年回美国入哈佛大学,以后回国入东吴大学任教。1926年,吴氏出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1928年,应哈佛大学之聘,赴美讲学。1933年出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以后又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立法院法制外交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吴氏本为基督徒,1937年皈依天主教。1942年11月开始翻译《圣经》,参考英、法、拉丁三种文字,至1944年10月脱稿,其中包括《新约》二十七卷及《圣咏》一卷。1946年9月10日,行政院例会通过,任命吴经熊为中国政府驻教廷第二任公使。

圣统制下全国各教区主教姓名一览表(有×者为中国籍)

教区	职衔	姓名	会籍或国籍
蒙古绥远	总主教	穆清海	圣母圣心会(比)
宁夏	主教	王守礼	同(比)
西湾子	同	石德懋	同(比)
集宁	同	樊恒安×	会外神职界
东北沈阳	总主教	卫宗藩	美国
抚顺	同	林化东	美国
热河	同	南阜民	圣母圣心会(比)
吉林	同	高德惠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四平街	同	石俊声	甘倍克外方传教会(加)
延吉	同	白化东	本笃会(德)
赤峰	监牧	赵庆化×	会外神职界

佳木斯	同	兴光启	嘉布遣会(意)
林东	同	赵玉明	甘倍克外方传教会(加)
齐齐哈尔	同	胡干普	白冷外方传教会(瑞士)
哈尔滨	代权	祁高德	无原罪始胎圣母会(不详)
河北北平	总主教	田耕莘 ×	圣言会
安国	主教	王增义 ×	遣使会
赵县	同	张弼德 ×	会外神职界
景县	同	凌安瀾	耶稣会(奥)
正定	同	陈启明 ×	遣使会
顺德	同	葛乐才	同(波)
献县	同	赵振声 ×	耶稣会
宣化	同	王振仁 ×	会外神职界
保定	代理	张弼德 ×	同
天津	主教	文贵宾	遣使会(法)
永年	同	崔守恂 ×	会外神职界
永平	同	刘士杰	遣使会(法)
大名	监牧	查宗夏	耶稣会(匈)
易县	同	马迪儒	印五伤司铎会(意)
山东济南	总主教	杨恩赉	方济各会(德)
烟台	主教	杜坤安	同(加)
周村	同	杨光被	同(美)
沂县	同	万宾来	圣言会(德)
曹县	同	何方济	同(德)
青岛	同	(缺)	
阳谷	同	牛惠清 ×	会外神职界
兖州	同	舒德禄	圣言会(德)
益都	监牧	狄嘉略	方济各会(意)
临清	同	(缺)	
威海卫	同	路道宜	方济各会(意)
山西太原	总主教	李路嘉	方济各会(意)
汾阳	主教	刘锦文 ×	会外神职界

潞安	同	康济民	方济各会(荷)
朔县	同	俞广仁	同(德)
大同	同	邓维道	圣母圣心会(荷)
榆次	同	富济才	方济各会(意)
洪洞	监牧	韩廷弼 ×	
绛县	同	孔昭明	方济各会(荷)
陕西西安	总主教	万九楼	方济各会(意)
凤翔	主教	王道南 ×	同
汉中	同	(缺)	
三原	同	班锡宜	方济各会(意)
延安	同	易兴化	同(西)
整屋	同	高正一 ×	会外神职界
兴安	监牧	方	方济各住院会(意)
同州	同	穆继文	方济各会(意)
甘肃兰州	总主教	濮登博	圣言会(德)
秦州	主教	(缺)	
平凉	监牧	高金鉴	嘉布遣会(西)
西宁	同	夏思德	圣言会(德)
新疆	同	卢斐德	同(德)
江苏南京	总主教	于斌 ×	会外神职界
海门	主教	朱开敏 ×	耶稣会
上海	同	惠济良	同(法)
徐州	同	邵轶欧	同(美)
安徽安庆	总主教	梅耿光	同(西)
蚌埠	主教	赵信义	同(意)
芜湖	同	蒲 卢	同(西)
屯溪	监牧	扶直义	圣母圣心孝子会(西)
河南开封	总主教	阳 霖	米兰外方传教会(意)
郑州	主教	丁玉守	(意)
驻马店	同	袁克治 ×	会外神职界
归德	同	陈明理	重整奥斯定会(西)

洛阳	同	巴友仁	巴兰玛沙勿略会(意)
南阳	同	南岭梅	密良外方传教会(意)
信阳	同	张作恒 ×	耶稣会
卫辉	同	林栋臣	米兰外方传教会(意)
新乡	监牧	米 干	圣言会(美)
四川重庆	总主教	尚惟善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成都	主教	骆书雅	同(法)
康定	同	华郎廷	同(法)
嘉定	同	邓甘霖 ×	
宁远	同	包明扬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顺庆	同	王文成 ×	会外神职界
叙府	同	林	巴黎外方传教会
万县	同	王泽溥 ×	会外神职界
湖北汉口	总主教	罗锦章	方济各会(意)
汉阳	主教	高尔文	高隆庞外方传教会(爱尔兰)
宜昌	同	顾学德	方济各会(意)
蕲州	同	佳格理	同(意)
老河口	同	费乐理	同(意)
施南	代权	顾学德	同(意)
武昌	主教	郭时济	同(美)
蒲圻	监牧	(缺)	
沙市	同	狄隆	方济各会(美)
襄阳	同	易宣化 ×	会外神职界
随县	监牧	龚成德	方济各会(爱尔兰)
湖南长沙	总主教	蓝泽民	同(意)
常德	主教	王德纯	奥斯定会(西)
衡州	同	柏长青	方济各会(意)
沅陵	同	欧克澜	苦难会(美)
澧州	监牧	马国珍	奥斯定会(西)
宝庆	同	龙博义	方济各会(匈)
湘潭	同	佳索理	同(意)

岳州	同	高凤翔	奥斯定会(西)
永州	同	德志恒	方济各会(意)
江西南昌	总主教	周济世 ×	遣使会
赣州	主教	和若望	同(美)
吉安	同	梅雅谊	遣使会(意)
南城	同	利伯高	高隆汴外方传教会(爱尔兰)
馀南	同	光一幸	遣使会(美)
浙江杭州	总主教	梅占魁	同(法)
宁波	同	戴安德	同(法)
台州	同	胡若山 ×	同
丽水	监牧	杜绝蒙	
福建福州	总主教	赵炳文	多明我会(西)
厦门	主教	茅中砥	
福宁	代理	赵炳文	多明我会(西)
建瓯	监牧	谷源真	多明我会(美)
邵武	同	王峻德	救世主会(德)
汀州	监牧	雷斯基	
广东广州	总主教	巍畅茂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香港	主教	恩理觉	米兰外方传教会(意)
嘉应	同	福尔德	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美)
江门	同	柏增	同(美)
澳门	同	罗若望	耶稣会(葡)
北海	同	祝福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韶州	同	欧尔额	不详(意)
汕头	同	和敬谦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海南	监牧	德文斌	比布斯圣心会(法)
广西南宁	总主教	沈士杰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梧州	主教	唐	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美)
桂林	监牧	罗	同(美)
贵州贵阳	总主教	蓝士谦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安龙	主教	贾禄	同(法)

石阡	监牧	包美德	德国圣心司铎会(德)
云南昆明	总主教	德为能	巴黎外方传教会(法)
昭通	监牧	(缺)	
大理	同	徐司庆	法国圣心司铎会(法)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元旦,南京天主教会在石鼓路天主堂举行两大典礼:(一)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公布教廷在华设立圣统制诏书,于斌宣读服从教廷决议誓文,牛若望神父用国语宣读教廷诏书译文;(二)于斌总主教举行就职仪式,黎培理授予教宗颁赐羔羊项带一条,其致辞由秘书陈哲敏译成华语。○2月2日,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在上海董家渡天主堂祝圣惠济良为上海教区主教。上海成为正式的主教区。○3月19日,由方豪司铎所编之《马相伯先生文集》由上智编译馆发行,该书由于右任题签,陈垣作序。方豪向奉马相伯为老师,抗战胜利以后,在南京天主堂搜得马氏家谱及遗著,回北平后又在英敛之寓所搜得更多的马氏函件,遂编成此书。○5月16日,第一次公教出版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址设在上海岳阳路197号,出席会议的人员有: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总主教、南京于斌总主教、教务委员会出版组临时秘书师人杰司铎、河北献县天主堂印书馆代表 A. Bernard 司铎、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代表 Cesbron Laveau 司铎、上智编译馆代表方豪司铎、河北献县印书馆代表 Kammarer 司铎、圣母圣心(普爱堂)出版事业代表 Legrand 司铎、遣使会出版事业代表吴宗文司铎、香港澳门撒肋爵印书馆代表 Pomati 司铎,撒肋爵会印书馆代表 Suppo 司铎、耶稣会出版事业代表王昌祉司铎、中国公教真理学会代表叶秋原先生、南京圣保禄会代表 P. Bertino 司铎、南京《益世报》记者张天松先生、安庆天主堂印书局代表 Heras 司铎、辅仁大学出版事业代表 Koster 司铎、南京教区出版事业代表牛若望及董世祉司铎、方济各会出版事业代表 Peeters Hermes 司铎、武昌教区代表 Sig. Schneider 司铎、撒肋爵会出版事业代表胡重生司铎、震旦大学出版部代表王仁生司铎、上智编译馆秘书袁承斌先

生。○6月20日,徐宗泽神父患伤寒症不治去世。上海天主教进行会等三十余团体,于7月10日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追悼大礼。○8月,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初访平津,方豪在《益世报》发表《迎教廷公使北上——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社论,重申天主教本土化的意愿,并对教廷公使寄予期望。○教廷任命王木铎为宣化主教。景县、大名、汀州升格为主教区。○10月3日,陆徵祥和罗光在比利时修院签字审定吴经熊所译的《新经》译文,至此,吴经熊《新经》译本告成。此项审定工作由传信部谕令于斌负责,于斌再委托陆徵祥与罗光进行。

徐宗泽(1886~1947),字润农,为徐文定公十二世孙,二十岁时入耶稣会修道,继而赴欧美,攻读文学及神哲学,并晋升司铎。留学期间,先后得哲学博士及神学博士,1921年学成回国,在南汇县境内实习传教工作,两年以后,居徐家汇,主编《圣教杂志》,兼任徐家汇藏书楼馆长。他所主编的《圣教杂志》一直到抗战初期停刊,以后他专心致力于藏书楼的工作,搜集各地方志及明清耶稣会士遗著。徐宗泽神父著述颇丰,主要有《哲学史纲》、《社会学概论》、《社会经济学概论》、《宗教研究概论》、《天主教之战争观》、《教育之原理》、《社会问题》、《社会主义鸟瞰》、《天主造物论》、《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国天主教史》、《徐文定公年谱》、《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文定公徐上海传略》、《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影印徐氏庖言》、《明清间灌输西学之伟人》、《增订徐文定公全集》。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1月,田耕莘创办《铎声》月刊于北平。6月,田离平抵沪治疗眼病,从此未北返。○2月15日,黎培理在上海岳阳路197号建立“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简称“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英文名为“天主教中央局”(Catholic Central Bureau,简称C. C. B)。其成员有华理柱(James E. Walsh)、赵玉明(G. Pre-dost)、高乐康(Legrand)、梅雨丝(Charles Mcuus)、陈哲敏、沈士



贤、莫克勤(William A. Mc Grath)、田望霖(Alain de Terwangne)、田恩需(Terry)、穆德(Motte)、董世祉、张介眉。○2月15日至23日，黎培理召集“公教教育会议”，在上海假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举行，时任金科中学校长的龚品梅发表《教职员在教学上道德上宗教上应有之条件》，认为当前师范生大都“染赤色主义”，当局应将师范教育委托给天主教会以事反共，教会可以主办师范教育。○大理、丽水升主教区。○天津工商大学改制为津沽大学。○5月31日，美国史贝尔曼枢机由马尼拉飞抵上海，黎培理、于斌、胡若山、朱开敏、田枢机代表雷震远、惠主教代表格寿平、张伯达、王仁生、美国海陆军随军司铎、上海市长代表张彼得等前往迎接。6月1日，史贝尔曼在徐家汇大堂举行弥撒，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在圣伯多禄堂举行盛大欢迎会。3日，史贝尔曼离沪，乘机飞抵南京。蒋介石私人代表许静之、游建文，李宗仁私人代表陈江，南京市长沈怡，“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以及黎培理、于斌、朱若望、朱亦未、毛振翔、陈哲敏、刘宇声等到机场迎接。下午，李宗仁“副总统”假国际联欢社举行茶会欢迎，驻外使节、教会人士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蒋介石在黄埔路总统官邸举行宴会欢迎。参加者有史贝尔曼、司徒雷登、黎培理、于斌、翁文灏、吴鼎昌、薛岳、吴铁城、俞大维、李惟果、董显光、谢寿

1948年田耕莘枢机在北平门头沟与前来欢迎的教徒们合影

康、游建文、沈昌焕等等。蒋介石致词曰：“差不多四年以前，史贝尔曼枢机曾来到中国，那时我们还在抗战中，那时史枢机给我们精神上许多鼓励。他返美以后，对于美国物资援华，竭力提倡，美国天主教会对中国也有许多物资援助。现在我们在勘乱的时候，适逢史枢机再度来华，不胜愉快和荣幸，相信史枢机返国以后，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方面，一定有很多的帮助。”4日，史贝尔曼在于斌等陪同下至中山陵谒陵。5日晨，史贝尔曼离开南京。随同史贝尔曼来华的美国玛里诺会华理柱留在中国，后来他成为“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的秘书长。

天主教教务协进会是一个全国性的天主教领导机构，它的成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梵蒂冈的对华政策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梵蒂冈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交，互派公使。1946年12月，梵蒂冈驻国民政府的公使黎培理到南京，建立公使馆。天主教传入南京的历史比上海略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南京天主教徒的基础不如上海，因此黎培理在南京建立公使馆后，又选择上海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全国性机构。他向方济堂租了上海岳阳路197号，作为会所。这个机构的中文名称是“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简称“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英文名称则是“天主教中央局”（Catholic Central Bureau，简称C. C. B.）。从1947年至1948年的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内，他物色十二个人，作为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的委员。他们是：华理柱（James E. Walsh）、赵玉明（G. Predost）、高乐康（Legrand）、梅雨丝（Charles Mcuus）、陈哲敏、沈士贤、莫克勤（William A. Mc Grath）、田望霖（Alain de Terwangne）、田思霈（Terry）、穆德（Motte）、董世祉、张介眉。

华理柱，1948年美国纽约总主教史贝尔曼（Joseph Spellman）访华的随同人员。史贝尔曼回国后，他留在上海。不久，罗马教廷就任命他为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的秘书长。此人是第二次来华。他第一次来华是在1918年。当时，创立还不满十年的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向中国南方派遣了首批四名传教士，华理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到了广东江门。1924年3月12

日任监牧。1927年2月初升代牧，5月22日行主教祝圣礼。1936年7月，当选为玛利诺会总会长，回到纽约总部。在来中国开辟传教区的西方修会和外方传教会中，玛利诺会可说是后来居上。华理柱主持该会总部十二年后再度来华时，这个美国外方传教会已“动员一百余位神父和几乎同样多的修女”，“先后接管中国南方的十四个传教区”，“在香港成立一总务处”，“此外也参与东北地区的教务”。所以如此，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经济力量比其他西方修会和外方传教会雄厚，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黎培理建立天主教教务协进会，把领导权交给他，也是为了在经济上可有个靠山。

赵玉明，加拿大魁北克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曾在东北传教。东北解放后来上海。他是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副秘书长。

高乐康，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士，曾任西湾子总本堂和会长等职。西湾子解放后来上海，住圣母圣心会所设的账房——普爱堂。协进会成立后，即被聘为该会文化出版部主任，从普爱堂迁至协进会大楼。

梅雨丝，比利时人，1935年来华后入中国籍，又入海门主教区，成为该主教区的神父。当时那里的主教是朱开敏。朱请他向外募捐。他先回比利时，后又去美国。在美国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做了美国随军司铎，随美军到缅甸，由滇缅公路转到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同田望霖等在上海为海门主教区筹备设立账房。他到协进会是因为黎培理要他当财务组组长，得到了朱开敏的同意。

陈哲敏，中国神父，四川万县人。曾在罗马传信部大学读书，并在该大学教授过哲学。他是梵蒂冈驻国民政府公使馆的中文秘书。任协进会公教名词统一组组长后，仍经常去南京。

沈士贤，中国神父，汉阳人。他曾在罗马传信部大学读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去法国、瑞士、英国及爱尔兰考察教育。1948年回国后，到协进会工作。他的主要职务，和莫克勤一样，是发展圣母军。

莫克勤，爱尔兰高隆庞会传教士。曾在汉阳传教。圣母军的发源地是爱尔兰，黎培理要在中国发展圣母军，请了这个爱尔兰人到协进会任圣母军组组长。

田望霖，比利时鲍朗会会士，抗战胜利后来中国，入海门主教区，主持该主教区设在上海的账房。他在协进会任图画宣传组组长。

田恩霈，河北献县法国耶稣会士。他到协进会任劳工法律组组长。

穆德，河北献县法国耶稣会士，曾在北京耶稣会哲学院内教授社会学。协进会成立后，黎培理请他来上海，任该会家庭通讯组组长。家庭通讯组是当时中国各地天主教会互通消息的通讯机构，每半月用拉丁文出《家庭通讯》一期，读者对象是神父。

董世祉，生于上海，读书和开始修道也在上海，后忽而去北京入本笃会，忽而离开本笃会转入山东一主教区，又从这主教区自费去瑞士读神学，终于在那里成为神父。1936年，他加入由于斌任主教的南京教区。抗日战争期间，于斌离开南京教区，他也离去，到了后方。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上海。董世祉协助黎培理筹备成立协进会。协进会成立后，董任教理讲座组组长。

张介眉，甘肃武威县人，主徒会神父。主徒会是北方的国籍修会。协进会成立时，他在北京《铎声》编辑部工作。《铎声》的读者对象是中国神父。黎培理为使这刊物由协进会来办，邀张介眉来上海，委任他为协进会中文传教杂志组组长。协进会成立后，出外文、中文两种杂志。由张任主编的中文杂志，是《铎声》的继续，但不称《铎声》，也无定名。如第1期称《敝帚一扫》，以后每期换一名称。

协进会除十二个委员外，还有原属汾阳教区的高思慎、原属安国教区的侯之正和上海教区的张维屏。这三人都是中国神父。高和侯都毕业于罗马传信大学。张成为神父后曾去法国巴黎进修。在协进会内，高任公教学校组组长，侯是陈哲敏

的副手，张任公教进行会组组长。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第748-751页〕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1月15日，陆徵祥逝世于比利时冈城。1月19日，宗座代表钱铎 Cento 主教在圣安德肋隐修院主持其葬礼。参加葬礼者尚有金问泗、钱泰之代表罗光、比利时国王代表比冷能 (Jacques Pirene) 爵士和培德夫人家属。○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4月21日，国民党从南京撤退，所有外交使团人员亦离去，只有宗座公使和苏联大使留下。1951年9月5日，黎培理及其秘书卡比阿 (Mgr Joseph aprio) 和翁顿 (Herma Uden) 被驱逐。据2月22日《益世周刊》载：关于教会人员撤退问题，教廷已有明确表示：“(一)大修院生迁往安全地带，继续学业；(二)关于小修院生，教宗谓全迁往遥远地区，使能继续进修，或无可能；(三)至布道人员，除少数有特殊危险者可避走外，教宗谓其他圣职人员得留守岗位。”2月15日，上海耶稣会文学院修士由中国籍神父王昌祉率领，初学院修士由法籍神父山宗泰率领，共五十人，乘船避往菲律宾。4月23日，徐家汇总修院十八名大修道生，由中国籍神父蔡总贤率领，乘船抵达香港南华总修院。不久以后，主母会神师神父张家树和松江光启中学校长连国邦率领主母会修士去了澳门。两湖总修院亦迁往澳门，鲁南总修院、景县大修院迁往菲律宾，浙江嘉兴文生总修院二十余人，及北平、顺德、正定、衡阳教区部分修生迁往意大利热那亚修院。○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6月9日，罗马教廷任命雷震霞为山西汾阳主教、段荫明为四川万县主教、邓甘霖为四川嘉定主教、龚品梅为江苏苏州主教。同日宣布扬州、海州为监牧区。○7月26日，罗马教廷委任皮漱石为沈阳总主教。○11月3日，教廷委任张克兴任西湾子辅理主教。28日，教廷又委任李保禄为山东临清宗座监牧。○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广东。○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主要参考书目

Charles Wilfrid Allan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Shanghai, no date
艾伦:《京廷之耶稣会士》,上海,无出版日期。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Mission de Se - tchouan(1920)
Mission du Kouang - tong. Paris. Têqui.
陆南:《中国传教区的历史》,巴黎泰吉书店。

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 ~ 18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科恩:《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年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
运动》。

Geonge A. Dune

A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Uniuersity Press, 1962.
邓恩:《一代伟人:耶稣会士在明朝最后数十年的史话》,
圣母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

Pascal M. D' Elia

The Catholic Mission in China. Shanghai. 1934.
德礼贤:《天主教会在华》,上海,1934 年。

Régis Evariste Huc

Christianity in China, Tartary and Tibet, 3vol,
London, 1857 ~ 1858.

古柏察:《基督教在中国、鞑靼和西藏》,伦敦,1857 ~
1858年。

Jerome Heyndrickx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in
19 and 20 th Centuries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1994.

韩德烈主编:《19 ~ 20 世纪中国天主教会历史研究》
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出版,1994 年。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纽约,1929 年。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7vols,
New York 1944.

赖德烈:《基督教扩展史》7 卷,纽约,1944 年。

Arnold H. Rowbotham.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2.

罗伯兹曼:《中国朝廷的耶稣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
分校,1942 年。

Ray R. Noll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1645 ~ 1941)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 1992.

诺尔主编:《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
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中心,1992年。

Bertan Wolfersta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1860 ~ 1907.

London, 1909.

Colombel, Aug. M.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Shanghai. no date

Jean - Paul Wiest

Margknoll in China.

Margnoll. New Yonk. 1997.

《利玛窦中国札记》

何兆武、何高济、李申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

(台)利氏学社 2002 年版。

《柏郎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

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鄂多立克东游录》

何高济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C. R. 博克塞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

何高济译,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A. 穆尔著:《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

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白晋:《康熙帝传》

载《清史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室编。

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

王立人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

澳门基金会和澳门文化司署,1996年。

古柏察:《鞑靼西藏旅行记》

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

田英杰:《香港天主教会掌故》

香港圣神研究中心,1983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

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

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安田朴、谢和耐:《明清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

耿昇译,巴蜀书社1993年版。

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

梅乘骥译,上海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8年。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下二卷)

岳麓书社 1987年版。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下三卷)

中华书局 1988年版。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

台北学生书局 1969年版。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

台北学生书局 1969年版。

李东华编著:《方豪先生年谱》

(台)国史馆,2001年。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二卷)

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年版。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上海书店 1991年版。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中华书局 1990年版。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中华书局 1980年版。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三联书店 1987 年版。

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二卷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

高振农等主编:《上海宗教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纪念利玛竇来华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辅仁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南怀仁逝世三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辅仁大学,1987 年。

《郎世宁之艺术——宗教与艺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辅仁大学,1991 年。

《纪念汤若望诞辰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辅仁大学,1992 年。

辅大天主教研究中心编:《纪念六位国籍主教祝圣七十周年、建立圣统制五十周年暨田公耕莘晋升枢机五十周年学术会议论文集》

辅仁大学天主教史研究中心,1997 年。

罗光:《徐光启传》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罗光:《陆徵祥传》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

罗光:《利玛窦传》

(台)辅仁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罗光:《罗光全书》(三十九卷)

(台)学生书局 1999 年版。

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台)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东方出版社 2000 年版。

刚恒毅:《残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

(台)主徒会,1976 年。

刚恒毅:《零落孤叶——刚恒毅枢机回忆录》

(台)主徒会,1980 年。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刚恒毅枢机回忆录》(一、二)

主徒会,1980 年。

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

(台中)耀汉小兄弟会编译,1990 年。

陈方中:《于斌枢机传》

(台)辅仁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顾保鹤:《中国天主教史大事年表》

(台)光启出版社 1984 年版。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

(台)“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专刊(1985 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版。

诺尔编,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

(中译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4 月版。

陈垣:《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辑

(台)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974 年版。

吴汝伦编:《李文忠公迁移垂池口教堂函稿一卷》

商务印书馆 1921 年出版。

林家骏:《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一)

澳门天主教教务行政处编制,无出版年月,为林主教赠。

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下册)

澳门基金会,1999 年 11 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粹》

澳门基金会,2000 年。

赵庆源：《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及其首长接替年表》

(台)闻道出版社 1980 年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

(1-5)

中华书局 1996 年至 2000 年出版。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日志》(上、下卷)

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

作者 =

页数 = 5 3 4

SS号 = 1 1 3 4 5 3 4 6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